

70 YEARS OF
WIND AND RAIN

风雨
70
年

张建华

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张建华，1944年1月2日出生于湖南宁远县老张家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64年考入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在电机工程系工业企业自动化及电气化专业学习，并在武汉参加了文化大革命。1970年9月分配到云南铁路建设指挥部汽车机械修配厂工作。

1980年9月“揭榜应招”，成为修配厂厂务委员会负责人，开展企业改革取得成功，接着出任厂长，后因文革问题被“记录在案”，为此所累，于1986年底调离铁路建设公司，在云南毛巾厂从事技术工作。在云南毛巾厂工作的七年间曾发表过多篇科技论文，获得一项国家发明专利，并因此被收录入《中国当代科学家与发明家大辞典》第一卷。后毛巾厂面临破产，从1993起外出打工，直到2013年底，共二十年。

作者从小立志对国家民族有所作为，虽事不如人愿，屡屡受挫，以致今天落入社会最底层，但仍初心不改。

责任编辑：钟 逸

封面设计：钟 惠



定价：140元

题 记

人是应该有所信仰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更应该有自己的信仰。没有信仰的人，生命就没有追求，就没有目标，就只能是形同草木，自生自灭。没有信仰的民族和国家就没有凝聚力，就只能是一盘散沙，更谈不上什么振兴和发展了。

世界上不同的人和国家有不同的信仰。有的人和民族信仰上帝，有的信仰金钱和权力。在中国，只能是信仰毛泽东，信仰他的思想。因为毛泽东思想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智慧的集大成者。

如果说宗教是信仰的集中体现，那毛泽东及其思想就是中国和世界上最高等级的“毛泽东教”。

70 YEARS OF
WIND AND RAIN

风雨

70
年

张建华



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数据

风雨七十年 / 张建华著

—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8.4

ISBN978—988—77055—8—1

I. 风… II. 张… III. 回忆录

风雨七十年 张建华 著

责任编辑：钟 逸

封面设计：钟 惠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40.25

字数：595 千字

印数：1—500

2018 年 4 月第一版

2018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2018

Copyright China Cultural Communication Pres 2018

香港新世界粉岭安全街 33 号丰盈工贸中心 5 字楼 G 座

Unit G 5/F,GOOD HARVEST CENTRE, 33 ON CHUEN STREET,

ON LOK TSUEN,FANLING,NEW TERRITORIES, HONGKONG

Tel:00852—39216033

Fax:00852—25285333

定价 :140.00 元

自序

传记大家托马斯·卡莱尔说：“历史是无数传记的结晶”。作家、诗人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说：“确切地说，没有历史，只有传记”，“传记的作用应该在历史之上”。这说明写传记对后人认识真实的历史有着重大的意义。

几年前我就有写回忆录的想法。我的一些同学和朋友也支持我写回忆录，希望能将我们这一代人经历的风风雨雨如实地纪录下来，让后人能对我们亲历的这一段历史有一个真实的了解。

近几十年来我国的传记作品不多，而且一些名为“传记”的作品严格来说不能算是传记。在图书馆，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将帅关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大量回忆录及关于这些将帅的传记，也可以看到外国人或中国人写的毛泽东、周恩来等少数领袖人物的传记。但我们几乎看不到我国现代政治人物和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自己写的回忆录，更看不到曾经历了这些事件的平民百姓写的回忆录了。

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现代一些回忆录的作者往往只写正面的而不写负面的事实，以致一些历史真实被抹杀。我们从小学到大学，一直都是受的“正面教育”。因此，即使我们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对中国的近、现代史，特别是民国史也缺乏全面的、必要的了解。在电影《血战台儿庄》上映以前，我们这一代人中的大多数一直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完全是共产党领导，由八路军、新四军进行的，而国民党则是“顽固派”，是消极抗日的。这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又如，邓小平执政后几乎所有的主流媒体和文学艺术作品都一致在声讨林彪、“四人帮”的同时也言辞激烈地声讨造反派红卫兵，致使今天的年轻人大多数对文化大革命缺乏全面了解。一提起造反派红卫兵，他们总是嗤之以鼻，认为红卫兵造反派是一些缺乏教养、不讲道理、一无是处，甚至是无恶不作的洪水猛兽。我作为当年的造反派红卫兵，可以负责任地说事实并非如此。

现在我们中的很多人对历史持冷漠的态度。他们（特别是一些重要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本来有责任也有能力、有条件以回忆录的形式

自序

将真实的历史事实公之于众的。但他们就是不写，宁愿让一些极为宝贵的资料灰飞烟灭。有的即使写了也不肯说或是不敢说真话，以致我们作为亲身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对很多事实并不清楚，更不了解其发生的原因及其后果。如：大跃进的前因后果是什么？三年自然灾害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发生，其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是什么？

一个不善于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以史为鉴绝不仅仅是政治家们的事，而是整个民族的事，是全体老百姓的事。在迈向强国之路的今天，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总结历史经验方面，特别是在总结近七十年来的历史经验方面，我们还有大量的事情要做。

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遗憾的是，我们中的很多同胞，包括一些领导者却很容易地就将刚发生过的事给忘记了。比如对十年文化大革命，一些“革命”领导干部不去分析文革之所以发生的社会的、文化的、历史的深层次原因，不承认文革的积极意义。对文革中负面的东西，他们不是去承担自己本应承担的责任，而是简单地给文革下个“是完全错误的”的结论，并将责任一股脑儿地推给毛主席一个人。这绝不是历史事实，也是极不公正的。

正由于国人没有认真汲取历史的教训，当权者们在反文革期间的“个人崇拜”的同时又继续搞起了自己的“个人崇拜”，如将“伟大导师”换成“总设计师”什么的；在批判“两个凡是”的同时，又将某一领导说的不管什么话都奉为“圣旨”，甚至将算不得什么理论的俗语也奉为指导中国建设的“理论”；在批判“怀疑一切”的同时又怀疑所有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并将参加文革的大小头头统统打入“另册”，如此等等。总之，他们转瞬间就将刚发生过的惨痛教训全忘记了，这是十分令人忧虑的。

我认为写回忆录一定要坚持客观性、真实性和公正性。否则将对不起历史，对不起希望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教训的人们。

我的这本回忆录主要是根据我不同时期的日记、会议记录、文稿和当时收集的资料写成的。因此，我对这本回忆录所记述事实的“历史真实性”是肯定的。

有人认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甚至是一个最底层的老百姓写回忆录

(或自传)毫无意义。这是不对的。梁启超在谈到传记的写作时就曾说过：“至于普通人物，多数的活动，其意味极其深长，有时比伟大人物还重要些，千万不要看轻他们。没有他们，我们看不出社会的真相，看不出风俗的由来。”¹

我相信，凡看了我的回忆录中《体验“大跃进”》这一章，多数读者会注意到：当时从中央到地方，亿万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激情已经到了疯狂的程度。对于大跃进激情带来的负面影响，一切善良的人都是愿意原谅的，因为那是年青的共和国为着共产主义的理想而犯的错。就像人们都能原谅一个为理想而干了一些错事、傻事的毛头小伙一样。因此，过分埋怨甚至指责大跃进的错误是没有必要的。

我相信，凡看了我的回忆录中《“三年困难时期”的回忆》和《“男人十五，穿州过府”》这两章，多数读者会注意到：当时整个国家确实都很困难，从中央领导到普通百姓都吃不饱饭，这确实是事实。但这个困难绝不是像《墓碑》所描述的到了“饿殍遍地”的程度。

我相信，凡看了我的回忆录中《在院革委会任职时的那些事》这一章，多数读者会注意到：即使像我这样的造反派红卫兵，也都是既有思想又有操守，既有年轻人的烦恼也有浪漫爱情的普通人，绝不是一些无良作家所说的“洪水猛兽”。至于文革期间的社会生活，虽然在一些局部的地方出现过武斗现象，也有个别人违法乱纪，但就整个社会而言是和平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和谐的，绝不是后来主流媒体所描绘的“红色恐怖”“浩劫”。

我相信，凡看了我的回忆录中的《改开篇》，多数读者都会注意到：改开之初，广大人民群众是支持并拥护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但后来却不支持、不拥护了。因为随着私有化的进展，人们的生活虽有所改善，但却发现自己主人翁的地位没有了，由“主人”变成“被雇佣者”了，贪官污吏多了，黄、赌、毒又回来了。于是，他们就怀念起毛主席，怀念起毛泽东时代了。

不可讳言，不同出身、不同学历、不同经历、不同生活环境的人，会因立场、视角的不同而对同一事物的认识会不同，甚至是完全相反的。

1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21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自序

这是很正常的，完全没有必要大惊小怪。

因此，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拿起笔来写回忆录。特别是希望那些曾经是政治人物、曾直接参与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人站出来，按自己的立场和视角来记录自己经历的历史。我想只要自己认为是真实的而不是编造的，那都是有价值的，都是应该受到欢迎和尊重的。只有不同立场的人充分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历史学者们才有可能综合各种不同的意见得出公正、公允、客观、真实的历史结论，让中华民族能更好地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早日实现强国之梦。

但愿我的《风雨七十年》能抛砖引玉！

《风雨七十年》完稿后我真是如释重负，心里已经踏实了。因为我终于把想做的事做完了，我已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张建华

2017年10月于昆明

目 录

自序

童年篇

- 第一章 老张家村 1
- 第二章 我的父亲母亲 6
- 第三章 童年记忆 15

求学篇

- 第四章 求学之路 37
- 第五章 体验“大跃进” 42
- 第六章 “男人十五，穿州过府” 56
- 第七章 “三年困难时期”的回忆 61
- 第八章 感谢班主任唐慧老师 76
- 第九章 学习雷锋好榜样 83
- 第十章 在院广播台当文艺编辑 89

文革篇

- 第十一章 万人辩论大会 98
- 第十二章 北京串连 108
- 第十三章 成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华工总部 122
- 第十四章 炮轰省委 131
- 第十五章 接管院广播台和出版科 143
- 第十六章 走出学校闹革命 153
- 第十七章 造反派夺权与造反派分裂 173
- 第十八章 我经历的武汉七二〇事件 192
- 第十九章 “钢新之争”再起 286
- 第二十章 在院革委会任职时的那些事 319
- 第二十一章 工（军）宣队进驻华工 358

- 第二十二章 难忘在咸宁的日子 384
第二十三章 《寄影书》 401
第二十四章 我说文革是与非 419

改开篇

- 第二十五章 投身改革 449
第二十六章 再起再落 473
第二十七章 初识建设厅长万跃林 487
第二十八章 直面官僚 504
第二十九章 新任公司经理米楠楨 521
第三十章 魔咒“记录在案” 535
第三十一章 改革走入歧途 542
第三十二章 调离铁路建设公司 553
第三十三章 在毛巾厂七年的那些事 561
第三十四章 打工生涯 570

附录

- 拾贝集 621

跋

第一章 老张家村

我出生在湖南省永州市大陂张家老张家村。

我们村位于宁远县舜陵镇东 25 公里，撤乡建镇前属宁远县太平区云潭乡，现归属于冷水镇。

我们村解放初有 300 多户人家，现有近 500 户，全部都是张姓。

在我们村附近还有新张家村、大陂岭村、石佳坪村、大山里村、大岭里和毛坪头村等大小六七个村子，也全都姓张，都是大陂张氏族。如果加上散居在邻县、邻近乡镇六十多个村的张氏族，现总人口在两万人以上（2006 年重修族谱时男性入谱人数为 11286 人）。

据清顺治十一年（1654 年）《大陂张氏宗谱序》及清乾隆十四年（1749 年）大陂张氏族谱《重修家谱源流序》记载：我们大陂张氏一族的先祖是北宋仁宗朝任殿中丞、涪州知州的张迪。张迪的祖籍是河南开封，出生在长安（今西安），侨居在凤翔府（今陕西眉县）横渠镇，其子张载（1020—1077 年）字子厚，是当时“关中学派”的创立者。“关中学派”对我国思想史、哲学史有着重大的影响。张载创立的“关学”在当时与“洛学”（程颢、程颐创立）、“新学”（王安石为首）、蜀学（苏轼父子为中心）齐名。在理学史上，“关学”又与“濂学（周敦颐）、“洛学”（二程）、“闽学”（朱熹）同称四学派。

嘉祐二年（1057 年），38 岁的张载中进士，从此涉足官场 12 年。他先后任祁州司法参军、丹州云岩县令、崇文院校书等，都是小官，但都是清官。他位卑职小，却有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从“民吾同胞”的观点出发，提出了“为政者，在于足民”的口号，赞成改革，认为要解决贫富不均，必须推行井田制，从政“以敦本善俗为先”。张载为学提倡“学以致用”，以“知学然后能勉，勉然后进而不息”为座右铭。

张载一生著述很多，有《西铭》《东铭》《横渠正蒙》《经学理窟》《易说》《礼乐说》《论语说》《孟子说》《崇文集》《张子语录》等 14 种。张载提出的“神无德，化无道，德其体，道其用，一于气而已”，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气一元论”的本体论，这是中国思想史上前所未有的，

是 11 世纪哲学在唯物论方面的最高成就。

张载自幼好学，志向远大。他认为作为一个大丈夫，应“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张载的著作直到明清两代还作为开科取士的必读书，其“四为句”至今仍激励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为中华的振兴奋力拼搏。这充分反映了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为纪念先祖张载的功德并学习他的治学精神，大陂张氏一族的祠堂号取名为“两铭堂”。

张载传张彦直、张观。张彦直和张观分别迁徙到江苏常州和江西泰和鹅井塘。

张彦直生四子，并相继登科，成为常州一大美谈。常州郡守徐申取五代窦禹钧“灵椿丹桂”的典故，上书申请在城内建造“椿桂坊”以贺。“椿桂坊”之名一直流传至今。我家老屋天井照壁两侧曾留有一副对联，写的就是张彦直的四子登科的故事。张彦直四子中的张守，字全真，又字子固，崇宁元年进士及第，是南宋名臣，封魏国公，谥号“文清”。他与同时代很多著名人物都有交集，如南宋“中兴四将”之一张俊与其交好；岳飞过常州时曾专门拜访他，并留下了诗篇。

根据族谱记载：“祖派大宗张守，先绳武表，其字隶，籍眉陕，博士世袭……。而我观公者，盖其小宗者也”。我们大陂张氏一族的先祖是张观。张观曾为宋哲宗元辅，后“以使相守零邑舜祠”，并定居于九嶷山由村洞。箕山（九嶷山）是我们大陂张氏一族的“祖山”，而保存至今的九嶷“永福寺”则是我们大陂张氏族人的祖庙。

九嶷山古称苍梧山，风景秀丽，人文历史丰厚。现存主要有舜庙、舜帝陵和紫霞岩、玉琯岩等岩洞，现已建成为九嶷山森林公园。毛泽东《七律·答友人》一诗中有“九嶷山上白云飞”句，使九嶷山光彩倍增。

到元朝末年，各地反元势力纷纷而起，零邑地区的李孟九也趁机造反，致使当时社会极为混乱。为避兵灾，张氏家族“兄弟分迁，万一公、万二公，万三公各卜善地而居，万一公后裔卜居零陵接履桥，万二公后裔卜居本邑大阳洞，万三公后裔卜居本邑之大陂洞”。“万三公始迁大陂洞，既而归于白鹤湾”，白鹤湾就是今天我们的老张家村。

老张家村地处南岭山地中部，雾云山东北余脉，属丘陵地貌。

我们村坐北朝南，沿背脊山脚东西分布。村中的道路为四纵六横，均为青石板路。

我们村的建筑多为明清建筑，一色的青砖青瓦。最典型的结构是：以堂屋为中心，两侧是正房，前面是天井，后面正中是神坛，供奉天地及历代祖先。富裕人家的天井一边是照壁，照壁两侧是厢房。神坛后又是两间偏房。解放前的建筑多为两层，砖木结构。

我们村有两眼清泉。村东北一眼深数丈，出水大故名“大水井”。而村东南一眼因常有枇杷大小的水泡冒出，且玲珑精致，故名“枇杷井”。两口泉水常年清澈甜爽，冬暖夏凉，是全村人上好的生活用水。

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村民用水都是去井台挑；九十年代后，各家都用上了来自两口清泉的“自来水”。

村前有一口约五十亩左右的大池塘，名“白鲢塘”，是全村雨水和生活废水的集散地，也是全村消防用水的取水地。上世纪七十年代前，每年秋冬之交农闲时，村里都要对白鲢塘组织一次“干塘”活动。

所谓“干塘”，就是用六七部水车同时抽水，将水塘抽干。水抽干后，用大量的稻草踩于淤泥中，再将裹有淤泥的稻草拖到岸上堆码起来，让其自行发酵、腐烂、干燥，待来年开春后运往田间作肥料。

淤泥是一种很好的有机肥。因此，每年的“干塘”活动既是对池塘的一次彻底清理，同时也是一次积肥活动。

由于每年都对白鲢塘进行彻底的清理，加之有枇杷井活水流入，白鲢塘的水质总能保持清亮，是孩子们夏天游泳、捉鱼，冬天滑冰的好地方。

我们村的龙山叫“背脊山”。背脊山形似一只悠闲散步的大象，故又名“象山”。因四季封山，故林木茂盛。

村的東西两侧高地有两片林地，古木参天。1958年大炼钢铁时背脊山和两侧林木曾遭到严重破坏，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得到基本恢复。可惜的是原来成片的古木现留存下来的已寥寥无几了。

在我们村的东边有一座妇孺皆知的“四山百公庙”。解放前，我们那里有很多寺庙，有“三里一庵，五里一庙”之说。土改时所有寺庙都被拆除了，唯有我们村北的四山百公庙保存了下来。庙里供奉的是八方诸神，据说十分灵验，几百年来村民初一、十五必去敬奉。

我们大陂张家在文化、习俗、饮食等各方面均与邻近村落差不多，唯一不同的是我们大陂张家有自己独立的语言——“张家话”。

在我们宁远县有四种语言：“官话”“平话”“瑶族话”“张家话”。官话即官方语言，也是我们县的通用语言，几乎人人会讲（从发声、音调看，我们那里的“官话”与桂林方言相近）。

在宁远县，平话是仅次于官话的一种语言，会平话的人占半数以上。瑶话是瑶族的语言，我们县有四个瑶族乡，近两万人，他们基本上都集中在九嶷瑶乡。而张家话现只存在于我们大陂张家。大阳洞张家和零陵接履桥张家的语言都早已被当地语言（平话）所同化。

张家话是一种独立的语言。除近现代出现的一些专用名词外，几乎包括日常生产、生活、天文地理的所有词汇。

一种语言的产生、发展、流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从小至今就一直没有弄明白“张家话”是从什么时候才有的，它源于什么地方。是源于江西鹅井塘还是陕西眉县的横渠镇？看小说发现陕西有些地方叫父亲为“大”，而我们张家话叫父亲也是“大”，这其中是否有一定的关系？我们叫母亲为 yē(椰) 或 nà(娜)，叫哥为 gù(固)，叫弟为 māo(猫)，不知陕西叫父亲为大的地方叫母亲、兄弟和我们那里是否一样。如果一样或近似，也许我们的“张家话”就找到出处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县级公路修到了大陂张家，随后通了客运班车。改革开放后，张氏族人为适应市场的需要，在龙华堂小学附近新建了一个交易市场，一些在外打工赚了钱的张氏族人（包括老张家村、石佳坪村、大山里村）陆续在龙华堂沿公路两侧建起了新房。2017年清明节我回家扫墓时发现新村已初具规模，并起名为“玉屏新村”。原老张家村已有近一半的人家先后搬进了新村，而石佳坪村新建的住房已与新村连接在一起了。

我的三个侄儿石志、贤志、壮志也都在新村盖了新房，现只有二哥一个老人还住在原来的老房子里。

新建房屋多为三层，也有六层以上的。房屋结构、内外装修及设施和现在的中小城市没有多大差别。更有甚者，我发现新村里还有仿欧式的建筑，有高大圆柱的门厅还真是够气派的。至今仍住在老村子里的绝

大多数是老年人，他们舍不得离开他们长期生活过的老祖业。

那些在新村规划时没有买到宅基地，在新村附近又没有分到“责任田”的人家，则在老村四周另择宅基地建房。原村东西两侧高地上现都建起了新房，只是新房在建筑结构上与老村的不一样了，原来都是土木结构，而新建的一般都是砖混结构了。

由于大部分村民都搬入了新居，原有住房现已无人居住而荒废。一些大院已经垮塌，原来曾是富户人家的“雕梁画栋”今天也成了一堆朽木。

新村离老村虽然不到一公里，但这一公里的变化却反映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观念。老村代表的是封闭和保守，而新村代表的则是改革和开放。

老村的龙山像一头大象。其身躯和前、后腿构成了一个 π 字型，这个 π 字型内的地方就是家谱中所说的“白鹤湾”，整个村子就建在其中。先人们根据“阴阳风水”的相关法则，在村前白鲢塘外侧筑起了一道“塘头门”，将 π 字的下口给封上，从而使整个村子处于完全封闭的状态。据说这是为了“气不外泄，财不外流”。

这当然是一种典型的保守观念。保守的观念导致人为的封闭的地理环境，而封闭的地理环境又反过来强化并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因此，几百年过去了，老村并没有什么大的发展，人们在满足平静安逸生活的同时也就丧失了进取和发展的机会。

新村则建在公路两侧并与集市在一起。这就使人们的生活、思想、观念和市场、现代交通及现代通讯联系在了一起。

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人们的观念逐渐与时代同步了，经济上也就有了长足的发展。2008年清明节我回家扫墓时发现：一些年青人已不屑于自行车，也不满足摩托车作交通工具了，卡车、轿车已进了农家。电话自不必说，网络也普遍进了农户，我的侄孙们玩起电脑游戏来一点也不比城里的孩子逊色。

从元末万三公建村至今，老张家村已经历了元、明、清、民国、共和国五个时代近七百年的历史沧桑！但今天却很快就要被人们遗弃了。

看到老张家村的巨大变化，自然使人骄傲。但在这兴奋之余，我也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这是对老村庄的没落和一去不返感到失落，还是对千百年来农耕文化传统的消失感到悲哀？我还真有点说不清楚。

第二章 我的父亲母亲

一、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张光树，字文楷，号吉祥。生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农历九月十七日。

父亲兄弟五个。大伯张光校，三叔光权，四叔光柄，五叔光楹，父亲排行老二。



父亲张吉祥

父亲成年后常住九嶷。因万三公兄弟分迁不同地方时，我们张氏家族在九嶷还有一些产业需要有人照看。父亲的职责是协助家族管事的照看这些祖业。听父亲说，他在九嶷那段时间过得还是很愉快的，闲时他还常帮人拓印九嶷舜帝陵中历代名家留下的大量字碑。可惜他没有文化，不懂得这些碑帖的价值，因此，这些珍贵的碑帖字画我家一张也没有留下。

祖父张际轩是个乡间郎中，英年早逝，只活了45岁。祖父去世时父亲20岁。因下面几个兄弟均未成年，大伯又自幼残疾，父亲只好回到老家承担起一家六口的生活重担。因时运不济，家道迅速中落，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父亲苦苦地支撑着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他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开始是给有钱人家当挑夫，去钦州，下广东，挑盐运米。后来做点小生意，卖南货，卖时鲜水果。其中辛苦自不必说，但收入却很微薄，仅能维持一家人最基本的生活。

父亲直到32岁时才和母亲结婚。此时三叔和满叔已成家自立。

祖父在世时曾为父亲买了一个“童养媳”，也就是我们的大妈。大妈名叫梁冬秀，1904年出生。听大姐说，祖父去世后，祖母的性情变得十分暴躁和专横，大妈就是被祖母折磨死的。

一次，祖母叫大妈去晒 chǎng 子¹，因篷垫被一阵大风给掀翻了，大半 chǎng 子掉落到了池塘里。祖母为此大怒，不但罚大妈站在大太阳下晒了一天，而且三天不让吃饭，结果是一病不起。

父亲当时常住九嶷，很少回家。当父亲听到消息赶回家时，大妈已不行了，去世时年仅 14 岁。

父亲对大妈的死非常内疚和痛心。他们虽然还算不得是真正的夫妻，但父亲一直受到良心的折磨。他一直要我们称梁冬秀为大妈，而且每年清明节都要求我们必须给她扫墓祭奠。

父亲一辈子都信神，是一个典型的虔诚的佛教徒。在我的记忆中，父亲除过年过节要烧香拜佛外，初一、十五也是要向神灵敬香烧纸的。这一习惯即使在文革期间扫“四旧”时也没有间断过。

他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相信人间的一切善恶神明都知道，而且会管人间的善恶报应。他甚至认为我后来能考上大学、三哥能参加工作都是因为他敬佛、菩萨保佑的结果。就在他去世前一天的下午，他还一个人上山给“四山百公”上了香。那时父亲的白内障已经非常严重，几乎完全失明了。据村里的人说，父亲每次去上香并为神灯加油时，几乎一半以上的油没有倒在油灯里而是倒在地上了。

父亲一生不吃狗肉和黄鳝。他说狗是人的朋友和恩人，“在水淹‘天门’时，是粘在狗尾巴上的谷种使后人才得以生存和繁衍下来”。之所以不吃黄鳝，他没有说是是什么原因，我想大概是因为黄鳝和“皇上”同音的缘故吧。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一生中最大的爱好就是喝酒。我虽然从未见父亲喝醉过，但他确实是一天也离不开酒。对酒的喜爱到了什么程度？三年困难时期，一个人一天的口粮只有二市两，他有时就宁可让这宝贵的二两粮食变成酒而不是用来做饭吃。

¹ chǎng 子：一种颗粒像小米大小的粮食作物，每年 5、6 月收获，此时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上世纪五十年代前，我们那里还普遍栽种，但那以后就不见人种，市场上也见不到了。

父亲 1986 年 10 月 17 日去世，享年 93 岁，善终。

我给父亲拟的挽联是：

历三朝风云，阅尽人间沧桑。

经百年艰辛，倍晓世态炎凉。

二、我的母亲

人生的第一个老师是母亲。母亲对我的教育早在我还未变成真正的人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这就是现代教育学说的所谓“胎教”了。母亲的教育是刻骨铭心的，因为我自己不仅与母亲有着血肉的联系，而且有着基因和“灵”的传承。



母亲夏春女

母亲夏春女，己酉年（宣统元年，1910年）正月二十五日生于湖南宁远县下坠乡下塘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

我的母亲不识字，但她却在给了我生命的同时也赋予了我智慧、人格、尊严及坚持正义、刚直不阿、不畏强势、勇于抗争、助善扶弱的品格。

母亲 16 岁时与父亲结婚。生有子女九人：大姐贞玉，大哥明辉（6 岁时因牙病误服砒霜而夭折），二姐（4 岁时因出麻疹误服单方燕窝泥而亡），二哥柳生（明耀），

三姐月翠，三哥明友，我，大妹明翠，小妹芬翠。

母亲生性刚强、正直、聪明、善良，极具同情心，乐于助人。

母亲的刚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惧怕困难，天大的困难压不垮；

二是不畏权势，敢于抗争。

母亲来到我们家时面对的最大困难是贫穷。

我们家的贫穷从祖父去世后就开始了。

父亲与母亲结婚时我家已是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了。

战胜贫穷首先是要吃苦。而母亲就特别能吃苦。

由于家庭贫穷，又要抚养一大群孩子，父亲就外出做点小生意（主要做时鲜水果、竹器家具）。

母亲在家里外操劳。她既要照顾一大群孩子，又要下地干农活。我家没有水田，只有两亩多旱地，因此每年都要租几亩田地才能养活一家人。因当时我们兄弟姐妹年纪都还小，几乎全部农活都由母亲一人承担。父亲有时去当挑夫，帮别人从广东或广西运回食盐、大米等。在这种时候，母亲总要在父亲回来的当天下午到二十几里外的地方去接父亲，经常晚上十一二点才回到家。

农闲时，母亲就去帮有钱人家舂米，报酬是每舂一担谷子（100市斤）给一升米。舂米的程序是：首先是从谷仓将谷子挑到碓房，再将谷子去壳（用一种类似磨，但上下磨盘接触面的齿镶的是竹条的器具，操作与推磨相同，可将八成以上的谷子去壳。这种器具叫什么已忘了。自从有了打米机后，这种器具就被淘汰了）。接下来就是分批置于碓臼中舂。舂好后上风车去糠，并将米和糠分装后送到东家。舂米之艰辛我是深有体会的。记得上小学后，每逢星期天，我们兄弟姐妹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舂米，劳动强度之大绝不亚于挑着重担上山，以致我们兄妹小时个个都害怕去舂米。

母亲最为艰难的时期是1947—1948年。当时父亲右膝盖上长了一个毒瘤，因无钱上医院诊治，由乡里郎中用草药包治，疼痛难熬，整整半年下不了床。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母亲只好借高利贷。结果弄得家贫如洗，生活难以为继。为了生存，母亲含泪将尚未满18岁的大姐贞玉嫁出去后，又把当时还不满十二岁的二哥柳生送到离家五里多的梅村帮有钱人家放牛，让他自己养活自己。而她自己则不得不带着三姐月翠、三哥明友外出乞讨。为了把一群孩子养大，为了维系这个家庭，母亲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现在的人是难以想象的。在那极其艰难的日子里，

母亲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只要咬紧牙关坚持下去，就一定能把孩子拉扯大，就一定有翻身的一天。

正由于有这段经历，母亲特别同情那些因贫穷、伤残而孤立无助的人。从我懂事以来，我从未看到过上门乞讨者空手而归，从未看到母亲对那些有难来求的人无动于衷。

父亲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而母亲却不信佛，也从不去庙里烧香拜佛。但她信善，从无恶念、邪念，相信善恶有报。她以诚待人，以善待人，深得邻里的欢迎和爱戴。

母亲刚强的另一方面表现为不畏权势、不信邪。

有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大概是1948年秋吧，为了防止野兔、麂子等糟蹋庄稼，母亲就叫二哥、三哥他们在马鞍岭的一块地四周挖了几个陷阱。每天天刚亮，二哥、三哥就赶到地边查看是否已套住了野物。一天，当二哥、三哥赶到时，看到本村的一个中年汉子正从陷阱里向外拉出一只麂子，立即追了过去索要野物，可那汉子扛了野物就走，根本不予理睬。二哥、三哥人小力气小，根本不是那人的对手，只几下就被撂翻在地了。

兄弟俩回到家后将发生的事告诉了母亲。母亲认为这汉子太不讲理了，更不应该欺负孩子。于是拉了二哥、三哥俩去那汉子家论理。汉子叫张元魁，是本村的一个地主。他仗着他家财大地多及人多势众，蛮不讲理，根本就没有把母亲放在眼里，他甚至当着众人的面用桌上的酒杯砸向母亲。

在这力量相差悬殊的情况下，母亲毫不退缩，不卑不亢，据理力争。在乡亲们的声援下，气壮如牛的张元魁不得不将麂子还给了母亲。

还有一件事也是我至今难以忘怀的，那就是发生在土改时的一段往事。曾祖父生有三子，我的祖父排行第三。因祖父英年早逝，家道中落，到父亲这一代就成了曾祖父下面三房中最贫穷的一房了。在那个年代，贫穷人家是受歧视的，即使在同一个家族中也不例外。

在我们这个家族中，那些家境比较优裕的主妇们常因我家穷而欺负母亲。母亲天生的性格哪容别人欺负，相互间的冲突在所难免，因此，母亲在同族中也就受到排斥。

土改时，我们村基本上是我们家这一支（同一曾祖父）掌权。满叔福祥是我们村的农会主席，大哥（堂兄）福生任农会秘书，二哥（堂兄）明进当民兵营长。他们在十二叔的暗中操纵下试图利用职权整治我们的母亲，希望母亲能顺从他们。

按我们那里解放前的风俗，姑娘嫁到一个村子后，要在这个村子里认一个长辈为“亲爹”（我们则叫“亲外公”）。母亲认的是张继宣（这与母亲的一个堂姐先嫁给张继宣这一房的人有关），而张继宣土改时被划为恶霸地主。十二叔他们就以此为理由说我母亲是张继宣的“狗腿子”，将母亲捆绑、吊打，肆意折磨。

一天，我从老大厅旁边过，突然看到他们将母亲用扮桶（一种上大下小的方形木桶，在推广打谷机前，我们那里都用扮桶脱粒）反扣着不让回家，当时我几乎要气疯了，立即冲了过去要把扮桶抬起来，但扮桶纹丝不动。我急得大哭起来，嘴里还不断地叫骂着。他们看到我竟在农会大吵大闹，就像提一只小鸡一样把我提了出来。当时的情景我至今难忘，每想到此就会心里发紧，难以自制。

面对同族人的欺凌，母亲毫不屈服，以死抗争。这使曾经大世面的十二叔也毫无办法，不得不将母亲放了。母亲被放回家以后，她先是一次次去找驻村里工作组的田同志（女）和杨同志，后又到乡公所找土改工作组，向他们诉说冤屈，要求工作组主持公道，声张正义。土改工作组了解情况后严厉批评了十二叔他们的严重错误，为母亲恢复了名誉。在分胜利果实的时候，我家不但分到了应分的水田和旱地，同时分到了全村最好的房子（也就是我“亲外公”的房子）。

母亲年轻的时候身体结实、健康，胆子大，不怕鬼，不信邪，这在整个村子里是出了名的。有几件事我至今仍记忆深刻。

一天，母亲在地里干活时，突然发现一条杯口粗的大蛇向草丛中逃走，她一步冲上去右手抓住蛇的七寸处，左手将蛇身向尾部拉伸，大蛇很快被制服。当母亲把蛇拿回家时，人们无不对母亲的勇敢感到惊讶和敬佩。

又有一次，也是在地里干活，母亲看到一只小狼仔，她明知母狼离去不远，但她还是三两下制服了小狼，并将其抱回了家。当人们问她是

否害怕时，她竟爽朗地笑着说：这有什么可怕的，一个小畜生而已。

人们常说：远怕水近怕鬼。胆小的人一到天黑就不敢出门，更不敢去荒郊坟地里去了。农村里的鬼故事很多，说鬼故事的人往往说得有根有据，有鼻子有眼，使人不得不服。我们小时候是既爱听又怕听，对鬼是既好奇又恐惧。可母亲不信神，更不怕鬼。她经常一个人晚上去接“挑脚”未归的父亲，从不害怕。她常说：心中无鬼就不怕鬼，鬼总是怕人的，只有那些做了坏事、做了亏心事的人才会怕鬼。正所谓“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

母亲为人正直、宽容、聪明、善良且眼光长远。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们三兄弟均已长大成人。二哥柳生当时已是我们村的主要负责人，三哥进了湖南鲤鱼江电厂工作并在两年后被保送到长沙电力学院读书，而我于1964年考上了全国的一流大学——华中工学院，成了我们村的第一个大学生。这在我们那个相对比较落后的地方，不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我家都是令人羡慕的。但是，母亲从不炫耀，从不趾高气扬，更从不以势压人。二哥当村干部难免要得罪人，也难免说错话，办错事。在这种时候，母亲总是批评二哥，并安慰和劝导受了委屈的乡亲，一些人甚至后来都成了我家的朋友和常客。

母亲的宽容大度也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前面说到的土改时任农会主席的满叔福祥、民兵营长明进、秘书福生在十二叔的操纵下曾欲置母亲于死地（如果不是当时已懂事的三姐月翠日夜守护，母亲的命差点就没有了），但母亲后来并没有记仇，而且在他们困难的时候还尽量帮助他们。

我们兄弟成人后，母亲一再告诫我们：满叔他们和我们家以前一样，没有文化，也是穷人。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好好的，比他们都好，就不要记他们的仇了，更何况是同一族的人。怨怨相报无了期，对谁都没有好处。母亲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她没有记满叔等人的仇，而且反过来给了他们不少的关心和帮助。

满叔有三个女儿但没有儿子。为了延续香火，1958年，满叔决定在村里招赘。

在此以前，我们那里同姓联姻是不允许的，在同村招赘同姓的人更

是闻所未闻。父亲是一个最传统的人，他第一个出来坚决反对。但母亲却不然，她积极支持三姐用真的选择，并为其筹措婚事，使三姐极为感动。

婶娘是三年自然灾害时去世的，当时满叔穷得揭不开锅，更无钱买棺材了。在这种情况下，母亲提出将为自己准备的寿材让给婶娘用，满叔说什么也不同意。最后还是由母亲作主，千方百计地为婶娘办了后事。

母亲对二哥明进（同一房，在我们这一辈排行老二）一家的关怀、照顾就更不用说了。因为二哥不但和我家同属一个生产队，而且离我们家也近。

十二叔曾任蒋介石卫士长，解放前夕潜回家，“三反五反”时被政府查出了历史问题，定为“历史反革命”而进了监狱，出狱后不久就去世了。他的三个儿子没有享到他一天的福，而今却受到他的连累，日子过得非常艰难。母亲从来不和我们提十二叔的事，但却要我们对他的三个儿子给予关怀和帮助。

宽容、大度是中华民族的一种美德，是人格的升华。一个人能在逆境时不折不挠，不亢不卑，在顺境时不骄不躁，对犯过错的人甚至伤害过自己的人能既往不咎，能以德报怨、宽容大度，这实在是极为难得的可贵品质。

母亲的聪明才智也是常为村里人称道的。她虽不识字，但日常生活中用到的计算，如买卖中的价款、平均数之类的问题，都得心应手，可以说一般人是望尘莫及的。母亲用的是“心算”，在买卖中只要你报出数量和单价，她会在几秒钟内给你准确无误的答案，比你用笔或算盘还要快。

要知道，在我们那里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称重还沿用16两制的秤，其计算难度可想而知。比如，一元一斤的东西，一般首先要算出一两值多少。那就是说，你首先要用1元去除16，然后乘以两数才能得到答案。记得小时候二哥教我背“斤成两”的口诀是：1625、2125、31875、425、53125、6375、74375……一直要背到159375，这确实要下很大的功夫才行，而且在运用时不能忘记了小数点。我直到现在也不知道不识字，更不知道乘法、小数点为何物的母亲是怎样计算出来的。

母亲的记忆力极好。凡她经历过的事几十年后也不会忘记，如你要

去问她村里我们这一辈人谁的出生年月，谁比谁长，谁比谁次，她准保给你说得八九不离十。母亲的记忆力当然也给我们家带来了负面影响，这就是母亲到了中、晚年时，她总是爱用往事和父亲吵架，弄得父亲无可奈何，家庭也因此少了温馨与和谐。

对我们兄弟姊妹来说，母亲最大的功劳是在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把我们都送进了学校（大姐贞玉除外），让我们兄弟姐妹六个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文化教育。

母亲的远见是我们家在一个相对落后的乡村中较快翻身的根本原因，更是我和三哥明友、小妹芬翠能顺利走出农村的根本原因所在。可以说，如果不是母亲的远见和苦撑，我们兄弟姊妹也将和我们村的大多数同龄人一样，在农村为生存而操劳奔波着，读者也就不可能看到这本书了。

母亲 2002 年 3 月 8 日去世，享年 93 岁。

母亲虽然离我们而去了，但她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活在全村人的心中。

母亲是平凡的，她只是中国社会最底层中的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但她又是伟大的。她不但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将我们兄弟姐妹拉扯大，培养成人，而且她给我们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精神遗产。母亲刚强、正直的性格和善良、宽容的品格也遗传给了我，让我受用了一辈子。当然，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这一生的前途和命运不会平坦、顺畅。

第三章 童年记忆

人的一生会经历很多很多的事，接触很多很多的人。但到了年老的时候，他往往把很多事和很多的人都忘记了，唯有对自己童年的往事却总觉得历历在目，一经有人提起便会说个滔滔不绝。

为什么？究其原因，我想大概是童年的际遇、意识、感受已经融入了他的血液中，已经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性格特征。大量的事实证明：一个人的性格除与其基因、血型有关外，主要决定于童年生活的环境、际遇和感受，而性格又往往决定了他的前途和命运。

一、在战火中诞生

癸未年腊月初七（1944年元月2日），一个婴儿有力的哭声宣告了有七百年历史的大陂张家又多了一个男丁。这个男丁就是我。

后来听母亲回忆说，我来得很不是时候。那时连日天都是阴沉沉的，刺骨的北风裹挟着雪花漫天飞舞。人们都蜷缩在火塘边，议论着从各处传来的战事消息，或激愤、或惊恐、或叹惜绝望。人们都觉得心头像被一块巨石压迫着，连气都透不过来。父母面对一个来得不是时候的新生婴儿，脸上没有丝毫的兴奋和喜悦。

当时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正经历着巨大的劫难。丧心病狂的日本鬼子正从北向南蹂躏着湘楚大地，灭顶之灾随时都可能降临我们的村庄。

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不断失利，他们的海路交通已被美军切断，为了援救已经入侵南洋的孤军，他们于1943年至1944年春发动了打通从中国东北到广州、南宁的“大陆交通线”的战役（我国称为“豫湘桂战役”）。

1943年4月，日军调集14万余人向河南进攻。一个多月后，河南全部失陷。接着南下又占领了长沙，并进逼军事重镇衡阳。国军在衡阳虽与日军鏖战了四十多天，但终于败下阵来。1944年8月8日，衡阳沦陷。国军第四十七军、六十二军、七十九军向永州方向撤退。

国军在向永州方向撤退的过程中，七十九军等部队在永州境内同日

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其中规模较大的战斗有龙王庙阻击战、零陵保卫战，但无济于事。1944年9月5日，零陵县城失守。

随着国民党军队从永州全面撤退，永州各县迅速先后沦陷。

9月4日，日军第五十八师团第一零四联队第三大队侵占祁阳县城。

同日，日军第五十八师团先头部队侵占了东安县城紫溪镇。

13日，日军第三师团中村部侵占了道县县城。

17日，日军第三十四联队攻占了江永县城，骑兵第三联队攻占了江华县城。

10月22日，我们宁远县城沦陷。

1944年冬，日军在宁远响鼓岭、荷叶塘建立据点，修筑碉堡、战壕，设立“石梯岭警备司令部”。

就在日军占领宁远县城后不久的一天，我们村突然得到消息，说大批日本鬼子已过了冷水铺，离我们村只有7公里，正朝我们这边杀来。顿时，全村乱成一团，人们纷纷到背脊山上躲藏。当时母亲抱着襁褓中的我，父亲领着我的两个姐姐、两个哥哥，好不容易才爬到了山腰，躲进了一个岩洞。

这个岩洞很大，足可容纳两三百人。当我们家到达时里面已挤满了人，空气变得浑浊起来。

突然，就在我们旁边的一个孕妇表情痛苦异常，她要临产了。几个妇女立刻围了过来，七手八脚地帮着接生。

在没有医生、没有护士、没有任何消毒用具，甚至没有火、没有开水的情况下，一个新的生命诞生了，他，就是张青山。后来，我和青山认了“老庚”¹，我们在一起上小学，又一起在宁远三中上了初中。再后来，我上了大学，他在我们村当了赤脚医生。

这一天，全村人在背脊山上一直躲到天黑，在确认没有鬼子进村时才陆续各自回了家。

几天后，人们才知道，从冷水铺过来的鬼子军在过了神下村（离我们村3公里）后并没有继续向东朝我们村来，而是向东北方向朝蓝山县1老庚：两个同年同月出生的人相互称“老庚”，但一般同年而不同月或不同年而同月出生的也可相互称“老庚”。在湖南、湖北、江西都有此习俗。老庚在我们那里当亲戚相互走动。

城去了，因此，我们村的一千多村民才得以免遭一劫。

1945年1月17日，日军千余人入侵新田县境。同年1月17日至2月19日，先后3股日军共一万余人入侵蓝山县境。至此，永州全境基本上处于日本侵略军的占领之下。

根据永州州志记载，日本侵略军在侵占永州期间，大肆烧杀抢掠，奸淫妇女，犯下了灭绝人性的滔天罪行。

狂轰滥炸：日军对零陵县城、冷水滩等地空袭25次，出动飞机325架次，投弹1361枚，炸死167人，炸伤128人，炸毁房屋265栋，经济损失2112亿元（法币）；日军飞机轰炸祁阳县城20次，整个县城成为废墟，炸死居民121人，炸毁房屋9527间，财产损失2507万元（法币）。

屠杀百姓：据统计，日军在侵占永州期间，共杀害百姓120890人，其中祁阳19266人，东安9456人，零陵59375人，道县24726人，宁远1695人，江永2945人，蓝山129人，江华3234人，新田64人。日军杀人手段残酷无比，或枪杀、刺刀戳、砍头、挖心，或砍手脚、挖眼睛、割乳房、捅阴道，或活埋于坑窑之内，烟熏于岩洞之中，扔人于开水锅里等等，无所不用其极。日军在祁阳白子河的乱葬岗活埋群众约千人，在祁阳县城延寿寺用酷刑折磨和吊死群众百余人。祁阳县城一唐姓父子被日军绑在树上当活靶，全身被刺满了窟窿；伍尚却、桂于夏、刘美轩3人先被日军砍去手脚，然后砍头剖腹。在东安，日军侵占大庙口后，屠杀当地群众500多人，抓走村民320多人。1945年5月18日，在零陵邮亭墟凡家岭村，因两名抢掠的日军被打死，日军80余人将该村团团围住，集中火力扫射，然后放火烧村，将村民赶到村中小土坪一棵大树下进行屠杀。他们先将两个小孩浇上煤油，活活烧死；又把4个未满周岁的婴儿抛向空中，用刺刀戳死。接着将张昌乙割掉舌头，乱刀戳死；将张昌贵、张其才倒挂树上活活烧死。最后，强迫17个男女村民脱光衣裤，用火烧阴毛，用刺刀戳妇女乳房、阴部，17人全被折磨而死。在道县，日军于1944年9月10日在万家庄用棉絮和湿布堵住34名村民的嘴、鼻，然后用枪托将他们打入5口薯窖内窒息而死；一个月后，日军又窜入万家庄，杀死75名村民。同年9月17、18两天，日军两次到道县小河边烧杀抢掠，杀死、淹死村民97人，并在村口张贴布告，上写“大日本皇

军在这里杀死、烧死、淹死……的支那人共计九十七人……”。同年 12 月 15 日，日军在道县楼田岩发现岩洞内有人，就用干柴、稻草烧干辣椒，再用风车往岩洞里鼓风，躲在岩洞里的难民 568 人被活活熏死，其中楼田村死绝 12 户，周家坊村死绝 19 户。

焚烧房屋：1944 年 9 月 6 日，日军在东安芦洪市放火烧街，烧毁店铺 896 间。9 月 18 日，日军在道县县城纵火，城内寇公街、城外西门街、桥背街、花巷口、许家坪、周家坪、五家岭等地的民房和公共建筑全部化为灰烬，西关石桥、水南浮桥烧得面目全非，文庙、濂溪祠、报恩寺等名胜古迹也遭到严重破坏。9 月 29 日开始，日军在祁阳天马山大冲连续放火 3 天，把附近 11 个院落烧成一片焦土，烧毁民房 30 栋、119 间。日军侵占江永县城后，在江永通往广西恭城和富川的大路两旁，烧杀 40 多天，将县城及允山、回岗铺、大桥铺、夏层铺、桃川等墟镇烧成一片废墟。据统计，永州各县被日军烧毁房屋数十万间，其中零陵 18780 间、祁阳 15362 间、道县 46724 间、宁远 76156 间、江永 1869 间、蓝山 182 间。

奸淫妇女：永州各地被日军奸淫的妇女不计其数，仅祁阳一县就有 3873 人。该县天马山大冲岗家院 1 名妇女被日军轮奸后剖腹取胎，胎儿被日军用刺刀戳着玩；双周村一幼女被日军用刺刀挑开阴户取乐；县城潇湘街 13 名妇女被日军关押作为军妓，不准穿衣裤，每天每人供十多名日军蹂躏。零陵县张家漕一妇女被 8 名日军轮奸致死。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抢劫财物：日军在永州抢劫破坏所造成的财产损失达 1244 亿元（法币），其中抢劫粮食 50 多万吨，耕牛 9.8 万多头。

日本鬼子在占领永州期间就犯下了如此滔天罪行，那么在湖南全省、在整个中华大地上，他们所犯下的罪行真的是罄竹难书！

1945 年 8 月 6 日和 8 日，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了原子弹。8 月 8 日苏联对日宣战，随即对日军展开了大规模进攻。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从 8 月 18 日开始，中日两国军队举行了为期 3 天的芷江洽降，对受降范围、接收品、日俘与日侨的遣返、南京伪政权的处理等重大问题签署了备忘录。至此，老百姓的生活才逐渐安定下来。

我当时还在襁褓中，我当然没有看到也不可能真切地感受到曾经发

生在我们国家和我身边的这场空前的劫难。我之所以要抄录下这段文字，是因为它记录的是一段千真万确的历史。作为炎黄子孙的我们是不能也不应该忘记这段历史的。我们特别是要记住的是“落后就意味着挨打”的教训，牢记从明朝的抗倭到满清的甲午战争再到现代的八年抗日战争的历史事实。日本这个大和民族是一个狼性十足的民族，我们任何时候也不能丧失警惕。

二、“白米饭太好吃了”

抗日战争结束了，老百姓终于可以过安定的日子了。但由于国家百年积弱，加之抗日战争使得国家的元气受到极大的损耗，国民经济已经崩溃，老百姓的生活仍然非常贫困。

“民以食为天”，贫困首先体现在饿肚子上。我出生后，家里已是七口之家了，但我们家却只有六分田和一亩多旱地，加之我们那里水源短缺，十年九旱，尽管父母起早贪黑，日夜操劳，吃饭问题仍然是我家头等的大问题。每年秋收的粮食只能勉强维持半年的生活，另半年吃的主要靠小春作物和大秋拾荒了。

每年秋收时节，母亲就领着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去拾荒。收稻时去拾稻穗，挖红薯时去地边捡别人不要的小红薯或去刨漏收的红薯，收油茶果时就去捡掉到刺窝里或主人因难以采摘遗弃的油茶果。除在本村范围内拾荒外，两个哥哥还会到更远的地方去拾荒，甚至跑到邻近的蓝山县去捡油茶果。每年拾荒可以收到一担左右的谷子和四五担红薯，可以解决一个半月的吃饭问题，捡来的油茶果榨油也可以勉强维持半年的食用。

我们那里的小春作物主要有蚕豆、荞麦、黄豆、绿豆、黑（红）豆、玉米、小麦、chǎng子、红薯等，这些作物都是在农历二至六月先后收获。蚕豆是一年中最早收获的，二月份就可以采摘了。荞麦一般在三四月采收。我们那里的黄豆是栽在田埂边上的，立春后雨季一来开始犁田，农民在用田里的泥加固田埂时顺便就将黄豆点上了，两个多月后就可以采摘豆荚了。红（黑）豆和绿豆收获期要稍晚一些，一般要到五月才能开始采摘，玉米和第一茬红薯则一般要等到六七月才可以开始收。

对于今天的城里人来说，上面说的蚕豆、荞麦、黄豆、红薯等这些

东西都是好东西，都是既有营养而且有利于降“三高”的好食品。但我们那时吃的时候却感觉不到好吃。因为这些粮食不是搭配着吃，而是根据时令，出什么就吃什么。出蚕豆时就只吃蚕豆，一日三餐，一天、几天都是吃蚕豆。收黄豆（我们那里叫毛豆）或黑豆时，碗里就只有黄豆或黑豆，而且是没有经过任何加工的一颗颗的黄豆或黑豆，不放油，盐也放得很少，煮熟就当饭吃。所幸，穷苦的劳动人一般的消化能力都强，吃了很管用。但那些消化力稍差一点的，就有问题了，肚子发胀不说，拉下来的还是一颗颗的，难以吸收，容易导致营养不良。

在我对儿时的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跟着母亲出去吃上了一顿真正的“白米饭”（在我们那里，不掺红薯或其他杂粮的米饭叫“白米饭”），觉得那白米饭实在是太好吃了。

大概是1947年冬的一天，母亲去帮一户有钱人家舂米，把我也带去了。母亲一人舂着米，而我则在碓房里玩。午饭时间到了，母亲还没有舂完米，而我早已饿了。就在这时，东家给母亲送来了午饭，是一大碗白米饭（记不得是否还有菜）。母亲没有停下手上的活，叫我先吃。眼看着面前的白米饭，我高兴极了，拿起筷子就往嘴里扒。白米饭香香的，甜甜的。饭已冷了，因此吃在嘴里有一股凉凉的感觉，愈觉得白米饭香甜无比，简直无法用文字来形容。吃饱后我问母亲：“白米饭太好吃了，我们家为什么不做白米饭吃？”母亲苦笑着对我说：“我们家只有一小块水田，收的谷子就少，所以我们家就只能以杂粮为主，米只能和红薯或其他的杂粮掺合在一起吃。再说，你今天是饿了，人饿了是什么能吃的东西都会觉得好吃的。”

至今我仍能回忆起当时吃白米饭的那种感觉。有时煮饭淘米前看到锅里还有一点冷饭，我会吃上几口，并慢慢地咀嚼，试图体验一下当时的那种感觉，但当时的那种强烈的感觉再也体会不到了。

在我的记忆中，小时候红薯是我们的主粮。一年中很长时间都是早饭是红薯，中饭是红薯，晚饭好一点，是红薯掺米的红薯饭。除非过年、来了客人，很少有吃白米饭的时候。

我原来以为我这辈子红薯是吃够了，再也不要吃红薯了。但最近看到的一些资料却改变了我原来的想法，甚至庆幸自己正是由于长期吃红

薯才有了今天的健康的身体，我真该感谢我曾经吃厌了的红薯。

资料中说：红薯含有膳食纤维，胡萝卜素，维生素A、B、C、E以及钾、铁、铜、硒、钙等十余种微量元素，营养价值很高。还说红薯不但营养均衡，还能有效地防止骨钙流失，具有鲜为人知的防止亚健康、减肥、健美和抗癌等作用。因红薯除了含有一定的钙质外，还含有大量的钾和镁，这两种物质可以维持体内的离子平衡，减缓因年龄增长而造成的钙质流失。除此之外，红薯的热量只有同等重量大米的三分之一，而且几乎不含脂肪和胆固醇，是很好的低脂肪、低热能食品；同时又能有效地阻止糖类变为脂肪，有利于老年人的体重控制。此外，红薯中含有的大量的膳食纤维能有效刺激肠道蠕动和消化液的分泌，降低肠道疾病的发生率。

我国明代著名医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这一巨著中讲到“红薯蒸、切、晒、收，充作粮食，称为薯粮，使人长寿少疾”。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国人口学者在考察长寿地区的农村生活水平、质量后曾指出：长寿者除了生活劳动有规则之外，还与常吃红薯有一定关系。

经专家研究表明：红薯中所含的大量黏液蛋白对人体有特殊保护作用。它能保持人体心血管壁的弹性，防止动脉粥样硬化，减少皮下脂肪，还能防止肝脏和肾脏中结缔组织萎缩，润滑消化道、呼吸道、关节腔和浆膜腔，防止疲劳，提高人体免疫力。

难怪营养学家称赞红薯为“营养最均衡食品”，是被世界卫生组织(WHO)评选出来的“十大最佳蔬菜”的冠军。

言归正题。上面说到了我童年时吃一顿白米饭都是很难得的。至于穿的衣服，在我的记忆中，我几乎没有穿过新衣裳，只穿过新鞋子。我穿的衣服多半是三哥穿旧了的，另外就是新张家的小姨拿来的旧衣裳经母亲改小后给我穿。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上小学一年级时的一天，老师领我们去稻田捉蝗虫，我穿了小姨给的一件尚未改好的又长又大的夹衣，一不小心一屁股坐在了水田里，当同学把我拉起来时，竟发现我没有穿裤子，引得大家一阵哄笑，我当时真是狼狈极了。

三、斗地主分田地

1949年8月4日，国民党高级将领程潜、陈明仁通电全国，宣布起

义，从而实现了湖南的和平解放，湖南人民得以免遭战祸之苦。

1950年1月，中共中央下达《关于在各级人民政府内设土改委员会和组织各级农协直接领导土改运动的指示》，开始在新解放区分批实行土改的准备工作。党中央明确规定了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基本内容，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把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对于地主分子，同样分给一定数量的土地，让其在劳动中改造为新人。

6月，中央人民政府通过并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成为指导土地改革的基本法律依据。土地改革法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同时规定，把过去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便更好地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小土地出租者、稳定民族资产阶级。

土地改革从1950年冬开始，有领导地分期分批地进行。每期一般经历发动群众、划分阶级、没收和分配地主土地财产、复查总结和动员生产等步骤。各地政府都派出土改工作队深入农村，领导土改运动。大批机关干部、知识分子（包括大学教授）和许多民主党派成员报名参加土改工作队，投身到这场伟大斗争中。各地土改工作队深入农村访贫问苦，培养积极分子，逐步把群众发动起来，建立以贫雇农为核心的农民协会，作为土改执行机关。随后，进行划阶级，开展对地主阶级面对面的斗争，揭露他们的罪恶，打垮他们的威风，并对其中罪大恶极的分子和破坏土改的分子实行镇压。在斗争胜利的基础上，由农民协会没收地主的土地和财产，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并在分配完成后进行复查，由人民政府颁发土地证，整顿与加强政权和民兵组织，引导农民发展生产。

土改时我已经6岁了，对斗地主分胜利果实的事记忆很清晰。土改是我经历的第一次重大政治事件。

我们村解放时有300多户人家。土改时，根据当时的政策和标准，

我们村有 13 户被划为地主。其中两户在“地主”前加了“恶霸”两字，叫做“恶霸地主”。一个叫张书长，另一个叫张继宣。因为这两个人都有血债，1951 年在公审后被枪决了。

土改的第一步是在土改工作组的指导下成立农会。当时分在我们村的两个工作组成员都是南下干部，一个姓田，一个姓杨的是个女同志。这两个人都来过我们家，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人很和蔼可亲，女的还长得很漂亮，至今我还想得起他们的模样来。

我的满叔张福祥被选为农会主席，大哥福生（堂哥）是农会秘书，二哥明进（堂哥）是民兵营长。

第二步是在农会的组织下召开诉苦大会。诉苦是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的最好方法，是共产党进行革命斗争中的一大发明。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正是通过在部队内和贫苦老百姓中的广泛诉苦运动，才调动和激发了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的斗志，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通过诉苦大会，既让社会最底层的、平日大气不敢喘的受压迫者积蓄多年的怨气得以渲泄，又让渲泄者认识到这场斗争与自己利益的关系，从而投身到革命斗争中去。一般诉苦大会和斗争大会同时进行，让受压迫者面对面地揭露压迫者。这样既长了被压迫者的志气，也灭了压迫者的威风。

当时的诉苦大会都在新大厅进行，主席台就设在戏台上。诉苦前，工作组的同志一般都要找诉苦的人谈话，一是动员，打消他们的顾虑，二是告诉诉苦者怎么诉，要注意些什么。

诉苦大会开始时地主分子被民兵押着推上台，并给他戴上高帽子。接着就是一个接一个人上台控诉，有的控诉者诉到激愤时会声泪俱下地冲上去痛打地主，台下也会不时响起口号声给予支援。

土改的第三步是划成分，没收地主的土地和家产。在我们村，地主成分的确定一是看其田地的多少（一般为四十亩以上），二是看其是否请过长工。拥有同样的田地，请过长工的会被划为地主，而没有请过长工，全部田地都是自己种的，一般不会划为地主而定为“富农”。后来在土改复查时，有两家开始时被划为地主，后都改划为富农，原被划为富农的一家改划成了中农。被划为地主的人家大多数家产将被没收，另外安排一处房屋供其居住并按人均土地数留给田地供其耕种，让其自食其力。

所谓“胜利果实”，就是没收的地主的田地、住房、衣物和家具等。分“胜利果实”前，农会将根据每家的具体情况（主要是自有田地、住房和人口的多少）进行充分的多次讨论，并实行三榜定案。我们家是村子里最贫穷的农户之一，分到了六亩水田和几亩旱地，还有几亩山林。我家分得的房子就是被政府镇压的张继宣的部分房子，这是我们村地主中最好的房子之一。

土改时，二哥柳生是村民小组长。因他上过高小，人又灵活，很受土改工作组的重视，丈量土地啦，清点登记“胜利果实”什么的，都要他参加，很少有在家待着的时候。而三哥则是村儿童团的团长，成天拿着红缨枪站岗放哨。当时我对大人们的事不感兴趣，整天就想跟着三哥到处跑，但三哥往往不让我老跟着他，我只好找自己的同伴玩。

一天，农会抄恶霸地主张书长的家，我也跟着去了。我看到书房里有好多好多的书，都是些线装本。而大人们似乎对此并不感兴趣，他们都忙着搬家具去了。我那时还没有上学识字，当然也不知道是些什么书，但总觉得这是好东西。于是，我就尽我最大的力气抱了一些书回来。父亲看到我抱了一些书回来，显得特别高兴。他没有上过学，不识字，但他一辈子吃了不少不识字的亏，所以认定这些书必定是些好东西。于是，他就将这些书放进了只有他有钥匙的一个柜子里了。遗憾的是，我一直没有看过这些书。小时候是拿不到父亲的钥匙的，也看不懂。上中学时是在县城，也想不到将这些书拿来看，上大学时就更不可能想到看这些书了。父亲去世后，我曾写信给二哥，要他去看看这些书到底是些什么书。回信说都是些小说，可惜保管不当，多数已经损坏了。后来我才知道，解放前，我们张姓家族在离我们村一公里左右的龙华堂设有一所图书馆，不知什么原因，图书馆后来关闭了，图书散落到一些识字人的家庭中。我当时抱回来的书很可能就是这个图书馆藏书的一部分。

土改时让我最高兴、最兴奋的是跟大人们扭秧歌、跳花鼓。当时村里的年青小伙、姑娘们经常组织扭秧歌和跳花鼓的娱乐活动，还组织村际之间的比赛，非常热闹。扭秧歌在电影、电视里我们都见过了，我国很多地方的人都会扭，但“跳花鼓”却很少有人听说。土改时我们那里跳的“花鼓”与全国有名的凤阳花鼓不同，凤阳花鼓是“打”，而我们

那里是“跳”，而且所用道具也完全不一样。跳花鼓配的道具，是用一截长约一米，粗约4、5厘米的竹子，将其两头镂空并串上一些铜钱，再系上红绸子就成了“花鼓”。跳起来时手持花鼓有节奏地敲打肩、背、脚，发出阵阵悦耳的声音，很多人一起跳时更是非常好看、好听。

四、“哭嫁”与“挂青”

在我的童年时代，让我感兴趣、觉得好玩并印象深刻的还有“哭嫁”和清明节“挂青”。这是我们那里的风俗，但这些风俗解放后就逐渐消失了，我觉得有必要在此记述一下。

不久前央视“走遍中国”栏目曾报导贵州省一个地方至今有“哭嫁”的风俗。其实，我们那里原也有这种风俗。与电视节目里说的不同的是，我们那里的“哭嫁”还有一项重要内容是“唱歌”，而吸引孩子们赶热闹的正是这个“唱歌”。

姑娘出嫁前三天就开始“哭嫁”，每天早上一起床就开始哭，一直要哭三天。在姑娘哭嫁的时候还有两三个“陪哭”，“陪哭”的一般是待嫁姑娘平时最要好的伙伴。哭的内容主要是诉说父母如何千辛万苦把自己培养成人，自己又是如何不懂事而惹父母生气，如何对不起父母，而现在知道要报恩了却要出嫁了，要去孝敬别人的父母了。总之，“哭嫁”是在诉说对父母的感恩之情。当然，姑娘在“哭嫁”时也可以诉说自己曾受的委屈，特别是那些后娘带大的姑娘，此时也可以通过“哭嫁”将自己曾受的委屈宣泄出来，而做父母的不会因此而抱怨。

在出嫁姑娘“哭嫁”的三天里，嫁娘的父母每天晚上还要招待来“唱歌”的村子里的姑娘、小媳妇，并准备糖果分发给客人和小朋友。

这里说的“唱歌”不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唱歌，而是专指姑娘出嫁时的一种“唱歌”，它有固定的模式和曲调（曲调多幽怨、婉转），但歌词则可以根据出嫁姑娘的实际情况现编现唱。“唱歌”的规模有大有小，视这家的家境和平常为人而不同，一般为两三桌人（二、三十人），多的也有十几桌的（一百多人）。桌子用的是大方桌，凳子是长条凳。唱歌时，姑娘、小媳妇们围坐在大方桌旁，桌上摆有糖果、花生和茶水。“唱歌”有“领唱”，但没有指挥，大家跟着领唱的节奏唱。唱词内容大致

是说做姑娘的自由和幸福，做媳妇的压抑和委屈以及尊敬公婆、相夫教子之类。具体唱词因时间长了记不得了，只记得每次开始总是：咦——哟，咦——呀。

“哭嫁”时最高兴的是孩子们。他们在“唱歌”的堂屋里相互追逐嬉戏，并不时唱着“咦——哟，咦——呀”。孩子们之所以那么高兴，当然是因为主人会不时散发糖果和花生了。

清明节扫墓，我们那里叫“挂青”（大概是因为我们那里到清明节时草木都已处于旺盛的生长期，大地已一片青绿了，因此“挂青”可能也有人们常说的“踏青”的意思吧）。

挂青是家族中最隆重、最盛大的活动，更是孩子们盛大的节日。

解放前，张氏族实行三年一小祭、五年一大祭的规制。每逢大祭，万二公、万三公派下的大阳洞张家和大陂洞张家十八岁以上的男子在清明节这天都要齐聚九嶷进行祭扫，远在零陵接履桥的万一公派下也会派代表参加。而在小祭的年份，则大陂张家和大阳洞张家分别进行祭扫。

在我依稀的记忆中，我们大陂张氏族从第四世后又派生为林、彬、杨、材四房（道字辈），清明时各房自行祭扫。我家属彬房，因此，我们只参加彬房的祭扫。小祭时没有年龄的限制，凡是男性都可参加。凡参加挂青的，不分年龄大小每人发一份糍粑。孩子们之所以对挂青极感兴趣，除了和大人一起上山踏青，人多热闹好玩以外，一定程度上还是冲着这份糍粑去的，起码我当时是这样的。

在既非大祭也非小祭的年份，清明节时就只是各家祭扫各家的过世先人了（一般只限于曾祖父母以下），隆重程度上自不如大、小祭的挂青了。

五、上小学，以玩为主

在我们那个年代，小学分初小（初级小学）和高小（高级小学）。1951年我开始上初小，学校就在村子东侧的“新大厅”里。

我们村有两座“大厅”。在村子中心的那座叫“老大厅”，村东的一座叫“新大厅”。老大厅规模较小，年代也比较长了。在老大厅里有一个很大的仓库，原来是存放“公粮”的地方。上辈们在分家时特意留

出一些田地作为‘房田’，属于族人公有。“公田”每年都分租出去，租家按约定的数量交租。租谷即公粮，主要用于村子里的公益活动开支，如清明祭祖、办学校等。土改时老大厅是农会办公的地方，同时也兼作农会关押、审问地主的场所，一般不给孩子们进去玩。

而新大厅是民国初建的，规模也比较大，由前后两部分组成。进正大门是戏台，约有十几米高。戏台两侧是厢房，有两层。一层左侧分成四间，用作老师的办公室，一层的右侧没有隔断，是一长条通间。戏台前有一个可容纳几百人的大天井。村子里召开群众大会（如斗地主大会）或正月里唱戏、“耍灯”（一种诙谐、滑稽、极具民俗化的曲艺表演）就在这里举行。天井后面就是真正的大厅了。大厅正中央供奉着孔子神位，神台上雕刻着一些人物故事和花鸟禽兽，十分精致。大厅两侧是两间大教室，也就是我们村初级小学的教室了。两个年级共用一个教室，一、四年级共用一个，二、三年级共用一个。每间教室上都挂有一块用颜体书写的大匾，左边教室的一块上书“根深叶茂”，右边的一块上书“源远流长”。在正厅孔子神像两侧还有一些长联，内容已记不清了。

我上初小一年级时的班主任是下坠谢家的欧阳维奇，他很欣赏我的那股调皮劲。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功课非常轻松。记得语文的第一课是：来来来，去去去，只学两个字，不像现在小学一年级的第一课就那么复杂。

在我的印象中，小学期间是以玩为主。我们每天上午九点上课，下午四点放学。上午上学前和下午放学后男生一般都是去放牛，而女生是去打猪草。上学前和放学后都是我们玩的时间。我们当时的玩法多种多样，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玩法，总之是怎么好玩就怎么玩。

下面就说说我们放牛时的玩法。

“放牛”有两种不同的放法。一是在田边地角放。这些地方草比较旺盛，牛容易吃饱。缺点是必须牵着牛放牧，否则牛会吃庄稼。对放牛娃来说这种放牧法等于没有了自由。另一种是在山上放牧。好处是放牧时不用牵着牛，上山后放掉缰绳随牛自便。当然，山上的草就没有田边地角的草鲜嫩了，牛不容易吃饱。不过，只要放牧的时间足够长，牛还是可以吃饱的。我们都喜欢上山放牧。因为只要牛上了山，伙伴们就可以聚成一堆玩游戏了。

游戏一般又分两种，一种是“文玩”，一种是“武玩”。文玩就是玩棋类，有五子棋（不是围棋的五子棋，而是我们那里独有的金、木、水、火、土五棋子）、回字棋、宝塔棋等几种，谁输谁负责照管牛。武玩又分摔跤和“打仗”两种。摔跤不常玩，因为常在一起玩的伙伴们中经过一两次较量后谁强谁弱早已分明，只是在村子里这一伙与另一伙，或与邻村的孩子需要较量时，才进行比赛。

我们常玩的是“打仗”。玩时通过抽签将人分成红、蓝两组，一组在前面跑，一组在后面紧追。前后两组人均可用石头或土块向另一组“开火”，被击中或被追上逮着的人将自动退出“战斗”，到最后减员多的一组为败。胜的一组骑着牛回家作为奖赏，而输的一组则牵着牛步行护卫，并听从“胜利者”的驱使。

这种玩法的危险性是显而易见的。一次我在追逐中就击中了村北一个伙伴的头部，鲜血直流，事后这家大人告到家里，母亲只好登门道歉赔不是。我也曾在一次这种追逐游戏中被藤条绊住，头撞在石头上而负伤。作为这种游戏的代价，我的前额发际间至今还留有一条五厘米长的疤痕。

在山上放牛时我们也常进行“斗牛”比赛。斗牛在我们老家是很时兴的。老辈人常常津津乐道的“十八斗笠下大阳”，说的就是用“斗牛”解决纠纷的真实故事。

我们张家在大阳洞的这一支以前常受附近蒋姓的欺负。最主要的是蒋姓控制着上游水源，他们宁愿水白白流掉也不让张姓的人使用。为争得水源，两姓连年械斗，互有伤亡。为解决与蒋姓的纠纷，大阳洞张姓求助于我们大陂张家的同族兄弟。我们大陂张家这边即刻派人去大阳洞与蒋姓协商，并约定一年后通过“斗牛”决胜负：若张姓牛胜，则蒋姓水源与张姓共享，从此张、蒋两姓和谐相处；若张姓牛败了，则张姓永不再提共享水源一事。

一年后，大陂张家如约派出十八名头戴斗笠、武艺高强的人牵着一头经过特殊训练的水牛赴大阳洞。斗牛的结果是张姓的水牛胜了蒋家的水牛。从此，张、蒋两姓多年的积怨得以化解，大阳洞张姓的农田灌溉问题得以解决。

我们玩斗牛都是用公黄牛，因为公水牛斗起来太危险了。公水牛一旦开斗，取胜的水牛不把落败的一方挑死不肯罢休。败方逃跑时，胜方穷追不舍，在追逐过程中会给村民带来很大的危险。正因为公水牛的这一秉性，我们那里的公水牛任何时候都是人牵着单独放牧，不能让两只公牛照面，一刻也不能疏忽。而黄牛则不同。两只公黄牛相斗时，一旦一方服输（停止进攻或扭头逃跑），胜的一方一般不会追，只会在原地仰头大叫几声，宣告它的胜利而已。

常在一起放牧的黄牛不会见面就开斗。因此，我们的斗牛多在村北和村南的牛之间进行。上高小时我们也会约附近石佳坪村的孩子们斗牛（大陂张家各村的孩子都在龙华堂上高小），一旦自己这一方的牛获胜，准保兴奋一星期。

不管是玩“打仗”还是玩“斗牛”，都充满着一股野性，也有一定的危险性。但这些玩法也有一定的好处，特别是玩“打仗”，由于是在山上进行，孩子们在野外奔腾跳跃，既可强健身体和增强耐力，还可以培养孩子们的勇敢精神和应变能力。再说这种玩法非常刺激，一般孩子都乐于参加。

我认为人就应该有一点“野性”，特别是对一个男人来说更应该如此。毛主席年青时为什么要称锻炼身体为“野蛮其体魄”？我认为青少年在锻炼时不“野蛮”一点，是不能锻炼身体并培养出坚强的意志的。我总觉得现在的男孩子们太女人化了，一些男孩已完全没有了男人应有的阳刚之气，这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是很危险的。

现在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孩子们上学、放学时都是一对一的家长或保姆护送，小学校门口接送孩子的小汽车、电动车经常堵塞了交通。我们经常看到一些老年人和年青的父母将自家的孩子奉为“小皇帝”，百般呵护，真是“含在口里怕化了，捧在手上怕摔了”。我真不能想象，这样培养长大的孩子今后会怎么样。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孩子的体质，特别是忍受力、耐力将大打折扣。最近在网上看到台湾一校长关于教育的讲话，很受触动。他主张用我国传统的教育方法教育我们的孩子，即“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而我们现在的教育，特别是

家庭教育却是反其道而行之，其后果真让人担心！

六、搭台演戏

我们小的时候，村里每年正月都要请戏班子唱几天戏或耍灯。附近的新张家村、云潭村、石佳坪村也一样。往往是几个村子轮流唱，直到正月二十四日。记得老家常演的剧目有：《黄鹤楼饮宴》、《辕门斩子》、《马刚带鏢》（也叫《盘肠大战》）、《捉放曹》、《穆桂英挂帅》等。父亲不识字，但很喜欢看戏，戏文也背得不少。他去看戏时总会带着我。因此，我对京戏就有了一种特别的情愫，特别是对京剧里的一些唱腔如二黄、反二黄、西皮、流水等更是着迷。至今凡是收音机里播京戏我都必听，电视里播京戏我必看。看到有京剧光盘卖，我会毫不犹豫地掏钱买回来。为了看戏，上初中时我还因逃票看戏而被查票的逮住过。

上小学三年级时，为了过唱戏的瘾，我和几个小朋友决定自己在村前枇杷井旁的一块空地上搭台演戏，自编自演。当然，说是自编自演，其实是胡闹，好玩而已。至于搭的“戏台”，其实只是用四根木桩，中间加几条横档，铺上木板，面积不足两个平方米。但戏台虽小，可我却为此动了不少脑筋，花了不少时间。

参与其中的有六个小伙伴，除我以外还有张水清、张光林、张青山、张良生、张尚喜，我是组织者兼指挥。由我指派谁从家里带锯子、斧子，谁带钉子，谁负责上山砍树还要弄回来，谁负责下料等。足足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我们的“戏台”才基本告成。为了给我们的“戏台”装扮一番，我们弄来了柏树枝、柳树枝捆扎在戏台的周围，还真像那么回事，我们高兴极了。戏台搭好后又有十几个小朋友要求参加进来，总共有二十几个人。

开始演戏了。大家把从家里拿来的能敲得响的锅、盆，乱敲一气。

我们也分不清谁是演员，谁是观众，在台上的模仿大人们演戏中的角色，又蹦又跳，弄得“戏台”吱吱作响。而台下的也是又叫又闹，乱成一团。而大人们则站在一旁看着这群发了疯的孩子直笑。

我参加工作后第一次回老家探亲时，儿时的伙伴们在一起说到当年搭台唱戏，仍不免激动非常。

我们搭合唱戏的事很快就被班主任欧阳老师知道了。他不但没有批评我们，反而编了一个《打魔鬼》的节目教我们排练，准备六一儿童节演出。

这个节目的故事情节很简单，说的是山上突然有一天来了一个魔鬼，它把孩子们放牧的牛和羊通通吃光了。于是，孩子们团结起来和魔鬼作斗争，最后战胜了魔鬼。

这次演出就在村子里真正的戏台上进行，但不大成功。原因是我们“自由发挥”惯了，一旦要照别人编好的台词演就别扭了。不管老师怎么启发，演起来就是不自然，远不如我们在自己搭的戏台上“演戏”好玩。这次演出我是领头打魔鬼的主角，演出不成功我自然要负主要责任，但这怪不得我。因为事实上我根本不是演戏的材料，我没有半点文艺细胞，没有扮演角色的丝毫才能。

在任何情况下我只能是我，装不成别人，这是天生决定了的。我一辈子处人处事总是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自己认为应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不会逢迎，不会拐弯，不会装扮，更不会隐藏自己，我从来说不出违心的话，做不出违心的事。有人说我是清高，有人说我是骄傲，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在生活中，有的人有心里想的一样、说的又是另外的能力，我觉得这简直不可思议。在我看来，爱就是爱，恨就是恨，这怎么可能装得出来呢？这也许正是我一辈子不讨领导喜欢，屡受打击，随时遭人暗算的重要原因吧。

七、第一次获奖

四年级开学不久，学校组织了一次讲演比赛。讲演的内容不限，可讲一个故事，也可讲自己周围的人和事，题目任自己选。

由于老师不断鼓励，报名的有二十几个人，我也报名了。

报名后，想到要在全校一百多名老师和同学面前发言我又犯了难。别看我平时冲冲闯闯，从不怯生，但真的要在老师同学面前讲演，心还是不免怦怦直跳。

回到家，我跟母亲、哥哥姐姐说了我已报名参加讲演比赛的事，他们都很高兴，鼓励我好好参加这次比赛。

讲什么呢？我上初小四年级时三哥上高小六年级，我和三哥经过认真讨论，决定就讲三哥他们刚学过的一篇课文：《上甘岭的故事》。

当天晚上，我就背熟了《上甘岭的故事》这篇课文。在讲演比赛的头天晚上，我又在全家人面前进行了预演。

我是第五个走上讲台的。尽管我已背熟了课文而且在家里进行了预演，尽管母亲和欧阳老师一再告诉我不要紧张，但当我走上讲台面对那么多平时都很熟悉的老师和同学时，我的心仍然跳得厉害，手不知该放在哪里，一双脚好像不是自己的，不但发软，而且抖得利害，脑子是一片茫然。

突然，我想起了母亲头天晚上说的一句话：“你就当是在山上对着树木、石头讲话一样就不紧张了。”说也奇怪，一想到此，心里果然一下子就平静下来了。我的讲演大概持续了十分钟。在讲演中，我并没有“照本宣科”地背诵课文，而是将课文用自己的话说出来，不但讲了课文中志愿军的英勇事迹，而且讲了我们要学习志愿军保家卫国的精神。当时我们学校的天井里还摆放着抗美援朝时做的几门木制大炮，那是张光林当木匠的父亲做的。因此，我就说张光林的爸爸做了大炮也是支援了保家卫国，说大炮虽然是木头做的不能打仗，但它表明了中国人民抗美援朝的精神和决心，因此也是在抗美援朝。当我讲完向大家鞠躬敬礼时，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老师在讲评时给了我很高的评语，我取得了这次比赛的第一名。奖品是一张“演讲比赛第一名”的奖状和两听牛奶。我们那里当时没有奶牛，绝大多数的人一辈子也没有喝过牛奶，所以，我能得到两听牛奶的奖品已是非常稀奇的了。

这次参加讲演比赛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激励，可以说它对我的一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因为这次讲演比赛及取得的成绩不仅激发了我的自信心，而且激发了我的学习热情，使我这个混沌少年开始用脑子思考问题，开始专注学习文化知识。

从那以后，我不但常拿三哥的教材来看，而且还找一些课外书籍来看。《增广贤文》《三字经》《少年诸葛亮》《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罗通扫北》《五虎平南》《薛刚反唐》《封神榜》《隋唐演义》《七

侠五义》等古典小说，我都是在小学阶段看的。当时虽然还有些看不懂，但我的兴趣已逐渐从和伙伴们玩游戏转变成了看书学习，并养成了好的学习习惯。

八、第一次遭受处罚

1955年9月我到龙华堂上高小。龙华堂高级小学原是我们大陂张家办的一所学校，建校已近百年，离我们村约一公里。解放后，龙华堂成了我们乡规模较大的高级小学，除招收张姓学生外，还招收附近云潭村、贺家村、梅村等其他姓氏的学生。

我上高小时的校长的名字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姓周，好像叫周中一。我们的班主任是蒋友三，他的一个儿子蒋淘与我同班，小学六年级时与我是邻桌。

蒋淘是一个比我还调皮的孩子。他经常欺负同学。因他父亲是我们的班主任，一般同学也只好让着他。

高小临毕业前一个月的一天，课间休息时我和几个同学在操场玩弹子。蒋淘突然跑过来二话不说抓了我们的弹子就跑，当我追着向他要时，他竟将我们的弹子丢到稻田里去了。当时我气坏了，只是上课铃声响了，只好作罢。

谁想没过几天，他又来找我的麻烦了。这天放学后我和另一个同学在学校旁边的小河里钓鱼，他悄悄地走到我背后，向我垂钓的水面扔石头，我回头看了他一眼，但没有理他。我不理他，他却来劲了，突然冲过来一把抢过我的鱼竿并将其折断了。对他平时欺负同学的事我早就看不惯了，心想总有一天要收拾他，我才不管你老子是谁呢。几天前他抢了我的弹子扔到稻田里，今天竟又欺到头上来，我怎么能忍得下这口气？

正在他得意忘形的时候，我猛地抢过折断了的一截鱼竿，向他头上、身上一顿猛抽。他开始与我对打，但他哪里是我的对手，不一会就打得他抱着头哇哇直叫，头上的血也流出来了。他边哭边跑，我一路猛追，直追到学校，追到他家。他从里面把门反锁了，我大声地吼着并拼命地踢门。蒋老师和其他老师闻声走了过来，好不容易才将我拉开。

我小时候虽然在村子里调皮是出了名的，但我从来没有和人打过架，

是一个公认的懂事的孩子。这是我第一次和人打架，也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和人打架，唯一一次出手打人。

第二天，我刚走进教室就被班主任老师叫住了，他当众扯下了我的红领巾，宣布免去我少先队中队长的职务、开除少先队并罚站。

同学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个个都给懵住了。我站在那里一声没吭，双眼圆睁盯着班主任，就是不屈服。

中午，母亲闻讯后赶到了学校。当母亲进来的那一刹那，我的腿突然一下子软了下来。我将昨天及前几天蒋淘如何欺负我的事告诉了母亲。我委屈极了，泪水再也控制不住，抱着母亲大哭起来。不知是因为激动还是因为大声地哭，我当时只觉得整个牙床麻木，全身发抖，连说话都很困难。这时，我们村的同学也围了过来，他们七嘴八舌地说了蒋淘平时如何欺负同学的事，并说蒋淘就是该打。

母亲听了我和同学们的诉说，没有和班主任打声招呼就拉着我回家了。回到家，母亲不断地安慰我，并说第二天她就去找周校长评理。

第二天，母亲去找了周校长。但我被开除少先队的事并没有得到解决。周校长碍于蒋友三是学校的骨干教师没有对他作任何处理。

在入队的时候，老师说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无数先烈用鲜血染红的。在孩子们的心目中，红领巾是非常纯洁而神圣的。红领巾不仅是好孩子的标志，也是一种骄傲和荣耀。我的红领巾被没收，被开除出少先队，这给我的自尊心极大的打击，我难过极了，痛苦极了，也愤怒极了。

为抗议班主任老师对我的处罚，我没有再去上学，我决不上蒋友三的课。

这件事对我的一生都造成了重大影响。

首先，因此事我没能参加当年的升初中考试，我的学业被整整耽误了一年。

其次，蒋老师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蛮横地撤了我的职务并把我开除出少先队，这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是真正的暴力！他对我处罚非但没有让我屈服，反而更增加了我对不公、对强权的抗争心理和欲望。

这种暴力和不公正深深地刺痛了我，让我刻骨铭心，以致在我一生中，凡是不公、以强凌弱的事都会使我如同当初那样愤懑，那样怒不可

遏。源自我亲身经历的这种感受本身已永驻不去，并完全摆脱了一切个人的利害关系，以致我只要看到或听到任何不平之事，不管受害者是谁，与我是否有关系，也不管发生在何地，我便立即会感同身受。当我读《封神榜》看到纣王残暴地杀害忠良的行径，读到白毛女受黄世仁欺侮时，我真想去亲手捅死他们，并万死不辞。当我看《说岳全传》时，我既为岳飞父子抗击金军感到由衷的鼓舞和欣慰，也为他们遭秦桧的无端陷害感到愤慨，同时也为他任由昏君、权奸迫害的愚忠感到无比的遗憾。而当我看到小说中描写弱者不畏强暴并战胜强者时，我就会为之兴高采烈，大加赞赏。如我看《粉妆楼》，对罗昆、罗灿兄弟在横遭冤屈时，敢于公开向皇帝挑战，就十分欣赏他们敢于抗上的精神。我曾作了一首诗，表达了我的这种立场和态度：

读《粉妆楼》有感

读书有几箴，最好《粉妆楼》。

君昏就该反，粪土万户侯。

这种情感甚至使我见不得动物之间的相互欺负，每当我看见一只动物欺负另一只动物时，我常常会身不由己地去干涉强者。记得我参加工作后的一天，我买回来一只大公鸡，把它和其他鸡关在一起时，其他的鸡竟群起而攻之，一只比笼中任何一只都强壮的公鸡竟被啄得头藏在翅膀里，好不可怜。我一时性起，将笼中其他鸡一个个捉出来按在地上，让新买来的这只鸡啄它们，让它们从此在新买来的鸡面前“俯首称臣”，以此解我心头的不平。这种做法也许有人会说太幼稚、太可笑了。但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这种感情也许是一种天性，是天性使然。

红领巾被没收这件事发生以后，我暗下决心，奋发图强，并立下志愿：学好本领，为穷人争气，为国争光。记得我曾对母亲说：我长大以后，别人凭力气，我要凭脑子，别人骑马，我就坐车，别人使刀，我就用枪，我一定要让母亲过上好日子，让穷人过上好日子。母亲听了非常高兴，并要我永远记住自己今天说的话。

为了实现自己的诺言，在1958年报考初中时，我独自一个人跑到离家十几里远的太平圩以“社会青年”的身份报了名，并将父母给我取的名字张友生改为“张法宝”。意思是我长大后要像《封神榜》中的奇

童年篇

人异士一样，用“法宝”除恶降妖，铲除人世间的平与不公。

今天想来，这种想法确实太幼稚了，也太不现实。人世间的平、不平到处都是，谁能铲除得了啊。

第四章 求学之路

一、11元入学费难倒我们一家人

1958年8月，我收到了宁远三中的录取通知书，全家人都非常高兴。但通知书说要交学杂费11元，这又使一家人犯了难，到哪里去筹集这11元钱的人学费呢？

翻身解放已8年了，吃饭的问题虽然基本解决，但家里的经济状况仍是捉襟见肘。我家除了靠两个哥哥和三姐挣工分，在生产队分得基本口粮外，没有任何经济来源。

当时的农村几乎还全部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吃的粮是自家种的，吃的菜是自家种的，穿的衣服是自家种棉、织布做的（我去武汉上大学时穿的衣服，被褥都是家织布做的）。必须买的生活品，如食盐、火柴等，只有从鸡屁股里去抠。因我们村是人多地少，人均田地并不多。记得我们村土改时人均水田只有六分，旱地人均也不到一亩。我们家八口人分得的水田不足五亩，旱地也只有六七亩。加之当时农业技术落后，产量也较低（以水稻为例，当时我们村的亩产在正常年景下也不过300市斤），在正常年景下，我家一年收的稻谷也就1500斤左右。平均每人还不到190斤谷子，碾成米后，每人每月平均只有13斤左右。1954年，国家开始实行统购统销，我家每年在交了公粮后只够吃半年，另外半年的口粮还得靠红薯等杂粮来当家。

说是自给自足，但当时自给是真，自足却还差得远。我们村的水源不好，因此常闹旱灾。遇到旱年，吃饭更是成了大问题。

1958年下半年，农村已实现了公社化。但我们家的经济状况并没有丝毫的改变。虽然二哥当了梅翠村炼铁厂的炉长，三哥也在东安县做了伐木工，三姐在刘家村种试验田，但他们还都是不拿工资的工人，是在生产队里记工分的农民。当时，全劳力一天记十个工分，而十个工分年终结算时只有一两角钱。家里劳力少的，每年结算时都是超支户。我们家当时二哥、三哥是全劳力，而父亲和三姐月翠两人都算是半劳力，母亲负责操持家务不出工，大妹明翠、小妹芬翠当时还小，都在上小学。

因此，我们家每年年终结算时虽不是超支户，但也绝没有分红的可能。公社化后家里不能养猪，鸡、鸭也只能少量养几只。因此，一般家庭几乎没有现金收入，真正是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每一分钱不捏出汗来是不会撒手的。

那时的人民币很值钱。在市场上，一个鸡蛋只两分钱，一碗三鲜面五分钱，一担（100市斤）谷子也只得七元钱。如果按现在的物价折算，当时11元的学杂费，相当于现在的300—500元。也就是说当时上初中的学杂费对我们家来说还是很贵的。

上学报到要11元的学杂费，这对我们这样的一个家庭来说，实在是个不小数字。更何况这只是学杂费，去县城上学还要寄宿、吃饭等的生活费呢。

为了这11元的学杂费我家竭尽了全力。父母亲不但卖掉了家里凡能换钱的东西，就连两只正在下蛋的老母鸡也被卖掉了。

二、独自料理自己的学习和生活

家里好不容易凑足了11元钱的学杂费，1958年9月1日，我顺利地宁远三中报了到，注了册，从此，我的中学时代也就开始了。

为了尽量减少开支，我没有在校寄宿。因为当时住宿每月要交6元的伙食费。从我家的经济条件来说，要寄宿实际上就意味着不能上学。为了能上学，我只能“走读”。我和本村同时考上初中的张明瑞、张明贤、张明宣、张青山及柏家坪的三位同学一起，在离三中一公里左右的东门街中段租了一间大房子（二楼一大通间），租金是每人每学期五角钱。

刚入学时，因我们的粮食关系还没有转入学校，加上我们的经济原因，我们吃的粮食、蔬菜，烧的柴火及日常用品都必须从家里挑去。又因为我们各人的家境不同，能提供的条件不一样，加之年纪小，没有“合伙”的意识，没有像后来的知青那样开集体户共同生活。我们是各自为政，各开各的伙，各做各的饭。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生活单元，各自照顾自己，并处理自己生活中的一切相关事宜。

开学后的一段时间，我吃的粮食和烧的柴都是三哥和二哥给我送去。后来二哥去了梅村炼钢铁，并当上了炉长；而三哥在东安干了一段时间

后，国家招工时报名去了资兴电厂，他们各自有了自己的工作。没有人给我送了，我就自己回家去挑。每个月回家两次，一般我星期六四点半下课后赶回家，星期日下午四点离家返回县城。

我家离县城 50 华里。那时到县城的公路还未修，只有两条小路：一条是从家走云潭、神下、十里铺到县城，这条路较平坦但较远；另一条路是走新张家、骆家，翻云雾山过十里铺到县城，走这条路较近，但必须翻越云雾山丫口，且多为崎岖的小路。从学校回家我一般是走翻雾云山这条路，因为回家时是空着手，跑跑跳跳，一般三个半钟头就到家了。而从家返校时就只能走过神下这条路了，因为返校时我必须挑着够我两个星期吃的粮食（大米、红薯）和烧的木柴，加上一些生活用品，最少也有五十斤以上，挑着担子当然走较平坦的路为好。

从初一第二学期开始，我没有再租房子住，而是住到了离学校更近的刘家村四姐家。四姐紫英是九叔的二女儿，曾祖父下我们这一辈姊妹中排行老四。四姐夫在县城东门街外的一个小学当老师，平时住校，不常在家。四姐很喜欢我，欢迎我住在她家和她做伴。

这时我的粮食关系（临时粮食关系）也已转到县城，每月定量是 28 斤。当时四姐在生产队挣工分吃大食堂，所以我还是自己一个人做饭吃。28 斤米对于一个正在长身体的男孩来说自然是不够吃，更何况买不起肉和油，每天的菜都是萝卜、白菜，清汤寡水的，饿得特别快。

当时农村已是吃大食堂，口粮不再分到户，而是由生产队统一管理，食堂统一煮饭。父母和两个妹妹每天早、中、晚餐都是在食堂打饭。他们再也不可能靠节食来贴补我了，我只能自己硬挺着。

为了做到每天不“超支”，避免到月底亏空后没饭吃，我每次买回米以后就将 28 斤米分成三份，每份 9 斤，管十天，自己严格控制，到第十天即使饿得冒冷汗，也决不动下十天的一粒米。

四姐所在的生产队是一个蔬菜队，是种蔬菜供应县城居民的。我有时实在饿得挺不住了，就去蔬菜地里转悠，看地里是否还可以找到可吃的东西。说也奇怪，尽管菜农们收菜时都十分认真，但有时还是能找到一些诸如白菜帮子什么的東西，拿回来洗洗后放在锅里煮煮，放点盐还是能管用的。

那时，我要读书的愿望非常强烈，一方面是我曾向母亲保证过我一定要好好读书，将来学了本领为穷人争气；同时，我也从读书中体会到了无穷的乐趣。为了在父母确实没有能力供我上学的情况下能继续上学，我一方面尽量节约开支，不随意花钱，一分钱不捏出汗来决不轻易撒手；另一方面，我想方设法，千方百计自己去挣钱。

在县城东门街和刘家村之间有座“七孔桥”（全木制桥），七孔桥头是一个大农贸市场。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和一个同学放学回家路过七孔桥时，听见一人正在高声叫卖芹菜，围了一大群人。出于好奇，我们也就凑过去看看，一问价钱，芹菜的价格每斤足足比我们老家贵了三分之一。于是我就动起了这差价的脑筋，心想，我如果从我们家挑50斤来县城卖，岂不可赚一块钱？

我非常兴奋，连跑带跳地回到了家。第二天正好是我们那里赶磐石圩，我在集市上买了50斤芹菜回来。下午四点，我挑了芹菜和自己吃的红薯赶往县城。

回到县城的住所，已是七点多了。因为我第二天还要去学校上课，上课是不能迟到的，所以我必须在早上八点以前将我的芹菜卖完。当夜我给芹菜洒了水保鲜，作好了第二天卖菜的准备工作后就睡觉了。

第二天我起了一个大早，天还没有亮我就挑着菜来到了农贸市场。这时市场上人还很少，我占了一个很好的摊位。

我原想这次可赚一块钱。但当晚回来一结账，结果只赚5角钱。

怎么回事呢？我分析了一下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我初次做“生意”，还不知道趸买变零卖有个折耗的问题。加之我人老实，不会玩秤，卖时只多不少，因此折耗就更大了。这是我在先前计算“赢利”时没有考虑到的。二是我不会吆喝，我的菜虽然比别人的好，但却卖不出好价钱；三是我要急着在八点差一刻前出手，好赶回学校上课，只好贱价卖了走人。

不过，对这次做“生意”的成绩我还是很满意的。毕竟我第一次做“生意”不但没有亏，而且还赚了5角钱！当然，所谓赚，是因为我只算了买菜的成本，而没有算我为此付出的劳动。在当时看来，出力气是算不得钱的。小时候，父母总教导我们人要勤快，不要偷懒，还常用老

辈人说的“舀不完的井水，使不完的力气”来激励我们。当时的想法是：力气是自己仅有的一种资源，不用就是浪费资源，就像泉水一样，你不用，泉水就白白地流走了。

为了挣钱，我还去建筑工地搬过砖。那是1959年上学期临近放暑假时，我和张尚达得到一个信息：县碾米厂正在进行扩建施工，需要砖石。当时的县碾米厂在原二中附近（文庙旁），而砖厂在桐山圩，两地相距约两公里，运价是每块砖三厘钱。

得到这个信息后我们都非常兴奋，第二天我们就拿了扁担和棕绳去米厂找到了相关负责人，说好价钱后，我们俩就立即加入了运砖的民工行列。

我们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七点半准时赶到工地与负责管砖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工作人员给我们指定了堆码地点。我每次挑30块砖，平均一小时跑两趟，一天干下来我可以运500块到600块，即两桶半到三桶砖（一桶两百块，工地负责人以桶计数）。开始两天，回到住所就感到累得不行，整个人就像散了架似的，一倒在床上就再不想起来了。但想到每天能挣一块五到一块八角钱，想到以这样的挣钱速度，只要干二十天，一个学期的学费和生活费就够了，心里却是美滋滋的。因此，尽管累，但晚上睡一觉，第二天还是照样干。

挣到了钱，1959年下学期我就结束了走读而住校了，这就为我的学习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为了节约开支，不论是生活用品还是学习用品，凡是家里有的或自己能做的决不花钱去买。在我的整个中学时代，我穿的衣服、盖的被子、穿的鞋袜无一不是自家产的。只有牙刷、牙膏、肥皂等工业品需要花钱去买，但用量是非常有限的。吃饭的钵是买的，但筷子和勺是自己用竹子削的。在学习用具方面，圆规、三角板等都是自己动手做的。

直到初中毕业升入高中，我家的经济条件才有所好转。这时三哥在鲤鱼江电厂已转正，他虽工资还低，但毕竟有了固定的收入。至此，我不再为学费多操心，而可以全力以赴学功课了。

第五章 体验“大跃进”

“落后就意味着挨打”。百年积弱导致百年屈辱的历史深深地刺痛了华夏民族的神经。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的胜利完成，极大地鼓舞了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在经济领域取得胜利的信心。为了使我们的国家能真正地站立起来，全国上下都希望能通过艰苦奋斗尽快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议提出了要使中国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十年内超过英国，十五年内赶上美国（所谓“超英赶美”）。提出钢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翻一番，即由335万吨达到1070万吨，1959年要比1958年再翻一番，由1070万吨达到3000万吨；粮食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增产80%，由3900亿斤达到7000亿斤左右，1959年要比1958年增产50%，由7000亿斤左右达到10500亿斤。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

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会议上，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要求全国各地尽快地将小社并大社，转为人民公社。

《决议》下达后，全国迅速形成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热潮。到10月底，全国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改组成2.6万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户有1.2亿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9%以上，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统称为“三面红旗”。

在大跃进中，中央提出“工业以钢为纲”、“农业以粮为纲”的口号。因此，全国上下齐动员的大炼钢铁运动和兴修农田水利运动便蓬勃开展起来了。一座座土高炉、炼钢炉堆砌了起来，不仅遍布山间、田野、街道、学校，也建起在了中南海里。与此同时，各地的大小水利工程的施工也陆续展开，各种粮食高产试验田遍地开花。

1958年下半年，我二哥柳生在离我们村三公里的梅村参加了大炼钢

铁，而且还当上了“炉长”。三哥去了东安县伐木烧炭，为“大炼钢铁”提供燃料。而三姐月翠则被大队抽调去了离家两里地的刘家村种试验田，并在那里结识了云潭村的奉治财，后来他们结成了夫妻。

可以说那时是哪里发现了铁矿，不管其品位是否符合开采价值，哪里就有“炼铁厂”，而没有铁矿的地方也会有“炼钢厂”，原料自然是收集废钢铁。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炼钢指标，一些地方动员各家捐献旧的铁器，甚至砸锅取铁。

在大跃进中有两件事我印象最深刻。一件是在运送木材的路上竟然睡着了，另一件是我给水库工地的指挥长写了一封信。

一、挑着担子走着路竟然睡着了

我所在的学校宁远三中也在操场上砌起了“炼钢炉”炼钢。

我们那里不产焦炭，“炼钢炉”的燃料就用木材来代替。而县城是不产木柴的，因此，只能从有木柴的地方去运来。

开学不久后的一天，我随我们三中的一百多名同学一起去五十多里外的中和乡运木柴。早上七点起床，吃了早饭后，八点赶到学校操场集合。领队老师交待了目的地及有关注意事项后，我们就各自拿着绑扎木柴用的绳索，扛着扁担出发了。

中和乡位于宁远县城西北 25 公里，与湖南著名的林产区双牌县相邻。

出县城 5 公里后我们就进入了山区。这时道路变得崎岖而狭窄，我们的运柴队伍也从双列变成了单列。在家时曾听父亲说起过中和圩，但我这是第一次去。因此，开始还有些好奇和新鲜感，和同学们有说有笑，很是开心。

一路上到处可见“炼钢炉”冒出的浓烟，而凡是有“炼钢炉”的地方，方圆几里地的树木都被砍光，留下了光秃秃的山梁和一片片的树桩。

随着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好奇和新鲜感逐渐退去，代之而来的是饥饿和疲惫。路越走越远，但就是不到目的地。虽说中和离县城的距离和县城到我家的距离差不多，但感觉上却觉得远多了。

下午一点半，我们终于到达了中和乡木材集散地。这里的木材堆积如山，全是原木，细的有碗口粗，粗的有达 50 厘米以上的。这些粗细不

同的原木，大多数将被劈开投入到炼钢炉中。

我们匆匆吃过午饭后，各自绑扎好自己挑的木柴。下午两点半，我们挑着木柴开始匆匆往回赶。

老师对各人应挑多重虽然没有指标，但处在那你追我赶、人人争先的大跃进的氛围内，加之大家都是年少气盛，谁人甘居落后？因此，各人都是根据自己的能力，尽量挑得多一些。

挑担远行，开始是不能走得太快的。就像长跑一样，力气要匀着点使，不能一开始就猛冲。同时还要控制好呼吸和行走的节奏，使扁担的上下闪悠与行走步伐合拍，使挑着的担子和人成为一体。当然，扁担的选择也是很重要的，太硬或太软都不行，一定要与所挑的重量相匹配，否则，就很难满足行进节奏的需要，人也就很累。

我们挑着劈柴一个跟着一个地往回走。开始时大家还有些兴奋，有说有笑。但走了不到几里地，运柴队伍就开始变得沉默了，一百多人的队伍在行进中再也听不到说笑声，只听见嚓、嚓的脚步声和木柴碰到路边杂草或石头的声音了。一些原来还走在前面的同学逐渐挪在了后面，有的干脆就退出队伍在一边歇脚了。

那时我们都还是十三四岁的孩子。虽然我们都是从农村，但挑着重担走远路几乎都还是第一次，都还没有挑担远行的经验。在家时，砍柴、割草等农活都在本村范围内进行，最多也不过两三里地远。再说，哪家父母又会让自己的孩子挑着重担去这么远的地方啊。

走了20里路后大家都累得不行了，但多数同学还是坚持着往回赶，只是速度已明显慢下来了。六点后，天渐渐黑了下来，走在前面的带队老师开始打开手电筒，并不时招呼同学们一个个跟上，不要掉队。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但由于没有准备吃的，我们只好顶着。

天完全黑了，幸好那天有月亮，队伍还在继续前进。十点后，我也累得不行了，脑子开始变得空荡荡的，只是双脚还在机械地迈着。

我们就像一群山羊，在头羊的带领下行进，不管前面是沟是坎还是悬崖。两条腿好像已不是自己的，而像是机器人的腿一样机械地交叉着向前迈进。

脑子里什么也不想，也根本无需去想。走着走着，我的脑子不知不

觉地就迷糊了起来，眼睛也不知什么时候闭上了。不一会我就真正地睡着了，还做起梦来。

我梦见自己走进了一条山谷，山谷下是一条河，河水又清又亮，里面有很多鱼，它们在水中悠闲地游着，根本就不理会有人就在它的面前。在河的两边山上，白云缭绕，一座庙宇在白云中时隐时现……

突然，有人大叫了一声：“逍遥岩到了！”我猛然被惊醒，睁眼一看，逍遥岩就在眼前。这时已是晚十点了，远处县城的灯光已隐约可见。

晚十一点，我们回到了学校。当把劈柴送到指定地点时，身体就像散了架一样，饿早已忘记了，当时只想睡觉，恨不得就地躺下去甜甜地睡上一觉。

读者看到这里也许不会相信我说的挑着担子走路会睡着的事是真的，但我可以负责地告诉读者，这确实是事实。

今天的读者也许还会问：你们学校用木柴能炼得出钢来吗？当然不能了。炼钢是一门科学，它不仅需要有科学的设备，而且要有一整套严格的生产工艺，不是随使用砖垒一个“炉子”就可以炼出钢来的。不仅我们学校用那种方法炼不出钢来，当时全国成千上万同样“土法上马”的“炼钢炉”也不可能炼出真正的钢来。我们学校当时“炼”出来的既不是钢，也不是铁，只能说是一堆“炉渣”。这些“炉渣”在我初中毕业前用来铺了一条由教室通往学校大操场的路。

二、给半山水库工地赵指挥长写信

半山水库工地位于九嶷山瑶族乡境内，离宁远县城 60 华里。当时不通公路，水库工地用的钢材、水泥等建筑材料全靠人工搬运到工地。

1958 年 12 月临近期末考试的一天，我们学校第二次接到上级向半山水库工地运送水泥的通知。当天下午，有关单位就将水泥送到了学校并统一堆放在操场上。

袋装水泥每袋 50 公斤，对于我们这些十四五岁左右的孩子来说只能是两个人抬一袋。

我和旺溪村的张尚达搭档抬一袋。根据第一次送水泥的经验，我们当天下午五点以前就作好了各项准备，特别是绊扎用绳和草鞋都准备了

备品，以防半路绊绳折断和草鞋磨坏。

第二天凌晨五点我就起了床，吃过早饭，六点差一刻赶到了学校，与张尚达会合并立即出发。正值冬天，这时离天亮还有一个钟头。我们抬着水泥走在队伍最前头。根据以往的经验，走在前面这一点非常重要。在行进的队伍中，即使走在前面的人正常匀速地向前走，走在后面的人往往每隔一段时间就要一阵小跑才能跟上队伍，这对均衡使用体力是很不利的。

我们很快就调整好了行进的节奏，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前面我说到了挑担走路要掌握好节奏，尽量使担子与身体成为一体。两个人抬着东西走路，节奏的控制就显得更为重要了。如果两人的节奏配合不好，就会出现“前拉后扯”、白白消耗体力的严重后果。而要调节、控制好两个人的步伐、节奏，显然要比调整好一个人的节奏要困难得多。

下午五点，我们终于到达半山水库工地。将水泥交给工地库房后，我要张尚达在库房门口休息等我，说我去一会就回来。

我转身奔向大坝。第一次来工地时我已探听好了，工地指挥长每天下午四点后一定在大坝顶上。

上到坝顶，经人指点，我一眼就看到一个身材魁梧的人正在指挥人们夯土，并和旁边的工作人员说着什么。我径直朝那人走去。

赵指挥长一米八以上的个子，四十几岁年纪。从他讲话的神态、气质、口音看，他是一个南下干部，而且一定是军人出身。

他看到我朝他走来，态度和蔼而亲切地对我说：“小朋友，找我有事吗？怎么跑到工地上来了？”我说：“我是个学生，是送水泥来工地的。我想给您提点意见，都写在这上面了。”说着，我从衣袋里掏出我昨晚写好的一封信递了过去。没等赵指挥长拆开信，我就转身朝大坝下跑去。

工地上人山人海。有挖土的，有挑土和用手推车运土的，他们都在忙碌着。沿水库大坝外侧的斜坡和两边山坡上，有用草席搭成的数不清的简易窝棚，这是来自全县各公社的成千上万民工休息和住宿的地方。

工地上没有供我们这些临时来工地的人住宿的地方，我和张尚达会合后就立即往回赶，争取在天完全黑下来之前找到一处能够安全睡觉的地方。

我这是第二次来半山水库工地送水泥。第一次在返回的路上找睡觉的地方，曾给了我深刻的教训，就是今天想起来也不免有些后怕。

那天，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我们看到山脚有一间房子。凭我们的经验，可以肯定这是附近生产队的一处公房，是用来堆放稻草、农具和杂物的。

门没有上锁，我们推门走了进去。没有灯，屋子里什么也看不见，但一股我们熟悉的稻草清香使我们知道这间房子里堆的是稻草。正在此时，又进来几个我们学校赶路至此投宿的同学。

我们连续赶了十二个小时的路，实在是太累了。一起说了一会话后就各自在稻草堆里睡着了。后面是否还有人来投宿，我们就知道了。

我们一直睡到第二天八点。突然，一个同学大叫了一声：“啊，有死人！”我一骨碌爬了起来，向刚才大叫的同学那边走去。走近一看，见一衣着褴褛、脚穿草鞋的人静静地躺在稻草堆里一动也不动。我翻开盖在他身上的稻草并摸了一下他的手，手已冰凉，全身发硬，显然已死了一段时间了。

我们竟和死人一起睡了一个晚上！这一惊非同小可。我们十来个同学一窝蜂似的跑出了稻草房，连头也不敢回就朝回学校的路上狂奔，一直跑出两里多路才逐渐平静下来。

附近有一个村子，我向村里人说了我们昨晚睡的地方发现有死人的事，请他们去看看并进行处理。

这一次的教训使我和张尚达决定到村子里借宿。

冬天白天短，还不到六点，眼看天就要黑下来了。我们来到一个村子，敲开了一家的门，向这家主人说明我们请求借宿的事。

这家主人是一个五十开外的老婆婆，当她听说我们是运水泥到半山水库工地的三中学生后，不但满口答应了我们的请求，还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她给我们煮了两大碗鸡蛋面。在我们吃面的时候，她告诉我们：她家住了两个工作组的同志，今天都去公社开会去了，正好有铺给我们睡。我们庆幸遇到了这样的大好人，同时也感谢那两个未谋面的工作同志，是他们腾出了床位给我们睡觉。

因为一天的劳累，也因为暖烘烘的被窝，头一碰上枕头我就睡着了。

这是我印象中一生睡得最香甜的一觉。

这一觉一直睡到第二天上午八点。我叫醒尚达，催促他赶快穿衣准备上路。

告别了好心的女主人，我们拉开大门正要往外走，眼前白皑皑的积雪把我们吓了一大跳。

原来昨晚下了一场大雪，积雪足有二十厘米厚。

怎么办？我们只能走。一来我们已和女主人作了告别，二来我们必须今天赶回学校，因为明天还要上课。

备用草鞋昨天就磨穿了底，走出不多远就完全不能穿了，只好赤脚走。当脱下草鞋，赤脚刚一接触到地面积雪的那一刹那，我只感到一阵刺骨的疼痛。但我只能向前走，不，这不是走，而是跑，是像有一只老虎在后面追着我一样，拼命往学校的方向猛跑。

下午四点，我们跑回了学校。

一进学校，我就去了校医务室。医生看到我一双通红的脚也吓坏了，他很快将一团蘸了碘酒的棉球递给我，要我往有些麻木了的脚上反复涂擦。

我的双脚这时就像两条烧红了的铁棒一样，饱蘸碘酒的棉球刚擦过去，一股白烟就冒了起来，擦上去的碘酒瞬间就干了。校医不停地递给我棉球，我不断地往双脚上擦，大约过了半小时，我的双脚才逐渐恢复正常，这时虽然还是红红的，但麻木的感觉已没有了。

回校后我一直在想我给赵指挥长的信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我设想了各种可能。但自从那天见了赵指挥长以后，我相信他是个好人，他是个那么和蔼可亲的人，绝不会为难我，他一定会很好地处理我提出的意见。因为我信上所说的问题都是事实，要解决这些问题也绝不是不可能。

我在给赵指挥长的信中主要说到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关于派我们这些学生送水泥的问题，二是关于工地工棚区的环境卫生及安全问题。我在信中说了我第一次送水泥来工地，因无处住宿而和死人睡了一个晚上的事。我写道：我们都是些十三四岁的孩子，要我们抬着水泥走六十里路到工地，是否有些太残忍了，不说要抬东西，就是空手走，对

我们来说也绝非易事。党把我们当作祖国的花朵，你又怎么能让我们来抬水泥呢？这不是在摧残我们吗？

说到工地民工的工棚问题，我写了我见到的卫生极度恶劣的现象。我说：“上千个工棚一个挨着一个，既无清洁的饮用水，也无正规的厕所。上万人的吃、喝、拉、撒所造成的环境问题极为严重，如果不尽快改变工棚区的卫生状况，很有可能发生传染性疾病的传播。还有就是工棚搭盖在大坝外侧及两边山坡上，一旦下大雨山洪暴发，或工棚失火，都将造成不可想象的后果，这些绝不是小问题，必须尽快予以解决。”

一个星期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仍无从半山水库那边传来的任何消息。不过，从那以后再没有通知我们往半山水库工地送水泥了。我想，赵指挥长一定接受了我的意见，不会再有事了。

谁知过了春节返校后的一天，我们班主任廖老师突然找到我，要我去她的办公室。我一进办公室，看到平时一脸笑咪咪的廖老师这时却是一脸严肃。这把我给弄糊涂了。我问：廖老师，找我有事吗？

她从抽屉里取出我给赵指挥长的信丢在桌上，气呼呼地大声说：“这信是你写的吗？”

没想到我一直盼望的消息今天是以这种形式出现的。不过，我有思想准备，我曾设想了各种可能。因此，我并没有紧张慌乱，而是平静地说：“这封信是我写的，怎么啦？”

“怎么啦？你出名了，你也让我们学校出名了！人家把信转到县教育局，教育局根据你送信那天的日期，一下就查出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写的。于是，这封信就转到我们学校来了。”

“我是向领导如实反映情况，又没有写反动标语，怎么就错了？”

“你知道赵指挥长是什么人吗？人家在解放战争中流过血，是有功之臣，是师级领导，你说赵指挥长残忍，你还说没错？”

就这样，我和廖老师为信的事情大声地吵了起来。她说我有错，要我写深刻检查。我说我没有错，没错我就不写检查。她一句，我一句，我毫不相让。廖老师看说服不了我，一时竟急得眼泪都要流了出来。我们正吵着，教导主任推门进来了。他要我先回教室好好想想，想通了再来找廖老师。

廖老师是刚从湖南茶陵师专毕业分配到我们学校的，人长得很漂亮，小巧玲珑。她教我们年级的历史课并兼任我们班的班主任。我们都喜欢听廖老师上的历史课。特别是她讲的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的屈辱史，讲到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讲到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时，总是让我们激昂悲愤以至声泪俱下。

她的讲课极富感染力，不但使我们受到了爱国主义的教育，同时也使我们明白了“落后就意味着挨打”的道理，从而极大地激发了我们立志报国的热情。记得一次我听了廖老师的课以后写了一首明志诗：

自勉

不求富贵不图侯，不想红颜太风流。

只要为国争口气，平生自愿第一筹。

可以说，廖老师给我的教育对我的一生都有重大影响。但今天我竟和她吵了起来，心中不免有些难过和愧疚。本想转回她的办公室说声对不起，但当着教导主任的面说对不起，我又觉得不合适，只有作罢，心想以后再说。

这天以后，我没有找廖老师承认错误，因为我认为自己根本就没有错。我就是这种犟脾气，我认为没有错的事情，决不会违心地承认自己有错。而如果我认识到自己真的错了，我会坦率地承认，决不会推托，决不会文过饰非。小时候是这样，长大后也是这样，这也许就是我的天性。为此，我确实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特别是文革时期，我在后面将就此作些记述。

奇怪的是学校和廖老师也没有再找我，县教育局从那以后也没有再通知我们给水库工地送水泥。这也许是他们认为我只不过是个孩子，对孩子不必认真；也许指挥长也认为我说得对，他们应该接受我的意见。如果是后者，其善也，莫能大焉！只是不知道半山水库工地那上万民工工棚状况是否有所改变。

不管怎么说，这次给指挥长写信带来的风波就这样过去了。在初中临毕业的时候，我曾担心学校会把我给赵指挥长写信的事记在我的档案里，如果放在我的档案里，那对我升高中将产生不利的影晌。因为在那个年代里，升学不但要看成绩，而且要看家庭成分和“政治表现”的。

以后的事实证明，学校并没有把这件事记入我的档案中。因为，初中毕业后，我顺利地考入我们县的重点高中——宁远一中，而且，我因参加文化大革命多次受审查时也没有涉及这件事。如果学校把这一情况记入了我的档案，在文革批斗我的时候，他们一定会给我加上一条“在上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反党”的罪状。因此，在以后的很多年内，我一直在心里感谢宁远三中，感谢我的班主任廖老师。

读者看到这里，可能会对我上面说的情况产生种种疑问，甚至根本就不相信我说的这些都是事实。

读者首先要问的也许是：两个十三四岁的孩子，抬着 50 公斤重的水泥，一天赶一百多里路，这可能吗？大冬天的，在稻草堆里能入睡吗？



初中学生证照片

还有就是：赤着脚在雪地里走路而不被冻伤，可能吗？今天的人，特别是今天的青少年提出这个问题是可以理解的。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我同样觉得当时所经历的事有些不可思议，但这确实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红旗招展、人山人海、意气风发、擂台竞赛、你追我赶、卫星满天的大跃进场面，及随之而来的万马齐喑、万户萧疏的三年困难时期的景象，都随着半个多世纪的过去，渐渐地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

但如何客观地看待这段历史，如何从中汲取历史的教训，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最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大炼钢铁那年，我撑起半边天》（原载

2009年7月24日《新京报》），很值得读一读。现摘抄如下：

人物：韩玉竹（女）

家庭档案：北京人，现住东城区北新桥头条48号。

1958年，韩玉竹25岁，但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韩玉竹很少走出家门。丈夫外出工作，她在家照顾孩子，打扫，缝补，洗洗涮涮。

1958年8月17日，中央号召全民大炼钢铁，作为团员的韩玉竹走出了家门，成了一名炼钢的积极分子。同一年，她参加了工作，报了扫盲识字班。

1958年，对于韩玉竹和她的家庭来说，都是一道分水岭。从此，韩玉竹走出厨房，撑起了这个家的半边天。

扔下吃奶孩子炼钢

1958年，韩玉竹家里的生活比较艰苦，家里靠丈夫每个月赚的50多元过活。经常上街捡点菜叶泡饭吃。

大炼钢铁期间，天还没亮，韩玉竹就掀开被窝起床，在简单地洗漱之后，随便吃点东西，便抛下孩子们炼钢铁去了。

韩玉竹的孩子最大的不过6岁，最小的才几个月大。妈妈炼钢去了以后，他们就哭。邻居们循着孩子的哭声而来，轮流帮忙照顾起孩子。孩子脏了，张家给换个衣裳；孩子饿了，王家给找来了吃的。

韩玉竹晚上回到家中，经常发现孩子穿着邻居们做的衣裳，“打扮得跟个小洋人似的”。

为争先进砸家里箱锁

“当时我是个团员，怎么也不能落后啊。”韩玉竹回忆，当时炼钢的材料不够，她就跑回家，先把不用的锅、盆捐出去，抡起一块石头，咣的一下就把箱子上的铁锁给砸了下来，然后拎起来就往铁炉子的地方跑。

丈夫知道了，一点也不生气。“那时候为了炼钢，大家都争先恐后呢。”她把家里的几把锁砸了以后，又打起了炉子用的“拔火罐”的主意，和邻居一商量，便决定两家共用一个拔火罐。她家的拔火罐就进了炼钢炉。

此后，做饭的时候，她就往邻居家跑。“还增加了邻里的感情呢。”

她后来给儿女们讲这段故事的时候，孩子们会问，家里没了锁，东

西不丢吗？

“那时可以说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家里没有一把锁，但东西从未丢过。”韩玉竹每次谈起这件事，她的眼睛就会望向远方。

她说，过去嘛，日子过得紧，有时候还吃不饱，但风气好得很呢。

夫妻黑白轮班炼钢

韩玉竹的丈夫蒿永怀，比她大6岁，在一家厂子做电工。白天，他外出工作；下班以后，还要赶到单位去炼钢铁，上头给下达了任务。丈夫为了超额完成任务，每天只睡几个小时。

当时他们采用的是土法炼钢，土高炉的制作较简单。

“在里面搁一些耐火砖，外面搁一些普通砖，再用一些石头，一堆就起来了。一个土高炉往往是10个人一拨，轮流炼钢。土高炉外面还设一个大风箱，需要一个人不停的拉，有人往里面扔生铁，还要有人负责燃料。”

每到深夜，许多人已经入睡，负责拉风箱的蒿永怀却没有停歇，他不时的抬头看着被高炉映红了的天空。那段时间，北京城没有夜晚。

蒿大爷说，那时他不觉得累。他们要“超英赶美”，要让外国人知道中国人也不是好惹的。

妻子白天炼钢铁，丈夫晚上炼钢铁。他们在家里一起的时间很短。偶尔，夫妻二人会比一比谁炼了多少钢。

我撑起半边天

1958年，“妇女解放”的口号提出已有时日，但外面还是男人的世界，偶尔有妇女骑着自行车去上班，但街上的人都会投以异样的眼光。

韩玉竹认为，大炼钢铁改变了这一切。男女都去炼钢，都参加劳动，自然没有人互相说了，也不担心别人怎么看了。

韩玉竹说，炼钢让她走出了家门，不再围着锅台转，得到了真正的解放。“从此以后，家里不再是丈夫一个人担着，我算是撑起了这个家庭的半边天。”

韩玉竹说，她在劳动中体会到了什么叫平等。

为认字租武侠小说

困难，其实没有什么，想要克服，也很容易。

走出家门以后，由于没有文化，韩玉竹感觉到处碰壁。于是，读书识字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丈夫白天上班，晚上炼钢，自己也要炼钢，三个孩子需要照顾……即使这样，韩玉竹还是决定要认字。

1958年底，韩玉竹报名参加了一个业余识字班。白天炼完钢，晚上就抱着几个月大的孩子去上夜校。

在这个培训班上，她掌握了大部分常用的汉字。

丈夫蒿永怀喜欢听书，韩玉竹就从外面租来了一堆武侠小说，那时租书便宜，只要几分钱。

现在，韩玉竹要读好些份报纸。她是家里的消息灵通人士。儿孙们学习遇到困难，打退堂鼓的时候，她就给他们讲1958年炼钢、识字的艰辛。

能够理解当年炼钢

许多年以后，韩玉竹通过一些文献，知道了当年他们炼的钢铁是不合格的，还必须回到大高炉里面重新炼。或多或少会感到遗憾，他们把家里一些好端端的铁具，比如锅盆，送去炼成了废铁，给自己造成很大的损失。

“但我们那一代人能够理解。”韩玉竹说，当时，国家的底子很薄，全国人民都急于摆脱贫穷落后的局面。大炼钢铁这个目标，把全国人民的热情都调动起来了。而且，作为一名普通老百姓，并没有能力去思考国家决策对还是错的问题。

“我们今天要辩证的看待这个问题，而不是一味地去否定或者肯定。”韩玉竹说，她常常教育她的儿孙们，今天的幸福是老一辈的人艰难探索和勤奋努力得来的。

如今，韩玉竹和蒿永怀都已经上了年纪，但老两口的身体都很硬朗，蒿永怀还是他们社区的志愿者，天一亮，他就戴着红袖章，顺着胡同巡逻去了。碰到邻居，他一般都会乐呵呵的打个招呼。

有时他们遛弯路过老街道办时，看到当年堆放土高炉炼钢铁的地方，总能想起热火朝天的1958年。

这篇文章记录了经历过“大跃进”的一代人的真实感受。为什么他们经历苦难而至今没有怨言，更没有怨恨？为什么那些没有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却对那段历史颇多微词？

人是会犯错的，一个革命党在探索发展中也会犯错。大跃进的错误今天的人看来是明显的，但大跃进在我国发展、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我认为也不能低估，特别是在全体人民的思想解放和工业建设的全面布局、迅速发展方面。

年青人犯错我们都说是可以原谅的，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原谅还处在幼年时的建设者们所犯的错呢？

第六章 “男人十五，穿州过府”

1960年暑假，我第一次走出宁远县界去三哥明友工作的湖南资兴鲤鱼江电厂，这一年我十五岁。

古人说要成就事业，必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也许是对希望成才的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要求。我的父母不识字，他们不知道读万卷书的具体作用，但却知道行万里路对一个人，特别是对一个男人的重要性。他们认为一个人要有出息，必须多见世面，见大世面。一个没有见过大世面的人读的书再多，也不可能有很大的出息。

因此，他们经常用“男人十五，穿州过府”的话来激励我们。还举出十二叔的例子：“你们十二叔在家时没有读多少书，但他十几岁就跑出去闯世界见世面了，二十几岁就当上了蒋介石的侍卫官。如果不是解放，不定要当多大的官呢！”。

二哥、三哥都在十几岁时出了县，二哥还去过广东打零工。

我在上小学时，父亲就带我走了周围二十里范围的很多地方，因此，我对方圆几十里地面的地名就比较熟悉了。

解放后有地种了，父亲不再做小生意了，不再走南闯北了。但父亲喜欢打鱼（用网网鱼）。每年秋天，他都要带我去周围有河的地方打鱼。如西南方向的琴棋、上宜骆家、神下、旺溪，东北方向的石城、枇杷岗、谢家等地方，我都跟父亲去过。这些地方离我们家近则四五里，远的就有二十几里路。

我们一般是下午四点左右背着鱼网鱼篓出门，第二天凌晨四五点回来。正因为有这段经历，我从不怕走路，不怕走夜路，我的胆子也就是那个时候练出来了。

宁远、新田、嘉禾、蓝山四县的县城在地图上组成一个菱形，而我们老张家就处在这个菱形两条对角线的交点上，我们家到四个县城的路程几乎一样，都是50里左右。当时县间公路已经通了，但公社和县城之间还未通公路。因此，我们不论去邻近哪个县的县城都还必须靠两条腿步行。

1960年暑假我决定出去见见世面，我要独自去三哥所在的鲤鱼江电厂。我对一个人独自远行充满信心。但父母还是不放心，要二哥柳生送我到嘉禾县城。

兄弟俩到了嘉禾县城后，二哥返回。我独自一人乘汽车到郴州，再由郴州换乘火车到了鲤鱼江，一路上都很顺利。

我这次去三哥那里，走的是老张家—嘉禾—桂阳—郴州—鲤鱼江的路线。

大哥福生和三哥明友是同一批参加工作的。他们开始被分配到资兴东江水电站，后鲤鱼江火电厂上马，他们又同时被调到鲤鱼江电厂参加建厂工作。当时鲤鱼江电厂是湖南最大的火力发电厂，有一千多职工。

大哥福生是维修工，而三哥则是司炉工。在大跃进年代，工厂都是先建厂，待工厂投产后再建职工宿舍和生活设施，即使像鲤鱼江电厂这样的湖南省重点建设项目也不例外。1960年我去鲤鱼江电厂时，大哥和三哥他们都还是住临时房（和现在正规建筑工地的临时板房差不多），生活还是相当艰苦的。

我到鲤鱼江电厂不几天，工厂就贴出省电力局要在鲤鱼江电厂办电力技校（中专级别）并招收学生的通知。那时农村上初中的孩子都希望能考中专或技校。因为中专和技校不但上学不交钱，而且能早些参加工作，早拿工资，早日摆脱贫困。

但那时中专和技校的招生名额都很少，想上技校或中专很不容易。为了抓住这一难得的机会，我毫不犹豫地决定报考，三哥很快为我报了名。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我参加了考试。几天后录取名单公布了，榜上有我的名字，我高兴极了。想到两三年后我就可以走出农村参加工作、当技术员、拿工资，我兴奋得几天都睡不着觉。

高兴之余，我又犯愁了。因为招生通告中有一条：初中在校生必须持转学证，否则不予报到。宁远三中会给我开转学证吗？我心中无数。

原本想在三哥这里待到新学年快开学时才回家，但此刻我再也等不得了，我必须立即回校开转学证以不耽误去电力技校报到。

得到录取通知书的第二天我就动身回家。不料当我乘火车赶到郴州要买回宁远的汽车票时却碰到了麻烦：三天内不但没有郴州到宁远的汽

车票，而且郴州到蓝山、新田、嘉禾的车票也都没有了。如果在郴州住旅馆等买第四天的车票，不但住旅馆要花钱，更重要的是时间耽误了要误大事。怎么办？我决定走路到桂阳，希望在路上能搭上便车。心想即使搭不上便车，到了桂阳再设法买到宁远的车票，机会肯定会多些。因为桂阳是郴州通往四个县的集散点，在这里只要有人下车，只要有一个司机肯让我上车，我都可以上车回家。不管他是到宁远、到嘉禾、到蓝山还是到新田。

因在郴州车站等车耽误了时间，我走到桂阳时已是下午两点了。到售票窗口去问服务员，都说没有始发车了，不过有过路车，但要看是否有人下车，如有人在桂阳下，我就有希望。我一直在车站入口处等，每过一辆车我就跑过去问，看是否有人在桂阳下。如没人下车，我就恳求司机让我上车，说没有座位不要紧，但都没有结果。直到下午四点，终于有一辆去新田县的客车司机同意让我上车。虽没有座位，但我还是庆幸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谁知事不如人愿，车子从桂阳出来开了不到一个小时，竟在半路上抛锚了。我们只好下车找阴凉处休息，而司机和他的副手则下车修车。他们先检查电路，再查油路，忙得满头大汗，但车子就是发动不起来，全车人焦急万分。

直到晚九点车子终于修好了，我们上了车，但车仍开得很慢，而且走走停停，到达新田县城时已是第二天凌晨两点了。

我从未到过新田县。到达时又是深夜，因此下车后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当时我是又饿又渴，但这么晚了，要想找吃的、住的地方根本不可能。即使找到了餐馆、旅馆，人家早已打烊睡觉了，哪还有人招呼客人？没有办法，我只好忍着饥饿，任由蚊子肆意攻击，在车站候车室的长条凳上睡到天亮。

第二天天还蒙蒙亮的时候我就起来了。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看候车室墙上挂的行车地图。我看行车图不是为了买车票乘车，因为从宁远县城回家和从新田县城回家都是要靠走路的。我看行车图的目的，在于了解新田县境内我曾听说过的一些回家方向的地名，以便问路。接着我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向人问清东南西北，弄明自己现所处的方位及我家的

方位。

吃过早饭，我就直奔新田县城南门。本想买张地图，但新华书店要八点以后才开门，而且当时也还没有出版过有村镇地名的地图，我只好作罢。

到了南门，我向当地人详细打听了去十字圩的走法。在家时曾听父亲说过，十字圩是新田离我们最近的地方，只要到了十字圩，再进入宁远县境问题就不大了。

十字圩在新田境内，当地人一般都比较熟悉，说得也就比较清楚。我一记下了去十字圩要经过的村镇地名，到了一个村再问下一个村怎么走。就这样一边走一边问，上午十点，我顺利地到达了十字圩。

在十字圩我随便吃了一点东西，问清了去白土的路线后就接着赶路。

下午一点左右我到达白土，白土就属于我们宁远县了。我非常兴奋，对回家的路我就更有信心了，因为平时就常听人说过这个地方，我们村还有从白土嫁来的媳妇。

下午两点半，我从白土到达太平圩。

太平圩也叫火烧圩，离我们家只有十二里路。这里已属于我熟悉的地方了，小时候我就经常跟着大人们来这里赶圩。下午三点半，我连蹦带跳地回到了家，完成了我15岁“穿州过府”的计划。

回到家的第二天我去宁远三中开转学证。但得到的答复是：学校不同意我转学。不管我怎么恳求，教导主任就是不同意。

我想上技校，早日当工人，早日走出农村的美梦落空了。

我有时想：一个人的前途、命运往往就决定于关键的几次转折，这几个转折中的每一个转折都将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试想，如果当时宁远三中同意我转学，我顺利地上了鲤鱼江电力技校，那我的命运将完全是另一种情形了。

这次虽然没有转成学，但我这次独自远行的间接成果是明显的。这次独自完成“穿州过府”的旅行，特别是在此期间我参加了鲤鱼江电力技校的招生考试并被录取，使我对自己的能力有所了解，极大地增强了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从鲤鱼江回来后不久，我写了一首诗，充分表达了我当时的“雄心

求学篇

壮志”。诗是这样写的：

望笔架山

窗外一岭生三峰，昂然若剑插云中。

想他胸怀不凡志，敢将锋芒示天公。

第七章 “三年困难时期”的回忆

今天 60 岁左右的人都经历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

上世纪的 1959、1960、1961 三年，全国出现粮食严重短缺，多数人吃不饱肚子，已经上马的一些工矿企业也因原料和投资不足而难以为继，不得不“下马”，职工遣散。史称这三年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也称“三年经济困难时期”。

近三十多年来，有关“三年自然灾害”的传言很多。一些反毛的“精英”们如杨继绳等任意夸大事实，说“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三千万人，网上甚至有人说“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四千万，说当时是真正的“民不聊生，饿殍千里”。这些人都毫无例外地将“困难”的形成归咎于毛主席，以此来抹黑共产党，在社会上特别是在年轻人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三年困难时期”的真实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呢？作为亲历者，下面就谈谈我经历的“三年困难时期”的真实情况。

一、我经历的“三年困难时期”

“三年困难时期”我正在上初中。

1959 年上学期我是在县城租房住，自己开伙，油、盐、柴、米都是从家里挑来。这段日子虽然过得艰苦，但过得很充实。

从 1959 年下半年开始，我开始住校，成了“住宿生”。

对于像我这样的农村户口的学生，政府为了既不改变我们这些学生的户口属性，又能保证我们的正常生活和学习，采取了一种变通办法：每年新学年开始时，家长所在生产队将我们一年的定量口粮卖给国家（各地因自然条件的不同，口粮的标准不一样），由粮管站开具“转粮证”，学生再将“转粮证”交给学校，国家就按城市户口的统一供应标准进行供应。这样，我们这些农村户口的学生也算是“吃国家粮”的了。下面就先说说我“吃国家粮”的情况。

我住校时每月的粮食定量是 30 斤。这个定量在肉食和食油供应不足

的情况下，对一个正长身体的十四五岁的男孩来说显然有点不够。但也也许是因为我们来自农村，抗饥饿力强，在我的记忆中，直到1960年暑假，我并未觉得粮食供应对我的成长有多大的影响。前面我说到1960年暑假期间我曾为实践“男人十五，穿州过府”的计划，只身去鲤鱼江电厂探望三哥的经历。在返回的过程中，我蹦蹦跳跳一口气跑了三十公里，从新田县城跑回了家，这充分说明那时我的体力并没有因粮食问题受到什么影响。今天的初中生，如果要他一口气走三十公里，也许多数人都会累趴下的。

从1960年下学期起，我们的定量减为28斤。而到1961年上学期，定量再减至26斤。这时多数同学开始觉得饭不够吃了，经常饿得发慌。

为了尽可能地解决学生吃不饱的问题，当时学校领导也想尽了一切办法。其中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发动全校师生将我们三中旁边的一片闲置荒地开垦出来种瓜、种菜，实现粮食不足“瓜菜代”。

学校按班级划分这块荒地进行开垦和播种，并进行比赛，比哪个班的地种得好，瓜菜长势快。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我们这些学生绝大多数来自农村，对挖地种菜自然都不陌生。由于肥料充足，两个多月后，我们栽种的白菜、南瓜、玉米等瓜菜就陆续开始收获了。有了瓜菜，学校还开始养起了猪，期末考试结束后还宰了一头肥猪给大家打“牙祭”。

“瓜菜代”的办法在当时确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大大地缓解了我们因粮食短缺而带来的严重问题。除了种瓜菜实行“瓜菜代”以外，学校当时还进行了“小球藻培植试验”，据说小球藻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可惜试验没有成功，我们未能分享到小球藻可能提供的蛋白质。

尽管学校为缓解粮食短缺的问题尽了最大的努力，但由于缺乏肉食和食用油的供应，我们的肚子仍然还是饿得发慌。上午到第三课时肚子就开始“造反”了，到第四节课下课的铃声响起时，我们就会一窝蜂似的向食堂发起“冲锋”。

我们当时吃的是蒸饭。各人有自己的饭钵，开饭时对号认自己的钵子，吃完饭洗好饭钵后再将钵子放回蒸笼固定的地方。有段时间，不知是谁发现在饭钵里放一点小苏打，蒸出来的饭几乎可以增加一倍，而且

吃起来特别香糯。为了让自己有饱的感觉，我们都照此办理，每次吃完饭后在洗好了的钵子里放上一点小苏打。结果三两米蒸出一大钵饭来，将肚子都撑得鼓鼓的，那种吃饱了的满足感实在是很美妙。

但事后想来，在蒸饭时放小苏打对饱肚子其实是帮了倒忙。因为小苏打呈碱性，它本身有助消化的功能，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它是“刮肠子”的。本来肠子里油水就少，再经小苏打这一刮，肠子里就更没有油了，饿得也就更快了。

由于吃不饱肚子，同学们的体质普遍有所下降。也许是巧合，当时我们学校竟发生了两起“闹鬼”事件。

一天早上七点，同学们正集中在大操场准备做早操。

刚排好队列，广播体操的乐曲尚未开始播放，突然一个同学站立不稳而向一侧倒下。

这时奇怪的事发生了，只听到一片尖叫后，上千名同学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一个接一个地纷纷倒在了地上。

我当时也在队列中，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受，可身体也不自觉地向一边倒去，并觉得有一种极为恐怖的气氛笼罩着整个操场。

领操的体育老师见状大为吃惊，拼命地吹哨子，在附近晨练的其他体育老师闻讯后也都跑了过来。他们一边大声地呼喊，一边一个个扶起倒地的同学们。过了好一阵子，同学们才相互搀扶着站了起来，对刚才发生的事都感到一片茫然甚至恐惧。

事后人们议论纷纷，说这是在“闹鬼”。

学校领导也许明白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因此决定暂停每天的早操和课间操。

可没过几天，学校又发生了第二次“闹鬼”的事。

这天下晚自习时，各班班主任发给每人三颗药片，说是用来打钩虫的，要求每个人必须在临睡前服下，大家都照办了。

熄灯铃响过后，寝室内逐渐安静了下来。就在此时，奇怪的事发生了：先是一个同学突然莫名其妙地哈哈大笑起来，接着又有一个同学也大笑起来。当时我还以为他们是在搞恶作剧，正要制止他们时，又有几个同学随之大笑不止，接着我们这个四十多人的大寝室里，除我、张尚达等

四五个同学外，全都发疯似的大笑起来。我和尚达都觉得有些不对劲，立即下床拉开了灯，试图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在此时，刚才还在大笑的人突然又大哭大骂起来，有骂同学的，有骂老师的，骂什么的都有。就像大家都喝醉了酒，疯了一样，把平时不敢骂、不敢说的人和事都说出来、骂出来了。

面对这种局面，我和尚达都吓坏了，不知到底是怎么回事。正要去报告老师，这时却有一些人起了床，衣服都没有穿好就又哭又骂地冲出寝室往楼下跑。

这时隔壁寝室的同学也和我们寝室的同学一样。

正当宿舍楼乱成一团的时候，住校的值班老师，还有教导主任、校长等闻讯也都先后赶到了现场。

老师们费了好大的功夫才把同学们安抚回宿舍。等到同学们都重新躺下时，我已是满头大汗，差点要虚脱了。我很纳闷，想不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觉得真是闹鬼了，心里不免有些发毛。

宁远三中接连发生的两次事件至今仍是个谜。当时各种说法都有。有的说是“闹鬼”，有的说第二次是吃打钩虫药引起药物中毒反应。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校园里两次“闹鬼”事件，我想只有留给有心人和专家们去分析了。

快六十年过去了，“三年困难时期”留给我的记忆就是这些。总的印象是当时我们的肚子都吃不饱。但要说这对我们的学习和成长造成了多大的影响，现在看来还真谈不上有什么大的影响。

现在有人在网上发表文章，说城里人在“三年困难时期”也闹了饥荒，也饿死了人。我认为这绝不是事实。

因为长期以来，国人分为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城市户口包括城市居民、企业职工、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军人、大中专学生等。有城市户口的人也称“吃国家粮”的人。对拥有城市户口的人，国家实行的是粮食定量供应制度。当时一般城市居民每月的定量是26—30斤，企事业单位职工的定量是30—45斤（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是35斤，从事重体力劳动的是45斤）。

“三年困难时期”的定量虽略有减少，而且要搭配一些杂粮（南方

搭配玉米粉、大麦粉之类），但应该说定量基本上是能维持正常需要的。虽然当时肉类及副食品供应不足，肠子里少了“油水”（用营养学的话来说就是缺少蛋白质和脂肪，从而导致了一些人“营养不良”）。但在我看来，“三年困难时期”对城市人口来说生活质量虽有所降低，但这只能说是有点“困难”而已，绝不存在什么“饥荒”甚至“饿死人”的现象。

二、我看到的农村“三年困难时期”的情况

“三年困难时期”的严重问题发生在农村。

当时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大多数。对农村来说，“三年困难时期”就不仅仅是一般的“困难”了，在一些地方已严重到危及生存了，河南、安徽和四川三省尤为突出。

下面我就说说我在湖南宁远县农村见到的一些情况。

上中学时，我经常回家，寒暑假都是在农村老家度过的，因此可以说我对当时农村的生活情况是了解的。

1961年春节前我并没有发觉农村生活有什么异样。直到1961年7月中考结束后，我在家等待中考结果时，才感觉到农村的情况确实有些不妙。

这次我从县城回到家，还没有进村，就觉得村子里有些异样：往日在村边嬉戏、追逐打闹的孩子们少了，鸡鸣狗吠的农家常见景象也没有了，在树荫下乘凉闲聊的一些老年人有的瘦骨嶙峋，有的患了水肿病，个个无精打采，似乎连说话都没有了精气神，而离村不远的地方却平添了一座新坟。

一进家，我就问母亲：我刚才看到光泽叔的坟了，春节时光泽叔还是好好的，怎么一下子就没了？

这时刚进门的小哥听到了我的发问就说：光泽叔是今年2月去神下村挑化肥时死在回家的路上的。同去的还有生产队的另外四五个人，我也去了。

那天，光泽叔早上出门时一点东西都没有吃，当挑了化肥从神下村往回走到琴棋村时，已饿得再也走不动了，大家只好歇下来陪着他。时

值早春，田里、地里什么能吃的东西都没有，连野草都还是枯黄的，只有车前草这时是青的。光泽叔饿得实在不行了，拔下路边的车前草连洗都没来得及洗，就大口大口地吃起来。不知是吃得太急还是中了毒，吃下去没有几分钟就口吐白沫，不省人事了。当我们把他送到云潭公社卫生所时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怎么抢救也无效了。

接着小哥给我讲了当时村里的粮食困难情况。

小哥说：“去年因天旱，粮食减产，收的稻子交了公粮、余粮后，队里剩下的就没有多少了。原本指望今年小春作物能够弥补一些，但今年春夏雨水还是少，荞麦、蚕豆等小春作物基本没有收成，夏收作物小麦、黄豆、红豆、绿豆、包谷的收成也大不如往年。我们已将返销粮的要求报上去了，但迟迟没有批下来。如果老天还是不下雨，即使批下来了也不一定能解决缺粮的严重问题”。

小哥接着说：“我们生产队能供应给每人大米就只有每月8斤，也就是说每人每天三两米都不到。为了度过饥荒，上面决定公共食堂停办，自留地也增加了一些，要求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搞好‘瓜菜代’，多种瓜菜。但瓜菜也要靠老天下雨啊，老天不下雨，瓜菜也长不起来呀。

“现在是什么能吃的东西都拿来吃了，连往年用来喂牛、喂猪的红薯藤也拿来吃了，至于像夏枯草及平常用来喂猪的野菜，一出苗就被人采掐光了。”

回到家后的第三天，母亲对我说：“我看别人家都吃过稻草粑粑了，我也尝过，确实可以吃。今天我们就做好准备，明天我们做稻草粑粑吃吧。”

当时我真不敢相信稻草还能做成粑粑，而且还能吃。但我还是没有说什么，和小哥、妹妹们一起去为做稻草粑粑作准备。

做稻草粑粑的工艺还相当复杂。第一步是将稻草铡成一寸左右，再将铡好的稻草放入大缸中，加上水和一定量的石灰；第二步是将在石灰水里浸泡了一天的稻草从缸内捞出并将石灰漂净；第三步是将漂净的稻草置入石臼中捣烂；第四步就是加“黏合剂”并将其反复揉搓成砣。这一步非常重要。不加“黏合剂”或量不够，稻草虽捣烂了却没有黏性而

揉不成砣，蒸出来也是散的，成不了“粑粑”。“黏合剂”最好是用米粉或面粉，我们用的是米粉。如没有米粉和面粉，用蒸熟的红薯当“黏合剂”也可以，只是效果要差一些。最后一步就是上蒸笼蒸。

长辈人常说：“什么是好药？能治病的药就是好药。什么东西最好吃？饿极了，什么东西都好吃。”这话一点也不假，绝对是真理。当热气腾腾的稻草粑粑端上桌子时，一股稻草特有的清香扑面而来，就连平时吃东西最刁的小妹芬翠也忍不住大口地吃起来。

晚上我问小哥：南岭（在蓝山县境内）的蕨根做粑粑不是很好吃吗？为什么要用稻草来做粑粑吃？二哥说，到处的人都去南岭挖蕨根，南岭的蕨根早就被人挖完了。

1960年寒假回家时我曾吃过蕨根粑粑，觉得很好吃。这种粑粑的原料是蓝山县境内南山上的一种蕨根。这种蕨根粗的有食指粗，呈黑色。蕨根粑粑的制作工艺是：第一步是将挖回来的蕨根捣碎；第二步是将捣碎的蕨根放入大缸中用水浸泡，让蕨根内的淀粉溶入水中；第三步是用纱布过滤，去除残渣；第四步是沉淀，去掉上面的水以后，将沉淀物放入大锅中熬煮，待大部分水熬干后，剩下来的就是蕨根淀粉了。用这种淀粉做的粑粑吃起来有点糯米味，口感很不错。

一天，我跟父亲去赶太平圩（太平圩，我们那里也称火烧圩）。圩上人很多，但除国营的合作社里还有一些工业品以外，副食品基本没有可卖的。到下午一点多时，我实在饿了，父亲看到农贸市场有人在卖以土茯苓为主要原料做的粑粑，就买了几个。我狼吞虎咽地吃了三个，当时并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可回到家以后却拉起肚子来，拉得人都快虚脱了。为这事母亲和父亲大吵了一架，埋怨父亲让我吃土茯苓，害得我生病。直到我大学毕业第一次回家探亲时，母亲还和我说到这事，当着父亲的面数落父亲。

当时农村缺粮的情况是普遍的，但程度却不完全一样。在同一个县以至同一个公社，缺粮的程度也会有较大的差别。有些地方情况好一些，有些地方更严重一些。

一般来说，当时小村子要比大村子好过一些。因为大村子之间，领导为了面子而相互攀比，搞“浮夸风”，而小村子往往就不存在这种情况，

相对实事求是。因此，一些小村子，特别是那些交通比较差、山上的那些村子，在“三年困难时期”反而成了人们向往的地方。

往年大村子的姑娘绝不愿意嫁到山上的小村子里去。可这时情况不一样了，为了吃饱饭，她们不但愿意嫁而且是找上门去。当时我就听说同属我们生产大队的六十岨村的一个三十七岁的老单身汉，仅凭两个大南瓜就娶了大村子来的一个漂亮姑娘。

比较而言，邻近的蓝山县比我们宁远县要好一些，而相邻的江西省又比我们湖南省的情况要好一些。当时，我们村就有人为生计，远的跑到了江西省，近的跑到了蓝山县，或给人家当儿子，或当上门女婿。我们生产队张光艳的独儿子张明勤就去江西给人当了儿子，而我九叔的三儿子张良生则去了蓝山县当了人家的上门女婿。

就我看到的情况而言，“三年困难时期”农村的吃饭问题确实是严重的。但要说严重到“饿死人”了，甚至说当时是“饿殍千里”，这也不是事实。“三年困难时期”我家当时8口人个个都好好的，我家的亲戚、我的同学和朋友中没有一个人因饥饿丢了性命，我们村近二千人，也没有听说哪家饿死了人。

当然，我们县在全国“三年困难时期”的饥荒可能并不是最严重的。那些最严重的地方，比如河南、安徽和四川肯定有人饿死了，而且还不少。还有像我上面提到的我们村子光泽叔的死，虽说是突发疾病，但也不能不说他的死是与饥饿有关的。事实上，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死亡的人中，相当部分都是因疾病加饥饿造成的。

三、天灾与人祸

为什么当时的农村会出现如此严重的粮食短缺以至饥荒呢？

我认为首先是天灾，其次是人祸。

1959—1961年，我国接连三年发生了范围最大、程度最深、持续时间最长的自然灾害。正如周恩来1960年10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说：“这样大的灾荒那是我们开国十一年所未有的，拿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二十世纪记事起，也没有听说过。”¹

1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558页，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现将陈东林《三年自然灾害与大跃进——“天灾”、“人祸”关系的计量历史考察》（载《中共党史资料》2000年第4期）一文中，有关三年自然灾害的情况摘抄如下：

1959年全国出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达4463万公顷，成灾（收成减产30%以上为成灾）面积1373万公顷（《灾情报告》¹第378页）。且成灾又主要集中在主要产粮区河南、山东、四川、安徽、湖北、湖南、黑龙江等省区的旱灾，占全国成灾面积的82.9%，而且各种灾害交替出现，对粮食生长影响十分严重。当年1—4月，河北、黑龙江出现严重春旱，影响300万公顷农作物，为历史罕见。4—5月的霜冻造成华北、黑龙江50多万公顷农田受灾。与此相反，2—6月，南方三次出现洪涝灾害，珠江、长江、淮河流域洪水泛滥，造成200多万公顷农田被淹。3—6月，东部沿海和华北地区又发生风雹灾害。进入夏季，旱灾、洪涝情况交替肆虐，6—8月出现江淮流域为主的大旱灾，到7月下旬受灾面积已达821.2万公顷，持续到8月上旬扩大到黄河以北和西南内陆，受灾面积达2276万公顷。7月下旬，河北、北京、黑龙江地区突降暴雨，山洪骤发，200多万公顷农田被淹。7—9月，东南沿海遭到5次台风侵袭，最高达12级，使120万公顷农田受灾。

本年灾害从受灾面积看已是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更重要的是灾害种类繁多，在部分地区轮番发生。除旱灾、霜冻、洪涝、风雹外，还出现了建国以来不多见的蝗灾、粘虫灾、鼠灾。

本年全年成灾人口为8043万，超过1949—1958年平均数80%以上，其中山东、湖北、四川各占1000万。本年春荒人口达9770万人（主要指缺粮人口，包括外流逃荒、营养病、破产度荒、卖送儿女、非正常死亡人口），相当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2.87倍。

继1959年大灾害后，“1960年全国大陆除西藏外又发生了建国后最严重的，也是近百年少有的特大灾害，受灾面积达6546万公顷，成灾面积2498万公顷，受灾面积居建国五十年来首位”（《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第35页，国家统计局综合司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以下简称《五十年汇编》）。主要灾害是北方为主的持续特大旱灾和东

1 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编《1949—1995中国灾情报告》，中国统计出版1995年版。简称《灾情报告》。

部沿海省区的严重台风洪水灾害。1—9月，从69年秋天开始就缺少雨水的山东、河南、河北、山西、内蒙古、甘肃、陕西等华北、西北地区持续大旱，有些地区甚至300—400天未下雨，受灾面积达2319.1万公顷，成灾1420万公顷。其中山东、河南、河北三个主要粮区合计受灾1598.6万公顷，成灾808.5万公顷，分别达整个旱灾地区的68.9%和56.9%。山东、河南境内的黄河等河流都长期断流，济南地区的800万人生活用水告急。进入夏秋，旱灾扩展到江苏、湖北、湖南、广东、四川、云南等南方地区。整个大陆省区除西藏外旱灾面积达3812.46万公顷，是建国五十年来最高记录。6—10月，东部地区发生严重的台风和洪水灾害。5个月里台风登陆11次，高于以往平均数近两倍。台风过境时间高达10—20小时，高于往年平均数三倍以上（《灾情报告》第379页）。台风造成暴雨频繁、洪水泛滥，广东、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江苏、山东、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11省受灾993.3万公顷，直接死亡5000余人。山东部分地区30多天里降暴雨19次，平地积水3—4米。东北辽河、太子河泛滥，流量为有史以来最大，淹没辽宁、吉林等地143.7万公顷，“鞍山、本溪等地区农田、村庄受到毁灭性打击”（《灾情报告》第378、379页）。

60年3—5、9月，东部和西北部发生严重霜冻灾害，波及11省区，受灾面积138.1万公顷。3—9月，还发生了由南向北推进、波及21省区的风雹灾害，受灾面积达392.26万公顷。

60年大灾害不仅面积超过以往，而且是在1959年灾害基础上连续发生，危害极大，成灾人口达9230万人，春荒人口高达12980万，相当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3.8倍。另一个特点是旱、洪灾同时发生，反差极大，一个省内，部分地区暴雨洪水泛滥，另部分地区持续干旱，给救灾带来复杂困难。

1961年，全国连续第三年发生特大自然灾害，受灾面积6175万公顷，其中四分之一绝收（减产80%以上为绝收）。成灾人口16300万，也超过了上年。

从60年冬季持续到61年3月下旬，黄河、淮河流域1300万公顷农田遭受大旱，4—6月，旱情扩大到长江流域广大地区，年内全国旱区受灾面积达3784.6万公顷，成灾面积1865.4万公顷。其中河北、山东、河

南三个主要产粮区小麦比去年最低水平又减产 50%，湖北有 67 万公顷未能播种，河南有 73 万公顷基本失收。4—5 月，淮河流域遭受霜冻、大风灾害，淮北有 375 万公顷农田受灾。倒塌损坏房屋 504 万间。4—6 月，江南珠江、湘江、赣江、闽江流域两次普降暴雨，洪水决口，泛滥成灾，水淹 10 个县市城……7—8 月，海河、黄河平原连降暴雨，发生严重水涝灾害，其中河北、山东部分地区灾情是百年未遇的，受灾面积达 160 万公顷，占播种面积 54%，近 100 万公顷无收成。

到 9 月，灾区有 60 万公顷仍积水未退，聊城、沧州有 3500 个村庄被水包围，280 万人断粮，沧州专区死亡人数占总人口 4.9%。7 月下旬至 8 月，东北局部地区遭受暴风雨侵袭，山洪暴发，冲入伊春市，交通、电讯中断，工厂停产。松花江流域 7 万公顷绝收。

8—10 月，东南地区的广东、福建、浙江、江西、江苏、安徽遭受台风袭击 11 次，其中 12 级以上占 9 次，是建国五十年里最多的（《灾情报告》第 82 页）。淹没 180 万公顷农田，造成损坏渔船、倒塌房屋、冲毁海堤、死亡人数的损失都超过往年。

“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最大损失，莫过于使粮食大幅度减产，造成农村严重缺粮。全国粮食因灾减产情况，据统计，“由于一些地区连续三年受旱，三年全国共减产粮食 611.5 亿公斤”，“其中 1959 年受灾最严重，约损失粮食 378 亿公斤，其中以旱灾为主造成的损失约为 260 亿公斤”。（《灾情报告》第 67、6 页）

在生产力还十分低下的情况下，人类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是十分有限的。1942 年发生在河南的旱灾加蝗灾饿死了 300 万人；1946—1947 年发生在我国南方的大饥荒，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了 1750 万人。近代在世界范围内，每次因饥荒而死亡的人数也都在数百万以上。

我国在六十年代初的生产力还是相当落后的。因此，在 1959—1961 年连续三年发生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发生严重的饥荒以至饿死人是可以想象的。

有人说上世纪 1959—1961 年根本没有发生自然灾害，饥荒主要是人祸造成的。我不知道这些人对上述自然灾害的事实作何回答。

除天灾外，当时是否存在“人祸”呢？回答也是肯定的。“人祸”

主要体现在当时各级领导干部被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冲昏了头脑，骄傲情绪、官僚作风膨胀，以至在“大跃进”中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瞎指挥，导致农村劳动力严重不足和浮夸风盛行，从而加重了自然灾害带来的后果。

在“大跃进”的年代里，干部们为了“超英赶美”，将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抽调到大办钢铁、兴修水利的工地上去，导致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严重不足。

我小哥当时是生产大队的负责人之一。他说1958年下半年和1959年全年，我们村（生产大队）90%的壮劳力几乎都被调出去炼钢铁或修水库了。以我们家为例，全家八口，除我和两个妹妹在校读书以外，两个哥哥是“全劳力”，小哥柳生去了梅翠铁厂炼铁，三哥明友去了东安县为炼钢铁烧木炭（后去资兴电厂当了工人）。三姐去了农业试验场。在生产队从事农业生产的只有父亲一个人。而父亲当时年事已高，只能算个“半劳力”。一家“全劳力”都在大炼钢铁，农业生产能不能正常进行，可想而知。

当时大修水利工程也占用了相当多的劳动力。以我们宁远县来说，县有县级的水利工程，比如前面提到的我曾去送过水泥的半山水库，县里从各公社抽调了数万民工去修水库。而各公社又各有自己的水利项目，我们云潭公社的项目就是修佛光音水库。佛光音是一个有六十多户人家的村子，当时公社为了彻底解决我们村及邻近村的水源问题，决定将佛光音村搬迁，在原村址上修水库。结果是由于开工前没有做必要的地质勘探，水库修好后存不了水，水从地下溶洞流掉了。不但劳民伤财，还害得佛光音的村民花了很多年才完成重建回迁。

当时的农业技术还是非常落后的。收成的好坏除看年景以外，主要靠劳动力的投入，靠精耕细作。以春耕为例，在我们那里，传统的做法是在插秧前必须“三犁三耙”，也就是犁一道后耙一道，如此反复三遍。插秧后接着就是炸石烧石灰，割青沤肥。我们那里的土壤是酸性土壤，每年都要在秧苗返青后撒石灰，一是中和酸性，二是除虫。当时化肥很少，主要靠农家肥，而农家肥是有限的。因此每年清明前后要上山割青（上山割刚长出来的灌木嫩枝叶或青草）沤肥，而所有这些都是需要投入大

量劳动力的。主要劳动力都去大炼钢铁或修水利工程了，农业怎么能不减产？

由于劳动力的严重不足，已经成熟的庄稼也有部分收不回来而烂在地里。我印象最深的是1959年回家过寒假时，一路上可以看到大片大片庄稼地里未收完的红薯、棉花和花生。社员们（基本上都是老人和妇女）为了按时完成“抢收”任务，一些人在挖红薯和花生时只把长在地面上的藤拔掉，而红薯和花生却仍留在地下。有的红薯虽然已经挖出来了，但却堆在地边无人搬运回去。当时在我们那里红薯是和稻谷一样重要的主粮，红薯被称为“半年粮”，红薯收不回来，半年的口粮就不在了。而且红薯怕冻，如不能在下霜前即时收回并存放窖中，一两场大霜后就完全冻坏不能吃了。

在“大跃进”的年代里，浮夸风在各级干部中愈演愈烈。

以我们宁远县为例，当时当地稻谷的亩产量在正常年景下为300—400斤。本来由于劳动力投入不足而减了产，而干部们则受浮夸风的影响，上报的亩产量却是700斤、800斤，甚至报1000斤。

为什么“浮夸风”与农村闹饥荒也有关系呢？为了弄清这一点，我们还得先了解一下当时国家对农村实行的统购统销政策。

所谓“统购统销”，就是政府对农村的余粮和主要工业原料实行由国家统一收购，统一销售。政府根据每一个村（生产队）土地的总量及平均亩产计算出总产量，减去这个村的总人口乘人均年口粮，再减去应上交的“公粮”，剩余部分就称为“余粮”，由国家统一定购，不得自行买卖和处置；如果总产量不足全年口粮，或因自然灾害减产，村（队）的不足部分则由国家统一售给（也叫“返销粮”）。

说到这里，大家就应该明白农村的“浮夸风”与饥荒的关系了。平均亩产量和人口数是你生产队自己报的，亩产量你浮夸得越多，按照余粮的计算方法，国家收购你的“余粮”自然也就越多，以致生产队秋收后交了公粮、卖了余粮后，就所剩无几了。

缺粮、饿肚子正是对“浮夸风”的必然惩罚。

按理说，因“浮夸风”引起的农民多卖了“余粮”，那粮食应该还在国家的仓库里呀，再卖回来给农民不就完了？事实上并非这么简单。

因为当时国家相关部门还真以为是农民吃不完才卖给国家余粮的，于是国家外贸部门就拿这些“余粮”出口挣外汇去了，苏联逼债逼得正紧呢；而国家民政部门则拿了这些“余粮”调剂到其他需要的地方去了。再者，当时蒋介石天天叫着要反攻大陆，传单都撒到内陆一些地方了。国家要准备打仗，战备粮肯定是要留足的。因此，当农民卖出“余粮”后，要买“返销粮”就很难了。

在写作这个回忆录时，我在网上看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及相关部委负责人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的发言和检查。从中我们也可以了解当时的一些情况。

在七千人大会上粮食部负责人在检讨中承认：1959年全国粮食产量是3400亿斤，可是征购就拿了1200亿斤，占三分之一强，这是农村伤了元气的一个重要原因。

冶金部负责人对一再抬高钢铁指标，造成9000万人上阵大炼钢铁，从而直接导致农业减产承担了责任。

外贸部负责人对在全国出现饥荒的情况下，还于1959年和1960年多出口了几十亿斤粮食的问题作了检讨。

水电部负责人对全国上马过多的大中型水库，因而挤占了大量农村劳力，影响了农业生产的问题作了检讨。

毛主席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又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之所以出现“三年困难时期”，除客观上的自然灾害外，无疑是党的政策、策略和干部出了大问题，教训是十分惨痛的。

我认为毛泽东、刘少奇及相关部门的领导人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和检查是可信的，大会所作的决议对此后纠“左”及迅速恢复国民经济也起到了关键作用。但会后并没有对相关责任人，特别是四川、安徽、河南这样的重灾区的主要领导人作出任何处理，也给党内官僚主义的继续滋生和蔓延留下了隐患。

“三年困难时期”，亿万人民以忍饥挨饿甚至失去生命的代价证实了他们对共产党的信任和忠诚。

而毛主席带头节衣缩食，与全国人民同甘共苦，共度难关，并及时

地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政策，实行了相应的措施，也证实了当时的共产党人是真正为人民服务并与人民休戚与共的。正因为如此，今天那些曾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的人们，虽有对这三年的痛苦回忆，但却很少有对当时共产党的怨恨。

第八章 感谢班主任唐慧老师

1961年7月，我考入我们县唯一的重点中学宁远一中。当时全国性的饥荒还没有结束。

我们班的班主任是学校党支部委员、政治教研室主任唐慧老师。

高中一、二年级我都是班上的三好学生、班委会成员，高二时加入了共青团组织。

在整个中学阶段，我的学习成绩在班上都属于中等偏上，从来没有得过第一。但我的任课老师对我的评价都不错，认为我人聪明，善于思考，学得比较活。

那时我们学校流行一种说法：“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的数、理、化三科成绩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特别数学和物理两科对我有更大的吸引力。为了解一道数学难题，我常常可以不吃不睡，即使睡下了，做梦还是在做那道题。每做出一道难题我就会感到特别的

兴奋，特别高兴，而且会有一种成就感、自豪感和幸福感。就像自己亲自攻克了一座碉堡、打了一次大胜仗一样，这种感觉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感受得到。

“学而知不足”。随着学习范围的扩大，我的求知欲更加强烈，因而就愈是感到自己知识的不足，就愈是觉得用于学习的时间不够，心中暗下决心，一定要争分夺秒地充分利用所有的空闲时间。

当时我们已是二十岁的人了，在农村正是谈婚论嫁的年龄，但我连想都没有朝这方面想。



我们班 57 人中只有 7 个女生。在我的印象中，我几乎没有和任何一个女生有过什么交往。因此，在我写这个回忆录回忆高中的同学时，我怎么也想不起这 7 个女生的名字来，甚至她们的宿舍在学校的什么地方我也想不起来。只记得当我知道大阳洞张家一个同学在谈恋爱时，竟会感到非常惊奇，甚至不能理解。我当时送了他一首诗，希望他从前途考虑尽快结束这段不会有结果的恋情。诗是这样写的：

送友人

爱情岂寻常，要经风和霜。

轻言爱情者，月下看《西厢》。

为了能充分利用高中最后这几个月的学习时间，高三下学期刚开学我就毅然做出两个决定：第二次更名，辞去班委职务。

我第一次改名时还小，当时将父母给我取的名字“友生”改成“法宝”，是希望自己能像《封神榜》中的英雄一样用“法宝”行侠仗义，锄暴安良。这种想法虽无可指责但无疑是幼稚可笑的。为了直接表达自己立志报国的志向，我向学校申请将“法宝”改为“建华”。和我一起提出更名申请的还有同班同学刘三崽，他更名叫刘健清，我们的申请很快得到了批准。

我作出第二个决定，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寒假期间我看了《少年诸葛亮》这本书。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大概意思是：如果一个人在对人生、对社会的认识还处于混沌状态时就急于走向社会、承担社会责任，就犹如“摘未熟之瓜，落未熟之果”，不仅食之苦涩而且是暴殄天物。当时我强烈地感到我这时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其他诸如学生干部啦、三好学生的荣誉啦，与我的长远目标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我出生在农村，我心里十分清楚：要走出农村奔向广阔的世界施展才干，实现自己报效祖国的志愿，我只有一条路——考大学，考不上大学一切都是枉然。

我的第二个决定在付之实施时却遇到了很大的麻烦，并险些因此失去了考上大学的机会。

当我向班主任唐慧老师提出辞去班委委员时，我没有说任何理由，因此唐老师不同意。之后他多次找我谈话，做我的思想工作，希望我能继续担任班委委员，继续支持他的工作。但我的回答总是一个字：不。

为了让我改变主意，团支部也多次开会“帮助我”，但我仍坚持自己的决定，坚决不再担任任何职务。从此班上同学对我就有了一些议论，主要是说我不关心政治、走“白专道路”什么的。对此，我一概不予理睬。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

但不久后发生的一件事却几乎使我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

开学前的一天，我在逛书店时突然发现书架上有一套新版《中学数、理、化复习参考资料》，并配有相应的习题集，我如获至宝，欣喜若狂，毫不犹豫地就买下了。这套书在当时虽只需十几元钱，但这十几元却是三哥刚给我寄来的学费和当月的伙食费啊。

三哥 1960 年下半年被鲤鱼江电厂保送到长沙电力学院带薪上学，他从 33 元的工资中每月给我寄 10 块钱作生活费。当时我们学校的伙食费是每月 6 元，在一般情况下，我每月都有一点节余。买了书以后，当月的伙食费就只好暂时向同学们借了。

自从买了这套书以后，我几乎把所有的课余时间都用在了这套书上。我不但对高中已学课程进行了系统的复习，而且通过大量做习题加深了对课本内容的理解。当时我身边有六七个志趣相投的同学，其中李民健、肖云龙是班上的学习尖子，而班长刘景明、团支部书记汪进旺及李有昌、刘健清、林名大几人的学习成绩与我相近。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学习中的问题，也常常在讨论问题时争得面红耳赤。在讨论和争论中我们相互启发相互交流，学习效果有了很大的提高。

就在我沉浸于学习的兴奋中时，一件我没有意料的事情发生了。五一节前一天下午最后一节课下课时，班主任唐老师突然宣布说：学校决定五一节会餐，要求每班派一个同学去学校鱼塘参加捞鱼，并点名叫我去。

我们学校的厕所建在鱼塘水面上，大便直接作为鱼的饲料。我本应愉快地接受这项逮鱼差事的，因为我从小就喜欢水，喜欢捕鱼捉蟹什么的。但当时我正如火如荼地复习、做习题集，根本没有心思干别的任何事，就连我平时最喜欢的康乐棋和乒乓球也不玩了，我哪有兴趣去逮鱼？更何况是到厕所下方的鱼塘逮鱼，心中已是有些不乐意，想到要逮吃大便长大的鱼来“会餐”，更让我打心底不乐意。

班主任点名要我去逮鱼，我认为是班委中有人看我整天就是啃书本做习题，也许出于嫉妒，也许出于对我走“白专道路”不满，故意借机整我。我从小就有强烈的自尊心，我总是力求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做漂亮。我也乐意帮助别人，特别是愿意帮助弱者。我最讨厌的是阿谀奉承、口是心非，最恨的是以强凌弱、以势压人，最受不得的是别人成心的欺负。因此，班主任一宣布要我去逮鱼，一股莫名的冲动就立刻涌了上来。我当时完全没有考虑后果就大声说：“我宁愿不参加学校的会餐也不去逮鱼，谁愿去谁去”。

一个学生当众顶撞班主任，直截了当地拒绝班主任的工作安排，这种事如果发生在今天也许算不得什么大事。但在当时那个年代，我的做法无异于冒了天下之大不韪！

那是政治第一、政治高于一切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时时都有政治，到处都有政治。政治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政治虽不可触摸，但可感受。政治不可超脱，更不能逾越，政治气氛笼罩着全中国的每一寸土地和每一个人。至于什么是“政治”，似乎很少有人认真地去研究过。但大多数人从一次次政治运动中，从父辈、从周围人的经验中知道，党的方针、政策，党的指示、号召，乃至你所在厂的厂长、所在村的村长、所属支部的书记、所在班的班主任，他们的话都是政治，都必须绝对服从，而且必须心悦诚服地服从，起码表面上要服从。否则就是不听党的话，就是不要无产阶级的政治，其后果是不言而喻的。

在学校，当时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生的政治自然就是思想、言行必须符合无产阶级的要求，就是必须参加每年农村的春种秋收及其他临时的日常的劳动。那时党号召学生又红又专，反对走“白专道路”。对青年学生，特别是对中学毕业生，党的要求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或升学或下农村）”，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当时的报纸、广播连篇累牍地报导各地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消息，并大力宣传在农村广阔天地做出成绩的邢燕子、董家耕等先进人物。校团委及班团支部也经常组织宣传活动，“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决心书贴满了学校和各班的宣传栏。

我不服从班主任的劳动安排以至公开顶撞班主任的事就是在这种政治氛围中发生的。因此，我瞬间成了学校里走“白专道路”的“典型人物”，成了众矢之的。团支部多次召开会议“帮助”我，班主任更是不厌其烦地找我谈话，要我端正态度，提高认识，改正错误。

如果那时我“识相”，如果我即时做出深刻检查，我相信班主任和团支部还是会从轻处理我的，因为我毕竟“根正苗红”，还是高中两年的“三好学生”，学习成绩也还可以，平常的群众关系也不错。糟糕的是我面对一次又一次的“帮助”，我的犟劲上来了，在班主任唐老师发脾气拍了桌子时，我竟也拍起了桌子，使本来有可能从轻处理的事情变得更复杂了。

学期末，班主任理所当然地给了我全班最差的“操行分”。至于他给我的政治思想评语（鉴定），按说是应该和我见面的，但我却没有看到，这是我最担心的。因为它将记入我的档案中，将直接影响到我是否能考上大学、圆我大学梦的问题。

那时“出身”和“政治表现”是参军、考大学的关键。“出身”好的要看“政治表现”，出身不好的就更要看“政治表现”了。“政治表现”不好，即使身体再棒，成绩再好，“出身”再好也别想参军、考大学。班主任唐老师对我的“政治表现”是如何鉴定的？想到他找我谈话时那严厉的神态及我和他对拍桌子的情景，我不寒而栗。

高考前，我对考上大学已不抱什么指望了。正由于不抱指望，我的心情也就逐渐平静了下来。当同学们个个都忙着高考前的冲刺，个个紧张异常的时候，我倒显得清闲了起来，简直和无事人一般。

我和往常一样上课、下课、做习题，一样吃饭、睡觉，一样打球、游泳。虽然我也报考了，但我已完全不把高考当回事了。既没有了怨恨，也没有了原来的激情。心想：天生我材必有用，考不上大学也许还有其他路可走，条条大路通罗马嘛，一切就让它顺其自然吧。

在填志愿时我还是认真作了考虑，一则我对自己有信心，尽管最后这两个月我的复习受到了一定影响，但我相信我的考试成绩也不会有大的问题。二则不管怎样说，班主任的鉴定我并没有看见，也许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坏，万一学校对我网开一面，抬手放我一马，也不是不可能。

当时我有一种强烈的意识：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现状，必须依靠科学技术，必须依靠工业的现代化。因此我的志愿是学工，当工程师。我们班凡和我要好、成绩也好的同学无一例外地都是报了理工科。当时国内一些知名大专院校在我们学校张贴了很多招生广告，我一眼就看中了号称中国工程师摇篮的华中工学院，因此，我的第一志愿就填了华中工学院的工业企业电气化及自动化专业。据说当时全国设有这个专业的仅有三所学校，哈工大、西安交大和华中工学院。

1964年7月15日，我参加了全国高考，考场就在我们宁远一中。

高考结束后的第二天，我就卷铺盖回了家，重新成为老张家村的一个村民，人民公社的一个普通社员。

回到家，看到儿时的伙伴多数都已娶妻生子或远嫁他方。除此以外，周围的一切似乎都没有什么改变。村子还是那个村子，没有多一间新房也没有少一条小巷，乡亲们还是那样纯朴敦厚，村旁供全村人饮用的两口水井还是那样明亮清澈……

“双抢”季节还未到来，农活很少。我每天除了早上上山割一担草垫牛栏外，其余时间还是看书，有时也练练二胡。有人给我介绍“对象”，母亲也答应了。

姑娘是我们生产队一个寡妇的女儿，人长相一般，但很勤快也很健康。出于对母亲的尊重，我同意处处看，但几次接触后我还是找不到任何感觉。

回到家后没有了城市的喧嚣，没有了同学间的相互竞争，也没有了期盼和等待，我的心静如水，日子倒过得十分平静和悠闲。

一天上午，邮递员突然送一份录取通知书到村里，但村里没有人知道张建华是谁，邮递员只好将录取通知书送到大队部。恰好二哥这时正在大队办事，就将录取通知书收下了。

看了通知书，我激动万分，眼泪几乎都要掉下来了。

第二天我就赶到了学校。正值暑假，学校里人很少。

当我走进学校时，一眼就看见宣传栏里的大红喜报。这是第一批全国重点院校在宁远一中的录取名单，总共四个人，我是其中之一，我被华中工学院录取了。

我径直朝班主任唐慧老师的宿舍跑去。

这时我第一个想要见到的就是唐慧老师。我要真心实意地向他表示感谢，由衷地向他道歉并请求他的原谅。

我当时真有千言万语要向他诉说。遗憾的是我未能见到唐慧老师，因为他两天前回老家了。

参加工作后，我曾在探亲路过宁远县城时多次去拜访唐老师，但都阴差阳错而未能如愿。2008年清明节期间我回宁远老家为父母扫墓，途经县城和老同学张孟龙、徐兴诚等聚会时，我们不约而同地谈到了唐慧老师。但我第二天去学校看唐老师，还是没有如愿，经打听，说 he 已退休回老家了。

宽容是一种美德，是一种情操，是一种胸怀，是一种境界。唐老师作为我的班主任，他给我的评语和鉴定关系到我的前途和命运。我顶撞了唐老师还向他拍了桌子，但他没有记恨我，更没有因我的无理顶撞而报复我，我一辈子感谢他，怀念他。

第九章 学习雷锋好榜样

1963年2月初，首都几家大报先后刊登了雷锋日记摘抄。3月5日新华社向全国发出通稿，首都各报同时发表了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中央领导人的题词。

中央号召学雷锋，其目的不是学他哪一两件先进事迹，也不是学他某一方面的优点，而是要学他的好思想、好作风、好品德；学习他长期一贯地做好事，而不做坏事；学习他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同时强调：学雷锋要实事求是，扎扎实实，讲究实效，不搞形式主义。不但普通干部、群众要学雷锋，领导干部也要带头学，才能形成好风气。从此，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国学习雷锋的运动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雷锋日记语言朴实，记叙简短，但字里行间所流露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却令人读之感动。

从雷锋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严肃认真的生活态度、积极向上的人生追求，体会到他对工作的负责、对同志与战友的关心、对广大人民的热爱、对剥削阶级的憎恨、对自身缺点的不断剖析。

可以说，在雷锋身上凝聚了一位共产主义者应该具有的诸多美德。雷锋日记中的一些名句，如“我愿做高山岩石之松，不做湖岸河旁之柳。我愿在暴风雨中锻炼自己，不愿在平平静静的日子里度过自己的一生。”“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永远不会干涸，一个人只有当他把自己和集体事业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最有力量。”都深深地刻入到我们的头脑中，成为我们这些青年学生的座右铭。

雷锋精神的实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雷锋有明确的为社会做贡献、为人民服务的人生信仰，并且以脚踏实地的行动，忠诚、执着于其信仰。他把人生的价值定位于服务人民，把人生的意义定位于服务而不是享受。毛主席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就其实质来讲，是希望人们

自觉地以雷锋为榜样进行道德自律与人格修养。

作为高中学生，当时我们学雷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听党的话，随时听从党的召唤”，也就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即既准备继续升学深造，也准备回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当时毛主席著作还不普及，也没有《毛主席语录》，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还很不具体，很不明确。事实上当时的宣传也没有刻意凸出毛主席，因此我们只知道党的指示、党的号召，只知道“听党的话，跟共产党走”，“党叫干啥就干啥”。二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好事，助人为乐，扶弱济困。当时我们个个都争着去做好事，如擦黑板，打扫教室，早上为同学打洗脸水，为同学理发、洗衣服等。如果哪个同学生了病或经济上有了困难，大家都会积极主动地去表示安慰并伸出援助的手。上街看到有老弱幼残或拉车上坡需帮助的，都会主动上前帮忙。

学校的黑板报和广播不失时机地每天报道好人好事，但多数人都做了好事不留名，哪个做了好事被报道了，反而觉得不自在。

学雷锋运动中有一件事让我至今难忘。

第一件是关于棉衣的事。

1964年8月底我去武汉上大学的时候，行李非常简单：除身上穿的以外，只有两件外衣、两件衬衣、一件三姐为我上大学特意织的棉线衣、两条长裤、一床被子、一幅床单、一双布鞋、一把二胡。

不是我有意带得少，到武汉时再添置，而是我当时确实也就只有这些东西，还都是上中学时用过的。之所以带一把二胡，是因为它是我心爱之物，而且是我亲手做的。

从小学到高中毕业，我没有穿过棉衣。穿毛衣是怎样的感觉我没有体验过。至于皮鞋、大衣之类的东西，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奢侈品，连想都不会去想。

入学时正值盛夏，身上穿得很少，衬衣、短裤、麻凉鞋（用麻编的草鞋）而已。武汉的夏天很热，衣少被薄没有什么，但11月以后，晚上就开始凉了。我没有垫絮，上中学时床单下铺有稻草，睡觉还很暖和，但大学里没有稻草可垫，床单下就直接是硬木板了。

12月初，学校要每个教学班登记缺衣少被的情况，我如实登记了。

两个星期后，我领到了新被絮（包括垫絮）和棉衣，心中对党自是一番感激。

元旦过后的一天，我收到一张包裹单，是三哥给我寄来他穿过多年的一件旧棉衣。收到这张包裹单，我就像收到法院的传票一样紧张，我像一个犯了大错的人一样惶恐不安，不知该如何处理这件事才好。

怎么办？我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拒收，原物退回，就当这事没有发生过；二是收下包裹，如实向年级指导员说清楚事情的原委。但不管哪种选择，我的内心都将受到谴责和煎熬，因为包裹单是寄到班上的，总会有人看见，总有一天会暴露。事实上，我也无法向指导员说清：我刚穿上国家发的崭新棉衣，就有一件棉衣寄了来。

经过反复思量，我决定选择第一种办法，即包裹原物退回。

包裹退还后我的心并没有平静下来。我反复问自己：我这样做对吗？这是不是欺骗了组织？为什么我要填补助棉衣的申请表？我明明知道还有很多人冬天没有棉衣穿，为什么我不将棉衣让给他们？雷锋碰到这种情况会像我这样吗？党对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学生发放全额助学金，每月除给13元伙食费外，另给2元零用钱（买牙刷、肥皂之类生活用品），党对我们真是关心到无微不至了，我怎么对党还要有所隐瞒？自责、懊恼甚至悔恨弄得我几乎难以自制，那段时间我就像掉了魂似的。

两个星期后的一天，班上的团支部书记龙国斌悄悄问我，是不是家里寄了一件棉衣来？我说是的，那是我三哥将他自己身上穿的棉衣寄给我了。我担心他寄给我以后他就没有了，所以我就退还给他了。

龙国斌没有再说什么，也没有再问什么，但我内心一点也不平静。这天晚上我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

我想了很多，首先想到的是三哥，因为三哥是我的保护神。孩提时代，他是儿童团长，也是我的保护伞，村里的孩子没有一个敢欺负我。上初中一年级时我开“通学”（不住校，和同学租房），我吃的粮食、菜蔬、烧柴多数是他从家里给我送到县城。上大学来武汉的车费和零花钱也是他给我的。当时他的工资很低，只有33块钱。他每月要给父母亲寄5到10块钱，手头拮据是可想而知的，更何况那时他正和三嫂湘云谈恋爱，总还得花钱。现在他把身上穿的棉衣寄给了我，他穿什么呢？湖南的冬

天和武汉一样也是冷啊。想到此，我认为我将包裹原物退回是对的。

但我也想到自己一个穷孩子能上大学，完全是党的关怀和培养，是欧阳维奇老师、廖老师、唐慧老师等苦心教导的结果。

想到这些，我下定决心奋发图强以报答党、报答人民。我当即划破食指，用血写了“人穷志不短，定为国争光”十个大字。

这十个大字一直鞭策我一生，不管是文革时期还是改革开放初期，我都以为为人民服务为己任，从不敢怠慢，从不敢生贪欲。虽一生成效甚微，但我敢说问心无愧。

我之所以要记下关于一件棉衣的小故事，一是因为此事确实曾经深刻地影响了我；二是也想说明：我们这一代人在学习雷锋时，确实是在用雷锋精神规范着自己的行为，是从内心发出的完全自觉的自省、自律，绝不是现在有人说的“学雷锋是作秀”。

学雷锋运动中第二件让我难忘的事，是半夜醒来看到有人为我打扇驱蚊。

1965年7月12日，我们来到湖北孝感7250部队101分队（警卫连）军训。

军训主要是两个内容：学军，劳动。

学军包括政治学习、听军史报告、队形操练、瞄准射击、紧急集合、拉练、野营等；而劳动则主要是在部队的八一农场锄黄豆地，干农活。

军训生活是紧张而愉快的。学军的内容和方式很多人都经历过，和现在可能差不多，这里就不再赘述。只是政治学习的内容和现在可能就大不一样了。当时林彪担任国防部长的职务，军队的政治空气非常浓厚，突出政治，“四个第一”，学雷锋，学英雄，做好事，“一帮一，一对红”等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同学们无不受到强烈的感染。

负责我们专业同学军训的是警卫连二排的王排长。他是山东人，一米八的个子，浓眉大眼，脸微黑，言行举止都有典型的军人风范。他待人和善，对我们如同兄长，关怀体贴，细心指导，尤令人感动。

军训期间唯一让我们难以适应的是热，真是太热了。政治学习是在室内，有风扇倒也还好，但在烈日下练队列、练瞄准，特别是在农场锄

黄豆地时，那种热真让人有点受不了。

孝感位于湖北省东北部，长江以北、汉水之东、江汉平原腹地，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

人们都知道，武汉是长江上的三大火炉之一，其实孝感的热一点也不比武汉逊色。我们在孝感时正值盛夏，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每天太阳刚一露头，地下就像着了火。一些似云非云、似雾非雾的蒸气低低地浮在空中，空气很快被烤热，风成了热浪，不但不给人一点凉快的感觉，反而使人感到难受、憋气。即使在室内坐着不动，汗水也会从全身各处冒出来，就像今天洗桑拿一样。

八一农场离我们的住处不远，乘汽车二十分钟左右就到。

为了避开一天中最热的时间，我们每次去农场锄黄豆都是五点半起床，早饭后，六点半以前就来到了农场。

那时人们的劳动热情都很高。不管是工厂车间还是公社地头，哪里都兴搞竞赛，特别是年青人在一起劳动的时候，更是非比不可。

我们一来到黄豆地，比赛就开始了。我们一字儿排开，女生负责五到六行，男生负责八到十行，从一头向另一头锄去。那是平原地带，黄豆地很大，真正的一望无际，有多少亩谁也不知道。只是黄豆地是按方格分垄的，因此，作业的目标还是很明确的。每个人都发挥了自己最大的潜力，当时年少气盛，谁甘落后？半小时后，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就逐渐拉开了，体力弱的和城里来的同学自然就落在了后面。

竞赛的规则和栽秧竞赛一样，即前面的人可以朝一边或两边“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因此，在前面的人的“势力范围”就越来越大，后面的“势力范围”就越来越小，最后被包围成孤岛，从而宣告失败。

两小时后就有了明确的结果。最后包围别人的自是兴高采烈，而被包围的人则只好认输，休息时只能为胜利者递茶端水了。

竞赛活动是非常消耗体力的，几天下来，大家的精神头就大不如开始两天足了。

锄地的消耗自不必说，最大的消耗还是天热出汗，体内盐分大量损耗。因为人一进入黄豆地，就像进了蒸笼一样，汗马上就冒了出来，一天下来出了多少汗谁也不知道。

一天，我回到营地时感到特别累，浑身就像要散了架似的，随便吃了点东西以后就睡觉了。

也不知道睡了多久，当我醒来睁开眼睛时，突然看到了一幅奇异的情景：王排长手摇大蒲扇在给我扇风，眼睛正盯着我微笑。看到我醒来，他说：“刚才我查铺时，看到你的手脚都伸到帐子外面，我就过来了。这几天你们实在是太辛苦了，睡吧，连部已下了通知，明天休息一天”。说完他就走了。

看着王排长的背影，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我还是没有说，因为同学们睡得正香呢。

我们在营地睡的是“通铺”，几十个人睡一间大房子。晚上蚊子特别多，虽然我们都挂了蚊帐，但蚊子总是围着蚊帐嗡嗡地飞，一旦你的手或脚靠近了蚊帐，那你就得放点血了。年青人睡觉哪能那么规矩呢？因此，即使有蚊帐，每天起床后手脚上仍少不了蚊子给你留下的浅红色的大包小包。

一个排长晚上为一个学生扇风赶蚊子，今天的人也许会觉得不可想象，但当时确实是真的。而且在当时的人看来，这并不算什么。

几年来的全民学雷锋做好事运动，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的三大转变。

一是干部放下了架子，深入基层，与群众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有事同商量。不说贪污受贿、买官卖官，就算多吃多占，那也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资产阶级作风，为人不齿。

那时“主人”和“公仆”是平等的，当干部的和当群众的，只是革命的分工不同，没有贵贱的区别。没有任何基层干部敢于明目张胆地搞特殊化。

二是通过贯彻、落实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纠正了造成极度困难的错误政策，城乡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大部分地方的人们可以吃饱肚子了，人们从内心深处感谢共产党，感激伟大领袖毛主席。

三是社会风气达到了空前净化。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在许多地方都变成了现实。“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已不只是口号，而是人们普遍的自觉行动。

第十章 在院广播台当文艺编辑

在人生的旅途中经常会发生一些出乎自己意料的事，而且这些意料外的事往往会影响你的人生轨迹。在我踏进大学之门时，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我会和广播、宣传联系在一起，更没有想到，踏进院广播台这一步对我今后的人生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

1964年10月的一天，年级指导员突然通知我说：“院广播台点名要你去任文艺编辑”。对此，我感到惊讶。我这个人天生缺少文艺细胞，中学时也没有参加过任何文艺活动，今天怎么会有人点名要我去搞文艺编辑呢？是因为我家庭出身好？不是，因为新生一半以上都来自农村，应该说多数人的家庭出身都很好。我到文艺组报到后发现，文艺组新入台的5个人中只有我一个人是来自农村，其他都是来自城市。莫非有人看到我入学时带着一把二胡，就认为我爱好文艺？其实我拉二胡的水平也是很蹩脚的。

我这个人从小好强，也很自信，喜欢挑战，想试试，因此，尽管心中没有底，还是爽快地答应去院广播台报到。

院广播台设在南一楼七楼，当时是全院最高的地方。广播台设四个组：采编组（文字）、文艺组、播音组和机务组，总共约六十人。当时我们文艺组有十多人，但随着四、五年级的老组员先后离开，到1965年下学期就只剩八个人了，基本上是每人每周值一天班。其中东校区3人，即何天华、朱安娜、梁××（名字忘了）。我们西校区（电机工程系、动力系）4人，即我、赵嘉林（六五级）、陈轱茹、陈殊殊（六五级）。和我关系密切且在广播台工作时间最长的有：采编组的李朝平、邓继珍（女）、吴贤杰、吴崇高、陈茂政、朱尚贤（女），播音组的王能秀、林光明、叶启轩（女）、陶丽娟（女），机务组的高万君、齐济萱、许坚、尹华林。

华中工学院有三大亮点：一是文体活动搞得非常活跃。学校把具有文体天赋的人挑选出来成立一个文体大队，并集中住在一栋宿舍内。在五、六十年代，华中工学院的文艺演出和竞技体育在武汉市大出风头。



华中工学院广播台文艺组成员 1965 年 7 月合影于院图书馆前，后排右五为作者
二是校园绿化、美化好。整个校园像个大花园，每到夏天，校园内几条主要道路完全被梧桐树荫所覆盖，让人舒畅、惬意。第三个亮点就是教学、科研、宣传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人气大长，几年时间就让华中工学院跻身全国几所知名学府之列。

这些都是院党委书记朱九思的功劳。朱书记曾是延安抗大教导员，凭着他多年来的教学工作经验及敏锐的眼光，使他成为新中国的一个名副其实的教育家。

院广播台的工作是业余的，但学校对每一个工作人员的要求却非常严格。既要求参加广播台工作不能影响学业，又要求严格执行以下守则：

华中工学院广播台工作人员守则

一、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党的方针政策，自觉地加强思想修养，兴无灭资，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党的宣传员。

二、自觉培养“三八作风”，向一切资产阶级的腐朽作风作斗争。

三、坚决贯彻院党委的意图和指示，随时随地以高度的责任感、严谨的工作态度，完成党交给的宣传任务。

四、密切联系群众，经常向台领导反映基层的活动，力求广播工作有的放矢，针对性强。

五、努力钻研业务，提高业务水平，做到不断地提高宣传质量。

六、在日常工作中，正确处理政治与业务、个人与组织、个人与集体、组与组、组与台的关系。防止和克服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情绪。

七、在基层必须起模范作用，尽可能主动协助和支持基层工作，真正做到根扎班集体，花开广播台。

八、严格遵守台内各项规章制度，做好安全保卫工作，爱护公共财物，维护台内的清洁卫生。

今天的年青人看了以上《守则》也许会认为这也没有什么，但当时我们是很“较劲”的，不是随便说说，而是要落实的。

就说第五条“努力钻研业务”吧，我就花了老大的劲才过关。

广播台的文艺编辑，就是根据学校当前的宣传中心，用同学们乐于接受的形式，选择合适的唱片或录音带，再用文字将其串起来，使其成为一个主题明确的文艺节目。当然，文艺组也常常根据采编组（文字）的要求，为他们选定的文章、故事配乐。

音乐给人的东西主要是感情的潜移默化或渲染。它并不是通过语言的形式告诉你什么，而是通过不同的旋律使你在不知不觉中加强了对某种意识、情感的理解，从而使你产生强烈的印象。人们在听音乐的时候，往往会在不知不觉中被音乐作品中的思想意识所影响。我们做文艺编辑的就是要通过积极、上进的音乐来影响听众的情感和思想意识。

为此，在广播台搞文艺编辑除要有较强的文字能力外，还必须懂文艺、懂音乐、熟悉现有音乐素材（唱片）。

前面说了，我身上的文艺细胞很少，中学时也没有接受过专门的训练。因此，我到广播台文艺组以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学习有关文艺的基本理论及经典的作品。

学习以自学为主，老组员（高年级的同学）指导和听专题报告为辅。自学一是看书，看有关文艺创作、文艺评论、文艺欣赏等方面的书；二是听唱片。我们组有大量的唱片，凡解放后出版的唱片几乎都有。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主要是苏联的）；有普通的，也有密纹的。文艺组

办公室的一面墙就是唱片柜，里面分门别类放满了各种唱片。通过大量地听唱片加深对理论的理解，同时熟悉渲染不同环境、不同场景和气氛的曲目所在的唱片及其位置，以便根据不同的主题进行编辑时能很快地找出来。

当时担任文艺组组长的是一位大三的同学（名字忘了），在文艺方面，他有较深的造诣，对我们新来的同学帮助很大。他很热情，也非常关心我们。他不但教我们编辑业务知识，还经常非常耐心地为我们的讲解、分析一些经典曲目的主题、意境、特点，以加深我们对曲目的理解和鉴赏。记得有一次他为我们讲《草原骑兵》这支苏联乐曲时，从作者介绍、创作的时代背景开始讲，再讲到乐曲的主要特点、配器等。接着他边放唱片边讲解：“第一部分，场景描写：茫茫大草原，蔚蓝的天空，成群的牛羊，牧民的帐篷，袅袅的炊烟……；第二部分：一队骑兵出现在地平线上，由远而近……；第三部分：战马嘶鸣，拼搏厮杀……；第四部分：胜利，战马由近及远，乐曲结尾……”他讲得很投入，我们听得入了神。他讲过后我们从头再听时，感觉确实大不一样了。

为了提高我们的音乐素质，台里还不时请文体大队的老师来为我们进行专题讲座，其中“交响乐专题讲座”和“京剧专题讲座”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原来从未接触过交响乐，通过听讲座才对交响乐的乐队组成、队列、各种乐器（弦乐和管乐）的音色及性质等有了初步的了解。我从小就喜欢京剧，但没有深入了解。通过听京剧讲座，我才知道什么是“板”和“眼”，才知道在京剧里1/4拍子的是流水板，2/4拍子的是原板，4/4拍子的是慢板，有板无眼的是快板，紧打慢唱的是摇板；而西皮是眼起板落，二黄则是板起板落。

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我基本上掌握了广播文艺编辑的业务，也熟悉了渲染不同环境和情感的乐曲。如要渲染悲哀、思乡、回忆的情节时，可从《西藏的新生》《嘎达梅林》《长工苦》《做媳妇的苦》《故乡的回忆》《烈士日记》等唱片中选取相应的部分；而要渲染热烈、欢乐等场面时，则可从《旭日东升》《奔驰在公社的大道上》《到农村去》《鲜花调》《麦穗黄》《赶路》等曲目中选取相应的乐段。

那时编辑节目比较麻烦，不像现在可用相应的编辑软件在电脑上进



作者在院广播台值班（1967年11月）

行编辑那么简单。一般情况下，我们是根据节目的需要先选取唱片，再将需要的乐段用录音机录下来，记下时长，乐段之间用小纸条隔开。在一般情况下，配乐节目是在播送前与播音组一起预先录制好。机务室和播音室之间隔着一块大玻璃，录制时我们既可以看到播音员的情况，也可以通过监听喇叭听到他们的声音。我们根据播音员的播音进度，适时按下录音机的按钮进行语音合成。合成后再听一遍，如没有问题才可以向全院播放。

从1965年初起我开始独立进行编辑。到年底，我已是文艺组的主要骨干了。

广播台是我院的重要宣传阵地，院党委自然非常重视。在人员选用上，在具体的宣传内容上，都有严格的要求。院党委分管领导定期召开广播宣传工作会议，传达中央文件、中央领导讲话，宣讲国内外形势，布置宣传任务，统一宣传口径。

我们进台的第一件事就是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文学艺术的阶级性，明确文艺工作者的立场和态度问题，明确“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服从

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

那时学校宣传工作的重要内容是阶级教育、人生观教育和国际主义教育，而阶级教育又是重中之重，是院党、团组织活动的中心。

阶级教育，也就是“兴无灭资”教育。它不是仅仅针对出身不好的人，而是针对全社会所有人。既要求出身不好的人随时记住和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记住要“夹着尾巴做人”，记住“重在政治表现”，认真改造；同时也随时提醒每一个像我这样“根正苗红”的人要“牢记阶级仇、民族恨”，要坚定无产阶级立场，提防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

阶级教育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如听忆苦思甜报告，谈个人心得体会，批评和自我批评等。

我入台参加的第一个全台工作人员会议，就是听台里一个叫唐成明的同学作检查。唐成明这个人我原来不认识，好像以后也没有接触过。因此，对这个人没有什么印象，我只记得他是上海人。他当时讲了些什么现在也记不得了，只是会议结束时，领导布置的讨论题在我的笔记本上有记录：

1. 对唐成明的检查有何看法？从中能汲取什么教训？

2. 自己在为人民服务、在贯彻落实党的文艺方针方面做得如何，今后应如何做？

3. 文艺战士是否要求政治标准？

笔记本上记录了我当时根据讨论题拟的发言提纲：

1. 看法：唐入台的目的不纯，他是为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入台的；上海的环境对他产生了负面影响；与工农的感情距离太大，他瞧不起工农，低估了工农的智慧；支部工作没有做得及时；年青人的两个“敌人”：聪明和成绩。

2. 认识：文艺战士一定应有政治标准。因为：文艺战士的任务；文艺对社会的影响；文学艺术在阶级社会中的阶级性；“教育者有一个先受教育的任务”。

为了加深我们的阶级斗争意识，学校还不时请一些苦大仇深的人来作忆苦思甜报告，听了报告后团支部自然都要组织讨论，人人都要发言谈认识。其中我印象较深的是我们学校总务处的辛中贵同志和院学生会

主席黄仁传的忆苦思甜报告。辛中贵是老红军，是穷苦人出身，因没有文化，转业后在院总务处当了一个副科长。黄仁传是个调干生，是单位委培的，当时已是三十几岁了。在播出辛中贵报告录音的时候，我在配音前加了这么一段话：“辛中贵同志的报告是如此的朴实：他没有用一个形容词，没有用一个比喻，没有用一个华丽的词藻和任何修饰，但它却给人以震撼，给人以感动。这是对旧社会的控诉，也是对我们的鞭策。这个报告之所以使人震撼和感动，是因为它是血和泪的凝聚。我们不能忘记那高举的皮鞭，不能忘记那仇恨的疤痕！决不能忘记，忘记就意味着背叛！”

人生观教育即“为人民服务教育”。这方面的情况我在《学习雷锋好榜样》一章中已说过了，在此就不说了。我想说的只是：那时的我们一心所想的是为人民服务，根本不会想如何赚更多的钱，更不可能想要升官发财，这也许是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和理解的。

国际主义教育即“支援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

1965年，越南人民的反美斗争如火如荼，我国政府全力支持。我们经常听相关的形势报告，我们文艺组也多次编辑了支持越南人民斗争的专题节目。当时的国际形势按中央的说法是“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认为以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正在迅速分化瓦解；世界范围内，特别是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正在蓬勃兴起，而这一切都对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十分有利。毛主席“七三指示”的发表，就像一副兴奋剂，使我们这些年青的大学生们周身热血沸腾，都对即将投身世界革命的大风大浪跃跃欲试。

毛主席在“七三指示”中说：

学生负担太重，影响身体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请邀请学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执行。今后的几十年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么重要的时刻啊！现在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再过二三十年是四五十岁。我们这一代年青人将亲手把我国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自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为了完成我们的伟大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要下定决心一辈子

艰苦奋斗。

我觉得院党委在处理政治（运动）与教学（业务）的问题上是非常慎重的，宣传上也有严格的纪律和要求。我记录的党委副书记熊小村在一次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报告人：熊小村

时间：1965年3月28日

一、国内外及院内形势（略）

二、在宣传工作中我们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 我们要爱护群众的积极性，不要滥用群众的积极性；

2. 坚决防止浮夸，不要搞形式主义，除体育以外，一般不要搞什么竞赛；

3. 要注意劳逸结合，精简干部的活动和其他会议。学毛选也不要再在午休、星期六晚上进行，一个星期搞一个多钟头就行了。

4. 在宣传中要划清以下界限：

1) 正确理解艰苦朴素、艰苦奋斗的作风。朴素没有固定的标准，要看时间、地点、条件。

2) 正确利用大字报。要强调实事求是，反对利用大字报进行人身攻击。

3) 关于阶级路线。阶级路线不能乱套，不要唯成分论，要强调重在表现。

4) 要充分发扬民主，充分听取不同的意见，不要抓辫子、打棍子。

正由于院党委正确地处理了政治和业务的关系，使得我院既保证了党的方针政策在我院的贯彻落实，又确保了教学质量的稳步提高。在我的印象中，我院的政治气氛是较浓的，但并没有像今天有人说的那种“让人压抑”的感觉。政治气氛主要体现在贯彻阶级路线和支持各国的民族民主革命上。虽然党的“阶级路线”也强调“重在表现”，但出身不好的人随时都觉得有压力。如和我同时进文艺组的钱天华，上海市人，他音乐素养较高，只因出身不好，我们“帮助”过他多次。我们虽对他说“重在表现”，但这无形中给他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他也难以与大家融合在一起愉快地工作。

当时全国正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个运动没有在我们学生中产生什么影响，也就是说社教运动并没有影响我们的正常学习环境和气氛。

直到1966年8月，院党委一直牢牢地控制着院广播台的宣传工作。8月以后，随着文化大革命大辩论的开展，院党委的“一言堂”开始被打破。10月23日，新华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夺了院广播台的权。11月，我组织了原院广播台的几名骨干在汉口江汉路成立了“新华工广播台汉口分台”。1967年1月，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华工司令部成立，同年8月新华工革委会成立。我在红卫兵司令部和院革委会都是宣传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而且都是分管广播台和文艺宣传队，文革中我的多数活动都与广播台有关，直到1968年8月工宣队进院。这是后话，在下面的相关章节中将详细叙及。

第十一章 万人辩论大会

一、激情燃烧的一代

古往今来，青年一直是旧世界的破坏者、革命者，是新世界的探索者、开拓者和献身者。他们思想敏锐，行动迅捷，很少保守。纵观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往往为理想、为真理、为信仰挺身而出，奋不顾身，因而成就了人世间的伟业。

文革时期的大、中学生是出生在抗日战争后期、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初期的一代人。这一代人都是在解放后开始上小学，是共产党培养起来的第一代青年知识分子。

从小学到大学，我们这一代人都是接受共产主义、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

上小学时，老师就告诉我们：共产党、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上中学时，老师告诉我们：中国近百年来之所以总受列强欺侮，就是因为我们的国家穷，官僚腐败。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学习，发愤图强以振兴中华。老师还告诉我们：必须听党的话，像黄继光、董存瑞、雷锋、欧阳海、王杰、焦裕禄、董家耕、邢燕子那样学习、生活和工作，要做像他们那样的人。

上大学后，我们上的第一课就是人生观和世界观教育。老师要求我们树立无产阶级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牢记人生的价值就是为人民服务，牢记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还没有得到解放。

我们从小学到大学受到的教育让我们相信共产党是一个光荣的党、伟大的党、正确的党。因此，我们必须听党的话，跟党走，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党。

在我们那个时代，同学和朋友之间最美好的希望和祝辞，不是当官、发财，而是要革命，要为人民服务，要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当时每一个中国青年无不以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做毛主席的好学生为荣。

今天的年青人也许根本不能想象我们对党、对毛主席及其思想的那种崇敬的程度。可以说，我们那时对党、对毛主席的忠诚远超过教徒们对上帝、对耶稣的虔诚。

那时我们时刻都准备着听从党的召唤，只要是党的号召，从不敢懈怠。为了党的事业我们像一群驯服的绵羊，跟着头羊越山跨水，即使前面是悬崖峭壁也会不管不顾地往下跳。为了捍卫党的路线，我们会像一群桀骜不驯的狼，跟着头狼无所畏惧地勇猛向前冲。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说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一点也不为过。正是因为有了这一代激情燃烧的青年，才成就了文化大革命的“史无前例”。

二、万人辩论大会

从1966年5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五一六通知）传达，到8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十六条）公布，在短短的三个月中，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愈演愈烈，已成燎原之势。

我在行动上直接参与文化大革命是从1966年8月16日开始的。

这天，我院“革命师生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大会主席团”迫于全国形势，同意和我院“少数派”共同主办了万人辩论大会，我在辩论大会上发了言。

这是我院首次就有关文革问题召开的群众性辩论大会，地点就设在西边的体育馆。院广播台的机务人员将会场播音设备和广播台主机相联，这样全院师生员工就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听到辩论大会的实况了。

上午八点，人们蜂拥着奔向西边体育馆。但体育馆只能容纳一千多人，大多数人都只好在紧靠体育馆旁的足球场上站着或坐着。我和同班的几个同学选了足球场边一块草坪上坐了下来。

九点，辩论会正式开始。大会主持人宣布这次辩论的主题是：“湖北省委及其派出的工作组是否犯了方向性错误？”

主持人接着还宣布：华工的每个师生都可以递条子报名参加辩论，发言者必须有自己的明确的观点，且每个人的发言时间不能超过十分钟。

辩论开始了。“文革筹主席团”为一方（多数派）的观点是：湖北省委及其工作组是革命的，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方向是正确的。而另一方即“少数派”（当时还没有造反派一说）的观点则是：湖北省委及其工作组没有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辩论进行得十分激烈。双方观点明确，针锋相对，互不相让。但这次辩论大会应该说是民主的，是井然有序且文明的，整个辩论过程没有出现任何粗鲁的行为。

听了双方几位代表的发言后，我非常激动。费了好大的力气挤进体育馆，向大会主持人递交了要求发言的字条。

大概过了二十几分钟，主持人点名叫我上台发言。

我虽然在上小学时就参加过演讲比赛，一般情况下我在众人面前讲话时是不会发怵心虚的。但这次走向发言席时，面对馆内外上万激动的师生员工发言时，心里还是有些紧张。

我不断地提醒自己：镇静、镇静！说来也奇怪，当我站到发言席面对麦克风时我却不那么紧张了。我大声地亮明了自己的观点：省委和省委工作组在领导我院的文化大革命过程中犯了方向错误。

接着，我根据十六条，结合我院的具体情况，从以下四个方面阐述和论证我的观点：

1. 十六条的第五条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省委工作组从进院以来一直是把矛头指向革命师生和普通群众，开展了大抓所谓“右派”“一小撮”“剥削阶级孝子贤孙”运动。在此期间，我院很多革命师生受到监视，失去了人身自由，有的被监督劳动改造，有的甚至被逼得精神失常！

2. 十六条的第七条“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中明确指出：“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而进驻我院的省委工作组却对那些敢于给院党委和省委提意见的人进行围攻和无情打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工作组一手制造了所谓

的“赵文成事件”。

3. 十六条的第九条明确指出：“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产生，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人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而我院“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及“主席团”是由省委工作组直接指定的，根本就没有经过群众的讨论，完全不能代表广大师生员工的意志和要求，更不能领导我院的文化大革命。

4. 十六条公布后，省委虽然撤出了工作组，但不让大家批判工作组的错误路线，而且又派出“三员”（观察员、联络员、巡视员）继续幕后操纵各大专院校的文革领导机构，继续贯彻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

我的发言似乎还不到十分钟，却赢来了约一分钟的掌声。

发言是即兴的，我事前并没有任何准备，因为我当时并不知道辩论会的主题。第二天我回广播台听了我发言的录音，觉得我的发言还可以，观点明确，论据真实可靠，有一定的分量。根据已经发表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两报一刊社论的精神，我认为我的发言观点是正确的，起码没有大的偏差。

三、我成了“少数派”的代表

为了说明我在万人辩论大会上发言的论据，这里有必要简单地交待一下我院当时文革的相关情况。

1966年5月下旬，我院有一些师生开始揭发院党委的问题，但很快就被压下去了。6月11日，湖北省委派工作组进驻我院，并取代院党委直接领导我院的文化大革命。

工作组按“反右”和“四清”运动的思维模式和经验领导我院的文化大革命。他们要求广大师生揭发批判“黑帮”“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及“地、富、反、坏、右”，并强调必须在工作组的统一领导下开展批判，不允许脱离工作组的领导和部署进行活动，否则就是反党，就是“坏人”。

工作组从6月11日进院到8月上旬撤出的近两个月中，我院一大批干部和教师被打成“黑帮”和“反动学术权威”，并把这些人当作牛鬼蛇神集中起来强制劳动。一些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学生或平时说过怪

话、有“前科”的同学则被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在班级受到批判、斗争。而一些不服从工作组领导甚至给工作组提意见的人则被打成了“右派”、“坏人”。

进入8月以后，由北京首先发起的红卫兵运动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全国。我院以原院学生会和院共青团委牵头，在省委的统一部署下于8月下旬成立了华工“红卫兵师”，“红卫兵师”的头头也是“华中工学院革命师生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大会主席团”（简称“主席团”）成员，原院学生会主席、调干生黄仁传任“大会主席团”主席。

“红卫兵师”的成员大多数是基层学生班的班委和共青团支委成员，一般群众很少。“红卫兵师”的负责人则基本上是原院系学生会和共青团的负责人。这些人出身好，多数是中共党员，是院党委最信任的一些人。

省委工作组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撤离后，省委又向各大专院校派出“三员”，“三员”实际上直接领导和指挥各院校的文革委员会。也就是说，直到9月底，武汉的文化大革命仍然是由湖北省委直接操控的。

华工文革筹主席团的成立显然违背了十六条中第九条“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的规定。首先，“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代表”不是通过选举产生的，事实上根本就没有选举这个过程。其次，所谓“代表”都是“多数派”的成员，没有其他群体的代表参加，因此“主席团”也就缺乏代表性和权威性。加之“主席团”唯省委领导是从，继续执行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继续围攻、压制群众。因此，很多同学不满，纷纷找“主席团”成员辩论。这些同学辩论的武器就是十六条和两报一刊社论。

我在发言中所提到的“赵文成事件”是这样的：

1966年5月13日，三系（动力工程系）教师赵文成、林志雄、胡承荫三人给王任重写了一份揭发材料，认为“我院可能存在黑线人物”。王任重收到赵文成等人的材料以后，很快给他们回了信。信中说：“赵文成等同志，你们的精神是好的，我们给你们撑腰。”

6月13日，赵文城、胡承荫、李宗华、王远章等七人写了一张大字报给工作组提意见。工作组就认为赵文成等人是“坏人”，是“右派”，并立即发动群众围攻他们。他们给王任重寄材料的事也被揭发，在对他

们进行抄家时，他们揭发院党委的材料和他们在北京与王任重的谈话记录也在王远章的箱子里被抄了出来。

7月1日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发表这段时间，赵文成等人一直受到围攻和迫害。尽管王任重得知赵文成等人受到打击后向工作组打了招呼：“你们把赵文成等人打成反革命是错误的，工作组要作检查。”但赵文成等人的处境并没有改变。

赵文成是我院文革中的一个典型人物。因给院党委提意见，在文革初期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他积极造反，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经常表现出“折衷主义”的倾向，加之因种种客观原因他和“黑线人物”如王任重、李守宪等人有一定的“联系”，从而在造反派内部受到激进派们非议和冷落。1968年工宣队进院以后，他成了工宣队批判的重点，长期得不到公正的对待。他的命运确实是令人同情的，但其悲剧性的结局似乎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旧的体制和习惯势力最终战胜了造反派，这就决定了他这个最早造反的人成了文革的牺牲品。这当然是题外之话了，言归正传。

文革初期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主要体现在如何对待群众的问题上。如何对待群众是两条路线的分水岭。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全会认为，搞好这场文化大革命，关键在于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这就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路线。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要敢于革命，善于革命。不要怕出乱子。反对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包庇右派，打击左派，压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制造许多框框，束缚群众的手脚。反对做官当老爷，站在群众头上瞎指挥。”

我在万人辩论大会上的发言无疑是符合中央精神的。但就是因为这个发言，我这个原本不出名的小人物却立即受到人们的关注。系里原来不认识我的人纷纷打听我的情况。那时我常穿一双麻编草鞋，我们班的同学就会对来打听的人说：“那个常穿一双草鞋的人就是张建华呀！”

“主席团”在我发言后的第二天就派人对我进行了跟踪监视。“党组织”很快就派人去我湖南老家调查。不久后系里就有传言说我母亲这

个曾经要过饭的典型的贫苦农民是“恶霸”，说我在农村的哥哥是个“四清下台干部”。我高考的成绩也在同学中传开了，显然他们近期查看了我的档案。他们想从中找到他们需要的东西，力图在同学中孤立我。

我很快成了一名少数派的代表，成了系里的“知名人士”。一些我原本不认识的人也常找我来辩论。一时间，我成了多数派围攻的对象。

没有坚强的意志和信仰是当不了少数派的。因为作为一个少数派，不仅要经得起围攻、打击、孤立，而且要经得起政治上可能的长期迫害。最要命的政治迫害莫过于在你的档案里塞“黑材料”。

运动初期的多数派对少数派的围攻是不遗余力的。这里可引用戚本禹 1966 年 11 月 12 日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多数派）代表时的话来说明当时的情况：“你们长期以来保呀保呀！保得厉害。”“你们整天整别人很厉害，为什么（红旗）十三期社论要发表，那时不行了，围攻主席的革命路线，而且有组织。你们可以体会到，毛主席没回来，基本上是学生整学生，北京市死了很多人，数量很大，矿业学院、外语学院都整了，文化革命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什么首先举起革命旗帜的被打成‘反革命’、‘游鱼’、‘小牛鬼蛇神’？一个学校整死了许多人，……白色恐怖，整个的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戚本禹说的是北京的情况，其实当时武汉及全国各地的情况也基本上是这样的。可以想象，一个年轻学生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和信仰，是承受不了当少数派的压力的。

所谓“黑材料”，就是将你某一特定环境下的言行或道听途说来的事记录下来，经“上纲上线”地分析整理，给你安上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后放入你的档案。“黑材料”之所以可怕，是因为档案跟随你的一辈子，它不但关系到你的升迁、调动、荣辱，而且关系到你的家庭、子女的前途命运。这些材料之所以冠上一个“黑”字，是因为它是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编造出来的，是见不得阳光的。因档案是党的组织编制和管理的，也只有能代表“组织”的人才能看到你的档案，而你自己是永远看不到你自己的档案的，所以你永远不知道这些“材料”里到底写了些什么，所以你永远不可能有申辩的机会。因此，档案中的“黑材料”就像如来佛用来制服孙悟空的“紧箍咒”，你纵有天大的本事，“组织上”也可

以把你压在“五指山”下，永远不得翻身。

工作组用以镇压革命的学生运动、迫害少数派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整黑材料”。从北京到全国，所有院校的工作组都一样。而“抢黑材料”也是造反派反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要内容之一。

为了防止那些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继续用整“黑材料”的手段镇压群众运动，1966年10月5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提到整群众的材料，“应同群众商量处理办法”，“也可以当众销毁”。11月16日，中央又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的补充规定》，明确指出：“根据最近各地的情况，中央认为，对于文化大革命中各学校、各单位编写的档案材料，都应该宣布无效，全部清除，一律当众焚毁。”“（一）责成原工作组、学校党委或者其他有关组织，必须将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以后的各种整学生、整群众的材料，包括整理过的或者没有整理过的材料，除在这一文件宣布以前，确实已经焚毁的外，全部集中，不许隐瞒，不许转移，不许复制，不许私自处理。否则，就将加深错误，并将受到党的严厉处分。”

中央的文件虽然下了，但当时的省委和各单位并没有认真落实，直到1967年1、2月，整“黑材料”及转移“黑材料”的事还在继续，而少数派揭露党组织和工作组整“黑材料”、要求交出“黑材料”、继而抢“黑材料”的事也不时有发生，并因此常出现剧烈冲突。武汉蛋厂1967年1月4日因烧“黑材料”引起冲突，二三十人受伤。1月11日，二司武测总部等数百名造反派前去声援华侨造反组织红侨兵，要求市委统战部交出其整理的华侨的“黑材料”，抢出了23麻袋材料，其中有市财贸学校学生的“黑材料”。

这是题外话了，言归正传。

我成了“少数派”后，虽然当时自己对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真正的认识，也不知道运动今后会怎样发展，但自己却好像已是“义无反顾”了。这也许是我从小养成的刚正不阿、痛恨强权、痛恨以强凌弱的性格使然，我虽受到监视、围攻，但我并没有害怕和胆怯，更没有倒退。相反，这更激起了我内心的反感和斗志。从我下面的两篇日记中就足可看出我当

时的情绪是处于极度的亢奋状态中。

1966年8月26日

我要点燃革命的烈火，助长革命的烈火，在烈火中锻炼，在烈火中永生。

没有一定的政治见解，对事情人云亦云的人是庸俗的人。这样的人不可能有坚定的革命意志，更不可能有坚定不移的信仰。他们最容易混淆革命和不革命的界限。他们是这样的一种人：就某一件事，某领导说“是”，他们就会说“是，是，肯定是”；而当一个更大的领导来说“不是”时，他们就会马上说“对，对。不是，不是，绝对不是”。这些人在关键时刻往往是坏事的，战争年代一定会成为叛徒。他们往往凭着大轰大嗡把一些真正正确的东西给否定了。

可笑的是：这样的人往往是洋洋得意的。

1966年8月27日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天山上的雪莲时刻在被风雪狂卷着，

海边的礁岩时刻在被海浪冲击着。

可是，

雪莲依然开放，

礁岩照样挺立。

我爱雪山上的雪莲，

我更羡慕海边的礁岩。

我要像雪莲一样无视风雪，

要像礁岩一样在风浪中傲然屹立，

为着信仰和主义奋斗终生。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我院万人辩论大会后，围绕省委和工作组的大方向是否错了的问题，全院师生员工继续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辩论。宿舍里在辩论，走道里在辩论，操场上也在辩论。平时关系不好的同学之间在辩论，平时关系融洽的同学之间也在辩论。

通过辩论，群众真正被发动起来了，我院的文化大革命也就真正地

开始了。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通过辩论，相同观点的人自然就聚在了一起，各自成立了自己的“战斗队”，并逐渐形成了以“观点”不同而划分的“派”。不久后，凡极力维护并紧跟省委的“多数派”被称为“保守派”，而认为省委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错误，并与之抗争的“少数派”则被称为“造反派”。

由于造反派得到了中央和中央文革的支持，在以后短短的三个月内，形势发生了逆转，文革初期的“少数派”成了“多数派”，而原来的“多数派”反而变成了“少数派”。

第十二章 北京串连

8·16 全院万人大辩论会后，我和我们系的几个同学天天上街宣传十六条。我们在公共汽车上、电车上、轮渡上宣读十六条，并即兴发表演讲。

8月27日我在汉口做街头宣传时，得知大学生可凭学生证免费乘火车上北京。

回校后我和几个同学说了我得到的消息，希望他们和我一起去北京。但他们心存疑虑，不相信能免费乘车，不愿意贸然和我同行。

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决定独自去北京看看。

28日，我带了3斤全国粮票和5元钱来到武昌火车站。到问讯处一问，果然可以凭学生证取票上车。这令我喜出望外，立即去售票口凭学生证拿到了去北京的火车票。

我凭票上了车。入座后，我看到车上并不拥挤，持站票的人很少，秩序也很正常。这说明武汉绝大多数大学生还不知道凭学生证可以免费乘车的消息，我为自己能抢先上北京而庆幸。

我去打开水的时候，突然发现在隔壁车厢里还有我们院广播台的5个人，其中有采编组的，也有播音组的，这让我非常高兴。因为一路上有伴了。

交谈中，我得知他们是学校大会主席团推荐上北京的红卫兵代表。这又不免又让我有一点失落感。他们是多数派，我是少数派；他们是学校推荐进京的代表，是学校出钱买的车票，而我却是孤影独行，凭学生证上的车。

不过，我们毕竟是同在院广播台工作的同学，平时相处也不错，个人之间谈不上有什么过不去的。因此，我们在一起还是很融洽。

聊了一会后，我提议和列车长联系一下，让我们在列车上主持一个宣传十六条的专题节目。

大家很赞同我的建议。于是，我们就一起去找到了列车长。说明来意，列车长很高兴地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并随即带我们去了列车播音室。

播音员听了我们说的来意后也非常高兴，表示很乐意和我们共同主持第二天的列车广播。

看到播音员如此兴奋，我们非常高兴。于是，我们几个人商量了一下节目的主题和相关内容后，立即就分头去做准备。原采编组的立刻去组稿，而我在院广播台是文艺组的，自然是负责文艺节目的编辑了。我查看了列车播音室的所有唱片后，很快就选好了能结合我们主题的唱片，随即我就去写将唱片组合起来的连接词了。下午六点，负责采编的同学完成了他们采集编写的稿件，我们又回到列车播音室，将我们的想法和播音员进行了沟通和协调，直到一切准备就绪后，我们才回到各自的车厢。

第二天太阳刚升起来的时候，列车上响起了“华中工学院广播台、华中工学院广播台”的呼号声，由我们编辑并主持的宣传十六条专题节目开始了。

乘客们对我们的节目反映不错，我们很是激动了一阵。

火车到达北京时已是傍晚时分。出站后，我们一行人找到了设在车站广场旁的首都红卫兵接待站。

其他几个同学因是学校派出的“红卫兵代表”，有学校开具的介绍信，接待人员就将他们领到一个地方上了接待专车走了。而我们这些没有学校介绍信、只有学生证的人则被安排住进了中央团校学员宿舍。

当时北京各大机关和学校都已有了红卫兵接待站，负责接待外地来京的学生。住宿不要钱，吃饭也不花钱。

第二天（29日）吃了早点以后，我独自一人去校园看大字报。这时团校内到处都贴满了大字报，但人却很少，显得很冷清。一打听，才知道学员多数结业回原单位了，新学员还没有来。现在校的基本上是学校的教职员工。

浏览完校内大字报后，我来到了中央团校接待站，请他们给我介绍一下中央团校文革及团校内大字报的情况。一个四十来岁的女同志热情地给我介绍了以下情况（根据当时笔记整理）：

一、关于团中央书记胡耀邦的问题

8月1日，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找胡耀邦、胡克实谈话。康生说：

团中央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错误、路线错误。8月5日，毛主席严厉批评团中央：“三胡”不是糊糊涂涂犯错误，而是明明白白地犯错误（“三胡”指团中央的三位书记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8月14日，李富春同志在工人体育场的群众大会上宣布改组团中央。

改组的理由是：

1. 过去的团中央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
2. 没有很好地执行阶级路线；
3. 没有走群众路线，尤其是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

李富春在北京市中学文革大会上说胡耀邦等是不是黑帮，现在还没有决定，还要靠大家继续揭发，最后由党中央来决定。

接待人员说，胡耀邦、胡克实已在团中央机关批了两次，有四五个单位要求开十万人大会批他们，他们正在作检查。

二、关于红卫兵的相关问题

接待人员说：这些天来有坏人冒充红卫兵，这些人不分敌我，到一些革命家庭去抄家，结果遭到“坏人”的殴打。有一个“黑帮分子”的儿子用刀砍了一个去抄他家的红卫兵负责人两刀，当天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十万人大会声讨这个凶手。

接待人员接着说了红卫兵打人和斗“黑帮”的几件事：一个学校的红卫兵（好像是清华附中的）把一个“坏人”打死了。事情的经过是：这一天，一个三十来岁的人拿着一根大棒闯入学校，见红卫兵就打，结果被红卫兵包围。这个坏人还乱喊乱叫，更激怒了红卫兵，不一会儿，这个人就被红卫兵打死了。

昨天在北京火车站看到红卫兵把一个地主婆（倪训荣）弄出来示众。红卫兵要她高举一块上写“地主分子—倪训荣”的厚纸牌，要她在原地转圈，并不断地抽打自己的嘴巴。据说这个人是原北京市委某人的爱人。

红卫兵们把黑帮们的头发剪掉，剪得乱七八糟，样子非常难看。另外，黑帮分子胸前都挂有一块纸牌，上面写着：黑帮分子××。

三、关于校领导的问题

接待人员对我说：“被揪出来的周杰、马石江分别是原中央团校的正、副党委书记，现在团校的大字报多数是外单位来贴的”。

四、关于学员问题

中央团校现在校学员只有七八十人。原来中央团校的学制是两年，为了能使更多的人有机会来学习，现改为五个月，五个月就毕业。开学时有八百多人，他们都是县团委以上的团干部。

这位接待人员还告诉我说：高级学校（中央党校）原来的杨献珍被揪出来后，继他职务的是林枫，现也被揪出来了。

8月30日，我去北大看大字报。因聂元梓等七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就出在北大，所以，到北京后我第一个去的就是北大。

北大校园内人山人海，真可谓摩肩接踵。据说，每天来北大的人不下10万，8月12日这一天竟达17.9万人之多。都是来看大字报的，其中多数是外地来的学生。

北大校园内到处都是大字报。有北大本校贴的，也有北京其他学校来贴的，还有一些是外地来京的大学生们贴的。

由于人实在太多，每一张大字报前都站了不少人。要看大字报，你必须花老大的劲挤进去才能真切地看完一张大字报。天气实在太热，个个都是汗流浹背，但人们似乎全不在意。

看了大字报后我来到校文革接待室，想通过接待人员了解一些北大文革的情况。但接待站也是挤得满满的，要想向接待人员了解自己知道的情况实际上也不可能。我只好在离接待人员较远的地方听接待人员回答别人提出的一些问题。其中有人提到了北大的6·18事件，我虽尽力去听，但始终听不完整。大概是说，所谓“6.18事件”，其经过是：6月18日上午九点到十一点，北大工作组正在开会，而一些人却离开工作岗位，揪斗了四十多名校领导人和教授，并有一些过火的粗暴行动。工作组知道后出来制止了他们，说背着工作组的这种乱斗的作法有害于革命，说群众是被坏人利用了。工作组认为6·18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并通过《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报给了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

接待人员接着说：7月22日、23日，陈伯达、江青来到北京大学，引起了北大师生对6·18事件的辩论。7月25日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再次来到北京大学，召开万人辩论大会，批判北大工作组镇压群

众，并建议撤销工作组。

我后来才知道，北大6·18事件是一件重大的事件。它不但影响了文化大革命的进程，而且使毛主席下定了换接班人的决心。

原来，北大工作组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报到中央后，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对简报作了批示，同意北大工作组关于6·18事件的定性，并转发全国。据说，毛主席对此十分震怒，说怪不得到处镇压群众，现在才明白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因此才有了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在北大，我看到了北京大学召开“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代表大会”的有关介绍。大会由聂元梓主持。聂说：“毛主席点燃了北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打倒了陆平、彭珮云，我们是新北大的主人”。

中央文革副组长、中共中南局第二书记、湖北省第一书记王任重同志（他身着军装）在大会上发了言，他说：“我代表陈伯达、康生、江青和中央领导同志向大家问好，热烈祝贺北大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召开”。会后，北大红卫兵代表给王任重戴上了红卫兵袖章。

下午四点左右，我从北大回到中央团校。接待站的同志通知我说：明天毛主席要在天安门接见外地来京的师生，并向我交待了有关乘车、吃饭及纪律的相关问题。听到这样的大好消息，我当时激动不已，以至一整夜都没有睡好。

我从当天的报纸得知8月27日北京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简称首都一司），江青等人参加了大会并讲话。周恩来等人晚上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接见“首都一司”代表，在讲话中强调不能冲击中南海、人民大会堂、报社、机场等地方，以维护首都的社会秩序。

8月31日早上五点我们就起了床。六点，我和同住宿在中央团校的外地学生一起，乘坐团校安排的车来到了天安门广场。这时，广场上已是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听说，这些人凌晨三点就来了。

毛主席这次接见红卫兵的方法与第一次不同。第一次是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依次行进的红卫兵游行队伍，而这次是毛主席乘敞篷车绕着红卫兵方队行进，依次和红卫兵见面、挥手致意。

红卫兵方队是按地区、学校、单位在天安门广场预先划定好了的。

而我们这些人虽是外地学生，但不是有组织来的，实属“散兵游勇”，因此就不在方队之列，我们被安排在靠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的地方。这里虽离毛主席乘坐的检阅车远了点，但我们相对比较自由，没有“方队”的约束，可以在附近走动。

维持秩序的全部是解放军战士，进入广场有专人引导。因此，即使如此大的场面，整个广场仍然是有序的。

接见大会由江青主持。

江青讲话：同志们、同学们：你们好！热烈欢迎你们，向你们致敬。现在请陈伯达同志讲话。

陈伯达讲话：我代表伟大的统帅、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毛主席向同学们问好！我相信你们回去后会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按照十六条把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革命小将们，党中央和毛主席热烈地赞扬你们敢想、敢干的革命精神，向你们欢呼，向你们致敬！

毛主席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当毛主席乘坐的敞篷车出现在天安门广场时，整个广场立刻沸腾了起来，“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连成一片，响彻云霄。尽管事先定了纪律，方阵不能乱，但当毛主席的车经过时，方阵还是有些变形，人们不自觉地涌向靠毛主席的一边。他们抑制不住万分激动的心情，拼命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好多人的眼泪都因激动而扑簌簌地流了出来。

因为我们不在方队之列，毛主席乘坐的车我们只能远远地望着。好在有自由移动的方便，因此，有时我们也能较清楚地看到毛主席大概的形象。和其他所有的人一样，我也是非常兴奋和激动。想想看，一个普通的学生能亲眼看到毛主席，那是多么不容易啊！怎么不让人兴奋和激动呢？

参加完毛主席的接见回到中央团校后，我与北京地质学院的高中同学李民健取得了联系，他要我移住到他们学校去，我高兴地答应了。

9月1日上午7点半，我来到了北京地质学院。李民健让我和他同

住一宿舍（他同宿舍的同学有的去串联了，有空床）。寒暄过后，他领我在他们学校看大字报，并打电话通知我们在京的其他高中同学：北京钢铁学院的徐兴诚、北京邮电学院的黄渊久、北京政法学院的奉谷义。

下午两点，他们三人都赶到了地质学院和我见面。两年多未见面的老同学、老朋友在北京见面自是一番激动。我们各自谈了两年多来的学习、生活情况。谈得最多的自然是各自学校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及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这天，我们是在馆子里吃的晚饭，我平生第一次喝了啤酒，我们尽欢而散。

晚上，李民健给我详细地介绍了他们地院文革的相关情况。

北京地院工作组组长是地质部副部长邹家华，院党委书记是李贵。

6月上旬，地院一些人认为驻院工作组落后于形势，难以领导文化大革命，于是在6月20日要求工作组回答一些问题。在工作组还没有答复的情况下，一些同学就去了国务院请愿，因而受到工作组的打击、迫害，为首者被打成反革命。这就是所谓的地院“6·20事件”。

对“6·20事件”，东方红红卫兵的看法是：发起6·20行动是革命行动，而镇压这次行动的工作组的行动是反革命行动。理由是：工作组把王大来（原团总支书记）打成牛鬼蛇神，很多给工作组提过意见的人遭到无情的打击，他们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东方红认为工作组的“反干扰”是一个方向性的错误。

8月17日，北京地院的“东方红战斗队”等组织联合成立了“东方红公社”，朱成昭、王大宾等为负责人。

8月23日，北京地院东方红公社一千多人在王大宾带领下到地质部静坐。在中央文革的干预下，地质部答应了学生的要求。

北京地质学院当时有三派：一派是“斗批改派”，这一派承认工作组犯了方向性错误，但同意工作组的检查，认为工作组的问题实际上已基本解决，因此主张马上进行一斗二批三改的战斗任务。一派承认工作组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工作组总的来说是革命的工作组，工作组是来干革命的。由于决定派工作组就是一个方向性错误，这就决定了工作组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问题和错误，但工作组绝不是反革命的。第三派则认

为工作组不是来革命的，而是来镇压革命的。因为工作组不相信群众，迫害左派，打击一些真正的革命者，6·20事件及由此引起的“反干扰”就是明显的证明。

9月2日，李民健同学陪我去清华看大字报。清华和北大虽相隔不远，但文革的气氛却大不一样，显得相对冷清，给人的感觉是：清华大学目前的文化大革命正处于低潮，很多人走了，一些人正准备走。在校的同学目前争论的中心问题是“文革筹”的选举问题。

在清华园我看到了“钢铁战斗小组”的一篇大字报并抄了下来，全文如下：

一场捍卫《十六条》的斗争

——批临筹和红卫兵总部某些人的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错误

一、主流、阻力

主流：较彻底地批判、清算了工作组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革命的造反精神冲破了重重障碍。

非主流：在批判工作组时，有人要把叶林同志打成“黑帮”，在为革命的造反精神翻案时，有人为一些个别人彻底翻案，在给中央领导人贴大字报时没有注意内外有别。

阻力：“临筹筹”及红卫兵总部的某些人蹈工作组错误的覆辙，加深了群众之间的分裂和对立，压制了群众运动。

二、混淆两类矛盾

我们认为临筹筹及红卫兵总部的某些领导人在很多事情上混淆了两类性质的矛盾，就是利用群众中的某些缺点、抓住个别人的问题去挑动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下面是几个例子：

（一）8·19辩论会的背景是广大革命群众根据周总理讲话及《人民日报》社论的精神，抱着对革命负责的态度，坚决要求撤消、批判工作组的错误路线。辩论的主题是为革命的造反精神翻案。当然有人给叶林同志乱上纲，有人企图给蒯大富翻成“革命造反精神的杰出代表”，但这是少数人。根据周总理及陶铸同志的讲话精神，他们的错误是人民内部矛盾。但8·19演出的一场“夺权”好戏却完全证明了自控系红卫兵的某些领导人企图把部分的革命群众打成敌我矛盾。

(二) 8·24事件与8·19事件有所不同，当时确实出现了一股歪风，筹委会因此请来外校红卫兵，其问题在于：

1. 在所谓“矛头指向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大字报中，有少数人是别有用心，但大多数主观上是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

2. 写大字报的时代背景是革命师生听了陶铸同志的讲话，看了红旗杂志社论，分析了王光美同志在清华的表现之后革命造反精神的发扬。写这种大字报的人，有很多是红卫兵的成员。临筹及红卫兵总部的错误在于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把一部分革命群众打成敌我矛盾，在他们看来，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成了右派，清华的群众不可信任，使运动又一次进入低潮。

——钢铁战斗小组

9月3日上午我去人民大学看大字报。在大字报区转了一圈，没有看到什么特别感兴趣的内容，于是我就去了人民大学广播台。因为当时我也在华工院广播台工作，想了解一下他们在文革中是怎么工作的。下面是我在作了自我介绍后，和人大广播台接待人员的问答记录：

(我)问：在有两种不同观点的时候你们广播台如何处理？

(接待人员)答：陶铸同志曾指示说：“两种意见都可以播，或者上午播这一方的，下午播另一方的”。我们的做法是：当对同一问题群众中存在两种意见时，开始是两种意见都播，等过了一段时间后，当某一种意见我们认为比较正确时，就只播正确的一方了。

问：在运动期间，广播台归那个部门领导？

答：广播台原来由校团委领导，文革开始后就不听团委的了。工作组进校后，我们由工作组领导。工作组撤离后是我们自己搞，自己领导自己。现校筹委会成立了，我们受筹委会领导。但我们广播台有相当的独立性，也就是说，我们不是绝对服从筹委会，而是我们认为对的就执行，不对的不执行。我们认为，我们只能绝对服从主席思想的领导。

问：你们台现有多少人？分几个组？如何协调工作？

答：我们广播台现有26人，分两组：即编辑组和播音组。广播台的工作人员在运动期间以广播台的工作为主。平时搞编辑，一星期值两天班。有些工作人员主要在下面搞运动，广播台基本上就不来了。

我们广播台的工作人员都住在下面。现在已没有班和年级的界限了，以观点分群。人大共有两千多学生，大部分学生都去外地串联走了，现全校只剩四百人左右。

问：你们台的人员构成如何？

在台的工作人员除一人外都是红五类子弟，有两个党员。我们只有组长和副组长。现在我们正准备成立一个文艺宣传队。

从人大广播台出来后我自然就想到了我们院的广播台，觉得我院广播台只播主席团和华工红卫兵师的稿件，只播“工作组好”、“湖北省委就是好”的稿件，不利于大辩论，应该像人大广播台这样才能体现大民主，才能充分发挥广播台在文革中的作用。

9月4日，李民健陪我来到北京外国语学院。下面是当晚我根据回忆做的笔记：

北京外语学院现有四个红卫兵组织，即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红旗大队、红卫兵、毛泽东主义赤卫队。这四个红卫兵组织分成两派，一派坚决否定工作组，一派基本认可工作组已作的检查。

目前北京外语学院“红旗大队”一派处于少数，绝大部分大字报对刘新权的检查感到满意。

在外语学院看到这样一副对联：

上联：红卫兵造反一心为革命，下联：红旗队抄家双手捞资本，横批：鲜明对比。

9月5日，李民健领我逛街并游览了颐和园，本想去参观故宫博物院，但当时故宫已关闭不再对外开放，只好作罢。

9月6日上街看大字报，下午去火车站办理了返程火车票。

下面是9月5日晚就几天来看到的有关情况写的笔记：

1. 北京现在到处都可以看到红卫兵贴的通告、宣言、通牒。他们认为现在来京的人很多是好事，但有些人不是来干革命的，而是来旅游的，因此要求这些人立刻滚蛋。并要求以后来京师生一律要凭学校证明，在证明上写明其出身、表现等。

2. “黑帮”们被红卫兵用汽车拉着游街。北京市现在到处是红卫兵，一些女红卫兵（都是十五六岁的，显然是中学的红卫兵）三三两两骑着

自行车到处跑。北大的一些“黑帮”的住房、财产都被红卫兵封了，邓拓、冯友兰等原来的住房中空无一人。门上都写着“打倒邓拓”、“黑帮冯友兰的黑窝”等标语。

3. 清华、人民大学、地质学院现在都有两种不同观点的红卫兵组织(如红卫兵、毛泽东主义红卫兵、818红卫兵、东方红红卫兵等)，这些学校之所以有两种红卫兵，是因为他们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观点完全对立，但都宣称自己是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4. 8月中旬前，北京红卫兵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基本上都是高干子弟。清华附中、北京四中、六中、八中是最早成立红卫兵组织的学校，这几所中学都是高干子弟集中的地方，其红卫兵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无一不是高干子弟。而像北大、清华这些有代表性的大专院校的红卫兵组织和“文革筹”的负责人也基本上是高干子弟把持着(作者注：后来进一步得知，当时在清华上学的刘少奇之女刘涛是清华文革筹委会副主任，贺龙之子贺鹏飞是清华文革筹委会主任，李井泉之子李黎凤是清华红卫兵总部的负责人。邓小平之子女邓朴方、邓榕等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子女也都是那时的活跃分子，他们当时的“革命行动”都得到了他们父母的支持)。

5. 这几天我在各大专院校都看到了有关北京工业学院谭力夫(高干子女)鼓吹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口号的辩论文章。一些高干子女极力主张“血统论”的口号并将其推向社会。我认为谭立夫的血统论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因为这不但不利于党的阶级路线的全面贯彻执行和“要团结大多数”的原则，而且也不符合历史事实。这些高干子女言行中流露出来的优越感既使一些人羡慕，也让很多人感到不舒服甚至反感。

6. 近来北京的交通看来成了问题，公共汽车都是挤得不能再挤，我这几天很少坐车，总是靠腿跑。现北京的饭店也是忙不过来。

9月6日，我离京返回武汉。

从8月29日到9月6日，我在北京9天。通过这9天的所见所闻及分析思考，我对以下两个问题有了自己明确的看法，它直接影响到了我回武汉后的行动。

1. 关于“两条路线的斗争”。

在去北京前，我虽然对我们学校、对湖北武汉的文化大革命已有了一定的看法和判断，但当时我和大多数同学一样并不知道中央存在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更不知道也不敢想象中央有两个司令部。

通过北京九天的实地考察和分析，虽然我还不能明确中央存在走资本主义还是走社会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但我开始相信中央在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确实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

两条路线的根本区别或说分水岭是如何对待人民群众，如何对待群众运动。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充分相信群众，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让群众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同时引导群众自始至终将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

而与之对立的则是另一条错误路线（当时并未公开刘、邓是错误路线的代表）。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及各地的执行者们是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他们沿用历届运动特别是四清运动的方法，即自上而下，由上级党委派工作组指导文化大革命，他们违背五一六通知及十六条的明确指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将运动的矛头指向“地、富、反、坏、右”、“反动学术权威”和群众中“落后分子”。

在当时，凡是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民主权利并“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保护群众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与此相反，凡不相信群众，压制甚至镇压群众，极力维护旧的机构、旧的纪律、旧的秩序的即是错误路线。我认为当时确实存在这两条路线的斗争，而且两者已经泾渭分明。

2. 关于“大民主”和“群众自己教育自己”。

我国几千年来都是封建制度、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在由此形成的文化氛围中，人们只知道“皇上”和“上级领导”，“不能犯上”几乎是天经地义的。

虽然近代孙中山被称为“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也强调在党内、军队内要实行民主，但到底什么是民主，如何行使

自己的民主权利，多数老百姓还是不知道，就是那些大小官员也未必知道什么是民主和怎样实行民主。

实行人民民主，特别是推行政治上的民主对一个国家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我认为，当时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运动，虽然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民主”，但起码可以算得上是一种民主意识的启蒙运动。而这种“民主的启蒙”对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来说，无疑是非常必要的一个过程。而这种“民主的启蒙”在西方早在18世纪就已经开始了。

为什么十六条要强调“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就是因为大家在还不真正懂得什么是民主的时候，必须进行民主的启蒙。正由于“民主”对中国人来说还是新鲜的事物，在实行中就难免要犯错误，难免要走弯路，就像我们还不会游泳的时候去游泳一样，难免要被水呛。

事实上，文革初期就出现过很多乱子，比如文革初期的红卫兵的“破四旧”、随意揪斗“坏人”等等。这些不但不是“民主”，反而是践踏民主，也与文革的宗旨大相径庭。

在我的思想意识中，我对当时红卫兵的“扫四旧”、抄家、斗“黑帮”、随便打人的做法是很反感的。认为这不是民主，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势压人，以强凌弱。

十六条中强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这是实行大民主的保证。没有这一条，当时的“大民主”就是一句空话。

事实上，文革刚开始，刘、邓派到基层的工作组基本上就是站在旧的体制一边，极力压制群众，把起来向党委提意见的群众打成“反革命”的。在短短的几十天内，仅据对北京24所高等院的统计，工作组就把10211名学生打成了“右派”，把2591名教师打成了“反革命”。以此推算，当时全国有多少人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在这种白色恐怖的情况下能有民主吗？能进行民主的启蒙教育吗？显然不可能。由此看来，工作组执行的路线是完全错误的，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工作组受到群众的批判是应该的。

从北京回到学校后，我首先在我们系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斗队”，半月后，我们又和本院其他系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斗队联合

起来，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华工总部。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华工总部的成立完全改变了我院文革两派力量对比的态势，通过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我们这些原来的少数派很快变成了多数派，而原来的多数派——华工红卫兵师则成了少数派。

第十三章 成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华工总部

我从北京回来的消息很快就在我们系传开了，当天晚上，一些同学来宿舍找我，他们急切地想知道北京文革的情况。

当我把我在北京的所见所闻及我对两条路线斗争的看法说了以后，大家都非常兴奋，一致提出我们也要成立红卫兵战斗队。

我想了想后说：我也是这样想的。我们应该成立战斗队，应该有所作为。这样吧，我刚回来，目前运动发展很快，我要先了解一下我院及武汉最近的情况后，再作具体的准备，大家在这几天也好好考虑一下。接着，大家就你一言、我一语地谈起了我院及武汉最近发生的有关情况及各自己的看法，直到晚十二点才陆续离去。

从第二天起，我连续两天独自上街看大字报和听辩论。

在我离开武汉去北京的短短十来天里，武汉形势发生了迅速的变化。在南下同学的带领下，人们的视线开始转向了武汉市委和湖北省委，辩论的地点也从各单位内转到了大街上，而辩论的主题则从“工作组是否犯了方向错误”，转到“省、市委的大方向是否错了”。

武汉地区这段时间大概是解放以来最热闹的时候了。那时你到武汉市的大街小巷随便转一下就会发现：到处可以看到成群的学生，到处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传单、大字报，到处可以看到人们三五成群地在议论或围着北京来的同学辩论。你只要随便打听一下，就可以去参加几百人、几千人甚至上万人的辩论会。

经过对武汉形势的调查和思考，我决定成立战斗队参与学校和武汉的运动。

我们当时是少数派。我完全没有考虑成立战斗队参与运动在政治上会有什么后果，更没有想通过这样做给自己捞点什么政治上的好处。当时只是觉得湖北省委执行了反动路线，我们应该勇敢地站出来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和几个同学商量后，9月9日，我在西一楼召开了电机工程系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成立筹备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陈俊庭、孙建群、周泽英、

徐正茂、毛忠芳、鲁迪、林巨才、宁广荣、陈安民等。在会上我发了言，发言提纲我记在日记里，现抄录如下：

在二系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斗队成立筹备会议上的发言提纲

一、目的：我们成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斗队是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是为了和“华工红卫兵师”闹对立来的。

二、任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必须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坚决听毛主席的话，捍卫毛泽东思想，目前主要是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三、要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每一个成员都必须“敢”字当头，做到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我们将碰到很多困难和阻力。我们一定要有勇气，只要我们认为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应该坚持，决不拿原则做交易。对战斗队的负责人，我们要求必须做到：头要冷，心要热。胆要大，心要细。目的要简单，脑子要复杂。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

四、组织原则：采取巴黎公社的选举办法，由全体成员直接选出负责人。

任何一个革命组织都必须要有有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我们现虽有了一个组织，但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一个真正的领导班子。领导班子建立以后会碰到很多问题，首先是我们来自不同的班级，我们的观点虽比较接近，但我们相互间还不太了解，要想把领导班子建设好，必须靠大家。

五、几个应注意的问题：

1. 我们必须正确理解和贯彻党的阶级路线。那些出身不好的同学如和我们的观点一致，我们应欢迎他们和我们一起战斗。在我们的战斗队成立初期，为慎重起见，我们先成立一个外围组织，让他们在我们的“红外围”组织里。

2. 要注意团结。院红卫兵（主席团属下的华工红卫兵师）是我们的同志，尽管他们的观点和我们有冲突，但应该看到，我们的目标和大方向还是一致的，这就是完成斗、批、改。在我们内部更应该加强团结，同时还要团结好我们的红外围。

3. 关于辩论。辩论是一种有力的武器，我们应充分利用。我们这些人敢辩论是没有问题的，但一定要本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态度去和别人辩论。原则的问题一定要争到底，一般问题不要纠缠。在辩论中一

定要摆事实讲道理，要以理服人。我们目前是少数派，到处遭到围攻，这对我们来说就是大风大浪。我们应该在这场大风大浪中得到锻炼，迅速成长起来。

4. 不要骂人，尤其是在传单和辩论中。也不要有意无意地用挖苦，甚至讽刺的语言对待不同观点的人。

5. 必须注意调查研究。我们在参加辩论或写传单、写大字报时，都要通过调查分析后才能进行，一定要有第一手资料。

6. 关于写大字报：

①要实事求是，不要乱上纲上线。在这个原则下，我们写的大字报要尽可能把关键问题、实质问题直截了当地点出来，文风要尖锐泼辣一些，不要软绵绵的不疼不痒。要做到观点明朗，旗帜鲜明，赞成什么、反对什么一定要鲜明，这应该成为我们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一大特点。

②作为一个组织，对外一定要统一思想，统一“调子”。一些重要的大字报要通过大家讨论后方可组织的名义署名，否则只能以个人的名义落款。

7. 今天要讨论确定的问题：

①确定我们战斗队的名称。

现大家提出了以下候选名称：“8·31”、“造反队”、“鬼见愁”、“8·18”、“硬骨头战斗队”、“大无畏”、“爆破手”，从中选一个或另提一个供讨论。

②推举联络员并分工（作者注：当时负责人通称联络员或服务员），领导班子由全体战斗队员民主选举产生。

③确定明天成立大会的地点、特邀代表（外系的）并提前布置会场。

我发言后，参会人员都先后发了言。大家对我提出的目的、任务、要求等都表示赞成。会上争论最多的是关于“红外围”的问题。部分人认为暂时不要搞红外围组织，以免让华工红卫兵师说我们“组织不纯”。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成立红外围组织是必要的，这既是那些出身不好的同学革命的权利，也有利于团结大多数。

会议最后作出决定：

1. 战斗队的名称：暂定为“鬼见愁”战斗队。

2. 联络员：张建华、徐正华。

3. 成立大会时间、地点：时间定于9月11日晚8点，地点在西一楼101大教室。会场布置由陈俊庭负责。确定特邀代表名单并通知由张建华负责。

4. 在战斗队成立的同时成立“红外围”，张建华负责。

9月11日晚8点，按预定计划，会议由我主持并首先发言。发言全文（日记原文）如下：

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鬼见愁”战斗队成立大会上的发言

我宣布：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鬼见愁”战斗队成立大会现在开始。

同志们：我们的战斗队今天成立了。战斗队的成立是我们按毛泽东思想进行斗争的结果，是我们克服重重困难，冲破层层阻力的结果。

我们是毛主席当然的红卫兵。我们最听毛主席的话，我们最爱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我们的最高统帅就是毛主席。在我们今后的一切活动中，都要以毛泽东思想为准则。

我们的战斗任务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和促进文化大革命。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坚决贯彻、执行、宣传“十六条”，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向“四旧”猛烈开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我们要向解放军学习，做解放军的后备军。

干革命就要有无产阶级的革命闯劲，我们要“闯”字当头。毛主席说“造反有理”，我们就按毛主席的指示，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跟着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奋勇前进。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的战斗队虽然成立了，但我们还只是在革命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在我们的面前还有很多困难和阻力，我们现在还是“少数派”！我们的战斗队为什么取名为“鬼见愁”？就是因为我們什么都不怕。我们的同志一定要在困难的时候看到成绩，看到光明。要相信自己，相信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同志们，战友们，我们一定要坚决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一定要按“十六条”办事，在斗争中坚持用文斗不用武斗。我们要加强团结，不但要搞好内部的团结，而且要搞好和其他革命组织的团结。“大专院校红卫兵”

的观点虽然与我们不同，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同学是我们的同志，我们的大方向是一致的。我们应该和他们并肩作战，共同进步。

同志们，让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凭着一颗红心，一面红旗，一本红宝书勇敢地战斗，做一个真正的忠于毛泽东思想的红卫兵！

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领毛主席万岁！

我发言后接着有十个人在大会上发了言，其中江重初是代表各系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斗队参会代表发言。

大会发言后全体战斗队员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了战斗队负责人，我和徐正华当选。

成立大会开得很成功。大家都是心潮澎湃，斗志昂扬，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团结的大会，鼓劲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9月12日上午，我召开了全体战斗队员会议，就战斗队下一步的工作及分工进行了讨论，最后确定分成三个组，即联络组、宣传组和材料组。

联络组的职责是：负责全面工作、抓组织发展和毛著学习。成员：张建华、徐正华。

宣传组的职责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审查稿件、抄大字报、刻钢板、组织文艺节目。成员：林巨才、周泽英、孙建群、毛忠芳、王钦才、宁广荣。

材料组的职责是：调查、走访、核实、整理、保管材料。成员：曹和平、王家树、董得友、凌仕文、龙名府、林其生、龚汝栋、贺定轩、倪吉平、黄国祯、陈俊庭、鲁迪、王绍礼。

这里我想说一个题外话，就是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关系问题。从上述鬼见愁战斗队筹备会议上我的发言可以看出，我是把多数派看作是同盟军，是同志，是阶级兄弟的（以上引文都是直接引用我当时日记的原文，目的是尽量忠实于历史的事实）。而当时的多数派（即院大会主席团控制的华工红卫兵师）对我们少数派红卫兵可以说是残酷无情的。

尽管他们对我们采取的是压制、排斥的态度，但在我当时的思想和



前排左起：孙建群、张建华、宁广荣，中排左起：毛忠芳、陈俊庭、林巨才、黄寇斌，
后排左起：周泽英、陈安民、吴雪兰

意识中，并没有对他们采取针锋相对的态度。事实上，从战斗队成立到工宣队进院，一直到造反派组织解散的整个过程中，我都没有对原院红卫兵进行过任何打击报复。现在一些年轻人从近三十多年来的主流舆论中，似乎得到一种印象，认为造反派对保守派是严厉打击的，这不符合历史事实，起码不符合我们华工的事实。

言归正传。

我们电机系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斗队成立时，其他各系也都先后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斗队。通过串联，我们很快商定成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华工联络站，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华工总部的成立作准备。

当时各系战斗队联络员（负责人）是：

机一系：刘颀富，机二系：覃服从，二系（电机系）张建华，三系（动力系）：巩学增、刘玉明、赵文成，四系（无线电系）：林沛、柳书伦、李培俊，五系（船舶系）：江重初。聂年生、黄国成为院联络站负责人。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华工联络站成立后，我们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经费问题。当时院里的行政机构还在院党委的领导下继续履行职责，

开展运动所需物品（宣传用品等）都还是通过“院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大会主席团”安排、配备。为了解决战斗队所需物品，我和联络站其他成员于9月15日专门去“主席团”交涉，提出了以下要求：

1. 在“主席团”中应有我们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派的代表；
2. 要给我们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统一的红旗、标志、袖章，并给我们红卫兵总部刻一枚公章；
3. 分配给我们一间办公室，并配电话，为我们的工作提供方便；
4. 给我们两辆自行车，为我们相互联络和散发传单提供方便；
5. 我们应有使用校车的权利；
6. 配给我们宣传用纸、油印机等，并为我们提供铅印的方便。

经过谈判，我们的要求得到了部分满足，但办公室、车辆使用等均未达成协议。这种结果是我们预料中的，我们现在是“少数派”，你没有力量，谁会把你当回事？从主席团办公室出来后，我们决定9月18日在联络站召开各系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斗队负责人会议，就当前文化大革命形势和成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华工总部等相关问题进行协商。

在联络站各系负责人会上我作了以下发言（日记原文）：

1. 对当前的形势我们应认真分析一下，要有一个明确的判断。在湖大、华农等院校，已发生了省委把我们这样的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的例子，我们对此应引起高度重视，认真分析一下，看我们是否也会遭此厄运。我们一定要有心理准备，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相应的心理承受能力。首先，我们不要怕，即使在我院也发生这种情况，我们也要顶得住。其次，我们在当前的组织发展中，特别要注意对家庭出身的控制，对中农和“革干”出身的队员要注意，要有证明。不要给别人钻了空子，说我们中的某某是黑五类。

2. 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我们现在是少数派，但我们要少而精，一个顶十个。关键是我们要统一思想、统一步调。为此，我们要经常到联络站碰头，对重大问题一定要集体充分讨论，联络站要安排值班人员。

3. 大胆吸收新队员。我们要尽快地发展和壮大我们的队伍，要尽可能地团结更多的人和我们一起战斗。通过这段时间的大辩论，现有很多

同学开始了解我们，同情我们，支持我们，很多人要求加入我们的组织，我们要大胆地吸收他们。我们现正着手全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大联合，我们和其他几个系的联络员已开了几次协调会，争取月底前成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华工总部，到时我院文化革命的形势将展现一个新的面貌。在我们系，已加入我们红卫兵组织的如果要求退出，我们也准予退出。256班昨天就有几个同学要求退出，我已同意了。这没有什么，有进有出，很正常。当然，我们也要求我们的队员不要随便地退出，退出时要申述退出的原因。在我们的队伍里也要提倡大辩论、大民主、大团结，不要随意给不同意见、不同观点的人扣帽子。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很及时。大家统一了思想，决定立即着手准备成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华工总部的相关事宜。

就在我们积极筹备成立总部的时候，湖北省委为了压制我院的“少数派”，于9月20日、21日两天内组织了武汉八大院校的“大专院校红卫兵”进驻我院。其中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派出的145人驻机一系，中南民族学院派出的100人驻机二系，湖北大学100人驻三系（动力工程系），武汉大学150人进驻四系（无线电工程系），武汉医学院100人进驻五系（船舶工程系），华中师范学院（人数不详）进驻附中。驻二系（电机系）和机一系的人数和派出院校不详。

湖北省委对我们的压制不但没有使我们屈服，反而更激起了我们的义愤。9月27日，我们顶着压力冒着极大的风险，按预定计划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华工总部。

考虑到总部负责人都是各系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斗队推选出来的，相互间尚不太了解，因此，总部没有设“司令”、“副司令”，而是采用“主席团”集体领导的模式。主席团下设四组一室，即组织组、宣传组、联络组、材料组、总部办公室。主席团由九人组成：刘玉满、李培俊、赵文成（中共党员）、聂年生、郭保安（中共党员）、张建华、左玉明、郭汉成、江重初。具体分工是：总部办公室：赵文成、聂年生、郭保安、李培俊；组织组：刘玉满、张建华；宣传组：江重初，材料组：左玉明，联络组：郭汉成。

为了展示我们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力量和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决

心，在成立大会后我们即浩浩荡荡游行到湖北省委所在地。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华工总部的成立是我院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转折点，它标志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我院已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我院的“少数派”正逐渐成为“多数派”。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华工总部成立后，各系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统称××大队，我们电机系的“鬼见愁战斗队”更名为“新华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前卫大队”。我因去了总部，经民主选举，鲁迪和钱亦军成为新的大队负责人。此后，我基本上忙于总部的工作就很少过问系里的事了。

第十四章 炮轰省委

文革中的“炮轰”（“炮打”）一词，源于毛主席1966年8月5日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毛主席在大字报中说：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二百多字，不点名地批判了刘少奇、邓小平，明确地提出了党中央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观点。8月7日，毛泽东的大字报作为中央文件印发八届十一中全会与会者。

毛主席的大字报得到绝大多数中央委员的支持。一些中央委员，特别是一些省的主要负责人纷纷站出来表示欢迎“炮轰”。

1966年12月新华工编《中央首长讲话选编》中，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1966年8月7日，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贴出了要求“炮打”自己的大字报：“省委机关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开始两个多月了，到现在还没有人贴我的大字报，也没有人贴书记处的大字报。这说明了什么呢？是我们没有问题可贴吗？不，完全不是。是说明群众没有发动起来。可能有思想顾虑，还不敢炮打司令部。我要求同志们解除思想顾虑，大胆起来贴我的大字报，向我开火。”

8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发表讲话：“现在正确的只有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各级组织有正确的，有错误的。你是正确的，为什么用‘正确’挡人家？你正确，人家也搞不掉你。你错误，人家搞掉你不是更正确吗？用‘正确’来作挡箭牌，实际就是不正确，我看就不

正确，真正正确就不怕揭嘛。”

8月25日，陶铸发表讲话：“省委可以反对，可以炮轰，可以炮轰中南局。包括我们在内都可以反对，只有毛主席不能反对，林彪同志是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我们拥护他，不能反对。我们这些人都是可以反对，省委为什么就不可以反对呢？湖北、湖南省委为什么不能反对呢？谁不革命，不但要反对，而且要打倒。把248门大炮对准市委、地委、省委、中南局开炮。你们回去讲，不革命就要开炮。”

同一天，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也发表讲话：“为什么不准别人怀疑省委？为什么不准别人怀疑市委？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如果你是革命的，就和广大革命师生站在一起干革命，如果你不革命，站在群众对面压制、镇压运动，就应该打倒。”

9月1日，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在讲话中说：“热烈欢迎炮打省委司令部，大胆怀疑省委的精神是彻底革命的精神。我是省委负责人之一，炮打司令部首先炮打我，其他人也可以。”

9月2日晨，中宣部副部长张平化在干部会上说：“我告诉你们，毛主席最近讲过这样的话：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满清政府镇压过学生运动，有好下场吗？北洋军阀镇压过学生运动有好下场吗？蒋介石镇压学生运动有好下场吗？北京大学的陆平镇压学生运动有好下场吗？清华大学的蒋南翔镇压学生运动有好下场吗？后来我们派出的工作组，又镇压学生运动，现在也没有好下场。当然，我们应该讲，主要是我们派工作组的人有责任。这个话我们应猛醒，不能当耳边风，主席这个话不听，你还要去镇压学生运动，你可以有自由，但我告诉你：你没有好下场！”“现在有些人对工人运动没有什么抵触，对农民运动也没有什么抵触。一看到学生运动，反感就大得很。这是什么道理呢？实际上这些人真正对工人、农民运动也还是不够认识的。所谓当时没有抵触，是因为那时没有革到自己头上来。有人讲过这个话，我认为有道理。说我们对于革别人的命，我们很勇敢，很坚决，什么地富反坏右，搞土地改革都很勇敢很坚决，搞四清很勇敢很坚决，为什么？因为是革别人的命。这次学生运动，文化大革命要革到自己头上来了，这下可难受了。于是就反对，就感到苦恼，就冒火了。冒了火怎么办？就压制，就镇压。”

社会主义这一关不是随随便便就好过的。光有革别人命的勇气，没有革自己命的勇气，不革掉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革掉自己的老爷作风，革掉自己的旧思想、旧习惯，没有这个勇气，是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的。为什么革命的青少年的革命彻底性比我们强？这里，我想还有一个道理，他们年青，生动活泼，旧思想比较少，旧习惯比较少。除了这个原因以外，我看他们包袱少，他们没有当官做老爷，没有那个臭架子。检查起来，我们当官做老爷的时间长了，臭架子大了，一革命，扫来扫去，扫到我们头上来了。如果没有这个决心，勇于把自己的错误、自己的缺点、自己的包袱、自己的丑恶东西甩掉，没有这个决心，是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的。而不解决这个问题，也不可能真正成为毛主席忠实的战士、忠实的学生。”

陈伯达在《文化大革命两个月来的总结》中说：“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斗争围绕着对群众的问题上。……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可是，提出错误路线的某些代表人，他们都是反对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他们在这个触及灵魂的大革命中把国民党的“训政”搬来了，他们把群众当阿斗，把自己当成诸葛亮”。

当时的通讯设备虽不像现在这样发达，但全国各地学生相互大串连，各院校在各地设有联络站，却弥补了通讯手段的不足。各种信息，特别是中央领导人和各省市主要领导人的讲话，会很快传播到各大专院校。

1966年8月3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第二次接见红卫兵以后，全国各大专院校师生开始进行大串连。各地师生大量涌入北京取经，而北京的学生则纷纷离京奔赴各地煽风点火。全国各地的少数派（后称造反派）红卫兵在毛主席《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启示下，纷纷起来炮轰当地的省、市委。而两报一刊则在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下，及时地发表社论给学生们的“炮轰”以指导。

10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七亿人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说：

无产阶级的敌人，继续在用各种方式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

们甚至打着“红旗”反红旗，欺骗和蒙蔽一部分群众，妄图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妄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对此，我们必须提高警惕，识破他们，并且要更加依靠群众，信任群众，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使敌人的阴谋，在广大群众日益觉悟的情况下，永远不能得逞。

另有一些人，他们对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至今还很不理解，对群众运动仍然是“怕”字当头。他们口头上也讲十六条，在行动上却离开十六条。他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搞宗派主义，利用广大群众对党和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制造一部分工农群众反对革命学生，造成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的一些局面。他们这样做，正好为无产阶级的敌人利用来浑水摸鱼。我们对这些人，本来是好心善意地希望他们改正错误。如果他们坚持不改，就会脱离人民，结果就必然滑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

1966年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指出：

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

对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必须彻底地批判。只有彻底批判它，肃清它的影响，才能贯彻执行无产阶级的十六条，才能在正确路线指导下进行社会上的、学校的以及其他文化部门的斗、批、改，才能明确斗什么，批什么，改什么，才能明确依靠谁来斗，谁来批，谁来改，才能胜利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如果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重复压制群众的错误，继续挑动学生斗学生，不解放过去受打击的革命群众，等等，那就是对抗和破坏十六条。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正确地进行斗批改呢？

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衷主义。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我们必须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而不能用形而上学的观点、庸人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

红旗杂志1966年第十四期社论《纪念我们的文化革命先驱鲁迅》

则进一步告诉造反的学生们说：

那些动不动就说我们“偏激”的人听着：对国内外的阶级敌人，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难道可以讲“恕道”吗？难道可以让他们有朝一日爬起来咬死革命者吗？

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搞折衷主义，实际上就是站到敌人一边。每当阶级斗争的紧要关头，折衷主义者总是出来大喊大叫，或者嘟嘟囔囔，然而，历史注定了他们扮演的是一个可悲的角色。

反动的围攻，锻炼出革命的左派，这是历史的辩证法。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左派同志都应该懂得这个道理，不怕曲折，不怕围攻，不怕孤立，自觉地在阶级斗争中千锤百炼，使自己成为坚强的革命战士。

对社会的新生事物的态度，是支持、不支持或者反对，这是革命、不革命或者反对革命的一个重要标志。

有了毛主席大字报的指引和党中央通过两报一刊的具体指导，加之前面所说的一些中央和地方领导人的讲话的支持，各地大专院校和中学的学生们，特别是少数派（后来的造反派）们纷纷组织起来向省市党委开炮。

那些思想敏锐、跟得上形势的领导们自然是积极欢迎学生们的“炮轰”，主动“引火烧身”，争取主动。但也有些领导不这样做，他们平时就是自以为是，自认为是一贯听毛主席的话、紧跟毛主席的。面对学生们的“炮轰”很不理解，甚至极为反感。正像张平化说的：“这次学生运动，文化大革命要革到自己头上来了，这下可难受了。于是就反对，就感到苦恼，就冒火了。冒了火怎么办？就压制，就镇压。”当时以张体学为首的湖北省委就是这样的一批领导人。

武汉地区学生造反派“炮轰”湖北省委，是从湖北省委大抓“南下一小撮”开始的，而所谓“南下一小撮”的代表人物应算是中国人民大学来汉串连的赵桂林同学。

8月28日前后，从北京来武汉串连的一些学生，原听说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搞得很好，准备在武汉呆一两天就去长沙。但一来到武汉就发现了一些问题，多数人认为湖北武汉地区的文革方向问题相当突出，因此他们留了下来，接着就发生了两件对武汉当时形势有着重要影响的事。

第一件事：8月31日下午，湖北大学文革筹召开了有省委主要领导

人参加的“欢迎外地来汉学生串连大会”。但大会上主持人极不民主，代表北京14个院校的代表没有被允许发言，而只能代表两三个人的北京航空学院学生杨小力却准予发言，而且杨小力是站在省委的立场上，在会上大骂其他南下同学。这就引起了多数与会者的强烈不满，很多人纷纷要求发言，会场秩序一下子就乱了起来。会议主持人只好同意要求发言的同学依次发言。但当人民大学的一个同学在发言中说到“今天的会不利于团结”后，张体学说南下同学诬蔑他，愤然离开了会场。

第二天，湖北日报报导了杨小力在大会上的发言，而湖北大学一些不赞同省委态度的学生却在会后被打成了“右派”。

第二件事：9月15日，湖北省委在洪山省委礼堂召开与外地来汉串连学生的协商会。会上，张体学说：“革命的实践证明：湖北省委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是一贯忠于毛泽东思想的，是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路线的”，为湖北省委定了调。

张省长的发言引起南下同学的不满，赵桂林等根据陶铸同志的“三点指示”要求张体学作检查，会场一时变得相当混乱。张体学面对激愤的学生束手无策，愤然说：“我代表湖北省委、代表武汉革命师生、代表湖北3700万人民控诉赵桂林！”赵桂林从此被打成了“右派”，一时成了武汉家喻户晓的人物。

我没有参加这次大会。9月22日，我院文革筹主席团主席黄仁传通过院广播台传达了这次大会的情况。黄仁传虽然是站在省委一边进行传达的，但我们从他的传达中仍可以了解这次大会的大概情况。下面是我听传达时的简要记录（日记原文）：

黄仁传：由于近来我们工作很忙，对省委的指示执行不力，接待工作（指接待外地来汉串连的学生）也作得不好。下面我就15日省委在洪山礼堂召开的和外地学生的协商会的情况进行传达。

我们的张体学省长热烈欢迎外地来汉的学生，他总是带头起立欢迎每一批进入会场的师生，并答应发给到会者每人一本湖北省委出版的《毛主席语录》。大会正要开始时，赵桂林进来了，张省长带头欢迎。

赵桂林进场后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今天开的是什么会呀？张体学同志没有直接回答他，只是说：我们的语录编得不好，没有经过中央的

审查。

赵桂林第一个发言。他提出了三个要求，第一，他要求在这次大会上传达陶铸同志就武汉问题的三点指示，要求张体学省长作检查。他说外地来的同学都应参加这次大会，说武汉地区也可派少数代表参加；第二，他要求给在这次运动中被打成“右派”的师生平反摘帽；第三，他要求省委宣布杨小力的所谓《驱逐令》作废并消除影响。

赵桂林说“湖北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情况介绍大会”的名字太长了，要求改为“湖北省委检查大会”，打着红旗反红旗是他赵桂林的一贯伎俩。

我们能不能答应给他们这些右派分子摘帽子？当然不能。那些黑七类被驱逐出湖北武汉有什么不应该？我认为完全应该！

这时赵桂林又提出为什么没有通知他们开会的地点和时间。在洪山会堂开会时，他们要在湖大开串连大会，还要省委派代表参加，张省长当即就派许道琦书记去参加了他们的会。

13日，到处都是他们的“号外”，说要张体学作检查，弄得满城风雨，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

这时赵桂林再次要求发言，全国各地来的代表不答应，会场上立刻轰动了起来。过了一会，哈工大的一个女同学冲上台要发言，要求赵桂林下来。

赵桂林又说到绝食问题，说绝食是伟大的创举。我立刻冲上去念了陶铸的电文，我每讲一句，全场都鼓起掌来。我念了一半，赵桂林就打断了我的讲话，说我传达的陶铸的讲话是假的，还说我是武汉代表，只代表十几个人。

会场一下子又乱了起来，他们上台抢麦克风要求发言，我们不给，就是不能给他们嘛。这是不是对他们进行压制呀？对他们我们就是要压制！

看到这种情况，张省长的眼泪都掉下来了。张体学同志为什么会哭呀？因为在这样的会上竟有人说他是黑五类。这中间赵桂林喊得最响，他最坏，我对他真的是恨得咬牙切齿！

这时会场的场面完全变了，变成了外地来的师生斗争我们本地少数人的会议。

张体学同志此时是忍无可忍，气愤地说：“我代表武汉400万和湖北省3700万人民控诉赵桂林。”

从黄仁传的传达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湖北省委当时并不是真心实意地欢迎南下同学来汉串连，只是迫于形势的压力，做做欢迎的样子而已，骨子里是不满南下师生的。从黄仁传传达时的用语和语气我们也可以看出，所谓“协商会”的气氛对南下师生不是欢迎而是压制的。

黄仁传在传达中说到的关于中央文革小组陶铸的“三点指示”，有两个完全不同的版本，一个是湖北省委传达的，另一个是少数派的北京联络站传回来的。

一、湖北省委传达的陶铸讲话（三条）：

1. 对湖北省委我们是比较了解的，是紧跟毛主席的，打倒湖北省委、打倒张体学的口号是错误的；
2. 不欢迎（南下同学）是错误的；
3. 湖北省的文化大革命是较好的，但目前是不是领导不得力，有骄傲自满的情绪。

二、联络站传回来的陶铸同志的讲话（三条）：

1. 由张体学同志公开向来汉同学作检查；
2. 由杨小力等写的所谓“紧急呼吁”收回作废；
3. 对王树成的讲话，湖北日报从正面写一篇社论承认错误。

从当时的形势和陶铸当时所担任的职务看，上面两个不同版本中，湖北省委传达的三条显然是不真实的。

9月15日省委“洪山会议的精神”通过各级党委在全省各单位、各部门传达后，湖北、武汉一个大抓“南下一小撮”的活动就迅速席卷开来。武汉大街小巷到处都在议论“南下一小撮”的问题。“湖北省委就是好”的大标语，驱逐外地学生的《驱逐令》，杨小力、宋要武写的传单（痛骂赵桂林他们的观点和做法），中国人民大学陈迅的声明《我坚决反对“炮打湖北省委”等口号》，谭立夫的讲话录音（鼓吹血统论），省委领导王树成9月4日的广播讲话（强调省委是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称“张省长的好儿女”的水院学生周宏的讲话录音“9月15日洪山大礼堂会议真相”等，在湖北全省、武汉三镇及各大专院校到处张

贴或播放。湖北省委为了动员群众对南下同学及武汉大专院校少数派的不满情绪，还专门组织了几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宣讲团”，到各单位作“忆苦思甜”报告。这些报告会名义上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实际上是利用群众对党的朴素阶级感情，激起对南下同学的不满情绪。在这种强烈的政治氛围中，外地学生和武汉支持南下同学的少数派不管走到哪里都会被围攻，被驱赶。

我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武汉其他大专院校少数派红卫兵是坚决站在南下同学一边炮轰省委的，因此和南下同学一样受到湖北省委的排斥和压制。

根据十六条，我们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华工总部和多数派的华工红卫兵师都是群众组织，应该享有同等的权利和地位。但事实上，湖北省委总是把我们少数派红卫兵看作另类，处处歧视我们。举个例子，9月28日，省委在洪山礼堂举行发放《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大会。会上，他们只发给多数派的大专院校红卫兵而不发给我们少数派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这种有意歧视我们的做法自然引起了大家强烈的不满。因此，我们当即就组织队伍游行到洪山省委所在地进行抗议，并由此引发了少数派红卫兵与多数派红卫兵的冲突。

“炮轰”是文革中的一个专用词，意思其实就是提意见或批判，是实行民主的一种形式。只不过方式上不是和风细雨，而往往是“急风暴雨”式的。当时的“炮轰省委”，就是批判省委执行的错误路线，并强烈要求改正。炮轰省委绝没有否定省委、打倒省委的含意。因为省委是共产党的一级组织，是代表党中央在本省执政的，当时不管哪个红卫兵组织都不可能想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炮轰”省委只是要求省委的领导放弃资产阶级路线而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事实上，当时我们对省委领导的个人历史并不了解，也无个人恩怨和利害冲突可言。就湖北武汉而言，我们当时“炮轰”的形式和内容不外乎就是上街游行，贴大字报、大标语，最激烈的形式就是用“静坐”、“绝食”的方式，要求省委主要领导出来接见群众并回答和解决问题。

在我的印象中，文革初期我院少数派直接针对湖北省委的“炮轰”行动主要有以下三次：

第一次是1966年8月23日持选票游行到省委抗议，表示我们绝不参加由院文革大会主席团（筹）指定候选人的假选举。我们反对由省委直接操纵的这种选举，要求省委落实十六条中关于文革权力机构“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这一精神。

第二次是1966年9月3日—4日声援南下同学在省委5号楼前进行了绝食斗争，强烈要求省委满足南下同学的正当要求。9月2日，南下及本市两千多同学根据武汉的文革情况，向省委提出了几个问题，要求张体学省长接见并回答问题，但张体学省长以“只支持左派，不支持右派”为由拒绝了同学们的正当要求。

第三次是1966年9月27日，即新华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成立的当天，我们游行到省委，在那里“坐冷板凳”，抗议省委组织武汉八大院校“左派”进驻我院以压制我院的少数派，同时显示我们这支新生力量的强大威力。

从以上的“炮轰”事件可以看出：我们新华工少数派的行动并不过分，错在湖北省委而不是少数派。就以第一次“炮轰”来说吧，如果当时湖北省委严格执行十六条规定的选举制，而不是包办代替，强行成立“院文革大会主席团”，那就不会有这次“炮轰”事件。十六条是中共中央通过并发布的，你张省长也是在会上举了手的，你为什么就不执行呢？你不执行，“炮轰”你有什么错？

由于中央的压力和学生们9、10月两个月来的“炮轰”，张体学终于在10月底和11月初，先后几次就文革以来的错误向南下同学和武汉少数派公开作了检查，承认了不欢迎南下同学、压制少数派等错误。

对张体学省长代表省委所做的检查，我们是不满意的。我们认为湖北省委的检查是迫于形势和革命群众的压力的产物，并不是他们真正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真正要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检查中的大部分内容实际上是以检查之名行辩护之实。但同时我们也认识到要让这些曾流血流汗打江山，平时高高在上的人向造反的“娃娃们”低下高贵的头，承认并改正错误是十分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不说在立场上，就是在感情上他们也转不过这个弯来。在感情上，他们自然是喜欢为自己唱赞歌，极力维护自己尊严，大叫“湖北省委就是好”的保守派，怎么会

喜欢专门找茬，“犯上作乱”的造反派？在中国，“唯上为大，唯上为尊”的传统文化理念是根深蒂固的，因此我们对张体学省长也不能太苛求。基于此认识，我们对张省长的检查还是欢迎的，认为不管怎么说，省长既然作了检查，说明我们造反取得了初步胜利。

1966年11月11日，我们《新华工革命造反战报》分别在第一版和第二版上发表了《评张体学省长的检查》和《湖北省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两篇文章。

在《湖北省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的文章中，我们列举了湖北省委文革以来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民主、压制群众的具体事例，说明了我们“炮轰”湖北省委不仅是正确的，而且也是必要的。

在《评张体学省长的检查》一文的最后，我们表达了对湖北省委的殷切希望：“我们要求你们触及自己的灵魂，不要怕痒，不要怕痛。共产党人应襟怀坦白，敢作敢当，不要怕‘脱裤子、割尾巴’，不要怕引火烧身。只有这样，你们才能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改正自己的错误，才能真正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彻底的决裂，真正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造就出一个红红通通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湖北省委。”

现在一些回忆文革的文章和文艺作品，都对造反派当年的“炮轰”省市委不遗余力地大加渲染，都说“炮轰省市委”就是“冲击省市委”，就是要打倒省市委的领导，并将当时省市委的瘫痪归罪于造反派的“炮轰”，这不符合历史事实。

事实上，文革初期的少数派（后称造反派）除对中央点名的干部进行了批斗外，没有随意批斗过任何省市委领导，更没有组织冲击、占领省市委领导机关。个别省市委领导的下马绝不是群众组织“炮轰”的结果，而是上级组织或中央直接“点名”的结果。就湖北、武汉市来说，文革中省市委领导干部的垮台没有一个是群众“炮轰”的结果。虽然在文革初期多数领导干部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但到1968年各级革委会成立时基本上都被“结合”进了领导班子，多数都“官复原职”了。至于说当时党组织的瘫痪，也绝不是因为“炮轰”的原因。就我所知，大专

文革篇

院校党委的瘫痪是省委派工作组的结果——工作组进院后即取代了院党委的领导，工作组撤离时也没有宣布恢复院党委的领导，而省市委最终瘫痪则是解放军三支两军的结果——1967年1月底以后，省市“支左办”实际上已取代了省市党委及政府的职能，上传下达，什么事都是军代表说了算。

第十五章 接管院广播台和出版科

接管院广播台和出版科是我院文革中的一件大事。它不仅标志着我院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地位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造反派已由少数派变成了多数派，成了我院文革的支配和主导的力量。同时也为我院造反派即将走出学校闹革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一、“多数派”和“少数派”的相互转换

通过9、10月关于资反路线的大辩论、大批判，我院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是造反派的队伍迅速壮大，另一方面是保守派的队伍迅速分化瓦解。

到1966年10月底，我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已经从成立时的700多人迅速发展到两千多人，加上继我们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华工总部后相继成立的“东方红红卫兵”“长征公社”“井冈山兵团”“教职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络总部”等造反组织，我院的造反派组织已发展到四千多人，几乎占了全院师生员工总数的40%以上。如果加上因各种原因没有参加任何群众组织，但表示支持造反派的师生员工，我们造反派的人数已超过全院师生总人数的60%以上，成了名副其实的多数派。

在此期间，我院的各级干部也纷纷起来参加造反派的队伍。其中168名干部自动组织起来成立了“新华工革命干部造反联络站”，全院副科级以上干部136人（其中党员116人），90%以上都加入了我们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华工总部。

而另一方面，以“华工大会主席团”为代表的保守派组织“华中工学院红卫兵师”及其外围组织“红卫团”则迅速分化瓦解。他们中的骨干分子有的因意见不同而各拉自己的山头，先后从“红卫兵师”中分离出来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其中较有影响的有“中南海”（多数是动力系的同学）、“乌兰牧骑”（主要是无线电系的同学）、“四野战军”等。而“华工红卫兵师”中的一般成员则纷纷脱离保守组织加入了造反派组织或成立自己的造反组织（如红旗红卫兵及战斗兵团、保卫毛主席红卫

兵及战斗兵团等)。当时“我要造反”“我要起义”的公告、大字报随处可见。我们的《造反先锋战报》就登载了机二系潘某的一篇《我要造反，我要起义》的文章。为了说明当时保守组织的同学脱离原组织参加造反组织的原因及背景，现全文抄录如下：

我要造反，我要起义

新华工机二系 206 班 潘××

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离开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维护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省委、工作组、院党委的奴隶，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了损失。我很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我心里感到非常的沉痛。

今年六月份，我院同学就开始大力揭发院党委，而我却默默不语，不敢发表自己的观点。有的同学说院党委是“三家村”的一个分号，是黑帮，我简直不敢想象。我想朱九思是“抗大”出来的，怎么会反党呢？我根本就不认为院党委存在什么问题。六月五日，朱九思开了全院师生员工代表大会以后，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群众运动给压下去了，给院党委贴大字报的同学受到了打击和围攻，当时我可在暗暗庆幸自己，幸亏没有给院党委贴大字报。

今年六月十一日，省委工作组进校以后，广大革命师生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炮轰院党委，而我却被革命的洪流冲得目瞪口呆，头昏眼花，不知如何是好，因为在我的头脑里装的都是党委正确，院党委是革命的，朱九思是信得过的。当时的革命洪流对学生中的基层干部也冲击得很厉害，我当时是班上的小干部，见了群众的这种冲动，我心里非常不安，我害怕孤立，害怕罢官，怕影响入党，但是我当时就没有想到怕不怕中国变颜色，怕不怕中国出修正主义，总的说来就是一个“私”字在我头脑中挂了帅。

后来工作组又把我重新扶上了台。接着，工作组来了一个镇压学生运动，大抓学生中的“右派”，扑灭革命的火焰，而我也做了一个得力的打手，这场革命烈火主要是通过我们这些人来扑灭的，我们当时借扫除运动阻力为名，整了一些同学，实际上是压制了一部分群众，使他们不敢讲话，不敢发表不同的意见，如果谁发表了不同的意见，起码是要

遭到围攻，甚至被打成反革命（如赵文成就是典型一例），真可谓白色恐怖浓矣！我在打击个别同志时，实际上是为了抬高自己，使自己的“官”保得住。

我当时在斗争中为什么那样“积极”呢？其一，奴隶思想造成的恶果。我认为省委工作组的领导是绝对正确的，因此，当时别人说工作组是毛主席派来的，我不但不反感，而且感到非常亲切。我从来不考虑工作组的方针、政策、方法是否正确，我只考虑如何把工作组的意图来执行好，贯彻好呢！

其二，既得利益者：工作组来后不久，把我这个奴隶，前怕狼，后怕虎的人扶上了台，使我重新又获得了领导权，因此，我当然对工作组的印象很好。谁对工作组提意见，我就起来顶住，以至后来根据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工作组要撤走了，我还对工作组念念不舍，很希望把他们留到我们学校做“三员”。

这些，其实就是个人主义思想在作怪，这种思想直到以后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时也还没有消除，甚至顽固地坚持。

今年八月初，一部分同志举起了批判工作组错误路线的大旗，而我却顽固地站在这个批判的对立面，阻止别人批判，企图想阻挡住革命的洪流。当时，我生怕说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同志们批判时举出若干事实我都承认，但就是不敢承认其错误的性质，一直到后来，张体学来我院作了一个折衷、调和的讲话后，我才跟着张体学转了一下，承认工作组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这时我才在口头上认输了，其实我心里对工作组犯了错误并没有一个深刻的认识，我很长一段时期内都认为当时抓“右派”是基本正确的，只不过是搞早了点。由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在我身上没有得到彻底的肃清，以至在后来的一个多月中，我对毛泽东思红卫兵的说法听不惯，作法看不惯，是一个“糟得很”派，而对省委的话听得惯，而且是毫不怀疑。当张体学讲的陶铸同志的三点指示和赵桂林等人讲的有本质的不同时，我毫不调查的就相信了湖北省委，而结果却是事实给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省委确实是欺骗了我，这时我才愿意高呼“打倒奴隶主义”的口号。这时我才开始觉醒，我才感到个人主义害死人，奴隶主义害死人。

当党中央发出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伟大号召时，我在思想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才开始慢慢地起了变化，才开始屈服，才开始投降。毛主席教导我们要随时准备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我要向真理投降。向真理屈服，就是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投降。因为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地方都违背了毛泽东思想，我应该勇敢地承认错误，认输。后来，由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组织勇敢而有力的批判，我带着问题学习了主席有关著作，学习十六条，使我一天天觉悟过来了，我深深地认识到我的问题的严重性，我在一段时间内离开了毛主席的路线，不但离开了，而且还对毛主席的路线有抵触，例如在撤销工作组的问题上就是这样。现在我再也不能做资产阶级的炮弹了。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我要听毛主席的话，我要起义！我要造反！

可能有人要问：“既然如此，那你为什么不早点退出大专院校红卫兵呢？”原因很简单，在我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了一定认识后，我就想从大专院校红卫兵内部来改造，使它变得革命起来。但是事态的发展使我非常失望，继续这样下去，对革命是很不利的。进一步学习了主席著作，特别是“老三篇”，学习了“十六条”以后，我的思想觉悟也得到很大提高，我决心去掉私心，打掉“我”字，丢掉“怕”字，敢于斗争。为了尽快地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现在郑重宣布：我从今天起退出大专院校红卫兵和原来参加的一切群众组织，一切从零开始，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革命精神万岁！

与我院的情况一样，武汉各大专院校的少数派（造反派）的力量也在迅速发展，除我们华工外，湖大、华农、武测、水院等院校的少数派都逐渐成了多数派。而由湖北省委控制的大专院校红卫兵则随着批资反路线的深入，省委被炮轰，他们的靠山不稳，底气不足，而迅速分化瓦解了。

当时，由省委组织、控制的大专院校红卫兵内部纷纷起来造反，如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所属华农红卫兵师的部分红卫兵分离出来成立了“反清洗临时联络站”，武大部分“9·12”红卫兵在大街上贴出大标语，

要“踢开武汉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自己闹革命”。武汉师范学院部分红卫兵在本院《革命造反报》上发表他们的《造反公告》，全文如下：

最高指示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造反公告

革命的同志们：

红卫兵战友们：

我们武汉师范学院原武汉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团庄严宣告：我们造反了！

我们不仅要造红卫兵师部的反，还要造武汉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的反，我们要造出一个红彤彤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武汉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我们造武汉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总指挥部的反，是因为它是湖北省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具。它的干部和红卫兵纠察不是由下而上民主选举的，而是从上到下包办指定的。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长年以来，完全控制在省委的手中，是省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具。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湖北省委继续利用总部来为维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冲锋陷阵，直到现在仍然在湖北省委镇压学生运动的打手“三员”的直接控制下。它根本不能代表我们大专院校红卫兵的革命意志，它是我们革命的绊脚石。这样的总部我们坚决不要，一定要彻底造它的反，把它彻底反掉。现在不反，更待何时？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深入发展，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了伟大胜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告破产，革命形势好得很！但是一小撮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并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在作最后的挣扎，还在以新的形式蒙蔽群众，企图进行反扑。我们要穷追猛打，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埋葬！我们要搬掉一切绊脚石，彻底闹革命！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

万岁！万万岁！

武汉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武汉师范学院革命造反团

二、强行接管院广播台

到10月中、下旬，我院造反派虽已成了多数派，但院内的行政、财、文大权却仍掌握在省委操纵控制下的大会主席团手中。最不能让造反派容忍的是院广播台在省委作了检查后，仍继续为省委的资反路线大唱赞歌。就此，我们曾多次向大会主席团进行交涉，提出院广播台应实行民主，广播台要播放不同的观点，要有不同的声音，要公平辩论的要求，但均遭到拒绝。

10月21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华工总部开会就广播台的问题进行讨论，决定由郭保安、刘玉民第二天上午继续和大会主席团协商共同领导和管理广播台的问题，如果协商不成，则联合其他造反派组织强行接管院广播台，并通过强行接管院广播台的行动来进一步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

10月22日上午，和大会主席团的协商会在图书馆二楼会议室举行。郭保安和刘玉民虽然费尽了口舌，但毫无结果。大会主席团的黄仁传等人都以“广播台是党的喉舌，不能交由群众组织领导”为名，拒绝我们参与广播台的领导和管理。

下午五点，聂年生、江林等人按计划去到广播台。他们先找到广播台值班台委龙海涛，要求播放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两篇稿件。不出所料，要求遭到拒绝。已经有所准备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得知消息后，立即冲上了广播台，并封锁了通往广播台的所有通道。

此时广播台正在播音。台委龙海涛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地向全院播放“严正声明”（现场记录）：

我代表台委会向全院宣布：以聂年生、江林为首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已经冲进了机房，并在机房大吵大闹，严重影响了我们的工作。对此，我们表示无比的愤恨，我们将追查他们的责任，到时候我们一定要清算他们。

红卫团的战士们，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已占领了我们的机房，对此，

我们感到无比悲痛。我们要游行到省委去。

我们广播台全体工作人员，大家是看得很清楚的，我们是努力的，我们是诚恳的，我们是不辞劳苦的。我们冲破一切障碍，想尽一切办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

同志们，我们在工作中是诚恳的，对毛主席是无比崇拜的。党把广播台的工作交给我们，我们一时一刻也没有离开毛泽东思想，在这次保卫广播台的斗争中，我们已尽到了我们的责任。……

听到广播后，不管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师生员工纷纷赶往广播台所在地南一楼，不一会南一楼就被围得水泄不通。

广播台内在辩论，南一楼楼外也在辩论，秩序一片大乱。

保守派的人想冲进广播台，但他们根本靠近不了南一楼，更莫说进广播台了，因为整个南一楼内外都已被造反派给封锁了。没有办法，他们只能在楼外对着广播台的窗口不停地向龙海涛挥着手，高喊：“坚持、坚持！”但由于他们的人数实在太少，可以说是势单力薄，坚持了约一小时后，他们只能无可奈何地散去了。

在广播台内，开始是辩论，后来就发展到相互推搡。

先是广播台内的工作人员多，进入台内的造反派人数少。工作人员将进去了的造反派一个一个向外推。但后来造反派的人进去的多了，于是就反了过来，造反派将广播台的工作人员一个一个朝外拉，经过近半个小时的拉扯，广播台的工作人员已全部被拉了出来。零时五十五分，广播台完全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所控制。

从聂年生、江林等人进入广播台到将广播台的人全部拉出来，持续了几个小时。所幸整个过程虽然出现拉扯推搡，但没有一个人受伤。

为了防止保守派来夺回广播台，造反派几十人在南一楼坚守了整整三天三夜。

我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华工总部的成员之一，原来又是广播台的工作人员，对广播台的人员和业务都比较熟悉，因此，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决定由我负责广播台今后的工作。

10月24日上午，我在广播台召开了第一次“新华工广播台”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与会者都是我在广播台期间的同事和老熟人，大家都很

兴奋，对办好广播台信心十足。

我首先宣布了新华工广播台工作人员名单和分工：

编辑组：朱尚贤（女）、王俊平（女）、吴贤杰、石湘云、吴崇高、陈茂政、邓继珍（女）、欧阳刚、孙建群。

播音组：陶丽娟（女）、刘正、林光明、叶启轩（女）、吴杏梅（女）、王能秀（女）、徐桂珍（女）、徐诗清。

机务组：齐纪萱、许坚、尹华林、徐兆斌、吴建英。

联络组（负责和各系各部门的联系和组稿）：罗明敏、焦顺昌、王洪金、邓少通。

文艺组：朱安娜、陈殊殊。

接着，我讲了当时大家都关心的三个问题：1. 我们为什么要接管广播台；2. 我们接管广播台的经过；3. 院大会主席团为了对抗造反派试图挑动工人斗学生。我介绍了主席团于10月22日晚在图书馆召开“秘密会议”的情况，主要是说主席团将发动我院的工人和我们对抗，膳食科的领导已决定叫食堂全部工人参加和学生的辩论。我还谈到了最近华工、华农、武测、钢院、武医等院校出现工人围攻学生造反派的事情。我特别强调了就在昨天发生的新动向：湖北医学院来了二三十个工人到我院，武汉重型机床厂来了三卡车六七十个工人，他们在我院发表演说，试图挑起事端，干预我院的文化大革命。我认为这都是相关院校的“文革委员会”“文革筹”组织、挑唆的结果，必须予以高度的警惕。

我发言后，与会人员进行热烈的讨论，并就今后如何办好广播台各自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当天下午四点，“新华工广播台”的呼号声第一次在我院响起（原来的呼号是“华中工学院广播台”）。第一次播音的稿件基本上都是由编辑组根据我的发言撰写的，包括《我们为什么要接管院广播台》《我们接管广播台的经过》《大会主席团挑动工人斗学生不得人心》等三篇稿件。同时播送了我院附属工厂“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指挥部”的稿件《紧急呼吁》，呼吁我院全体工人不要轻信大会主席团的谣言，不要轻易干预学生的革命行动。

我们的广播受到了广大师生员工的热烈欢迎和支持。正式开播后，

我们每天都会收到大量的来稿，其中有批判稿，有意见和建议，还有诗歌和散文，这为我们办好广播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三、接管院出版科和印刷厂（车间）

文革前我院出版科的职责主要是为教学印刷教材和讲义，下设拣字排版间和印刷车间。地址就在西七舍和第一教工食堂之间。

接管院出版科和印刷厂比接管广播台简单多了，接管过程几乎没有受到任何阻碍。

我们是通过辩论、协商的方法接管出版科和印刷厂的。

12月11日，我们在院出版科召开了一次辩论会。参加辩论会的有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的代表、大会主席团的代表、华工附属工厂的代表及出版科的全体干部、职工。我作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的代表参加了这次辩论会。

这次辩论会的主题是：出版科在停课搞文化大革命期间是否应为文革服务？

说是辩论会，其实根本就没有发生什么辩论，因为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即使是大会主席团的代表也认为在停课闹革命期间，出版科理所当然地应为文化大革命服务。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在这次“辩论会”即将结束时，出版科的全体干部职工一致要求加入我们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华工总部。这当然是我们所希望的。

就这样，出版科的员工都加入到了我们造反派的行列，由我们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华工总部接管院出版科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了。

接管院广播台和院出版科是我院文革中的一件大事。它不仅给我院的造反派以极大的鼓舞，而且从心理和事实上动摇了代表“正统”的大会主席团的权威。

从此，我们的宣传手段不但有了广播，而且有了印刷厂。

我院出版科在文革中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它不仅为我们印刷了《新华工》报和各种宣传资料，在1967年七二〇事件前，湖北日报好几期都是在我院出版科排版、印刷的呢！当然这是后话。

文革篇

我们在接管了院广播台后，很快就利用我院雄厚的设备储备和精干的骨干队伍在武汉各地区设立了“新华工广播台”的分台，为在全市范围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批判资反路线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新华工”是湖北、武汉第一个接管本单位广播台和印刷厂的造反派组织，这为我们加强宣传、扩大政治影响，以至后来成为湖北、武汉造反派的重要力量，成为“新派”之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第十六章 走出学校闹革命

一、文化大革命的重心从学校转到工厂、社会

到了1966年11月中旬，学生外出串连已达高潮。华工园内一时显得空空荡荡，偌大个校园内见不到几个人。同学们几乎都走光了，我们班就只剩下我一个。而且我也拿到了19日去长沙和27日去上海的火车票，随意挑选一处就可离校了。

为什么半个月前还是热热闹闹、轰轰烈烈的校园一下子会变得如此冷冷清清？原因很简单：毛主席、党中央大力提倡和支持大、中学生的革命大串连，希望通过学生们的大串连，充分发动群众以形成一股任何力量也无法抗拒的革命洪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从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北京和外地来京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以后，全国即掀起了革命师生大串连的高潮。到11月20日，到首都的外地师生和红卫兵达到九百万人。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毛主席和林彪等中央首长先后举行了八次盛大的接见红卫兵活动，大大地激发了广大师生们的革命热情。

随着资反路线被批判，原保守派的一些同学逐渐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失去了保省委、保院党委和工作组的热情。他们觉得与其留下来还不如趁大串连之机去全国各地走一趟。于是他们就结伴或乘车，或步行“长征”去了。当然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同学认为自己长期以来受“奴隶思想”的影响，上了当，受了骗，当了“保守派”丢了脸，于是他们就回到家乡或到别的地方去“造反”一番，就像北京一些在校当了“保守派”的同学到别处去“造反”那样。

造反派的同学也大部分走了。主要原因是在院内已没有了“对手”。“对手”都走光了，自己也就无事可做了。

我们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华工总部早在10月中旬就曾发出号召：“杀向社会！”此后，我们去全国各地、全省各专县建立联络站。到10月下旬，新华工的同学在北京、广州、成都、桂林、上海、长沙，湖北各专区甚至县都设立了“新华工联络站”。仅在武汉市区，我院毛泽东思想红卫

兵常驻省市委、政府及大型厂矿企业的联络站人员已达四五百人。他们在那里印传单、设广播、收集文革动态信息，去街道、工厂宣传和发动群众，支持造反。我院后来之所以成为湖北、武汉钢新两派中新派的“派首”，这些联络站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同学们都走了，但我最后还是没有走。我决定哪里也不去，就留在武汉。

我当时为什么不走呢？主要是当时看到了有关工人运动的信息，自认为工人运动方兴未艾，自己应投入到这场工人运动中去。从中学到大学，党就号召我们要到工农群众中去，要与工农相结合。当时我也深信：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不到工农群众中去与工农相结合，那会是一事无成的。

1966年11月16日这一天，中央有关领导在京分别发表讲话，支持工人参加文化大革命。中央文革小组戚本禹在北京军区后勤部礼堂接见全国各地工人代表时发表讲话，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在全总二楼会议室接见重庆市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代表并发表讲话，中央文革王力、戚本禹在帅府园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三百多上访职工并发表讲话。

11月17日，中央文革小组在接见首都工人代表时，王力宣读了中央《关于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意见（草稿）》，向在场工人征求意见。当时我看到的这个草稿全文如下：

关于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意见（草稿）¹

1.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人们的世界观，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革命。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挖掉修正主义根子，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使中国永不变色，从而大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工人阶级是领导力量，是最积极的因素，负有特别重大的责任。工矿企业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是大势所趋，好得很，是不能阻挡的。

2. 各级党委和厂矿领导要认真贯彻党中央、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绝不能因为群众一起来就害怕，要敢于叫群众批评工作中的缺点，绝不允许挑动工人斗工人，群众斗群众。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要打击、反对一小撮蜕化变质，忘本自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¹ 见新华工1966年12月编《中央首长讲话选编》第三集。

当权派。

3. 当前的问题，是各单位的负责人错误地把文化大革命和生产对立起来，有的以抓运动为借口，打击革命派，保护自己，还有的以抓生产为借口，压制革命，这两种都是错误的，都是不符合大局的。正如一个职工说的：“他们怕群众，怕罢官，怕撤职，就是不怕完不成生产任务”。

4. 应该充分认识并相信广大工人群众，他们既关心文化大革命运动，也关心生产。要充分估计工人阶级对国家的高度责任，一切不信任职工群众的观点，必须纠正。

5. 党中央号召各级党委必须按“十六条”积极到工人当中去，充分发动群众，充分商量，充分酝酿，充分讨论，使群众自觉地作到文化大革命与生产两不误，决不能犯包办代替的错误，凡把群众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

6. 许多工矿企业工人，都提出文化大革命和生产时间的问题。应给予适当的规定，如八小时的工作必须保证，每天3~4小时搞文化革命，不得占用生产时间，搞文化革命，还要注意休息。

7. 为着使抓革命、促生产顺利进行，必须配备两个班子，工厂文化革命的权力机关是文化革命筹委会、文革小组。文革委员会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实行全面选举制，不得包办，不得背后指使。这两个班子要做到不要随时撤换，因而冲乱生产。

原来党委和行政没有瘫痪的，应积极领导生产，原来已瘫痪的，可以由厂里的老工人为主，吸收优秀的技术人员，组成新的生产领导班子。

8.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工人有建立工人自己的组织的权利，一切革命的组织都要按“十六条”办事。组织内部、组织之间有不同意见，可以民主讨论，民主的争论，严防宗派主义、工团主义，不要因纠纷打架、停工，妨碍生产。

9. 工人的组织最好用联合会、协会、代表会议、代表大会的形式，名称要适合工人阶级的特点，一切工人组织，都应该按工人组织的勤劳朴素的本色，不要搞脱离工人阶级的机构，不要讲排场。工人组织内的工作人员，一般不要脱离生产。

10. 工人群众一定要坚守自己的生产岗位，顾大局，绝不能成群结队，

脱离生产去外地串连。顶岗位生产的半工半读学生，也要这样做。

11. 厂矿企业的工人组织，可以在业余时间到本市其他工矿、学校、机关参观学习、交流文化大革命经验。

12. 革命的学生组织，可以派代表去厂矿企业串连、交流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学生代表要去工厂时，应先与那里的工人组织取得联系，生产时间不要到车间去，不要到保密厂、保密车间去。

毛主席指示：“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青年学生应该逐步做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学习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切大中学生，要当小学生，虚心向工农群众学习，全心全意为工农群众服务。到工厂串连的代表，在统一安排下争取参加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严格遵守劳动纪律。

不知什么原因，这个草稿并没有形成正式文件，也未在报刊上见过相似的文件。但我肯定，这个文件是存在的，而且是经毛主席认可的。因为从这以后，全国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就在全中国开展起来了。武汉地区12月11日成立的工人保守派组织就用了草稿中提到的“联合会”一词作为自己组织的名称。

12月9日，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规定》解除了十六条中对工人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限制，承认工人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有权自由参加运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工人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12月14日，中央又发出《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规定农民有同工人、学生、机关干部同等的参加运动的权利。从此，文化大革命运动就从学生运动正式推广到了全国各个阶层。

从1966年10月底、11月初开始，武汉一些工厂的工人在学生运动的激励下就已纷纷起来投入了运动，有支持学生造反派的，也有支持学生中的保守派的。其中较有影响的单位有武汉重型机床厂、武汉锅炉厂、武汉钢铁公司、汉阳轧钢厂等，少数派工人已行动了起来，并酝酿成立他们自己的组织。

在学生造反派的支持下，造反派工人先后成立了工人总部（全称“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简称“工总”，成立于1966年

11月10日)、九一三(全称“毛泽东思想九一三战斗兵团”,简称“九一三”,成立于12月12日。以我国第二大钢都武汉钢铁公司造反派为主)、工造总司(全称“毛泽东思想红色造反者武汉地区革命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造总司”或“工造”,成立于12月25日)。他们当时都是工矿企业的“少数派”。而支持学生保守派的职工则成立了武汉地区革命职工联合会(成立于12月11日),是企事业单位的“多数派”。

二、组建新华工广播台汉口分台

11月14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华工总部召开会议讨论有关“杀向社会”后的工作问题。

我在这个会上发了言。下面是我当天的发言提纲(日记原文):

我认为工人阶级运动正在兴起,我们应毫不犹豫地投入到工人运动中去,我们工作的重点应放在城市。理由是:

1. 学生运动归根到底必将汇合到工农运动中去,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相结合。学生运动只有得到工农兵的同情、支持和参与才能成功,否则将一事无成。

2. 大民主的前提是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有民主。反过来,大民主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保证,没有大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巩固。目前我们的主要任务应该是进一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因为资反路线的危害首先是扼杀大民主,其危害首先是城市,尤其是大城市。

3. 武汉市各工矿企业、事业单位的少数派已经开始行动起来,但目前对他们来说还是文革的初期,一些单位、一些工厂、一些企事业单位目前对少数派的压力还很大,很多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至今尚未得到平反。他们非常需要我们的帮助和支援,当务之急是我们应该深入到他们之中去,了解他们的需求并援助他们。

4. 中央决定今冬搞步行(串连)试验,明年普遍推广。我们应争取这段时间把城市的工作做好,总结经验后带到农村去。

5. 因为12月20日以前外出串连的同学都要回来(中央有文件要求),我们应整理好相关资料贴出大字报,让外出的同学回校后能及时了解学

校和武汉的情况。在外出串连的同学中有相当一部分原是多数派的，在外面跑了一段时间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的观点将有所变化，这对我们来说是好事。

基于以上理由，我们应留下来，仍然将重点放在城市和学校。

在这个会上，我提议在汉口设立“新华工广播台汉口分台”。认为汉口人多，我们去那里设广播台必将产生重大政治影响。我的想法得到了多数与会人员的支持。会议还支持、鼓励设在各处的联络站都设立广播站以扩大我们的影响。

第二天上午，我就带了广播台的3个同学在汉口寻找建台地点。下午，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满意的地方——汉口长征绸布店（原名“江汉绸布公司”）。

我们进店找到了经理，说明了来意。经理对我们表示非常欢迎，满口答应了我们在店里建广播台的要求。她说店里职工都非常赞同我们新华工的观点，并佩服我们的造反精神，愿尽最大的努力为我们提供方便。除发给我们每个工作人员“长征绸布店”的徽章以便进出外，还同意让我们店里的职工食堂“搭伙”。随后她就领我们上了二楼，说是将二楼空余的房间全部给我们使用，并随即安排职工为我们腾房子，这让我们大喜过望。

长征绸布店在当时是汉口一家最大的绸布店。上下两层，砖木结构，一层用于营业，面积约两百平米，二层用作办公和仓库。

汉口绸布店地处汉口中山大道和江汉路的十字路口的西南角，北面是中山大道，东面是江汉路。从绸布店顺江汉路往南走五分钟就是当时湖北日报社和武汉晚报社所在地——红旗大楼，继续向南到武汉关轮渡码头也就几分钟的路程。

从华工去绸布店交通非常方便。出学校大门，在关山站乘15路公共汽车在汉阳门站下车，再坐从汉阳门码头到武汉关码头的轮渡，下船走十分钟就到长征绸布店了。

11月16日下午四点，我和院广播台的朱善贤等四人去市委联系在汉口江汉路设广播台的有关事宜。

接待我们的是一个叫胡群的五十多岁的男同志。我们说明了来意并

提出了四点要求：一、要房子，二、要导线，三、要喇叭，四、要一辆中吉普车把我们的广播器材从学校拉来。

老胡是一个机关“老油子”。他说话很客气，总是笑嘻嘻的。但一说到要东西的事就死活说没有，翻来覆去就是说：“不是我们不给，对你们宣传毛泽东思想我们理应全力支持，但我们市委确实是没有你们要的这些东西”。

磨蹭了半天，东西还是没有要着。我们只好一步一步往后退，一直谈到晚十一点。开始说房子我们不要了，我们自己找；没有办法，后来说喇叭、导线我们也不要了，只要求你派一辆车把我们的广播器材从学校拉到江汉路长征绸布店就好。

胡群同志这才爽快地答应了派一辆中吉普把我们送回学校，并把我们的广播器材及设备拉到绸布店来。

车子送我们回到学校后，我一方面安排人将设备、器材打包、装车，另一方面我立即骑了自行车把广播台机务组的同学从被窝里拉起来和我们一起去汉口。

当我们带着设备和器材回到长征绸布店时，已是17日凌晨的两点多钟了。

正当我们忙着卸车时，却看到湖北日报社那边聚集了上万人，好像是在辩论，我当时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到现场一了解，才知道原来就在我们去武汉市委文革接待站要广播器材的时候，我们新华工、新湖大、武测等院校和一些工厂的造反派联合起来造了湖北日报的反。他们冲进了红旗大楼并封闭了湖北日报，因而引起保守派的极大不满。当晚八时，几百名保守派的工人和红卫兵不顾劝阻冲进了红旗大楼要和造反派辩论。由于双方情绪激动而引发了相互推搡，我院有几个红卫兵在推搡中受了伤。直至凌晨四点，保守派的人才离开。

卸了车，我们都顾不得休息，负责机务的同学立即着手安装广播器材，调试设备。其他同学则开始清扫房间，布置办公室。我根据分台人员的配套要求，给院广播台值班人员打电话，要他们通知播音、采编的相关人员天亮后赶来汉口长征绸布店。

天亮后，我们即着手安装室外喇叭。为了配合红旗大楼那边的辩论，我决定先装沿江汉路的喇叭，后装中山大道方向的。我们的广播线从绸布店一直拉到了红旗大楼，每隔 100 米左右装一只 25W 的高音喇叭。而负责采编的同学则立即开始组稿、编辑，准备投入广播工作。

一直忙到下午两点，我们新华工广播台汉口分台的第一次播音正式开始，并立即投入关于湖北日报的大辩论中。

造反派封闭湖北日报并占领红旗大楼是武汉文革开始以来最具爆炸性的事件，因而立即引起了各阶层的广泛关注，并导致了武汉全市造反派和保守派关于湖北日报的大辩论。

22 日、24 日和 25 日，造反派先后三次在红旗大楼前召开万人批判大会，批判湖北日报文革以来为湖北省委推行资反路线摇旗呐喊的事实。25 日开会时正下着雨，气温很低，但人们都坚持站着听，这充分说明武汉人民对湖北日报社是非常关心的。会后造反派举行了大游行。

我们汉口分台现场转播了这三次辩论会的实况，并报导了大游行的相关消息。

这些天来保守派也起来“造反”了，和造反派唱起了对台戏。造反派造了湖北日报的反，他们则去造武汉晚报的反。他们也在造反派开会的同一个地点开了一个批判会，批判湖北省委执行了新的“资反路线”，说湖北省委对造反派封党报的行为反击不力，是从极右跳到了极左。

大辩论确实是发动群众的最好形式。通过辩论，人们不但可以了解事实的真相，明辨是非，而且引发人们去思考。在这几天中，每天都有上万的人来到江汉路红旗大楼，参与辩论或了解情况。

11 月 20 日，湖北省委迫于学生造反派的压力终于作出了《省委关于湖北日报在文化大革命的宣传中所犯严重错误的检讨》，承认指使报社拍摄学生造反活动照片、突出报道省委负责同志的活动和工作成绩等是错误的。

11 月 24 日，根据省委指示，湖北日报编辑部发出《关于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初步检查》，承认宣传报道中的一些错误。

武汉造反派封闭湖北日报 13 天后，即 11 月 29 日，我在我院驻红

旗大楼联络站的同学陪同下走进了红旗大楼。

红旗大楼虽然离我们汉口分台只有几百米的距离，但这是我第一次进到大楼来。这时大楼显得很平静，保守派的人没有来寻衅闹事。我从一楼（报社印刷厂）上到顶楼，看到二层上都住着来自各院校的造反派红卫兵，还有一些工人造反派也住进来了。他们有的躺在地铺上闲谈，有的在写标语、传单，也有的在争论什么。在红旗大楼“造反派联络站”，我院驻红旗大楼的负责人邱汉斌同学向我介绍了有关情况，其中说到了连日来保守派组织每天都有人来冲击红旗大楼的事。

我是坚决支持封闭湖北日报的。这不仅是因为自文革开始以来湖北日报一直在为资反路线和湖北省委唱赞歌，压制造反派，同时也觉得报社的记者、编辑们多数保守意识很强，甚至有些迂腐。对同学们在红旗大楼的坚定、坚持、坚守，我感慨颇多，当即赋诗两首赠与红旗大楼的同伴们：

（一）

滔滔扬子江，巍巍红旗楼。

英雄驱虎豹，为民争自由。

（二）

昔闻江汉报社楼，只见铁窗只见儒。

今日工农登大雅，红旗漫卷楚天舒。

由于我们是当天设备安装、调试，当天就组稿播音，显得非常仓促。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又要配合红旗大楼的大辩论，也没有来得及就我们台本身的问题进行安排和调整。直到11月22日上午，我才抽时间召开了第一次台务会议。

会议首先是明确了分工。采编：吴贤杰、朱启贵、朱尚贤（女）、夏和忠、赵显恕；机务：尹华林、齐纪萱；播音：林光明、丁琼玉（女），我负责全面工作。

在分工时，我特别强调了分工不等于分家，要齐心协力。要求人人都要搞接待，搞调查研究，人人都要写稿子。

接着我谈了当前形势对我们宣传工作的要求，强调了纪律。

当时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都希望自己能在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

斗争中一显身手，对办好汉口分台充满信心。

我们的新华工广播台汉口分台开播后，每天都将毛主席、党中央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中央首长接见各地群众的讲话，大家关心的发生在武汉的重大事件及焦点问题即时进行广播。因此经常有成千上万的群众聚集在江汉路和中山大道交会处听我们的广播。

我们汉口分台的影响日益增大，很快成了我们新华工乃至武汉造反派在汉口的一面旗帜，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

在我们得到造反派广泛支持的同时，也引起了保守派组织的恐慌。为了抵消我们的影响，他们就在我们汉口分台斜对面、中山大道上自来水公司的水塔内，建立了“华中工学院乌兰牧骑广播台”，与我们唱起了对台戏。

乌兰牧骑广播台是在我们新华工广播台汉口分台开播大概半个月后成立的。

文革中的宣传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那就是打“语录战”。不管是保守派还是造反派，都认为自己是忠实于毛泽东思想、都是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他们都会从毛主席著作或马列著作中找出相应的语录来加以论证。因此，在文革中就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宣传同一个事件，都引用毛主席的语录，但得出的却是两种截然相反的结论。

事实上，在那个年代，不管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或什么派都没有参加的人（主要是一些出身不好、以前挨过整而心有余悸的人，还有当时正在挨整的“当权派”），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是忠于毛主席的。这里说的“忠于”，不仅仅是说他们表面上的口头上的“忠于”，而是说他们从内心深处对毛主席都是极度虔诚和崇敬的。

要实现大民主，开展自由辩论是非常必要的。不同观点的人聚在一起唱对台戏（辩论），在文革期间是常有的事。

在与乌兰牧骑广播台的大辩论中，我们新华工广播台汉口分台始终占着上风。这是因为：

1. 我们的信息来源广泛且及时。我们新华工总部下设有一个专门收集信息的联络部，该部的职责就是即时收集和整理来自本省和全国各地

特别是北京的新华工联络站发回的信息，这些经整理的信息会及时地送到我们汉口分台来。而站在武汉职工联合会一边的乌兰牧骑广播台显然就没有这一有利条件了。

2. 我们当时占了“天时、地利、人和”。我们代表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得到中央和毛主席支持的造反派，自然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而乌兰牧骑广播台则是代表保守派的，保守派虽有省委的支持，但得不到中央的支持，因此也就得不到广大群众的支持。

3. 我们新华工广播台汉口分台虽然人不多，只有 10 个人，但这是一支团结、精干、高效、反应迅速、能战斗的集体。因为我们多数是原院广播台的成员，经过了专门训练，熟悉业务且责任心强，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高昂、饱满的政治热情。

面对我们强大的舆论压力，乌兰牧骑广播台的同行们不久后就沉不住气了，他们开始耍起了小聪明。12 月 15 日和 17 日晚他们先后将我们汉口分台的三个高音喇叭给偷了，而且把他们原来安装在水塔上的四个 25W 高音喇叭转移到了中山大道街面上来了，其中一个就装在了我们播音室的对面，严重地影响了我们的正常播音。

对此下三滥的行为大家都非常生气。有人主张去砸了乌兰牧骑广播台，但我没有同意。我认为他们这样做说明他们沉不住气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要给他们略施一点压力，他们就会心虚了。18 日上午，我们通过广播和大字报向他们提出了抗议，佯称我们已查清了他们广播台的具体位置，如不拆除安装在我们播音室对面的喇叭，我们将采取相应的行动。这一着还真管用，他们真以为我们知道了他们广播台的秘密位置，怕造反派们把他们的广播台给砸了，于是，当天晚上他们就乖乖地拆除了安装在我们播音室对面的喇叭。

为了加强我们汉口分台的宣传力度，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央的政策和武汉发生的一些事件的真相，我们于 1 月 6 日在红卫 13 号、红卫 16 号过江轮渡上设立了广播站。轮渡上的工人对我们很热情，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二十中的几个女生主动报名当了我们的播音员，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当时我们的汉口分台既是一个宣传队，也是一个联络站，每天都有

很多群众来台里向我们反映情况、提供新闻线索和素材。有的群众还直接给我们送来稿件，要求我们播送。正由于我们能广泛地接触群众，我们的信息也就更加灵通，这既能使我们及时了解运动的动态，也能了解社会各阶层的一些心理状况。

有两件事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第一件事是我在无意中结识了一位老红军。

一天，一个叫黄兰亭的工人来到我们广播台找到我，他说他认识的一个叫王盛荣的老红军想见见我们，问我想不想去见见。我说当然想见见了，特别是想听听老革命的意见。接着，我问了这位老红军的基本情况。他说这个老红军是长征到延安，从南打到北，从东打到西，经历南征北战的老革命，还说王盛荣老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届中革军委委员。

能见到一个老红军，我自然很高兴。我将这个情况告诉了我们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的负责人郭保安，他说要和我一起去拜访这位老红军。

11月24日下午，我和郭保安在黄兰亭师傅的带领下，拜访了这位老红军。

王老住在汉口一栋两层楼里，有独门院子，院子里收拾得非常整洁。他见我们来看望他非常高兴，热情地把我们领到他的书房，勤务员为我们上了茶水。

我们进行了约两个小时的谈话。

他开始详细地问了我们新华工的情况，我们如实地作了回答。接着他说他支持我们新华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并赞成我们占领红旗大楼的行动。他希望我们要注意斗争策略，要注意团结大多数。他认为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把王任重揪出来，希望我们在今后的宣传工作中将重点转移到批走资派王任重上来。

王老是一个很健谈的老人。他因枪伤失去一条腿、安上假肢，现走起路来有些跛。但看上去他的身体很好，红光满面的。我对这个老人的印象很好。

1969年王老被污蔑为以我院鲁礼安为首的“北、决、扬”的后台，并被投入监狱，吃尽了苦头，这是后话。

第二件让我印象深刻的事是对武汉第一色织布厂的雨夜采访。

前面说了，我曾要求分台的每一个人在完成本职岗位工作的情况下都要接待来访者，都要自己动手写稿子，我作为分台的负责人当然也不能例外。

1966年12月24日晚10点，有人用电话告诉我说武汉一色织布厂发生了“武斗”，还伤了人。我立即带了分台的两个采编人员骑着自行车前往调查。

一色织布厂在汉阳，离我们汉口分台较远。出了市区后，郊区的路很不好走，路面坑坑洼洼。因没有路灯，我们只能凭借远处居民家中透出的微弱灯光前行。倒霉的是我骑的自行车今天不知怎么啦，老是掉链，走一会就得下来弄链条。周围又找不到修理的地方，连一把扳手也找不到，真是狼狈极了。

在离一色织布厂还有几里路时，老天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泥泞的马路不一会就成了一条小河，路边的高压线因大雨不时放电，强烈的电火花伴随着骇人的爆裂声，令人不寒而栗。

路是根本不能再走了，因为已完全看不出哪是路哪是水田了。

不一会，我们已是周身湿透，在深冬凛冽的寒风中一个个冻得瑟瑟发抖。

没有办法，我们一行三人只好停下来找地方躲雨。

还好，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有一处灯光。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来到有灯光的地方，仔细一看，原来是生产队的一间办公室，这时里面正有几个人在谈论着什么。

听说我们是新华工的学生，是来了解一色织布厂的事时，房子里的人立即把我们让到了屋内，并拿来了一盆火叫我们先烤烤衣服。

在谈到一色织布厂的事时，他们说不怎么清楚，只是听人说那里现已由解放军戒严了，不准任何人进去了。

我们只好作罢。待雨稍小一点后，我们告别了老乡，原路返回。

凌晨两点半，我们回到了江汉路长征绸布店，也顾不上洗漱，就钻进被窝睡觉了。

为了弄清事实的真相，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又骑着自行车前往一色织

布厂。

通过实地调查和走访，我们了解到事件经过是这样的：

12月初，武汉第一色织布厂“工造”的造反派发现了厂原工作组整理了群众的黑材料。《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及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反复强调各种整群众的材料必须“当众焚毁”，“不许隐瞒，不许转移，不许复制、不许私自处理”，造反派据此要求工作组立即交出这些黑材料，但遭到拒绝。于是造反派就决定硬抢。但他们在厂内是少数派，要硬抢又觉得力量不够，于是就在12月23日这天请来外单位“工造”的人帮忙。

一方要求交出黑材料，另一方则死护着不给。在相互争抢中，该厂女档案员林焕运突然倒地猝死了。

人命关天，法院、公安局、医院都即时介入了调查。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林焕运因心脏病突发死亡，属意外事故，希望双方妥善处理好善后。

调查回来后我们立即写了调查报告，并通过广播和传单向市民报导了我们的调查情况，使广大群众了解了第一色织布厂林焕运事件的真相。

当时整个武汉市的文化运动中，还没有发生过两派武斗的情况。两派在辩论时虽经常会言词激烈地互相指责甚至推搡，但都还是坚持“文斗”，绝没有打人的现象，更不用说将人打死了。

我们的调查报告是真实可靠的。职工联合会的头头们为了显示自己的实力，扩大影响，坚决不同意公安机关和医务人员的结论，硬说林焕运是被造反派工人打死的。但他们这样做不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使职工联合会处于被动的状态中。

我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华工总部成员之一，但自组建新华工广播电台汉口分台后，总部的工作我就基本上没有参与了，除总部有重大问题需要开会通知我参加外，我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汉口分台的工作上了。直到1967年1月底我院造反派实现了大联合，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司令部（新华工）”（简称“红司”），我又成了红司司令部的一员。因司令部一再催促我回校履职，我才于2月中旬从汉口回到学校。按司令部的分工，我被安排在宣传部当副部长，主管院广播台和院文艺宣传队。

我回校后不久，根据3月7日中共中央《关于大专院校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草案）》的要求，我们的汉口分台于3月19日正式撤离了汉口长征绸布店，“新华工广播台汉口分台”就此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我从1966年11月16日“走出学校闹革命”，在汉口建立汉口分台，到撤离汉口分台重新回到学校，总共124天。在这一百多天的日子里，我和汉口分台的同学们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我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了以下文字：

3月19日 天气：阴有雨

汉口分台今天撤离。

上午8点，我去院事务科车队要了一辆卡车去接汉口分台的同学回校。9点，我们汉口分台的全体同学在依恋中离开了长征绸布店。一路上同学们都有说有笑，“新华工广播台汉口分台”的大旗在迎风招展，汉口分台的呼号声仿佛还在耳边回响。四个多月了，这是多么不寻常的几个月啊！

三、批判王任重

1966年12月以后，武汉文革的形势发展很快，造反派与保守派的斗争也日趋激烈。

为了应对迅速发展的形势，12月10日，总部派往各地野战兵团的负责人根据总部的通知陆续回到了学校。11日晚和12日整天，我们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在院内召开会议，请他们报告各自所在地的运动情况，以便决定我们下一步的方针和工作重点。

我参加了这两天的会议。听了各地回来的负责人汇报的情况，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问题：

1. 保守派的队伍正在迅速集结，武汉地区革命职工联合会将作最后一搏，他们很有可能在近期内有大的动作，我们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2. 很多单位少数派受压的现象依然存在。个别地方现在还有人被打成“反革命”，因此，必须继续猛批资反路线。

3. 一些地方的造反派有极左趋向，政策性很差。他们经常胡批乱斗，

以至把一些受蒙蔽的群众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

4. 造反派内部已经出现分歧，这种分歧有继续升级的趋向。

大家就下一步我们的方针和重点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基本上统一了认识，即我们的方针是团结大多数，反对极左。我们既要注意团结曾经受过蒙蔽的群众，更要努力实现造反派内部的团结。我们下一步工作的重点仍然是批判资反路线，批判资反路线在湖北的总代表王任重，通过批资反路线团结更多的群众。

在这次会议上我也发了言。根据我了解的情况，我重点讲了在宣传工作中要特别注意团结广大受蒙蔽群众的问题。我认为这关系到是否能团结大多数夺取最后胜利的关键。

这次会议开得很及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后来形势的发展证明，总部当时对形势的分析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文革前，王任重是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是在湖北、武汉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疯狂镇压群众的“元勋”。1966年12月27日，工总、工造、九一三、新华工、二司、新湖大、三司等十几个组织组成斗争王任重指挥部，于1967年元月1日、2日和4日分别在新华路体育场、中山公园召开揭发批判王任重大会，会后都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声讨王任重在湖北、武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

揭发、批判的主要事实是：

1. 早在1966年4月18日，湖北省委就向武汉大学派出了全国第一个教育革命工作组。4月25日，王任重在湖北省委会议上说：“由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着文化教育界，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目标要针对知识分子。文革的结果之一，就是要查出占总数5%—10%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知识分子，把他们定为右派。”

2. 1966年6月6日，王任重的儿子王三宝（初中三年级学生）在武昌实验中学贴出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字报。大字报说，“武汉市的中学教职员中有40%出身为剥削阶级家庭，学校主要领导人出身不好的达到48%”。武汉大学工作组认为王三宝的大字报是“关于文革运动如何开展的内部口径”。

3. 6月8日，王任重提出把1957年《湖北省委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

几点意见》作为当前运动的指导文件。

4. 在王任重的直接指挥下，湖北省委在武汉市的几个重点大学内定性了一系列所谓的“反革命事件”，其中湖北大学“6·20”事件就是典型例子。王任重公然号召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一小撮反党反社会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知识分子”，在全省范围开展“反右”总动员，直接对抗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在短短的37天内，华工就划出了383名“右派”，华中师院被斗的有300多人，建筑工程学校全校总共500人，逮捕了18人。湖大第一批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学生11名，政治系教工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的14名，被点名批判、即将被打成“右派”的学生40多名；凡是给湖大校党委、省委工作组提过意见、写过大字报的都成了重点批判对象。

5. 王任重不仅在大学里大抓“右派”，还在中学里大抓“右派”和“反革命”。王任重说：“中学生的右派分子，是指那些流氓学生，这样的人要立即逮捕法办”。据省委书记许道琦后来揭发说，在1966年6、7月间，全省中学生至少被逮捕了190人，大的十四五岁，小的十三岁，多数是给领导写过大字报的。

6. 1966年6月28日，王任重起草了《目前文化大革命形势和我们的建议》，强调派工作组的作用和在知识分子、群众中抓右派的重要性。王任重认为：“多数学校都像水利电力学院类型，左、右派在争夺领导权。目前要着重研究解决这一类型的单位，暴露牛鬼蛇神，彻底批倒、批臭右派分子。”提出用“擒贼先擒王，枪打出头鸟”的方针指导全省运动。

王任重的这份在普通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中抓右派的“建议”，被在京主持工作的刘、邓、陶转批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作为开展文化革命运动的指导性文件。

7. 6月3日，武汉大学工作组开始批判李达、朱劭天（前党委书记）、何定华（副校长）“三家村”反党集团，在武大划出了27名“黑帮分子”，内部掌控的91名；武汉大学13名省委常委中9人被定为“黑帮分子”，在1222名教职员中227名被公开划为“黑帮分子”。

8. 运动初期武汉全市有400余人（学生159人）以“反抗、破坏文化大革命”罪被逮捕。王任重于7月6日省委常委会上定下抓右派的指

标：在武汉市文化界作为右派分子打击的不超过 3%，干部和学生不超过 1%—2%¹。

大会发言者以亲身经历和铁的事实，揭露和控诉了以王任重为首的湖北省委在文革中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大地激发了广大造反派的斗志，同时也以事实教育和唤醒了受蒙蔽的广大群众。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文革结束以后，那些疯狂反文革的走资派们及既得利益者们却将王任重这些资反路线的代表人物“整人”的罪恶都归罪于造反派，归罪于毛主席，这真是瞒天过海，何其毒也！

四、昙花一现的“职工联合会”

为了抗衡造反派的巨大压力，以宋侃夫为首的武汉市委经过多次酝酿，决定组织一支自己的队伍。经市委组织部辛甫的直接组织策划，“武汉地区革命职工联合会”终于在 1966 年 12 月 11 日正式成立了。在原党政体系、工会系统的动员下，很多不知底细的干部群众纷纷参加，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职工联合会就发展到 40 万人。

职工联合会的一号头头是崔景德（武汉重型机床厂技校电工，曾任四清工作队队员），常委是杨庭峰、崔景德、张立华、何其华、冯正湖、张良久、周德明、张用久、汪大榜。办公地点就设在汉口万松园路的武汉市总工会里。

职工联合会的成员主要是那些支持湖北省委、武汉市委的工人、干部。

职工联合会成立的宗旨是保湖北省委，保武汉市委，与以工总为首的工人造反派组织抗衡。

职工联合会成立之初的声势确实不小，但好景不长。成立两个多月后的 2 月 20 日，职工联合会主要负责人之一杨庭峰在武汉体育馆召开大会，宣布解散武汉职工联合会，并亲自砸掉了职工联合会的公章、撕毁了旗帜。作为一个全市性的群众组织，就这样昙花一现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1 关于王任重文革初期言行的记述，参见王广宇《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的一些资料》（载电子刊物《记忆》2011 年第 2 期）、《湖北省委的资产阶级路线必须彻底批判》（载 1966 年 11 月 10 日新华工《革命造反战报》）。

职工联合会解散以后，其成员中的多数人加入工造，另一部分则加入工总。一些坚定分子则纷纷转入地下，准备再战，这些人也就是后来“百万雄师”的骨干分子。

一个号称四十万之众、为官方支持的群众组织，何以在两个多月后就土崩瓦解了呢？

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职工联合会逆潮流而动。

当时的潮流是什么呢？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中央文革旗帜鲜明地支持造反派，支持批判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当时，不管是中央文件还是两报一刊都是将造反派看成是左派，而将参加保守派的群众称为“受蒙蔽的群众”。“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口号被普遍接受并成为风气。

职工联合会在这种形势下成立并以保省、市委为宗旨，本身就违背了“天时”，是逆潮流而动。

职工联合会的昙花一现当然也与他们的决策人犯下的一个接一个的错误有关。

他们犯下的第一个错误是搞罢工。

1967年1月4日下午，职工联合会以要求上北京告状为由在武昌南站拦截北去的火车，导致京广线中断6个多小时。6日，他们又组织公共汽车、电车工人罢工，造成了武汉全市严重的交通瘫痪。这是文革以来武汉从未出现过的严重扰乱交通、破坏生产的事件。

他们犯的第二个严重错误是把矛头直接对准造反派。

1月5日晚至6日凌晨，职工联合会包围了省委11号楼和13号楼，与工总、九一三队员及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发生严重冲突。他们用砖头、木棒等乱打，同时还袭击了我们新华工设在省委的广播站，造成了流血事件。在这次事件中，数十名造反派工人、学生被打伤，制造了武汉自文革来的第一次武斗。

他们犯的第三个错误是试图成立全国性的“职工联合会”。

中央在关于工矿企业职工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文件中明确规定工人不要成立全国性的群众组织，但他们还是去北京搞串连，试图成立全国性的“职工联合会”。其结果自然是遭到中央的反对，去北京的头头们一

回到武汉就被公安机关给抓起来了。

第四个错误是借林焕运之死搞万人大游行。

林焕运之死本来是一个意外，而且公安机关、法院也有了结论。但职工联合会的头头们却想借此向造反派发起挑战并向省市委施压。

12月25日，职工联合会在武汉举行了万人大游行，抗议造反派“打死”林焕运。更惹众怒的是，有人将林焕运的遗像与毛主席的画像并列抬着，走在游行队伍前。

职工联合会头头们接二连三的错误不仅极大地刺激了造反派，引起了造反派的强烈反弹，而且也失去了广大普通民众的信任，从而决定了职工联合会迅速土崩瓦解。它的命运只能是昙花一现。

第十七章 造反派夺权与造反派分裂

1966年1月6日，上海造反派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表了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并号召全国学习上海造反派的经验。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上海各造反派组织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在“编者按”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认为“一月风暴”是“今年展开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一个伟大开端”，号召“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自下而上地夺权”。2月5日上海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23日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1967年1月上海的夺权，当时称为“一月革命”或“一月风暴”。

一、武汉造反派夺权

随着全市性保守组织职工联合会瓦解，造反派除在组织上迅速膨胀外，士气也随之高涨。在上海“一月风暴”的鼓舞下，武汉各单位的造反派也开始从当权派手中夺权。

到1967年1月底2月初，武汉大多数单位的造反派根据中央的精神，夺了本单位或本系统的政、财、文权。

1月16日，继湖北日报和武汉晚报造反派夺权后，工总电信分部接管了市电信局。

1月17日，工造井冈山兵团夺了市机电局的权。市银行红尖兵等造反派组织接管了市银行系统。

1月18日凌晨三点，新华工配合公安厅内毛泽东思想战斗兵团和红战士，夺了省公安厅的权。

当晚，张体学省长派张华、吕汉荣等到红色造反大楼（武昌阅马场红楼，武昌起义时湖北军政府所在地）与工总、九一三、二司、红工兵、红教工等组织商谈有关省市夺权及联合办公问题。

到1月20日左右，相继夺权的还有市总工会、省科委、市邮局、湖北人民出版社、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江汉学报社、市教育局、团

市委、省文联等。许多厅、局、公司、部门和厂矿企业的造反派都实现了夺权。

1月20日，工总、九一三、工造、三新、红工兵、红教工、二司等二十几个造反组织及外地赴汉学生五十多万人，分别在汉口人民公园、武昌体育场、青山等地集会，并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表示坚决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

晚上，工总、工造、红工兵、二司、新华工、新湖大、红教工、北航红旗驻汉联络站、西军电临委驻汉联络站、南下造反大队等十一个组织在武昌红楼开会，商讨成立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总司令部（或总指挥部）等问题。

1967年1月21日，我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东方红红卫兵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团、长征公社、教职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络总部等五个造反组织统一成立了我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司令部，简称红司（新华工），并夺了华工的权。不久，另一个以我院附属工厂工人为主体的造反组织“红工兵”也宣布加入红色造反司令部。这样，红司的成员就达到了五千八百多人，占全院总人数的百分之六十，成了全院唯一的有权威的造反组织。

此时，武汉市各级党组织及各级政府都已基本瘫痪。工、农、商、学各系统、各单位都是在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运作，社会各阶层都是根据中央文件、两报一刊的社论和文章行事。今天的人们也许难以置信，这段时期社会基本稳定，未出现大的动乱，人们的生产、生活也基本上是正常的。

当时各单位（企事业、学校、机关等）的大联合和夺权都比较顺利，可以说基本上没有受到本单位或本系统当权派的反抗和抵制。

但到夺省、市党政大权时问题就来了。首先是造反派各组织之间出现了大的矛盾冲突，致使“11·8”省公安厅夺权、“1·26”省委夺权和“1·27”市委夺权都宣告失败。

1月25日，武汉各造反派组织开会，决定联合起来成立“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并通过了总司令部《宣言》，选出筹委会常委7人。其中工总、工造、九一三、红工兵、二司、新华工、三

司各一人。

总司令部下设三个小组：抓革命、促生产小组，省、市委夺权小组，总司令部办公室。三个小组当天就分别开了会，研究了下一步工作。

1月26日上午，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召开会议，商讨夺省、市委权事宜。会上通过了《夺权公告》和《向毛主席的致敬电》等。

下午6点，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在洪山礼堂召开夺省委权大会，工总代表担任执行主席。会上宣读了《夺权公告》《第一号通令》《向毛主席的致敬电》并宣誓。宣布夺权后，举行了大游行。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于当晚22点15分报道了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夺省委权的消息，并播发了《夺权公告》。

当天，湖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省长张体学代表省委、省政府通电湖北全省各市、专区、县，要求各地各级党政领导承认这一夺权。

1月27日凌晨，工造等造反派组织夺了市委的权，也发表了《夺权公告》和《第一号通令》。

至此，省、市委的权都被造反派夺了。按理说夺权公告播了，张省长也承认了，造反派的“夺权”应该说就算成功了。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就在26日的当天晚上11点左右，工总、二司却“通令”湖北日报和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不准登载和广播《夺权公告》，并宣布这次夺权无效。

1月27日，工总、九一三、二司、红工兵、红教工等五个组织发表《联合声明》，宣布“1·26夺权”无效，并要求立即解散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夺省、市委的权之所以失败，有外部的因素，也有内部的因素。

外部因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 此时中央尚未出台夺省、市一级政权的具体方针、政策及相关程序等（事实上当时中央文革和毛主席也还没有既定的方式和方法，两个“三结合”即革命干部、解放军、群众代表三结合和“老、中、青”三结合是当年3月后才逐渐明确的）。正因为这样，中央对这次造反派宣布的夺权未作正式的表态。中央不表态，就意味着此次夺权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受到质疑。

2. 原体制内的党政领导人绝不愿轻易地交出权力和他们的既得利益。迫于当时的形势，他们虽作出了某种程度上的让步（如张体学省长通电全省承认造反派的夺权），但在他们的骨子里是痛恨造反派的，因而他们也就必然会利用他们在政治经验和组织能力上的优势和造反派进行顽强的斗争。当时他们故意装出一副“无能为力”的可怜相，实际上是故意甩挑子罢工，使行政机关瘫痪，让社会运转失控，从而将责任推给造反派。

内部因素主要是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 参与夺权的造反派头头们缺乏政治经验。

造反派的头头们都是在反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过程中脱颖而出的，虽说这些人都是有一定的政治意识、对政治反应较敏锐且有一定组织领导能力的优秀分子，但他们此前都处在社会的最底层，直接接触政治博弈还是第一次，而且历练的时间也还太短，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经验。工人中的头头从站出来造反到夺权也就是一两个月的时间。学生造反派的头头虽然造反经历要长一些，但从1966年8月算起，也只不过半年时间而已。

不管是工人中的造反派头头还是学生中的造反派头头，在现实的政治斗争中他们都缺乏必要的艰难困苦的历练和磨砺。因此，可以说他们没有任何政治经验可言，在这场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显得幼稚就是很自然的了。

2. 匆忙夺权，没有进行必要的思想和组织准备。

武汉各造反派组织25日才联合成立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26日上午总司令部才开始讨论夺权的问题，当晚就匆忙把权夺了，真还有点像小孩“过家家”一般，把本是艰难、复杂的夺权问题简单化了，有的人甚至认为只要把大印控制在手就算是夺权了。

3. 没有形成有权威的领导核心，内讧在所难免。

各造反派组织都是在批判资反路线的短短几个月内成立的。他们的大方向和主要观点虽然一致，但他们成立的先后、人员素质、成员多寡、所处环境和诉求等却有所不同。当时各造反派组织就像一座座山头，各有各的地盘，各有各的环境和风格，甚至各有各的走向。正是由于时间

短促，又缺少相互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所以在面临夺省、市委权这样的重大问题，就很难做到统一意志、统一步调、协同作战了。

二、造反派形成两派

武汉地区的造反派在1·26夺权前夕已形成两派。

一派除工总、九一三、二司外，还有红卫军、红教工、红工兵等。

另一派除三新外，还有工造、赤总工二司、红工、新一冶、长办联司、二机床厂八一七、安装公司红色革命敢死队等；中学造反派除参加二司、三司外，也有参加新华工、新湖大的。

两派之间的矛盾和摩擦其实早在1966年12月初就初见端倪了。在12月10日我们新华工司令部的会议上，就已明确地提出了造反派内部正在发生、发展的矛盾及如何应对的问题。

我们和二司、工总之间的矛盾开始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方法、策略上的不同，二是如何评价几个月来各造反派组织的业绩问题。到了1967年1月下旬，两派之间的矛盾就主要体现在由谁主持夺权和夺权后“席位”怎么分配的问题上来了。

毛主席历来强调要团结大多数。我们认为在任何情况下，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要取得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团结干部和群众的绝大多数不仅是方法、策略问题，而且也是根本宗旨问题。因此，我们欢迎受蒙蔽的群众退出保守组织后加入到造反派组织中来，同时欢迎各级干部支持造反派。

在这方面二司和工总的头头们却显得太“左”，甚至有些过分。当保守组织职工联合会分崩离析即将瓦解时，其成员多数要求参加造反派组织，而工总一些分部却将其拒之门外，说他们是“老保”，致使大部分职工联合会成员心里憋屈。

当时工总和二司的一些人热衷于以势压人。最典型的做法是职工联合会一开会，他们就去捣乱、就去冲，就去砸。他们还将参加过保守派组织的大小头头和偏向保守派组织的干部搞“游街示众”。当时我们汉口分台所在的中山大道上，我们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一车一车的参加过保守派的人被游街示众，有的还被戴上了高帽子，挂上“铁杆老保”、“走

资派”的牌子。由于被游街的人多了，好多被游街的人根本就不在乎了，甚至在车上微笑着面对看热闹的人们。

工总和二司的这种做法我们认为是方向、路线的错误，打击面太大了。而他们却认为自己完全正确，不但不检讨自己的行为，反而以此为荣。他们觉得他们这样做才是真正的左派，认为我们是“右倾机会主义”，是“托派”。

如何认识和评价几个月来造反派的成绩问题是我和二司矛盾的另一焦点。

1966年12月，三新、二司、三司联合在武汉展览馆举办了一个大型展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展览的主题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览的主要内容是武汉造反派自文革开始以来和资反路线作斗争并取得伟大胜利的图片 and 资料。

这个展览本来办得很好，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支持和欢迎。但突然有一天人们发现一夜之间展览的内容全部被“刷新”了，凡有关三新、三司的内容被撤销，展览变成了二司和工总的文革成就展览，二司和工总成了湖北、武汉批判资反路线的唯一主角，而三新、工造等只不过是武汉文革的配角罢了。

二司的这种做法显然违背了客观的历史事实，因而引起了三新等广大造反派的极大不满和愤慨。就在展览内容被“刷新”后没有几天，愤怒的新华农的一些造反派就将“刷新”后的展览给砸了。

展览的“刷新”和被砸导致了我们的三新和二司之间的公开大辩论，摩擦迅速升级。

因为一个“权”字，大联合根本搞不起来。两派几乎在所有重大问题上谈不拢，尿不到一个壶里。新生的湖北日报本来是由报社内部造反派和三新、工总、二司、三司等共同主持办的。但到元月下旬，由于两派意见的分歧，常常引起纠纷。没有办法，最后不得不协商达成一致：各组织调到湖北日报社的工作人员从2月3日起全部退出，由报社内部造反派组织“捍卫毛主席路线总部”全权主办。

12月以后，一些工矿企业的正常生产受到了一些影响，而造反派内部却因意见分歧而难以成立共同的“抓革命、促生产”指挥机构，只好

两派各自成立自己的“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负责各自控制范围内的促生产工作。

由工总、九一三、红工兵、二司、红教工、新闻战士等十三个组织组成了一个“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而由工造、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等44个组织则成立了“湖北省红色造反派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两个指挥部都分别发出了《紧急呼吁》，呼吁工人、农民、财贸战线职工及各厅、局机关干部立即行动起来，“抓革命、促生产”，“打退反革命的经济主义”。

1月9日，由工总首先发起，邀请了十三个在武汉有影响的造反派组织开会（实际参加的有四十多个组织），商量造反派大联合的问题。与会者都同意实现联合，并起草和通过了《武汉造反派联合指挥部告武汉全市人民书》。这次会议还把向省、市委夺权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这是武汉造反派的第一次大联合，但签字后没几天，这次大联合就散伙了。

就在工总、二司准备搞第二次大联合、成立“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时候，工造等十一个造反派组织却在汉口又成立了一个“武汉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在1月26日由工总、二司组织的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会议上，工造代表在会上散发了铅印的以工造为首的十一个组织联名的《公告》，坚持要把在汉口成立的“总司令部”与武昌成立的“总司令部”并列。在这次会议上工造代表首先提出“工人总部的头头修了”“二司我们信不过”，还有工造代表甚至提出“有他（工总、二司）无我，有我无他，我们水火不相容！”。首都南下造反大队也公开说：“工人总部的头头修了，工总队伍严重不纯，战斗队员应该起来造反”，并喊出了“砸烂工人总部”的口号。会议开得乱哄哄的。后来有人提出要“从大局出发，求同存异”，各方的代表才勉强又坐下来继续开会。最后在二司同意不进入常委的情况下，会议才通过了《夺权公告》。

为什么工造会有人说和工总、二司“水火不容”呢？这主要还是因为不同意工总和二司当时的一些极左、分裂主义的错误做法。

首先是工总和二司总是以造反派的老大自居，自认他们是武汉的霸

主，因此，夺权、掌权非他们莫属。他们认为联合必须以他们为“核心”，夺权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去夺，其他组织要夺权必须得到他们的认可才有效，否则他们就不承认。

进入1967年1月以后，他们几乎在所有方面排斥另一派，特别是排斥我们新华工。到1月底，凡他们的人占多数的单位，我们新华工的联络站几乎全被赶走了。

但当夺权一开始，他们似乎突然发现事情并非如他们原来的愿望，用工总、二司某些人的话来说就是：“实权实际上都被他们夺了，我们成了‘花架子’。”所以，他们也就根本不顾自己的面子，断然宣布“1·26夺权无效”。

就在我们新华工搞的省公安厅“1·18夺权”后几天，1月27日工总和二司等组织了一批人成立了一个“湖北省公安厅夺权委员会”，夺了我们1月18日刚夺过的权。二司还电告在各地、县的联络站，要求他们立即返汉参加武汉的夺权，直言如回来晚了权就全被三新、工造等夺完了。

1月29日，我们红司司令部在学校召开通报会，郭保安通报了以下几方面的情况：

1. 原21个单位筹备省、市夺权，由7个单位组成常委。与会者很多人提出我们新华工要有一个常委，但工人总部反应激烈。第二次会议有人提出把二司常委名额拉下来，二司就说是我们新华工操纵的，说我们只代表一个学校。针对二司代表的发言，有人在会上公开说“谁反对新华工就砸烂谁的狗头”。

2. 关于北京联络站和长沙联络站问题，二司说要建立联络站应征得他们的同意。关于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问题，二司说目前不要揪，说不是时候。

3. 关于二司发电报的问题：前几天二司下发了一个通知，说武汉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权已被新华工、三司夺了，要求下面的战斗队员立即返回武汉。二司大批人将陆续回汉参加夺权。

4. 在省计委，二司说我们独揽大权，威胁要把我们新华工的人游街，说水利厅、计委都是我们这一派掌权了。

5. 关于公安厅夺权问题：我们夺了省公安厅的权，九一三等组织也参加了。但实际上权是我们夺的，因此，工人总部要夺我们的权。二司说我们是保皇派，要我们滚蛋。前天，他们说我们冒充公安厅人员把他们的人绑架了，当我们把事情讲清楚后他们才走了。前天晚上，二司（商校）又围攻了我们，但现权还在我们手上。

6. 二司、工总砸了省委机要室，抢走了大量材料。

7. 目前武汉的存粮只能吃到2月份，蔬菜是从北京运来的。煤球郊区人买走了，进入了私人市场。

8. 现中央军委鉴于美帝妄图在北部湾进攻越南，蒋介石妄图进犯大陆，决定七个军区不搞文化大革命，其中就包括武汉军区。因此，我们不要去干扰军队。

会上大家都对目前的形势表示忧虑。一方面是国际形势不容乐观，二是造反派内部因夺权而起的矛盾有愈演愈烈之势。

所幸中央对当时造反派在夺权中出现的问题有所发觉，并及时地通过两报一刊针对造反派中的极左趋向发表文章予以纠正，并要求造反派进行整风。

元月28日，人民日报用红字标题登载毛主席《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引导各革命群众组织及其负责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克服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个人主义、流氓主义、盲动主义等资产阶级思潮。

元月30日人民日报社论《关键在于大联合》指出：在夺权问题上产生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阻力，阻力来源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旧的社会习惯势力。同时又指出：有些组织中存在着风头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有些革命造反者身上还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极端民主化和非组织观点等妨碍大联合的错误思想。社论还指出：只有真正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才能胜利地展开夺权斗争。

元月31日，红旗杂志第三期发表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社论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这是大方向。一切革命同志，考虑和处理一切

问题，都必须从这个大方向出发，都必须服从这个大方向。

根据中央的精神，各造反派组织都开始内部整风。整风的主要内容是学习两报一刊的社论，结合当时大联合和夺权的实际，批极左，“斗私”。

当时的“批左”，主要是批“唯我独左”“山头主义”“无政府主义”，目的是实现革命派的大联合，团结广大群众，特别是要团结参加过保守派的群众。而“斗私”就是自我批评，检查自己的私心杂念和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言论和行为。

我除参加红司（新华工）司令部的整风外，还负责新华工广播台和宣传队的整风。整风通常是以民主生活会的形式进行。

在这次整风学习中，我们的一个主要话题是：是否对二司和工总近期的言行公开表态？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司令部一直争论不休，犹豫不决。多数人主张立即表态，认为新华工对武汉的文化革命负有举足轻重的责任，应该在目前这种严重的情况下立即公开表态，明确表明我们对工总、二司近期所作所为的反对态度，以遏制其在错误路线上的越走越远。而另一些人则认为目前不宜表态，认为二司、工总和我们之间的矛盾还不是路线之争，认为我们一旦公开表态，势必造成武汉的大乱，他们主张还是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直到2月4日司令部才最后决定先对二司进行表态，但在正式表态前必须先组织一个调查小组对二司司令部成员的情况作进一步的调查。

就在我们成立调查小组着手调查二司的情况时，事态发生了突变。2月8日，工总和二司等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即“二八声明”），各造反派组织的这次整风因此夭折，武汉以至整个湖北省的文化大革命也因此出现重大转折。

三、“二八声明”

2月4日晚，工总、九一三、二司等组织负责人开会，151部队“红总”的张智华参加了会议，而且在会上发了言。他说：“目前，出现一股批评你们、反对你们的风气，在这个时候他们大搞左派是极端错误的。你们现在很被动，整天赔礼道歉，现在不是整风检查的时候。对武汉部

队我们是有看法的。他们是不是真正支持你们？目前你们四面受敌，你们面临四大敌人，四大矛盾：省委、军区、保皇派、机会主义。”他的话引起了与会者的共鸣。工总、九一三当即宣布不再整风。

张智华的这次讲话成了二八声明的指导思想。

由二司水利电力学院井冈山兵团宣传部长雷志茂负责起草的《关于武汉当前局势的声明》2月7日定稿，2月8日（这天正值1967年除夕），长江日报在头版刊登了这个声明。

二八声明对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有着重大影响。它的发表不仅加速了武汉造反派的分裂，而且为旧体制中的反文革势力制造了反击造反派的契机，同时也使工总等受到重创。

由于二八声明对武汉文革的重要影响，现全文转载如下：

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

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处在一个激剧斗争的过渡阶段。以王任重、张体学为首的湖北黑省委更加疯狂地刮起经济主义的妖风，极力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他们转入地下，躲到幕后，驱动喽罗，勾结一切牛鬼蛇神，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阵线内部制造反对派，扶植托洛茨基主义及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分子，实行腐蚀侵袭，软硬兼施，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内外夹攻，挑起混战。最近，正当“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伟大革命运动席卷全国全省的时候，而以武汉地区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的某些人为首，却把矛头对准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他们充当了湖北黑省委的别动队，起到了“职工联合会”所不能起的作用。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进行无理攻击，否认其革命大方向，公开挑起分裂和混战，这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反扑。他们还拼凑了一个乌七八糟的大杂烩，策划了一个形“左”实右的假夺权。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认为有必要就目前局势发表声明。

武汉地区目前所发生的围攻工人总部、猛轰“九·一三”战斗兵团及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反革命事件不是偶然的。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现在，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以王任重、

张体学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混蛋退居幕后，操纵一些所谓“造反”组织，以“革命”之名，行反革命之实。

毛主席教导我们：“决不可以认为反革命力量顺从我们了，…他们的反革命思想和反革命企图就不存在了。决不是这样。”他们决不甘心失败，他们必然地要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

这种斗争的新形势新特点，就是王任重、张体学利用其爪牙走狗和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伙同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他一切牛鬼蛇神，相互呼应打入革命造反派内部，配合各种机会主义分子，利用个人主义的野心家及一些忘记阶级斗争，忘记为党夺权的糊涂虫，马大哈，还骗取一些不明真相的革命群众，纠集了一个围剿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大杂烩，他们从去年十月份开始，就逐步结成了托派小联合，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

一个非常荒唐的事情发生了，一种值得人们深省的严重情况出现了。那些在标语、广告和喇叭里叫喊反对经济主义，叫喊“抓革命，促生产”叫得最响的人，他们本身就是王任重、张体学用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豢养的哈叭狗，它在“职工联合会”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疯狗落水后跳了出来。就是这帮东西，对泛滥经济主义，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罪魁祸首王任重、张体学不揭露，不批判，不斗争，不采取行动。反而架起一百二十门大炮，猛轰工人总部，猛轰“九·一三”，搞什么反对工人总部的“经济主义”，妄图把工人总部整垮，妄图把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联合、大夺权的斗争，把反对湖北黑省委的经济主义，把“抓革命，促生产”的当务之急，引向革命群众之间的纠纷。他们到处乱跑，到处乱说，到处乱写。极力造谣、污蔑、中伤工人总部，胡说什么工人总部的领导集团“修”了，扬言与工人总部誓不两立，有我无你。北京南下中有一小撮坏蛋与北京“联合行动委员会”的家伙们互相呼应，狂妄地叫嚣要砸烂工人总部。真是欺人太甚，猖狂至极！他们已经撕下脸皮，公开同以王任重、张体学为首的湖北黑省委，同以武汉“职工联合会”为首的保皇党徒坐在一起。他们还公然叫嚷，要我们搞什么全民“整风”，叫我们下台。见你们的鬼去吧！收起你们的破烂！目前，我们在以

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下所开展的整风运动，应当是按照“古田决议”的精神，学习毛泽东思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纠正各种错误思想，健全各级领导班子，组织好革命造反派队伍，更高举起“造反有理”大旗，大闹武汉三镇，大闹全湖北，而决不是整天赔礼道歉，决不是纠缠于繁琐辟谣，决不是整掉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更不能允许那些口蜜腹剑的家伙妄图把我们整得萎靡不振，垂头丧气，置我于被动，轰我们下台。谁敢这样干，就把他揪出来，砸烂他的狗头！更值得注意的是，有极少数半路出家的投机商，或中途打入革命造反派营垒的那些坏东西，现在把手伸得老长老长，纠集一帮乌合之众，排斥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分裂革命造反派阵营。他们居心险恶，把大印一抢，名曰“联合夺权”。然后，恬不知耻地摆出一副“革命造反”的祖师爷的架势，对我们呵斥道：“不准动，不准你们争权夺利！不准你们闹分裂！”啊呀呀，好一副神气姿态！我们呼吁一切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同志们，千万不要上当。我们决不为个人和小集闭争权夺利，但是，我们要为毛主席，为党，为人民誓死夺权！目前发生的一系列情况集中到一点，就是王任重、张体学通过他们的“造反”奸贼对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反夺权。我们能允许他们这样干吗？不能，绝对不能！我们在白色恐怖和反革命的围攻中杀出来，就是为了夺权。今天，我们更要乘胜前进，以百倍的造反精神夺权！夺权！！夺权！！

我们最最伟大的革命导师毛主席在《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一文中曾经严肃地，全面地，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统一论，就是全国人民的统一论。就是一切有良心的人的统一论。这种统一论是以抗战、团结、进步三件事做基础的。只有进步才能团结，只有团结才能抗日，只有进步团结抗日才能统一。这就是我们的统一论，这就是真统一论，这就是合理的统一论，这就是实际的统一论。那种假统一论，不合理的统一论，形式主义的统一论，乃是亡国的统一论，乃是丧尽天良的统一论。他们要把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消灭，要把一切地方的抗日力量消灭，以便统一于国民党。这是阴谋，这是借统一之名，行专制之实，挂了统一这个羊头，卖他们的一党专制的狗肉，死皮赖脸，乱吹一顿，不识人间有羞耻事。”毛主席提出的这条方针就

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统一论，就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总纲领，就是我们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建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

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必须注意，不要因为有人指责我们争权夺利就缩手缩脚，不要因为有人咒骂我们想独揽大权就心怯手软。每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应当明确，我们决不能把“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同资产阶级的篡夺领导、争权夺利混为一谈。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及其追随者看来，他们的“夺权”就是看谁的手脚快，心眼多，抢得大印的便是王，抢不到大印的靠边站。他们企图把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拉向反面，为资产阶级复辟效劳。他们的“夺权”，不是为了把资产阶级当权派斗倒、斗臭、斗垮，而是为了维护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统治；或者为了他们自己爬上台，建立复辟资本主义的新机构。他们夺权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老子说了算，挥“权”如儿戏，发号施令，登报扬名，滥印传单，愚弄人民。当前，在他们策划分裂造成混战的假夺权阴谋的流毒下，致使经济主义泛滥成灾，生产几陷瘫痪。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同他们完全相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是毛主席革命路线最忠实的执行者，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要当仁不让地夺权，掌权。在这个问题上千万不能缩手缩脚，不能心软，不能有半点的折中和调和。有人叫嚷说我们“野心大”，公然咒骂我们“纯血统”，“手伸得长”，“老子天下第一”，“大国沙文主义”等等。我们认为，凡是出自敌意的攻击，我们就要坚决还击！但是，来自同志的善意批评，我们就要虚心接受；那些挂着“革命造反派”的招牌，推行机会主义，实行托派路线的混蛋们，野心大得很，手伸得长得很。因此，我们的“野心”还要再大些，我们的手还要伸的再长些，否则，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就要灭亡！这是极其残酷的阶级斗争，不能有丝毫的庸人观点，不然，脑袋被别人搬了家自己还不知道。值得注意的是，这几天来，“九·一三”战斗兵团正遭到托派疯狂的围攻和内部瓦解，这是以王任重、张体学为首的阶级敌人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新反扑！这就是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阶级敌人惯于声东击西，妄图各个击破。他们在开黑会，整材料，

千方百计挖我们的墙脚。我们必须高度警惕，严重注意。对托洛茨基派必须全线反击、迎头拼杀。

在目前的形势下，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要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要采取果断的决策和具体措施，高举“抓革命、促生产”，“反对经济主义”的大旗，高举“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大旗，向托洛茨基主义及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发动总反击，大清算，在斗争中不断壮大左派，团结群众，争取多数，孤立顽固势力，建立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向以王任重、张体学为首的湖北黑省委发动全面的总攻击，自下而上地大夺权。

当前，湖北省武汉地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不深不透，反革命经济主义泛滥还十分严重；尽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努力下，正在扭转局势，开始掀起抓革命、促生产的高潮，但是湖北省的大联合、大夺权还面临着托派的大分裂、假夺权的威胁。总之，湖北省武汉地区还没有乱透、还没有大乱。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要紧急动员起来，行动起来，牢牢掌握住斗争的大方向，决不要陷入反革命的分裂混战。我们就是要把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白色恐怖下的闯劲拿出来，把我们在反革命围攻中的造反精神发扬光大。丢掉幻想，投入战斗，在四面围攻、内外夹击的战场上，看准方向，杀出一条血路来！

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特乱，乱深、乱透。我们要继续大造反、特造反，一反到底！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子弹上膛，刺刀上枪，朝着以王任重、张体学为首的湖北黑省委冲啊！

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工人总部

毛泽东思想“九·一三”战斗兵团

后字二四八部队红色造反野战军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

毛泽东思想红卫军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委员会

毛泽东思想红工兵湖北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

毛泽东思想红教工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

毛泽东思想红教工武汉中等学校革命造反总部

《长江日报》毛主席路线战斗兵团

北航红旗战斗队驻汉联络站

西安军电(临)驻汉联络站

哈军工红色造反团驻汉联络组

一九六七年二月七日

二八声明的发表立即引起了两派的大辩论。支持二八声明的以工总、二司、九一三为首的组织说二八声明好得很，是“大香花”，“香飘万里”。而反对二八声明的以三新和工造为首的一派组织则认为二八声明是“大毒草”，是极左思潮的集中体现，必须坚决反对。武汉地区的造反派就此公开分裂为两派，在围绕二八声明展开大辩论这一时期称为“香花派”和“毒草派”。

在我们看来，二八声明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首先，这个声明将矛头直指兄弟组织，并公开点了工造的名，把三新打成所谓的“托派”，并扬言要“向托洛茨基主义及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发动总反击，大清算”。其结果是两派之间的矛盾和摩擦迅速升级为公开的内战了。当时文革的大方向是大联合，向走资派夺权，建立革委会，使全国的局势逐步稳定下来。而二八声明却提出：当前要“向托洛茨基主义及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发动总反击，大清算”，“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特乱，乱深、乱透”。这就完全背离了毛主席的联合、夺权、稳定的战略部署。

2月9日，长江日报继发表二八声明后又发表了社论《让革命的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并声明长江日报要毫不含糊地为大喊大叫。此后一段时间，长江日报登了不少赞颂二八声明的文章。

此后，“香花”“毒草”两派互砸广播台、联络站、总部办公室的现象频繁发生。

2月10日，我代表新华工去汉口二七俱乐部参加一个造反派组织会议，会议一直开到第二天凌晨4点才结束。因离我们汉口分台较远，此时又没有公交车了，我只好在二七车站候车室打了一个盹，天亮后才往回走。当我回到汉口分台时，一进门就听说我们的汉口分台被二司机械学院总部的人给砸了，而且抢走了分台的喇叭和部分广播设备。当天上午，我带了两个人去了武汉展览馆，看了武展被砸的现场，并和二司的

工作人员就我们汉口分台被砸展开了辩论。

我们的汉口分台是公认的造反派的一面旗帜，二司机械学院总部砸我们的汉口分台显然毫无道理可言。因此，在辩论中他们经常被问得理屈词穷，哑口无言。

我们的汉口分台被砸事件在造反派内部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人们纷纷指责二司的错误行径。在强大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二司机械学院总部不得不敲锣打鼓将抢走的广播器材给我们送了回来，并赔礼道歉。当然这是一个多月后的事了。

2月11日上午，在红教工、红工兵等组织的配合下，二司的人把“毒草派”全部赶出了红旗大楼。

2月13日，湖北日报以《打倒分裂主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为题发表社论，首评二八声明。社论说：“二八声明是一株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大毒草，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大联合大夺权阶段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扑”。此社论的发表拉开了轰轰烈烈的批判二八声明的序幕。紧接着，湖北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这篇社论，同时播送了该台评论员批判二八声明的文章。

2月15日下午，工造总司、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南下造反大队、省委机关革司等组织数万人在武汉体育场举行批判二八声明大会。

2月16日，湖北日报以《不许转移斗争大方向》为题发表社论，再评二八声明。社论说：鼓吹分裂主义的二八声明，实际上是为阶级敌人的反夺权鸣锣开道，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冲锋号。湖北日报还同时发表了湖北人民广播电台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起来，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兼评〈长江日报〉二月八日〈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

二八声明的发表使江汉路再次回到去年11月封湖北日报时的那种场面，成千上万的人拥向江汉路、红旗大楼参加辩论，只不过那时是“造反派”对“保守派”，而此时是“造反派”对“造反派”。我们汉口分台很自然地再次卷入大辩论的漩涡中。

2月18日，武汉部队发表“严正声明”，公开反对二八声明。

2月19日至月底，两派都各自组织了大规模的游行。一方喊“二八声明是大毒草”，另一方则呼“二八声明是大香花”。街上的大标语、大字报空前地多，晚上到处是辩论的人群，尤其是江汉路一带的辩论持续到深夜两三点。二司和工总的广播站每天都在拼命播放《就义歌》《坐牢算什么》《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等歌曲。

2月20至22日，二司首届红代会在水院图书馆大楼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数百名代表。这次会议再次肯定了二八声明，认为武汉军区内一小撮走资派和省市委走资派相互勾结，对造反派搞拉一派、打一派，企图搞垮工总、二司。

2月21日，长江日报社毛主席路线战斗兵团部分成员发表“郑重声明”，“反戈一击”，承认二八声明是“大毒草”。

这天，工造、三新、三司、省直革司等数万人在新华路体育场召开“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会上通过了《告全省人民书》，会后举行了游行。

2月22日长江日报发表工总、九一三、二司、红工兵、红教工等四十二个组织共同签署的近三万字的文章《无产阶级夺权和资产阶级反夺权的生死决战》。而湖北日报也在同一天发表了社论《绝不能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三评二八声明。

2月23日，红旗杂志第四期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发表。社论指出：在大联合夺权过程中，干部是关键问题。同时指出：对当权派，不作阶级分析，一概怀疑，一概排斥，一概打倒，是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潮。对于犯错误的干部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这就告诉造反派，夺权不是群众组织一方的事情，必须有干部参加。因此，解放干部已明确地提到了造反派组织的议事日程上来。

23日这天，因担心红旗大楼随时可能被解放军接管，香花派数万人云集红旗大楼前，挤满了江汉路。汉剧院、话剧院等文艺团体的造反派轮流为红旗大楼的守卫者作慰问演出，整整闹了一个通宵，24日晚上也是如此。

2月24日，湖北日报刊登湖北人民广播电台评论员文章《冲破阻力，打倒“私”字，迅速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大夺权》。

25日，湖北日报发表社论《当心走向自己的反面——四评长江日报二八声明》。

这天下午，近二万名二司成员在武汉展览馆举行“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和中央文革誓师大会”。会后举行游行，游行队伍高唱林彪语录歌《要敢于牺牲》，高呼“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我们想念毛主席”等口号，也喊了“向忠于毛主席的解放军学习，向忠于毛主席的解放军致敬”的口号。

26日，工总、二司等又举行了同样规模的集会游行，参加人数达十几万。工总很多分部给红旗大楼送红旗，大楼几乎每个窗口都插着红旗。

27日凌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人员阎长贵与二司驻京联络站通电话。在谈到二八声明的问题时，他建议二司好好学习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并把二八声明与社论进行对照，有错误就改正，不要坚持错误，不要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提出反托派是错误的。

武汉部队的“严正声明”、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及中央文革的电话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香花派的斗志。迫于强大的压力，2月下旬，以朱鸿霞为首的工人总部负责人不得不到武汉军区“请罪”。接着，长江日报社毛主席路线战斗兵团和工人总部各分部负责人乃至一般战斗队员也纷纷去军区请罪。在以后的几天里，工人总部请罪的队伍连绵不断。二司、九一三等组织也纷纷表态，承认二八声明存在缺点和错误，承认打托派是错误的。

在这种情况下，香花派内部发生了剧烈震荡以至开始分化。

2月15日，工人总部武昌分部宣布退出工人总部，并成立“2·13司令部”，其他分部也迫于基层组织的责难而处于瘫痪状态。

3月1日，二司一些成员分赴红楼和红旗大楼造反，要抓二司的“修字号头头”。不少院校的二司成员纷纷来红旗大楼作动员工作，劝说战友内部起义，并且向大楼指挥部的负责人施加压力，楼内部分二司成员对自己坚持的观点产生了怀疑。

到2月底，武汉造反派轰轰烈烈的“夺权”化成了泡影，香花派因少数头头错判形势、发表二八声明而遭受重创。

第十八章 我经历的武汉七二〇事件

一、是非功过任评说

1967年7月20日，武汉军区独立师和群众组织百万雄师的一些人反对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武力绑架、殴打、批斗中央代表王力，直接威胁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安全，同时在武汉全市围攻、抓捕造反派和无辜群众，实行白色恐怖，制造了武汉七二〇事件。

1967年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表了《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将七二〇事件定性为“严重政治事件”，是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叛逆行为”。

1978年7月26日，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同意湖北省委、省革委会、武汉军区党委的报告，决定为七二〇事件平反、昭雪。该报告称：“‘七·二〇事件’完全是林彪、‘四人帮’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反党乱军，挑动群众斗群众，以达到其破坏文化大革命，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而亲手策划挑起的一个重大事件”。

关于武汉七二〇事件的记述和评论，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多个不同的版本。其中有陈再道的回忆文章，权延赤的《微行——杨成武在1967》、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纪希晨老先生的大作，当事人王力本人的《文革记事》以及叶永烈的有关文章。这些记述都是在文革被全面否定后出版的，是“胜利者”或为“胜利者”捉刀者的记述。作为亲历七二〇事件的人，我手头保存了一本《江城风暴》，也是关于七二〇事件的记述与评论的文章，是1967年8月，也就是事发不到一个月造反派写的。该书分八个部分。写这本书的人虽然由于条件限制，还不能把握事件的全局（如作者还不知道事件发生时毛主席就在武汉，而且就在事件发生处的中心——东湖宾馆），但对事件的记述我认为基本上是客观真实的。

在诸多已发表的关于七二〇事件的记述和评论文章中，我认为戴维堤所著《文革时武汉“七二〇”事件始末》和徐海亮《武汉七二〇事件

及其在文革中的地位》两篇文章记述的事实，是比较客观可信的，相关评论也是较公正的。

我认为记述人虽有权评论任何事件，但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人，即使是作为“胜利者”，也绝不应凭道听途说，指鹿为马，任意抹杀历史事实，拿历史事实开玩笑。历史是不能任意被嘲弄的，凡嘲弄历史的人最终都将被人民所唾弃。

武汉七二〇事件到底是旧体制下的反文革势力以暴力形式对党中央、毛主席发动的反革命暴乱，还是所谓“完全是林彪、‘四人帮’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反党乱军，挑动群众斗群众，以达到其破坏文化大革命，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而亲手策划挑起的一个重大事件”？对于曾亲历这段历史事件的我们来说是非常清楚的。

在已发表的关于七二〇事件的文章中，多数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上，记述了1967年7月20日前后几天武汉所发生的独立师和百万雄师围攻、批斗中央代表的情况，并以此发表对七二〇事件的评论。因此，即使较客观评价七二〇事件的人也难免有偏颇之处。如他们也认为七二〇事件是保守派百万雄师和以工人总部为首的造反派之间发生的“大规模武斗”，认为事件之所以发生，与当时作为中央代表的王力将中央的“四点指示”提前通知造反派有直接关系。而这些显然与历史的真实不符。

七二〇事件的发生有其明确、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根源。人们只要对七二〇事件的酝酿、发生、发展的全过程作全面的了解和分析，就不难理解：即使没有王力与造反派见面，甚至中央代表团中没有王力，事件也必然会发生，只是发生的时间、形式可能有所不同罢了。至于对七二〇事件性质的结论，我想也只有对事件的全过程（从武汉部队支左开始）进行全面、客观的了解和分析后才能得出。

本章记述1967年2月至7月武汉文革的概况，参考了武汉钢二司红武测1967年8月编《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六七年元月一七月）》。

二、武汉部队支左与工人总部被解散

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

发布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决定说：“最近，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决定还说：“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重申军队不得做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防空洞的指示。”

1月25日，解放军报就部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发表社论，重申中国人民解放军要听毛主席的话，满腔热忱地、毫不含糊地、全心全意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夺权斗争。

我认为，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柱石和基本保证。毛主席之所以断然发动文化大革命，向强大的官僚体制发动最猛烈的进攻，一是凭借自己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威望，二就是凭借亲手缔造和指挥的人民军队。

中央《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下达后，武汉军区迅速成立了“支左指挥部”。

人民解放军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目中是伟大的、光荣的，是“最可爱的人”。因此，当造反派听到毛主席要解放军支持造反派的消息后，无不欣喜若狂。我们新华工当晚就组织同学游行到军区，欢呼中央这一决定的发布，最热烈地欢迎人民解放军支左。

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事实确实如此。以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为首的武汉军区实际上早就已经介入了湖北省、武汉市的文化大革命，他们对武汉的文化大革命早就有了自己的立场和思路，并有了一套完整的计划和方案。

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成立不久后，2月18日，军区即发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严正声明》（也称“2·18声明”），对湖北、武汉的文化大革命公开表明了支持毒草派反对香花派的立场。该声明说，二八声明“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是与《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所指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

派手里夺权’的大方向背道而驰的”，“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精心策划的，是制造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的”。

当时我们毒草派正在和香花派就二八声明进行大辩论，武汉部队“2·18 严正声明”的发表使毒草派大受鼓舞，因此热烈欢迎武汉部队的声明。为了表达我们对军队的支持和感谢，20 日下午，我代表红司（新华工）带文艺宣传队“轻骑兵”到独立师作了慰问演出。

与毒草派相反，香花派对武汉部队 2 月 18 日的“严正声明”却极为恼怒。他们中的一些人围着解放军辩论，一些人在街头张贴的武汉部队“严正声明”上打叉或泼墨汁以泄心中的愤怒。19 日，他们还多次冲击军区要求和部队进行辩论。

“2·18 声明”发表以后，军区紧接着对军内的造反派进行了严厉的整肃。2 月 21 日，武汉军区发布公告，对军事院校的革命造反派发出警告，接着宣布汉口高级步校的红旗、红色造反团，空字 006 部队（雷达兵学校）的红总等为反动组织，强令其组织解散，并抓走这些组织的负责人和骨干。

2 月 21 日深夜，武汉部队支左办公室通知长江日报编辑部，要求长江日报必须在 2 月 24 日以前作出检查，否则将对报社实行军事接管。

香花派在武汉军区强大的政治威慑下，内部很快发生了急剧震荡。工人总部负责人到武汉军区“请罪”，接着，长江日报社毛主席路线战斗兵团和工人总部各分部负责人也纷纷去军区请罪。二司、九一三等香花派组织也纷纷表态承认二八声明的错误。

3 月 1 日中午，武汉部队对武汉市电信局及其二、五、六、九等几个分局实行军事接管，逮捕了工人总部电信分部 4 人，拘留 12 人，强迫登记一百多人。

3 月 2 日，红旗大楼内的香花派发生内讧，有人提出请解放军来红旗大楼，这个意见得到多数人的支持。长江日报在内外夹击下被迫停刊。

3 月 3 日，香花派撤出红旗大楼。

3 月 17 日凌晨，大逮捕开始了。荷枪实弹的军警把工人总部 9 个勤务员及各分部的负责人共 485 名头头全部抓了起来。

3 月 21 日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通告》（又称 3·21 通告）

说：“‘武汉地区工人总部’成立以来，在少数反革命分子操纵下，与湖北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互相勾结，干尽了坏事。”“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和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特宣布从即日起，‘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一律解散。”“通告”后附有《“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中反革命分子的罪行》。

从“通告”引用的毛主席语录（“原有的反革命分子肃清了，还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并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来看，武汉军区实际上已把工人总部打成了“反革命组织”。

在此期间，全省各地成千上万的香花派头头和群众被打成“反革命”而遭逮捕。黄冈县就解散了28个群众组织，黄石市有30个组织被打成“反革命组织”或被宣布解散，天门县拥有七十余万人的造反组织被打成反革命组织遭解散，共逮捕一千三百多人。

3月29日，武汉军区编辑印制的《“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中反革命分子的滔天罪行》图片集在武汉市广为张贴。

武汉军区从1967年2月1日成立支左指挥部到3月21日，仅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将香花派主力之一的工总给摧垮了。香花派另两支主力九一三和二司的头头虽没有被抓，但他们都被迫不断地“请罪”和检查，其组织指挥系统已基本瘫痪，内部已是人心涣散，相互猜忌，人人自危，基本上失去了战斗力。

三、由信任到怀疑

对武汉部队发表“2·18严正声明”严厉批判二八声明，我们是支持、拥护的，认为部队是在支持真正的左派。军区接下来对香花派头头采取的打压措施我们也能理解，甚至感到高兴，认为这是他们咎由自取，罪有应得。

由于派性使然，当时我们对香花派的一些头头确实很反感。认为他们在批判资反路线时搞“唯我独左”，不准曾参加过保守组织的群众起来革命，甚至无理打压参加过保守派的干部、群众。在“一月风暴”时的夺权过程中，他们搞“唯我独尊”，认为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夺权。当

三新等组织不买他们的账而组织夺权时，他们竟然把斗争矛头直指三新、工造，在二八声明中公开点名指责工造总司，骂我们三新、工造是“托派”。

当时军区是支持我们毒草派的。支左指挥部负责人一再声明：“过去和将来我们都支持和依靠你们”。事实上，当时支左指挥部很多事都会找毒草派的头头商量、通气，包括军区发表“3·21通告”解散工人总部这样重大的事。

我们毒草派和军区支左的矛盾是从1967年3月底4月初开始的。直接的原因是他们在打压香花派的同时，公开支持已垮台的保守组织大专院校红卫兵（即原省委组织操纵的各大大专院校红卫兵师）。

早在2月23日，独立师政治部就发出了一个内部掌握使用的文件——《怎样识别左派》，这个文件以党、团员多少，是否拥护武汉部队的“2·18严正声明”作为划分左派、右派的标准。按这个标准，工总是右派，九一三、二司等香花派也在右派组织之列，而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中学红卫兵则成了“革命的群众组织”。

在如何对待大专院校红卫兵的问题上，军区支左指挥部和我们的意见原来是一致的，这可以从3月8日上午，军区支左指挥部办公室主任信俊杰（武汉军区动员部部长）、湖北军区副政委张竞和毒草派主要负责人座谈时的讲话中可以看出来。那天，张副政委对大专院校红卫兵问题发表了正式讲话（五条），明确提出允许大专院校红卫兵的同学起来革命，“但这个组织不宜再恢复，因为恢复不利于当前的大联合”。（详见本章附件1）

在这次座谈会上，信部长也明确要求：“要对大专院校红卫兵做思想工作，把受蒙蔽的群众团结过来，分期分批地把他们接受过来。要和他们说明，如果闹下去对他们是没有好处的。”

3月9日，我们红司司令部召开会议，会议传达了张副政委和信部长的讲话精神。我们一致认为张副政委和信部长的讲话是代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是符合武汉目前实际的，我们应该坚决支持和执行。

为了进一步搞好我院的大联合，为成立院革委会作准备，会议决定立即开展军政训练和司令部整风，并就整风的相关问题统一了认识。

3月10日下午，红司召开了全面整风誓师大会。当时我认为开展这

次整风是非常必要的，认为它将对我院的文化大革命产生深远的积极作用，是关系到红司向何方的关键。

但实际上，红司的这次整风却由于军区对大专院校红卫兵的态度发生变化而不了了之。

原来，3月8日张副政委讲的那“五条”，在向军区钟汉华政委和孔庆德副司令员汇报时被否定了。军区支左指挥部在3月11日下午召集我们红司的郭保安、聂年生去开会，明确宣布撤销8日所作的“五条”，军区决定支持大专院校红卫兵并恢复其基层组织。

同一天，武汉军区发表“声明”说：武汉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是两头好，中间有错误（“两头”即文革初“扫四旧”、斗黑帮，近期批二八声明、支持武汉部队的“2·18严正声明”；“中间”指保工作组、保省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因此，支持其恢复基层组织。

对武汉军区支持武汉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支持恢复其基层组织的决定，我们是坚决反对的。因为我们认为大专院校红卫兵和中学红卫兵是省委一手炮制的保守组织，是资反路线的产物，也是旧体制的既得利益群体和社会基础。承认大专院校红卫兵和中学红卫兵就是对革命造反派的否定，因而也就是直接否定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革”与“保”绝不仅仅是群众之间的意见、观点分歧的问题，正如人民日报、红旗杂志1967年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所指出的：“一个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一个要保存资本主义旧秩序，一个要革，一个要保，这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事实上，刘邓路线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斗争是通过保守派和造反派的斗争来体现的。我们现在的大联合指的是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而绝不是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大联合。

毛主席在谈到人民解放军支左时说：“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很显然，毛主席这里说的“革命派”就是造反派，造反派就是左派。

联系到军区支左以来过分打压香花派的做法，我们认为军区在支左问题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那个年代，方向、路线错误是最大的错误，是绝对不能含糊的。就这样，我们对军区的态度从支持、信任变成了怀疑和抵制。

3月15日、16日，为了说服我们支持军区的决定，支左指挥部负责人来我院与我们红司负责人“交换意见”。在说到大专院校红卫兵和中学红卫兵的问题时，信部长说：“大专院校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认为是两头好，中间错。在运动初期，他们生气勃勃，在横扫‘四旧’、大立‘四新’中立下了很大的功勋，后来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犯了错误，这个错误是因为受蒙蔽导致的。”张副政委在座谈会上也发了言（详见本章附件2），他在重申支持和信任我们的同时希望我们从策略上考虑问题，支持军区关于大专院校红卫兵的决定。

3月18日前后，陈再道司令员在接见二司负责人杨道远时也强调在当前大联合的情况下要支持大专院校红卫兵起来革命（详见本章附件3）。

关于如何对待大专院校红卫兵的问题，我们曾和军区支左指挥部进行了多次沟通。但双方各自都坚持自己的立场，始终没有达成共识。

在支左指挥部来我院召开座谈会时，我们曾就当时高校大联合和大专院校红卫兵问题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各组织全部都打散回班，再以班为单位从下至上实现系、院的大联合。二是各组织自己整风、军训。我们认为如果实行第一方案，既可以实现中央要求的大联合，也可以在无形中解决好大专院校红卫兵的问题。但支左办未予采纳。

客观地说，军区支左指挥部中具体和我们联系的人是很诚恳也很友好的，他们也确实是希望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他们说我们在团结大多数、特别是团结参加过大专院校红卫兵的同学方面存在问题，也是实事求是的。但当时我们觉得他们的动机虽然不错，但他们的思路和立场有问题，也脱离了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他们始终认为如何对待大专院校红卫兵恢复基层组织的问题是方式、方法问题，是策略问题；而我们却认为这是方向、路线问题。我们认为让大专院校红卫兵恢复其基层组织不但不利于大联合，而且会影响甚至破坏革命的大联合。

事实上，在军区表态支持大专院校红卫兵恢复其基层组织前，武汉各大专院校已基本实现了大联合（我院早在1月21日就完成了大联合），都在为成立“三结合”的革委会做准备。而军区表态支持大专院校红卫兵恢复基层组织后，大联合的局面立即就发生了逆转，一些院校的大专院校红卫兵立即组织、串联起来，不但恢复了组织，打出了旗号，

而且开始与造反派对抗，搅乱了大联合的局面。

事实很明显，如果军区支持大专院校红卫兵恢复其基层组织，文化大革命势必又会回到1966年8、9月份那种“革与保”大战的局面中去。

为了了解我院参加过大专院校红卫兵的同学的真实思想状况，我在武汉军区表态支持大专院校红卫兵恢复基层组织后，曾代表红司（新华工）司令部分别在我院电机系和机二系主持召开了原大专院校红卫兵负责人及骨干分子座谈会。

两个系的座谈会分别在西一楼和东一楼大教室内举行。这两个系原大专院校红卫兵的主要负责人几乎全部都参加了。我先说了召开这次座谈会的目的，是想了解大家对当前形势的想法，希望大家积极帮助红司整风，尽快实现我院的大联合，尽快成立院革委会。

会议是在非常融洽的气氛中进行的。自始至终我没有感觉到与会者有什么压力，更没有发现有什么对立情绪，会议发言也很踊跃。

自从我去汉口分台后，很少和院内的同学接触，甚至和自己班上的同学也很少联系。因此，对同学们的情况，特别是对曾经参加过大专院校红卫兵的同学们的思想状况很不了解，总觉得我们新华工已是“铁板一块”了，都是造反派了。没想到事实上并非这样。还是有部分同学思想上受到了压抑，他们的积极性还没有发挥出来。

这两次座谈会上同学们的发言（详见本章附件6）确实给了我很大的震动，我在3月7日的日记中写下了如下文字：

会后感言：参加了两次座谈会，听了原来曾参加保守组织的同学的发言，我深深地感觉到我们“红司”也存在团结群众，特别是团结曾经反对过自己、压制过自己的那些人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如不能很好地解决，就像代表们在发言中说到的“就是夺了权也巩固不了”。我们必须明确：谁反对团结“老保”，谁就是真正的“老保”。这就是我最大的感言。

在3月8日的日记中我又写道：

近两天，原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在武汉一些地方又把旗号打出来了，这是人们不能忽视的问题。

保字号的红卫兵为什么现在又把旗号打出来呢？原因主要有以下两

个方面：

1. 武汉军区的支持，这是主要的也是直接的原因；

2. 由于我们造反派在组织路线方面执行了形左实右的路线。忘记了毛主席关于要团结大多数的教导，不但没有主动地去团结曾经受蒙蔽的群众，把他们吸收到自己的组织中来，反而对这部分人进行排斥，使这部分人对造反派产生反感，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现在要恢复“大专院校红卫兵”是被我们逼出来的。

如何对待曾受过蒙蔽、表现为保守的同学的问题是日前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对待“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呢？

我认为，就我院来说，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量地吸收他们加入到我们“红司”来。据调查，目前我院还有近2000人没有参加任何群众组织，其中起码有近1500人早已转变了观点，转向了我们。如果我们全部吸收这1500人，再团结剩余的那五六百人，尽量争取他们的合作，这样“大专院校红卫兵”的问题也就彻底解决了。退一步说，即使这几百人继续和我们作对，也无关紧要了。

我总觉得如何对待“老保”的问题是我们目前的关键问题。谁歧视老“保”谁就是真正的老“保”。谁如果要继续压制老“保”，他就要犯错误，就会把老“保”越压越大。我们现在对犯过错误的同志愈是宽容，我们将愈是主动。

当时我们虽然对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产生了怀疑，但出于对解放军的尊重，我们还是处处维护解放军的威信，尽量避免和支左部队产生公开的争论。

3月15日上午，我主持召开了红司广播宣传工作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我主要谈了如何看待军区支持大专院校红卫兵恢复其基层组织的问题。我详细介绍了我3月5日和7日主持召开电机系和机二系的两个座谈会的情况，并谈了我的一些看法和感想。要求必须按毛主席关于“只有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精神去做好宣传工作。在这个会议上我提出了我的看法：“现在谁反对团结‘老保’，谁就是最大的‘老保’！”

在谈到当前宣传工作中要注意的问题时，我特别强调：因很多问题

现在还不明朗，我们必须冷静观察分析后才能作出明确的判断。因此，我们现在应集中心思搞内部整风，不要受外部干扰，不要上当。具体要求：

1. 把目前关于大专院校红卫兵的争论引导到司令部的整风上来，也就是批判司令部在组织路线上的“左”的关门主义，真正做到毛主席要求我们的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群众。

2. 要充分相信解放军。在宣传工作中不要和驻院搞军训的解放军发生争论，有看法可以保留，特别是不要在广播中争论。

3. 要明确红司目前最大的危险是和解放军发生冲突，千万不要授人以柄，给人以可乘之机。

4. 稿件中不要引用湖北日报和武汉军区“2·18 严正声明”中的一些话，不要点群众组织的名。不要提“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只提“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社会上的牛鬼蛇神”。

在谈到宣传内容和具体组稿问题时我说了我的意见：

1. 组织团结工作的正面稿件，如“我们是如何对待受蒙蔽群众的？”“我们是如何对待犯过错误的革命干部的？”

2. 组织一批典型的曾受蒙蔽的群众、干部的稿件，如：“我的思想和观点的转变过程”“我是怎样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曾犯过错误的干部和群众的大字报我们可以在广播台播送，也可以播送一些典型的反对我们的稿件，让群众自己去判断是与非。

3. 为加强和解放军的友好关系，我们要组织一些拥军的稿件，如“解放军是如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等。

4. 组织有关大联合经验的稿件，如“我们班是怎样实现联合的？”“我们是如何和井冈山等革命组织搞好大联合的？”

5. 组织炮轰司令部的稿件，特别是红司在组织路线和干部路线中存在的问题。

6. 大力宣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红旗杂志社论精神，要及时收集同学们的反应并写成稿件宣传。

尽管当时司令部要求尽量避免和解放军发生公开的意见冲突，但3月16日下午解放军支左人员在体育馆召开的大型座谈会上的发言却使矛盾公开化了。

支左指挥部来我院组织召开大型群众座谈会，本来是想借此直接向群众宣传军区关于对待大专院校红卫兵、工人总部及二司的立场、态度，希望能得到新华工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但效果却恰好相反。他们不但没有说服我院的干部、群众，反而激起了新华工人的公开反对。一些同学说：“现在我院到底是军区领导还是红司司令部领导？要是军区领导，我们干脆就什么也不要管了，一切都交给他们，随他们怎么搞，看他们怎么领导。”而另一些同学则说：“我们干的时候‘老保’们睡大觉，他们现在成了左派，我现在也要睡觉了，以后我再出来当左派。”……

就在第二天，我院贴出了一张署名“批判者”的大字报，题目是《自己解放自己》，全文如下：

自己解放自己

谁是三岁的小孩尚需保姆？谁是八十岁的老头还需要拄拐杖？我们是顶天立地的革命者，年青力壮正当年！我们一不需要保姆，二不需要拄拐杖。我们要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有毛泽东思想引路，有党的阳光哺育，我们还需要什么？需要锻炼。毛主席给了每个革命者锻炼的机会，选择的权力，这个权力是任何人剥夺不了的。

毛主席给了我们驰骋天南地北的权利，世界革命的舞台正等待毛泽东时代的青年大显身手，一切妖魔鬼怪正等着我们去扫除，一个欣欣向荣的新世界必将在我们这一代诞生。这一切需要什么？一句话，需要我们的勇气。

红卫兵战士们，一切要革命的同志们，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国际歌说得何其好啊，“全靠我们自己”！我们要革命，我们要打掉一切束缚我们的枷锁。我们需要的是充满火药味的敢想、敢说、敢干、敢革命。敢造反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我们决不要鹦鹉学舌，人云亦云，亦步亦趋的卑贱性格，我们不需要仰仗别人的鼻息，我们不需要后退，我们坚决反对后退。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在山呼海啸、风起云涌的火热时代，我们要像雄鹰展翅拍击长空，像海燕冲向海洋。

批判者

3月23日是我们“新华工革命造反广播台”成立五周月的日子。司令部原打算开一个大型的纪念会。后来考虑到支左指挥部的意见（他们明确表示不同意搞集会和大小辩论会）及当前正在搞大联合，纪念会就取消了。但到了晚上八点，我院西边的电机系和动力系的一些人却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自发地组织起来游行了。开始只有几十个人，但很快就有不少人加入游行队伍，人愈来愈多，当游行队伍到达出版科附近时，已经扩大到三千多人。

导致这次游行的直接原因是头天武汉水院的一张大字报。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一个叫邓子政的大专院校红卫兵写出一张大字报，说：“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光辉著作，刘少奇是和毛主席一个司令部的，罢免刘少奇应通过人大。”这张大字报一贴出，立即引起了武汉各大专院校的强烈反应，这一天大多数学校都举行了大游行，以抗议保守派的反扑。而这次游行的真正原因则是对武汉军区“支左”工作的强烈不满。

武汉军区关于解散工人总部及其基层组织的“3·21通告”发布以后，同学们对武汉军区打压造反派、支持保守组织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尽管当时红司司令部力求平息同学们的不满情绪，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无济于事。

四、反击复辟逆流，为工人总部翻案

对于军区的“2·18严正声明”，毒草派是拥护并积极支持的。但随着军区对香花派打压的逐步升级，特别是武汉军区把工总打成反革命组织加以取缔后，毒草派对军区支左的看法开始动摇了。虽然香花派从开始夺权以来和我们产生了很多矛盾，以至到二八声明发表时翻了脸，但香花派毕竟是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和我们一起冲杀出来的造反派组织，两派之间虽然有矛盾甚至有斗争，但总还是“同一战壕的战友”，是兄弟，“再怎么吵我们还是一家人”。我们开始支持和拥护军区的“2·18声明”，在很大程度上是认为教训一下香花派组织中那些“头脑极度发热”的头头是应该的。我们批判二八声明，绝不会有要将香花派打倒的想法。

军区支左指挥部一方面打压香花派，另一方面却极力扶持和支持保守派，这不是明显地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吗？在一些单位，保守派不但

在军区的支持下死灰复燃，而且文革前的原班人马又重新掌权并打压造反派，这不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复辟吗？因此，我们对军区的“支左”彻底失望了。

3月24日，红司司令部按原计划召开全体会议。当天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解放干部问题。司令部“三结合小组”在会上首先介绍了我院干部的基本情况，并提出了他们认为可以马上解放进入“三结合领导班子”的名单。经过充分讨论和辩论，一致认为以下干部可以第一批进入“三结合”的领导班子：

熊小村（院党委副书记）、章光昭（人事处副处长）、孙宝酷（总务处副处长）、诸玉林（院长办公室主任）、周书珍（院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多兴（院党委委员）、何均华（院党委候补委员）、朱慧南（教务处处长）、黄天柱（院党委委员）、葛成秀（四系总支书记）、车红勋（总支书记）、王嘉林（总支书记）、许仁万（教师科）、张昌书（机二系）、王立清（二系）、曾德光、张太行、张世林（学生科）、辛忠贵（总务科副科长、老红军）。

在这次会议上，郭保安提出我们要稳住两个阵脚，一是学生，二是教师和干部。他认为目前同学们的情绪可能失控，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在会议快结束时，他传达了在我院搞军训的张政委昨天向红司司令部提出的几点意见：

1. 现外面有人在南一楼贴解放军的大字报；
2. 在军训中有人无组织纪律，想走就走，连个招呼也不打；
3. 讨论不发言；
4. 红司是革命组织，要支持军训；
5. 应该相信解放军，解放军有一套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经验。

对解放军的上述意见，大家已是心照不宣，因此，未予讨论。

3月25日，我们继续开会。这天会议的议题是：根据当前形势，特别是针对同学们对武汉军区支左的强烈不满情绪，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讨论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关于大联合的问题，二是如何看待解放军支左的问题。

关于大联合问题，大家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我们不能同意军区要我

们和大专院校红卫兵搞联合的要求。认为大联合应该是革命派的大联合，坚决反对搞调和、折中，搞大杂烩。

关于对解放军支左的态度问题，部分人的意见是按红旗杂志第五期社论的精神办事，在任何情况下不要和解放军对抗，要大力造绝对相信解放军的舆论，下面同学对解放军支左的看法可向上面反映。但多数人认为武汉军区从介入地方文革运动以来，扶植保守派，打压造反派，是“二月逆流”在武汉的反映。他们主张对军内反文革的走资派掀起的复辟逆流进行坚决反击。

会议开了整整一天，辩论非常激烈。最后达成以下共识：

1. 武汉军区从支左以来扶植保守派，打压造反派，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2. 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全面向党内走资派夺权的关键时刻，“二月逆流”的流毒及“带枪的刘邓路线”是当前最大的危险；

3. 重新杀向社会搞调查和发动群众，宣传反复辟逆流，号召工人起来革命，调查各工矿企业资本主义复辟的情况，调查工人总部的问题，坚决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

4. 考虑到必须维护解放军的崇高威信，在具体做法上不点陈再道、钟汉华等军队领导人的名，宣传中暂不提军区支左是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问题，但我们要用行动支持工人总部和二司，支持他们顶住打压，尽快振作精神，坚决起来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

我们当时得出以上结论的根据是什么呢？这里我想有必要先说说我们当时的信息来源。

1967年元月，新华工造反派实现了大联合，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司令部”。在司令部下设立了动态组（即情报组），由原聂年生的“红反团”的负责人之一赵延昌任动态组组长。后来随着武汉形势的恶化，又决定扩大动态组，在动态组下设四个办公室：“一办”负责全国情报，“二办”负责武汉情报，“三办”负责军队情报，“四办”为综合办公室，负责综合前三个办公室的情报呈报司令部参考。在七二〇事件发生前，动态组还设立了无线电广播台，一是监听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之间的无线电联系，二是准备在我院危急时刻用无线电广播

对外联系。当时我们司令部的成员每人都有一个信箱（专用的文件袋），每隔几天就会收到动态组收集整理的湖北、武汉及全国各地的信息资料。

当时对我们作出上述决定（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起决定作用的有以下几方面的资料：

一、关于以谭震林为首的元老大闹怀仁堂的资料。这份资料给我们传达的信息是，反文革的势力仍十分强大，老师和副总理中多数人对文革不理解，并持反对意见，是目前运动的主要阻力。

二、蒯大富在清华井冈山内部整风时所作《迎接第八个回合人类历史的大决战》的讲话。这个讲话的第二部分谈文化大革命与走资派八个回合的斗争，其中第八个回合也就是当前正在进行的斗争是决战阶段，也是关系到人类命运的大决战。“讲话”说毛主席认为，2、3月是决战阶段，但胜负未定，我们有信心一定能取得胜利。

蒯大富在讲到第八回合时说，“我们担心百分之五十的人是否能坚定。目前有人放出一股风，说国际、国内形势紧张，中央要收了，这是一个阴谋”。

蒯大富在这篇讲话中说到了对运动发展的几种估计，即：

1. 笔杆子取胜；
2. 枪杆子取胜；
3. 敌人可能用枪杆子暴动；

4. 国内外敌人一起来，天灾人祸一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紧跟毛主席重上井冈山。

这份资料给我们传达的信息是：当前文革的形势仍然十分严重，胜负还未定。弄得不好已经取得的成果将会付诸东流，革命者将跟毛主席“重上井冈山”。

三、王任重3月2日给陈再道、韩东山、姜一写的一封信及相继写出的三份“检查交待”材料（第一份：《对湖北省委的基本估计》，第二份：《我的历史》，第三份：《十七年来我在湖北省工作的情况》。由军区组建的“湖北省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曾将这三份材料作为绝密文件发给了官方人士）。王任重在信中向陈再道等提出：要迅速地把省一级、市一级、地县一级的临时“三结合”的权力机构建立起来，并建

议具体由钟汉华出面挂帅，吸收原省委和军区的一些领导参加。军区由陈再道、韩东山考虑，省委、省人委建议由姜一、杨锐、韩宁夫、王海山、张旺午、阎钧、张起、陈扶生、邓群、饶兴礼参加，群众组织由孔庆德、张竞决定。他还希望派出大批政治工作人员深入到若干大单位（武钢、重型、锅炉厂、肉联、一纱、国棉、武大、水院、华工、华师等）去进行政治工作，把群众争取过来，使他们拥护武汉军区的“严正声明”和“通告”，推动各个组织开门整风，有些革命组织的领导人员，凡坚持错误的，由群众自己撤换重选，这样才能比较快地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

这些资料给我们传达的信息是：军区虽然表面上还在组织批王任重，但实际上军区领导仍然在听从王的指挥，并按王的指示开展工作。最典型的例子是：军区按王任重的意见撇开原造反派组织成立的各级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而成立由军区直接控制的省、市、区各级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这些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实际上就是军政府，它代行原各级政府除公、检、法外的所有职能。省、市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的成员基本上都是王任重信中指定的那些人。而这些人在指定下一级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的成员时，很自然地不用造反派，而是指定那些各部门、各单位的原负责人了。这就造成了很多单位文革前的原班人马上台的局面，使这些单位和部门“全面复辟”了。

四、关于武汉市一些单位保守派实现反夺权，走资派重新上台，造反派再度受压的资料。这方面的资料是大量的，而且具体到某厂、某单位。这方面的资料给我们传达的信息是：武汉市除毒草派掌权的单位以外，基本上都“复辟”了。

我们当时都是一些血气方刚的热血青年，都是百分之百的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支持者和拥护者，是愿意“跟毛主席重上井冈山”的革命斗士。因此，尽管我们明知道前面的道路布满荆棘，仍义无反顾，一往无前。

就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决定于3月27日召开纪念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40周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发表41周年大会，会后进行大游行，向社会公开我们坚决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态度。

红司司令部25日的会议后来被武汉军区看成是红司“左”和“右”

的分水岭。他们认为3月25日以前红司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是左派的革命组织，而3月25日以后就是右派组织了。用七二〇事件的主要参与者、独立师政委蔡炳臣7月16日师党委会上的话来说就是：“新华工3·26提出杀向社会，矛头指向军队，冲军事机关，搞打砸抢抓抄，翻案风四起，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革命复辟。”还说：“新华工现在实权掌握在政治教研室，重大问题都是由政治教研室决定的。该教研室47人，其中地、富及有问题的20人。”蔡说的当然不是事实。事实上，这次会议提出的“杀向社会”主要是去工厂搞调查研究，核实一些单位“复辟”的情况（原领导班子上台后造反派受压），绝没有将矛头指向军区的意思。我们更没有搞什么“打砸抢”。说新华工实际上是政治教研室掌握实权也毫无根据。

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得知我们将举行庆祝大会并游行的消息后大为恼火，他们明确表示不同意我们开纪念大会和游行。为了阻止我们走出学校，他们特地于27日早上七点在我院发表了广播讲话，给我们规定了五条。其中一条是：不准到市里去游行。我们认为支左办的规定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所以，我们还是照原计划召开了大会并进行了大游行。

大会在我院露天电影场举行。参加这次大会的有我院师生员工约七千人。会后，数千人到武测、湖大、湖医、武大、水院等院校进行串连游行。游行队伍高呼口号：“一切权力归农会”“痞子要掌权”“把乌拉稀（即华工“乌兰牧骑”，大专院校红卫兵的中坚组织）入另册”“打倒刘邓陶王”“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逆流”“向二司战友学习”“向二司战友致敬”等。

武汉军区对我院27日的集会和游行十分不满，但还是希望我们放弃“反复辟”的立场而支持他们对工人总部和二司的打压。

3月28日，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亲自在军区组织我们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及三司的负责人开座谈会，在会上陈司令员说：“工人总部号称四十万，被反革命分子掌握了，解散工人总部对你们就是很大的支持。”“工人总部9个头头，7个是政治严重不纯分子，干了许多坏事，破坏了文化大革命。”“二司成员绝大部分是好的，但他们做了许多坏事。工人总部干了的他们干了，工人总部没有干的他们也干了。他们已

经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利用了。他们现在的总部在实现了按部门、按单位、按系统大联合以后，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你们(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的组织就那么好?人人都是左派?”

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在会上也发了言，他说：“二八声明的出笼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勾结一些坏人搞的鬼，是反对革命派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方针的。对二八声明还没有批判透，你们(新华工、新湖大、三司)一定要高举批判二八声明的大旗。”

当时我们对军区的“支左”已基本失去了信任，因此，这次座谈会没有取得任何积极的效果。双方都还是各行其是，谁也没有说服谁，矛盾反而升级了。

军区继续执行他们的既定方针：扶植保守派，打压造反派。就在他们和毒草派负责人座谈的这一天，他们支持的保守组织“红武兵”成立。“红武兵”是以武汉市各级武装部干部为骨干、以复员退伍军人为基本成员的群众组织，是后来百万雄师武斗的中坚力量。这一天，武汉军区向武汉市一中派出了工作组，试图压制正在起来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新一中造反派。也就是这一天，武汉军区军事接管了“公、检、法”，为对造反派的进一步打压作好了准备。

3月29日，武汉军区公布了所谓《“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中反革命分子的滔天罪行》图片集。此图集后来被证明纯属“莫须有”。

这天上午，我在院广播台主持召开了宣传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广播台全体工作人员及红司各大队负责宣传工作的同志。

会议议题：广播台如何配合学校及武汉形势的发展变化?应该做些什么?怎么做?如何落实?

会上我谈了对目前武汉形势的看法，我认为目前资本主义复辟在全国具有普遍性。

在谈到大联合问题时我强调了我院的特点，认为我院红司已经是一个大联合的革命组织，我院造反派占压倒优势，且内部比较团结。红司已实现了夺权。《中共中央关于大专院校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第六条指出：“大专院校必须由革命学生、革命教职员和革命领

导干部组成临时权力机构，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行使本校的权力。已经由革命左派学生组织掌握领导权的，应着手吸收革命教职员工和革命领导干部参加。在条件成熟时，按十六条的要求实行全面选举制，正式建立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组织形式，作为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正式权力机构。”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按照这个“规定”的第六条，将那些优秀的革命干部和教师结合到我们的领导班子中来。

在谈到目前宣传中的注意事项时，我着重强调了要正确处理和解放军的关系，正确对待大专院校红卫兵。认为我们现在要把混入军内的反文革的走资派和解放军区别开来，任何时候我们都要相信人民解放军，我们反对武汉的谭氏人物不能认为我们是反对解放军。因此，我们在宣传上一定要体现我们是充分相信解放军的。为了加强这方面的宣传工作，我要求各大队指定专人报道有关军训问题。

3月30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发表于红旗杂志第五期的山东省革委会主任王效禹的文章《放手发动群众，粉碎反革命复辟阴谋》，文章明确指出当前出现了一股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逆流。

这天，三新（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负责人在新湖大开会，就当前武汉的形势进行了磋商和协调，一致认为武汉的资本主义复辟的表现，比王效禹所列举的山东的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经讨论，一致作出了以下决定：

1. 坚决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并把它作为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
2. 为公开我们反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决心，5日毒草派举行全市大游行，8日在武测召开批判刘、邓、陶的誓师大会。
3. 组织群众做社会调查。既要调查资本主义复辟的情况，也要调查工人总部和二司领导层的情况，特别要核实武汉军区公布的所谓《“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中反革命分子的滔天罪行》图片集的真伪。
4. 关于二司，为了有利于目前的斗争（不让军区找借口），同时也为了进一步了解二司头头们对二八声明问题的认识，决定在没有看到他们公开的文字检讨前，暂不和他们以组织的名义一起搞活动。

4月2日—7日我们红司召开了首届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代表大会。

这次红代会的召开可以说在我院以至在武汉市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会议统一了思想，明确了下一步工作的重点，即批判武汉军区在支左工作中的错误路线，坚决为工总翻案。

在司令部和红代会的联席会议上还作出了下列决定：

1. 为了统一指挥，红代会不设常设机构，休会期间由司令部代行红代会职责。

2. 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万一现在的主要负责干部出现不测，要有人接班。

3. 成立一个精悍的战斗队，主要任务是做社会调查，人员由各大队推荐报联络部。强调所有联络站都归联络部领导。不准组织“还乡团”（即回原籍办联络站），到外面去活动要由联络部派。

4. 对武汉的“谭氏人物”暂不点名，相关材料暂不发出，到时再向有关部门递交材料。

5. 设立对外广播站，开辟新闻专栏，并装备一辆宣传车。

4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

第一、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为反革命组织。宣布一个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必须经过中央批准。

第二、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仅仅因为冲军区和对军区提意见，或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夺权有不同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被捕的，应一律释放。通缉令应一律取消。许多外地学生几次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认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击军事机关一事却看得严重了。

第三、一个群众组织的个别负责人，证据确凿是反革命分子，或者是犯罪分子，应依法处理。但是，要同这个组织的广大群众区分开来。在取缔证据确凿的反动组织时，也要把为首的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同一般被蒙蔽的群众严格区分开来。不准对群众组织乱加取缔，更不得采取解放初期对待反动党团组织采取登记骨干分子的办法。

第四、对于犯了一些错误，甚至严重错误的革命群众组织或革命群众，应采用整风的方法，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来解决问题，不应该也不

允许要群众上街、挂牌子、贴大标语、开大会请罪。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革命无罪”，“言者无罪”，大民主无罪。强调群众请罪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严禁假借“镇反”名义，镇压革命群众。

第五、坚决地正确地支持各左派革命组织。在左派组织之间，不能片面支持一方，打击另一方。

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似乎就是直接针对武汉军区“3·21通告”而发的，大大地鼓舞了武汉造反派的士气，从而也就拉开了武汉地区全面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帷幕。

4月1日，我们三新和三司等在新湖大举行了庆祝“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发表十周年大会，大会收到了聂元梓发来的祝贺电，会后举行了游行。

武汉二司整风办公室当天也在武昌体育场召开了三万余人参加的大会，会后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当天，我给院广播台写了一首《准备战斗》的诗，全文如下：

准备战斗

——致革命造反派战友

是雄鹰，快展翅长空，
是海燕，快飞向海洋。
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了，
一场严峻的考验就要开始了。

阴沟里刮出了一股妖风，
江城已听不到造反的歌声，
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推波助澜，
文化大革命正处在紧要关头！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誓言：
我们的天职就是捍卫毛泽东思想，
生为毛泽东思想而奋斗，
死为毛泽东思想而献身，

艰难险阻何所惧，
万水千山只等闲。
解放全人类，
永远忠于党。

亲爱的战友们，
此时此刻，
你有何感想？
你有何打算？

是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还是放任资本主义复辟？
是前进还是后退？
是奋发还是消极？
是做奴隶还是要做主人？
事实是如此严峻，
历史是如此无情，
在此关键的时刻，
你千万不要迟疑！

亲爱的战友们，
请戴上你那金光闪耀的主席像章，
庄严地戴上那象征无畏的红卫兵袖章，
赶快振作起来，
战斗起来！

是雄鹰，快展翅长空，
是海燕，快飞向海洋，
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了，
一场严峻的考验就要开始了。

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社论开宗明义指出：“如果否定革命小将，便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果打击革命小将，便是打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勾结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抓住革命小将的某些缺点、错误不放，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全盘否定革命小将的大方向，甚至操纵已垮台的保守组织进行翻案活动，把一些革命小将重新打成‘反革命’。他们这样做，就是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是否定前阶段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对于这股逆流，我们必须坚决回击，彻底粉碎！”

中央4月1日下发的《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和2日人民日报社论并没有引起武汉军区的重视，他们既没有根据中央精神纠正武汉军区“3·21通告”解散工人总部的错误，也没有按4·2社论的精神结束对二司的打压，而是继续公开支持保守派，从而导致了造反派对武汉军区更大的不满甚至愤怒。

4月2日，红司司令部再次开会分析当前形势。先听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的录音，接着就是结合武汉情况分析当前的形势。

多数人认为目前的形势比去年8、9月份还严重。那时是省委领导，群众还敢贴大字报，没人敢报复。而现在是武汉军区领导，实际上是实行全面军管，是军政府，群众敢怒不敢言，莫说贴大字报了。军管以来，除工人总部被解散外，一些单位的毒草派组织如二机床厂的“八一七”、市工业安装公司的“红工革命造反敢死队”等都被勒令解散，13个群众组织被查抄。二司虽未被明令解散，但他们的压力很大，也是岌岌可危。与此同时，在军区的支持下，保守势力空前活跃，原工总掌权的单位基本上实现了“复辟”，原领导班子重新掌了权，而湖北日报社则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

针对当前形势，我们应怎么办？会上一些同学认为现在司令部已落后于群众，甚至是在拖群众的后腿。他们说现在我院及各大专院校，还有一些工厂的群众都自发地起来反击资本主义复辟了，“3·23”、“3·27”的大游行就充分说明了群众已经走在我们的前面了。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现在是英雄们牵着我们司令部走。

4月3日，我们三新、三司的负责人和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的负责人在新湖大25号楼开会，协调有关4月4日共同召开批判刘、邓大会，并举行全市大游行的问题。

会议开始进行得还顺利，很快就通过了“大会议程”、“开幕词”及各组织分工。军区负责用车将三新的同学接到洪山宾馆会场，新华工负责大会广播器材及音响效果，新湖大负责把守会场大门，维持秩序。

但接下来在讨论主席团成员、参加大会的组织、大会口号等问题时，我们和军区却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在大会主席团成员问题上，军区不同意二司进入主席团，而我们则认为二司是武汉主要的造反派组织之一，必须有代表进入主席团。在参加大会的组织问题上，我们同意让二司参加这次大会而不同意中学红卫兵和大专院校红卫兵以组织的名义参加大会，认为二司广大战士与大专院校红卫兵、中学红卫兵及其变种不同，二司是犯了错误的造反派，而大专院校红卫兵、中学红卫兵是刘邓路线的产物。因此，二司广大战士可以进场，而且应戴着袖章打着各总部的大旗进场，而大专院校红卫兵、中学红卫兵则不能带着袖章进场。军区则认为中学红卫兵和大专院校红卫兵应与二司享受同等待遇，要给进场都给进场，要不准进场都不准进场。信部长说：二司的性质正在转化，二司的问题还没有定案。他们的错误与大专院校红卫兵、中学红卫兵不同，二司的错误更大。如让二司参加，那就必须也让大专院校红卫兵和中学红卫兵参加。在大会口号问题上，军区不同意喊“打倒反攻倒算的急先锋谭震林”，而我们则认为武汉存在谭氏人物，大会应该喊这个口号。

武汉军区副司令员韩东山是中途进入会场的。他一进会场就大发雷霆。他说：“为什么要二司参加？为什么不让中学红卫兵参加？喊口号就是要按中央文革的规定办。你们新华工、新湖大为什么要把解放军撵出来？”他接着说：“把中学十二、三岁的孩子当成保守派，他们保省委哪一小撮？他们现在保了谁？现在人家矛头是指向谁？现在人家的大方向对不对？就是应该让中学红卫兵参加大会嘛，为什么要把多少万战士撇在一边？”

我们正要反驳韩的讲话时，信部长说：“二司现还疯狂得很，他们和走资派一起搞反革命复辟。为什么大专院校红卫兵就不能参加？让参

加了就是和稀泥？都是左派，清一色还有什么左派不左派？大专院校红卫兵是不是保守组织还需讨论，你们有什么理由不承认？武测‘一月风暴’这样的组织就是只允许自己革命，不允许别人革命。”

在这天的讨论中，我们和三司也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会议一直开到晚十一点半，最后达成以下协议：

1. 解放军将大力支持这次大会，准备派海、陆、空三军一万人武装参加。

2. 会上少发言，联合发言后接着就进行大游行。

3. 大会将在中午 12 点开始进场，游行由湖北军区吴世安司令员亲自指挥。

4. 打倒刘、邓的大会是一件大事，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能破坏会场。

5. 打倒谭震林的口号在大会上不喊，由军区支左同志在大会上说明情况。游行时喊不喊由各组织自行决定。

6. 大专院校红卫兵、中学红卫兵不打旗号、不戴袖章可以进场，否则不准进场；二司不以司令部的名义参加，可打各总部的旗帜进场。

7. 二司代表不参加大会主席团，联合发言以大会主席团的名义讲。

4月4日，我们到达会场时已是12点了，都还没有吃饭，在解放军入场前大家都没有进场。会议在1点40分开始。当进行到大会主席发言时，中学红卫兵突然冲入会场，其中一些人还冲上了主席台。我们新华社工要求表态，三司负责人吴穷却抢过话筒拍桌子大骂，会场一时显得十分混乱。

正在争吵时解放军代表上了主席台，要求非主席团的人下去。

在中学红卫兵要进场时，新湖大负责维护秩序的人不让他们进，还抢了三面“中学红卫兵”的旗子。后解放军来了，他们就手挽手把中学红卫兵压到一边。当湖大同学又抢下一面旗子时，出来三个解放军，把他们抢的一面旗子拿回去还给了中学红卫兵。后来又来了几个解放军，其中一个军官大声说：“红卫兵（中学红卫兵）你们进去”，“红卫兵你们进去”。这时中学红卫兵大量进入。解放军还把新湖大的人带走了几个。在外面还有一万多人没有进来的情况下，新湖大宣布退出会场。后来空军支左的来了4辆宣传车，叫的口号是间接地支持中学红卫兵，

中学红卫兵热烈鼓掌欢迎。

接着，新华工、新华农、红工等也陆续退出了会场。

我们退出会场后，会议还是在三司和军区的主持下继续进行，但会场显得更乱。为了维持秩序，只好改由解放军负责守门，只准出不准进。三司吴穷作了挑衅性的发言，说“为了维护解放军的声誉，会议不要给坏人破坏了”。接着有三司的三个代表发了言，空司的一个部长也发了言，但没有什么具体内容。待宣读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以后，会议就结束了。会后部队、三司、中学红卫兵分别举行了游行。就在这一天，三司和造反派正式决裂。

我们退出武昌体育场会场后就到湖大重新举行集会，会后我们照例进行了游行。游行队伍长达几公里，其规模是文革以来少有的。

这次大会三新等提出了两个口号：“揪出武汉的谭震林！”“还我湖北日报！”

当天晚上，司令部就白天大会和向中央汇报情况的问题进行讨论。会上，张立国认为今天的会是军区给破坏的，他们违背了3日双方达成的协议，故意放打着大专院校红卫兵、中学红卫兵旗号的人进场；昨天下午军区就通知了各中学红卫兵参加会议，当中学红卫兵打着旗号要冲进会场时他们不但没有劝阻，而且故意大量放入；当会场出现混乱时，陈司令员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而强行继续开会。

在讨论向中央汇报情况的问题时，郭保安说：刚才来了几个首都红代会派来的同学，他们是来调查武汉军区支左情况的。他们要求我们把材料都交给他们。最近，解放军报的记者经常来我们司令部找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也来了，人民日报社的记者明天也要来。我们是否要发动大家都来收集有关资料？

会议还就今后我们是将工作的重点放到社会上还是放在学校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大家认为重点还是放在校内的斗批改，可以组织小分队搞社会调查，但不要影响工厂的抓革命、促生产。

会上一些人提出在市内还要设几个联络站，有人提出要恢复“汉口分台”，如不能实现，就搞几辆宣传车。因意见不统一，会上没有作出决定。

4月6日晚11点，张立国在司令部传达了上午军区召集新华工、新

湖大、新华农、三司负责人开座谈会的情况（我当时作了记录）：

信部长在今天的座谈会上说：“我们介入文化大革命的时间不长，对文化大革命还不够理解，今天请你们来，就是请你们提意见。”

湖大红八月代表说：军区支左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不是支左，而是支保。

红司聂年生说：支左在“2·18 严正声明”前后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后来军区来了一个180度的转变，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

红司张立国说：支左犯了方向性错误。是支左人员对文革不理解呢？还是军区领导故意的？军区现在执行了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了一大片，保护了一小撮。

座谈会上我们提出了以下几点要求：

1. 军区立刻正视自己的严重错误；
2. 收回对大专院校红卫兵的“三点意见”，取缔保皇组织；
3. 给我们的调查提供条件；
4. 对空军支左在外面放的毒，军区要表个态。

信部长讲了八个问题，我们不满意。我们问军区，武汉有没有资产阶级复辟逆流，信部长回答得很含糊。信部长说：

1. 军区支左基本上是贯彻了中央指示的，支左是有成绩的。
2. 工人总部、二司的处理是征求过你们的意见的。
3. 由于军区的任务重，经验不足，工作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是难免的。我们知错就改了。批判二八声明的问题，我们认为批得还不够，还没有揪出幕后指挥者，还没有提到纲上来。有人认为批判二八声明是阴谋，这个问题你们要考虑。
4. 关于对工人总部的处理，我们是比较慎重的。
5. 对于二司的问题，你们说二司是犯了错误的革命组织，你们要求改组二司司令部，我们同意了，现二司在整风，我们觉得他们整得还不深刻。
6. 关于大专院校红卫兵的问题：我们从来就认为他们是犯了方向错误的。但我们欢迎他们起来革命。我们之间分歧的由来在于是否允许他们基层组织恢复。关于大专院校红卫兵的问题，我们还要和大家商量一

下。你们要求取缔大专院校红卫兵，我们正在和中央挂电话，究竟要团结谁，谁要瓦解，对此，你们是否要区分一下。

7. 关于抓革命、促生产：工农业要按两个十条办事（工业十条、农业十条），周总理说了学生不要到工厂设立联络站，毛主席也肯定了不搞大串联。

8. 在会上我可能讲错话，公开检查不好，讲清楚就行了。我这个人不会和稀泥，我是坚决站在造反派这一边的。到你们学校去也可以，但不要搞文字性的东西。我们对你们是看主流，希望你们也看我们的主流。你们现提出要揪武汉的谭震林，这不大好，要严防被阶级敌人利用。

孔副司令在座谈会上也讲了话。他主要谈了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他讲话的最后说：军区有命令，撤消王任重武汉军区政委的一切职务。他还说：我们允许你们犯错误，你们也应该允许我们犯错误。

信部长的讲话态度是诚恳的，语气是平等缓和的。因此，大家在听传达时对军区支左办并无不满情绪。对于信部长说的第2、5条我当时还蒙在鼓里，因为在此之前，我们并不知道军区在工总、二司问题上曾和三新等主要头头通过气。

4月6日，中央军委发布经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中央军委命令》（即“军委十条”），再次强调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同时强调：“要防止赵永夫式的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原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对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或思想很右的人主持支左工作”。“对业已违反了上述诸条做法的，都要立即改正，积极进行善后处理。今后，坚决按以上各条办事”。

中央军委十条命令发布后，我们没有看到武汉军区在支左工作方面有任何反应，唯一的动作是于10日不给出任何解释，突然撤走了驻院搞军训的解放军。

4月8日，我们司令部开会决定炮轰孔庆德，批判军区支左所犯方向路线错误。

为什么要批孔庆德呢？因为孔庆德是军区支左指挥部指挥长，军区支左犯了方向错误，他是主要责任人。在这次司令部会上列举了他以下主要问题：

1. 湖北日报“3·4社论”《粉碎秋后算账派的反攻倒算》是针对当时造反派重新受压的情况写的，我们认为它和二八声明的性质是不同的。但孔庆德对“3·4社论”却恨得要命，他说“3·4社论”比二八声明更坏，并扬言“如果不好好检查就要抓人”。

2. 在对待二司问题上，我们认为二司是“有错误的造反派组织”，而孔庆德却认为：“工人总部做了的二司都做了，工人总部没有做的二司也做了。”意思是二司比工总更坏，更应该将二司取缔，一棍子打死。

3. 韩东山在黄石群众大会上大放厥词时（详见本章附件5），孔庆德就在旁边，他放任韩东山胡说，不予制止，说明他对造反派的立场、态度和韩是一样的。

当时全院都充满着反逆流的火药味。为了了解曾是保守派、至今也没有参加造反派的一些党员的思想情况，4月10日，我主持召开了电机系党员、干部座谈会。（详见本章附件4）

会上，大家回顾文革开始以来的经历，结合自己的感受谈了对目前武汉反复辟逆流的想法。一致认为当前反复辟是正确的，必要的。有的人甚至觉得“要是不把这一股逆流打下去，文化大革命前段所取得的成绩就全部被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也就进行不下去了”。

从发言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最近由我院大专院校红卫兵组成的“春雷”，是得到军区支左指挥部负责人支持和怂恿的。没有“支左”的支持也就没有“春雷”的出现。

就在这一天，解放军报发表了社论《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社论指出：“当前，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甘心他们的失败，正在勾结牛鬼蛇神，网罗社会渣滓，拼命转移斗争目标，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疯狂的阶级报复，掀起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他们极力混淆黑白，颠倒是非，造谣惑众，挑拨离间，玩弄种种阴谋诡计，妄图破坏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血肉联系，把斗争矛头引向人民群众。”“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别有用心地抓住革命群众组织前进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极力夸大，肆意歪曲，甚至无中生有，制造谣言，拼命往他们脸上抹黑，企图把他们一棍子打死。他们并且暗中操纵，竭力扶植已经

垮了台的‘保字号’组织，使它们死灰复燃，重新抬头，压制无产阶级革命派，把一些革命闯将重新打成‘反革命’。”社论号召：解放军“应该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要坚决为无产阶级革命派撑腰。”

许多单位的造反派举行了游行，热烈欢呼解放军报“4·10社论”发表。

4月11日，我院“九一五大队”的15名同学组成了一个“我们要见孔庆德战斗队”，到洪山宾馆要求见孔庆德。我得知情况后于当晚11点半左右乘宣传车也来到了洪山宾馆，这时已有几千人云集洪山宾馆，大家强烈要求孔庆德出来回答问题。

凌晨一点四十分，孔庆德出来了，他回答了有关问题。但其态度显然是不诚恳的，多数同学不满意，甚至感到非常气愤。

同学们要求就在洪山宾馆前召开炮轰大会，但没有开成。原因是我们事前没有准备，现场秩序很乱。我们根本没有办法使现场安静下来，大家七嘴八舌地提建议，但每提出一个方案，都会有人出来反对，根本无法统一意见。后来王富山表了一个态：不同意开炮轰会。我也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开炮轰会是不合适的。当时很多人骂我们右倾，弄得不欢而散。

12日凌晨一点左右，武汉部队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从北京打来电话，主要内容是：

1. 中学红卫兵是保守组织，要瓦解，不能重新组织。

2. 湖北日报问题：可以由新华工派两人、新湖大派一人、三司派一人、二司派一人组成一个监督小组，监督湖北日报的工作。同时，湖北日报可以发表造反派的文章，树立造反派的政治威信。

3. 承认军区前段时间在支左中存在缺点，同学们可以提意见。

4. 孔庆德立刻出来接见革命造反派。

对于陈司令的电话内容我们将信将疑，还没有等我们仔细分析判断，形势又发生了变化。

4月12日，新一中向市“抓办”提出撤出工作组、交出黑材料等四点要求遭到非难和拒绝，已静坐抗议四个多小时的一百九十多名新一中革司学生决定从晚上八点起绝食，表示不达目的，绝不收兵。

4月13日，新华工、新湖大等组织的代表在湖大开会，决定由新华工、新湖大等派代表到军区去，要求军区解决新一中问题，如军区到当晚12点仍拒绝，则在全市进行大游行，要求各造反组织做好行动准备。

这天，二司和其他造反派组织上万人也于当天下午、晚上前往洪山宾馆支援新一中的行动。晚上，清华井冈山还打来了声援电。

14日，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地院东方红、科技大东方红、北农机东方红、北林东方红、上海炮司、哈军工红色造反团、西军电临委等组织的赴汉代表团发表《关于强烈要求释放朱洪霞、胡厚明等同志的联合声明》。

4月15日凌晨，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孔庆德去新一中绝食现场，代表军区党委接受了新一中的四点要求。

这一天，工人总部联络站宣告成立，并发表了《严正声明》。声明指出：当前武汉地区出现了一股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必须坚决回击，彻底粉碎。“声明”要求必须立即释放无辜被捕的人并彻底平反。呼吁广大战斗队员积极行动起来，组织起来，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

这一天，我院的敢死队冲进了红旗大楼，并决定第二天在这里召开“纪念封闭湖北日报五周年大会”。新湖大、新一中及其他中学的二司战士也回到了红旗大楼。

4月16日，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二司、工造总司、红工等造反派组织在红旗大楼前召开封闭湖北日报五周年纪念大会。

当晚10点半，新华工驻京联络站的田勇给院广播台打来电话，内容如下：

1. 我们红司有关武汉市的情况汇报已通过蒯大富和红旗杂志编辑部转给了中央文革。中央文革正在密切注视武汉局势。

2. 据北京军事院校造反团称，他们已接管了全军文革接待站，我们在北京的同学正准备找陈再道辩论。

3. 不要搞绝食斗争。

4. 不要把矛头对准解放军，不要开大会轰，不要对孔庆德开斗争会。对我们的绝食斗争，中央并未表态说错了。要把矛头对上，要搞出高质

量的材料。

5. 中央文革已讲了武汉军区支左错了，江青可能最近要负责中南地区的运动（不要外传）。

6. 昨天关锋、王力接见了北京军事院校造反团，说到了关于解放军支左的相关问题，说主要是有错误，要注意策略。戚本禹“4·14”讲话的内容已由同学带回，可在全市传达。

7. 清华井冈山、新北大、新人大、地院东方红对我们是支持的。

4月18日上午，“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总联络站”及北航红旗赴汉调查组发表了《关于工人总部十大罪状的调查报告》，该报告否定了所谓“工人总部的十大罪状”，列举事实证明工人总部绝不是反革命组织，朱鸿霞不是反革命而是革命闯将。

19日上午，武汉三司近万人脱离三司司令部起来造反。他们在武大召开“三司革联”成立大会。三新、二司等造反派组织派代表出席成立大会，并表示坚决支持他们的一切革命行动。

这一天，原副省长孟夫唐给武汉军区陈再道、钟汉华并军区党委写了一封信，指出军区对形势的认识是错误的，在支左工作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上严重错误，并提出了改进工作的三点建议，公开站在了造反派一边。在此前后，刘真、张华、任爱生、薛朴若等也公开指出武汉军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表示坚决站在二司、三新一边。

4月19日，我们红司司令部和各大队主要负责人继续开会，分析当前形势和我们的应对措施。会议一致认为当前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批刘、揪武汉的谭震林。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司令部作出了如下决定：

1. 为加强司令部的统一领导，对司令部的机构作一定的调整：成立勤务组（常委会）、政治部（负责毛著学习及大批判）、动态组、宣传组、外交组、保卫组、后勤组、秘书组、办公室等九个部门。

人员分工：

勤务组（常委）：聂年生、郭保安、张立国、王富山（另再抽一人上来）。

委员：张汉卿、刘玉民、尹国祥、刘玉满、许玉贤、赵延昌（再由办公室和外交组各抽一人）。

政治部：张汉卿（负责人）、刘师明、刘勇、左玉明（女）。

动态组：赵延昌（负责人）、王九生、赵德镇、柳书伦。

宣传部：刘玉民（负责人）、张建华、江重初、胡家丰、叶仲翹。

联络部：朱海滨、郭保民、张敏。

保卫组：刘玉满、秦永发、陈西安。

组织部：尹国祥、刘衍清。

后勤部：许玉贤、张太行、刘多星、庞福生。

秘书组：邓家琪、吴家培。

办公室：杨盛国、黄信本、郭汉成。

教改、干部组：朱慧楠、庞福生。

2. 加强社会调查，以武汉市为主，适当派人到专区、县去（不要搞“还乡团”，人一定要由司令部派。）

3. 收集军区的材料（领导人的出身及在军内压制造反派的情况）。

4. 我院成立革委会的时机基本成熟，院内的斗、批、改要抓紧进行。

4月19日，钟汉华政委从北京打电话给武汉军区，其主要内容如下：

1. 解散工总，我们请示了中央，但在中央未批准下来时我们就办了，我们要作检讨。

2. 我们可能多抓了些人。

3. 我们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我们的错误是暂时的。

4. 三司是左派组织，对解放军的态度没有错，大方向没有错，要给三司谈一谈，叫他们积极准备斗争王任重。

5. 派到工厂、学校的干部抽回来学习并进行整训。

6. 要抓紧对刘、邓的批判，开大会，作大报告，可以到街上写大标语，但不能乱写。

从4月初中央军委“十条命令”发布到4月下旬，造反派与武汉军区的矛盾逐步升级，造反派对武汉军区由怀疑到直接对抗。而军区则无视经毛主席签发的军委“十条命令”，继续打压香花派，拒不改正武汉军区“3·21通告”的错误，拒不释放被抓的造反派负责人，而且对原来支持的毒草派也一并打压。学生造反派因得到中央的支持和鼓励，纷纷重新“杀向社会”“杀向工厂”，在工厂、机关再次建立了联络站。汉口中山大道上的民众乐园等处都有造反派进驻，并建立了广播站。群

众绝大部分站到了造反派一边，中山大道很快成为造反派的“解放之路”。武汉的反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运动进入高潮。

当时还出现了一个新的“组织”叫“钢八司”，以坚持八小时工作制、业余时间参加运动而得名。钢八司其实不能算是一个“组织”，其主要成员是工总基层组织被解散后仍然坚持造反派观点的一些工人战斗队员。他们的活动时间多是晚上7点到12点，喊出的口号是：“抓革命，促生产，坚决有效保护革命小将”，特别是保护“杀向社会”的革命小将，他们认为这也是“支左”。

4月20日下午，我们正在开会，新华工驻汉阳联络站的一个同学突然闯了进来，向大家汇报了有关汉阳轧钢厂的调查情况：

汉阳轧钢厂有职工1460人，工总曾经掌权，负责人夏帮银，中共党员，劳动模范。“3·21通告”前该厂革命、生产的各项工作都比较正常。3月17日，夏帮银被军管后的汉阳区公安分局逮捕。现全厂有1100名群众要求释放夏帮银，厂内绝大多数中层干部也都要求释放夏。

经研究，我们认为汉阳轧钢厂发生的事是一个典型，决定将其作为反击资本主义复辟、为工总翻案的突破口。

4月22日，我们驻汉阳的联络站派出代表到汉阳公安分局去要求释放夏帮银，指出公安分局逮捕夏帮银违反了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和中央军委“十条命令”，对其进行逮捕是非法的。但对我们的要求汉阳公安分局不予理会，并以他们是专政机关为由，要我们不要干涉。在无奈的情况下，三新、二司二百多人决定开展静坐斗争。

第二天上午，一个从汉阳静坐现场回来的同学向司令部详细地汇报了事情的经过：

昨天下午，我们汉阳联络站派了8个代表去汉阳公安分局，公安分局的人开始不出来，我们就用两个低音喇叭在公安分局外向群众宣传，说明我们为什么要求释放夏帮银同志。很快，周围就聚集了不少群众，并表示支持我们的行动。汉阳的保守派组织得知我们在公安分局静坐的消息后，也派了一些人赶过来和我们辩论。此时，公安分局出来了几个人，他们煽动说我们是来为工总翻案来了。于是，我们就和他们辩论起来。他们的理由是：我们是专政机关，你们不得干涉。我们的理由是：只要

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我们就有权干涉。这时，我们受到保守派们的围攻，谈判根本不可能进行。就在我们向群众宣传的时候，独立师调来了4辆宣传车向静坐现场的同学进行“宣传”，他们宣读武汉军区“3·21通告”，宣传陈再道、钟汉华、孔庆德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等。他们故意对我们的宣传进行干扰，我们的两个低音喇叭在独立师三个高音喇叭的压制下简直就像没有声音一样。

开始我们并没有发现公安分局院内有警戒线，可后来我们发现了。有一个解放军把其他人叫开，要我们进去，我们就进去了。当我们发现警戒线以后立即止步。这时一些人大喊大叫“你们过去呀，你们过去呀”，试图诱使我们冲警戒线。

公安分局的大喇叭不停地大叫，我们多次要求他们停止大叫，但他们不理，还是不停地叫，这使群众十分气愤，人群开始骚乱起来。我们新华工有3个人被挤到警戒线内，结果被警察抓了进去。23日凌晨一点左右，物资学校的一个同学从水管爬到放置喇叭的平台上，把喇叭拆了。结果被两个公安人员抓住从窗口丢进了屋子。

在这种情况下，同学们再也无法忍耐下去，于是就不管什么警戒线不警戒线而往里冲。公安分局的铁门立即被关了起来。此时我们外面的人往外拉，关在里面的人往外推，一推一拉，门很快就被拉开了，我们的两个同学首先冲了进去。此时公安分局出来了很多人，他们拼命地关大门，后来门终于关起来了，我们的这两个同学也就被他们扣留起来了。

就在这个时候，有一辆满载解放军战士的卡车径直朝我们冲了过来，我们的宣传车看到势头不对，立即指挥我们的同学就地坐下来。看到同学们都坐下了，军车才不得不刹车。过了几分钟，这辆军车才后退走了。

我们通过宣传车通知公安分局要求举行谈判，可在参加人数上争执了很长的时间，他们只准我们派10个人进去，我们同意了，但后来还是没有谈成。因为双方都不让步。过了一阵，又有几个解放军来了，代表们这才开始谈判。

在当时的情况下，谈判自然没有什么结果。不管我们怎么说，公安分局就是不同意释放夏帮银，大家只好继续进行静坐以示抗议。

这次静坐长达20多天。直到5月14日，汉阳区公检法军管小组在

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不得不释放关押了两个月的工总汉轧分部负责人夏帮银。

夏出来后，新华工、二司等群众组织多次召开群众大会，请夏帮银作报告，揭露资本主义复辟的事实。

在此前后，市公安局军管会还悄悄地释放了其他一些工人总部及其分部的负责人，如武汉锅炉厂的李洪荣，武汉重型机床厂的胡崇元、祝孝先等。

当时人们之所以将4月22日发生在汉阳公安分局的冲突称之为“汉阳事件”，是因为它标志着以我们新华工为首的武汉造反派已将夏帮银问题作为突破口，拉开了我们从行动上实实在在为工人总部翻案的序幕，而不仅仅是口头上说说而已。

4月23日，工人总部联络站、九一三战斗兵团在新华路体育场召开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誓师大会。工造总司、二司、南下赴汉调查组等组织派代表出席了这个大会。代表们的发言一致认为工人总部是革命造反派组织，要坚决彻底为工人总部翻案。

面对造反派日益高涨的反逆流斗争，武汉军区采取了反制措施。

4月24日，武汉部队第一次公开在武汉三镇贴出了大标语：“解放军坚决支持左派”“武汉部队支左大方向完全正确”等。同时指示派往各厂的军代表召开保守派骨干紧急会议，要求全部赶走在工厂办联络站的学生。就在当天晚上，到处出现了赶新华工、二司学生和砸学生联络站的现象。

为了应对急骤变化的形势，我们司令部即时召开了碰头会。赵延昌首先谈了他对当前形势的分析，认为目前武汉军区正集中火力对付我们新华工。现社会上所有的谣言几乎都是针对我们新华工的，不管是二司做的、新湖大做的，还是谁做的，他们都骂是我们新华工做的。赵延昌认为目前是军区暗中支持和操纵保守派与我们新华工对抗。

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就以下问题统一了认识：

1. 加强统一战线，除我们毒草派外，要充分发挥香花派的积极作用，特别是二司的作用。要力求避免我们新华工孤军作战的局面。

2. 对于“汉阳事件”，我们的方针是只能进，不能退。我们现在的

对策是大造舆论，在现场召开控诉会并设立接待站。相关大字报、大标语上街，给汉阳公安分局施压。

3. 对其他造反组织，特别是二司施加压力，要求他们积极行动起来予以配合。

4月24日晚七点，新华工宣传队“轻骑兵”从水利电力学院打来电话，说他们到水院慰问演出，受到水院广大二司战友的热烈欢迎，到处都贴满了“和新华工战友战斗在一起、团结在一起、胜利在一起”的大幅标语，要我尽快赶到水院，并代表红司司令部发言。

我随即乘车赶往水院。我到达后，晚会很快就开始了。水院二司负责人作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后，我代表新华工致答谢词，希望团结起来争取反逆流的胜利。

我的发言受到水院造反派同学的热烈欢迎，掌声经久不息。

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是武汉二司的牵头院校。“轻骑兵”这次在水院的慰问演出获得圆满成功。

4月25日，武汉部队出动两万多人在新华路体育场集会，会后在武汉三镇举行了行程达四十里的武装游行。红武兵、红城公社、大专院校红卫兵、中学红卫兵、三司等在各主要街道和路口夹道欢迎。解放军见了他们则高喊：“向革命左派学习”“向革命小将学习”，有的中学红卫兵还上了解放军游行的汽车，在汽车上炫耀。一些造反派冲上去要把中学红卫兵从车上拉下来，结果与解放军发生了冲突（后来被人说成是殴打解放军，冲游行队伍）。

军区要求湖北人民广播电台报导当天解放军游行的消息，由于造反派的坚决抵制，未成。

这天，造反派写出了“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决不容许枪指挥党”“4·25游行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绝不容许向中央施加压力”等大标语。

武汉军区在这个时候召开如此空前规模的大会并游行，其目的是显而易见的。除向造反派示威、给保守派鼓劲外，最主要的是向中央施压。因为当时中央已决定5月解决武汉问题，此前，武汉军区和武汉各造反派组织都已派人去北京汇报情况了。

4月25日这天我主持召开了宣传工作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院广播台和两个文艺宣传队（轻骑兵和红艺兵）的全体人员，各大队、兵团文艺宣传队的负责人。会上我传达了红司24日会议精神。特别强调我们当前宣传工作的重点是宣传造反派的大联合。我们一定要把已被军区打压下去的工总和二司的广大战士动员起来，共同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改变目前我们几乎孤军作战的局面。在这次会议上我还对即将到来的“五·一”“五·四”的广播和文艺节目的组织作了具体布置和安排。

这里提到的“红艺兵”，其成员主要是武汉艺术学校的同学，他们加入了我们红司，并在我们宣传部领导之下进行演出活动。我曾多次去艺术学校和他们讨论节目创作和编排问题。

红艺兵是一批生气勃勃且有艺术天赋的年青人，当时有13名女队员：赵小曼、周菊芳、许珞华、胡红琳、刘淑萍、陈小蓓、叶劲、汪明全、沈红、孙凌云、程惠文、杨先学、王德箴；男队员14人：李局雄、黄战、彭德祥、钱劲、刘宗清、赵伟明、何帆、陈士铨、余启文、王汉文、李武功、胡发云、贺学农、王育旺。

4月26日，数万名二司同学在武昌体育场举行热烈庆祝二司成立半周年大会。武汉各造反派组织和外地来汉造反派代表出席了会议，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由会场出发，浩浩荡荡跨过长江大桥，首次去到保守派相对集中的汉阳。游行队伍高唱“下定决心，为工总翻案，工总起来，武老谭完蛋”，高呼“坚决、彻底为工人总部翻案”“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逆流”等口号。

到4月底，在学生造反派全力反击资本主义复辟的影响下，省、市党政机关，各大专院校的干部也纷纷加入到学生造反派的队伍中来了。

4月27日，省委机关造反派干部在洪山礼堂召开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逆流大会。

为适应反逆流形势的要求，加强造反派间的团结和友谊，武汉学生造反派组织决定联合成立一个文艺宣传队。

4月28日，我作为红司（新华工）的代表参加了武汉造反派联合宣传队的筹备会议。会议在湖北大学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二司、三司革联武大总部等组织的代表。各单位的代表在会上

都发了言，表示坚决支持成立武汉造反派联合文艺宣传队。经讨论，对以下几个问题达成了一致：

一、造反派联合宣传队的宗旨：加强武汉造反派的友谊和团结，促进造反派间的大联合，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

二、宣传队的驻地设在湖大，广播器材、道具由新湖大、新华工和二司解决。

三、宣传队的人数暂定 26—30 人。

四、宣传队的队名为“星火燎原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联合宣传队”。

五、几个原则：

1. 宣传队必须突出毛泽东思想，政治标准第一。

2. 节目反映观点时，必须通过五个组织的讨论，如有不同观点冲突时，要求大同、存小异，有重大分歧时应放弃该节目。

3. 节目创作好后要交队主要负责人审查，有问题交宣传队勤务组讨论，大问题可交各组织总部讨论。

4. 宣传队必须参加运动，要求它既是宣传队，又是战斗队。

5. 宣传队要成为团结的模范，如有破坏团结的现象发生，相关人员必须承当组织责任。

会后，我为这个宣传队写了“成立宣言”。5月4日，由三新、二司、三司革联组成的“星火燎原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联合宣传队”在湖北戏校排练场（湖北剧场）召开了正式的成立大会。

星火燎原宣传队成立后在各大院校和工厂演出，对造反派的联合及反逆流运动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在“反复辟”的声浪中，工人总部的一些基层组织又纷纷打出了旗号，加入到反复辟的洪流中来。4月28日，工人总部电信分部在市电信大楼上重新打出了“工人战斗队”的大旗。

与此同时，武汉军区也正着手“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在武汉市大专院校群众组织中，他们由支持、依靠三新改变为支持、依靠三司。而在城郊，军区则试图利用农民来钳制市区工人、学生造反派。

4月29日，在汉桥区武装部的直接指挥下，江堤、红光、永丰等四个公社约六千名不明真相的农民进城参加游行，他们首先冲击了在汉阳

公安分局前静坐的造反派，接着又去汉口民众乐园一带挑起武斗，打伤过路群众多人。

武汉市武斗的序幕就此揭开。此后大大小小的武斗事件几乎一天也没停止过。

4月30日上午，张立国主持召开红司司令部及各大队主要负责人会议。赵延昌首先介绍了这几天在武测、湖大、四中、电池厂、硚口棉织厂和二十六中发生武斗的情况。

张立国说：汉阳这几天内估计要发生大规模的武斗，昨天有一万多农民在汉阳游行，这是一个不祥的信号。对此，我们应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会议就“五·一”大游行的相关事宜作了安排。

5月1日，三新、工人总部、九一三、工造总司、二司、三司革联等共十六个造反派组织数十万人冒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全市性大游行。

进入5月以后，武汉造反派已不大理会武汉军区的权威了，因而和武汉军区的矛盾也就进一步加深和扩展。

这时原省委的一些领导干部也纷纷加入到了造反派的行列中来，任爱生、张华、刘真等早在一个月前就公开表明了观点，认为武汉部队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执行了带枪的刘、邓路线，提出要为工总翻案。

5月2日，红司司令部召开全体成员会议，传达新华工驻京联络站的“北京来电”：

1. 陈再道正在武汉召开军区党委会，准备和我们辩论。

2. 三司组成了一个35人的控诉团到北京，要控诉新华工并状告新湖大，结果他们一下车就被北京矿院的造反派赶回来了。

3. 4月29日，毛主席给谢富治有一个指示，意思就是要支持革命造反派。

4. 根据内部调查，陈的问题严重。可以提“打倒陈再道”。

5. 谭震林昨天出来了，谭的问题是很严重的。但根据主席“一看二帮”的方针及谭的一贯表现（只在二月逆流中犯有错误），结合当前的国际形势让他出来一下。

对上述“北京来电”我们进行了分析讨论。多数人认为对第四条我

们还是要慎重，现在还不宜提这一口号。

当时我们心中始终有一个“结”难以解开。这就是既要根据毛主席的要求，相信解放军、依靠解放军、维护解放军的威信；又要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打倒一个解放军的司令员陈再道，这本身就是一个大矛盾。因此，虽然我们红司也早有人喊“打倒陈再道”了，但作为司令部的口号提出来，大家始终觉得不合适。

在这次会议上我们还讨论了有关三司的问题。一致认为三司和我们的矛盾性质正在发生变化，他们现公开站在“武老谭”一边和我们三新、二司作对。

当时街上的大标语是二司和三司对着干。二司骂三司是“康老三”（康者，康有为，改良派），而三司则骂二司是“袁老二”（袁者，袁世凯）。

5月3日，湖北日报社内部的造反派“捍卫毛主席路线总部”再次夺回了湖北日报的权。但联合印刷厂仍为军区的“湖北日报一线指挥部”所控制，因此，湖北日报只能拿到我们新华工出版科印刷厂排版、印刷。



湖北日报在我院出版科印刷厂排版印刷

因设备和纸张等原因，印量不多，基本上只能供张贴和散发。

5月4日，一万多不明真相的农民进城上街游行，向造反派示威。

5月5日下午，学生造反派各组织的头头在湖大开会，讨论大联合的问题。与会者要求联合的愿望都比较迫切，于是决定成立“武汉地区大中学校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

5月7日，市武装部组织一批农民来到我

们学校。他们本来是来寻衅闹事的，但我们深知其中厉害，于是便热情地接待了这些农民。对那些带头寻衅的少数人，我们尽量克制，并耐心周到地接待。农民们看到我们新华工秩序井然，和平安然，完全不是他们来以前头头们说的那样。因此，大多数人都高高兴兴地自动撤离了我们学校，那些准备来闹事的刺头们看到这种情况也识趣地走了。

这一天，孟夫唐写出了大字报《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对待武汉地区工人运动》，同时还写了一封给陈伯达并转中央文革小组的信，向中央文革汇报武汉地区存在的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问题。

5月8日这天我看到了《北航红旗动态》中关于全国形势的分析文章。文章认为全国总的形势是好的，有几个省实现了大联合和三结合夺权，且夺权后政权是巩固的。但也有一些夺了权的地方出现了反复，局部地区出现了问题。文章认为已夺权的地方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夺权后政权巩固，局势稳定，保守组织几乎全部瓦解，生产恢复了正常，目前正在开展对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大批判。这类地方有北京、上海、太原、贵州、青岛等。

第二类是夺权后有一些反复和波动，个别地区还有问题，如山东、山西、黑龙江等。

在全国某些地方出现了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大约是从2月份开始的，把造反派全部整垮。有四川、青海、内蒙、河南、新疆、湖北、安徽、南昌、福建等地。

这次反复的特点是：1. 走资派支持操纵保守派翻案。2. 残酷打击站出来支持造反派的革命干部。3. 某些军区执行了带枪的刘邓路线，他们以“矛头指向解放军”为借口，残酷打击造反派，大量捕人，制造白色恐怖。

“军委十条”发布后有下列造反组织得以恢复：四川成都“川大八二六”、“工人革命造反团”，河南“二七公社”、新乡“八一八”、开封“八二四”、洛阳“八二六”、“郑大革联”，乌鲁木齐“红二司”，内蒙呼和浩特“三司”，青海西宁“八一八”，安徽合肥“八二七”、蚌埠“铁红总”，河北保定“红二司”、“保定公社”，广州中山大学“八三一红旗”、辽宁“辽大八三一”等。

对照湖北武汉的情况，我认为武汉属于第二类情况。

5月9日，武汉地区大中学校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负责人与哈军工红色造反团、清华井冈山、西军电临委等驻汉联络站召开了联席会议，讨论了为工总翻案的问题，决定由武汉造反派和南下同学共同组成工人总部问题联合调查团，对工人总部的问题进行全面的调查。

5月10日凌晨二时，湖北省柴油机厂、武汉柴油机厂、新华印刷厂的数百名红武兵，分乘7辆大卡车冲入我们新华工驻邮电器材厂联络站，进行打、砸、抢，多人受伤。

也就在这一天，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分局出动上百人前往市公安学校支持保守派，并假借贴大字报、送声援书为名，蓄意复盖新公校红司刚贴出的大字报，因而发生了严重武斗。红司学生23人受伤，其中4人受重伤。为抗议这一严重事件，新公校发起了一场当时轰动全市甚至全国的“新公校绝食斗争”。

这天下午，工人总部联络站在新华路体育场召开了工人总部成立半周年庆祝大会。工人总部、九一三、工造总司、二司、三新、三司革联、中学红联等群众组织六万余人参加大会。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5月11日，钢二司司令部公布了武汉邮电学院总部关于工总电信局分部的调查报告：《武汉的谭氏人物在把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打成反革命的丑剧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上午，武汉地区大中学校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在武昌体育场、中山公园前隆重集会，声援成都造反派。外地赴汉造反派也参加了会议，数万人沉痛哀悼蓉城5·6事件死难群众。在武昌体育场的这次会上，联合指挥部的张维荣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十项决定。

会后，武汉地区造反派募捐支援四川造反派，并组织赴川慰问团到成都等地慰问川大八二六等造反派组织。

5月13日凌晨一点，中原印刷厂的保守派纠集厂外的红武兵、中学红卫兵近千余人冲入该厂，打伤造反派工人及新华工学生二十余名，毁坏印刷机两台，毁坏《新华工》报三万份，生产被迫停顿。

水院、武测、华师、湖医等院校的钢二司学生再次进驻井冈山大楼，

建立了“井冈山大楼事件平反联络站”，并发表了“第一号通告”。“通告”指出：井冈山大楼“没有什么反革命勾当，指挥部的头头绝大部分是革命闯将，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武汉军区发布的诬陷井冈山大楼内造反派的“3·9布告”“是一株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是继2·18声明以后，资本主义复辟的又一宣言书，所谓‘井冈山大楼展览’完全是武汉谭氏人物一手炮制的黑货”。

“新公校5·10事件”发生后，该校红司联合二司、新华工、外地赴汉造反派代表多次去军区支左办公室、市公安局军管会交涉，都没得到圆满答复，数十名新公校学生被迫于当天下午六时三十分首批宣布绝食。绝食示威发展到武汉三镇，数万造反派参加。“5·10火线指挥部”向市公安局军管会提出七点要求，表示“不达目的，绝不收兵”。

5月15日，钢二司司令部发出《为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翻案紧急动员令》，指出工人总部是坚定的革命造反派组织，广大战斗队员是革命闯将，为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为工人总部翻案关系到如何对待几个月来武汉地区工人运动的问题，关系到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问题，关系到能否击退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的问题。

这天，汉桥区保守派向全市发出“呼吁书”，说新华工、钢二司学生打了贫下中农，为挑动农民进城围攻造反派学生作舆论准备。这天上午，汉桥区江堤、红光、井冈山、南泥湾等九个公社和四新农场一万多农民在区武装部一些人的带领下，扛着锄头、扁担等到汉阳、汉口游行，高呼“不准为工总翻案”“坚决拥护武汉部队3·21通告”“支持红卫兵的一切革命行动”“打倒工总，镇压反革命”，甚至喊出了“打倒大学生”“打倒新华工”等口号。

这一天，原副市长、市抓办副总指挥薛朴若辞去副总指挥职务，公开表明态度站在三新等造反派一边。

王力、戚本禹在京接见武汉地区造反派代表。

晚上七时，夏帮银在汉阳公安分局门前作报告。

5月16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五一六通知”。

为响应中央关于拥军的号召，这天我们宣传部的叶仲翘带队给军区

送大字报。叶还代表红司司令部写了一封给军区党委的信，在指出军区支左存在的问题的同时，也充分肯定了军区在支左工作中的成绩。

这封信在我院内部引起了强烈反应。一些群众到司令部来造反，并贴了大字报。他们认为这封信对军区支左的评价太高了，实际上否认了“揪谭”。

对这封信我在宣传部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我认为这封信存在两个问题，但大方向应该肯定。

问题一：这封信没有通过司令部集体讨论就发出去了，这不符合组织原则。问题二：给军区支左定的调子不合适，高了。高了之所以是问题，因为一旦这封信被军区利用来对付其他造反派组织，那将给我们带来很多麻烦。二司等造反派将借此攻击我们投机，甚至说些更难听的，我们新华工在造反派内部的威信将受到严重损害。

我当时为什么说必须肯定这封信的大方向呢？因为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是文化大革命得以进行的根本保证。军队不能乱是毛主席的既定方针，也是我们的共识。基于此，我们充分肯定军区在“三支两军”中的成绩，即使过分一点也是应该的。

事实上，广大的解放军指战员，特别是在一线进行“三支两军”的指战员，他们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也是支持和同情造反派的。如在对待大专院校红卫兵的问题上，支左指挥部张副政委3月8日的讲话（五条）就几乎完全和我们的意见一致。在接下来的几次支左指挥部的同志和我们的座谈中，我们都可以感觉到他们的态度是诚恳的，对造反派是支持的。由此可以看出，在一线支左的广大指战员从思想到感情都是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应该说，支左中出现的问题（支持保守派，打压造反派），错不在一线支左的广大解放军指战员，而在以陈再道司令员为首的少数军区上层领导人。如果当时陈再道等支持支左指挥部的“五条”，也许武汉文革的历史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基于这一认识，我对叶仲翘给军区的信的大方向持肯定的态度。事实上，我在如何拥军和反陈（再道）的问题上当时是有所考虑的。在5月15日的日记中我就写下了如下文字：

5月15日 天气：晴

当前的斗争已进入了夺权阶段，各种政治势力集团都在尽其所能地争夺或巩固自己的每一个阵地。因此，目前的斗争就显得更加尖锐、更加复杂。

近来都在传说中央首长要接见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的消息。我认为，根据武汉的现状，中央对武汉的表态肯定不会引起武汉形势的根本变化。中央对军区的表态，肯定和陈再道他们表态的调子差不多。有些同志以为中央一接见，“武老谭”就会被揪出来，形势就会迅速变好，这种想法是幼稚的，不切实际的。

当前我们不但要敢于斗争，而且要善于斗争，要讲究斗争策略。如果用去年和省、市委的斗争方法来和武汉“谭式人物”斗，那肯定是不行了，因为形势变了、对象变了。

16日晚上，红司传达了昨天下午中央文革小组王力、戚本禹在北京政协礼堂接见武汉造反派代表的有关消息。戚本禹讲了三条：

1. 湖北来的人立即回去；

2. 军区支工、支农是有成绩的，但也有错误，主要是在支左问题上，但他们正在改正；

3. 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安徽的“五条指示”，凡是被错误打成反革命组织的要平反，被错误逮捕的群众要释放。

戚本禹的讲话精神不幸被我言中。事实上，如果陈再道司令员不采取极端行动，中央也不会怎么他，因为军队终究是毛主席依靠的力量。从这一认识出发，我认为在对军区的问题上，我们应慎之又慎。

整个5月份上半月，武汉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虽有一些激烈的摩擦，但总的形势是相对平静和稳定的。军区和造反派都没有采取大的行动，都在准备材料等待中央解决武汉问题。

当时总的形势对造反派是有利的。因为群众再一次发动起来了，工人总部的大多数基层组织都先后重新“竖旗”开始了活动，并积极投入到反逆流中来；社会上从一般群众到省、市机关干部，甚至一些领导干部也都行动起来，纷纷表态站在造反派一边，社会舆论出现了一边倒的局面。

此时，武汉军政府则显得有些被动和孤立。但当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军区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们表面上的沉默可能正意味着对造反派更大的迫害。

就在人们正兴奋、急切地等待中央解决武汉问题，准备迎接胜利到来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一场空前的灾难却悄悄地一步一步地降临了。

五、准军事组织——武汉“百万雄师”

当新湖大、新华工不顾支左指挥部的劝告，愤然退出4月4日“武汉军民批判刘、邓大会”时，信部长曾对陈再道司令员说了这样一句话：

“看来我们是要重新组织阶级队伍了”。当日晚我们司令部的会议上虽然有人提到信部长的这句话，但并未引起大家的重视，未对这句话的背景和含意进行认真的分析和讨论，更没有考虑相应的对策。事实上，我们当时可能想到的是：军区如果要“重新组织阶级队伍”，无非是进一步扶持大专院校红卫兵和职工联合会，对此我们根本用不着担心。因为大专院校红卫兵已在批资反路线时彻底被瓦解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包括骨干分子都已加入本校造反派组织，军区要把大专院校红卫兵重新组织起来和造反派抗衡，简直是不可能的。就我院来说，军区虽然在2月底3月初就表态支持大专院校红卫兵恢复基层组织，并派人直接到我院召开原大专院校红卫兵骨干分子座谈会，但收效甚微。我院当时虽然有人成立了如“春雷”之类的组织，但响应者寥寥，根本形成不了什么气候。至于职工联合会那就更不用说了，因为职工联合会不但在社会上名声狼藉，而且在造反派面前也是不堪一击的。

1967年5月16日，以“红武兵”（即“红色武装基干民兵”，其成员都为复员退伍军人）为首的几十个保守派组织联合成立了“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百万雄师联络站”。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通过武力首先占领了汉阳，继而又攻占了汉口并直逼武昌，除我们新华工、红水院等少数几个造反派的“解放区”“根据地”外，几乎整个武汉三镇都被百万雄师占领了。

直到这时，我们才真正认识到军区“重新组织”的阶级队伍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队伍，但为时晚矣。

原来，就在军民联合批刘邓大会后的一天，军区派人找到了武汉机械工业局武装部干事俞文斌，要他组织一支队伍与造反派抗衡。开始俞并未答应，但经不起军区的劝说和利诱，最终还是答应了。四十年后俞对采访者是这样说的：“武汉军区、省军区、市人武部的人拿了些文件给我，要我组织‘红武兵’，也就是你们造反派说的‘黑乌龟’。他们就这样逼我走上了这条路”。“军区派了两个便衣跟随我，名为帮助我协助我，实为逼我走上前台”。“当时‘百万雄师’得到了武汉市人武部的大力支持。市人武部政委巴方廷对我是积极支持的。我看老红军、老干部都支持我的工作，我就答应当‘红武兵’的一把手了”。“造反派当时主要攻击我们‘红武兵’，他们称我们是‘黑乌龟’。我们不怕，我们手上有武器。任何组织想搞垮‘红武兵’是不可能的。”¹

此后，俞成了陈再道司令员的座上客，支左部队独立师更是对俞礼遇有加。俞到独立师用餐，正在吃饭的军官都会全体立即站起来向他鼓掌致意。

百万雄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

百万雄师总站下设政参部、作战部、后勤部等机构。而作战部是其中最大的一个部，十三名常委中，作战部就占了三个。

军区专门指派两名军人“贴身警卫”并协助俞文斌工作，同时负责百万雄师与市人武部、省军区、武汉军区的联系。俞文斌说：这两个人“一是联络，将我们的情况上传下达，我们组织与市人武部、省军区、武汉军区联系都是通过他们两人。二是对我进行重点保卫。他们不穿军装，穿便衣，与我同吃同住，24小时形影不离”²。

为了提高百万雄师的战斗力，独立师各团还派专人指导各基层组织的训练。此外，百万雄师总站还以办“毛主席著作学习班”的名义抽调各分站的骨干分子集中在江汉公园、二七区委、中山公园、汉阳铁中、汽运四站、汽运六站等地进行军事训练。

在后勤保障及物质供应方面，军区指示市一商局、二商业局大力支持。用俞的话来说就是：“要什么给什么，大量供应。吃的、喝的、穿的、戴的，我们一要，送都送不赢。当时的武器除武装部保管的枪械外还有

^{1 2} 荣根《“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章迪杰等采访记》，2007年。

大量的长矛、匕首，极个别的人还有日本人的马刀。”¹

人们从上面的事实不难看出，百万雄师完全是一个由军区组织、指挥的准军事组织，同时也是军区的一个傀儡组织，用原公安系统保守组织“武汉公安”头头汪仕奇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是皮影戏，后面有人提线指挥。”²

百万雄师这个组织的成员非常复杂。几乎包括了社会各个阶层，各种行业。既包括工、农、兵、学、商，也包括社会上的三教九流。百万雄师成立时是由红武兵、中学红卫兵、大专院校红卫兵、红城公社（城市居民的组织）、造反大军、贫下中农协会、硬骨头战士等多个组织联合组成的。因红武兵的组织成员是复员转业军人、基干民兵，有较好的军事素质，战斗力最强，所以百万雄师以红武兵为核心，一把手也是由红武兵的一号头头俞文斌担任。

百万雄师的组织十分严密。其勤务组成员从不在公开场合露面，我们当时都不知道百万雄师的头头到底是些什么人。直到七二〇事件后，人们才从揭发材料中逐渐知道了百万雄师的一点内幕。

百万雄师是文革中最典型的保守组织。他们认为造反派跟着毛主席造反是错误的，而他们反对造反派才是正确的。因为他们是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保上级党委也就是保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保本单位、本系统的党委，保省、市委，保军区，保一切旧的体制。说它是保守派，他们当时虽不承认，但现在他们自己也不否认，而且常以此为荣。文革结束四十年后，百万雄师的头头章迪杰先生面对采访者坦率地说：“文化大革命是揪斗党内走资派，而我们这一派的绝大多数是党团员、劳动模范、工农积极分子。老干部是培养我们劳模、党团员的人，我们怎么会去反对他们呢？”³

由于百万雄师是军区组织并公开支持的，凭着解放军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威望，原职工联合会的群众都纷纷加入。工人总部被取缔后，造反原本不坚定的及随大流的工总战斗队员也加入百万雄师的队伍。工造总司头头胡重远带了几万不明就里的工造总司队员离开，先是成立“新工造总司”，后参加了百万雄师。还有就是军区通过农村的各级党委、

1 3 荣根《“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章迪杰等采访记》，2007年。
2 吴焱金《四十三年 望中犹记》第40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09年版。

各级武装部动员农民加入百万雄师。百万雄师就是这样急剧膨胀起来的。

百万雄师从不搞什么“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人们只见过百万雄师的大标语，从来没有见过它发表过任何文章，极少看到它的大字报、传单。他们根本不理睬文革十六条关于“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的规定，而是一味地搞武斗。

百万雄师最大的特点就是“行动、行动、再行动”，口号是：“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

就在造反派“反逆流”、“揪武老谭”、搞批判、搞游行、搞静坐、搞绝食，同时把最后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于中央的表态时，百万雄师已开始对造反派进行扫荡了。

5月17日凌晨，汉阳红武兵对在汉阳静坐的学生进行殴打，造成流血事件，数十人受伤。

也就在这一天，以庆祝五一六通知公开发表为名，汉桥区委书记王××、副书记兼区长曾××亲自挂帅，组织了六千多名农民上街游行，高呼“打倒工总，镇压反革命”“打倒三新、二司”等口号。

5月21日，军区支左指挥部发表《关于当前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中的几个问题》，指责造反派揪“武汉的谭震林”是转移斗争大方向。

5月23日，百万雄师汉阳分站三百余人手执木棒冲进三中，殴打二司红岩战斗队学生，数十人受伤。

5月24日中午，红武兵、红星军及红光公社的农民砸毁新华工驻汉阳广播站，六次冲击区委大楼，砸“5·17事件火线指挥部”，受伤者近百人。同时江堤公社一千多名农民在公社党委书记的带领下，由派出所所长亲自指挥包围了三中，二十多名学生被打伤。

5月25日，百万雄师砸了井冈山大楼内造反派的广播台。

5月26日军区出动一百五十多人武装包围新湖大，堵死前、后、侧门，声称要抓张华。

5月27日凌晨两点，汉口铁中、十八中、十三中等学校的中学红卫兵三四十人手执匕首、木棒、铁棍、钢鞭等凶器，在二十中附近撕毁大字报、大标语，并企图抢走二十中造反派的广播器材。二十中二司的张昌森头部重伤死亡。

6月2日晚，“星火燎原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联合宣传队”前往武汉邮电器材厂，为纪念北大大字报发表一周年大会演出，几千名红武兵突然包围了该厂，宣传队员、该厂造反派和新华工、新湖大驻该厂联络站学生，总后后勤学校学员三十多人被打伤，其中10人重伤。

这天晚上，武昌车辆厂工人战斗队召开重新树旗大会，红武兵冲进会场，工总、二司、新华工22人受伤住院，其中重伤16人。同一天晚上，红武兵冲进长办大院，打伤二司、新华工、长办联司的学生和职工多人。

6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公告》发布。“公告”以检查为幌子，大摆成绩，说：“对‘二·八声明’进行批判，我们积极给予支持并发表‘二·一八严正声明’是必要的、正确的。”“解散‘工人总部’及其下属的某些组织是正确的。”“‘工人总部’不能恢复。”“对‘工人总部’中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采取专政措施，是必要的。”“各级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做了许多工作，成绩是很大的。”等等。“公告”还说：“像孟夫唐之流，把自己打扮成‘革命的领导干部’，赤膊上阵，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煽阴风，点鬼火，拼命夸大，说我们‘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离间革命群众同人民解放军的关系”。

显然，这个“公告”是在为百万雄师加大围剿造反派的力度作舆论准备。

“六四公告”出笼当日，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在作战室召集百万雄师头头开会，牛怀龙公开表态称：“我是坚决支持你们的！”

这天下午三点，近千名头戴安全帽、手持木棒的百万雄师成员突然包围市委大楼，发生严重武斗，新华工、钢二司等造反派组织驻市委联络站被赶出，十多名学生遭到毒打，材料被抢走。此后，市委大楼成为百万雄师总站所在地。

6月5日凌晨两点半，国棉二厂“抓办”负责人带领数百名百万雄师成员砸了该厂工人战斗队等十多个造反派组织的办公室。

这天，“武汉公检法”等专政机关的保守派分乘七十多辆卡车在武汉三镇游行，高呼“坚决拥护武汉军区‘六四公告’”“解散工总，镇压反革命”“不许工总死灰复燃”等口号。

晚上六点半左右，武汉第二、第三砖瓦厂的百万雄师及红卫村中学

红卫兵五百多人在厂长王××率领下借游行为名，闯进建材学校，冲击该校钢二司、新湖大红八月反逆流联络站所在大楼，造反派21人受伤。

6月6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通令》说：除国家专政机关奉命依法执行必要的逮捕拘留任务外，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抓人，都不准私设公堂和变相地私设公堂；严禁武斗，严禁行凶打人，严禁在本单位和到外单位打群架，严禁抢劫个人所有的财物；除国家专政机关奉命依法执行任务外，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对任何团体和个人进行搜查和抄家。“通令”指示各地卫戍部队和驻军负责保证“通令”的执行，对于肇事者和背后挑动者，对于打死和打伤人的凶手，有权逮捕和拘留，依法惩处。

就在6月6日这一天中午，数百名红武兵截断了通往汉阳钟家村的交通要道，头戴柳条帽，手执洋镐柄、铁矛，攻占了设有二司、新华工等组织的联络站、广播台的汉阳区委大楼，打伤数十人，其中十多人重伤，杀死肉联厂工人杜世顺。

6月8日上午，百万雄师下属红城公社的三百多人以要在武昌区委开会为名，要新华工、新华农联络站搬走。随后武昌区曙光派出所十多人进入武昌区委，控制各门。不久，武昌造船厂一卡车百万雄师武斗人员赶到，关上大门，卡死楼口，殴打在此设联络站的二十多名造反派学生，重伤5人，绑架5人。

这天在六渡桥、大兴路一带多处发生武斗。武斗发生时，独立师的宣传车还叫嚷“打倒牛鬼蛇神”。“武汉公检法”用汽车送给百万雄师武斗人员大量水果、面包。

这天上午，独立师一张姓排长带领十几名战士和武船一千多名百万雄师成员，围攻武汉第二机床厂造反派组织“八一七”，打伤三十多人，其中重伤十多人，4人被逼跳楼，14人遭绑架，其中有学生4人。前往了解情况的新湖大学生柴玉本被绑架。

中午，数千名红武兵、中学红卫兵手执木棒、武装带、钢鞭游行。队伍接近湖大校门口时，挑起武斗，用石头向校园内乱砸，抢走新湖大高音喇叭。此时新湖大两百多名下乡支援夏收的同学分乘5辆卡车返校，红武兵、中学红卫兵将车团团围住，用木棒、武装带、弹簧钢鞭殴打，

致一百二十多人轻伤，五十多人重伤，有人遭绑架，围观群众有人遭毒打。

这天下午，在江汉路食品厂附近，红武兵向卡车上的九一三成员扔石块、砖头，挑起武斗，街道被阻塞，直至深夜。有人被打死，伤者不计其数，江汉路上到处是血迹和砖头瓦块，不少民房和商店遭破坏。

6月9日，为拔除与育红中学（设有百万雄师广播站）隔中山大道相望的居仁门中学（时改名“红锋中学”）红司（新华工）广播站，早五点左右，近两千名百万雄师武斗人员层层包围了居仁门中学，用砖头、石块、棍棒攻打，把学生逼上四楼，并断水断电。红司学生三十多人受伤，十人受重伤，围观群众也有不少被打伤。

6月中旬，武汉军区决定将对百万雄师的领导权从市人民武装部转到独立师。蔡炳臣在师党委会上说：“这是武汉军区党委对我们的信任，虽然有困难，也要接受这个任务。”¹

6月12日凌晨三点多钟，百万雄师两百多人冲进硚口工人文化宫，抢砸设在该处的新华工广播站，绑架15名学生。

这天下午，数千名百万雄师武斗人员攻打武汉汽车配件厂的“新汽配联司”，杨正超（全国劳模、工人工程师）等9人当场被打死，65人重伤，百余人遭殴打后被绑架到附近的国棉三厂。

6月14日晚十一点左右，百万雄师强行占领湖北人民广播电台大楼，抓走“广播战士革命造反总部”负责人刘某，湖北、武汉人民广播电台被迫于15日起宣布停播地方新闻节目。

6月15日，武汉军区发出《关于立即制止武斗的紧急呼吁》（六条），百万雄师发起的武斗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更见加剧。

当天晚上，百万雄师七百人攻占了中山大道附近的制高点——水塔，直接威胁当时造反派在汉口最大的据点人民文化园。

晚上十点半到16日凌晨，江汉路循礼门发生流血事件。四十多辆满载百万雄师武斗人员的卡车（无车号）从市委等地开往井冈山大楼方向。他们一路喊着“打倒工总，镇压反革命”等口号。到达循礼门后分兵两路，包抄街上群众。此时正好一列未发任何信号的火车驶入循礼门道口，切断了群众退路，百万雄师一通冲杀后多人被打死，伤者无法统计。1省直红司劳改局分部《反革命分子蔡炳臣、牛怀龙操纵“百万雄师”的黑幕》，载1967年9月8日《武汉钢二司》报。当时省劳改局和独立师师部在同一院内。

6月17日中午，百万雄师为夺取人民文化园，以江汉区财贸系统职工“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为由，集合二百多人进入离人民文化园不远的江汉区财贸大楼，和在楼内办广播站的造反派发生冲突。百万雄师作战部部长谢敏华在现场指挥，调集数千余武装人员包围财贸大楼，同时切断周边交通。驻民众乐园抗暴指挥部派出一卡车人员前往救援，发生武斗。造反派和围观群众伤一百二十多人、死24人，抢回的6具尸体上都有多处铁矛戳出的贯通伤口。傍晚，百万雄师数十辆满载武斗人员的卡车开往人民文化园，为成千上万愤怒的市民所阻挡，百万雄师用消防水枪也驱赶不散，一直对峙到18日清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百万雄师进攻财贸大楼、人民文化园的整个过程中，武汉三镇交通要道上都有“制止武斗”的解放军战士。

这天下午，我们红司司令部召开了全体委员会议，讨论目前的形势及相关问题。

这次会议决定：为了在中央解决武汉问题时争取主动，同时避开百万雄师的势头，暂缓“揪谭”。外面公开的联络站撤回学校搞院内斗、批、改，尽快建立院革委会。

6月18日下午六时左右，驻红旗大楼的造反派学生被迫撤出，下午，新湖大被迫撤离学校。

这天上午，武汉各造反派组织的负责人召开会议，商讨对策。

6月21日，我们司令部再次召开会议，讨论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对策。在当天的日记中我写下了如下文字：

这几天我们红司内部就“打”和“撤”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一方主张打，把“百万雄师”的嚣张气焰打下去，在时机有利的时候主动撤回和谈判。他们认为：“武老谭”挑起武斗的目的是在中央解决武汉问题前用武力把革命造反派打垮。如果我们现在撤回来，武汉将会出现全面资本主义复辟。我院是湖北、武汉革命造反派的一面旗帜，我们一撤，旗帜不在了，“百万雄师”势必更加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再说，我们有地方撤（撤回学校），可那些造反派工人撤到哪里去？另一方则主张应避开目前“百万雄师”正盛的锋芒而撤离。双方意见分歧很大，而且主张撤的一方人数要多一些。

6月23日早上七时许，百万雄师出动三十余辆卡车包围了铁道部第四设计院一百多名造反派，把他们逼上四楼及楼顶。下午五时，又增派24车人一起攻打，六点左右大楼落入百万雄师之手，造反派全部被绑架。

6月24日上午十时，百万雄师政参部部长蔡俊善等7人乘吉普，从铁四院督战后返回总站，路上被钢二司武汉水运学院总部学生扣押带回学校。百万雄师数次要求放人未果，先由“武汉公安”出动船只封锁了水运学院附近江面，深夜包围了水运学院八号楼上的学生和工人，用推土机把墙推倒，占领一楼，把一楼里的东西扔出来围在四周浇上汽油放火烧楼。百万雄师武斗人员逼着造反派举手投降，当场杀死一名学院工人，杀伤多人，其余楼内的人全部被绑走。

6月24日打打工造总司是独立师和百万雄师共同组织策划的。“6·24”血案发生前几天，独立师以检查消防为名，派两名军人来工造总司司令部大楼侦察，并绘制了详尽的地图。工造总司负责人对此毫无警惕，热情接待来人，任其“检查”。

进攻开始前，独立师派人在工造大楼附近的武汉市三十中与百万雄师人员开了三次会，商讨攻打方案，军人作了讲解和部署，攻打的每一步骤和细节都讲得很详细具体，要求一切都按正规作战程序进行。

24日凌晨三点左右，两万多头戴钢盔，手持铁矛、钢叉的百万雄师武斗人员封锁了工造总司大楼周边交通要道，包围了楼内二百多人，占领了周围的房顶，并用高压水枪向大楼喷射，之后又用火攻。这次大血案，造反派死28人，近百人受重伤。

造反派在汉阳最大的据点汉阳轧钢厂，6月23日下午被万余百万雄师武斗人员包围，24日被攻占。厂内造反派三百多人，被杀死5人，其中工人3人，武大二司学生2人；重伤25人，其余都被绑架关押。

6月25日下午，驻守汉口民众乐园、工艺美术大楼、中南旅社，武昌险峰大楼等处的造反派工人、学生撤离。

6月26日上午，长办联司撤离长办大院。

至此，造反派仅仅剩下武昌的新华工、红水院等两块较大的“根据地”了，而且军区和百万雄师对我们新华工的武力包围已经形成。

6月26日上午十一点多，中央文革办事组、军委文革办公室向武汉

军区发出电话指示，指示说：“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极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该按中央六·六通令处理。不久以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

中央“6·26电话指示”虽然给了军区和百万雄师以严重警告，百万雄师频繁的大规模的围攻有所收敛，但他们并没有打算执行。就在6月26日当天，百万雄师绑架了长办联司一百多人，翌日，又绑架了武钢九一三数十人。

27日汉阳区“公检法联合指挥部”给毛主席和林彪的一封信说：“6·26一纸电文给百万人民泼了一瓢冷水，大长了资产阶级威风，大灭了无产阶级志气”，“中央文革办事组对武汉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了解很不全面，助长造反派杀向社会，进行打砸抢抓杀，脱离了武汉二百万群众和军区广大指战员。”“6·26来电是支持了一方，打击压制了另一方，把被反革命操纵的组织——工人总部和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二司的罪名强加在百万雄师革命群众头上”，“起了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作用”，“给革命群众迎头一棒，压制革命群众的积极性”，要求重新调查、重新作出决定。

6月28日，百万雄师武昌区分站头头召集二三百人开会，研究形势，要求“坚持到底，不要解甲归田，半路散伙”。

6月30日上午，百万雄师围攻新湖大，用卡车改装的装甲车撞倒湖大围墙，冲进校园，当场杀死3人，杀伤数十人，不少人被绑架。

六、文攻武守

6月5日晚，我们红司司令部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动态组负责人赵延昌通报了近半月来百万雄师在武汉围剿造反派的情况及下一步可能的发展趋势。郭保安作了激昂的发言，表示要坚决进行自卫，并作了具体布置。与会者对百万雄师的暴行义愤填膺，一致表示：在红武兵的暴行合法化、凶手受保护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坚决实行自卫，以革命的暴力来对付反革命的暴力，“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今后若有人敢攻击我们新华工，我们的回答是：打！

6月7日凌晨4点30分，我院举行了第一次自卫演习。

广播台集合号一响，不到一刻钟，在东三楼就集结了四五千人，个个手拿木棒，群情激昂，每个人都作好了打的准备。

当天学校内一片准备战斗的气氛。有的同学爬上梧桐树锯树枝作自卫棒，有的同学锯钢筋，有的在做弹弓，有的在往楼上搬运石头，操场上不时可以看到三五成群的同学在比划着。

武汉各造反派组织也纷纷组织起来准备进行武装自卫。

6月10日，九一三战斗兵团向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发出“最后通牒”，强烈要求支左指挥部“老老实实、不折不扣地立即执行6·6通令”，解除百万雄师的武装，“否则我们将武装自卫和反击”。当天，九一三举行了抗暴自卫誓师大会，大会声明：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保卫革命小将的生命安全，九一三不惜付出最大的牺牲。



新华工战士宣誓：文攻武守，保卫毛主席！

6月11日，湖北日报发表社论《坚决打退反革命武斗黑风》，揭露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指使并操纵保守组织、网罗社会渣滓，企图镇压革命造反派，搞反革命暴乱的阴谋。同时指出：“那些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的人，坏事做得越多，罪恶越陷越深。欠债是要还的，深重的罪恶决不能用‘受蒙蔽’三个字一笔勾销。如果死不回头，就必将变成人民的敌人，那是死路一条。”

当天，武汉重型机床厂的千余名造反派工人手持木棍，头戴柳条帽，举行了游行。

6月12日，百万雄师武装进攻武汉汽车配件厂后，工总、二司、九一三、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成立了抗暴联合指挥部，提出了“文攻武守”的口号。

当天上午，武锅一千多造反派也举行了“武装自卫”游行。

当晚，关山地区的造反派工人、农民、学生在关山口召开万人武装自卫誓师大会。6月9日成立的“市革命干部造反联络站”（市革干联）负责人薛朴若在会上发言，支持这个会议召开，表示要与造反派一道彻底粉碎反革命武斗黑风。会后举行了游行。

6月18日，二司政宣部发出《紧急动员令》，号召二司战士紧急行动起来，坚决粉碎反革命暴乱的阴谋。

这天上午九时，武钢九一三、新一冶、武钢一冶红旗总部、工总青山分部等七个组织向支左指挥部和陈再道发出呼吁，要求立即停止屠杀，否则青山地区革命造反派将采取火速行动，不惜一切牺牲，突破重重封锁，杀过大江，全力抢救革命战友。

当天，工人总部发表《关于武汉目前局势的几点声明》，指出当前出现的打、砸、抢、绑架、暗杀及武斗是反革命暴乱，是成都5·6事件在武汉重演，工人总部广大战斗队员将用革命的两手坚决打击“武老谭”反革命的两手，迅速组织起来，杀回工厂去，就地闹革命。坚决支持九一三、工造总司、钢二司、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红卫兵革联等组织的革命行动，誓作他们的坚强后盾和亲密战友，坚决支持“大专院校革干联”的一切革命行动。

中午12时，武汉重型机床厂的工总武重兵团、九一六兵团等十多

个造反派组织向厂“支左”军代表发出紧急照会，呼吁执行中央“6·6通令”，立即制止武斗，解散百万雄师武斗集团，勒令武斗人员立即回厂。如若对一再照会、呼吁置如罔闻，武重四千多名造反派工人将武装自卫，杀向社会，展开全面反击。

当天，“洪山无产阶级革命派联防指挥部”所属新武重革联、武锅联司、新华工、新湖大、钢二司司令部等六十五个组织发表《严正声明》，指出：“武老谭当前所制造的大血案，完全是一种阶级报复，是反革命暴乱”，强烈呼吁武汉部队支左指挥部立即制止武斗，解除百万雄师的武装，严惩杀人凶手及幕后指挥；号召造反派实行“文攻武守”，在实行积极防御、狠狠打击一切来犯者的同时，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

钢二司所属各总部一万余人，上午在红武测大操场举行“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誓师大会”。

6月28日，“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发出《通告》，检讨了5月以来总指挥部右倾、逃跑的错误，表示总指挥部将立即回到新湖大办公。

早在4月底就传说中央将于5月解决武汉问题，造反派都把希望寄托于中央。因此，虽然各造反派组织在6月中、下旬都相继提出了“文攻武守”的口号，但真正付诸行动的却不多，多数只停留在口头上。如百万雄师6月24日发起对工造司令部进攻时，工造竟然没有设防，毫无武装准备。而工总虽然发表了强硬的声明，表示要“文攻武守”，但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正由于多数造反派组织只是将“文攻武守”停留在口头上，所以从6月中旬至七二〇事件发生，由独立师直接指挥的百万雄师对造反派的围剿真可谓是“所向披靡”，“势如破竹”。由汉阳到汉口，再到武昌，造反派的宣传“据点”一个个被拔掉，联络站一个接一个被捣毁，就连实力较雄厚的新一冶、长办联司等也不得不先后撤离本单位。

现在多数有关武汉七二〇事件的记述、评论文章中都说七二〇事件是“以百万雄师为首的保守派和以工人总部为首的造反派之间的武斗事件”。这显然不是历史事实。第一，当时只存在百万雄师对造反派的镇压和扫荡，根本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双方武斗。如果造反派当时真正认识到要以武力解决问题，要和百万雄师拼武斗，在用冷兵器的情况下，

即使百万雄师有军区的支持，即使造反派中没有工人总部参加，造反派也绝不会如此被动挨打的。因为造反派中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像工造、九一三、新一冶等造反派组织以及在武汉大中学校学生中占绝对优势的造反派组织，实力绝不亚于百万雄师。百万雄师的主力是红武兵，但人数有限。第二，作为百万雄师的主要对立面，也不是工总。首当其冲的是工造、新一冶和我们新华工，其次才是二司、九一三。因为此时工总尚属非法，工人总部实际上只是一个空壳，它的全部负责人都还在监狱里，绝大多数基层组织已经被解散，只有少数基层单位尚在活动，对百万雄师不构成大的威胁。

真正在行动上落实“文攻武守”口号的，也许只有我们新华工、二司水院总部等少数几家。

从6月初我们提出“文攻武守”以后，我们就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除组织准备外（成立了专门自卫机构“敢死队”、“武卫队”），在武器装备、通讯联络、情报收集等诸方面也作了相应准备。我们试制了土“手榴弹”、炸药、无线遥控地雷（6月27日我院附属工厂黄其万师傅、208班皮向东同学在配制炸药时不幸身亡），用卡车改装了一部“装甲车”，并在我院周边作好了充分的防御部署。在我院的各条道路上均安放了无线遥控的地雷，在东西两个操场安放了地雷引爆的氧气瓶，全部地雷都在南一楼进行无线遥控。如果百万雄师攻打华工，他们一进入我院周边就将遭遇地雷的杀伤。为了解决通讯方面的问题，我们架设了电台。电台一方面用于监听军区和百万雄师的通讯联络及他们发起进攻的相关情报，另一方面，在危急时刻可以用于向中央和外界求援并通过广播疏散我院人员。

面对军区和百万雄师的威胁，当时我院展现了空前的团结。当时我院除我们红司（新华工）外，还有其他几个小组织及一批没有参加任何组织的师生员工（约两千人），此时他们全都团结在红司（新华工）周围，积极地投入“文攻武守”的准备中，对外一律都称“新华工”。那时的新华工真可谓是同仇敌忾，万众一心。

惟其如此，促使独立师牛怀龙师长、蔡炳臣政委及百万雄师头头下定向新华工大开杀戒的决心，而我们新华工则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七、悲喜交加“7·15”

1967年7月15日对华中工学院来说绝对是一个悲喜交加的日子。

这一天白天，我院上下都笼罩在无比悲痛之中。因为这天我院有6位师生惨遭百万雄师残忍杀害，上百人受伤。

这一天晚上也是全院师生员工感到非常惊喜和宽慰的一个晚上。因为晚十一点，中央派来解决武汉问题的代表谢富治副总理和王力突然来到了我们学校，并在电影场对我院全体师生员工进行了慰问。人们转悲为喜，认为中央终于要解决武汉问题了，“武老谭”、百万雄师要完蛋了，我们要胜利了。

7月15日这天，百万雄师组织横渡长江。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组织了几万人的大游行，强烈抗议百万雄师绑架新一冶负责人徐飏等7人。

我院三千名师生员工冒着武汉7月的酷热参加了这次徒步大游行。根据游行指挥部的决定，我院为整个游行队伍殿后。

我院的游行队伍于上午九时从学校出发，步行经红旗大道（今珞喻路、武珞路）过长江大桥、江汉桥，经汉口中山大道、解放大道，从武胜路折返。

造反派的游行受到了武汉市民的广泛支持，特别是汉口的市民看到造反派的队伍又回到了汉口，都表示最热烈的欢迎。他们为游行队伍送茶、送水、送冰棒、送水果，一些市民甚至热泪盈眶地跟随游行队伍高呼“解散百匪，镇压反革命”的口号。

当我们的游行队伍经过武胜路电车公司时已是下午四点多多了，师生们从上午七点吃过早点到这时已过了九个多钟头，真可谓是“人困马乏”，疲惫不堪了。

可就在这时，电车公司大楼上百万雄师突然向游行队伍发起了攻击。他们从大楼上用砖石雨点般地向游行队伍掷来，因猝不及防，当即就有几名同学被击中受伤，游行队伍被迫靠街边走。后来一些同学不信邪，毅然决定不顾砖头瓦片的袭击从大街中间通过。专业武斗队闪电兵起初慑于我们新华工的气势，一时竟停止了扔砖石。但几分钟后，闪电兵就又向游行队伍扔掷起砖石来，并冲出了大门。他们以我们游行队伍中有

“黑工总头头”为由，大打出手。我们负责保卫的武卫队立即赶过来展开自卫还击，很快将其压回了电车公司大楼内，游行队伍继续通过。

就在我们的游行队伍刚通过一半时，百万雄师从就近的几个据点调来了全副武装的四五百人向我们的队伍扑来，而电车公司内的百万雄师也趁机手持大刀、长矛冲了出来。我们的武卫队立即给予了回击。但终因事发突然，缺乏思想准备，加之没有实战训练且寡不敌众，队伍很快被冲散。在混战中，李长亮、黄以礼、杜向东、王兴汉、张兴荣、朱纯钢等6位师生先后倒在了血泊中。

在极度危急的时刻，我们新华工武卫队向百万雄师扔了三颗自制的“手榴弹”，但似乎并未造成杀伤（我想应该有人伤亡，但一直没有看到百万雄师有关报告）。其中一颗还不知什么原因未能炸响，成了后来百万雄师说我们挑起武斗的证据。

与此同时，百万雄师又从中山大道方向调来几百个武装人员，他们迅速地切断了江汉桥、新华路口等交通要道，并开始对新华工师生进行围攻。

当时观看游行的群众人山人海，一些同学趁机混迹于群众中或就近在居民家躲藏起来。杀红了眼的百万雄师见人就一通乱打乱杀，并对附近居民挨家挨户进行搜查，把搜查出来的新华工师生全部用汽车拉走。

据参加了这次游行的同学回校后对我说，当时就和电影中日本鬼子进村时的情景一模一样。

有人初步估计，当天有上百群众和我院师生被打伤、刺伤，上百人被带到了百万雄师的据点关押。

我们班的同学也参加了这次游行。贺××同学（女）这天头部受了伤，是同学们拼死把她背回学校的。她是在队伍被冲散后躲在一条沟内被百万雄师用长矛挑伤的，至今还留有疤痕。

我们年级二班的曹××（女）也在这一天受了伤。她是被木棒打昏后被一位老奶奶救回了家。因当时各路口都被百万雄师封锁，不可能送医院救治，老奶奶一家只好在对其伤口进行简单消毒、包扎后让其在自家疗伤。7月25日她回到学校时，同学们都大感意外。因为十天不见她回校，同学们都以为她被百万雄师杀害了，学校还为她开了“追悼会”呢。

百万雄师在武胜路对我院师生的围攻和抓捕一直持续了三个多小时，直到工造总司的铁军闻讯后赶来支援，我院参加游行的大部分师生才得以安全返回学校。

为了防止百万雄师趁势对我院发动袭击，当晚司令部作出决定：加强院内外的巡逻并启用枪支，如百万雄师敢于发起对我们学校的进攻，我们将开枪还击。

当时我们的枪支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我院武装部保管的枪支，另一个是我院“特种仓库”原守卫连留下的部分枪支。枪支不多，但足可装备一个排。

根据司令部的指示，当晚武卫队除在院内外及周边进行武装巡逻外，还在市区往华工的必经之地鲁巷设下了埋伏。

可就是这个埋伏闯了祸。由于当时没有必要的通讯联络手段，更由于设伏的人复仇心切，神经绷得太紧，过度紧张，以至把开车前来支援我院的武钢中学生当成了百万雄师，并开枪射击。导致了当场2人死亡、多人负伤的难以言状的悲哀。

就我所知，这是我院文革中开的第一枪。然而这愤怒的一枪、复仇的一枪却没有射向仇人，而是射向了前来支援自己的战友。

当晚十一点左右，我们自制的“装甲车”开出了校门。刚一出校门，迎面就碰上了闻讯赶来新华工进行慰问的中央代表谢富治和王力乘坐的挂军用牌照的小汽车。

双方停车后，谢副总理和王力都下了车，并里外查看了我们的“装甲车”，当时他们什么都没有说，但看得出来，他们的表情凝重。

当“装甲车”上的武卫队人员得知是中央代表特意前来慰问时，立即跑步到东三楼向司令部报告。可这时司令部的几个主要负责人都不在。于是，他们打电话到院广播台找到我。当我听说中央代表来我院慰问的消息时自然十分兴奋。但主要负责人都不在，怎么办呢？转念一想，既然是来慰问新华工师生的，何不让中央代表在电影场直接面向全院师生员工进行慰问呢？于是，我立即叫广播台工作人员打开广播，通知全院师生员工到电影场接受中央代表的慰问，并决定由自己主持这次非同寻常的慰问大会。

我院电影场是一个能容纳万人的露天电影场。它像一个打开的贝壳，两侧都设有阶梯式水泥长凳，中轴线上有一块三百平方米左右的水泥筑成的台子，台子中央立有两根钢柱。放电影时在两钢柱上挂上银幕，两边看台上都可以看到清晰的电影画面。学校要召开全院大会时，中间的平台就成了主席台。文革时我院的大型辩论会和报告会都是在此召开。

当我陪同谢富治、王力来到电影场时，电影场一万多个座位已是无一空席。来参加大会的除我院师生员工外，还有数千名被百万雄师赶出来后在我院栖身的造反派。当人们看到谢副总理和王力步入主席台时，全体人员都站了起来，满含热泪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我们想念毛主席”的口号。

谢副总理和王力先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简短讲话。

谢副总理说：“我代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周总理、伯达同志等中央首长向新华工全体师生、向到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武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问好，并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接着他说：毛主席、党中央非常关心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武汉问题将很快得到解决。最后他向我们提出了两点要求：1. 要用文斗，不要武斗，要在制止武斗方面做出贡献；2. 坐下来学习毛主席关于文化革命的一系列指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自我批评。

王力接着讲了话。他说他相信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解放军能解决好武汉的问题。他要求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抓住主要矛盾，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凡是骂人的口号都不要喊。希望各派尽快达成协议，立即停止武斗。武汉军区必须保证“6·6通令”的执行，群众组织的武器一定要交出来，所有的武斗工事都必须立即拆除，所有武斗据点都要解散，一定要保证“四大”的正常进行。

我代表全院师生员工感谢中央首长对我们新华工的关心和慰问，表示我们新华工坚决执行毛主席“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的指示。

谢副总理和王力讲话后，直接从电影场乘车离开我院返回东湖宾馆。

中央代表来院慰问给了我院师生极大的支持和鼓舞。长期压抑、愤懑的心理终于得到了一时的缓解。人们都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认为武汉

问题终于要解决了，胜利的曙光已经在我们的面前展现了。

然而，当我院3名师生被百万雄师残忍地活埋的消息传来时，人们的神经却再次绷了起来，而且绷得更紧了。一种难以言表的愤怒、压抑、紧张甚至恐怖的情绪很快蔓延开来，并笼罩了整个校园。

7月18日，驻汉雷达兵某部在他们驻地附近的菜地里发现有三人被活埋，估计死者是我院的学生，于是就通知我院派人去确认。

参加认领的我系的一个同学告诉我说：

“当我们赶到时，发现在一片新挖过的菜地上露出三个脑袋，面目全非，惨不忍睹。因三个死者的舌头都伸出好长，是被活埋的确定无疑。当我们从农民那里借来工具将三位的遗体挖出来时，我们从其中的一位身上找到了一枚华中工学院的校徽，从而证实死者确实是我院的。在检查他们的遗体时，发现三人都是伤痕累累，后来被确认为我院基础课部体育老师的遗体上竟有被长矛刺出的二十多处伤口。我们请附近农民给遗体作了清理，并买来白布覆盖后立即搬上车往回赶。当我们的车快到学校附近的鲁巷时停了下来，并通知了郭保安。当郭保安一行人来到鲁巷听了我们的报告并看了遗体后，无不愤恨难已，伤心流泪。

“如何处置遗体？经在场人的讨论，一致认为：如拉回学校让师生们看到遗体的惨状，其后果将是难以预料的。它会像一座复仇的火山，随时都可能爆发。再则，当时气温很高，遗体已开始腐烂，必须尽快处理。于是，郭司令决定遗体不拉回学校，第二天直接从鲁巷送火葬场火化。”

为了贯彻谢副总理和王力同志15日晚反复强调的“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的指示精神，我们红司司令部没有对三名师生被活埋的事作任何宣扬。《新华工》报在院革委会成立时所发长篇通讯《新华工在前进》中也没有提到此事。

“7·15事件”留给新华工的记忆是惨痛的。以致事件发生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曾亲历了这一事件的人一谈及此事无不扼腕唏嘘。

现网上一些武汉文革回忆文章认为“7·15”只不过是一次偶发事件，是因为造反派喊口号激怒百万雄师而导致武斗。当年百万雄师的主要负责人章迪杰2007年3月在和采访者谈话时也说：“7月15日我们‘百万雄师’组织横渡长江，造反派组织全市游行。造反派故意在电车公司门

口挑衅，喊‘解散百匪，镇压反革命’的口号。电车公司本身就是据点，集结了一些人在那里，以二十多岁的青年人为主，有‘霸王鞭’、‘铁臂摇’等组织，有几个青年被激怒了，于是打了起来，所以‘7·15’没有预谋，是突发事件。”¹

7月15日百万雄师对我们新华工游行队伍的冲杀，显然是独立师和百万雄师中的某些人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的。俞、章所说“7·15事件”他们“没有预谋，是突发事件”，显然另有隐情。

一、我在前面曾说到我院为应对突发事件而设立了监听电台。就在我们的游行队伍出发后，守候在南一楼五楼监听电台旁的有关人员就立即行动了起来，他们很快调好了独立师和百万雄师通讯的频率，并密切关注着他们的联络信号。开始没有什么异常，但当我们的游行队伍返回快到武胜路时，监听电台里突然传出了独立师给百万雄师的指示：“新华工游行队伍很快就要到达武胜路，各单位做好战斗准备，迅速向武胜路口集中。”当我们的游行队伍到达武胜路时，独立师立即向百万雄师发出了具体的命令：“×××厂向××路口集中”“×××厂向××路口集中”……。不一会又发出命令：“新华工游行队伍已接近武胜路口，各单位做好战斗准备！”命令声和接受命令的回答声在监听电台中此起彼伏。

当时，在电台旁的同学们都知道我院师生已陷入了重围，真是心急如焚，但他们此时却什么也做不了，完全无能为力。既不能将情报及时报告给司令部的头头，要他们采取相应的措施，也不能和其他造反派组织取得联系以得到支援。因为头头们全部都在汉口游行队伍的行列中，在当时的通讯条件下，根本不可能和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取得联系。监听人员此时唯一能做的就只能是尽力做好录音工作，以便事后向中央如实反映情况。

“七二〇”后，当时的录音带已上交给中央，相信总有一天此录音会公之于众，使真相大白于天下。

二、如果事实真像俞、章所说是因为“造反派故意在电车公司门口挑衅，喊‘解散百匪，镇压反革命’的口号”激怒了“几个青年”，才

¹ 荣根《“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章迪杰等采访记》，2007年。

导致对我们新华工游行队伍的冲杀，那为什么口号喊得更尖锐、更刺激的走在前面的那么多游行队伍通过时这“几个青年”没有被激怒，却偏偏是我们殿后的新华工喊了几句却激怒了这几个人呢？

三、那天，我们新华工为了展示我们“文攻武守”的决心，参加游行的三千名师生中有近千人是头戴柳条帽（也有一些是铝盔）、手持木棒的“武装人员”，他们个个斗志昂扬，其势可想而知，这岂是百万雄师“几个青年”敢到游行队伍中抓人并大打出手的？

四、我院师生与电车公司“闪电兵”、“霸王鞭”发生冲突后不到二十分钟，百万雄师分散在不同地区、不同武斗据点的近千名全副武装的武斗人员就赶到了武胜路并封锁了附近的各个路口，如果没有周密的计划和强有力的统一指挥是完全不可能的。

认真分析“7·15”事件的整个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从肇事者对时间、时机、地点、目标的选择及善后处理都是按军事作战的思路和方法进行的，是经过严密思考和计划的。

在时间上，他们选择在我院师生已步行近三十公里，九个多小时未进食，已疲惫不堪的时候。

在时机上，他们选择了大部分游行队伍已过了江汉桥，只剩下我们殿后的新华工还未过桥的时候。

在地点上，他们选择了武胜路。因为这里既有百万雄师现成的武斗据点——电车公司，又紧挨江汉桥，而江汉桥是游行队伍返回武昌的必经之路。他们知道，只要封锁了江汉桥，我们新华工的游行队伍就完全孤立无援了。

在寻衅滋事的借口方面，他们也是经过认真研究后选择的。当时工总还是“反革命组织”，因此，他们就以我们的游行队伍中有“黑工总”的坏头头为借口对我们的游行队伍进行冲击。

从以上事实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7·15事件”是独立师和百万雄师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的，绝不是什么“偶发事件”。俞文斌、章迪杰说该事件是偶发事件，只能说明他们对这一事件的发生过程及其后果并不了解或不完全了解，也可能就是不敢说出事实真相。

事实上，百万雄师自成立以来就一直是军区的一个傀儡。特别是6

月11日独立师接过对百万雄师的指挥权以后，百万雄师所有大的行动，都是由独立师直接指挥的。在2007年7月6日和29日武汉两派主要负责人的“历史性的会见”中，俞文斌说：“‘七二〇事件’前攻打造反派据点，‘百万雄师联络总站’勤务组没有开过一次会议研究此事。”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说，攻打造反派这些行动都是独立师某些人策划的，不仅百万雄师勤务组的其他人不知道，就是百万雄师的一号头头俞文斌也完全被蒙在鼓里，以至于一无所知。

众所周知，“6·24”攻打工造是百万雄师在文革中制造的震惊武汉三镇的三大惨案之一，是独立师和百万雄师进行了缜密的侦查并制定了严密的作战计划后实施的。但当采访者问“6·24打了水运后为什么还要攻打工造？”章迪杰的回答是：“当时我们并没有攻打工造总司的计划。我当时不理解为什么要去打工造总司。6·24打水运，是作战部安排的。为什么6·24同时又打了工造总司、汉轧（汉阳轧钢厂）等三处地方，我不理解。我对工造的印象不是蛮坏”¹。这里顺便要提一下的是：百万雄师的主要头头对我们新华工是比较尊重的，他们认为我们新华工注重政策，水平高，“不会乱来”。正由于他们对我们新华工有这种信任，在中央对七二〇事件公开表态后，他们在考虑向哪逃亡时首先考虑的是“去新华工”。由此也可以看出，如果不是独立师的某些人刻意要对我们新华工开刀，百万雄师的负责人是不可能作出向我们发起攻击的决定的。也就是说，如果不是独立师的组织指挥，“7·15事件”根本就不可能发生。

八、白色恐怖的“七二〇”

1967年7月上旬，毛主席、周总理在北京确定了解决湖北武汉问题的方针和政策，决定派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组成解决武汉问题的中央代表团并亲赴武汉坐镇指挥。

7月14日下午，谢富治、王力、余立金飞赴武汉，周总理则随后到达。晚九时，毛泽东主席的专列秘密到达武汉，代总长杨成武、中办主任汪东兴和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陪同毛泽东同时到达。

¹ 荣根《“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章迪杰等采访记》，2007年。

毛主席确定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是首先解决部队的问题。

根据毛主席确定的方针，从7月15日开始到18日，周总理、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人参加了武汉军区召开的多个会议，听取了军区负责人和各支左部队负责人的汇报。

18日下午，总理在武汉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总结讲话。主要内容是：

第一、武汉军区首长要主动承认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尤其错误的是解散工人总部。出图片，是严重打击、压制了群众，要彻底平反，要释放被关押的造反派头头。因主要责任在陈再道、钟汉华同志，因此中央建议陈再道和钟汉华进行自我批评。

第二、肯定工人总部、二司、九一三、三新是真正的革命群众组织，是左派，大联合应以他们为核心。

第三、凡是群众组织都不能取缔、强行解散，就是保守组织也不能解散，要教育争取。

第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工总起来后可能进行报复，要做好说服教育工作，这个工作中央帮助来做。

第五、三司是倾向保守派一边的群众组织。

第六、军区要作农民的工作，不要进城来参加武斗。

第七、军区党委除要承担责任外，还要作部队教育工作，教育下属单位支持造反派。长期的影响，不作这个工作是不行的。

第八、所有群众组织要进行整风，好好学习，改变对解放军的看法。

总理最后强调：他的意见是代表中央和毛主席的，要求对毛主席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要执行。军区的错误改了就好了。

会议结束前，总理宣布了一条纪律，当天会议的内容暂时保密，不要向下传达，不要上大字报，先向部队广大干部战士做好政治思想工作。

为了消除百万雄师和造反派之间的对立情绪，给解决武汉问题创造良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在军区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期间，中央代表团不失时机地做两派群众组织的工作。

谢富治、王力继15日来我们新华工后，于17日凌晨接见了百万雄师负责人，要求百万雄师停止武斗，不要搞煽动武斗的宣传，所有武器、

凶器上交，拆除工事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不准挑动农民进城，不准动用生产工具、动用汽车，不准拦车。要求百万雄师好好学习，要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怎么一回事，要知道应该反对谁、斗争谁、打倒谁，要知道毛主席为什么要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接见了百万雄师负责人后，谢副总理、王力、余立金又来到武汉测绘学院钢二司司令部，与钢工总的沈复礼、九一三的陈滌、钢二司的方保林、三司革联的许谦等进行了座谈。谢副总理要求：1. 立即停止武斗，制造谈判气氛，为解决武汉问题创造条件。2. 坐下来学习，学习中央文件和社论，特别是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王力也讲了话。他强调说：武汉问题最终还是要靠军区和革命群众组织来共同解决。因此，要求造反派拥护军区，拥护陈司令员，不要随意提口号（打倒陈再道的口号），要做团结的模范。他说主席有个最新指示，对于保守的群众组织，甚至是反动组织，也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

在这次谈话中，谢副总理还要求造反派坚决按主席教导，团结大多数。并告诫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他举例说：去年8月，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了一封信，高度地评价他们，热情地支持他们，赞扬他们。他们是一批老红卫兵，但后来因这些红卫兵骂人家黑七类、狗崽子，只准自己革命，不准别人革命，结果他们走向了反面。

7月17日，根据谢副总理的指示，为了保证“四大”的正常进行，促使武汉问题的解决，我们新华工及三司革联、工总、九一三、二司都发表了有关立即制止武斗的严正声明，表示坚决执行毛主席“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的指示和中央“6·6通令”，并决定在中央解决武汉问题期间不搞大型集会。同时呼吁受蒙蔽参加保守组织的革命同志立即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强烈要求武汉军区按毛主席指示办事，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担负起维护和巩固无产阶级革命秩序和保卫国家财产、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神圣职责。

7月19日凌晨，谢副总理、王力、余立金等在红水院接见了三钢等造反派数千人，并发表了与来我们新华工时类似的讲话。

谢副总理和王力的讲话大大地鼓舞了武汉地区的革命造反派。当天，武汉造反派和军事院校的造反派纷纷上街宣传中央代表的“7·19讲话”。

就在造反派欢欣鼓舞准备迎接胜利的时候，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独立师却要铤而走险了。

就在18日周总理总结讲话的当晚，独立师蔡炳臣政委违背周恩来“不要向下传达”的指示，将周总理的总结发言传达给了师团级干部，次日又传到排级干部和战士，并将派往各处的军代表调回营地听传达，要求这些军代表马上回去组织群众传达。在传达中蔡炳臣和部队部分领导故意挑动战士和群众的对立情绪。

19日深夜，百万雄师成立“专揪王力火线指挥部”，谢敏华任指挥长，省直联司头头杨以才任副指挥长。独立师有人参与并起主导作用。就是这个“指挥部”，组织、发动和指挥了震惊中外的“武汉七二〇事件”。

与此同时，独立师和百万雄师几百人冲进军区大院，要求陈再道和钟汉华不要作检查，并要求陈、钟出来“解释”他们提出来的问题。

紧接着，武汉三镇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谣言，如：“王力背着中央散布了处理武汉问题的四条意见，把百万雄师打成保守组织。”“王力的老婆是新华工的副教授，所以新华工的消息那么灵通，他儿子是二司的头头，所以王力说二司好。”“王力是国民党员，是从公安厅查到的，还来不及向中央报告。”“王力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所主持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之一，是反革命纲领‘二月提纲’的起草人，是推行苏修教育路线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以前是刘少奇重用的红人，是孟夫唐的学生，是王任重的好朋友……他混入中央文革后，摇身一变以极左的面貌出现。他在哪儿插手，哪儿就出现武斗。”

20日凌晨，数十辆军车满载独立师荷枪实弹的军人，四十多辆卡车满载拿着长矛、大刀的百万雄师武装人员，从前、后门冲进谢富治、王力下榻的东湖宾馆百花二号，要求王力出来“回答问题”。

面对来势凶猛的独立师战士和百万雄师群众，谢富治开始要求他们派代表进去谈，后又打电话要正在东湖宾馆的陈再道来百花二号解决问题。陈来到后他表示无能为力（陈还被独立师军人和百万雄师的人误认为王力而挨了一拳）。

在一片混乱中，王力被独立师战士和百万雄师人员拖上了车。

王力被带到军区大院4号楼，被批斗、殴打，逼他对武汉形势和百万雄师性质重新表态。

十点后，独立师和百万雄师开始武装示威游行。游行队伍中，独立师战士全副武装，百万雄师的人则带着藤帽，手执木棒、长矛。他们高喊着“踏平工总，为民除害”“打倒谢富治、绞死王力”之类的口号。

车至湖北大学前，一位独立师军官对空连开数枪，百万雄师呐喊着冲进学校，毒打群众，当即打死1人，重伤3人。

当天，独立师大量印发了《特急呼吁》。《特急呼吁》说：“‘百万雄师’是真正不折不扣的、浩浩荡荡的、硬梆梆的、响当当的革命左派组织。他们最听毛主席的话，紧紧掌握了斗争的大方向，把斗争的锋芒始终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旗帜鲜明，是执行和捍卫党中央指示的模范，是‘抓革命，促生产’、‘拥军爱民’的模范，是制止武斗和打击牛鬼蛇神的英雄”。《呼吁》还说：“坚决支持‘百万雄师’的一切革命行动，誓作他们的坚强后盾，坚决和‘百万雄师’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谁敢妄动‘百万雄师’的一根毫毛，我们就毫不留情，杀他个片甲不留”。“我们再次重申，黑工总是个地地道道的被反革命分子操纵的组织，我们坚决踏平工总，为民除害，‘三新’、‘二司’的大方向完全错了”。

百万雄师汉阳分站也于当天发表《特急声明》，说《特急呼吁》“是一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勇敢捍卫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庄严誓词，是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宣言，是响应‘拥军爱民’号召的模范行为”。

7月20日这一天，武汉的工厂大都被迫停产，交通中断，街道堵塞，整个武汉三镇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

我当天的日记是这样写的：

7.20 天气：晴

暴乱和恐怖的一天

今天在武汉发生了空前的骚乱和恐怖的事件。

前天上午，周总理、谢富治副总理、王力同志、余立金同志在军区

召集了师以上干部会议。会上，周总理对武汉问题作了表态（说了六点）。当天晚上十点左右，独立师开始骚乱起来，几百名解放军战士在没有军纪约束的情况下大喊大叫起来，高呼“打倒谢富治、绞死王力”、“王力不能代表中央文革”、“百万雄师是真正的革命左派”等口号。

从昨天十点到今天下午五点，几百辆卡车满载着“百万雄师”和解放军战士在大街上示威，一些解放军战士打着“百万雄师”的大旗，佩戴着“百万雄师”的袖章，大叫着“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的口号。每辆卡车上都架着机枪，有些战士还把枪交给“百万雄师”的人，有些解放军战士竟然拿着“百万雄师”的长矛，他们衣服敞开着，军帽斜戴着，有人说他们和“土匪”一个样。

街上一片白色恐怖。

“百万雄师”的车又过来了，一辆、两辆……三十辆、四十辆……

独立师的车过来了，战士们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车以波浪式方式前进，两边的群众为了躲避而纷纷奔跑躲闪。

“百万雄师”的车又过来了，喏，一百辆，两百辆，四百辆，……

消防车来了，像一群怪兽，刺耳的警报声使恐怖的气氛更加强烈。

大街上的大标语都是“百万雄师”的，什么“打倒谢富治、绞死王力”、“独立师是支左的模范”等。

独立师的“特急呼吁”出来了，遍街都是。

人们都在议论着：“独立师今天终于撕下了支左的面纱，公然亮相支保了，他们原来不敢喊的口号今天终于喊出来了。”有人惊奇地问：“解放军为什么也会打人了？”有人则愤懑地说：“陈再道真的该打倒！”

街上传说很多。说水院（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疏散了，武大（武汉大学）疏散了。说什么“江青、陈伯达来汉了，要接见‘百万雄师’”，“周总理来汉了，王力已被开除出中央文革小组”……

呀，开枪了，一枪、两枪，一共开了九枪。一个军人毫不隐讳地掏出手枪，在光天化日下，啪、啪、啪又连开了几枪。……

今天是反革命暴乱的一天，白色恐怖的一天。

7月21日，独立师和百万雄师继续出动近千辆卡车、消防车、装甲车进行全副武装游行。游行中他们包围新湖大，数次冲进湖大校园，

强行抓走新湖大临委会成员张维荣、谢邦柱、彭勋及各兵团主要负责人二十余人，抓走师生、教工家属、群众 208 人。大字报被撕毁，民兵训练的枪枝弹药被抢走，人事档案材料遭到破坏，宿舍里的物品被洗劫一空。水院、湖艺、武医、一中、二中、三十四中、韶山中学、汉剧院等也遭到同样的命运。

7 月 22 日，独立师和百万雄师的疯狂行动仍在继续。和昨天一样，街上一片恐怖气氛。

恐怖游行的车辆猛增至 1500 辆左右，除郊区的农民外，来自黄石市的五万多农民也参加了游行。

这天，百万雄师在青山地区抓捕九一三、新一冶成员两百多人。

从上午九点开始，满载百万雄师武斗人员的车辆一批接一批地向我院方向开来，并在校大门对面的关山地区百万雄师据点集中。

下午四点，红司司令部召开紧急会议，综合组介绍了当时形势，认为百万雄师已实现了对我院的包围，很可能在今晚发起像昨天攻击新湖大一样的事情。于是，司令部当即决定在校师生员工全部撤离学校，并就撤离方向、地点及相关事宜进行了具体讨论和布置。

晚八点，撤离开始了。同学们按大队（系、部）为单位向学校背后的喻家山撤离。

同学们在撤离中虽有些紧张甚至慌乱，但总的情况尚好，撤离进行得比较顺利。可教职员工们的撤离就显得麻烦了，一些老教授、老工人说什么也不愿走，而小孩则吓得直哭，乱跑乱叫。

此时，百万雄师不断从关山据点向我院南一楼、南三舍、南一舍射击，一阵阵划破夜空的凄厉枪声更增添了撤离现场的惊慌、恐怖的气氛。武卫队的同学们费了好大的劲，一户一户地动员，做工作，直到晚九点左右教工及家属才由武卫队护送到达预定的地点。

我没有在撤离的队伍中，我决定留下来和坚守岗位的院广播台的小伙伴们在一起。

我当时真是思绪万千。全院师生员工上万人避百万雄师的刀枪而撤离这样的事，发生在今天的社会主义中国，真是不可思议，但事实就是这样。

我当时想，全市造反派就剩下新华工了，而新华工现在也在撤离。

晚十点，7252部队的三个解放军战士来到广播台。他们先巡视了一下广播台内部和周边的情况，然后劝我回东三楼司令部。

我开始没有同意。认为广播台关系重大，我应该留在这里。见我不走，一个穿四个口袋军上衣的解放军对我说：“你就放心走吧，我们会保证广播台的安全和正常运行的。你去司令部，这便于我们的安全保卫工作，而且不会影响你和广播台的联系，你随时都可以通过电话了解广播台的情况和发布指示。”听解放军如此说，广播台的值班同学也劝我去司令部。于是，两个解放军留在广播台，一个送我去了东三楼。

同学们、教职员工及其家属们在喻家山上度过了难熬的一夜。好些人手脚都被荆棘划伤，四系还有一位翁姓同学被蛇咬了。

所幸，当夜百万雄师并没有对新华工发起进攻，真是虚惊了一场。

人们都纷纷猜测：“是不是综合组的情报有误？”“是不是百万雄师在和我们打精神战？”我也在问自己：为什么解放军昨晚会来广播台要我回司令部？为什么他们会肯定地说广播台不会有事？

后来我们才知道：周总理根据武汉事态可能的发展趋势，已于21日调兵遣将，命令25军3个步兵师从九江、开封向武汉运动，15军空降部队已进驻孝感机场，运动到了黄陂。东海舰队三艘炮舰从长江口启程开赴汉口。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独立师和百万雄师对造反派的大屠杀，周总理一回到东湖宾馆就立即召集武汉军区、武汉空军和8199部队的负责人开会，决定马上派空军部队进驻武汉各高校和武钢，保护红卫兵小将和革命造反派。

正是由于总理派空军部队及时来到我们学校，独立师和百万雄师当晚才没有发起对我们学校的进攻，我们全院的师生员工才得以平安返回校园。也正由于周总理预先有了安排和布置，蔡炳巨和牛怀龙领导的独立师才不敢铤而走险。

7月23日凌晨，中央致电武汉军区，令主要负责人陈再道、钟汉华等进京“开会”。早上，野战部队奉命进驻了武测、华工、武大、水院、华农等院校，原独立师军事管制的单位进行了换防。武汉的恐怖气氛有了缓解。

早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谢富治、王力等已于22日返京的消息，当天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登载了这一消息，并发表了中央首长与群众到机场欢迎的照片。

下午，武汉空军和军区支左指挥部约见我们红司（新华工）负责人，向我们通报了武汉形势。当晚司令部召开全体成员会议进行了传达。下面是我当时记录的会议要点：

会议由张立国主持。

张立国：

现在请下午参加军区通报会的同学汇报一下会议精神。

王富山：

今天我们去了空军司令部和8199部队，觉得人民解放军是完全可以信任的。这次保卫中央代表（谢富治、王力）主要是空军和8199部队。总理来了武汉，对稳定武汉局势作了重要安排和指示。

原武汉军区党委基本上烂掉了。现军区工作由孔庆德和叶明主持，军区司令部已搬到8199部队办公。军区支左指挥部的信部长、王参谋长现坚决支持革命左派，感情完全变过来了。

8199部队在关键时刻坚决地站了出来。这次王力被绑架后就是由8199部队的张昭剑政委和谢参谋长等人救出来的。

19日晚，独立师和“百万雄师”的一些人冲入军区，对军区的人进行逐个搜查，王力同志从头到脚被打伤，衣服全部被撕烂了。独立师的人用枪口对准王力同志时张政委站出来大声说：“王力是中央派来的人，你们要开枪就向我开枪！”后来，8199部队把王力同志转移了（此时军区还不知道）。在“百万雄师”包围8199部队前一分钟，张政委、谢参谋长从军区后门把王力护送了出去。后他们到了小洪山，在荆棘中度过了一夜。张政委、谢参谋长还有一个警卫员全身都被荆棘划破了。直到21日下午才把王力同志护送到某机场和谢副总理会合。

张政委为了救出王力同志，和身边的战士做了几天几夜的工作，尤其是对七连。我们到了他们那里去看他时，他（张政委）连讲话都讲不出来了，嗓子全哑了。

现军委已有布署，长江、大别山等军事要道都被封锁了，独立师跑

不了了。

信部长要我们马上作群众的工作，要宣传群众，争取群众，要作农村工作，把周围的农民工作搞好，把回去的同学叫回来，要正确对待解放军，即使对独立师，也要把他们的头头和战士分开来。

张政委说：今后的斗争还是很艰巨的，武汉的天现在还不能说已是毛主席的天，因为现陆军基本上还在他们那边。

空司对今后形势提出了几点看法：

第一种可能：他们死拼一把，来一个大屠杀。

第二种可能：现在他们小干一把后撤到农村去建立据点，如在东西湖。他们在那里既有群众基础，也有物质基础。

第三种可能：缴械投降。军区内他们已被缴械。

张立国：

一、独立师明天有一个干部来，但来不来得了还不一定。根据上海来电，看来中央文革有了统一的部署，现上海的大街小巷都贴满了“打倒反革命分子陈再道”的大标语。

二、上海革委会的第四号头头在谈到经验教训时，其中谈到了两点，即（1）人民的枪杆子必须掌握在人民手中；（2）对保守组织的顽固分子要采取坚决的行动，因为这些人在对党内一小撮的问题上是保守的，但在武斗杀人方面他们不是保守的，武汉这次事件发生在刘少奇抛出“请罪书”后，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三、现在人民武装部的问题比较严重。

四、青山武钢来了一批工人，说五号炉本该昨天出炉了，但就在此时“百万雄师”来抓人，导致五号炉冻结了。工人晚上在树林里睡觉，几个人在警戒，白天啃几个硬馒头。

赵文成：

1.8199 部队他们的意见是当前尽量避免冲突。

2. 王力同志从小洪山到大洪山时，硬是爬去的。在此过程中，他们曾几次想冲出去，但都没有成功。在此同时，谢参谋长回到军区，独立师和“百万雄师”用枪逼着谢参谋长，要他交出人来。谢参谋长派了两辆小轿车故意在军区附近转了两圈后，告诉“百万雄师”说王力已经走了，

现在哪里不知道。

3. 孔庆德、叶明、王步青参谋长、信部长四人现是军区临时党委成员。

张立国：

军区已下了通知打倒三反分子陈再道，并已在连以上干部中作了传达。

听了传达后我们都很振奋。认为武汉的大局已定，陈再道保不住了，独立师和百万雄师气数完了，我们胜利了。

7月24日，8199部队救出了新湖大临委会负责人张维荣、谢邦柱、彭勋等，并由谢参谋长等人亲自护送到了我们新华工。曾经磨难的战友重聚在一起，真是感慨万端。

7月25日，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军民欢迎中央代表团光荣返回北京大会。

7月26日，经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批准，武汉军区发表公告，公告指出：七·二〇期间发生的围攻、殴打、绑架谢副总理、王力、张根成、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记者，围攻新湖大、九一三等革命造反派的严重政治事件，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行动。这次事件是在部队内和百万雄师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进行的，而王任重和陈再道则是上述事件的罪魁祸首。军区领导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要坚决同陈再道划清界限，把他打倒。对军区所犯的错误将迅速做出公开检讨，并坚决、彻底改正。立即为工总平反，并向被拘押的革命闯将朱鸿霞等革命造反派的同志承认错误，为他们恢复名誉。坚决支持工总的革命行动，积极帮助其恢复、发展和壮大队伍。坚决支持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三司革联、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等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坚决同他们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

这一天，在扩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上，批判了陈再道、钟汉华。

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表《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信中说：“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抗中央军委的正确指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竟然采用法

西斯的野蛮手段，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这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造成的严重政治事件”。

至此，武汉七二〇事件以武汉军区党委被改组、独立师被整编、工人总部重新恢复、百万雄师被瓦解而结束。

九、为七二〇事件平反不得人心

斗转星移，世事沧桑。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武汉七二〇事件的当事者大都进入古稀之年，一些人已相继离开了人世。

1978年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为七二〇事件平反，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一些昧了良心的文人和主流媒体一边倒，将七二〇事件归罪于林彪、四人帮，将肇事者捧为英雄，真实的历史完全被淹没了。

所幸，近些年来由于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大量的历史事实被披露了出来，从而引发了人们对武汉七二〇事件的大讨论，这无疑对恢复真实的历史并从中汲取教训是非常有益的。

2007年7月6日和29日，文革中武汉造反派和保守派的负责人40年后走到了一起。当年的保守派“百万雄师”“武汉公检法”的几位代表人物，与“三钢”“三新”等造反派组织几位幸存的领袖，两度聚会恳谈。这些当年曾以命相搏的性情中人，今天几乎都被挤到了社会的边缘，他们在一起共话人间沧桑，共同总结教训。正像鲁迅先生说的：“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今天要去争论或评判四十多年前的是与非，看来是很难的，似乎也完全没有必要了。但如果人们要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给中华民族以正能量，就应该正视真实的历史，特别是七二〇事件这样具有重要影响的事件。

梳理一下我前面的记述，我认为可以认定或澄清以下历史事实：

1. 以陈再道、钟汉华为首的武汉军区主要领导人在奉命支左时思想是不通的。当时他们的思维还停留在文革前甚至停留在“反右”时的模式上。他们对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根本不理解，不知道在文化大革命中要支持谁、反对谁。他们出于自身的立场和“朴素的阶级感情”，对勇于批评领导的造反派非常反感，而对维护“领导权威”的保

守派却钟爱有加。因此，他们从介于支左开始就一直是支持保守派打压造反派的。典型事例是：支左工作一开始，他们就极力扶持保守组织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当事实证明大专院校红卫兵不可能“扶上墙”后，就直接组织成立并操纵百万雄师和造反派对抗。为了打压造反派，支左指挥部成立不久就发表了《武汉部队严正声明》，接着又发表了“3·21通告”，解散了有二十几万产业工人参加的工人总部，全省范围内的“香花派”统统被打压。当“毒草派”认为军区支持保守派打压造反派犯了方向错误并进行抵制时，他们则将矛头集中对准“毒草派”，并于6月11日将对百万雄师的领导权从市人武部手中转给独立师，由独立师组织指挥了武汉多起流血事件，试图对造反派进行全面武装镇压。最能反映军区领导人的思想感情和立场的经典语录，出自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支左指挥部副指挥长韩东山在黄石八万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什么‘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到处乱搞乱喊，搞得乱七八糟。”“你造反，造个卵子，造到老子头上来了！”

正是由于他们的这种立场、思想状况和情绪，加之当时他们是“军政府”，大权独揽，所以七二〇事件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

2.1967年7月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政策是毛主席、周总理亲自制定，并由毛主席直接坐镇武汉指挥，周总理具体执行的，与林彪、四人帮毫无关系。将七二〇事件归罪于林彪、四人帮是瞒天过海，未免太霸道了。

所谓“王力的四点指示触发了七二〇事件”的说法，毫无事实根据。王力压根儿就没有向造反派说过什么“四点指示”，他在我们新华工没有说，在钢二司和其他场合也没有说过。相反，王力在我们新华工和钢二司的讲话都是要造反派制止武斗，强调要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团结大多数。对此，我院当时在场的万名师生员工都可作证，凡参加了谢富治和王力接见的造反派也都可以作证。

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四点指示”是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代表中央和毛主席在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上讲的（其实周总理不只讲了四条，只是独立师对这四条最不满而已），而最先将这四条公布于众的恰恰是

独立师政委蔡炳臣。

事实说明：所谓“王力的四点指示触发了七二〇事件”的说法只是陈再道、蔡炳臣拥兵逼宫的幌子。事实上，即使没有王力参加中央代表团，他们也会造出一个李力、张力来，七二〇事件照样也会发生。

3. 所谓“七二〇事件是以百万雄师为首的保守派与以工人总部为首的造反派之间的大规模武斗事件”这一说法，同样是毫无事实根据的。在整个七二〇事件过程中，只存在独立师和百万雄师的武装游行和对造反派的镇压，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双方的武斗”。而且当时工人总部作为整体尚未完全恢复，也不能说当时的武汉造反派就是以工人总部为首。

4. 回顾武汉七二〇事件的全过程：独立师和百万雄师成立“揪王力指挥部”——提出揪王力的行动口号——冲击军区和东湖宾馆——绑架、批斗、殴打王力——武装游行和封锁水、陆、空交通——搜捕造反派、攻占新湖大并武装包围新华工，我们可以看出：武汉七二〇事件是在陈再道的支持下由蔡炳臣等人精心策划和实施的。大量事实证明，他们是以“清君侧”为借口，拥兵“逼宫”，目的是迫使毛主席改变解决武汉问题的决策和部署。他们的行为，用后来一些文人津津乐道的话来说，就是造了毛主席的反。

5. 为七二〇事件平反，实际上就是要否定毛主席解决武汉问题的决策，就是要否定周总理对七二〇事件的处理措施和部署。

毛主席、周总理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是首先解决军队问题。中央当时虽然认为陈再道的错误是严重的，但还是决定做他的工作，还是要保他，希望他改正错误。这是毛主席和周总理稳定部队、稳定社会、尽快结束文革的重大决策，这无疑是正确的。当事变发生后，周总理采取断然措施，调兵遣将，严密布局，特别是指定军区临时党委成员，调空军部队进驻大专院校和武钢等单位，避免了一场即将发生的独立师和百万雄师武斗集团对造反派的大屠杀。历史证明这是非常英明的，其功德无量。

1977年调湖北省任省委书记的陈丕显一上任就迫不及待地要为七二〇事件平反。他罔顾历史事实，硬说“‘七二〇事件’并不是什么反革命事件，而是林彪、‘四人帮’为反党乱军、篡党夺权而制造的一

起大冤案，应予彻底平反”，还说“凡因‘七二〇’事件强加给解放军和广大干部、群众的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翻；对因‘七二〇’事件造成的冤案、假案、错案，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平反昭雪”¹。

人们不仅要问：毛主席在关于解放军支左问题的指示中说：“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而以陈再道为首的武汉军区从开始介入支左就支持保守派打压造反派，是对的吗？

陈再道司令员等将有二十几万人的工人总部打成反革命组织，并抓捕、迫害上万造反派大小头头，在中央发布“6·6通令”以后仍拒不为工人总部平反，还继续关押造反派负责人，是对的吗？

陈再道司令员等为保自己而组织成立百万雄师，并操纵、指挥百万雄师的武斗组织对造反派进行疯狂的武装镇压甚至活埋无辜群众，造成成千上万的群众无家可归，以至像我们新华工这样的高等学府为避杀戮而上万人连夜撤离，这也是正常的吗？

“七二〇”期间，独立师进行疯狂的武装游行示威并封锁水陆交通，迫使正在武汉处理问题的毛主席不得不改变多年来不坐飞机的习惯而乘飞机离开武汉去上海，迫使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不得不靠伪装才能离开武汉乘飞机去北京，这也是正确的吗？中外历史上有哪一个帝王、哪一届政府能容忍扣押中央代表（钦差大臣）、“拥兵逼宫”的将领？又有哪一个历史学家会将其捧为英雄呢？

文革中，作为广大人民群众，都是响应党的号召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运动的。不管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他们都是出于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动机。即使他们有错也是无辜的，是可以原谅的。因此，为百万雄师广大群众，包括为百万雄师的主要负责人平反，为文革中所有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人平反是理所当然的。但为七二〇事件军内主要责任者平反是逆天理的，是不得人心的。

¹ 陈丕显《武汉“七二〇”事件彻底平反的经过》，载《武汉文史资料》2006年第8期。

附件1 1967年3月8日上午武汉军区支左办信俊杰部长、省军区张竞副政委与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政法尖兵等七个组织的代表座谈时张竞的讲话（3月11日下午红司司令部会议上郭保安、聂年生传达，作者记录）

今天请你们七个单位的代表来座谈如何对待大专院校红卫兵的问题。我们将向钟（汉华）政委、孔（庆德）司令汇报这次的座谈情况。

对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到底应怎么看？我们认为：

1. 文化大革命现已进入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走资派夺权的阶段。坚决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贯彻革命派大联合的方针是当前的大方向。争取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出发点。

2. 大专院校红卫兵经过两条路线的斗争，随着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和刘、邓路线的破产，这个组织的总部已经解体，其基层组织也很少活动了。大专院校红卫兵的错误，其责任应该由湖北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派负责，广大的群众是受蒙蔽的，不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因此应当欢迎他们起来闹革命。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参加了其他造反派组织。没有参加其他组织的，应该欢迎他们站出来革命，让他们跟上当前的大方向起来闹革命。对他们不要歧视，不要强迫他们写检查。如果他们自觉表态划清界限，承认错误，应当表示欢迎。不要搞人人过关。至于各单位的头头，如果觉悟了，也应该欢迎，对极个别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那当然是另一回事了。可以让他们检查，但必须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达到既要解决思想问题又要团结同志的目的。

3. 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个组织不宜再恢复，因为恢复不利于当前的大联合。下一步各院校要开始整风，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组织要按班、系进行整顿，在这个基础上实行大联合。仿效北京红代会的经验，搞自下而上的联合，不要成立新的组织，这点应该强调，更不能成立什么总部。

4. 对于大专院校红卫兵和中等学校红卫兵的看法应有所区别，它是两回事，不是一回事。中等学校红卫兵应当贯彻中央“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精神，通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5. 由于我们过去了解情况不多，对大专院校红卫兵、中学红卫兵没有

加以区别，划分不清，我们接待组的答复没有划分清楚。因此今天宣布那个答复无效，予以撤销。

附件2 1967年3月15、16日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信俊杰部长、张竞副政委等来华工与红司（新华工）司令部成员座谈情况（3月17日红司司令部会议上郭保安、聂年生、张立国传达，作者记录）

张副政委发言：

昨天我们一起开了座谈会，今天再交换一下意见。

第一，军区对你们红司（新华工）是信任的，对你们前一段时间的大方向是肯定的，是真心希望你们搞好的。希望你们把大联合搞起来。钟政委给我们讲了，要在你们学校搞个样板，军区派几个同志帮助你们，我们现在就是照这个意思办的。有些同志对军区关于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的看法的改变，担心对红司不利，引用接待员的话说：“新华工是什么组织还没有肯定”。事实不是这样的。到底如何处理大专院校红卫兵的问题？要讲策略。军区对你们是肯定的，过去依靠你们，现在和将来也都要关心你们，依靠你们。我们来不是和你们作对的，不是来想搞垮你们的。有的同志担心出现反复，我不希望反复，也不会出现反复。希望你们正确对待大专院校红卫兵，要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唯恐你们犯错误，唯恐你们偏离大方向。你们要当好无产阶级革命左派，不要忘记毛主席的教导，要使自己的思想不断革命化，始终要把握大方向，不能把支流当主流。也不能满足于过去自己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就不再前进了。大联合的阻力来自“私”字，不是来自“大专院校红卫兵”。昨天的座谈会是否都能适合新华工？我还没有调查，因为时间太短了。

第二点，有的同志问过去的大专院校红卫兵的性质如何，如果肯定了他们，他们不是保字号，那不就否定了我们吗？问题不能这样提，也不能这样看。有的同志欢迎他们起来革命，但不欢迎他们成立组织，他们一成立，就认为是老保死灰复燃，借尸还魂。我们不能这样提，让他们成立，再看一段时间嘛，看他们到底是左，还是中或右。要善于团结过去犯过错误并被实践证明了的人，他们也是受害者，他们也是受迫害嘛。他们也有错误的提法，他们有情绪，这种对立不能单怪他们，也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的。

他们当时犯错误，自己也要负责。他们有的出于对主席的热爱，犯了错误，运动到了今天，只要他们愿意也来革命，起来造反，我们还是要欢迎他们。

他们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犯了错误。但你们采取了关门主义也不对嘛。他们说：“我们要加入红司，写了申请，但一个多月过去了也没有被批准，真是比入党还难。第一步是刻钢板，贴大字报，再考验一段时期，先参加外围组织，再后才能当上红卫兵”。他们要起来，你们可以批评帮助嘛！他们起来能否定你们的大方向吗？否定不了的，你们要宽宏大量嘛！

对大专院校红卫兵你们要主动，要放手大胆。有意见还可以提，摆事实，讲道理嘛。我现在不赞成搞大辩论，也不赞成搞小辩论。你们上面搞小辩论，下面就必然会搞大辩论嘛，这不符合目前的大方向。

第三点，关于“2·8声明”的批判问题。

“2·8声明”思潮的本质是什么？就是个“私”字。只许自己革命，不许别人革命，排斥别人。实际上自己也不革命，把矛盾扩大化，搞分裂，背离了大方向。我们要肃清其流毒。这对我们正确对待大专院校红卫兵有帮助，当然，两者不能等同。希望你们能整风，把整风搞好。你们可能还有不同的看法，但不管怎样，考虑问题不要背离大方向，要不断加强革命化。根据去年红旗杂志十四期社论的精神，对大专院校红卫兵和中学红卫兵，大家可以去研究、讨论。他们现在在揭发、批判省市市委时是积极的，在批判“2·8声明”时，他们也是积极的。对这个组织，在大联合的时候我们应如何对待他们呢？我们说大专院校红卫兵不是老保，不是保守派的组织，军区认为大专院校红卫兵是革命组织。

上午就讲这些，很可能有不对的地方。

空军张副参谋长在这个座谈会上也发了言。他说：当前对大专院校红卫兵的看法，我们主要是从策略上和方法上来考虑问题，认为这有利于大联合。昨天的座谈话谈到的一些具体问题可能有错误，我们不要纠缠在这些具体问题上，这些不能代表军区。

军区宣传部李副部长也讲了两条。他说：我们主要是来听取你们的意见的。和你们接触了两次，对你们的印象很好。当前主要是要坚决贯彻主席的“三七指示”（对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的经验批示）。现在在对大专院校红卫兵这个问题上，已对军训和整风产生

了一定的影响，我们应该抓主要工作，抓大方向，就是要高举联合的大旗。至于对大专院校红卫兵的看法不统一，我们应该统一在武汉部队的看法上（第一、大专院校红卫兵的成员大部分是好的，他们的出身、表现也比较好。第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要革命的。他们犯过错误，但要具体的分析，很多同志是受蒙蔽的，他们现在起来革命，我们应满腔热情地欢迎他们。第三、我们要高举联合的大旗，团结大多数，帮助他们起来革命。）至于对他们的评价，我们认为大专院校红卫兵是“中间坏，两头好”。我们不要纠缠在这个上面，我们的一切出发点都要有利于大联合。当前武汉的形势发展很快，湖大、武大，他们的组织都已经打散了，你们新华工也应作出成绩来，应继续努力，希望你们做好犯过错误的干部群众的工作。

附件3 1967年3月16日陈再道接见杨道远时的讲话（3月20日红司司令部会议上郭保安传达，作者记录）

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对大专院校红卫兵的看法首先要从阶级观点来分析，他们大部分出身贫下中农，大部分是党、团员。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也做了一些成绩。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他们也做有成绩，比如他们批判刘、邓、王，他们也开过一些会。不过，有些会他们没有开成，因为他们一开会就有人去撒传单等。他们的错误肯定是严重的，他们包庇工作组，包庇省委。他们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方面是犯了极大的错误的。但他们是受刘邓路线的影响，是受湖北省委的蒙蔽。他们对党是有感情的。（有同学插话：“大专院校红卫兵是由省委泡制的。”）正由于这样，我们不让他们成立总部了，只允许他们的基层活动。他们有保守的错误，犯过路线错误，但不一定要加上一个保皇的帽子。现在大部分人是认识到了自己以前犯了方向的错误，他们现在一说要起来，有的人都在流眼泪了。当然，也有少数人现在仍认为他们过去的大方向是对的。

“保守派”这个名字要好好研究一下，他们是保了，犯了这方面的错误，但不一定给他们戴上这个帽子。你们也犯了错误嘛，比如你们有风头主义，不一定要给你们加一个什么“风头”组织嘛，现在我们要注意联合，他们现在灰溜溜的，如果再压一下，那就不得了了。现在要是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的话，那不更好吗？

附件4 1967年4月10日电机系党员、干部座谈会发言摘录（作者主持会议并记录）

刘献君：在文化大革命的前期，我基本上是站在刘邓路线上的，犯了严重的错误。我认为目前武汉地区存在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支左中一小撮混蛋无情地打击革命造反派。最近我到工厂去了一趟，发现厂里七八百个工人战斗队员靠边站了。我要进去时，开始还不准进。

要是不把这一股逆流打下去，文化大革命前段所取得的成绩就全部被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也就进行不下去了。

关于“春雷”，我认为参加“春雷”的人是被武汉军区内一小撮人利用了，我建议凡参加了“春雷”的人立即退出“春雷”加入造反派组织。

我是受“修养”毒害很深，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影响很大的人，现我们更应站在造反派一边，彻底闹革命。

你没有受到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专政，你就不知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性及残酷性。在前一段时期我们犯了错误，但我们只要丢掉这些错误就能得到很多有益的东西。我可以说是挽救了我，主席挽救了我，革命造反派挽救了我，否则我一定会成为修正主义的苗子。

王立清（原系总支干部）：今天借这个机会亮一下相，这个相很丑，但也要亮。我在前段时间犯了严重的错误，我应该向同志们检讨。我在电机系七个多月，同志们受我的影响是很大的。我要向造反派学习，造反派敢想、敢干，用生命和鲜血来保卫毛主席，这一点我们是很难做到的。

有些事你不参加就不知道，比如抢黑材料的问题，你有黑材料，叫你交出来你不交，那当然就要抢嘛。

由于你没有参加群众运动，你对群众运动中的一些问题就不可能理解。我过去受“修养”的毒害很深，每次运动开始时都要学习“修养”，过组织生活时，甚至下乡时也要带去推荐给群众去学习。

正由于受“修养”的影响很深，奴隶主义思想就非常严重。刚来学校时还敢提意见，但后来就再也不敢了。

我们应该绝对相信解放军。但根据目前的情况，不得不使我产生怀疑。如他们的几个“不准”，不准上街，不准游行等，把群众都束缚起来了。昨天支左解放军的报告是背着红司讲的，他的讲话和去年张体学讲的一样。

他们当面说你好，说依靠你，背后却搞你的鬼。

从好多事情看，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勾结起来了。这次大专院校红卫兵起来时，我又犯了奴隶主义，当时解放军支持他们嘛。

从当前的形势看，武汉的形势是大好的，但有一股从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

我开始对“东风战斗兵团”（红司电机系兵团）不理解，只看到他们的缺点，看不到他们的优点，没有看到路线，只看到了某个人。

我们有一次去贴传单，提着浆糊桶，有人看到后说“这是劳改犯”，回来后我们就进行了讨论，觉得说的人是开玩笑。我们过去只知道指手画脚叫人家干，思想上没有改造过来。

陈国贤：我犯过错误，至今和造反派也有隔阂，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的。对于“春雷”，我认为“春雷”是适应了军内一小撮的需要。

陈维桢：过去奴隶主义很重，对造反派起来造反很不理解。目前解放军支左中有没有一小撮呢？我看有。

王远璋：有些人认为解放军支持我，我就是对的，他们没有看到军队里也有阶级斗争。我曾参加过“春雷”的几次活动，当时主要是对红司的整风不满意，认为整风只整头头不行。

对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问题，原认为指的是“2·8声明”，对照王效禹和林杰同志的文章才知道不是这样。

附件5 1967年3月26日武汉军区副司令员韩东山在黄石八万人群众大会上发言摘抄（见武汉钢二司红武测1967年8月编《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六七年元月—七月）》）

什么“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到处乱搞乱喊，搞得乱七八糟。

你造反，造个卵子，造到老子头上来了！

你们革命？革个卵子的命，老子革命几十年还要老子坐喷气式飞机，还给老子戴高帽子……，我×他娘，这次抓人用绳子捆，用枪押着走。

叫你搞文斗，你要搞打砸抢，我×他娘，连土匪都不如，不是反革命是什么？

冲军区的来多少抓多少，来一个抓一个，来十个抓十个，军队里装不下，抓不及了，就用机枪扫。

附件6 1967年3月两次原大专院校红卫兵座谈会纪要（作者主持会议并记录）

1. 电机系座谈会纪要

时间：1967年3月5日

地点：电机工程系（西一楼）

议题：思想交流，给红司（新华工）司令部提意见

发言摘要：

詹承清（四年级同学）：

我觉得红司能召集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学来开会是很好的，但我认为不是时候，应放到你们整风后期来搞。

你们红司的负责人首先应该检查一下自己方面的错误，触及一下自己的灵魂。我觉得从运动开始以来，红司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像王任重这样的人，没有造反派是斗不成的。现既然是整风，我就来提点意见：

1. 我认为红司司令部和一般战士中也存在“2·8声明”和“3·4社论”反映的错误思潮，司令部对二司有保的现象，生怕二司垮了。

2. 司令部有的负责人对过去曾犯过错误的同学的态度不好。比如，有一次买纪念章，剩下不多时，郭保安叫红司的战士回去，叫“老保”留下。在纪念章不多的情况下要红司的人回去，将纪念章留给我们，这本来是发扬风格，但他这个“老保”的称呼使我们感觉受到了羞辱。

3. 红司下面的战士有时几个人走在一起，经常议论“老保”的问题。他们没有看到大多数原来保守的人早就转变过来了，但他们还是“老保、老保”的。我们有时本来有话要讲，但不敢讲了，怕别人说“保皇派翻天”。这些人开口就是“老保”，闭口还是“老保”，真使人受不了。

4. 红司在对待其他组织如共产主义红卫兵、院工人捍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态度上也有问题，总觉得别人是半路出家，不支持，甚至不承认别人。

5. 在对待干部方面，现绝大部分学生干部都已靠边站了，前一段时间，

经常给别人下通令，要他们写检查，这显然不利于团结大多数。

6. 前段时间，司令部采取关门主义，不相信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自己解放了自己，还不准他们自己成立组织。

7. 红司的整风要明确目的和指导思想。整风不要把“老保”的意见看成是“老保翻天”。现在下面压力很大，说的人不觉得，听的人却受不了。你说他“老保”，他就感到压力，结果是压而不服。

8. 现在有人要成立大专院校红卫兵联络站，这是不好的。就是成立了，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王立超（五年级同学）：

我们在前一段时间确实犯了一些错误。我们元月份才回来，成立了一个红军红卫兵，造了反，回到了班上。回到班上后，我们中的大部分至今还不是红司的战士，把我们关在了红司的外面。后来红司把我们组织成“抓革命、促生产”的小队，这当然很好，但郭保安给我们说了一通“保”不“保”的，说什么“老保”、“小保”的，把我们的热情给打下去了。原来我们是热情参加的，回来后就不想参加了。上面搞什么都是“保保们去”，“保保们去”，上头都是这样，下面也就变了。

我和其他班的造反派还说得来，就是和班上的谈不拢，他们说话时总是“摇头摆尾”的。

过去参加保守组织的人的积极性一直没有调动起来，我们想和班上的造反派一起干，可他们不同意。正由于这样，我们昨天到了军区支左办公室去，支左办公室的要我们组织起来，说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事都可以干，说大专院校红卫兵在运动初期是有成绩的，后来犯了错误。从支左办公室回来后，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小组，叫“换新天”。

前段时间我们下厂，有人把我们当工具用。白天上班，下了班以后就是抄大字报，我们根本就没有起什么作用。

林进忠（四年级同学）：

我们犯了错误，我们愿意改正。我们从外面回来时，“勒令”、“通令”还是比较多的。我们想找造反派的人谈一下，但他们不理我们。我们班的造反派的骄傲情绪是很大的，比如“二·一八声明”发表以后，二司的同学被压得哭，但他们却说：“我在丛中笑”。

整风的门应该开得大一些。革命的整不垮，不革命的整垮活该。我们应该看主流，过去大专院校红卫兵不相信群众，这是大专院校红卫兵垮台的主要原因。班上有些人找我们谈，我们也找他们谈，但有些人却说和我们谈的人是“和稀泥”。我们有一人找班上造反派的同学谈，希望一起成立一个战斗队，可造反派的同学却说：“你们可以自己成立自己的组织嘛，我们不见得对，你们也不见得错，东边还有‘乌兰牧骑’嘛。”让人听了很不舒服。

组织起来不行，参加班上的战斗队又不答应，那我们成了世外人士了？

红司战士应该站在犯过错误的人的处境上想一想，不要把他们排斥在外。原来勒令我们写检查，可写了以后又退还给我们了。同志们整风，不要忘了我们这批群众，我们以前掉了队，现在不能再掉队了。

袁伯仁（五年级同学）：

我们由于长期受到奴隶主义的教育，当时自己宁愿犯政治错误也不犯组织错误。因此，文革初我们犯了错误。我认为我们过去是受了蒙蔽，当我们一旦觉醒过来，应该就是一股很大的力量。在我院，像我这样的人可能还有两千多人。

中央军委委托武汉军区去调查“联合会”的情况，调查的结果是联合会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贫下中农和老工人。武汉部队支左办公室的人说，要是“联合会”的基本群众不动员过来，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无法保持下去。我们大部分是贫下中农出身的党团员，我们应该以阶级分析法来争取大家，我们希望电机大队这个队伍立刻行动起来团结这批人。

现红司和三司在我们班可能还要经过一场论战，还有分裂的可能。我们对红司也应该进行阶级分析。

龙国斌（226班，我同班同学）：

运动开展以来，我经历了奴隶主义、改良主义、逃跑主义到今天的觉醒干革命。我们系还有二百多人是靠边站的。红司和其他组织都应该争取他们。我原来争取参加军训，可八班却透露说“凡是党员都不能参加军训”（注：3月初，武汉军区支左办派解放军在我院搞军训，4月上旬撤出。）。

你们过去有成绩，这是被肯定了的。但不要骄傲，要是骄傲了，势必和我们一样犯错误。有成绩只能说明过去，而不能说明现在。

肖海棠（225班同学）：

我第二次参加长征实际上是逃跑。当时我觉得运动有点形左实右，要是我忍不住性子，就又要闲下来了。

2. 机二系座谈会纪要

时间：1967年3月7日

地点：机二系（东一楼）

议题：思想交流，给红司（新华工）司令部提意见

发言摘要（当时忘了记下发言者的姓名）：

525班同学：

我从改变观点以来一直是很爱护红司的，希望它能少犯些错误。红司是杀出来的，从去年12月后就基本上取得了胜利。但胜利以后没有注意，有些骄傲。比如：中央台广播了华中工学院的消息，有人就写出大字报自我欣赏。只善于冲杀的话是不够的。冲杀是必要的，但要是根据新形势的环境、不改变战术也是不行的。

过去两派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两种思想的斗争。局势的变化，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应归功于毛泽东思想，不能把保守派的同学当俘虏来看待。对于过去两派的斗争不应把罪名加在群众头上。

造反派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就应该考虑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了。大专院校红卫兵现在又出来了，原因是前一段时间对他们压得太狠了，他们也有自尊心呀。

我原是大专院校红卫兵，现退出来了，但没有一个组织也不行啊，年青人都要革命嘛，红司在这方面要注意。对原来的大专院校红卫兵，他们要重新组织起来我认为可以的，但组织起来后如果对造反派抱敌对情绪，那到头来还是要失败的。

我们的造反派现在要是不站得高些、看得远些的话，今后还是会失败的。

关于“乌兰牧骑”的问题，过去他们的路线是反动的，但他们的头头还是可以争取过来的，他们中的两个头头都是我们班的，我对他们是有所了解的。在做保守派的工作时，我们不要要求他们承认他们的组织是什么性质的组织就行了，我们要把他们的心争取过来才是重要的。

523 班同学：

我觉得你们应该开门彻底地整风。新华工在湖北武汉影响很大，很多人都在关注着新华工，红司整风可以开门到市里去。

新华工在批判“2·8 声明”时是很得力的，但在批判中是否能触及自己的灵魂呢？

现在红司的主要问题是对待群众的问题。在我们学校，凡是带“长”字号的人，现都是靠边站的，这就把干部和群众对立起来了，这是不利于联合夺权的。我建议红司应该对干部有所了解，鼓励他们干革命，对干部要一分为二，我们不但要看他们的过去，而且要看他们的现在。在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大联合、大夺权的关键时刻，干部不出来干革命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我们现有一、两千人没有参加组织，长此下去是不行的。

我现在也参加了大专院校红卫兵，为什么要参加呢？就是为了更好地干革命。现在好像我们一讲话就是“老保翻天”，要是这样的话，就是夺了权也巩固不了的。

为什么干部问题要提出来呢？因为我们要防止阶级异己分子夺了我们的权，对各级领导要严格审查。

第十九章 “钢新之争”再起

内斗是一些人的劣根性。内斗不但消耗了自己，而且给了外敌以借口和机会。

武汉七二〇事件前后，全国各地的保守派组织基本上都瓦解了，所有大专院校及绝大多数企事业单位的造反派都在本单位掌了权。凡成立了省、市革委会（或筹委会）的地方，大的造反派组织的主要头头都以“群众组织代表”的身份进入了省、市革委会（或筹委会），有的当上了副主任、有的当上了常委或委员。

为了推进文化大革命的进程，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在武汉七二〇事件后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并根据全国文化大革命运动反映出来的实际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并对一些政策作了重要调整。

针对当时全国各地群众组织的派性斗争问题，毛主席特别强调：“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并要求：“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在谈到革命大联合以谁为核心的问题时，毛主席说：“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核心是在斗争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愚蠢的”。

毛主席还强调：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对他们做政治思想工作，主要同他们讲道理”。

毛主席还就保守派问题、干部问题、上下级关系等问题作了重要指示。

关于保守派问题，毛主席说：“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

关于干部问题，毛主席再次强调：“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犯了错误有什么要紧？改了就好。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

关于上下级关系问题，毛主席说：“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同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今后要吸取教训，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在某种意义上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

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要斗私批修，要拥军爱民，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当时毛主席对整个形势的估计是乐观的。他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

然而，毛主席对形势的这一判断却出现了很大的偏差。他没有想到，他的战略部署会因为造反派头头们的“内斗”受到严重干扰。

也就是在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这个时候，极左思潮开始泛滥。全国各地的造反派组织非但没有按毛主席的要求联合起来，而且几乎都分裂成了对立的两大派，内斗不断，并逐步升级。其中最典型、最具代表性、影响也最大的当属北京的天、地两派及武汉的钢、新两派了。

对立的两派开始是相互指责，打口水战，后逐渐发展到兵戎相见，斗得你死我活。从1967年8月到1968年8月的一年时间内，全国因武斗死伤的无辜者以万计，其中伤亡最惨重的当属四川和广西。

在我看到的文革回忆录和评论文章中，几乎很少看到有关造反派之间内斗的记述，即使记述了也没有很好地总结经验教训。一些文革中造反派的著名领袖人物，如北京的聂元梓、蒯大富，武汉的吴焱金、杨道远等，他们的回忆录中几乎都没有对内斗问题进行认真的总结。这也许

是因为他们都把文革失败的原因全部都归罪于“走资派”了，认为造反派的“内斗”对文革的成败无关紧要。

我认为忽视或有意回避造反派文革中的内斗是错误的。造反派之间的内斗不仅是文革中期（1967年1月—1968年8月）武汉以至全国运动的主要特征和主要内容之一，作为文革真实历史的记载不应该予以忽视。更重要的是，文革中造反派之间的内斗不仅充分体现了中国人喜欢“窝里斗”的民族劣根性，而且这场内斗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第一次文革的最终失败。

文革的失败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极左思潮支配下的造反派头头们的内斗是重要原因之一。

首先，造反派之间的内斗严重地干扰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因而也就失去了毛主席对造反派的信任和期望。同时，内斗也给了反文革势力镇压造反派的口实和把柄。因而，造反派头头们的这场内斗不仅断送了造反派本应有的光明前程，落得个惨烈的结局，同时也使成千上万的无辜者受到了牵连。

今天，一些当年的造反派总把文革失败的原因都归罪于强大的旧体制，归罪于走资派。而一些精英们和主流媒体则将文革的错误全部归罪于毛主席，并借此对毛主席进行讨伐。我认为这不仅不符合历史的真实，而且也会给后来者总结研究文革带来误导。

为了还原真实的历史，更重要的是要让人们从文革期间造反派之间的内斗中汲取教训，团结起来，凝聚正能量，振兴中华。基于此，我还是决定在我的这本回忆录中记述武汉文革时期的内斗——钢新之争。

1970年我在咸宁被审查期间书桌被抄，所有资料被没收，虽然后来根据中央政策，我留存的部分资料还是退还了，但1967年9月4日至1969年9月19日的日记和部分书籍、信件却消失了。因此，本回忆录有关这段时期的记述，我只能根据学校退还给我的部分文革小报和在咸宁院学习班时我的“检查”“交待”，再加上我现在的回忆来写了。

一、钢新之争再起

树欲静而风不止。武汉七二〇后，在大家都想安静下来抓革命、促

生产，搞“教改”，学业务的时候，钢、新两派的头头们为着一个“权”字，再次掀起了钢新之争。

“钢派”“新派”的称谓始于七二〇后的1967年5月。钢派（原香花派）即在二八声明上签字的群众组织，主要有工总、九一三和二司（即三钢）。新派（原毒草派）即反对二八声明的群众组织，主要有学生组织中的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中学红联，工人组织中的工造、新一冶、长办联司等。

在中央处理七二〇事件后，我当时最担心的是钢派对百万雄师的报复和钢新之争重起。因此，我在回湖南老家的前一天，曾特意写了一篇要正确对待百万雄师中广大受蒙蔽群众的文章，并请同班同学将它抄成大字报贴了出去。

返校后我发现，在中央的一再强调下，钢派对百万雄师群众的大规模报复行动并未发生（因我们在学校，社会上到底是否对百万雄师进行了严重报复不是很清楚，但起码可以说没有发生足以影响当时社会舆论的大事件），而钢新之争却如期而至了。

武汉钢新之争始于1967年1月造反派夺权。

正如我在第十七章《造反派夺权与造反派分裂》中所记述的，1967年2月钢派之所以要发表二八声明，把矛头直指新派，就是因为钢派的头头们认为在“一月夺权”中，新派夺的权多，而他们的组织大、人多反而夺的权少了。因此，尽管“1·26夺权”是两派头头开会研究后决定进行的，他们在相关公告和文件上都签了字，代理省委书记、省长张体学也同意造反派夺权并通令全省地、州市党政机关移交权力，钢派还是在夺权的当晚就宣布“夺权无效”，要求重新分配省市权力。

接着，武汉军区介入文革，一亮相就发表了武汉部队“2·18声明”，不但严厉地批判了二八声明，而且接着又发表了“3·21通告”，将工总给解散了。直到在反逆流和抗暴斗争中新派为工总翻案，钢新两派才重归于好，联合一致对外，第一次“钢新之争”才告结束。

七二〇事件的硝烟刚过去。8月上旬，中央召集武汉三钢、三新、三司革联的负责人到北京开会，研究和讨论武汉的大联合及成立“三结合”的省、市革委会的问题。

根据周总理在座谈会上的指示精神，会后起草了一个座谈会纪要（即“8·8纪要”）。关于武汉的大联合问题，在座谈会中总理说：“武汉不是有个联合指挥部吗？包括的范围比较广泛嘛。在革委会建立以前，还应当起到过渡的作用。将来要取消，由革筹小组代替。”中央的意见很明确：武汉以三钢、三新、三司革联为核心实现大联合。

在这次座谈会上，王力、谢富治、康生、周总理都作了讲话。其中还提到了新派在批判二八声明时也有缺点错误。中央认为二八声明的大方向还是对的，只是有缺点错误，说新派对二八声明的批判有些“过头了”。

我院代表返汉后，先在院革委会委员中进行了传达。开始大家对中央说我们批判二八声明过头的问题有些想不通，认为从二八声明本身及其产生的后果来说，它无论如何也谈不上大方向正确。当中央首长的讲话在大队（系）一级负责人中传达时更是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但通过两天的学习和讨论，大家还是从大局出发，接受了中央的批评，不再说二八声明应该批判的话了。

“8·8纪要”在钢派中却产生了另一种结果。一些曾因武汉部队“3·21通告”而被拘禁和受到打击的钢派头头，在发泄对陈再道和百万雄师的愤怒时，竟然迁怒于新派。他们认为新派批二八声明是帮了陈再道的忙，新派是陈再道镇压工总的“帮凶”，因而群起对新派进行围攻和谴责，并提出“钢化武汉、钢化湖北”“以钢工总为核心实现大联合”的口号。

为了应对钢工总咄咄逼人的气势，新派中有头头提出成立“新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总司令部”以统一新派各组织的领导和指挥。这个消息一出来，武汉就像炸了锅，各方的反应都非常强烈。街上出现了“解散新武汉”“新武汉是分裂主义的产物”的标语。更有甚者，有人还写出了“绞死吴焱金”的大标语。武汉警司表态不支持成立“新武汉”。

成立“新武汉”的问题在我们司令部和革委会内也产生了激烈的争论。有人认为应该支持“新武汉”的成立，有人则认为在这个时候成立“新武汉”不合时宜，认为这将极大地刺激钢工总，不利于大联合。

“新武汉”虽然开了成立大会，但没有开展什么有影响的活动。8月26日，周总理等中央首长接见武汉三钢和新华工、新湖大在京代表时，

对成立“新武汉”的行动进行了批评，消息传到武汉，“新武汉”立即偃旗息鼓。

随之而来的是武汉“钢风”四起。钢派头头们提出的“大树特树钢工总的权威”“钢化全武汉”“钢化全湖北”等口号充斥全省。

武汉最大的两个工人组织工总和工造的矛盾骤然升温，钢新之间的内斗一触即发。

从感情上来说，我们新华工的大部分人是支持工造的。但为了大局，我们革委会当时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口号，即“支持钢工总，支持新武汉，钢工总、新武汉，团结起来一起干！”。

这个口号的提出不但没有缓解工总和工造的矛盾，我们新华工反而很快成了钢派攻击的主要目标。

一时间，武汉又动荡了起来，似乎又回到了二八声明出来时那种大辩论、大论战的局面中。

论战的主体没有变，还是钢新两派。论战的主题也基本上没有变，还是围绕着大联合夺权应走什么样的道路、谁是真正的革命派、谁是机会主义等问题。

在武汉的大联合到底应走什么样的道路问题上，钢新两派存在完全不同的主张。钢派认为武汉应走上海工总司的道路，即在武汉应“以钢工总为核心实现大联合”。而新派则认为应按中央的要求，走北京的按行业、按系统自下而上联合的道路。

针对钢工总要以自己为核心实现大联合的主张，1967年10月1日《新华工》报发表了社论《人间正道是沧桑》，主张武汉的大联合应向北京学习，走按系统按单位自下而上实现联合的道路，批评了“唯我独左”和“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

社论说：“今天，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向党内走资派夺权的新的历史阶段。毛主席指示我们，‘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最近毛主席指示我们搞‘大批判，大斗争，大联合，尽快实现三结合’”。“今天我们必须急起急追，向北京和上海学习，紧跟伟大统帅的战略部署，抵制各种错误思想，排

除各种人为的障碍，如‘以我为核心’、‘唯我独左’、‘削平小山头，保留、补充大山头’、‘保证我有几个常委’等等，从而迅速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在新的形势下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

钢派的头头们不同意新华工在这篇社论中提出的主张。1967年10月11日，《武汉钢工总》报（总第27期）发表社论《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指引下建立统一的革命工人组织》，公开明确地阐明了他们的以钢工总为核心实现大联合的主张。社论说：“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已向我们宣告：革命工人联合起来，建立统一的革命工人组织，这是武汉地区工人运动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在该报同期刊登的《武汉钢工总》报评论员文章《武汉钢工总战旗林立，威震大江南北》中，他们明确地说武汉要建立的这个“统一的革命工人组织”就是钢工总。也就是说，现武汉其他革命群众组织都应一律解散，然后统统都加入到钢工总来，从而实现以钢工总为基础的大联合。该文说：“‘钢工总’是属于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的。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指引下，以左派为核心，在市内以‘钢工总’为基础，自下而上，上下结合地联合起来，建立全市性统一的革命工人组织，实现最广泛的革命工人大联合。这是革命的需要，历史的必然。”

本期还刊登了一篇通讯，该通讯煞有介事地说：“近日来，武汉许多工厂企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都敲锣打鼓，欢天喜地地在‘钢工总’的大旗下实现了大联合。……仪表兵团原‘工造总司’的战友说：‘钢工总’造反最坚决，我们公司系统联合打‘钢工总’旗号最适合。当某些组织的负责人还抱着自己的小山头不放，津津乐道地争论着旗号、常委席位时，下面战士和战斗队员已经在‘钢工总’的大旗下联合了。”。

争论是一回事，重要的是行动。在一些人的操纵和指挥下，一个“钢化全武汉”“钢化全湖北”的宣传运动开始了，在武汉三镇的大街小巷出现了一些奇怪的标语：“大树特树钢工总的绝对权威”“以钢工总为核心，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加入钢工总，实现大联合”。

在这场钢新两派就武汉大联合和成立革委会走什么样的道路的争论中，“七二〇”前在抗暴斗争中曾站出来支持造反派的“革干联”的一些领导干部和长江日报，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钢新之争更显得复

杂和激烈。

8月中旬，原湖北省副省长孟夫唐在一次有关大联合的会议上说：“在武汉应以‘钢工总’为核心，中央在点名次序上是树立‘工总’的威信，……中央对这个问题的决策，就是说武汉地区大联合究竟以谁为核心”。

原湖北省委副秘书长刘真也说：“最重要的是以‘三钢’为核心的队伍，有无这个队伍是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命运，关系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败。这个坚强的核心就是‘三钢’。武汉要联合在‘工总’的旗帜下。我们必须选定真正的左派。谁能担当？是‘三钢’，这是当之无愧的。”“大联合必须以‘三钢’为核心”，“‘三钢’是柱子，顶住了。没有‘三钢’，天就塌下来了”。

原武汉测绘学院党委书记毛远耀则说：“不钢则康，树不树‘工总’的威信，是承不承认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问题。”

这些在“七二〇”前就支持造反派的老干部的这些带煽动性和挑动性的话，进一步鼓动了已经头脑发昏的工总头头们。

这时的长江日报也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作为报社的采编人员，他们并不是不了解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精神，但他们却偏要制造混乱。8月16日，他们发表了标题本身就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社论——《以钢工总为核心领导联合起来》。社论写道：“对待‘钢工总’，不是对待其本身的问题，而是对待武汉的整个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也是对待全国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树立钢工总在武汉的威信，是毛主席革命路线最严格的要求，是历史的必然！”“结合武汉的历史和现状，只有这条道路才最正确，最合乎中央最近指示精神的。”。

工总的头头们为了实现他们“钢化武汉”的目的，9月4日，在中山公园门楼前召开了“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总指挥部成立及誓师大会”。他们认为新华工属“康”派之首，因而被排斥在这个“总指挥部”之外。这个总指挥部是干什么的呢？9月12日，毛远耀在革干联席会上是这样说的：“现在一定要树这个‘摧资指挥部’。既然是指挥部，就是权力机构，就是要用它来抓住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

钢新矛盾迅速升温，而且大有从文斗向武斗方向发展的趋向。

9月24日，钢二司红水院总部发出“最最紧急呼吁”，提出全市学

生铲平山头，成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总司令部”。二司水院总部的呼吁在二司内基本没有得到响应。当天深夜至次日，一些以中学生为主的二司成员毁坏了全市数以千计的大批判专栏，刷上“三钢是大联合的当然核心”“省市委大权老子三钢拿定了”“不钢则康，破新立钢”之类的标语。

9月25日晚，钢派一些人包围了中南旅社，并于晚上七时半砸了三新、工造、新一冶等10个革命组织设在南洋大楼的大批判联合广播站。

钢新之争在我院也有了反映。

8月23日，我院以鲁礼安为首的几个人用“新华工红反团”和“新华工敢死队”的名义，邀请了三千多工总战斗队员来我院参加他们在东边大操场召开的“树工总权威，纪念8·23造反精神大会”。会上，鲁礼安等人公开表示支持钢工总“钢化全武汉”的主张。

这个大会在新华工园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多数人反对红反团和敢死队个别人的这种有损新华工形象的行为。

随后几天，红反团和敢死队的个别成员受到钢派一些组织的邀请，去出席一些钢派的会议和活动，而他们在这些会议或活动中以新华工的名义发表了一些与新华工委立场相左的言论和观点。对此，新华工委和红司(新华工)司令部立即作出了回应，于1967年9月13日在《新华工》报上发表了严正声明，全文如下：

新华工委声明

最近以来，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用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一股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在革命群众组织内部挑拨离间，制造分裂，破坏革命的大联合，破坏已经建立起来的革命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而我们有些同志受了他们的蒙蔽，上了他们的当，跟着他们做了一些制造分裂破坏大联合的错事，在革命组织之间和革命组织内部制造混乱，客观上帮了阶级敌人的忙。为了反击阶级敌人的猖狂反扑，为了巩固、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抵制各种分裂主义的错误做法，我革委会特发表如下严正声明：

一、新华工革命委员会，是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的产物，是经中央文革批准了的。它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

因此，它是代表新华工行使一切党、政、财、文大权的唯一的权力机构。

二、今后任何组织召开任何会议，如果邀请了新华工革命委员会参加，同时又邀请新华工所属的任何其他组织参加，我们新华工革命委员会将一律不参加这种公开分裂我新华工的会议。

三、今后只有我新华工革命委员会派出代表参加的会议，作出的决定，对我新华工方为有效；凡非新华工革命委员会派出的代表，无权代表新华工。因而他们参加的任何会议，作出的任何决定，对我新华工无效。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均由会议召集者承担全部责任。

特此声明。

本期《新华工报》还配发了本报评论员文章《有礼当知仍有节，能柔应识亦能刚》。文中说：“最近，王、陈死党又向我们红色政权疯狂进攻，他们的阴谋分裂行动达到了狂热的程度。”“我们新华工人的忍耐从来是讲原则的，有限度的！新华工革命委员会是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的产物，是中央文革亲自批准成立的。每个真正的革命派都必须爱护这个新生事物，注意维护她的权威，只能对她补台，而决不允许拆台！”“阶级敌人正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利用革命队伍中某些同志的小资产阶级派性，在革命派内部拉一派，打一派，妄图分裂新华工。最近，在许多兄弟组织召开的会议上，连续发生的分裂事件，只能便亲者痛，仇者快”。

院革委会对红反团、敢死队少数人上述行为的反应之所以如此迅速和强烈，是因为这种行为如任其发展，可能导致新华工革委会的分裂。

为了说明这一点，在这里我有必要简要介绍一下我院文革中红反团和聂年生的有关情况。

红反团的全称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团”。成立时的成员都是四系（无线电系）学生，后来接收了我院附中部分学生，人数最多时大概有八九十人，负责人是聂年生。

红反团是我院最早成立的造反派组织之一。在我院文革初期反工作组和夺院广播台的斗争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我院大联合成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司令部（新华工）”（简称“红司”）时，红反团三个主要负责人聂年生、赵延昌、柳书伦都成了红司司令部成员，聂年生是红司的副司令（司令是郭保安），赵延昌任联络部长，柳书伦

任宣传部副部长。

红反团是我院以至整个武汉市大专院校中最先“杀向社会”并在省委建立联络站的学生组织。

以聂年生为首的红反团在串连和组织成立工总和二司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聂年生在工总和二司中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受到普遍的欢迎和尊重。在二司，甚至有人传说二司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将司令的位置空着，等待聂年生去就任呢。

我院有关郭、聂两派的说法始于1967年3月初。当时我们红司司令部搞整风，有人就说那次整风只不过是郭、聂两派之争罢了。到底郭聂之争因何而起，多数人都说不清楚。但人们普遍认为聂年生在我院是代表激进的一派，而郭保安则是代表较温和的一派。在红司（新华工）和新华工革委会中，聂派是少数，郭派是占主导地位的多数。

郭、聂两派在“七二〇”前并无明显的矛盾表现。在此前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如批判省委的资反路线、批判二八声明及反逆流和抗暴等问题上，郭、聂两派都表现了高度的一致，并未发生过任何大的矛盾和冲突。

但无可否认的是，在院革委会成立时决定由张立国出任革委会主任，后来又让张立国代表新华工出任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的职务，确实是我院郭、聂两派之争的结果。

我和聂年生早在1966年9月上旬就认识了。当时我院各系都先后成立了造反派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属“少数派”。为了增强战斗力，通过串连，我们决定成立新华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当时聂是四系（无线电系）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团的负责人，我是二系（电机系）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鬼见愁战斗队的负责人。后来我们都是新华工红卫兵总部、红司司令部、院革委会的成员。相对来说，我和他的接触还是比较多的。但这主要是在各种会议上的接触。因他住我院的最南边，而我则住在最西边，两人私下交流的机会很少。加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成立后不久我就去了新华工广播台汉口分台，这时他的精力也主要放在了驻省委联络站上，我们很少见面。

再后来，他当上院革委会副主任，他的工作很忙，而且主要在院外

活动。因此，我们的接触就更少了。

我和聂年生私下交流只有过一次。那是1969年5月间的一天，他突然约我去图书馆，他先给我谈了武汉当时“反复旧”的情况，说这次运动是工人阶级自发掀起的，作为学生应该积极支持和响应，希望由我出面组织恢复“新华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以投入反复旧运动。

当时因我刚从黄冈回来，虽然对武汉反复旧的情况作了一些社会调查，但心中对是否投入反复旧运动还在犹豫，因此，当时我并未答应他的要求。我给他的建议是：如果真要恢复红卫兵总部，最好从各大队（系）抽人上来组成新的总部，凡院革委会成员就不要参加了。他采纳了我的意见，第二天他亲自在图书馆召开了各大队负责人会议商讨恢复总部的事。但就在当天下午，从北京传来了消息，中央说反复旧是错误的，因此，恢复总部的事也就不了了之。

在我的印象中，聂年生是湖南衡阳人，比我高两届（六二级）。他出生在一个铁路工人家庭，身材高瘦，偏黑。颧骨略高，双眼下凹。他给人的印象是坚毅、果敢和睿智。

聂年生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和号召力。因此，在他的身边总不乏追随者，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粉丝”不少。他手下有“四大金刚”即：赵延昌、柳书伦、吴国芳、贺光宇。他还有一个最亲密的同伴叫李定初，不管在哪里，他们总是形影不离，李定初就像是他的贴身保镖一样，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由于聂年生与工总、二司之间的深厚渊源及他偏激的性格，在钢新之争中，他最终还是倒向了钢派。1968年6月7日，他在武汉关山地区工总群众大会上公开发表了演讲（详见1968年6月17日《关山反修前哨》第一期刊登的《聂年生同志谈×派中右倾机会主义头头的嘴脸》），和钢派头头一起批判新派头头的“机会主义”。正是由于聂公开倒向了钢派，他在院革委会中完全被孤立了。当时张立国曾提出要开除聂年生，公告都起草好了，只是郭保安觉得聂在革委会已完全被孤立，他在华工又没有群众基础，还是留着他好，更何况开除聂影响也不好。因此，聂才未被开除出新华工。这是后话，言归正传。

钢工总的头头们为了钢化全武汉，要利用我院郭聂之争来削弱甚至

分裂新华工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更有甚者，革干联中支持钢派的毛远耀还提出：“三新的概念要变了，新华工就是指新华工敢死队，新湖大是指红八月公社，新华农是指钢二司”。这就说明，他们不仅要分裂新华工，而且要分裂另二新。

就在钢新之争有可能愈演愈烈的时候，10月8日上午，周总理借陪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来汉访问的机会，召集武汉各群众组织的头头就大联合的问题进行了座谈，以化解当前的危机。在座谈会上，总理认真地听取了钢新两派头头的意见后作了重要指示。他批评了“唯我独左”和“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周总理在座谈会上还说：“康派也是革命的，康老（指康生）不是很好吗？”殷切希望武汉的革命派团结起来，要求钢新两派“困难时在一起，胜利后莫分开”。

9日晚八点，周总理在吴法宪、曾思玉、刘丰、肖前、方铭等的陪同下专程来到我们新华工，并在院革委会办公室与我们革委会部分负责人进行了座谈。我很荣幸，也参加了这次座谈会。

座谈会上，总理详细地询问了我们新华工及武汉近期的有关情况，希望我们搞好本院的斗、批、改，搞好复课闹革命。同时勉励我们继续



1967年10月8日周总理在华工与新华工革委会负责人座谈



周总理在华工电影场指挥师生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努力，争取在大联合中立新功。随后，周总理在电影场接见了我院全体师生员工和驻校的 7252 部队官兵。在欢呼声和掌声中，周总理说：“同志们，战友们，我早就听到你们新华工的革命精神和干劲了”。他在解释了上午没有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一起来新华工的原因后说：“我

文革篇

通过你们新华工向全武汉市的大专院校、中学校的同学们、红卫兵战友们问好！”

从总理在同一天两个座谈会上的讲话可以看出，总理对武汉的情况



1967年10月9日上午，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谢胡一行在康生等陪同下访问新华工。上图右起第一人为华工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熊小村。下图挽着谢胡者为王富山，挽着康生者为郭保安

是非常熟悉的，他非常关心武汉革命派的大联合问题。他特地来新华工会见院革委会负责人并与全院师生员工见面，无疑是对新华工的一种支持和鼓舞。

虽然钢派的头头在10月8日总理主持的座谈会上都表示坚决按总理的指示办，尽快实现大联合，但实际上钢工总的头头们还是坚持他们的“只有实现以钢工总为基础的大联合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的主张。为了大树钢工总的权威，他们一方面这样评说新派头头的主张：“除少数别有用心的外，不是政治上的瞎子，就是目光短浅的庸人。他们看不到人心所向，众望所归，置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革命群众的呼声于不顾，却在那里咬文嚼字，死搬硬套”；另一方面就是为自己评功摆好，抬高自己，把钢工总说成是武汉文化大革命中唯一正确的革命队伍。

1967年11月10日，《武汉钢工总》报发表社论《毛泽东思想照亮了武汉工人运动胜利前进的道路》说：“武汉钢工总英勇奋斗、光荣成长的一年，是毛泽东思想光辉胜利的一年，是和我们最亲密的战友九·一三、钢二司等风雨同舟、并肩战斗的一年，是武汉工人运动胜利前进的一年，是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值得骄傲的一年。”在这里，他们完全把新派在文革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给忽略了。

社论将工总比作“集体的江姐”、“集体的鲁迅”、“集体的愚公”、“集体的雷锋”，说“集体的江姐，集体的鲁迅，集体的愚公，集体的雷锋，这就是炉火中锤炼的纯钢，这就是钢工总光辉灿烂的钢，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哺育的结晶，这就是武汉工人运动的方向”。

如此自我吹嘘，显然是缺乏自信，同时也不免多了些孩子气。

怎样才能使这些派性十足、“斗志昂扬”的头头们冷静下来实现大联合呢？当时中央找到了一个解决派性的好办法，那就是办“学习班”。把两派的头头都集中在一起学习，给你好吃好住，让你“斗私批修”，搞批评与自我批评，还要求以自我批评为主。凡参加学习班的人，不准外出，连电话也不准打。这样就把他们和下面隔离开了，一切干扰都被屏蔽了。有的学习班到北京去办，而像武汉这种情况的则由负责“三支两军”的武汉部队“曾、刘首长”主持操办。

周总理离汉后，当时主持湖北省党政工作的曾思玉、刘丰根据总理

指示立即主办了钢新两派头头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任务就是解决大联合的问题，在实现联合的基础上，各自推选参加省市革委会的干部（包括推选参加三结合的群众组织代表）。在学习班上，要求各派头头各自多作自我批评，批判自己的“派性”，“人家的问题由人家说”。

头头们进了学习班，社会上也就平静下来了。

学习班很快取得了成效。通过学习毛主席的教导：“核心是在斗争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王明、博古、张闻天，他要做核心，要人家承认他是核心，结果垮台了”，钢派的头头们虽不情愿，但还是放弃了“以工总为核心实现大联合”的主张，接受了周总理提出的以三钢、三新、三司革联、工造等十一个组织为核心的大联合。在“三代会”和省、市革委会的人选问题上，虽然经过了激烈的争吵和讨价还价，但终于在1967年12月23日工代会（临）成立，次年1月15日红代会成立。紧接着，武汉市和湖北省革委会也先后于1968年1月20日和2月5日成立了。

那些极力主张以“三钢为核心”，在派战中选边站的干部，如孟夫唐、张华、刘真、毛远耀等人，虽有三钢全力推举，却一个也没有被中央批准进入省、市革委会。而新派力挺的干部被结合的比例比钢派高得多。

省、市革委会成立后，钢新之争本应宣告结束了。但随着中央几个领导人的讲话和报刊上发表有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的文章后，钢新之争又再度升温了。

当时省、市革委会虽然成立了，但革委会的权威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群众组织也还没有真正解散。进入革委会的钢新两派的头头们本来就没有从思想上真正统一起来，相互间还是不服气。

钢派的头头们在二八声明中就认定新派的头头是右倾机会主义者，中央有关“三反一粉碎”（反右倾机会主义、反右倾分裂主义、反右倾投降主义，粉碎右倾翻案风）的指示传达后，他们就立即行动了起来，直接由主要头头出面公开反新派头头的“机会主义”。

1968年5月17日，钢工总在《江城前哨》第六期上刊发了社论《让机会主义见鬼去吧》，同时登载了钢工总勤务组张耀忠、胡厚民在各级勤务员万人大会上的讲话。

张耀忠在题为《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乘胜前进》的讲话中说：

先谈一谈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小资产阶级革命派，由于他们所处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决定了它一方面要革命，可以革命，另一方面又决定了它在重要关头时的狂热性、动摇性或投机性。……因为小资产阶级革命派主要是小资产阶级队伍，他们的主要成分是知识分子，产业工人较少，特别是领导集团。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革命的不彻底性，投机性这几点决定了它的政治主张带有机会主义色彩。

回顾一下历史，我们就很清楚地看到了他们这一派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大家想一想，在“二·八声明”的时候，就是毛主席号召我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的时候，……而小资产阶级革命派是怎样的呢？在这个时候却抓住“二·八声明”某些缺点不放，甚至无限上纲，以至充当了陈大麻子镇压工人总部，镇压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打手，扮演了可耻的角色。“一·二六”夺权，就看出了它的领导集团推行的是一条机会主义路线，起到了阶级敌人起不到的作用。……第二点，在抗暴斗争中，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当以“三钢”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被压下去以后，机会主义就大搞投机，什么“只为战斗队员平反”，“工总不能恢复”等等，他们想独吞果实，结果还是吞不到。陈再道照样饶不了他们，并不买他们的账，照样要压他们，解散他们。

张耀忠在这里直接把新派打成了“机会主义”。为了说明新派头头的机会主义，张耀忠还谈到新派头头对待姜一进入省革委会的态度：

还有一点，比如在搞三结合，对待干部的态度问题时，也说明这一点。大家知道，当时到处都在揪姜一，开始是所有组织联合起来进行游斗，还在体育馆开了个大会斗争姜一，打倒姜一。结果呢，有些人听了周总理说了一句“姜一这个人，你们看怎么样呢？”只问了这么一句，他们就跳出来了，突然对老朱（指朱鸿霞——笔者注）讲：“老朱呀，我看姜一还不错。”投机的丑恶嘴脸就表现出来了。

为了说明钢工总是真正的革命派，张引用了毛主席“人民民主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的语录后说：

分析分析我们的队伍，我们的队伍除了“钢二司”和一些学生组织

外，“钢工总”、“钢九·一三”都是以产业工人为主体，而且，武汉地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人都是在我们这个队伍里头，都是在我们这个派别里头（说得太离谱了——笔者注）。……我们这个队伍是工人阶级当权，不是知识分子当权，不受学生左右，也不是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当权，更不是牛鬼蛇神当权。拿我们“工总”来看，勤务组一共十一个人，除了一个同志是一般技术员外，全是工人，而且是产业工人。……由于我们这个领导班子都是工人，又没有包袱，除了请教毛主席的教导就是请教战斗队员，请教群众。我们从来都是自己开会研究决定问题的，所以就把工人阶级的本色，工人阶级的革命彻底性，工人阶级的战斗风格，带到我们的勤务组里来了。

张耀忠在这个讲话中也就“揪军内一小撮”问题、“对待省市革委会”的态度问题、“武斗”问题、处理和“钢九一三的关系”等问题阐明了工总的立场。

1968年5月23日，钢二司以《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为题发表了“关于武汉目前形势的声明”。“声明”与钢工总头头的讲话相呼应，把新派头头说成是“蹩脚的革命家”，是“打着反对‘以我为核心’的招牌来树立右倾机会主义的核心的市侩们”。“声明”重申：“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部历史说明：钢工总和钢9·13这两支以产业工人为骨干的革命大军，是真正由无产阶级的左翼占据领导地位的革命左派组织，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

针对钢工总头头们的讲话和钢二司的声明，《新华工》报连续发表文章予以反驳。

5月29日，《新华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评武汉目前局势》，指出：武汉变色龙“接过‘三反一粉碎’和‘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的革命口号，利用‘左派’的旗号，进一步顽固地推行‘三右’，煽动资产阶级派性，拼命转移斗争大方向，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质纳入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混战，纳入‘钢新之争’，其矛头始终指向‘三红’。……当前，某些组织的某些负责人‘三右’相当严重，早已是敌我不分。他们看不到当前阶级斗争的实质，而沉醉于独霸江城、独霸湖北的黄粱美梦；他们不去密切注视阶级敌人的新动向，而是密切注视和他们持有意见分歧

的革命组织的‘新动向’，……他们不去研究当前阶级斗争的新问题，而是精心研究‘以我为核心’上的‘新问题’”。“在目前，有些组织的少数头头，借口‘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一方面，把与自己持有不同意见的革命组织肆意打成‘机会主义’、‘托派’、‘考茨基派’，另一方面，却把自己和自己所在的组织吹嘘为‘一贯正确’的百分之百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这是一个很坏很坏的习惯。”

《评武汉目前局势》这篇文章印了10万份，在湖北全省散发。

《评武汉目前局势》在全省产生了重大影响。用张立国的话说：“一些专县把我们的文章当中央文件来学习”。

当时新派认为刘丰是钢派的后台，是武汉的“变色龙”。而刘丰是武汉军区政委，因此，钢派则以此说新派“揪变色龙”是“揪军内一小撮”，是把矛头对准解放军。

6月19日，《新华工》报第96期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评〈江城前哨〉的资产阶级方向》。文章说：“作为工总的机关报的《江城前哨》，最近一个时期来在某几个人的炮制下，完全适应了武汉变色龙的需要，代表了资产阶级的方向。它掩盖和歪曲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实质，把矛头指向和他们持有不同意见分歧的革命群众组织、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转移了革命斗争的大方向。”

评论员文章针对《江城前哨》载文说新派“揪变色龙”是“反军乱军”，反驳说：“人们不会忘记，去年，武汉的天刚亮，你们晕头转向，到处派兵遣将，大力鼓吹‘揪军内一小撮’。曾思玉同志刚到武汉，就有人提出‘一看、二帮、三轰、四揪、五打倒’的方针，并到沈阳等地调查曾思玉同志的情况。康生同志、江青同志曾严肃地指出：武汉的钢工总，刚刚翻身就翘尾巴了，到处煽动揪军内一小撮”。“人们不会忘记，去年，当反革命王力揪出来以后，你们还狂妄地向毛主席请求要王力来湖北当主任。当广大江城人民、湖北人民揭露了你们的阴谋的时候，你们又倒打一耙说我们和王力穿一条裤子”。

同一天，《新华工》报第97期（当天出了两期）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评“反机灭康”——不许孟夫唐之流“不钢则康”的幽灵再现》。

与此同时新派其他组织也针对钢工总头头们的讲话和《江城前哨》

的文章发表批判文章。其中，工造总司《横空出世》报发表的文章尤为典型。

1968年6月25日，《横空出世》报发表了工造总司一号勤务员吴焱金在各级勤务员大会上的讲话《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夺取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吴以幽默、辛辣、狡黠的口吻回应了工总勤务员张耀忠和胡厚民的讲话。

吴针对张耀忠批新派“机会主义的动摇性和投机性”说：

请问，在工总刚被打成反革命组织后的几天，在武汉有谁这样为工总平反，有多少人敢揪武老谭呢？我们在为他们翻案时，他们当中有些人不是在请罪吗？不是有人扛着请罪牌在大街上“修正错误”吗？既然是无产阶级的左翼，为什么要低头，不敢坚持真理呢？当然，我们也不去说这些人就是机会主义，因为当时对这个问题也同样存在着一个认识过程，我们不说别人是机会主义，不抓住别人的一点就无休止的攻击，因为这样做不利于团结。

有人说，“你们不坚决、不彻底为工总翻案”。我们一开始是提为工总平反的口号，后来有人说要坚决彻底为工总翻案，我们认为这也是正确的，它反映了群众当时的心情，我们没有反对过这种提法。中央也是提平反二字，没谈什么翻案嘛。如果说提平反二字就是机会主义的表现，那就是炮打中央。实质上，问题不在于你的口号喊得多么响，问题在于你的行动如何。我们不应该做口头革命派，而应当做言行一致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那些口号喊得最响的人实际上在为工总翻案的问题上却没有做什么事情，甚至那些要翻案的本人，当时也无影无踪，溜之大吉了。大家不会忘记，震动江城的新一中、新公校的绝食斗争，总指挥就是张维荣。他是机会主义头头？（群众笑）钟汉华还写了一封信给张维荣嘛，“百万雄师”是顶恨张维荣同志的。新公校绝食的时候，张维荣给我讲“小吴，你调十万人把军区围起来”，当时我们就调了很多人去围军区，有谁敢在那个时候这样提着脑袋干呢？当新湖大的革命小将把钟汉华揪出来以后，有些响当当的人就指责我们不策略。什么策略不策略？谁是机会主义不是一目了然了吗？那时候向陈、钟示威的“五·一游行”，总指挥是工造的嘛！当时出头露面的人，现在都是机会主义了？（群众笑）

从4月22日到5月17日那一段时间，三新等革命小将绝食静坐了二十余天，在汉阳把夏帮银搞了出来，这难道不是人所共知的吗？到底谁是机会主义呢？”

今年，有很多值得纪念的光荣的日子，什么六·一二、六·一七、六·二四、七·一五都是我们新派的光荣和骄傲，是我们亲密战友“钢九·一三”人以及“钢工总”、“钢二司”中的坚强战士的光荣和骄傲，这是因为我们当时和“九·一三”的战友们战斗在第一线。而有一些人却跑到外地，真是荷叶包鳊鱼——溜了！跑到最安全的地方去干革命，跑到最保命的地方去大叫抗暴去了。震动全国的“六·一七”抗暴，有“新一冶”，有“九·一三”，有我们“铁军”，就是差响当当（群众大笑），我们有很多战士和战友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壮烈牺牲了，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流下过鲜血和汗水，这些人绝不是机会主义者，和这些烈士一同生死与共的、浴血战斗并活着的人也决不是机会主义者（鼓掌）。

抗暴时，我们勤务组就牺牲了两位同志，我们的戴鹏同志被“百万雄师”打死后，埋在市委大院，我们的联络部长王明扬同志被“百万雄师”杀死后喂了猪。同志们，这是多么残忍的事！（群众呼口号：向“百万雄师”讨还血债！打倒陈再道！）“六·二四”，百万雄师调动大批人马血洗我们工造总司，我们的勤务员阎志斌同志，就被“百万雄师”杀了十几刀，他当时已昏死过去了，准备送往火葬场，而被“百万雄师”的医生以为是“百万雄师”的伤员，误将阎志斌同志救活了，才免去一死。像这样坚强的抗暴英雄，这样的群众组织的头头，难道是“机头”吗？是机会主义的头头吗？我们的广大“铁军”战士也同样是这样勇敢，仅“六·二四”，我们工造总司就牺牲了几十名战士。当然，我们也不会忘记，还有其他组织的坚定革命派，曾经和我们一同守卫工造大楼，在“六·二四”，也为毛主席革命路线流了血，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这一点的，我们要珍惜这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只有那些没有在抗暴时流过血，甚至连汗都没有流过的人才会忘记这一切，才会恶意地攻击我们是机会主义者。现在不是有人要喝“鸡汤”吗？我们穷得很，没有“鸡汤”供应，只有抗暴烈士的鲜血，有种的就来喝吧！

武汉地区的掀陈抗暴，我们工造总司是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的，我们

广大的战士所作的战斗是可歌可泣的。江城哪一个抗暴战场没有我们工造总司战士洒下的鲜血？谁能否定我们抗暴斗争的大方向？否定我们抗暴的成绩是白日做梦，是绝对办不到的。虽然他们总是处心积虑地想贪天功为己功，想否定我们，但这一切都是徒劳，江城人民是最了解的。站在抗暴第一线的头头是右倾机会主义，是小资产阶级革命派，而在牢里向陈大麻子投降，甚至“职工联合会”的头头反成了响当当的无产阶级的左翼，难道会有这种事情？我们奉劝某些人，想颠倒革命历史是颠倒不过来的，历史已经作了结论。

针对张耀忠说的工总领导班子是最优秀的说法，吴说：

最近，《江城前哨》造谣说：周总理讲过“武汉地区号称48万的工人组织工总的领导班子是全国最优秀的”，这纯系造谣，我们没有听到过总理这样的讲话记录，如果真有的话，那很早以前就会有“特大号外”、“北京来电”了。实际上，“工总”七二〇以前的领导班子就有劳改犯×××和×××，可见并不纯嘛！现在的新领导班子是七二〇后才建立的。至于纯不纯，自己不能夸自己，要江城人民鉴定，自己夸耀自己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百万雄师也曾造谣，曾经夸耀自己“大、好、纯”，结果适得其反。自己称赞自己，是最愚蠢的了。

吴还就张耀忠提出的有关“揪军内一小撮”问题、“对待省市革委会”的态度问题、“武斗”问题逐一进行了反驳。

1968年6月15日，《新华工》报第95期发表了本报评论员的长篇文章《评反革命跳梁小丑鲁礼安》。

《新华工》报之所以要在这个时候发表批判鲁礼安的文章，不仅是因为鲁礼安在我院搞了一个“树工总权威，纪念8·23造反精神大会”，试图挑起我院的钢新之争，直接伤害了我们新华工，还因为他是当时武汉市极左思潮的代表人物，是钢工总头头们的“座上宾”。他在《扬子江评论》上发表的一些文章极力宣扬他的所谓“决派”思潮，不仅毒害了一大批青年学生，特别是中学生中天真幼稚的红卫兵，而且迎合了钢派少数头头打压新派的需要，给钢派头头的“钢化全武汉”“反机灭康”火上加油。

鲁礼安名扬全省是在“七二〇”以后。这个“新时代的狂人”曾仰

望苍天发问：“北斗、北斗，未来几十年的中国、世界，将谁主沉浮？”他要“不顾火刑与十字架的威胁，冲破历史的惰力，去开拓新的道路”。

他在“七二〇”后短短两个月内先后成立了“北斗星学会”（成立于1967年11月7日）、“决派联络站”（“决心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简称“决派”，成立于1967年12月30日），搞了一个刊物《扬子江评论》（创刊于1967年12月25日），制造了一套又一套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新理论”“新策略”和“新思潮”，将极左思潮一步一步地推向了极致。如他在《决派宣言》里写到：“决派当前奋斗的目标，就是要彻底摧毁旧的国家机器”，“直至今天仍在袭用的资产阶级国家体制，将在这场斗争中被决派所摧毁”，“实现决派的历史任务，就可以使得决派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代之而起的思想统治将是决派思潮”。

当时我们确认：以鲁礼安为代表的极左思潮是极其危险的。因为它完全背离了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思想和设定的框架，更是与毛主席当时的战略部署格格不入。

为了警示后来的造反者们，在1969年6月由江重初、陈定方、克己和我4人起草的新华工革委会文化大革命总结——《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斗争》第三部分“关于三股思潮”中，我们还专门对决派思潮进行了分析和批判。有关情况我将在后面的章节里说到。

鲁礼安于1968年5月在黄石被新派扣押。当时钢派一些人搞了一个72个单位署名的“营救鲁礼安联合代表团”，极力为鲁礼安鸣冤叫屈，说鲁是“勇敢的革命闯将”，是“江城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优秀代表”，是“新华工的左翼”“新华工的希望”。由此可见，鲁礼安的极左思潮在钢派一些组织中有着广泛的影响。

一年后，中央发布了关于“北决扬”的“9·27指示”，当时主政湖北的曾思玉、刘丰借此大搞扩大化，整造反派。为什么湖北省、武汉地区的造反派比其他任何省都整得惨、整得彻底？可以说就是因为有北斗星学会、决派、扬子江评论（简称北、决、扬）为当权者整造反派提供了口实和把柄。从某种意义上讲，是鲁礼安把湖北、武汉的造反派害惨了，他的罪孽是深重的。

我不认识鲁礼安，从来没有和他有过交往，但我却也深受其害。1970年3月，我被院工宣队送到了湖北咸宁马桥的“院学习班”（院学习班的“对象”共10人，我是其中之一），从“动力”们要我交待的问题看，他们显然把我当成“北、决、扬”来审查了。为此，我受尽折磨。

2006年春节前，鲁礼安在香港出版了他的回忆录《仰天长啸》。我没有看到这本书，只是在网上看到了一些人对这本书的介绍和这本书的节录。因此，我很难对全书进行评说。但从我读到的节录来看，我认为鲁礼安虽经历了十一年的监狱生活，但他的本性却还是没有什么改变。关于鲁礼安书的评论，我同意原新湖大“红旗公社”杨闯的说法，即可用“极端、狂妄、空洞六个字来概括”。至于他的为人，我同意曾经和他有过紧密关系的我院贺光字的结论，即鲁是一个“从极左到极右的文革叛逆”。

鲁礼安在回忆录中把自己说成是文革中的造反英雄，信众如云，能“一呼百应”。而事实上，在武汉“七二〇”前，除他的同班同学外，没有几个人认识他，更不用说全武汉市了。

文革中的鲁礼安是一个典型的“孤家寡人”，武汉没有一个造反派组织愿与他合作，更不用说收留他了。“七二〇”后，他极力鼓噪他的极左思想，但在他成立决派组织时，也只不过二十来人，且多数是年幼天真的中学生。

他在回忆录中任意夸大其词，很多事使人难以置信。如他说在监狱里“被看守班长用半自动步枪上的三棱刺刀朝胸口猛捅，痛得在地上打滚”，奇怪的是，文中并没有说他受了伤。他当时肯定是没有穿防弹背心的，既然是用三棱刺刀“猛捅”，怎么他就没有被刺伤？他能刀枪不入？使人更难理解的是，文革中有那么多人因他无辜被牵连，受尽了磨难，他却没有真诚地向这些人道歉，更没有因此忏悔。他既然自称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怎么就忘记了应该向上帝忏悔，向因他而受到伤害的人忏悔呢？

话说远了，言归正传。

在这次钢新之争中，三钢之一的钢九一三并未站在钢工总一边反对“新派的机会主义”。

在1968年5月20日出版的《缚苍龙》报上，刊登了九一三兵团一号勤务员李想玉在“武汉钢九一三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上的讲话，讲话通篇都没有提到反新派的“机会主义”问题，而是强调：“我们造反派不能忘记毛主席的教导，不能忘记过去，我们是在战斗里锻炼成长起来的。我们要听中央首长的话：‘困难时在一起，胜利了莫分开’”。 “我再重复一句，就是我们要提防敌人的阴谋，把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搞成‘钢’、‘新’之争，搞成群众斗群众。”

该报在同期中还刊登了《武汉钢九·一三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纪要》。在该“纪要”的第五部分“关于武钢无产阶级革命派封闭《长江日报》的问题”中，还特别指出了长江日报的右倾分裂主义问题，其观点和钢工总的观点就完全相左了。

当时人们都认为长江日报已成了钢工总的喉舌，在派战中它已完全选边站了。九一三毅然决定封闭长江日报，实际上是给了钢工总一个大大的难堪。

到1968年5、6月，新派在这场论战中显然已占了上风。但在“武卫”方面，钢派此时已占了绝对的优势。

二、抢枪与武斗

武汉“七二〇”以后，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根据解放军支左以后一些地方造反派受到打击和压制的情况，错误地提出了“要武装左派”的决定，两报一刊也发了相关的社论。社论要求凡已实现了大联合、成立了革委会的单位应该武装保卫红色政权。在武汉，钢二司根据中央的这一精神首先从部队军械库弄到了一批枪支弹药¹。随后，钢派的其他单位也去部队弄到了一些枪。

这里之所以不说是“抢到”而说是“弄到”，是因为这些枪其实是部队送的，而不是抢的。当时部队根据中央要武装左派的精神，对造反派的“抢枪”实际上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随意让拿的。事实上，文革中除少数枪支是造反派硬抢的外，大部分是“明抢暗送”的。

随着钢新之争逐步升级，钢工总的少数头头开始用拳头说话了。他

1 参见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202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0年版。

们首先在武汉市内建了多个武斗据点，由工总作战部统一指挥。工总当时最大的“群众专政”组织“江城前哨”所办的《江城前哨》报，实际上已成为工总的机关报。

1968年5月3日，钢工总调集武装人员围攻中原机械厂，造成一死多人受伤；5月下旬的一天，围攻钢铁学院的新派，大批学生被赶出了学校。

由于钢工总掌权的一些单位如武汉机床厂等对本单位新派的打压，“七二〇”前曾收容过钢新两派的新华工现又成了新派的收容所。一些被赶出来的无家可归的新派人员再次云集我们新华工。到5月中旬，我院整个东三楼都被这些人住满了。

钢新之争迅速波及到湖北各专县，并主要表现为武力对抗。钢派在“钢化湖北”的口号下大力扩充组织，导致一些本来已经联合夺权的地方再次公开分裂，个别地方已经成立的革委会被推翻（如汉川县），有的单位军代表被无理驱逐（如黄石）。而新派在专县的力量本来就比较强，对钢派自然不肯相让。因而，在专县就发生了一系列的武斗事件，伤亡数百人。

当时流传各种谣言，其中最让人不安的是说工总的二号头头胡厚民扬言要在三天内踏平新华工。为此，郭保安曾亲自去找了原湖北省省长，时为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的张体学，要求省革委会和军区给予干预。虽然张体学对所传胡厚民的讲话的回答是“没有此事”，但他也并没有对新派作出任何承诺。因此，郭保安告别张体学时说了一句话：“我要回去准备战斗了”。

事实上，当时新派的头头们根本就不相信张省长说的话是事实，而认为工总的头头们完全可能依仗他们的武装力量袭击新华工。因此，华工园内一直弥漫着准备“战斗”的紧张气氛。

新派的头头们对当时的形势进行了全面分析并作了各种准备。他们认为：现全国各省的造反派都已分裂成了“激进派”和“温和派”，就湖北武汉来说，钢派是“激进派”，新派是“温和派”。那些“激进派”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其行动已逐步超越了文革所规定的目标和任务，完全突破了毛主席为文革所设定的框架。最典型的是北京的“五一六”、

湖南的“省无联”以及湖北的“决派”。他们几乎都同时将矛头对准了毛主席的得力助手、文革实际的操盘人周总理。头头们认为“激进派”实为“极左派”，而“激进派”几乎都同时患有如列宁所批判的“左派幼稚病”，是真正的右倾机会主义。

头头们都认为“温和派”是讲究政策和策略的，是真正代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因此“温和派”最终必胜。

基于以上的分析，新派的头头们决定要武装保卫自己，并决定一旦在武汉失利，就去专县打游击。经过协商，新派成立了全省性的“联防指挥部”，并要求新派各单位都要成立相应的武卫队组织¹。因新派在专县的力量比钢派强，武汉的新派就和专县的新派一起搞联防，以抗衡钢派。

接着，新派一些头面人物，包括工造的吴焱金、新湖大的彭勋、新一冶的曹承义及我院的张立国等人组成了一个报告团，他们在新派所属单位（包括我们华工）进行宣传 and 鼓动。他们认为：“钢铁长城由于许多原因不能及时地、有效地保卫真正的革命造反派，因此，必须自己武装起来，保卫红色政权”。

事实上，我院早在3月底就已经成立了武卫队。郭保安在3月中旬的一次革委会会议上说：“现在学校不大安全了，我们要组织一部分人成立武卫队，并去弄些枪回来。”经过讨论，多数人表示赞成。于是，在3月底成立了我院的“292部队”（由111和181两个队组成），负责人是刘玉满、鲁迪、秦荣法。

刘玉满开始是政委。后又把鲁迪抽到武卫队来，由他负责组建一个摩托排。这个摩托排由13人组成，给他们每人发了一套军装，还配了领章。摩托排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头头们的安全。当时特别交待：一旦学校被工总包围，这些人必须全力保护头头们突围出去。

当时郭保安、赵文成、刘玉满、鲁迪、刘玉民几个人都配了手枪（当时革委会其他成员是没有枪的），鲁迪除配了手枪外还配了一支快慢式机枪。

钢派要搞武力震慑，新派要武装保卫自己。于是，钢新两派都争先
¹ 见1969年11月11日郭保安在工宣队陶常任副指挥长主持的院贯彻9·27指示学习班上的检查。作者保存有当时的记录。

去“弄”枪。

在这一系列抢枪事件中，荆沙地区抢枪是最典型的。当时钢新两派的主要头头都到了现场指挥，新派去的是省革委会副主任、我院革委会主任张立国，工总去的是省革委会副主任、工总一号头头朱鸿霞。新派先在荆州抢枪，钢派后在沙市抢枪。钢新两派在抢枪过程中发生了枪战，多人被枪杀，上万担棉花被烧。当时新派有人还认出了朱鸿霞并朝他开了枪，朱险些丢了性命。

除荆沙抢枪外，黄石铁山、大冶、鄂城的抢枪事件也很突出。铁山的新派把 8199 部队一个连的枪全抢了。大冶、鄂城的枪也是在新华工的支持下由当地的新派组织去抢的。

新华工直接抢了三次枪。第一次是去 162 医院，第二次是去南湖某部，第三次是去 127 部队。第一、二次抢枪都成功了，但数量都不多。第三次抢枪是联合指挥部早就决定了的，当时决定只要钢派再次抢枪，新派就去 127 部队抢枪。可这次抢枪失败了，不但没有抢到枪，而且因守卫战士开了枪，把我院参加抢枪的韩前同学给打死了。

除上面提到的我们的三次抢枪外，我院还在武卫队成立之初去部队偷过一次枪，去抢了一次工总的枪。

在 1969 年 10 月 4 日的院学习班上，秦荣发就去部队偷枪和去抢工总的枪作了如下发言（笔者会议记录摘要）：

秦说：我们第一次“弄枪”是去南湖某解放军驻地去偷枪。因为有内应，我们赶到存放枪的屋子，伸手拉开窗户的插销就进去了。这次我们一共偷了 17 支枪。因事先没有准备交通工具，枪拿到后却运不走。后来有人想了一个办法，先把枪沉到南湖里去，第二天再开一辆车去取回来。谁知第二天去沉枪的地方一看，枪不见了，被别人取走了。是谁取走了不清楚。我们当时分析可能是因为我们偷的枪是新的，枪身上包裹着一层保护油，入水后，枪身的保护油就从水里冒了起来，在水面形成了一层油，因而引起了别人的怀疑，沉枪的地方水不深，别人下去一摸，发现是枪，自然就被别人搞走了。当然，也可能是有人挖了个坑，故意让我们上当。

第二次“弄枪”是去抢工总抢来的枪，也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所谓炸

汽车事件。

一天，新一冶的曹承义从黄石铁山打来电话说：工总有一辆满载抢来的枪支的汽车将于晚上十一点从黄石返汉，这辆车将路过×××（我没有记清——作者注），要我们设卡劫持。我们立即派出武卫队赶到指定地点，并布署了三道警戒：首先是用手电示意其停车，如不停，则在车通过第一道警戒线时开枪警告；若还不停车，则在第二道防线上拉响炸药包；若还不停，则在第三道防线时瞄准射击。

晚十二点左右，一辆汽车果然来了。我们用手电示意其停车，但车非但不停，反而加大油门向前冲。按原计划，如在第一道警戒线时车子不停，则在车辆到达第二警戒线时拉响炸药包。谁知第二道警戒线按电钮的人心慌，在车还离50米远时就拉响了，车辆完好无损，飞驰而过。当车辆快到第三警戒线时，武卫队的人开了枪。结果是第一枪未中，第二枪卡了壳。当时我院只有几支步枪和一挺机枪，机枪是用来防武汉鼓风机厂工总进攻的，这次行动没有带去。那天我们带去的五颗手榴弹中只有一颗是真的，另外四颗是铁山造的。扔的第一颗是真的，但扔时未拉引线，扔第二颗时拉了线，但未响，到要扔第三颗时，车已开出很远了。

汽车顺利地通过了我们的三道防线。

当这辆车到达我们华工后，我们才知道原来这辆车是新派的。车上的人带了介绍信，说是要去警司反映情况，实则他们是来我们新华工避难的。

这两次偷枪、抢枪都没有成功，反而成了后来人们的一段笑话。

在1969年11月的院学习班上，郭保安在有关抢枪和搞武汉与专县联防的问题上作了以下检查发言（笔者会议记录摘要）：

1. 荆沙抢枪问题：荆（州）沙（市）抢枪是我们新派先抢的，以后钢派也抢了。当时钢派在沙市，新派在荆州，不知死了多少人。在这方面，张立国在那时有他的错误，在去时张立国说朱鸿霞可能搞小动作，我就说，他搞你也搞嘛，他们不交枪，我们也不交枪。

2. 有关鄂西联防问题：搞鄂西联防是我出的点子，以后勤务组通过了。当时看不清形势，认为武汉形势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当时认为铁山地势险要，沿途也安全，我到了铁山后，高玉峰用了几十分钟时间论

证了钢派是“老机”，而我们新派是代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我就说了：从目前武汉的形势发展看，我们应作好大打的准备。我在铁山时，他们还专门为我搞了一次“检阅”，参加“检阅”的队伍长达一公里。

3. 我们搞刘丰，认为刘丰是钢派的黑后台。当时把问题看得非常严重，认为如果钢派打来了，解放军要来保护我们都进不来。为此，我曾专门去找了张体学同志。我说胡厚民讲了，他们要在三天内踏平新华工。张体学同志说：“不可能，不会有这种事”。我说：“无风不起浪，他们是会这样干的。你不信我信，我要回去准备战斗了。”《评武汉目前局势》这篇文章我们印了10万份，在湖北全省散发，鼓吹掀变色龙，在全省掀起了掀变色龙高潮。

4. 插手专州县问题：在广济，我们当时是支持广济“红总”的，这实际上是我们挑起了广济的派性斗争。还有黄梅、监利等专县，有些也是由于我们直接插手，或是在我们错误的思想影响下大搞了武斗，死伤了两百多人。当时我们还认为广济“红总”打得好，还派了刘多兴、朱海云等人去慰问。

5. 我们在院内成立武卫队，大造武器，这些都是我搞的。当时决定调机一系两个班去造武器，我也亲自去搞了。我们制造的武器是专门对付钢派的。当时我们认为他们（钢派）是国民党，我们之间的斗争是国共两党的斗争，我们歪曲了主席要武装左派的最高指示，我对不起党和人民，也对不起大家，向大家赔礼道歉。

张立国1969年11月11日的检查发言，在谈到抢枪问题时说：“我的另一个错误就是搞抢枪。专县很多地方的抢枪是由我指挥的。我派了一百多人的‘调查团’下去搞枪。如去洪湖等地的抢枪都是我派去的。潜江的武斗也与我院有很大的关系。……我在荆沙还召集了八个县的新派负责人会议，煽动武斗。当马文秀说他们把人武部和监狱的枪都抢了时我大加赞扬，为他们鼓气。”

1968年两派抢枪、武斗达到高潮，引起了严重的社会安全问题。为此，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湖北省革委会主任的曾思玉坐不住了，发脾气了。他下令两派抢来的枪支必须在三天内封存上交，否则将追究头头的责任。在6月21日的省革委会会议上，曾思玉要求立即停止抢枪武斗。他说：“在

武汉发生了大规模的抢枪，仅5月26日、27、28日三天，就抢了五万多支枪。这是什么原因呀？有些人还把枪故意搞断，一支半自动步枪要经过1500道工序，值440多元呀，这是真正的造反派干的吗？这完全是反革命行为”。“在荆沙，他们把我们的解放军的枪全部都抢了。在宜昌，最近发现反革命集团破坏，应该抓起来嘛。”

曾思玉在会上还说：“自抢枪以来，在武汉打伤了四百多人，流弹打死了五十多人。一架飞机也被打伤，还有一个单位造了土坦克，你那个土坦克有什么用呀？你抵挡得住解放军的坦克吗？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要抵制，损坏国家财产的要赔偿。对这些坏家伙我们不能采取无政府主义，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在会上曾司令员还念了一份材料。材料说：“昨天，钢二司武汉电力学校的高××、潘××一伙坏蛋打死了我们解放军的一个连长，这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最近以来，钢二司中少数人潜伏在海校附近，天一黑就拦路抢车，行凶杀人。6月14日晚8点，他们袭击了空军的巡逻车，6月14日晚9点30分，他们袭击了从军区返回的空军雷达兵，一个战士被打伤，车辆被打坏。6月18日晚8点多，省革委派小车送省革委会副主任张立国同志回新华工，车子被抢，司机被打伤。同时他们还抢了空军的一辆华沙牌小轿车。6月19日晚，这伙暴徒向我解放军开枪，当场打死了我们邱少云连连长，他们对解放军有什么感情？”

曾司令说：“前天开会，我说三天内交枪，今天是第三天了。枪落到坏人手里，我们的社会秩序就得不到保证。枪愿意交的要交，不愿意交的也要交！如果顽抗不交，不自动交枪，我们就强行收枪。到时你可不要说我们这是搞什么鬼呀，说陈再道又来了啦，你可不要这样讲。”

曾司令员的讲话发挥了很好的震慑作用。两派头头虽然对交枪都不情愿，但还是在6月底以前陆续将抢来的枪都交了。

交枪以后，钢派的头头们失去了武力依恃，而新派的头头也就失去了“武卫”的借口。因而，武汉文革期间的第二次钢新之争宣告结束，社会也就逐渐稳定了下来。

武汉的钢新之争先先后进行了两次，第一次是1967年1月下旬至2月中旬，持续的时间约一个月；第二次是1967年8月至1968年6月，持

续了十个月。两次加起来不到一年的时间。

1968年9月底，中央发布9·27指示，宣布以鲁礼安为首的“北、决、扬”为“反革命地下组织”，武汉所有造反派头头都受到牵连。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复出，钢新两派主要头头全部被打成四人帮的“帮派分子”，大多被判徒刑，最高的达20年。

第二十章 在院革委会任职时的那些事

我院革委会成立于1967年8月6日，当时叫“新华工革命委员会”。

我院革委会因成立比较早，革委会没有实行后来通常实行的党政领导干部、军队代表和群众组织代表的“三结合”，而是实行的原院党政领导干部、教职员代表和学生代表的“三结合”。正由于没有军代表的参与，我院革委会也就避免了很多因军人参与带来的弊端。

我作为院革委会的一名委员，在院革委会任职了两年零四个月，即1967年8月至1969年底。

从1970年初开始，全院搬到咸宁搞整党和“斗、批、改”，工宣队全面接管了学校的党政大权，我们这些学生委员都回到了原来的教学班，这时革委会虽没有宣布解散，但已名存实亡。

毛主席说：“革命委员会好”。

通过比较文革前和改开后我国政权组织的状况，我认为革命委员会确实是好，比文革前的好，比改开后的好，比一些人企望的西方“文明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还要好。

但今天的一些年轻人在三十多年来主流媒体和不良文人的误导下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在他们看来，文革时期的革委会无非就是造反派掌权，尽干坏事。

其实，真实的革委会确实是好的，完全不是他们在影视节目中看到的那个样子。

下面我就根据自己在新华工革委会任职的经历和感悟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革委会好在哪里？好在革委会的成员是真正按巴黎公社的形式即民主选举的形式产生的，这些人一般都是从群众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为群众所信任的，他们的人品和才干是经过实践检验的。

我们都知道，文革前和改开后，我国各级党政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是由上级指定或委派的，这种任用和选拔干部的制度，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

正因为革委会的成员都是群众直接选举的，革委会就真正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意志，因而也就真正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革委会好在哪里？好在它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大事小事都处在群众的监督之下。群众给革委会及其成员贴大字报、开批判会是非常普遍的事。

革委会好在哪里？好在革委会在行使权力时真正地实行了民主，真正实行了“集体领导”。在革委会内部讨论问题、作出决策时，委员、常委、革委会主任之间都是平等的。不同的意见都可以发表，都可以争论。这就避免了一把手个人说了算，其他常委、委员只是摆设的弊端。

革委会好在哪里？好在机构精简，党政合一，精英荟萃，令出一门。我院革委会成员共45人，是原院党政干部的三分之一（可能还不到三分之一）。机构精简了，人员精干了，办事的效率大大提高了。教学、教改、科研、落实政策等各项工作都有声有色、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并很快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华工在院革委会治理期间没有出现任何人整人的现象。总体来说，华工当时的干群关系、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同事关系是积极的和谐的。对此，我院原院党委第一书记、教育家朱九思在评价文革十年的华工时，也肯定了华工的文革是文明的。

我在新华工革委会任职期间，除分管院广播台和院文艺宣传队外，还曾主持过“大型毛泽东诗词组歌演出团”的工作，曾去湖南进行过一个多月的社会调查，曾短期主持过全院的行政工作，曾参与全院文革总结的写作和两本诗集的编辑、出版，曾主持“解放朱九思学习班”，为“解放”朱书记作出了努力……

在我写这本回忆录时，我总觉得我在新华工革委会任职的两年多是我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一段日子。虽然当时我只不过是一个二十三四岁的毛头青年。

我之所以说在院革委会任职的两年多是最值得我骄傲的一段日子，一是因为我所做的事都是给学校、给社会输送“正能量”；二是我认为当时我的思想是最开放、最自由的，身心是最放松、最畅快的，精神生

活是最丰富的。我们不但有理想，有激情，而且有浓厚的友情和烂漫的爱情。读者只要看了我在本章和下一章的回忆就知道我说的并非谎言。

一、探亲路上的见闻

武汉七二〇事件震动全国。父母亲担心我的安全，接连两次来电报佯称“父亲病危”催我“速回”。

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发表，我认为武汉大局已定，因心中惦念年迈的父母亲，决定回家探亲。

当天，我上了南下的15次特别快车。

这是我离家来汉上学三年来第一次回家探望父母。三年来，不是我不想父母亲，而是因为经济拮据，实在无力购买回家的火车票。父母亲在解放前吃了不少苦，近年来我老家因连年遭旱灾，收成很不好，日子过得还是很苦。想到此，我真是恨不能飞到他们身边。

列车在京广线上飞驰着。我目不转睛地望着窗外我熟悉的农村的山、水、行人和农田。

早稻已经收割了，一片片第二季稻长势很好，绿油油的秧苗汇成了绿色的海洋。此时，我的心情不错，一年来一直紧绷的神经终于得以放松了。

不知什么原因，列车在一个小站停了下来。我没有下车，静静地凝望着窗外。

刚下过一阵雨，空气中散发着一股泥土的清香。草木经雨水的洗刷后，山峦似乎变得更加清秀。村子旁池塘里荷叶上的水珠反射着太阳的光辉，五颜六色的。那含苞欲放的荷花在绿叶中摇曳着，让人赏心悦目。

在稻田旁的一座小山上，一群白鹭（大概不下千只吧）云集在那里。突然一起飞走了，不知是因为什么，大概是受到了惊吓吧。过了一会，又飞回来在小山上空盘旋着，并不停地叫唤着。

村庄里的人们都在忙碌着。有的在扬场，有的在堆放脱过粒的稻草。小孩们有的在嬉戏，有的在相互追逐，奔跑打闹。在村子显目的地方还可以看到一条条“打倒陈再道”“为工总翻案”的大标语。

半个钟头后，列车开动了，继续向南飞速驶去。

列车徐徐地进了蒲圻站，下一个大站就在湖南境内了。

列车刚一停稳，车站内就传出前面发生武斗的消息，说列车不能开了。我不想下车，开始和周围的人闲谈起来。我们很自然地就谈到了武汉近来发生的事。我说了王力同志在汉的情况，说了8201部队在七二〇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旁边座位的旅客都围过来听我讲，并不时有人插话补充。这时，我发现听我们说话的人中有的表情很不正常，出于一种警觉，我开始仔细观察这些人并停止了话题。

周围的旅客都下车吃饭或洗漱后，坐在我对面那个从辽宁去广州的男子突然悄悄地告诉我说：刚才坐在我们这边的几个人都是百万雄师的，这些人都在逃亡途中。这时我才明白，在我刚才讲话时，他们为什么会表现出紧张的神情。

当我吃了饭返回原来的座位时，周围座位上的人也都回来了，我们接着闲聊。不过我们的话题已经改了，原来表情紧张的那些人也放松了下来。

7月28日凌晨两点五十分，列车离开蒲圻站继续南行，但到了湖南岳阳时不知为什么又停驶了。

据车站报导，要到七点五十才能继续开车。没有办法，我下车进岳阳城逛了一趟。

岳阳的街面不大好，市容也显得很乱。就大街上贴的大字报看，岳阳工联的力量比较弱，大多数大字报都是站在反对长沙工联、反对湘江风雷立场上的。

从岳阳百货大楼张贴的一张大字报“走访记”中可以看出，岳阳军分区是站在湖南省军区龙书金这方面的。

本想去看看岳阳楼，但一是不知道岳阳楼在什么地方，二是没有熟人带路，只好作罢。

列车从岳阳开出后一直比较顺利，相继过了长沙、株洲、衡阳。因列车上没有服务员，没有广播，加之开车时间连车站的人都说不清，更无法控制，所以车过长沙、株洲、衡阳时我都没有下车。

下午五点左右，列车终于到达了终点站郴州。

在郴州站下了车，我直奔郴州汽车站，准备买回宁远的车票。到了

售票处一问，才知道去宁远的车票很紧张，不但没有了当天的车票，就连第二天的车票也没有了。我只好找一个旅馆先住下来。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去了车站，想碰碰运气。

看来买去宁远的车票是不可能了。于是我就买了到蓝山的车票，准备到蓝山后再设法买到宁远的车票回家。十一点左右，汽车由郴州到达蓝山县城。到了蓝山后，我就去买由蓝山到我们宁远的“过路车”车票，但售票员死活不卖，好说歹说，终于同意我自己上车后买票。我上了开往宁远的车，车上其实空了很多座位。十二点半汽车到达神下，下了车步行，我于一点半左右安全地回到了家。

父母亲看到我平安回到家都非常高兴，四邻也都过来看我。闲谈中，他们说的都是一件事：今年又是大旱灾，很苦。

一回到家知道这次是父母亲担心我在外面有危险才要我回来的，虽然是骗了我，我还是很高兴能回家见到双亲。

下午我去村外转了一下，水田都龟裂了，禾苗多已枯萎，看来家乡的父老乡亲们明年上半年又要挨饿了。

在家呆了三四天后我就呆不住了，我惦记着武汉的事。于是我决定尽快返校。

8月2日早上七点半我动身回汉。由于当时谣传很多，父母怕我在外面出事，一定要小哥送我到三哥所在的鲤鱼江电厂。

宁远到嘉禾县城的车还是没有，我们兄弟二人决定步行到蓝山县城。一路上听到很多谣传，但我最关心的还是从蓝山到郴州的班车是否开，郴州北上的火车是否正常。快到广发圩时，我们碰到一个社员，问及班车情况时，回答是“客车有好几天没有开了，外面打人的事太多了”。小哥一听就要我和他一起折返回家，但我回汉心切，不同意返回。心想，要是真没有车到郴州，就是走，我也要走到郴州，反正也就是一百多公里的路。到了蓝山县城，我们开了旅馆住下后，就立刻去车站打听蓝山去郴州的班车的消息。

第二天凌晨四点半我就起床赶往汽车站。此时售票窗口还没有开，我只好等，直到五点半售票窗口开了，我第一个买到了票。不过，不是客车票，而是货车票。

八点半，货车出了蓝山县城，十二点半我们到达郴州。

来到火车站，站内不像往日那么热闹，看上去人们似乎有些慌乱，一打听，知道火车已停开了。

候车室屋顶已被拆了，说是前两天因武斗被毁的。就在这时，人群突然乱了起来，我一看，见几个人被一群拿着枪的人押着过来了，整个车站顿时充满了紧张的气氛。

是否有火车到鲤鱼江不得而知。我们只好重新回到汽车站，准备乘汽车去鲤鱼江三哥那里。

8月4日清晨我们听说火车恢复开行，于是我们退了汽车票买了去鲤鱼江的火车票。六点五十五分火车驶出郴州，八点半就到达了鲤鱼江电厂。三哥恰好轮休，三嫂湘蓉也在家。我们兄弟三人三年后又团聚了，真有说不完的话。

由于我急于回汉，而小哥也要急着回家（小嫂要生孩子了），我们在三哥家住了两天后就决定离开鲤鱼江。

8月5日下午两点，三哥送我们到达郴州。我和三哥陪小哥先去汽车站买了回家的车票，又去旅社定了床位，然后我们就一同去了火车站。

郴州火车站仍未恢复正常。“铁联筹”的人都跑了，车站一片冷落。车站没人售票，广播也没有开。造反派“红铁军”的几个人拿着枪守护着车站并维持秩序。

下午四点，小哥回旅馆，三哥回电厂。我一个人在车站等候列车消息。

晚十二点半左右，突然从广播里传出由广州开往北京的161次列车到达郴州的消息。人实在太多了，我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挤上了车。

车厢里非常拥挤，就像插筷子一样，要转个身似乎都不可能。人多加之天气又热，上车不一会就全身湿透了。车厢内空气混浊，各种气味都有，实在令人难受。不过，上了车的人都管不了这些，都觉得能上车就已经是很幸运的了。

铁路运输为何如此混乱？主要是因为铁路系统内两派意见分歧和武斗造成的。广州、郴州、衡阳、株洲、岳阳几个大站近来经常发生武斗，驾乘人员的安全得不到保证，导致铁路运输一片混乱，有时列车几天都开不了，有时列车在行驶途中莫名其妙地停了下来，而且一停就是几个

小时。

8月6日八点半左右列车到达长沙。此时发生了我意想不到的情况：车站工作人员要求所有的人统统下车，然后再凭车票重新上车。由于我们在郴州站时无人售票，我们是无票上的车，结果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火车开走。没有办法，我只好离开了火车站。

出站后我很快找到了新华工驻长沙联络站。联络站的小李把我带到湖南省公安厅招待所，他说先住下来，车票的问题他会帮我解决。联络站还真有办法，晚十点半，他们就把第二天的车票给送来了。

8月7日上午七点，我和新华工的另一个同学一起登上了北上的282次列车（慢车），下午七点左右到达武昌南站。

这次回家探亲一路上最大的感受是社会秩序比较乱，交通严重不正常。觉得文革应尽快结束，不能再乱下去了，“安定”已成为亿万人民的普遍要求。

二、新华工革命委员会

在回汉的列车上，我从湖北日报上得知我们新华工已于8月4日成立了院革命委员会的消息。

当我回到学校时，学校到处都还留有盛大庆典的痕迹。我急切地找来了院革委会成立当天的《新华工》报。当我看到那套红的《新华工》报时自是心潮起伏，很是激动了一番。

我院是湖北省乃至整个华中地区第一个成立革委会的省厅级单位。新华工革委会的成立大会在我院确实是盛况空前。

当天，除湖北、武汉本地的造反派组织外，全国各地920个知名单位和组织都派了代表到会祝贺。其中有北京的新人大三红、清华井冈山、北师大井冈山、新北大公社、北航红旗、地院东方红、北工东方红，上海工总司、上海红三司、上海大专院校红代会（筹）等的代表。远至边疆的云南八二三、新疆红二司、哈军工红色造反派等也派代表参加了我院革委会的成立大会。

新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政委刘丰到会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

本期《新华工》报出了八大版，除全文刊登《给毛主席的致敬电》、《新

华工革命委员会宣言》、《新华工革命委员会通告》、张立国代表院革委会的发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及曾、刘首长等讲话外，还用了整整三大版的篇幅刊登了长篇通讯《新华工在前进》，全面回顾了我院一年多来的文革历程。

我们新华工革委会是经武汉军区审查呈报中央批准后成立的。院革委会由45名委员组成，其中学生代表29名，教师代表7名，原院党政干部代表5名，工人代表4名。主任委员张立国，副主任委员五名：郭保安、聂年生、王富山、熊小村（原院党委副书记）、张汉卿（政治教研室教师）。

成立院革委会时我虽然不在学校，但还是被推选为院革委会委员，仍在宣传部工作。

院革委会的成立标志着我院夺权的结束，教育改革的开始。同时也标志着我院闹腾了整整一年的红卫兵运动（从1966年8月到1967年8月）已近尾声。除张立国、郭保安、聂年生等后来进入了省、市革委会，担任了领导工作，还在忙于政治外，大部分同学的“政治热情”已逐渐冷却了下来，“看穿了”的思潮也随之蔓延，一些曾经热衷于政治斗争的同学也成了政治上的“逍遥派”。广大师生们的兴趣已从热衷于“政治”转移到专业的教学和实践上来了。

在院革委会的领导下，师生们开始“复课闹革命”，搞“教改”。当时，全院成立了各种各样的“教改小组”“教改探索队”并积极地开展了活动。我们年级工企专业三个班同学，有的在老师的带领下去了大冶钢厂、荆州搞教学和实习，也有人参加了院无线电元件厂的筹建。

我没有参加班上的“教改小组”，只参加补本专业的专业课。

三、组建“毛主席诗词组歌演出团”

院革委会成立以后，少数头头对成立“新武汉”和“支援全国造反派夺权”很感兴趣。他们不但没有撤回原派往全国各地的联络站，而且要求各大队继续派人以增强联络站的宣传工作。在我探亲回校前，我负责的“轻骑兵”文艺宣传队也被派往上海。

对院革委会少数头头搞“新武汉”和“支援全国造反派夺权”，我

很不以为然，甚至认为这不仅不利于大联合，而且会直接干扰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帮倒忙。



江重初（前）与作者

8月20日上午，我去了一趟设在湖大的“星火燎原”宣传队队部。在和宣传队的队员谈到武汉目前的派战时，宣传队的同学们不管是新派的还是钢派的，无不感到忧虑。一个同学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现在睡上一个月的觉，要比我们干上一个月的事的贡献还要大一些。”我认为这句话很有道理，也符合我的想法。是呀，参与派战不但无功，反而是对人民的犯罪啊。

这天，在上海的“轻骑兵”突然打电话给我，说他们准备支持上柴联司。我当即对他们说：“上海不能乱，反工总司是错误的”，并要求他们立即

返回学校。

在当天的日记上我写了以下文字：

我们在考虑任何问题时都要从大局出发，小道理必须服从大道理。有些事从局部来看是正确的，说起来也很有道理，但如果从全局考虑，从整体和长远利益来考虑，它就不一定正确，甚至是错误的。

就当前上海的问题来说，有人主张支持“上柴联司”。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如从“上柴联司”本身来说，无疑是应该同情和支持的。因为：1. 该

组织无论如何不能说它是保守组织；2.“上柴联司”在上海，它代表着相当部分的造反派，而且它对武汉的态度无疑比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积极；3.上海革委会、“工总司”目前对“上柴联司”采取压的态度是不对的。

但是，我们如果从大局考虑，从整体来看，我们却不应该支持“上柴联司”，而应该支持上海革委会和“工总司”。理由很简单：一、成立革委会，向走资派夺权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因此我们应该支持上海市革委会并维护它的权威；二、“上柴联司”只有几千人，而上海工总司却有几百万人，在上海它占绝对优势。如果我们支持“上柴联司”，必然造成上海的“内战”，上海的稳定局面将遭到破坏，造成的损失将是无法估计的。千方百计使上海稳定下来是“大道理”，而“上柴联司”不管有多大的委屈和不公，只能是“小道理”，是局部。“小道理”必须服从“大道理”，局部必须服从大局。理论必须和实际相结合，我们应该好好地研究社会，注重社会科学的学习。

我们宣传部有三个院革委会委员，刘玉民是常委，宣传部长，我和江重初是副部长。具体分工是：刘玉民负责全面工作，江重初主管《新华工》报，我仍主管院广播台和文艺宣传队。

当时江重初和我都不支持院革委会少数头头搞“新武汉”打内战。根据当时同学们普遍比较消极的实际，为了丰富同学们的文化生活，我们宣传部搞了两项大的活动：一是由江重初负责组织一台话剧《红旗飘万代》的创作和演出，二是由我负责组织“毛主席诗词组歌演出团”的



新华工“毛主席诗词组歌演出团”演出实况

排练和演出。

毛主席诗词组歌演出团的演职人员有三百六十多人，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型演出团。演出团的主要成员是当时我院几个文艺宣传队的队员，原院文体大队的管弦乐队、民乐队的队员。为了突出演出团的群众性，我要求各系（大队）将有一定文艺天赋的同学都推荐到演出团来。从参与演出团的人数、舞美设计、灯光布景、演出效果和演出场次（在武汉演出近百场）来看，这个活动也许是我院空前绝后的文化活动。至今都让我难忘的是演出时那恢弘的气势给观众带来的震撼，这种震撼绝不是在看电影、看电视时所能感受得到的。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我院电影放映员李纯师傅。他把电影影片中一些能渲染、映衬演出内容的镜头，通过剪辑后再用电影放映机投射到舞台背景屏幕上，极大地增强了演出效果。特别是演出即将结束时，屏幕上出现毛主席向观众挥手致意的镜头总会把演出推向最高潮，使观众激动得热泪盈眶，久久不能平静。

我想，当时几乎所有舞台演出都采用布景加幻灯烘托演出气氛，用电影影像配合幻灯应该算是一个很好的创新吧。正是由于李师傅对我们演出团的大力支持和所作贡献，我俩从此成了几十年来最好的朋友。在校时我是他们家的常客，离校后，我每次到武汉必先去拜访他们夫妇。他的三个子女，特别是那活泼可爱，当时还没有上小学的大女儿玉梅，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组织的这次演出活动据说还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这个人就是我的同班同学陈文玉，这是我怎么也想不到的。

2012年5月，我们班的同学在母校华中科技大学组织了一次聚会。42年后重相聚，同学们自是激动不已。其间，陈文玉同学和我一见面就连连向我表示感谢。这让我感到很意外，甚至茫然。通过他的解释，我才明白原来是怎么回事。

陈文玉是武汉市人。上高中时，学校提倡与苏联的年轻人写信交朋友。他和莫斯科的一个叫索菲亚的女生交上了朋友，通过几年的通信，他们已发展到了男女朋友的关系。文革中他因此被认为有“里通外国”的嫌疑，加之他出身不好，在班上一直处于挨整的状态。他的情绪总是

非常低落，对前途感到悲观。就在我组织毛主席诗词组歌演出团，正“招兵买马”时，一天我回到了班上，发现他正在向同班同学陈运福学拉二胡，而且有了一定的水准。于是我就问他是否愿意参加我们的演出团，他答应了。于是，他成了我们演出团民乐队的队员。通过在演出团的演出和自己的努力，他的京胡演奏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毕业分配时他被分配到河南的部队农场。因他对文艺演出的组织工作比较熟悉，加上他的二胡（京胡）演奏水平不错，于是他就被安排到所在团的文艺宣传队。由于他认真负责的态度，很快受到团领导的重视和好评，他的人生也从此完全改变了。

他在部队很快入了党。“二次分配”时，他被分配到河南漯河某大型机械厂。因部队对他的评价很高，该厂党委对他自然是非常重视。几年后，他进入了厂领导班子，成了该厂的核心人物。

改革开放后，他被调到市经委工作。因他俄语水平强，又被调到漯河市驻俄经贸办事处，从此走上了经商的道路。

他走遍了俄罗斯和原苏联的各加盟共和国，与俄罗斯的政治界、军界及一些民间团体都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俄罗斯通。即使现退休了，他仍还是一个大忙人。在我们班，他是令人羡慕的成功人士。

陈文玉的成功当然是由于他自己的努力和机遇。他说感谢我，我受之有愧。但陈文玉的经历也说明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一个人的命运往往会因年轻时的某一际遇而完全被改变。

言归正传。1968年春节后的一天，有人向我反映说毛主席诗词组歌中一些曲作者可能有政治问题。为避风险，建议我停止演出活动。为慎重起见，我立即赶往北京了解情况。当时我去了中央文革接待处、中央乐团、海政文工团等单位了解和落实有关情况，但回答都很模糊。回校后，我征求了院革委会几个同学的意见后，还是在1968年春节后不久就结束了演出团的演出活动。

在主持毛主席诗词组歌演出团期间，我还参与了两本书的编辑和出版工作，一本是支持造反派的武汉军区胜利文工团创作员白桦的《迎着铁矛散发的传单》，一本是我院舒先绪同学主编的新华工抗暴文艺作品专辑《火炬颂》。

《火炬颂》收录了包括序诗在内的四十首诗和一个独幕话剧《虎口逢亲人》。在编辑过程中，编辑人员要我也写上一首。于是，我就把4月份写的一首《艰险何所惧》拿来凑了数。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艰险何所惧

大江留不住，滚滚向东去。
回首浪滔天，天高何所惧。
热血奔腾急，飞马不停蹄。
此行欲何往？险峰白云处。

四、在西七舍发生的故事

西七舍位于华工校园的西部，是一栋六层砖混结构的单身宿舍楼。楼前有一块空地，空地旁有一约五六亩大的水塘，水塘四周满栽杨柳。紧靠水塘的就是华工园内唯一的公园——“青年园”。公园内树木葱郁，小径幽深，是早读外语和夏季纳凉的好去处。

西七舍原是外国留学生和院文体大队宿舍，各种生活设施比较完善。文革开始后留学生都回国了，院文体大队也解散了，队员们都各自回了所在班级。因此，这时的西七舍基本上都是空着的。

从新华工广播台汉口分台回到学校后，我没有回班上去住，而是搬进了西七舍227号房间，一直住到1968年工宣队进院，总共一年零四个月。当时学校为我装了一部电话，还配给我一部自行车，这在当时算是很特殊的了。

毛主席诗词组歌演出团的工作结束后，我决定静下来好好读点书，好好地反思一下文化大革命。我每天早上6点起床，洗漱后去大操场锻炼，吃了早点，8点准时上班，开始读书或看来自全国各地的文革资料。

院革委会成立后办公地由东三楼搬到了原院党政机关办公的南一楼，我们宣传部就在原党委宣传部办公室办公。

原党委宣传部存有大量的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著作。在西七舍住的这段时间内，我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选集》1—4卷，重读了《毛泽东选集》1—4卷，还有一本收录毛主席未公开发表的文章的书，读了《联共（布）党史》《新民主主义革命简史》等，可以说，

我学到的马列主义主要是在这段时间较系统地学的。另外，我还读了《恩格斯传》《第三帝国的兴亡》《赫鲁晓夫主义》《少年诸葛亮》等。在这段时间我也阅读了大量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文革资料。当时我记了几大本读书笔记，可惜这些笔记后来都丢失了。

住在西七舍的这一年零四个月里，发生了很多让我刻骨铭心的故事，这些故事有的快乐浪漫，可谓意味绵长；有的惊心动魄，让我至今心有余悸；有的则是因少年狂妄，吃尽了苦头。

1. 我和两个女生的浪漫故事

两个女生中先进入我生活的是晓文。

晓文是一个健康、俊秀、活泼可爱的姑娘。1965年我认识她时她才15岁，在我们华工附中读初二。她的父亲也是我们湖南人，五十多岁，是我院附属工厂的工人工程师，也是我金工实习时的指导老师。老人很随和，指导我们这些来厂实习的学生非常认真负责，我们很快成了忘年之交，每到星期六，他常邀我去他家玩。

晓文的母亲是一个大家闺秀。原在一家街道工厂当厂长，后辞职当了全职太太。我第一次去她家时，她一看到我就说很喜欢我。

后来去的次数多了，她对我更好，几乎把我当儿子一样看了。我每次去她们家，一进门，她就会端出一大盘时令水果让我品尝，而且每次都要留我在家吃饭。

我出生在交通不便的农村，家里又穷，好些水果我只在书本上看到过，从未品尝过。现在看来很平常的苹果、香蕉、菠萝、葡萄之类的水果，我都是在她家第一次品尝到的。

晓文是个独生女。我第一次去她家时她妈妈就要她叫我哥哥。开始她还有点不情愿，但后来我去她家时她就哥哥、哥哥的叫得可亲热了，我也很喜欢这个有点调皮的漂亮小妹妹。

文革开始后的一年多我都没有去晓文家。这倒不是因为她妈出身不好，怕影响什么，而是因为忙着“干革命”顾不上去她家了。

革委会成立后的一天，晓文突然来我的办公室找我，说是她妈妈叫她来找我，要我去她们家玩。见到她我自然也很高兴，两年多没见，她已变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我问了她爹妈的身体状况，问了她们

附中的情况，她都一一作了回答。我们谈得很高兴，下班后我就随她去了她家，她爹妈见到我自然也是非常高兴。

此后，晓文经常来办公室找我，有时还会找到西七舍来。

9月的一天，我们的轻骑兵文艺宣传队要去152部队演出。晓文来找我，说她也想去。这天恰好我要去长办联司开会，离演出地点不远，于是我就答应了。

我们乘部队来接宣传队的车到了部队。下车时我和晓文约定好，我一开完会就来找她，和宣传队一起回学校。

这次会议因与会者对一些问题有较大分歧，争论了很长时间，宣布散会时已是晚十一点多钟了。当我赶到演出地时，只见晓文一个人站在部队营房门口等我，显得非常焦急。我一问才知道送宣传队回校的车早已开走了。我问她为什么不上车回校时，她却非常委屈地用手捶着我的肩膀说：“不是你说我们一起回去吗？”唉，真是一个傻得可爱的小妹妹呀。

此时已是晚十二点了，公交车和轮渡都停开了。处在当时的情况，今天的年轻人很自然地就会想到去住旅馆。可是，我们当时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再说，那时的旅社晚十二点就关门不接客人了。

怎么办呢？晓文说：“我们走回去吧。”

看到这个从小被父母娇生惯养，从未步行过十里路以上的小姑娘说要走回学校，我当时都愣了。我说：“从这里走回去可有四十多里路呢，你能行吗？”

她扬着头对着我神秘地一笑，说“走着瞧吧”。说着，就拉着我的手向回学校的路走去。

开始还不错。她时而拉着我又蹦又跳地一路小跑，一会而又独自跑到前面回头向我傻笑，一副得意的样子。

但过了江汉桥后她就不行了，走不动了。她向我撒娇，赖着要我背她走。

我说：“这不行的，你是大姑娘了，别人看到会笑话你的。”

晓文说：“我不怕，我就是要你背我嘛。”

我说：“你不怕，我倒是怕别人看到呢。这样吧，我给你讲我小时

候那些好玩的故事，我们慢慢走好吗？”

她噘着小嘴说：“好嘛，不准骗我。”

于是，我就给她绘声绘色地讲起了我小时候和小伙伴一起上山放牛，在山上如何斗牛，和小伙伴们如何打野战，如何将别人打伤后被告状受罚。接着我又讲了上小学时，我的同桌、班主任的儿子如何欺侮我，我又是如何拿着半截钓鱼竿将他打得到处乱跑，最后追到他爸的办公室我还打，我因此被撤掉了少先队中队长的职务，并被开除少先队。

晓文边走边听我讲，听到我说打了班主任的儿子，她有些不相信，不断地问我：“这是真的吗？你真敢打班主任的儿子？”

我说：“这当然是真的了。这就是为什么我比同龄人晚一年考大学的原因，因为我为此休学了一年呢！”

晓文要我继续讲我的故事。于是，我又给她讲了我在“大跃进”时期参加“大炼钢铁”，去几十里外的地方挑柴，走着走着就睡着了。讲参加修水库抬水泥，晚上投宿和死人睡在一起的故事，讲困难时期饿肚子及学校组织种菜搞“瓜菜代”的故事……

晓文听得入了神，不时以敬佩的眼光看着我，我在她面前也似乎有了些自豪感。

她拉着我的手，我几乎是在拖着她走。凌晨四点半左右，我们走过了长江大桥，进入了武昌。这时晓文说她实在走不动了。

于是，我们在桥头附近找了一块有草的地方坐下来休息。

晓文真的是累了，也困极了。刚坐下来不一会，她就靠着我睡着了。睡了一阵，可能是因脖子酸了，身子一歪，头就顺着我的肩膀滑了下来。我随即伸开双腿，一手枕着她的头，一手扶着她的腰，让她平躺在我的腿上。她睁眼看了我一眼，嘴角微微向上动了动，然后侧过身，双手搂着我的腰很快就又睡着了。

这时的我却毫无睡意。我凝望着眼前的长江和对岸武汉关顶楼上的灯光出神。

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江城之夜啊！晴朗的夜空繁星点点，皎洁的下弦月挂在暗蓝的天上，把柔和清澈的光辉洒向大地。白天的喧嚣早已沉静了下来，四周一片寂静，整个江城似乎都进入了梦乡。只有那奔流不

息的长江在轻柔地拍打着两岸，发出一阵阵有节奏的哗哗声，就像一个慈祥的母亲在轻轻地拍着自己玩累了的孩子，轻轻地唱着催眠曲一样。

晓文在我的怀中安静地睡着。我低下头望着她，将散落在脸上的头发给掠到耳根后。

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看着她。十七岁青春的年龄把她蕴藏着的美展现了出来，像含苞欲放的花一般，自有一种可爱的姿态和色泽。晓文真的长大了，胸部开始变得丰满而挺拔了。她身体上那柔和、自然、美妙、舒展的曲线，以及只有青春少女身上才能散发出来的那种特有的温热的体香，真是撩人心神，给人以无限美妙的遐想。

火炉武汉的暑热已开始逐渐退去，江风轻拂，送来阵阵凉爽的风。五点过后，天边出现了鱼肚色的霞光，江面上升起了一层薄薄的水雾，草地也已经结露了。我担心晓文受凉，紧紧地抱着她，这样她就会暖和一些。过了一会，我咬着她的耳朵轻轻地说：“天要亮了，快起来吧。”说完我低下头，在她的额头上轻轻地吻了一下。

她慢慢地睁开了眼睛，直直地看着我笑。突然她猛地坐起来，抱着我的头，给了我一个大大的吻。

我们起身继续往回走。这时大街上开始有了行人，但四周依然很安静。恢复了体力的晓文这时又开始拉着我的手欢笑、奔跳起来，又回到了先前那天真调皮的样子。六点半左右，我们回到了学校。我把她送回了家。

此后，她总是有事没事的经常来找我。她好像一下子成熟了许多，见到我时变得文静了，而且脸还会泛红，语气也变得温柔了。这种变化让我感到吃惊。我知道这种变化的原因和意味着什么，但我还是和以前一样，把她看成是我可爱的小妹妹。

后来她作为知青去了农村，我也去了咸宁接受“再教育”，从此我们就再也没有见面了。

1975年5月我们夫妇旅行结婚路过武汉时去看她，但不巧她们家搬家了，一时找不着。听玉梅说，晓文已和我们系我们年级的一个留校同学结了婚，这个同学也是我们湖南的，是益阳人。

2012年5月，我们班同学在母校聚会时我曾向玉梅问起过晓文的情

况。玉梅告诉我说晓文前几年就离了婚，现在是单身。我本来应该去看望她的，但我没有去。我想还是不要去打扰她平静的生活，就让我们在彼此的心中还保留着四十年前的样子吧，她还是我心目中那个美丽、天真、快乐的小天使。

第二个进入我生活的女生叫LC（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这里暂且隐去她的真名实姓）。

LC是我们系比我低一级的女生，文革前我们并不认识。文革初，正是“资反路线”最盛的时候，大字报栏上有一张关于批判LC的大字报，说她是“资产阶级的大小姐”。当时我并没有怎么注意。

1966年9月，我在我们系成立造反战斗队，ZY是我们战斗队的一名得力女将。有一天，我问她经常和她在一起、形影不离的人是谁，她说是她最要好的朋友，也就是曾有人写大字报点名批判过的LC。直到这时，我才将LC这个名字和具体的人对上了号。

几天后，ZY带LC到我们战斗队的办公室办事，我和LC也就算相互认识了。

LC是广州市人，父亲是广州某远洋航运公司的一位船长，家庭环境比较优裕。

LC身材娇小，有一双大而明亮的眼睛。像很多两广人一样，额头有点高，因而眼睛显得有点儿凹。她的皮肤白而细腻，柔润如瓷。她和同时代的女孩一样留着一对短而粗的辫子，脸上总是挂着甜甜的微笑，是个典型的小鸟依人的角。

LC的美主要在于匀称。面部的器官，躯干和手臂，分开来看也许没有什么，但组合起来就觉得彼此相互呼应，灵动有致，天衣无缝，恰到好处。我第一次注意她时，心想如果她穿上一双漂亮的高跟鞋，或许会显得高挑婀娜一些。但又一想，如果那样的话可能会破坏了整体的平衡与和谐，会变得单薄枯燥，没有了先前的韵味，也就会不那么惹人注视了。

我和LC的相知、相恋是院革委会成立后的事。

院革委会成立后，LC和她们班的同学去沙市搞教改，我们开始通信。开始每周一封，到后来几乎隔一天就写一封了。通信的主要内容是谈当

时大家所关心的文革中的问题，如：如何看待钢新之争，如何看待解放军支左，全国形势及发展趋势等。当然也谈个人志趣、感受等，但在信中我们都没有谈及个人情感上的问题。

1968年4月，沙市钢新之争升级，武斗不时发生，LC她们的教改小组不得不撤回了学校。

LC回校后我们的关系迅速发展，我的初恋就此开始了。不久后，我们成了真正的恋人。

她几乎每天下午五点后都来西七舍，帮我收拾房子，去食堂打饭。饭后我们就去青年园散步，经常到晚十一点我才送她回女生宿舍。星期天我们常去爬山，有时也去东湖游泳场游泳。

我和LC的恋情持续了三个月左右。

7月下旬的一天，ZF来找我。他说他是代表他们班的杨某来求情的。ZF说LC是他们班杨某的对象，早在LC上高中时就由双方的父母定下来了，希望我不要介入。

ZF是我成立造反战斗队时最信任的主要骨干成员之一，比我高一级，是六三级的。他说的有关LC的情况让我震惊。因为此前不仅我对此一无所知，就是她的“闺蜜”ZY也毫不知情。对ZF提出的要求，我要他转告杨某：给我三天时间考虑，三天后我一定给他回复。

这是我内心十分矛盾、纠结、斗争的三天，是被痛苦煎熬的三天，是想大声呼喊又不得不忍痛的三天。

这三天我想了很多。想到了我和LC在公园里曾流连过的每一条长凳，每一棵树，每一个花坛，每一条小路拐弯的地方；想到我们曾相互追逐、嬉戏的沙滩上的每一块礁石，每一串我们留下的脚印；想到她那娇小、玲珑、匀称的身姿及那大而明亮的眼睛是那么惹人怜爱，她是那么温柔、善良，那么善解人意……

我在心里不断地问自己：她为什么要向我隐瞒她和杨某的关系？她曾和我说过她在“个人情感上的插曲”，应该是指她和杨某的关系。既然是插曲，就应该是过去时。为什么杨某却说LC在读高中时就是他的女朋友，现在也还是？如果她和杨某确实是男女朋友的关系，那为什么和她形影不离的闺蜜ZY会一点也不知道，保密工作会做得这么好，以

至几年来都不露痕迹? ……

在我答应 ZF 的第三天晚上，我终于作出决定：“不介入”。并给杨某写了封短信，要 ZF 转给杨某，明确了我“不介入”的承诺。

我之所以最终作出“不介入”的决定，当时主要还是从 LC 的安全考虑。因为如果我作出相反的决定，势必引起杨某的激烈反应，我和 LC 都将成为全系同学，特别是女生们议论的焦点。一旦出现这种局面，我自然不会有什么问题，但 LC 就可能难以承受来自各方面的沉重压力。她曾经和我说过“传统的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这样的话，这说明她是非常顾忌“人言”的。事实上，在当时“男女关系”问题是足以致人身败名裂的。

第二天我将自己的决定告诉了 LC，并说今后一段时间尽量少来往。

她一声不出。不管我怎么解释和劝说，她只是坐在那里不断流眼泪。我的初恋就此结束了。

然而这段初恋却给我留下了久久的痛。在此后的半年时间里，我总有一种内疚感，认为自己伤害了 LC。有时我甚至会想：在处理爱情的问题上不应该退让，应该和 LC 一道共同迎接挑战。然而，我既然已向杨某作出了承诺，作为一个男人是决不能反悔的。

为了给这段恋情一个了断，开始新的生活，1969 年 1 月 5 日，我给 LC 写了一封藏头去尾的长信，题目是《一江春水向东流》，全文如下：

一江春水向东流

每当我那回忆的“脱缰之马”自由飞翔的时候，我的心总是久久地不能平静。

它有时使我兴奋，使我感到自豪，给我力量和鼓舞。因为它这时把我带到了我曾亲身经历过的激情场面，让我回到那使我引为自豪的日日夜夜。

每当此刻，我就会无愧地对自己说：我是一个战斗着的革命青年，我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我没有枉度我的青春年华。我的学生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我经受了考验，受到了锻炼。我没有糊糊涂涂地生活，我是在有意识地锻炼自己（有时甚至是有意识折磨自己）。我很自信，我相信自己能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为人民的幸福做出一定的贡献。每

当此刻，我就会受到鼓舞，更加坚定信心，加快我前进的步伐。

这带着野性的马有时也会让我感到沮丧和懊恼。因为它在自由飞翔的时候，常有意无意地把我带到那让我伤感的地方，而且在那里徘徊不前，久久不愿离去。因此，我常警惕着，不让它随意奔跑，不让它停留在这样的地方。可是呀，这野性的马总是难以驾驭，你愈不让它随意乱跑，它愈是要把你带到那恼人的地方去。

这些日子，这野性之马更是有意地把我带到那炎热的6月，带到那曾经漫步过的草地、湖畔，带到那些我们曾经相依相拥的地方。

每当此时，我就会因这一切不再回来而感到无比的烦恼和惆怅。

为了摆脱这个烦恼的纠缠，也为了惩治这野性十足的回忆之马，我决定利用这个星期天写一封我平生第一长的信，把我的一些想法告诉你，同时也将这段情感作一个了断。

你的名字我是66年7月从大字报上看到的，当时我们并不认识。直到10月，你的好朋友ZY才把大字报上的名字和你给我对上号。而你在我的脑子里形成印象大概已是年底的事了。去年初的一个晚上，你来我宿舍，和我谈到了你的家庭情况及在“个人问题”上的插曲，对你的坦诚及对我的信任我非常感动。

我们的认识是偶然的，但也是必然的。那时我们的接触是无意识的，但这无意识的接触却给我们以后有意的接近、为我们爱情的种子准备了土壤和养分。

大概是去年3月份吧，我的朋友向我提出了“另一半”的问题，这引起了我的关注。

“另一半”应该是怎样的呢？应该是政治上的参谋，生活上的助手。应该是战斗中的伴侣，志同道合的同志。她能在我面临危险或头脑发热的时候给我警告，在我受到挫折和失败的时候给我以鼓励和慰藉，情感上给我温暖和体贴。

抱着这种标准，我开始注意我周围的人们。然而，在这道遥颓废成风的情况下，我到哪里去找“另一半”呢？

当我看了你给我的几封信后，我似乎在你的身上隐约发现了我的“另一半”的影子。我似乎觉得我们共同撒下的种子正在生根发芽，并已经

长成了一棵“小苗”。

“小苗”在邮递员的浇灌下成长着。

“小苗”在清凉的晚风中，在雨露的滋养下成长着。

“小苗”在我们共同的理想、共同的愿望的滋润下成长着……

这时我虽然还没有看到我“另一半”明朗的身影，但我已肯定了它的存在，甚至感觉到了它那温暖、甜蜜的气息。

一个人的际遇和前途往往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一件美好的事物的成长，往往也会因受到社会环境、传统文化和人们的习惯势力的影响和约束，以致最终使其归于毁灭。

正当我的“另一半”日渐明朗的时候，你曾说过的“最可怕的势力”出现了，你为此承担了你难以承担的压力和危险。

……

考虑到你的处境，同时也考虑到杨某的心情，在一个难眠的、痛苦的晚上，我最终还是给杨某写了一封信，给了他一个明确的承诺。

7月10日，我满怀革命的激情和求知的欲望离开武汉到了长沙。我希望从此开始我的新的生活。

7、8、9月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有意义也是很充实的几个月。但即使在这样思想极度活跃的情况下，对你的思念仍时常困扰着我。每到一个新的地方，或正在进行某种有意义的活动时，在我享受着某种一般懒汉不可能享受到的乐趣的时候，我就会想到你，“如果她这时和我在一起共享这个幸福该多好啊，她是最能理解我的人，我能理解和享受到的她一定能理解和享受到”。

在返汉的列车上，当周围的人们都熟睡了的时候，我却久久不能入眠，脑子里总是你我在一起时的景象。我拿出笔记本，准备写下点什么，但最终只写下了一句：“一夜蝉声，哪来蝉声？”就再也写不出来了。

第二天早上同伴问我在这列车上哪来的蝉声时，我含糊地说：“昨夜我明明是听到蝉一直在我耳边叫呀”。

在上海时我知道了你和杨某间发生的一些情况。回校后好些日子也没有见到你。一天我去食堂帮厨，看到你和你们班的几个女同学来打饭。

开始，我的眼睛一直在回避你，可当你走到我面前时我就再也不能回避了。你问我近来的情况可好，问我在上海的情况。我本想和你多说几句，但又想到我和你的谈话可能引起你的同伴们的怀疑，并因此加重你的思想负担，所以也就只敷衍了几句。

后来在操场上碰到过你几次，看到你总是愁眉不展，总是郁郁寡欢的样子，我的心都要碎了，我有一种强烈的内疚感，觉得对不起你。有时看到你的同伴们在一起玩却见不到你的影子时，我就会想：她为什么不出来呢？她一定是被那所谓“最可怕的势力”给压垮了。

我真的很怀念你，怀念你对我的关怀和柔情，怀念我们在一起时的美好时光。

在《恩格斯传》中，作者引用了恩格斯在他失恋时写的这样一段话：“这颗心啊，一个月前还是无限幸福的，可是今天却被粉碎了，空虚了。确实的，还有什么痛苦比痛苦中最痛苦的爱情的痛苦更高尚，更崇高，更带个人色彩呢？……”在我读这段文字时开始还不以为然，而今天，我却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恩格斯所说的这个“痛苦中最痛苦的爱情的痛苦”是什么滋味了。

再过一个星期我们就要去“政治野营”了。“政治野营”后将开始分配。三个月后，我们将结束学生生活，走向社会，走向新的生活了（当时已有我们要分配的消息——作者注）。今后的生活会是怎么样的我不知道，但我总觉得我们应以更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我自信能接受并通过生活和工作中的各种考验。有人说我“狂妄”，我自己并不这样认为。即使有点狂妄，我认为这也不是什么罪过。有人说我还是那么幼稚，这一点我承认。但我也喜欢那些年纪轻轻就“很老练”的人。我认为要“一分为二”地看待年轻人的“幼稚”，对年轻人的幼稚首先应该是肯定。因为年轻人的这种幼稚往往是勇于探索的表现，而勇于探索是很可宝贵的精神。有些人的所谓“老练”实际上是假的，是无能、消极、不求上进的表现。世界上的事是复杂的，成功往往是通过斗争、失败，再斗争，在斗争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后才取得的。年纪轻轻就会很老练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不符合辩证法，不符合正确的认识论。

我是很自信的。我愿意将自己的一切贡献给人民，贡献给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

我常把自己比作一根火柴。我最担心的是落在一个抽烟人的手中，为了他抽的一支烟而结束了我的一生；我愿为在黑暗中的人们点燃一盏油灯，这时我虽然会被点灯的人所遗弃，但油灯却可以继续给人们以长久的光明；我更愿意为那些拓荒者点燃那荆棘丛生的荒地，让那漫天大火把枯木朽枝、豺狼虎豹烧成灰烬。

对于我去年5、6、7月所持的一些观点，如对军队的态度问题、对“钢新”两派的内战问题、对如何处理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对今后形势的发展趋势问题等，我现在仍认为我当时的观点是正确的。这些观点有的现在已被证明了，其他的也将很快被证明是正确的。当时你可能为我担了一些心（甚至害怕过），其实这是多余的，完全没有这个必要。我当时心里踏实得很。

我认为：在政治上我们应以政治的眼光去看待政治问题，应以严肃的态度去处理严肃的问题。在复杂的社会问题中，我们应首先看大局，看主流。不能从局部的变化，局部的利益或临时的事变去作结论。否则，我们制定的方针、政策将是错误的，就会碰得头破血流！难道事实不是这样的吗？

通过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我们确实学到了不少东西，懂得了不少道理，确实使我们变得聪明一些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的人不学习，不研究社会，却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不可一世，这些人到头来将会身败名裂是毫无疑义的。我总想：一个人要把时钟的指针任意拨动几圈是容易办到的，但他要想把行进中的地球挪动一丝一毫却是万万不可能的。

毛主席说：“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

毛主席的这段话说得多么好啊，元旦社论再次发表它确实有着重大的意义。

我没有见到过大海，但我却似乎看到了那震天动地的万顷波涛，它

使我热血沸腾，难以自己。我们应该以极大的热情去实践，去学习，去战斗。切不可自暴自弃，作生活的奴隶。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们走自己的路。

1969年1月5日

附：

1. 由于办公室同伴和电话的干扰，这封信断断续续地写了一天，很是有点零零碎碎。把它命题为《一江春水向东流》似乎不妥，春水是多愁的，但它是向前的，永远向前的，你自己去理解好了。

2. 15号我们就要走了，这封信你看后希望能在14号以前退还给我。

3. 这段时间院系两级革委会成员都在办学习班，我被抽出来处理院革委会的日常行政事务。比较忙，但很愉快，勿念！

4. 暑假期间我西七舍的宿舍被人撬了，抽屉被翻得乱七八糟。还好并没有丢失什么东西，只是你给我的信件不见了，甚是可惜。估计是那个对你不大放心的人做的。这件事就算了，没有必要去追究什么了。

5. 去年12月31日我写了一首诗，现抄给你，请修正。

访故友

朔风催门紧，万里飞雪急。

束衣访故友，惊醒窗前梅。

1968年12月31日于华工园

写完这封信后我似乎觉得身心都轻松了，初恋的快乐和伤痛都结束了。此后，我和LC再没有任何联系。2012年5月在汉同学聚会时，陈文玉曾提到过ZY，说ZY在河南某地当县委书记。我本想通过ZY和LC取得联系，但这个念头很快就打消了。我和LC的恋情虽然时间短暂，但我们确实是真真实实地爱过，我觉得还是让那段情感留在心中的最深处为好。

2. 我第五次和死神擦肩而过

我这个人喜欢山，也喜欢水。每当心情不好或郁闷时，我就会想到去爬山或去游泳。因为一上到山上或下到水里，愉悦的心情就会将一切郁闷的情绪扫荡得全无踪影。也许正是由于我太爱爬山和游泳，与山和水太亲近了，以至我曾在山上、在水中五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却安然无事。

1968年7月的一个星期天，因和LC的事心情特别不好，于是我就约江重初去游泳。江答应了，又约了《新华工》报的编辑陈定方。

上午九点左右，我们一行三人骑自行车到达华中工学院游泳场。

华工游泳场位于喻家湖西南岸，是一个天然游泳场。

正当我们来到游泳场准备去更衣室换衣服时，陈定方说：“这里人太多了，我们还是向前走一段，到前面找一处比较安静的地方去游，我们再来一次横渡喻家湖吧。”大家一致同意。于是，我们骑车继续向前走了约一刻钟，来到一处湖面宽阔又比较安静的地方停了下来，一致觉得这是一个理想的横渡地。

脱了衣服，做了准备活动以后我们就下了水。

和往常一样，我们三人相隔两米左右并排朝对岸游去。

一个小时后，我们离对岸不到一百米了。可就在这时，老天爷似乎要对我们进行惩戒或要故意捉弄我们，刚才还是好好的天，忽然间就变了脸。一时间乌云蔽日，狂风大作，恶浪掀天。那暴怒的浪头一个接一个地从远处翻滚着、咆哮着径直向我们扑来。

一切发生得是这样的突然和意外，使得我们感到自己就像是一片可怜的小纸片，被狂风恶浪任意吹打和蹂躏。

我们迅速地聚在一起，说了一些相互鼓励和提醒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的麻烦来了，我们的危险来了。我们当前最重要的是镇静、镇静！任何慌乱都可能置我们于危险之中。同时，我们也十分清楚，在目前的情况下，每一个人只能靠自己，靠自己的毅力，靠自己的坚持。任何想依靠别人的想法不但会害了自己，还会连累同伴。

此时，我们是在远离学校游泳场的地方。这里没有救生艇，没有救生员。在我们身边也没有任何自救的器械，一小块木板，一小根树枝都没有。偌大的湖面上看不到任何船舶经过，除了一排排的巨浪，还是绵绵不绝的巨浪。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和风浪顽强地拼搏着。不一会，我们“一字形”的队形被冲散了，相隔也越来越远。我拼命地呼喊着同伴们的名字，但没有用。真正的独立作战，人自为战，真正的考验来临了。

我努力调整好自己的呼吸，尽量使自己的一呼一吸和波浪的频率相

适应,尽量避免呛水。我深知在这种情况下,每一次吞吐呼吸都至关重要。因为它都关系到自己生命下一分钟、下一秒的延续。

我不断地变换着自己的泳姿,一会儿蛙泳,累了就仰泳。

仰泳绝对是一个休息和恢复体力的好办法。如果不求速度只要休息,仰泳可以毫不费力地平躺在水面上。

在茫茫的宽阔的湖面上仰泳最大的问题是看不清方向,因为没有任何参照物。因此,仰泳时间不宜过长,你必须不时改为蛙泳或其他姿势。否则,你就很可能离目标愈行愈远。

正当我仰泳休息的时候,冷不防一个大浪扑来将我推到波峰,接着又将我送入谷底,湖水直灌进我的嘴里,鼻孔里。呼吸道因受到强烈的刺激,我立即痉挛性地猛咳起来。身体这一本能的反应让我乱了手脚。经此一折腾,本来已极度疲劳的我,这时觉得好像再也支撑不下去了。脑子里一片空白,四肢似乎也麻木了。

我平躺在水面上,过了好一阵我才逐渐恢复了过来。我不断地默念着“坚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最后的胜利往往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我恢复为蛙泳,奋力地向对岸游去。八十米、五十米、二十米、十米,我终于到岸了。

这时,我真的是筋疲力尽了,连站起来的力气也没有了,我干脆就趴在沙滩上,下半身还泡在水里就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突然觉得有人在叫我。是江重初。他已先我上了岸。他说陈定方也平安上岸了。

这次我们都与死神擦肩而过。

此前,我在水中还有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

第一次是在上小学时。一个夏天的中午,我和三个小伙伴明瑞、良生、尚喜在上学的路上去池塘“洗澡”(当时在我们那里还不知道“游泳”这个词,更不知道还有“蛙泳”、“自由泳”什么的,后来我才知道我们那时的“洗澡”只能算是“狗爬式”了)。几个人正玩得高兴,我突然发现一个小伙伴两手不断地乱扑打起来,眼看就要沉下去了。我立即叫他旁边的两个伙伴去拉,谁知非但没有把人拉过来,两人反而被拉了过去。我见情况不妙,赶紧游了过去,拉住了其中的一个拼命往岸边游。

可就在这个时候，另外两个人在情急中却把我的脚给抱住了，我也进入了深水区，四个人都拼命似的拉扯着，挣扎着，乱成了一团。

不知道当时我是哪来的力气，虽然我也被水呛了，但我最终还是挣脱了他们的拉扯。我立即上了岸，飞快地跑到田埂上拔了根豆角杆（豇豆，我们那地方叫豆角。豆角杆是用来供豆角藤攀爬的）回来。我坐在岸上，将豆角杆的一头递过去，将他们三个一个个都拉了上来。

这次与死神的相遇经历前后虽只有那么几分钟，但受到的惊吓及因此产生的“后怕”，却久久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当时我们村子里流传着一些“水鬼”的故事。说一个人被水淹死后，就会变成“水鬼”，他只有找到一个“替身”才能投生。因此，我们上岸以后都认为我们这次是真的碰上“水鬼”了。经过这次遭遇，我们对“水鬼”的存在深信不疑，同时也就加深了我们对“水鬼”的恐怖印象。为了报复“水鬼”，此后我们每经过这口池塘时都要向里面扔石头，砸“水鬼”，并大声骂上一通以壮胆。

如果说这次在水中和死神的遭遇是因为小孩的无知和贪玩，而第二次在水中与死神遭遇却是因为我年轻好胜的心理使然。

那是1963年夏天的事。连日来的暴雨使我们学校旁的泠江水位暴涨，江面比正常情况下增宽了一倍。这一天晚饭后，我和几个同学在泠江边散步，望着那由东向西滚滚而来的波涛，我突发奇想，要独自横渡到对岸再游回来。同学们都劝我不要冒这个险。但我不听，仍信心十足地脱了衣服，下了水，奋力向对岸游去。

一切都很顺利。我很快地就游到了离岸只有十来米的地方，似乎并没有费多大的力气。我信心十足，胜利在望。

可就在我离岸只有一两米的地方，问题来了。往常，离岸这么近就可以停下来走上岸了。可当我要站起来的时候，却站不住，脚下的沙是流动的。我只好继续向岸边游，但不管我怎么使劲，就是靠不了岸。有时似乎要抓住岸边的草或树枝了，但就是抓不着，江水硬生生地把我拉开了。

原来我要上岸的地方呈弧形，自东向西而来的江水到了这个地方会发生一个折转，就像光线投射到凹镜镜面时会发生反射一样。

我反复多次冲刺都没有成功。既站不起来，也抓不着岸边。这一来我真的慌了。因为在下游不到百米的地方就是一个拦河坝，一旦被冲到拦河坝上，必死无疑。

我立即改为仰泳，让自己休息一会。我很快就冷静了下来。我看准水流方向，抓住时机，奋力游向岸边。在离大坝不到二十米的地方，我终于抓住了岸边的树枝，上了岸，与死神再次擦肩而过。

在山上我也曾两次和死神遭遇。和在水中相比，我在山上和死神遭遇的时间只能算是一瞬间。

第一次在山上和死神遭遇是上世纪农村搞土改的时候。那是冬天的一个上午，民兵们在山上砍树，我去捡劈柴（砍树时留下的碎块）。正当我哼着什么专心捡的时候，突然“轰”的一声巨响，一棵大树不偏不倚地就朝我的头上倒了下来。当时真把我吓傻了，呆了。因为倒下来的树干离我的头顶不足一公分！

真是万幸，我并没有受伤，连皮毛都没有伤到。

原来，在树倒下的地方有一个大土坑，是前几天有人刨树桩时留下的。而树倒下来的时候我正好在这个坑内捡劈柴，因而我躲过了这一劫。

我第二次在山上与死神遭遇是在1957年的春天。

这天，我来到一个叫“枫树脚”的地方“割青”（割下植物春天发出的嫩枝叶。“青”可踩于水田土壤中作绿肥），发现不远处有一座巨大的陡峭石山。由于平时人迹罕至，山上灌木长得十分茂盛，是“割青”的好地方。我毫不犹豫地跑了过去，手脚并用地就往山上攀爬。到了山腰，我很快就割了一大堆“青”，看到差不多了，我就将“青”一把一把用藤条或草捆好，然后站在悬崖上往山下扔。

就在我不断向下扔“青”的时候意外发生了：我前脚站立的石块突然崩塌，随着一把“青”被抛向空中，我收不住脚，身子也随之向下跌落。

就在我向下跌落的危急时刻，奇迹出现了：一棵从石缝中生出来的约有碗口粗的树把我拦腰接住了。

真是万幸！我再次和死神说byebye。

我从7岁到24岁的17年中曾五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此后，我患过肺结核、疟疾、十二指肠球部溃疡、伤寒、乙肝。除十二指肠球部溃疡

时间持续十多年，后来不得不做了胃大部切除手术外，其他都没有费什么周折就治好了。这除了是我的幸运外，只能说是天地怜见了。

生命是宝贵的。因为对于一个人来说生命只有一次，不管是贵为“天子”的皇帝还是卑贱的草民、乞丐概莫能外。

人们常说：人的生命是脆弱的，活着就是最大的幸运。我现在已年过七十，还能健康快乐地活着，还能在这里写“回忆录”，那不能不说这是我最大的幸运、最大的福分了。

3. 我被批为马丁·路德·金

马丁·路德·金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的一个黑人领袖，主张以和平的方式争取民族解放，是一个非暴力主义者。按说我不可能和马氏有任何牵连。可1968年5、6月间在我院东边的三角地带却出现了一些大字报，把我和马氏扯到了一起，批判我的“非暴力主义”，说我是“当今的马丁·路德·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事情得从彭勋等人在我院作报告，主张以暴抗暴的事说起。

1968年5月的一天，由新派主要头头吴焱金、张立国、彭勋、曹承义等组成的报告团在我院电影场作报告，号召新派所有成员单位“立即武装起来保卫红色政权”，抗击钢工总可能发动的对新派的武装进攻。

听了彭勋等人的报告后我感到非常焦虑。我立即找来江重初，说了我的忧虑。他也有和我一样的看法：认为这个报告会的宗旨和内容都是错误的，如照此办理，必将酿成大祸。因此，由我执笔，以“初华”的笔名在当晚写出了一张大字报《我们和彭勋同志等人的不同看法》，并于第二天一大早贴在了东边三角地带的大字报栏上。

我们的大字报从三个方面阐述了我们的“不同看法”。

1) 稳定、团结是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是民心所向，任何有可能导致局势紧张的行为都是错误的。“武汉六月要大乱”和“走四川道路”的提法违反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

2) 我们认为应充分相信和依靠中国人民解放军。所谓“武装起来以弥补钢铁长城的不足”的观点是错误的。在当前的情况下，这种观点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会增大解放军支左的难度。

3) 钢新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绝不能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暴制暴和以牙还牙的办法只能增加群众间的仇恨，使亲者痛，仇者快。

在大字报贴出的当天下午，我还给院武卫队写了一封公开信，坚决反对搞武斗。我到院武卫队，要满兴民等已参加武卫队的原文艺宣传队的队员立即退出武卫队。我对他们说：“如果工总真的拿枪打来了，我宁愿举手投降也决不把枪口对准阶级兄弟”。

几天以后，郭保安在西二楼召开院革委会会议，讨论对钢派的方针和策略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我重申了我在大字报中表明观点，我说：“稳定军队、稳定革委会是毛主席的重大战略部署，对军队的问题我们决不能乱来。”针对张立国在会上列举的有关军区政委刘丰的问题，我说：“像你说的这样的材料，即使有一百条也算不了数，因为它没有一条是实质性的问题。”

我的这些举动自然引起了那些头脑已经发热、发昏，极力主张“弄枪武卫”的头头们的不满，因而也就有了前面所说的批我“是非暴力主义者”“是马丁·路德·金”的大字报了。

我当时为什么会“弄枪武斗”做出如此强烈的反应呢？这主要是此前我和 ZC 有一次对局势的分析和判断，及由此而产生的对局势发展的极大忧虑。

ZC 是我住西七舍时的常客。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时事，交流观点。有时讨论得太晚了，他就干脆和我挤在一张单人床上睡觉。

1968 年 5 月初的一个晚上，ZC 又来我的宿舍。我们的话题是从最近看到的以下三则消息开始的。

1) “18 人上书”的问题。消息说包括大闹怀仁堂的元帅和副总理在内的 18 人给毛主席上书，反对林彪和江青，反对文化大革命（此消息我曾在网上查过，但现仍无人证实，可当时我们确实看到了此消息）。

2) 有消息说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讲：“我和林彪、叶群到上海去，江青就交给你们处理，你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好了。”

3) 蒯大富对今后局势的两点估计，说他准备跟着毛主席第二次上井冈山。

接着，我们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并得出了相应的结论：

1) 中央内部的问题。

当时认为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在组织上还未占优势，中央内部的斗争还很激烈，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当时认为：如果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在组织上已占了优势，那就不可能有什么“18人上书”的问题，不可能有毛主席说要带林彪、叶群去上海，将江青交出去的问题，更不可能有重上井冈山的问题。

2) 打仗的问题。

当时我们看到了一些有关“美帝”“苏修”要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的资料，认为很可能在一年内或长一点的时间内发生中美或中苏之间的战争。而一旦发生战争，那些反对文革的老师傅们必然被重新启用。当时我们最担心的是社会上的无政府主义已经严重地渗透到了军队，这无疑将大大削弱部队的战斗力。

3) 社会经济问题。

当时我们看到了大量的来自全国各地打派战的资料，特别是四川和广西的枪战让我们担心。认为全国的派战已导致了大量企业停产或半停产，严重地破坏了国民经济建设。当时我们最担心的是像武钢这样的钢铁企业受到派战的影响。认为打仗一是打政治，二是打军事，三就是打钢铁（经济）了。我国的钢产量本来就不高，如现有钢厂停产或半停产，都会严重影响战争的胜负。另一方面，我们当时还认为如不尽快控制目前愈演愈烈的武斗，很可能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内战。

我们通过以上分析，认为当时全国的形势已经非常严重，如果不尽快加以控制将是非常危险的。要控制当前的危险局面，稳定社会秩序，首先要控制群众组织之间的派战，严厉制止武斗。

在谈到全国性的武斗问题时，我认为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是犯了历史性的错误。因为当时全国各地几乎都分成了两大派，两派都认为自己是左派。你要文攻武卫，我也要文攻武卫，你抢枪，我也必须抢枪，因而导致武斗迅速升级。这个口号提出前，全国武斗最严重的武汉伤亡人数总共也不到两百人，因为那时使用的武器只不过是拳头、大棒加梭镖而已。自“文攻武卫”口号提出后，弄枪、送枪成风，武斗双

方的武器由拳头、大棒变成了机枪、大炮，伤亡人数一次就有超过两百人的。

在谈到“反多中心”的问题时，我们对林彪也提出了怀疑。认为杨成武说的“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实际上是林彪搞起来的，因为林彪不但首先提出了“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而且说了“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都高，是世界上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的一个天才”。当时我刚看过《赫鲁晓夫主义》这本书，我就把林彪和赫鲁晓夫联系起来。我怀疑林彪就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因为斯大林在世时，赫鲁晓夫也像林彪吹捧毛主席一样大肆吹捧斯大林，甚至说过斯大林是他的再生父亲。

我和 ZC 在这天晚上的讨论是完全放开的，毫无顾忌的。我们对当时的政局提出了很多疑问，对形势的发展提出了各种可能性。这次讨论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三点。当讨论要结束时，ZC 不无担心地说：“我们今晚的讨论如果被别人听到了，我们就成了反革命了。”我说：“干革命就是要不怕被打成反革命，现在把各种可能都估计到，在思想上有所准备是必要的。”

遗憾的是，我们这次讨论最终还是在 1970 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揭发了，我因此在咸宁被办了半年的“院学习班”，并因此直接影响了我的前程。这是后话。

文革中很多人都打过枪，处在我当时地位的人很多配了枪。整个文革中我没有打过一枪一弹，更没有配过枪了。我当时被批为非暴力主义者，是马丁·路德·金，这应该说是我的一种荣幸吧。

四、去湖南做社会调查

1968 年 3 月，学校和武汉市都相对平静，学校的“斗、批、改”工作都在正常地进行着。当时我认为文化大革命已到了后期，我们也很快要毕业分配了。一天，我和江重初在青年园散步时，我提出在毕业前好好地总结一下我们参加的文化大革命。他很同意我的想法。当时我们边走边谈，决定以《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为题写一篇总结，并拟定了写作提纲。

正当我们按分工动手写作时，两人都觉得我们还缺少感性认识，应该去进行社会调查，在调查的基础上再来写。于是，我们决定去湖南搞一次社会调查。为什么选在湖南呢？因为我们两人都是湖南人，社会关系和语言沟通方面具备有利条件。

在动身去湖南前，我们就这次调查的目的和路线进行了讨论。

调查的目的是：

1. 通过调查深入了解社会各阶层的状况（在文革中的地位和作用）、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

2. 了解湖南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及现状；

3. 通过调查熟悉社会，了解工农，培养对劳动人民的感情。

为了更能接近群众，体验生活，我们将自带行李，不住旅馆。五十公里内不乘车，步行（本来我们是可报销车票和住宿费的）。

具体路线是：长沙——宁乡（花明楼）——湘潭（韶山）——湘乡——双峰——衡阳——返回。

1968年7月9日，经院革委会主任张立国同意，我们开了去湖南调查的“新华工革命委员会”的介绍信。当天，动力系（三系）的李纯植也要求和我们一起去湖南搞社会调查，我们同意了。

因江重初手头工作需交待，一时走不了，于是，临时决定我先走。

7月10日我离汉乘火车先期到达长沙。在长沙，湖南大学、中南矿冶学院、长沙铁道学院、湖南财经学院等都有我高中同班同学。为方便联络，我就住在湖南大学刘健清那里。

第二天，其他在长沙的同学应约都来到了湖大。四年未见面的同学相聚在岳麓山，自是一番激动。

通过三天和同学们的接触，我对湖南的文革有了个大概的了解。

7月15日，江重初和李纯植到达长沙，我们住进了湖大招待所。

从16日开始，我们三人开始对长沙一些文革中有影响的单位进行走访调查。我们先后去了长沙各大专院校、湘瓷厂（湘瓷派）、汽车电器厂（汽电派）、“红色新闻兵”、“永向东”、长沙一中、长沙通用机械厂、长沙市工代会等处。

7月29日上午我们乘汽车离开长沙到达宁乡县城。午饭后，我们一

行三人背了行李就向谢灵芝家所在村——油草铺进发（谢是江重初同班同学）。傍晚时分，我们到达谢灵芝家。她一家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们就像回到了家一样。

我们在谢灵芝家住了四天，其中三天都和社员一起劳动，主要是栽第二季稻和车水抗旱。

这里的水车和我们家乡的水车车身是一样的，但车头操作系统却完全不一样。我们那里的水车是用双手摇的，而这里的水车是用脚踩的，用起来比较轻便省力。我们那里的水车一般只能成年男子使用，因为不但要求使用者力气够大，而且手还必须够长。而这里的水车因为在车头附加了一个木头架子，车水时操作人员可双手扶着木架，用脚蹬踏踏板。这样操作起来就省力多了，不但女人可以操作，就是孩子也可以派得上用场，因为它可以两人协同踩踏。

油草铺是一个只有三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庄。这里山青水秀，环境十分优美恬静。

离村子不远处有一座山叫天马山，气势雄浑，连绵数公里。我在车水时见天马山上白云缭绕，气象万千，曾即兴写出一首诗来：

三湘游

1968.7.31

予乘天马游三湘，稻浪千重万里香。

四水相迎挥玉带，群山竞起舞蹁跹。

扮谷声声农家乐，牧笛阵阵伴夕烟。

催马扬鞭月宫去，定邀嫦娥返人间。

第四天，谢灵芝领江重初和李纯植上天马山玩，我在谢家写在长沙调查时的小结《我们对长沙文化大革命的看法》。这篇文章没有公开，1969年在咸宁院学习班期间失去踪影。该文的结论大概是：现长沙各派已实现了大联合，局势相对稳定。但各政治派别之间的明争暗斗仍在激烈地进行着，离真正的稳定还早。

在当天的日记中我写了一首诗，应该可以概括我对当时长沙时局的看法。诗是这样写的：

红旗怨

四水映红旗，奔腾行更急。

洞庭同庆贺，余波仍未息。

8月4日下午，我们一行三人从谢灵芝家步行到花明楼。花明楼区委的工作人员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在花明楼区委大院找了一间空房让我们住下。

我们到花明楼的目的主要是想了解刘少奇故乡的干部群众对刘的印象和看法。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去了宁乡四中，想通过四中的学生了解当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但这时学校空无一人，我们只好返回。在返回的路上，我们看到一些社员正在栽第二季稻，我们也就挽了裤脚和社员们一起栽起秧来。

我们三人都来自农村，栽起秧来自然一点也不含糊。因此，很快就和社员们熟悉了起来。

6日上午，我们向区委的工作人员了解了当地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情况。后又经工作人员介绍，我们到了刘少奇故居所在生产大队。不巧，我们到时大队负责人都下田劳动去了。经人指点，我们就径直来到了刘少奇故居所在村子——炭子冲。

刘少奇的故居是一幢砖木结构的大宅院，这种宅院在我老家也是可以看到。因大门紧闭，我们不能进门观看，只能看到大宅外墙贴满了的大标语。

青壮年都下田干活去了，村子里显得十分安静。见附近屋檐下坐着一个老婆婆，我们就上前招呼。也许是老婆婆年纪大了耳背，也许是她听不懂我们的问话，她只是抬起头望着我们，满脸的疑惧。我们问了半天也没有问出个结果，只好扫兴地离去。

8月7日，我和李纯植再次来到我们5日曾帮忙栽秧的生产队（洋湖塘公社荷叶大队），该队的保管员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留我们在他家吃饭。当我们问起刘少奇及其家庭的情况时，保管员和他妈妈都说：“解放前我们并不知道炭子冲有个刘少奇，直到解放后我们才知道炭子冲出了个大人物”。他们对为什么要批判刘少奇不大清楚。看得出来，他们

对刘并没有什么反感的情绪。当我们问到他们现在的生活情况时，他们都说还不错，起码吃饱饭没有问题。

我们在保管员家一直呆到傍晚才离开。当晚我想了很多。认为刘少奇的路线是应该批判的，但在处理刘及家庭方面觉得太过了，古人都还“杯酒释权赐富贵”呢。联想到在炭子冲看到的刘故居的凄凉景况，我即兴写了一首诗：

访炭子冲

1968年8月7日于宁乡花明楼

炭子冲内静无声，四壁标语一层层。

瞽妪瞠目难作语，游客止步惊飞魂。

花明楼中空荡荡，陈列馆内雾腾腾。

杯酒释权赐富贵，世人浅薄天无情。

8月8日清晨，我们离花明楼步行去韶山。

到达韶山时已是傍晚时分，一时找不到地方住，只好在火车站候车室过了一晚。

韶山是被称为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每天都有成千上万来自全国各地的干部、群众、军人和学生来到这里。他们都怀着崇敬、虔诚的心理，来觐见一个能扭转乾坤、改变了中国以至世界前途命运的伟人出生的地方。

我们随着人流排队参观了毛主席的旧居、毛主席革命事迹陈列馆。当我们来到旧居对面的小山上仰望挺拔俊秀的韶峰时，我不禁和前两天看到的刘少奇故居炭子冲作了一个对比，觉得差别实在太大了。由此我就想到了民间有关风水的传说。是呀，平缓、平凡的小山包，怎能和挺拔俊秀的韶峰相抗衡呢。

下午四点，我们离开韶山乘火车去湘潭。到达湘潭后，我找到了院广播台文艺组的陈殊殊，她带我们来到她的母校湘潭二中，我们就在这里住了下来。

在湘潭我们住了五天，在此期间，我们先后去了市工代会、湘潭锰矿、湘潭电机厂、湘潭军分区支左接待室，了解湘潭文革的有关情况，并搜集了有关资料。

16日上午我们离开湘潭乘火车到达湘乡。在湘乡县城，我们通过刘海滨的武大同学周红宇的帮助，当晚住在湘乡县俱乐部。

在湘乡我们没有停留，第二天我们就乘汽车到了双峰县龙返公社（浏水公社）长河大队新建生产队江重初家，而李纯植则回了他自己的家。

在江重初家我们呆了11天。在此期间，我们只去了江重初的母校永丰一中，没有外出搞调查，我们每天在一起谈论文化大革命的有关问题，再就是享受湘西农村的田园风光。

“湘西十里不同音”，此话一点也不假。我这个湖南人在这里简直像到了外国一样，如果不是有江重初当翻译，就无法和乡亲们交流。

湘西多山。农舍多建于山腰或山顶。入夜，山峦模糊，灯光点点与群星相连，天地难分，如梦如幻，令人陶醉。有感如此，在江重初家的第三天我写了一首诗，命名为《随感》。诗是这样写的：

随感

山外青山峰外峰，农家点点垂半空。

千古英雄今何在？原来尽在稻浪中。

我当时为什么会发出“千古英雄今何在”的感慨呢？这不仅是千古英雄确实大都出于农村山野，更重要的是，我觉得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年四季辛勤劳作，朴实无华的农民，比起城里那些自以为是的人来说才是真正的英雄。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们才能有饭吃，有衣穿。正是因为有了他们，即使城市已经大乱，但整个社会还能保持基本稳定。试想，如果农村也像城市一样乱，农民也不种田了，都去“革命”了，那情况会是怎么样呢？

我的这种想法当时确实是非常强烈。就在写了《随感》的第二天，我还写了一首《农民万岁》的打油诗：

农民万岁

近处青山远处蓝，八月求知返故乡。

农民伟大当万岁，谁不承认断他粮。

在双峰我发现一个我原来并未注意的现象，那就是在晴朗的天空下看山，近处的山是青绿色的，而远处的山则是灰蓝色的。此后，我注意在其他地方看山，情况也是这样的。为什么会近青远蓝？我想这应该与

光线反射有关，但为什么会是这样，至今我也没有弄明白。

8月29日清晨我们离开双峰去衡阳。在衡阳我们逗留了三天。在此期间，我们走访了衡阳工代会、军分区和几个大厂，搜集了一些文革的有关资料。

在湘潭我们从湘潭驻军支左办公室主编的《学习》第三期中看到了《聂元梓等同志传达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精神要点》，在衡阳我们又看到了毛主席决定派工宣队进驻大专院校、毛主席将斯里兰卡送给他的芒果转送给工宣队的消息，同时看到了衡阳群众抬着芒果模型举行的游行，认为全国形势将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我院也将很快有工宣队进驻，因此决定结束湖南调查回校。

9月1日，我和江重初先后离开衡阳。江重初去株洲看他姐姐，而我则去了资兴鲤鱼江电厂我三哥那里。

9月11日，我和江重初在株洲会合，并于第二天回到学校。这次湖南调查历时两个月整。

通过这次湖南调查，我增加了阅历，磨砺了意志，更增加了我对农村和农民的感情，应该说这次湖南调查是值得的。然而，这次调查却在1970年咸宁院学习班受到批判。这是后话。

第二十一章 工（军）宣队进驻华工

按照毛主席的计划，文化大革命是一年发动，两年看成果，第三年扫尾。

但正如我在第十九章《“钢新之争”再起》中记述的那样，从1967年底开始，极左思潮泛滥，无政府主义和山头主义失控，全国各地的造反派几乎都分成了对立的两大派，武斗频繁，死伤惨重。每一派都说要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都说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但一些派头们实际上是为了争个上下，谁的话也不听了，以致毛主席的战略部署难以贯彻实施。

毛主席对造反派头头的态度终于从热情支持、善意批评，到严厉教训了。

为了制止日益严重的武斗，1968年7月3日中央根据广西情况发布了《七三布告》，布告针对广西发生的一系列反革命事件，要求迅速实现以下几点：立即停止武斗；恢复铁路交通运输；无条件地交回抢夺的援越物资；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解放军武器装备；一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上山下乡青年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运输畅通、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

1968年7月27日，为了制止清华大学从4月打到7月的“百日武斗”，毛主席派3万首都工人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徒手进驻清华大学，制止武斗，收缴武器，拆除工事。蒯大富等下令以武力“还击”，造成5名工人死亡，几百名工人受伤。

毛主席闻讯极为愤怒。7月28日凌晨，毛主席紧急召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等五大学生领袖，从凌晨三时半开始，一直谈到八时半。

毛主席批评他们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提出四个解决方案：“（一）实行军管；（二）一分为二（就是两派可以分两个学校，住两个地方）；（三）斗批走；（四）继续打下去。”

毛主席还就教育革命如何搞提出了具体意见。

8月19日工宣队进驻北京大学。8月底，北京59所大专院校都进驻了工宣队。

1968年8月26日，人民日报转载了红旗杂志第2期发表的姚文元的一篇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文章说：

放在各级革命委员会当前的重大任务，就是不失时机地认真搞好斗、批、改。完成这个任务，必须坚持工人阶级领导，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

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首先要保证工人阶级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每一个指示，工人阶级的最高战斗指挥部的每一个号令，都能迅速地畅通地贯彻执行。必须反对“多中心即无中心论”、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等种种破坏工人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反动倾向。各地革命委员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机构，各单位都应当接受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我们国家中，不允许存在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相对抗的任何大的或小的“独立王国”。

现实的情况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单靠学生、知识分子不能完成教育战线的斗、批、改及其他一系列任务，必须有工人、解放军参加，必须有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

毛主席最近指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工人阶级有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丰富的实践经验，工人阶级最仇恨一切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言行，最痛恨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旧教育制度，最反对某些知识分子破坏国家财产，阻碍斗、批、改的“打内战”行动，最讨厌言行不一的空谈习气和两面派作风。所以，工人阶级群众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士相结合，能够最有力地制止一切违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错误倾向，最有效地解决种种所谓“老大难”的问题。知识分子

纠缠不休不能解决的矛盾，工人们一到，很快就解决了。

姚文元的文章中有一段话是毛主席加写的：

有些自己宣布自己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知识分子，一遇到工人阶级触动他那个小小的“独立王国”的利益的时候，就反对起工人来了。这种叶公好龙式的人物，在中国还是不少的。这种人就是所谓轻视工农、爱摆架子、自以为了不起的人物，而其实不过是现代的一批叶公而已。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占领那些“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者盘踞的地方。这样，成堆的知识分子中间的不健康的空气、作风和想法就可以改变，他们也就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

从毛主席7月28日接见北京五大学生领袖到姚文元文章的发表、工（军）宣队进驻大专院校，政治上敏锐的人们已经发现毛主席的想法和相应的政策有了两个重大变化：

1. 从热烈支持、依靠造反派红卫兵转为支持、依靠工人阶级；
2. 从“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改为共产党习惯了的“自上而下的、有组织、有领导的群众运动”，也即是从“群众运动”变为“运动群众”。

毛主席的这种改变在当时也许是被迫无奈的。因为如果不作这种改变，全国性的武斗问题将难以解决，文革“斗、批、改”的目标将难以实现，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将遥遥无期。更重要的是，当时的极左思潮如任其发展泛滥，其后果将难以想象。

然而，这个改变的后果也是严重的。原体制内反文革的势力假借毛主席的这种改变，对造反派进行了疯狂的报复，欲置那些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起来造反的造反派头头们于死地。尽管毛主席一再要求他们对革命小将“高抬贵手”，但没有用。

一、工（军）宣队进驻华工

工（军）宣队是哪一天进驻华工的我不清楚，大概是1968年9月中下旬吧。因为我9月12日从湖南调查回到学校时，工宣队还没有进驻

华工。为了争取去工厂实习的最后机会，我在回校后的第三天就去了上海机床厂，和本年级本专业的同学们一起去实习。

在上海机床厂实习一个月后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学校革委会的电报，说工（军）宣队已经进院，要我和同学们一起立即返回学校。

我回到学校时，院系两级革委会成员已经集中起来办学习班，学习毛主席关于文革的“最新指示”和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院工（军）宣队指挥部接管了党政大权，院革委会只能在院工（军）宣队指挥部的领导下工作。

在我的印象中，院工（军）宣队指挥部有五个指挥长，一正四副。指挥长和第一副指挥长是部队首长，指挥长叫刘昆山，第一副指挥长叫赵旭。他们都来自15军，刘是副军长，赵是某师副参谋长。另外三个副指挥长都是工人，一个叫陶常仕，一个叫刘茂海，另一个姓吴（名字忘了）。

工宣队的成员基本上都是从武汉一些工厂抽调来的工人，他们被分配到各教学班、教研室及院党政各科室当领导。安排在我们班的工宣队队员有两个，年纪较大的姓顾，年轻的一个叫陈桂元。

从工宣队1968年9月进驻到1969年贯彻“9·27指示”前的一年时间内，院工（军）宣队指挥部和院革委会的关系还算融洽。虽说是工（军）宣队领导革委会，但指挥部对院革委会还是很尊重的，并不干涉院革委会的正常工作。

五个指挥长中，我和三个工人副指挥长接触很少，与刘昆山指挥长的接触也不多，接触最多的是赵旭副指挥长。

赵副指挥长身材魁梧，东北人，50来岁。

赵副指挥长虽然是军人，但他为人随和，脸上总是挂着微笑，因此少了一些人们心目中应有的威武。

赵副指挥长经常来我们宣传部办公室，有时也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去。有时是谈工作，但更多的是聊天。我们什么都聊，我很喜欢他。

我在接触赵副指挥长以前不会抽烟。但他每次来我们办公室或我去他那里，他都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发烟，他发烟不接还不行。我抽烟的历史就是从这时开始的。从那时起到现在40多年过去了，我抽烟也抽了

40多年。每说到当年的工宣队，我就会想起赵旭副指挥长，想起他那身材魁梧而又不威严，反而和蔼可亲的身影。

二、工（军）宣队要我负责全院的日常工作

不知为什么，我从上海回院后，工（军）宣队指挥部并没有让我进院学习班，而是要我负责全院的日常工作，直到1969年3月。

学校的日常工作处理起来并不难，但很繁琐。所幸，当时我院各级革委会的工作秩序都很正常，需要我直接出面处理的事不算很多，处理起来也还顺利。

当然，也有复杂到让我无法处理的事情。其中最让我头疼的一件事就是合同工要求转正的问题。

文革前，各企事业单位都招有合同工，我们学校也不例外。我院的合同工主要集中在附属工厂、事务科的绿化队，其他如膳食科也有一些，总共一百人左右。

我院合同工多为女性，男性不多，年龄多在35岁至50岁之间，工龄在5—12年不等。

在我负责院行政工作期间，合同工们曾多次来我办公室“造反”，要求给他们“转正”。理由很简单：他们和正式工一样干活，都是为人民服务，为什么待遇却完全不一样？

合同工与正式工在经济和政治地位上确实是不同的。在经济上，正式工比临时工的工资要高，而且正式工的工资会随工龄和技能的增加不断增长，最多可以拿到八级工资（工人八级到顶）。而合同工则不同，不管你工龄多长，到退休年龄时最多也不过四十来元，只相当于正式工的三级工资。更重要的是，正式工退休后有退休工资和医疗保险，而合同工则没有退休一说。

合同工和正式工在政治地位上更是不一样。正式工是属于“工人阶级”，而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当时的人们无不以自己是工人阶级的一分子而感到骄傲和自豪。而合同工在政治上则完全被边缘化了，他们什么也不是。

我曾去拜访过一个姓刘的合同工。她是学校附近鲁巷村人，年龄35

岁。她爱人几年前去世了，有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她说早在华工建校时就在学校做小工了，1958年被招来华工附属工厂当合同工，在铸造车间干翻砂，现工资是三十元，相当于一级工的工资，全家四口全凭她一个人的工资生活，其生活质量是可想而知的。

合同工的境遇无疑是值得同情的。但我对他们的诉求，特别是要求“转正”的问题无能为力，爱莫能助。因为合同工问题不是个别单位、个人的问题，而是全国普遍存在的问题。对合同工的待遇，国家有相应的政策，我不可能超越政策去解决这些人提出来的问题。因此，当他们来向我“造反”时，我只能安慰他们说：“合同工的待遇问题国家是一定会解决的，但要等到运动后期，也就是要等到进行斗、批、改的‘改’时才能解决，你们暂且耐心等着吧。”

遗憾的是，今天的工人已都成了当年的合同工。作为一个阶级，“工人阶级”似乎已经消失了，或者说都被边缘化了。今天各行各业的工人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来自农村，他们被人称为“农民工”，其政治地位自不必说，就其经济地位来说，他们只不过是老板们廉价购买的劳动力而已。虽然政府一直要求，按劳动法规定用工单位应为他们买“五大险”，但事实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没有社会保险，更不存在所谓的“失业保险”了。在一些人看来，他们根本就不存在失业，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农民，而农民是可以回到农村去的，农民不存在失业的问题。

三、主持解放朱九思学习班

院革委会成立时，我院绝大多数干部除个别确有历史问题的外，都先后“解放”了，其中多数都已回到了原来的岗位。但原院一把手朱九思的解放问题，却迟迟没有得到解决。

朱九思，江苏扬州人，1937年入党，同年赴延安并在抗大任教导员。曾任冀察热辽边区群众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建国后，历任新湖南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1953年调湖北组建华中工学院，并任院长兼院党委书记。

关于解放朱九思的问题在院革委会中曾开会讨论过多次，但一直没有结论。一些人认为应尽快解放，而另一些人则完全不同意。我是同意

第一种意见的。

不同意解放朱九思的理由主要有两个：一是说他在运动初期执行了资反路线，也是我院17年来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总代表、总根子；二是说他在华中工学院一直是独断专行，搞独立王国，且至今认识不好，群众意见很大。

1969年7月中旬，院工宣队指挥部决定由我负责主办解放朱九思的学习班。

在组建解放朱九思的学习班前，我认真地看了由院革委会解放干部小组办公室专案组提供的有关朱九思的所有材料，并研究了《新华工》报1967年12月连续三期刊登的批判朱九思的文章和关于朱九思的材料。

此前，我没有直接接触过朱书记，但我对他的印象从入学以来一直不错。看了他的全部资料后，我更觉得朱书记是一个难得的有雄心，有抱负，有独立人格和思想，敢作敢为，敢于担当的好领导。在我看来，朱书记起码应该属于十六条中所指的那种“比较好的干部”，应该尽快解放。

这也许与我的个性有关，我崇尚有雄心，有抱负，有独立人格和思想，敢作敢为的人。

对于《新华工》报第69期公布的供批判用的材料，我认为其中的大多数不仅不应该批判，而应该学习和坚持。如材料的第一部分“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攻击、诋毁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所列举的朱书记说的话：

突出政治这个口号与越南形势有关，只适用于部队，不适用于地方，院刊宣传突出政治与林总提出的精神不符，林总还强调二百米硬功夫。

“四个第一”的基础是“实践论”。（朱九思对××的谈话）

政治是灵魂，还得有躯体。没有躯体的灵魂等于幽灵。（在一次党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政治与业务，连领导也没有搞清楚。现在是愈搞愈复杂，以致对工作影响很大。什么大摇大摆，大起大落，原因在此，是重要原因之一。

只专不红，重业务轻政治等等说法是不对的，但已成了口头禅。只专不能说不对，重业务也是对的。但是把轻政治联系起来，就把事情混

清不清了。事实如此。一批评之后，就感到学外文、上图书馆见不得人了，理亏了。恐怕有一天别人又来批评自己。……只专不红的说法是错误的，每经过一次批判，片面性就上升一步，这样下去很危险，……

重政治，重业务，就是要政治与业务相结合。

政治工作没有很好地做到业务中去，则“四个第一”就很难落实。……既然大量的实践在此，政治工作不落实到这个实践中去，还有什么帅可挂？（朱九思 1965 年暑假党委扩大会四、五系小组讨论会上的发言）

这些话无疑是对的。在“政治压倒一切”的年代里能说出这种“反潮流”的话是很令人钦佩的。

我看全部材料后曾约朱书记进行了一次长谈。当面向他核对了相关材料，并希望他放下包袱，积极配合我的工作。

我们之间的谈话是友好的，气氛是融洽的。

看了材料，又和朱书记有了一次坦诚的谈话，我对解放他的决心更坚定了，把握也更大了。我立即拟定了参加学习班的人员名单和学习班的运行程序及时间安排。

参加人员：学生、教师代表各 5 人（由各系、各教研室推荐产生），“朱九思专案组”成员 3 人，加上朱书记本人和我共 15 人。

运行程序和时间安排：

1. 学习、讨论毛主席关于干部问题的一系列指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时间两天。

2. 核实专案组提供的有关朱九思的材料，剔除似是而非的部分，对一些重大问题进行历史分析，分清哪些是上级领导的责任，哪些是应由他主要负责的。时间两天。

3. 朱九思作检查，大会发言。时间一天。

4. 由我和专案组根据朱九思的检查和大会发言，以院学习班的名义向院革委会提出关于解放朱九思的书面报告。时间一天。

解放朱九思的问题是我院文革“斗、批、改”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早在院革委会成立前，红司（新华工）就成立了“朱九思专案组”，两年多没有解决的问题我要在一周内解决，可能吗？对此，我当时是作了充分考虑和分析的，我有把握，一定能行。

我认为朱九思的问题之所以两年多没有解决，固然与已解放了并重新工作的原院党委成员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因为院革委会主要负责人没有充分予以重视，或者说他们没有真正认识到解决朱九思问题的重要性。我坚信：既然问题交到了我手上，我一定能很快解决。

事实证明我是对的。我们只用了一周的时间就解决了朱书记的“解放”问题。当我们的报告递交到院革委会时，立即得到了肯定并很快以院革委会的名义报给了院工（军）宣队指挥部。

一个星期就办完了这样一个重要的学习班，而且得到了各方的一致肯定，这在我院文革时的众多学习班中可以说是破天荒的。

遗憾的是，院革委会报给工（军）宣队指挥部的关于解放朱书记的报告并没有被批准。不但朱书记没有得到及时的“解放”，就是早已“解放”，而且已经担任院革委会副主任的原院党委副书记熊小村及原副院长邱静山等，在贯彻“9·27”指示后也被扔到水里给“泡”起来了。据留校的同学说，朱书记直到1974年才被工（军）宣队“解放”，而他官复原职则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事了。

此后，我曾多次参加过“院学习班”。最短的一个月，最长的达半年。只有院革委会解放朱九思书记这个学习班是由我主持，是解决“对象”的问题的，而其他几次我都是作为“对象”参加的。

我和大名鼎鼎的朱九思仅在这次学习班中有过直接的接触，时间也只有一个星期。而两人单独对话交流则仅有上述的那一次。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朱九思参加教育部在昆明召开的一个会议。会议结束后，昆明华工校友会在他下榻的宾馆为他举行了欢迎会。他一进会议大厅，第一句话就问：“张建华同学来了吗？”当听到回答说没有联系上我时，他说：“你们想办法联系上他，我要见他。”当校友会负责人告诉他我还在受审查时，他说：“张建华是我的学生，不管他有什么问题，均由我来承担。”

一个多月后，当我听到同学们说朱书记想见我的消息时，我确实非常感动。那么多同学他不问，单单问了我一个人，而且说要见我。这说明这个在华工说一不二，在中国教育界也是鼎鼎大名的他，对我是有印象的，这多少给了我些许慰藉。

四、武汉反复旧运动

为了进一步稳定社会秩序，为党的九大召开创造条件，毛主席和党中央在作出派工（军）宣队进驻大专院校的决策后，又于1968年12月作出知识青年（中学生）上山下乡，分配六七、六八届大专院校毕业生的决定。这样，作为文革主力军的学生队伍基本上就解体了，在湖北武汉，以工代会牵头的工人队伍则成了文革的主力军。

1969年3月，我院三千多名师生到湖北黄冈搞“政治野营”。所谓“政治野营”，其实是为了“战备疏散”。

这时我回到了我所在的教学班。我们班被安排在路口公社五一大队第三生产小队，和社员们同吃、同住、同劳动。

干农活对于我来说并不陌生，特别是栽秧我更是在行。可以说在多次栽秧比赛中，我并不比那些青年农民差，起码我从没有“被围”过（参赛者排成一排，开始每人负责3—5米范围的栽插，栽插慢者将被围在田中央）。

栽秧的活看似轻松，其实是很累人的。也许是因为年轻，加上是年轻男女在一起干活，说说笑笑，嘻嘻哈哈的，干起来并不觉得有多累。

黄冈乃历史上有名的鱼米之乡。当地农村的生活还算可以，吃饱饭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副食品少了一些。

我寄宿的这一家，当家菜是咸鱼。鱼虽然是好食品，但一日三餐，餐餐都是鱼，时间长了还是让人觉得受不了。

五一节放假，我和班里的同学去黄州城参加五一节庆祝大会。

午饭后，我约了几个同学去逛黄州城。在街上看到一大群人在看一张大字报，我们也凑了过去。原来是朱鸿霞（工总一号头头）、李想玉（九一三一号头头）、吴焱金（工造一号头头）三人署名的大字报《人类解放我解放，洒尽热血为人民》。大字报列举了武汉市一些单位“复旧”现象和造反派再次受压的情况，号召广大群众起来“反复旧”。

在回驻地的途中我顺便走进了政治野营指挥部，吴副指挥长和院刊编辑部的几个人都在。于是我们就武汉市目前的形势和朱、李、吴的大字报议论了起来。大家在谈到武汉一段时间来发生的一些变化时都有些激动，认为这是真正的工人运动，应该支持。不过当时我还是提出建议，

不要急于下结论，还是回武汉看看，分析研究后再说。

5月5日下午，我和《新华工》报的陈定方等三人找了一辆车回到了学校。

当晚，我去江重初宿舍找到他。他给我介绍了当时武汉反复旧的相关情况，还谈了他个人的一些看法。

他说：“开始我是不同意搞反复旧的，认为这不合时宜。后来看到武汉那么多工人都起来了，而且上街了。再看看一些单位文革前的原班人马重新上台，造反派再次受压的情况，觉得反复旧还是必要的。”

他还说：“反复旧运动的出现也符合革命运动的规律，即学生打头阵，接下来就是工人阶级作为主力军上阵，并主导革命。”

他的结论是：“这次反复旧运动完全是由工人自行发起并由他们自己组织领导的，我们应该予以积极支持。”

他补充说：“说实话，我这次决定参加反复旧，真真正正是经过一番‘斗私批修’后才决定的。”

听了江重初关于武汉反复旧情况的介绍和他的意见，我还是没有拿定主意。一方面觉得江重初说得有道理，另一方面又觉得虽事出有因，但还是要深入调查分析，慎重考虑，不要贸然介入为好。

第二天上午，我和陈定方等三人骑自行车先后到武汉邮电学院、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武汉测绘学院、华中师范学院等大专院校和汉口中山公园去看大字报。从汉口返回时我们又去了湖北大学，准备去找当时我院派驻市红代会的钱亦军了解情况（钱为市红代会常委）。不巧，他不在，问旁边的工作人员，说钱可能回学校去了，我们只好作罢。

当晚，我参加了院革委会全体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讨论我院是否参与反复旧运动。会上多数人都发了言，列举了武汉市大量有关“复旧”的事例，发言者的情绪多数都是非常激动的。

在同学们列举的“复旧”事例中，有两件事让我感到震惊。一是汉阳轧钢厂文革前原班人马上台，以夏帮银为首的造反派再次受压；二是百万雄师成员陈爱娥竟然被省革委会推选为九大代表，并差一点当上中央委员。

在这次会议上，我因刚回校，情况还不了解而没有发言。但听了会

上大家的发言后，我在思想上已开始趋向于支持反复旧运动了。

在这个会议上作出了接回在黄冈政治野营的全部同学、恢复新华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成立院革委会后，总部已撤销了）等四项决议。同时指定由江重初率代表团去黄冈接同学，由我负责恢复红卫兵总部的工作。

5月7日上午八点，各系、各部门派出的代表在南一楼前上了车。就在江重初刚上车准备出发时，却被吴副指挥长拦住了。吴说江有重要的事情要处理不能去（江当时负责我院庆“九大”的事）。

没有办法，江重初只好托我代他把代表团带去黄冈。

上午十二点左右我们到达鄂城。在过轮渡前，我把代表们集合起来交待了一下。主要是要他们到政治野营指挥部后在原地待命，等我向指挥部汇报完后，再各自回本单位传达院革委会的四点决议。

到达路口指挥部以后，我向刘茂海副指挥长简单地汇报了院革委会的四项决议和有关情况。他觉得事关重大，他不能轻易做出决定，并把我和刘玉民等指挥部负责人拉到一个小房间开了一个小会，决定学生撤回学校的问题要等向学校工宣队指挥部请示后再说。

5月9日，江重初到达黄冈并立即来到我所在的生产队。我们就武汉反复旧运动的前途、院革委会和指挥部的关系及有关我院反复旧的组织领导问题进行了分析讨论。我们认为反复旧的前途存在三种可能，即反复旧对了，中央支持；反错了，中央制止；双方都有错，中央对曾、刘和造反派各打五十大板。

至于学校反复旧的组织领导问题，我们认为我院的反复旧应争取院工（军）宣队指挥部的领导。因为不管反复旧是对了还是错了，到头来院革委会还是要在工（军）宣队指挥部的领导之下工作，这是不可能改变的。因此，即使工宣队指挥部反对搞反复旧，我们也不能和工宣队指挥部把关系搞僵。

10日，我们系（电机工程系）革委会在驻地召开学生班副排长以上负责人（当时按军事编制，一个学生班为一个排）及各班工宣队工人师傅会议，讨论回校参加反复旧的问题。我和江重初也应邀出席了会议。江重初在会上介绍了武汉反复旧的情况。会议主持人要我发言，我看大

家的情绪都很激动，因此泼了点冷水。我要大家回去后先认真搞点调查，不要急着去冲锋陷阵，要考虑到反复旧是否会错，如错了那是不好办的。

由于政治野营指挥部回校请示汇报的陶常仕副指挥长等人找不到车回武汉，等他们步行回到学校时已是10日以后的事了。这时在黄冈的同学们却再也等不及了，他们不管院工宣队同意或不同意，全部都于11、12、13日分三批先后返回了学校。

我是随第三批人员返校的。

15日，我和江重初、赵文成、吴忠义、刘伯棠参加了市红代会在武汉工学院召开的武汉各大专院校负责人会议。上午听毛主席在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录音，下午在一个小会议室开小会（下午我院只有我和江重初参加，其他人都回校了），参加会议的有湖大的梅子惠等武汉各大专院校的代表，还有部分学校的工宣队员（当时一些学校的工宣队员参加了反复旧，并成立了工宣队反复旧指挥部。据江重初1969年11月3日在院学习班上说，我院也于4月17日成立了工宣队反复旧指挥部，具体情况我不大清楚）。会议议程是：

1. 各院校介绍本单位“反复旧”情况；
2. 通过口号报（行动纲领）；
3. 下一步“反复旧”安排。

会议主持者宣布完会议议程后，要我先发言，说我们新华工是老大哥。我以自己刚从农村回来不了解情况为由婉拒了。后来市红代会负责人和各与会院校的代表都先后在会上发了言。

发言内容除列举了一些武汉市复旧的典型案例外，主要是围绕学生参加反复旧的必要性和反复旧的组织领导问题进行了讨论。最后会议通过了两项决议和一个“口号报”，要求各单位会后贯彻落实。两项决议是：

1. 反复旧是工人阶级自发组织和领导的，作为革命的青年学生应义无反顾地予以坚决支持；
2. 还没有成立“工宣队反复旧指挥部”的院校应尽快成立，以领导本单位的反复旧运动。

回校后我没有向头头们汇报，也没有在院革委会会议上传达这次红代会的会议精神。之所以没有汇报和传达，主要是因为自己对这次会议

的决议有看法。我认为：在组织上，院革委会只能在省革委会派出的工宣队指挥部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在院工宣队内成立“工宣队反复旧指挥部”，其合法性难以成立，事实上也不现实。再就是我对会议通过的“口号报”有些不以为然，特别是对其中的“张体学的老虎屁股要年年摸，月月摸，日日摸”这一条更是反感。我觉得华工是否参加反复旧还是更慎重一点好。

5月20日，刘玉民在图书馆主持召开了院革委会扩大会议，除院革委会在院的全体成员外，各系各部门革委会的主要成员都参加了会议。

会议主要是讨论武汉及我院当前反复旧的问题。认为当前武汉的反复旧是由工人自发组织的群众运动，大方向是正确的，院革委会应坚决给予支持。

会后由陈定方、克己两人起草了一个会议纪要（即后来受到院工宣队严厉指责的“第二个会议纪要”）。

在这个会议上我没有发言。但这个“会议纪要”的初稿写出后我是同意的，初稿打印前，我加了这样一句话：“有些人说起话来还是三年前的话，做起事来还是三年前的那一套”。

25日，聂年生在电影场作了一个反复旧的报告，号召全院师生员工积极参加反复旧运动。

28日上午，聂年生在附属工厂又召开了一次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除我和江重初、肖佑祥等人外，还有附属工厂的几个人。会议主要是讨论恢复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华工总部和院内郭、聂两派联合反复旧的问题，并决定下午两点召开原院红卫兵总部扩大会议讨论这两个问题。

下午的会议在图书馆准时召开。正当会议作出恢复红卫兵总部和总部人选的决定时，我院在北京参加中央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会议的代表打来电话，传达了中央关于处理武汉反复旧问题的“5·27指示”，说反复旧不能搞了。于是，恢复红卫兵总部的问题只好作罢，我院的反复旧也就因此画上了句号。

反复旧运动是由武汉造反派（钢新两派）主要领导人胡厚民、朱鸿霞、吴焱金、李想玉发起、由当时的市工代会具体组织运作的。从朱、吴、李联名的大字报《人类解放我解放，洒尽热血为人民》贴出，到中央5·27

指示发布止，历时不到 50 天。

我们新华工卷入反复旧较晚。当我院正准备恢复新华工红卫兵总部参与反复旧时，中央 5·27 指示已经下来了。因此，可以说我院其实并未真正参加过武汉市的反复旧运动。

武汉的反复旧运动应该说是武汉文革中的一个重大事件。我认为武汉反复旧运动的经验教训是不应该忘却的。

武汉的反复旧运动是真正的工人自发组织的工人运动。其组织领导机构——工代会的合法性不容置疑。

群众运动是不是“天然合理”？今天看来是值得商榷的。

文革中普遍流行的一种观点是“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马列对群众运动有专门论述，林彪将其归纳为“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我们当时都认为武汉的反复旧运动是真正的工人运动，运动不仅是由工人领导，而且卷入运动的近百万工人群众都是自发、自愿的。基于此，我们认为作为学生应该予以坚决的支持（当时我们接受的教育是知识分子必须和工农兵相结合）。

武汉的反复旧运动事出有因。最主要的原因是实权在握的军政首脑在感情上不能接受造反派。虽然原武汉军区党委被改组了，陈再道、钟汉华等因七二〇事件被撤职了，但新来的曾思玉等军队领导人从骨子里并没有改变对造反派的看法。在省市革委会中，“三结合”中的群众代表事实上只不过是一种摆设。不仅如此，军政首脑还不时给造反派头头难堪。他们打压造反派的种种手段，造反派总结为“三条扁担”“三根绳子”：“三条扁担”是指“派性、打砸抢、抢枪乱军”，“三根绳子”是指造反派“想当官、想入党、造反动机不纯”。这自然引起了造反派头头们对曾、刘的不满。在基层单位也是一样，一切都是军代表说了算，群众代表根本没有什么发言权。这也就是为什么“朱、吴、李”振臂一呼，百万群众积极响应的原因。

中央处理武汉反复旧问题基本上是采取了“各打五十大板”的方法。

中央处理武汉反复旧问题的 5·27 指示中，一方面指出反复旧“是不符合毛主席关于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和一元化领导的教导的”，同时又指出省市革委会“由于缺乏经验，他们没有很好地试点，抓典型，

总结经验，落实政策，以点带面，在工作作风上又不够细致谨慎。这些缺点、错误应该纠正”。

中央对武汉反复旧运动的定性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曾、刘为首的武汉军政当局虽对造反派仍心存不满，但对造反派也只能暂时住手。

五、总结文革——《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斗争》

早在1968年3月，我和江重初就计划写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总结，并以“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为题拟定了写作提纲。但临动笔时又觉得我们还缺乏必要的感性认识，因此提出了去湖南考察，决定待湖南考察后再来写。

但湖南考察回来后工（军）宣队进院了，写文革总结的事也就放下了。

中央1969年5·27指示下达后的几个月中，造反派与军政当局基本相安无事，我们学校的工宣队指挥部与院革委会也是和平共处。

当时盛传我们六九、七〇届的学生也要分配了。同学们放了野马。

我和江重初觉得在毕业分配前总还应该做点什么，于是总结我们亲历的文革的事就再次提上了我们的议事日程并很快付诸行动。

1969年5月底的一天，我和江重初、陈定方、克己四人在江重初的宿舍开会讨论写总结的事。

会议由江重初主持。他首先说了他和我1968年3月就准备写总结的事，说当时确定的这个总结的主题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革命”。接着他念了我们在咸宁政治野营时他已经起草好的一些内容。

会议就总结的主题、指导思想、写作方法、涵盖内容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最后确定这个总结就以《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斗争》为题，分五大部分：“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斗争”“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要斗私批修”“不到长城非好汉”，分头来写。

具体分工是：江重初将他已写好的内容修改完善作为第一、第二部分，即“伟大的时代”和“伟大的斗争”；我写第三部分，即“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陈定芳写第四部分“要斗私批修”；克

已写最后一部分“不到长城非好汉”。

1969年6月12日，我们四人开了一个小会，会上各自汇报了自己负责部分的写作情况，并交流了意见。

我谈了我在写作过程中遇到一些理论如何与实际相结合的具体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根据马列主义关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学说，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解放初划分阶级是根据人们的经济地位（生产资料的占有和生活方式）来划分阶级（成分）的，几十年后，原划为地主、资本家成分的人都不在了，他们的子女都和工农子弟一样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了。按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都存在阶级斗争的理论，到那时阶级斗争仍然还存在，但到那时怎样对群众划分为不同的阶级呢？如果不划分阶级，那又如何确定阶级阵线呢？如果到那时不再根据人们的经济地位来划分人们的阶级属性，那又以什么形式体现阶级斗争呢？

我们就这个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最后的结论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阶级斗争，主要体现在是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两条路线斗争上，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斗争的事实就是最好的证明。

但对于这一结论，我们当时还觉得缺乏更充分的事实根据和理论来支撑。因此，讨论后决定暂时放弃“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一部分的写作，而将这部分内容中我们认为有把握的观点，即“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将主要体现在路线斗争上，体现在中央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中”，放在“伟大的斗争”这一部分来写。这就是最后定稿的《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斗争》这篇文章分为四部分，而不是五部分的原因。

我负责的那部分不写了，大家的意见是我不能闲着。于是就让我协助陈定方写“要斗私批修”这一部分，在全文初稿出来后负责最后的审定、打印及相关事宜。

1969年6月14日下午，我们在院图书馆召开了关于《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斗争》一文的第一次座谈会。参加这次会议的除我们四个人以外还有《新华工》报的孙水波，院革委会常委张春芳，我们二系革委会委员王家树、徐正华等十来个人。

6月20日，我们在图书馆召开了第二次座谈会，讨论修改后的初稿。

参加会议的除我们执笔的四个人外，还有当时院革委会的几个主要负责人郭保安、聂年生、刘玉民及各系革委会负责人，到会约四十人。

与会者对初稿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一致认为这个总结不错。会议期间，我曾向与会者谈了我们放弃写“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这一部分的原因，并希望大家会后对这个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讨论和理论探索。

会后，我们根据会议上大家提出的意见又对文章进行了修改。

6月30日，《伟大的时代，伟大的的斗争》被抄成大字报贴出，作为我们对党的生日的献礼，并广泛征求全院师生的意见。

文章写完后，江重初带着《新华工》报的陈定方、克己等几个人去了庐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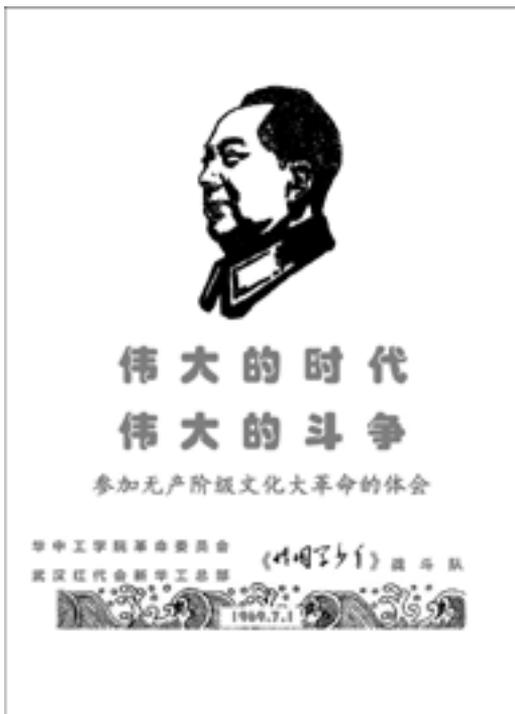
7月10日，《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斗争》一文在我们宣传部办公室打印和装订。打印前我对个别地方进行了最后的修改和审定。

我们的这篇《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斗争》总结文章，是集体的产物。

在酝酿和正式写作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很多热心的同志的积极支持和帮助。可以说：没有整个新华工革命师生员工的共同英勇奋斗，就不可能有我们的总结。没有大家（包括已经毕业出去的战友）经常地在一起讨论、议论，就根本不可能有我们的总结文章。

7月20日前后，《伟大的时代，伟大的的斗争》一文除在院内分发外，还寄给了中央文革、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及当时国内知名的群众组织。

文章公开散发后得到了一



《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斗争》油印本封面

片叫好声。

但在接下来的贯彻9·27指示运动中，这篇文章却被工宣队指挥部打成了“大毒草”，并公开进行批判。

1969年11月21日，工宣队刘昆山指挥长在贯彻9·27指示院革委会学习班的总结发言中，不得不出来打圆场，他说：

“张建华，你们写的那个东西（指《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斗争》），同志们提出了一些批评，不要有抵触情绪。江重初来了吗？（江答：来了。）你们的指导思想有些是有问题的。当然，你们要作三年的文化大革命总结，这么大的事，牵涉的面这么广，难道还会没有一点错误？还会没有一个错误的观点？错误总是会有有的，这是难免的嘛。

“不是说今后不能再写东西了，一写就会有人批判。写还是可以写的，有错误也不要紧，我们的大报不也是会出现错误吗？写还是可以写的。但要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敢想敢干。你们这些喜欢写文章的人这点要好好注意。

“你们的动机谁也没有否认。你们不要拿着自己写的东西说这也差不多，那也问题不大，总的还是好的。如这样就不好了。别人批评，说了100份，其中只要有10份是对的，那别人的批评就是对的了，要正确对待群众。

“写文章也不要怕出错，但要接受教训。你们的总结当然是以个人名义，不是以革委会的名义发的，但这起码是不慎重的吧。你就是写得很成熟，也不能这样做（到处发）。你们发了很多份呀，除西藏个别省份外你们都寄了吧？自己总结总结是可以的。”

当刘玉民发言时，刘指挥长插话说：“工作中犯一点错误不要紧，这是前进中的错误，认识改正过来就行了。你们搞宣传的，如果形成了一个理论，一种观点，那就难改了。王明他就是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嘛，现在还是这样。胡风反党集团他们也是有一套理论的。”

作为一个有文人风格的军级首长的上述讲话我当时是能接受的，因为他毕竟是我们的长辈，语气中还是充满了对晚辈的爱护。

但到1970年3月，工宣队指挥部在湖北咸宁突然将我隔离审查，《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斗争》一文成为审查、批判我的主要内容之一。

邓小平成为核心以后对我们这些高校文革的骨干分子搞“记录在案”，我参与写《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斗争》一文成了我被“记录在案”的最主要的问题，直到1986年底我调离云南铁路建设公司时他们还因此不放过我（有关情况后面我还要说到）。

从《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斗争》问世到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今天重读当年几个刚二十岁出头的年青人写的这篇文章仍倍感亲切。

我认为这篇文章是我们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写成的一篇文章，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华中工学院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最高水准。它不仅对后人研究文革史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对今天仍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左派们也会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斗争》一文将近五万字。

文章的第二部分“伟大的斗争”，从“惊涛骇浪的几个回合”“革命的群众运动”“无产阶级大民主”“难忘的1967年”“伟大的创举”五个方面，概述了毛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文革中的运用及其取得的伟大成就。

文章告诉我们：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说是一场伟大的革命，是因为：

这场革命不是单纯的思想革命、教育革命，更不是纯学术讨论，而是一场向着资产阶级司令部发起总进攻的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大革命。

这场革命不是少数人的行动，而是一场充分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伟大的群众运动。

这场革命从根本上着手——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由广大革命人民自下而上的向党走资派夺权，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

这场革命不是一次简单的组织上的罢官，而是一场深刻的触及人们灵魂的“斗私批修”的大革命。

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开展，为其他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如何进行革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使全世界革命人民坚定了共产主义能够最终胜利的信心。

文章告诉人们：面对庞大的官僚体制，用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反制是唯一正确、有效的方式。文章从“两条路线的分水岭”“革命

群众运动的灵魂” “群众的力量在于觉悟、组织和团结” “革命先锋与主力军” “主流与支流” “舆论、群众与政权” 等六个方面阐述了什么是文化大革命，什么才是真正的革命群众运动。

文章指出：“革命的群众运动必须是代表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劳动人民的愿望，符合他们的根本利益”。“革命的群众运动必须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这是群众运动的根本和灵魂。革命群众运动并非是简单的任意的一群人参与的活动。如果工人运动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便会自发地走向工联主义、工团主义，为阶级敌人所利用。”

文章同时指出：群众运动并非是天然合理的。“一九六六年底武汉出现的‘职工联合会’和一九六七年在二月逆流中出现的‘百万雄师’，这两个组织可以称得上是显赫一时的庞然大物，参加的人数不少，这些组织里的基本成分是群众，但是，他们完全受了阶级敌人的蒙蔽、操纵，为着保护资产阶级司令部，保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破坏、对抗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所以他们所从事的活动，不仅不是革命的群众运动，而且是反对了革命的群众运动。”

我国历史上发生的很多农民运动不但没有促进历史的发展和进步，反而给社会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文章特别强调了作为一个革命者必须勇于“斗私批修”。认为“要斗私批修”是毛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灵魂，是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重要武器和过程，也是纯洁人们心灵、净化社会空气的法宝。

文章除“主流和支流”一节中公开承认了我们“过于强调了工总、二司的非本质、非主流方面的东西，结果犯了错误”，还在本文显著的位置上公开承认了我们新华工在文革中所犯的三次错误，即七二〇事件后“揪军内一小撮”，1968年“揪变色龙”，1969年“反复旧”。

这三次犯错误虽然都有一定的客观原因，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它们之所以是错误的，关键在于我们忘记了毛主席的教导：“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严重地干扰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文章还从“关于我们的错误”“关于三股思潮”“既作革命的动力又作革命的对象”三个方面总结了我们在文革中的经验教训。

对于当时盛行的三股思潮，即武汉的“决派”思潮、湖南的“省无联”思潮和北京的“4·14”思潮，我们持坚决反对的立场，并给予了严厉的批判。认为“决派”思潮、“省无联”思潮是极左思潮，而“4·14思潮”则是极右思潮，它们给革命带来的损失是难以估量的。

文章认为：在今后的几十年中，肯定和否定文化大革命将是我国政治斗争的焦点，赞同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的结论。

六、贯彻“9·27 指示”

1969年9月初，以曾、刘为首的湖北军政领导人以武汉军区党委的名义向中央报告“北、决、扬”的问题。中央在回复中说：“根据现在看到的材料，在武汉市出现的“北斗星学会”、“决派”这类地下组织，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假借名义、暗中操纵的大杂烩。那些反革命分子的目的，是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反革命复辟。他们不择手段，制造谣言，散布各种流言蜚语，混入群众组织进行挑拨离间，大刮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妖风。对这类反革命的地下组织，必须坚决取缔。”“所谓《扬子江评论》是一些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幕后操纵的反动刊物，肆无忌惮地大量放毒，必须查封。《扬评》的主要编写人员，应由湖北省革命委员会责成有关机关审查，按其情节轻重，分别严肃处理。”

这就是所谓的中央“9·27 指示”。

接着，省革委会扩大会议召开，学习和贯彻中央的9.27 指示。不在省革委会任职的造反派头头几乎都被“扩大”进去。这个会又称“9·27 学习班”，从10月3日开始到27日，办了25天。

会议由曾、刘主持，曾思玉传达9·27 指示后，刘丰做了长篇发言。至今保存这份讲话记录的原湖北大学学生杨闯评论为：“讲话的核心就是把造反派的活动都归到北决扬的活动”，“他所列举的三个时期北决扬的十大反革命罪行实际上都是造反派当时开展的活动。”¹

1 杨闯《湖北大学文革亲历记》第264、269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4年版。

10月27日，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作了总结发言，他说：会议“揭开了反革命地下组织‘北斗星学会’、‘决派’和反动刊物《扬子江评论》的盖子，找到了湖北省和武汉市问题的根子”。

省革委会扩大会结束后，11月各级造反派头头和骨干千余人到北京参加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湖北班，继续深挖北决扬，其间又开始挖五一六分子，历时7个月。

与此同时，华工工宣队指挥部从10月2日起，把院、系两级革委会成员集中在图书馆举办贯彻落实中央9·27指示学习班。

学习班分成11个组，我们院革委会成员和已解放的干部为第一组，熊小村、刘玉民为我们这一组的召集人，成员为：原院领导干部和教职工代表熊小村、邱静山、宋驹、石贻昌、臧之昭、张以书、赵文成、方应详、邓家琪，院革委会学生委员刘玉民、张春芳、陈木楨、江重初、张建华、王绍庆、王家树、郭保民。工宣队徐国清副指挥长（工人）和严指导员（解放军干部）也参加了我们这个小组，他们是我们组的实际负责人。

学习班的任务是：学习、揭发、批判。

对这次院、系学习班，多数人开始并不怎么重视。认为9·27指示是针对北决扬的。我们学校是最早揭发、批判北决扬的，而且早在一年半以前我们就发表了批判文章，把鲁礼安也给抓了。认为在批判北决扬方面，我们新华工不说有功，起码也无过吧。正由于有这种思想，我们的学习班办得有些松散，我们没有什么压力，虽说不上轻松，但一点也不紧张。工宣队指挥部对此很是恼火，虽作了两次动员报告，但也不见什么变化。

省革委会扩大会议结束后，我院参加会议的张立国、郭保安回到了学校，加入到了我们的院学习班。10月28日，院工宣队指挥部在东边大操场召开了第三次全院“坚决贯彻9·27指示动员大会”。刘孟池副指挥长作动员报告。在安排下一步工作时，他强调一定要揭开我院“阶级斗争的盖子”，“要通过剥画皮、揭罪行挖出敌人”，要求广大师生员工“划清界限，分清是非，肃清流毒”。

工宣队指挥部重新调整了院学习班的领导班子，任命陶常仕副指挥

长为院革委会成员小组组长。工宣队指挥部为了壮大声势，特从教师和学生中挑选了20名“积极分子”参加到院革委会成员这个小组来，于是，我们院革委会成员小组就由原来的19人增加到了41人（包括张立国和郭保安），动力和对象一半对一半。

第三次动员大会后，学习班内的“对敌斗争气氛”果然发生了变化，人们的神经从轻松变得紧张起来。

根据工宣队指挥部的部署，学习班主要揭批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 影响新华工的“黑手”，2. “揪变色龙”及“抢枪乱军”问题，3. “小山头”“多中心”及“（郭派）一派掌权”问题，4. “反复旧”问题。

在省革委会扩大会议中，革干联的一些主要成员都被军政当局说成是“黑手”。刘副指挥长在动员大会上公开点了这些人的名字，说这些“黑手”都来过新华工，有的甚至还在我院住过。因此要求学习班彻底揭发。

在揭发“黑手”过程中，首当其冲的是赵文成，其次是熊小村。因为曾被、刘打成“黑手”的孟夫唐、李守宪、王盛荣等来我院都是赵文成出面联系的，而熊小村是支持造反派的革干联的组织者之一。

赵文成和熊小村在院革委会成员这个小组作了多次“揭发、交待”，但在工宣队指挥部那里就是通不过。

张立国和郭保安都主动承担了“揪变色龙（刘丰）”和“抢枪乱军”的责任并作了检讨。

新华工被工宣队指挥部说成是湖北最大的“山头”。批“小山头”和“一派掌权”时，郭保安和刘玉民是主要的批判对象。

正如前面说到的，院革委会虽准备参加反复旧运动，但因中央处理及时，我院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卷入。所以，可供揭发批判的内容不多，也上不了“线”。

我院贯彻9·27指示学习班从10月7日开始到11月底结束，办了五十多天。在这五十多天中，通过当事人的检查和相关知情人的揭发，基本弄清楚了近两年来我院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参加学习班的大多数人都受到了教育，特别是加深了对极左思潮危害性的认识。

这次学习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人是陶常仕。

陶常仕，武汉市电车公司工人，当时四十岁左右，从他的言谈举止看，

他可能曾是一个军人。

陶常仕之所以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是因为他虽身为院工宣队副指挥长，但他在学习班中却一直扮演一个打手的角色。此人心胸狭窄，专事整人，且凶神恶煞，军阀习气突出。他以为当上副指挥长就可以目空一切，盛气凌人。对我们院革委会成员，不管是年长的老革命还是我们这些青年学生，他总是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架势，对我们的过错或失误无限上纲，死揪不放。听听他1969年10月24日在院学习班大会上的发言（我保存着当时的记录）：

熊小村，你是革委会副主任，在反复旧中你扮演了什么角色？你说“哪个说我是黑手，那个组织就是黑的”，难道你是黑手，这个组织就一定是黑组织吗？反复旧的两个纪要你是知情的，你是个十级的高干，你的党性哪里去了？你的用心何在？要抓阶级斗争呀，不抓阶级斗争，到时候脑袋掉了都不知道是怎么掉的。决派要推翻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你干革命几十年，这个你都不懂？

按：看，这哪里是对一个老革命提意见，分明是在训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嘛。

刘玉民，你在黄冈政治野营时大搞独立王国，架空政治野营指挥部。当时工宣队刘副指挥长在那里，你根本就不把他放在眼里。我们那次要回来汇报情况，你就是不给派车子，我们只好靠走路回来。六十多里路，我们还是走回来了嘛，我们还是向军区、向指挥部反映了情况了嘛。

想当初，你刘玉民好不威风。你的狼子野心不是很清楚了吗？你不要以为几个副指挥长都是工人！我们要比阶级感情，比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觉悟。你不要以为是个大学生就有什么了不起。

按：刘玉民只是因为没给他派车，让他走了几十里的路，他就怀恨在心，借机报复，足可见其心胸狭窄。何况当时政治野营指挥部也确实是无车可派给他呢。

张建华也是其中一个。在黄冈时往返武汉市多次，你是从哪里听到这些消息的？必须搞清楚。你们到处联系车船把同学们搞回来，神通真是广大。

你们抛出来的那个《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斗争》是一株大毒草。

三万多字，我看了三遍。你们鼓吹不提反复旧口号的反复旧运动。九大开了后，你们还在那里说现在的主要矛盾还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矛盾，你们的用心何在？我建议常委们都好好地用心看看。还有，作为宣传部副部长的张建华，用这样好的纸给大右派白桦编诗集（拿出一本《迎着铁矛散发的传单》），你的立场哪里去了？真的是提不出问题来吗？你和决派就没有一点联系吗？我就不相信。

按：就因我参与写一篇总结文章，给一个诗人出了一本诗集，陶就认为我一定和决派有联系。在另一次大会上，陶公然气势汹汹地对我说：“就凭你的那个报告就可以直接定你为现行反革命”。我至今也不知道他说的那个报告指的是我哪一次讲话，更不知道他凭什么就可以把我定成现行反革命分子。

从1968年9月工宣队进驻华工到1974年工宣队撤离，工宣队中的副指挥长换了若干轮，但陶常仕却一直稳坐副指挥长的宝座。

在历次运动中都会涌现出大量像陶常仕这样的人。从我数十年的经历中发现这种人几乎每一个单位、每一个部门都有。他们以整人为乐，靠整人生存。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不学无术，但在整人方面却称得上是专家。他们靠阿谀奉承、打“小报告”、整人获得上司的赏识并借此飞黄腾达，给社会风气、给国家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贯彻9·27指示后，院革委会已名存实亡，院系两级革委会成员都回到了他们原在的教学班、教研室或科室。和文革初期的工作组一样，院工宣队包揽了全院的一切党政大权。也就是说，在华中工学院，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了。虽然运动还在进行，但运动的方式以至其本质已完全变了。

第二十二章 难忘在咸宁的日子

在湖北武汉，如说到文革就必然会说到新华工。为什么？因为新华工不仅是新派之首，而且也是整个武汉文革、武汉造反派的一面耀眼的旗帜。

也正因为此，湖北、武汉反文革的军政当局都将新华工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做梦都想拔掉新华工这面旗帜。

陈再道们是这样的，后来的曾思玉们也是这样的。

但新华工这面旗帜并不是那么好拔的。

陈再道们为了拔掉新华工这面旗，“七二〇”前把矛头主要对准新华工，以致不惜制造震惊武汉的“7·15事件”。但他们没有成功，不但没有能拔掉这面旗帜，反而落得个身败名裂。

曾思玉们对造反派也是抱敌视态度的。他们开始想借中央5·27指示压垮造反派，拔掉新华工这面旗，但没有成功。因为中央给反复旧的定性是“人民内部矛盾”，更何况新华工只是准备投入反复旧，还没有真正地投入，他们抓不到什么把柄。

后来他们又制造了一个所谓的北决扬假案，试图假借中央的9·27指示打垮造反派并拔掉新华工这面旗。结果是钢派的头头们被他们打垮了，但新华工只伤及皮毛，未伤到筋骨。因为在9·27指示下来的一年前，新华工就在批北决扬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把新华工和北决扬扯在一起。

直到1969年底，曾思玉们才终于找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把我们新华工弄到农村去搞斗、批、改，并把院革委会“化整为零”。

到了咸宁后，工宣队指挥部并没有搞斗、批、改，而是搞所谓的“整党、建党”。

在“整党、建党”中，院革委会成员中的学生代表都回到了原教学班，教师代表都回到了原所在教研室，而党政干部代表则回到了他们原所在机关，参加“整党、建党”。

1970年春节后不久，工宣队指挥部的方向突然变了，院革委会所有

委员一个个被隔离了起来，并对他们进行残酷斗争，把国民党发明的审讯“车轮战术”也用上了。

3月初，工宣队把没有参加北京学习班的院革委会成员和原院党政领导干部集中起来，在咸宁温泉镇办所谓“温泉学习班”。

与此同时，工宣队指挥部在全院师生员工中大搞人人过关，在批“派性”、批“山头主义”的名义下，要求每一个人都要“斗私批修”，彻底和“造反”划清界限。

曾思玉们的这一着确实厉害！此时的院革委会实际上已名存实亡，新华工不但群龙无首，而且一些人被洗了脑。

新华工革委会就这样被他们打垮了，但“新华工”这面旗帜却并没有被拔掉。它在湖北、武汉人民的心目中依然迎风飘扬着，而且还是那样的鲜红，还是那样的灿烂！

一、疏散到湖北咸宁

1969年12月，为适应“准备打仗”的需要，根据省革委会的安排，我院师生员工被疏散到湖北咸宁县马桥公社。工宣队指挥部就设在马桥，我所在的教学班被安排在马桥公社建新生产大队。在此期间，中央一些部门如文化部等的五七干校也先后来到咸宁安营扎寨。

咸宁县位于湖北省东南部，长江中游南岸，是湘、鄂、赣三省交界处。东与黄石市的阳新县交界，南与江西省的修水县、湖南省的平江县接壤，西与湖南省的临湘市相连，北与荆州市的洪湖市隔江相望，与武汉武昌县、鄂城县、大冶县毗邻。咸宁是南下北上的主要通道，素有“湖北南大门”之称。

咸宁县处于幕阜山脉向江汉平原过渡的地带，地势东南高，西北低，山地、丘陵、岗地、平原兼而有之。我们所在的马桥公社属丘陵地带，风土人情及民居建筑与我的老家湖南宁远相近。

我们来到咸宁时正值冬季，是农闲时节。我们这次下农村和以往去农村不同，不是来参加劳动，而是来搞学校的“整党建党”学习。

我在咸宁呆了十个多月，从1969年12月初到1970年9月下旬。因这段时间的日记已丢失，加之时间已过去了几十年，多数事情都已淡忘

了，但有三件事却让我终生难忘。

一是我在咸宁认了“老庚”，二是体验了学习班的“车轮战术”，三是参加了“咸宁温泉学习班”。

二、老庚

“同庚”这个词大家都不陌生，但对“老庚”这个词很多人就可能觉得陌生了。其实在两湖和江西这个词是普遍使用的，它指的是两个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人相互间的亲密称谓。事实上，只要志趣相投，也不一定非同年同月同日生，只要是同年出生的就可以相互认“老庚”了。在我们老家，“老庚”间的关系往往比亲戚间的关系更加亲密与和谐。

刚到咸宁时，白天都是学习、讨论。学习的内容主要是毛主席关于整党建党的论述和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同时接合实际进行讨论。晚上和星期天一般不安排学习讨论，可自由活动。

我年轻时喜欢交友，也喜欢探讨有关社会问题。我经常利用晚上和星期天的闲暇时间去老乡家串门子。

一个星期天早上，我独自离开住处，准备去前几天我们班同学演过“三句半”的村子找人聊聊。

这是一个小村子，在一个小山脚下，只有七八户人家，离我们住的村子不到一里路。

走近村子，看到一个老者正坐在屋前的石阶上晒太阳。他六十多岁，看上去身板很硬朗。他眯缝着眼，嘴角微微上翘，露着微笑。嘴里还不时哼着什么，走近了才知道他正在听收音机里播放的《红灯记》，并学唱李玉和的唱段。他脸上的表情安详、和谐，给人友好、慈善的印象。

看到我向他走来，开始稍稍有点儿惊异，但接着就表现出开心的样子。他向我点了点头，示意我走近他，我立即上前和他打招呼。

听说我是武汉来的大学生，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他很高兴。他先问我是哪里人，父母现在怎么样，兄弟姐妹几个，我一一作了回答，告诉他我家也在农村，我是一个农民的孩子。

听了我的回答，老人显得有些兴奋，话匣子很快就打开了。从谈话

中我知道老人姓窦，在这里住了几十年了，是地道的本地人。他说他们这个村和我们住的那个村属同一个生产大队，田地都连在一块。他还告诉我说他的儿子是这个生产大队的大队长，年纪和我差不多。当他问到我的出生年月时，我告诉他我属羊，是癸未年腊月初七出生时，老人听了后双手一拍大腿站了起来，大声说：“太巧了，我儿子也是癸未年腊月出生的，看来我们真是有缘，有缘。”说着，拉着我就进了他们家的堂屋。

进门后他兴奋地朝在里屋的老伴喊道：“老婆子，快出来，贵客到了。”

窦大妈应声出来。见了我连声说“欢迎、欢迎”，并忙着为我倒水沏茶，并拿出一大盘糖果和花生来让我吃，真像是来了客人一样。

当窦大妈听说我也是癸未年腊月出生时更是兴奋，连忙说：“好呀，好呀，我儿子和你年龄一样大。”

大妈年纪五十出头，宽脸，短发，眉宇间显着慈祥。她上身着紧身短棉袄，腰间系着围裙。看她的装束和屋内收拾的情况就可知道大妈是一个干脆利索而又勤快的人。

我们聊得很愉快。我就像回到了家一样。眼看十一点多了，我起身告辞。但大妈说什么也不让我走，要我留下来吃中饭。说儿子马上就要回来了，要我见见她儿子。说着转身就进了厨房准备午饭去了。

我和窦大叔接着又聊起了今年收成的事。就在此时，门外传来了脚步声。大妈高兴地说：“儿子回来了，儿子回来了。”

不一会，一个英俊、干练的小伙子走进了堂屋。

我起身上前迎了过去。我们相互作了自我介绍。他说他叫窦志明，现是生产大队干部。他说他很佩服华工学生，希望能有机会去我们学校看看。

寒暄了一阵，大妈叫开席了，大家入席。这虽谈不上是什么大餐，但有鱼、有肉、有豆腐，摆了满满一大桌，比起我们学生食堂来说可真算得上是盛宴了。

看到我和志明很投缘，大妈很是高兴。于是指着我和志明说：“难得你俩是同年同月生的，又很谈得来，你们就认了老庚吧，今后也好多走动走动”。我俩都高兴地同意了。就这样，我有了一个老庚。

此后，我一有空闲就上老庚家闲聊。老庚不在时我就帮大妈做点什么。我每次去大妈总是高兴异常，每次都要为我下一大碗面条，而且总要在面条下埋两个荷包蛋。

大妈蒸的蛋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真是太好吃了，此前我还真没有吃过这样好吃的蒸鸡蛋。有一次我问大妈为什么她蒸的蛋特别好吃，她笑眯眯地说：“这很简单，只要在搅好的鸡蛋里滴几点石灰水再蒸就行了。”

去的次数多了，我和老庚及他们一家人相互间的友谊就更深了，去到他们家我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一样感到温暖与和谐。

我和老庚一家的接触仅有三个月。但老庚一家人的音容笑貌我却永远也不会忘怀。这不仅是因为两个老人对我的热情和关怀，还因为老庚让我逃过了接下来我要说到的一场劫难。

1970年10月我被分配到云南，我和老庚一直保持通信联系。一年后，我成了“云南省四个五一六分子之一”，为了不连累老庚，终止了和他一家人的联系。十几年后我再要和他们联系时已经不可能了，因为人迁事过，再也无法联系上了。这成了我终生的一大憾事。

三、体验“车轮战”

1965年下学期我曾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整党开始后不久，同学们选我当我们系的“整党积极分子代表”，这说明系工宣队和同学们对我是信任的。1969年春节后不久的一天，系里准备召开整党动员大会，要我作重点发言。

我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结合我个人的体会认真做了准备，发言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我结束发言时，全场响起了长时间的热列掌声，这让我深为感动。

也许这不寻常的掌声刺激了工宣队副指挥长陶常仕的神经（他当时分管电机系），因为他认为我是一个“有自己完整的思想体系的人”，并断定我与北决扬一定有关系。在他看来，群众那长时间的热列掌声正是我蛊惑人心的结果。

就在我院的整党开始不久，“一打三反”开始了，我的命运由此彻

底被改变。

我在系里整党动员大会发言后的第三天凌晨两点多钟，我突然被我们班的一个同学从睡梦中叫醒，说是工宣队有紧急事情找我。我立即起床，睡意朦胧中跟着来叫我的同学来到村子里的一个仓库里。

我一进门就发现气氛不对。只见屋里已有十来个人，其中有我们班的工宣队员陈桂元师傅，有我们班（六班）和七班、八班的同学（发配电专业），个个表情严肃。更让我吃惊的是，屋里还有刚贴上去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横幅。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正准备开口问，工宣队陈桂元师傅说话了。他直截了当地说：“今天叫你来，是要你交待你是怎样攻击敬爱的江青同志和林副主席的！”

这让我莫名其妙。“我什么时候攻击江青和林副主席了？你说这话是要负责的。”我未加思索，脱口而出反问道。

接着响起了口号声：“张建华必须老实交待！”“誓死保卫江青同志！”“誓死保卫林副主席！”……

这一下我的睡意完全没有了，脑子飞速地转着。很快我就明白了自己的处境。我被工宣队隔离审查了，而且来势凶猛，我必须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他们不断地追问：“你是怎么恶毒攻击江青同志和林副主席的？”我的回答总是：“我不可能攻击江青和林副主席，我不可能有那种思想和动机。”当他们再问时，我则以沉默相对，闭着眼睛，静静地等待着他们下一步的动作。

天亮了，陈桂元师傅把人都叫到旁边的一间房子里。我不知道他们商量了什么。过了一阵，回来了4个人，其他人都回去睡觉去了。

吃早点的时候到了，有人给我们送来了馒头和稀饭。

早饭后，4个人继续重复问我他们已问了一晚的问题，而且声音愈来愈大。但我不予理会。

4个人轮流着念毛主席的语录，从上午到下午。我静静地听着。

晚八点，陈师傅带着4个同学进来，而追问了我一天的4个同学都出去了。显然，他们是要轮班来对付我，进来的人是来“接班”的。

“听说你一天都没有吭声，你是怎么想的？我们是为你好，把问题讲清楚了就行了，你不要有抵触情绪。”陈师傅说。

“我不可能反对江青和林副主席，这是大家都清楚的。”我还是那句话。

“指挥部不会凭空要我们找你的，更不是我们哪个要和你过不去。你好好想想，你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和谁说了攻击江青和林副主席的话。”陈师傅说。

接着又是念语录。我一直沉默着，一声不吭。

天亮了。看到我一直沉默不语，陈师傅对我的沉默忍不下去了。他说：“提醒你吧，你和谁讲过《东周列国志》里的故事？”

他这一“提醒”，我似乎想起了什么，我努力地回忆着。

《东周列国志》里“烽火戏诸侯”的故事，我只在和 ZC 分析形势时因话说话讲过。当时我们分析了各种可能，也曾意识到当天的分析传出去的危险。莫非是 ZC 交待了我们那天的谈话？

ZC 的女友是我们系的，就在上周的星期天，她约我一起去看望 ZC。她说 ZC 来咸宁后不久就被他们系的工宣队给隔离了，平时不给见外人，只有礼拜天可以见。

ZC 的驻地离我们二系驻地不远，我早就想去看望他了。因此，当 ZC 的女友提出一起去看 ZC 时，我就欣然同意了。

当我看到 ZC 时，见他消瘦多了。他的神情似乎有些恍惚，眼神显得有些呆滞。说话的声音也变了，变得有些嘶哑。

才两个多月没有见面，他就变成了这个样子，显然他受尽了折磨。为此，我心中不免生出些许悲凉。ZC 的女友手上在收拾 ZC 的床铺，两眼却满含热泪，说话的声音也有些颤抖。可以想象，她的内心正经历着痛苦的煎熬。

因有其他人在旁监视，我没有问 ZC 被隔离审查的事，只聊了一些家常。临别时我们互道保重。出门时，我说了一句：“我相信你是一棵大树”。

这是我早就想对他说的话，我相信他是能听懂我的意思的。

想到 ZC 被折磨后的情景，他已交待了我们那次谈话的内容是可能

的。我反复思考着他如果交待了此次谈话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

一个上午过去了。虽然审查组不断念语录和呼口号干扰了我的思考，但我还是想清楚了，我决定“交待”我们的那次谈话。

我当时坚信：江青的“要文攻武卫”及林彪的“大树特树”确实是错误的，历史将证明这一点。作为一个男人，说了就说了，要敢于承担。再则，ZC即使交待了我们那次谈话的全部内容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那毕竟是我们私下里说的，是因话说话提到了江青和林彪，我们并没有“攻击”的主观故意，这是客观事实。难道他们还能因此把我们打成北决扬不成？

审查组的人听说我要“交待”，很快就取来了纸和笔。

午饭后，我开始交待我们那次形势分析时的谈话内容。

“交待”中，我承认那次在谈到“要文攻武卫”的口号在全国引起极为恶劣的影响时，我说过“江青提出‘要文攻武卫’是犯了历史性的错误”。承认了我对江青在文革中的一些表现确实有些反感。承认我给这个朋友讲了“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并引申开去，说了“从历史上看，女人往往是最坏事的”这个话。承认在谈到批杨成武的“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权威”时，我说了“搞个人迷信其实是林彪搞起来的”，并说了“林彪可能就是睡在毛主席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同时，我还承认九大后我曾对江重初说过“将林彪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写入党章是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在这个“交待”中，我特别强调上述有关林彪和江青的谈话是在分析局势时说的，是出于对时局的担忧，绝不存在我们要攻击谁。因为既然是分析形势，当然要分析各种可能性，当然要从正反两方面分析一些现象的因果关系。

审查组的人看到我的“交待”后都兴奋异常。陈师傅来“接班”时看了我的“交待”后，拿着材料就往门外跑。显然，他这是要连夜去工宣队指挥部报告去了。

我原想他们拿到我的“交待”后会让我休息了，其实不然。当第三批人接了班以后，非但没有让我休息，而且气势还加码了，他们又是念语录，又是呼口号，说是一定要压压我的“嚣张气焰”。

他们要我交待我住西七舍时和哪些人常在一起，搞了些什么活动。还不时念一些材料“提醒”我，说某年某月我在什么地方有个什么讲话，参加的人有哪些。他们说的有时间，有地点，有鼻子有眼，好像确有其事似的。

我年轻的时候记忆力是很强的。凡我参加的会、说过的话一般不会很快忘记。何况他们说的事情相隔的时间并不长。当他们说到我某年某月某日在东一楼某阶梯教室作了一个什么报告时，我终于明白了他们的意图，他们这是在搞诈供、诱供。他们是要把我和红反团联系起来，进而证明我与决派有关系。

东一楼阶梯教室我只在一年级上大课时进去过，文革中我从未去过。由此我可以肯定他们要我交待的那些事根本就不存在，他们念的那些所谓材料完全是编造出来的。

我从小就养成了不畏强权，敢于碰硬，敢于担当的性格。我做过的事或说过的话，有错误我决不会推卸，天大的事我也敢于承担。而我没有做过的事，没有说过的话，有功我不会去抢，有过我也不会去揽。我决不会为了解脱自己而诬陷他人。

面对眼前气势汹汹的审查组，我打定主意：继续以沉默来对付他们。不管他们说什么，吼什么，我就两个字：不理。心想：“我倒要看看你们到底是要干什么。”

这天一整天我没有再说什么。晚饭后陈师傅回来了，审查组又换了一批人。这一批人没有再问我和决派的关系问题，而是要我交待湖南调查、反复旧和参与写《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斗争》一文的问题。

我说：“这些问题在学校贯彻9·27指示学习班时我都讲得很清楚了，现在没有什么可交待的”。说完，不管他们吼什么，我都保持沉默，而且闭上了眼睛。

我已三天三夜没有睡觉了，我实在是困极了。开始我还依稀听到他们在说什么，但很快就什么也听不见了。我全身发软，脑子昏蒙。一会儿觉得自己好像躺在棉花堆中，软软的，很舒服；一会又觉得自己轻轻地漂浮在白云上，周围静悄悄的。

我靠在桌子上睡着了。

迷迷糊糊中我觉得有人把我拉了起来，两个人架着我让我站起来，有人在呼口号……。

在我被隔离的第四天傍晚我醒来了。睁眼一看，我躺在自己的床上。同室的一个同学见我醒了，走过来说：“你已整整睡了一天了”。

我惊奇地问道：“他们怎么会让我回来睡？”

“今天上午生产大队的窦大队长来了，他说是你的老庚，要找你。工宣队没有告诉你他被隔离审查的事，说你去指挥部去了。可能就是因为窦队长来了，你才被他们放了回来。”同室的同学回答说。

啊，原来是老庚来找我了。老庚确实是我的贵人。要不是他来，还不知道审查组的车轮战要到哪天呢！他们的车轮战可真厉害，三天的功夫就几乎让我散架了。

真要谢天谢地。还好，审查组也不敢轻易得罪贫下中农。

工宣队指挥部并没有停止对我的审查。两天后的晚上，我被转移到了另一个村子。

这个村子离我们原驻村子不远，不到一里地，同属一个生产大队。

我被安排在一“五保户”家。主人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婆婆。

审查组再没有使用他们的车轮战术。他们只是把我关在老婆婆家不让出门，一日三餐也让人送来。

老婆婆不知道我为什么被工宣队审查。但她对我很好。每天无事就陪我聊天。

一天，老婆婆突然问我：“你和窦队长是老庚？”

我说：“是呀，你是怎么知道的？”

她说：“我是听人说的。村子里好多人都知道。孩子，你别怕。你是贫农家的孩子，大家会保护你的。”

前面说了，工宣队进院以后我学会了抽烟。这时我被关起来与外界完全隔离了，心情十分郁闷，烟瘾也就更大了。但我不能出门，买不了烟。老太太看到我烟瘾来了难过的样子就主动给我去买烟，还顺带拿来了火柴。

审查组的人看到我桌上有火柴，收走了。但很快就又有一盒摆在了我的桌子上。

当时，农村在搞清理阶级队伍，搞批判大会。

一天，我听见外面有人在吵，乱哄哄的。我问婆婆外面吵什么，她说：“原定今晚大队要开批判会，斗地主。你们工宣队的说要把你拉上去陪斗，队干部们不同意，说你是贫农的孩子，绝不能和地主站在一起批斗。因此，双方就吵起来了。”

结果，大队里的批判会没有开成，地主也不斗了。我“陪斗”的事自然也就没有发生。

我心中十分明白，这一切都是老庚从中保护我的结果。

我的体力很快就恢复过来了。审查组要我上山砍柴。这个我很乐意。因为我小时候经常上山放牛、割草、砍柴，像玩儿似的。更何况山上空气好，还有审查组的人陪着我。心想：如果砍柴是对我的惩罚，那他们不一样也要砍柴，不是一样在惩罚他们自己吗？

3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审查组的人突然要我收拾行李。我知道这是又要我“搬家”了。

我扛着行李上了车。当我回头看到房东老婆婆正向我摇手时，我一时语塞了，眼泪不知什么时候流了下来。心想：这是一个多么好的婆婆啊，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她的，尽管我一直不知道她的名字。

汽车路过老庚家时，我没有见到老庚和他的父母。我凝望着老庚家的房子，默默地祝福老庚一家平安幸福。心里想：“以后我一定会回来看望你们的。”

四、咸宁“温泉学习班”

汽车在温泉疗养院前停了下来。我们下了车，步行约二十分钟到达了一个村子。

这个村子不大，只有一二十户人家。与此前住过的村子是依山而建不同，这个村子周围看不到山，就建在田坝中间。

我被安排住进了一农户家的一间耳房。房子不大，大概就五六个平方吧。但里面收拾得还干净，而且有一个窗子。从窗子向外看可以看到一些民房，也可以看到大片已收割了的农田。

在接下来的这六个月中，我是在孤独、郁闷中度过的。

在这半年的时间内，除专案组的5个人外，我没有和其他任何人有过交流，就连我现住的这个村叫什么村，房东家有几口人，男女主人公都是谁，我一概不知道。这也许是因为专案组的人事前对这家人有所交待，要求他们不要与我接触，或许这本来就是一套公房，原来就没有人住。

刚来到这里时，审查组（应该说是“张建华专案组”）的人告诉我是来参加“华工温泉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但这个“学习班”似乎和通常的“学习班”完全不同。既没有人向我宣布这个学习班的具体任务和主题，连学习班的名称也没有。贯彻5·27指示时的学习班叫“学习贯彻5·27指示学习班”，贯彻9·27指示时的学习班叫“学习贯彻9·27指示学习班”，我负责举办的解放朱九思的学习班就叫“解放朱九思学习班”。

这个学习班的“学习”方式和往常的学习班不一样。通常学习班的对象都是在一起学习文件或毛主席著作，一起对具体问题进行讨论或批判。而这个学习班采取的则是每一个审查对象隔离在一个小组内，后来才知道，像我这种作为审查对象的一共是10个人，也就是共有10个小组，每个组配有3—6名专案人员。

据说10个组又分在三个“点”上，一个点设在马桥，一个点在白墩，一个点在温泉，统称“华工温泉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我不知道我这个组属于哪个点，我想属白墩这个点的可能性大。因为马桥我曾去过，那是公社所在地，工宣队指挥部就设在那里，我住的地方显然不是马桥。而温泉就更不可能了，因为温泉是部队疗养院所在地，都是现代建筑，那里环境恬静而优美。

我们这些对象相互间没有任何联系，连面都见不到。显然，这个学习班其实就是工宣队指挥部搞的“清理阶级队伍专案组”。

我不知道这个学习班具体是由谁负责主持的，也不知道参加这个学习班的对象到底有哪些人。

来到学习班后，每天上午都是由陈桂元师傅领着学习毛主席著作和相关文件，下午就是要我作检查或写交待。

他们要我检查和交待的与在建新大队时一样，即“攻击中央首长”问题、“湖南调查”问题、“写《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斗争》”问题、

“反复旧”的问题。这四个问题其实我已检查交待多次了，但是他们总是不厌其烦地要我反复检查反复交待，试图从我先后的检查和交待中找出什么不同的地方。一旦找到了不同点，如时间、地点或相关人不一致，他们就会批我不老实，就会“深挖”，追究个没完。

我作检查后的批判会常会变成辩论会。当他们无限上纲时我会据理力争。如他们说我“攻击中央首长”，我说不能认为是攻击，因为攻击是有行动的，我没有任何攻击行动。他们说我去湖南调查是要为刘少奇翻案，我会说搞调查是毛主席提倡和要求的，不能因为我们去了花明楼炭子冲就是为刘少奇翻案，如按此逻辑，我们也去了韶山，难道是反毛主席？他们说我们写的“两个伟大”（即《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斗争》）是搞“不提反复旧口号的反复旧”，是“大毒草”，我就会争辩说：“这篇文章出来后，指挥长们都看了，当时个个都说好，难道指挥长们也同意反复旧？”我还搬出刘昆山指挥长在“学习贯彻9·27指示学习班”上的讲话来反驳他们。

我当时的心情真是郁闷极了。文革中我自问心中无愧，我想不通工宣队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相信自己在文革中没有私心，而且在是大非问题上我都认真、独立地思考过。我没有介入派性斗争，在院内，我既不是聂派，也不属郭派。在社会上，武汉七二〇事件后，我没有介入钢新之争。我立场坚定地反对抢枪和武斗，并因此被斥之为“和平主义者马丁·路德·金”。在整个文革中，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没有伤害过任何人，包括那些文革初曾伤害过我的人。文革初我曾参加过很多辩论会，但我没有参加过任何一次对老师和同学的批斗会。我坚信自己在文革中是没有犯大的错误的，是对得起党和人民的。

好在到了温泉学习班后，工宣队还是执行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审查组的人既没有对我再搞什么车轮战，也没有因我和他们辩论而有粗暴的行为，连“罚站”的事都没有发生过。这是我应该感谢工宣队指挥部的。事后我常想：如果他们当时真动粗了，我会怎么样？根据我刚烈的性格，后果肯定是严重的。

到学习班两个多月后的一天，“华中工学院现代京剧演出团”来部队温泉疗养院大礼堂作慰问演出，工宣队指挥部通知我们去看。直到

这时，我才知道和我一样作为对象接受审查的总共有 10 个人。

和我一样，所有来看演出的对象都有五六个人“陪同”。我们这些对象是先后入场的，被安排在不同的区域内入座。因此，我们这些对象之间不可能发生任何接触和交流。

这 10 个人显然是我院工宣队指挥部审查中的重点对象。据后来曾参与审查我的一个同学说，这 10 个人中包括原院党政领导人朱九思（院党委书记）、熊小村（院党委副书记，院革委会副主任）、邱静山（副院长）、宋驹（院党委成员）及院革委会成员聂年生、我和原红司（新华工）的宣传部副部长柳书伦等。

如果说群众组织中的代表人物在七二〇事件后因受极左思潮影响而受到审查可以理解的话，我不明白为什么像朱九思书记、熊小村副书记等这些老革命，工宣队指挥部也要对他们进行再审查？

我曾主持过“解放朱九思学习班”，我对朱书记的历史和文革中的情况是了解的。我不知道在院革委会同意解放朱九思同志并报告给了工宣队指挥部以后，工宣队为什么还要对朱书记进行再审查。

原院党委副书记熊小村是经中央审核后结合进院革委会的。他虽与革干联曾有一定的关系，但他会有什么问题呢？指挥部为什么也要对他进行审查？

1970 年 6 月初，中央决定分配在校的六九、七〇届大专院校毕业生。参加院审查组的学生除留校的外，都回本班参加分配了。指挥部适时补充了审查小组的人员。审查我的小组仍保持 4 人，他们分别是工宣队的陈桂元师傅、我同班同学 × ×、院基础部外语教研室的廖老师和史老师。

廖老师，眼睛深度近视。虽只有五十多岁，但头发已经花白稀疏，甚至有些秃顶了。他性情温和，未见过他大声与人争论，即使对像我这样的审查对象也是和言细语，绝没有恶言训斥。给人的印象是友善、慈祥的。

史老师是个三十多岁的青年教师。他身材高大、健壮，活力四射。也许因为廖老师和陈桂元师傅都是慢性子的原因吧，史老师对我的态度也很友善，在相处的三个多月中我们之间没有发生过任何冲突。

1969 年 8 月初，工宣队指挥部终于决定结束对我的审查，可以分配

工作了。我自然十分高兴。但在填毕业分配表时我和专案组发生了矛盾。

在填“自我鉴定”一栏时，专案组要我承认在文革中“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我不同意。为此，双方僵持了半个多月。其间，工宣队陈师傅曾威胁说：“你不承认也可以，那你就甭想分配工作了。”

同学们都离开咸宁走上了工作岗位，而自己却仍在咸宁的院学习班接受审查。夜深了，“你不签字就别想离开马桥”的呵斥声仍不绝于耳。为表心志，我即作了一首小诗以自勉。

松梅本色

1970年8月于湖北咸宁马桥

雷劈青松松更翠，雪压冬梅梅更红。

松梅本色皆如此，堪笑檐下可怜虫。

直到9月底，廖老师出面找我谈话。他说：“个人鉴定和组织鉴定是不同的，关键是组织鉴定。个人鉴定你上纲高一些，表示你对问题有认识，对你有好处。组织结论会很慎重的，绝不会对你有任何伤害，也许组织结论好得让你不敢相信。对你的分配，指挥部还是按原方案进行嘛，你还是被分配到绝密单位嘛。组织结论到时是会和你见面的，你看了后就知道了。”

我相信了廖老师的讲话。因为党的政策历来是“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嘛。于是，我在个人鉴定栏中承认“文革中犯有政治错误”。

9月27日，我终于离开了咸宁踏上了去昆明的火车。

送我上火车的是廖老师和史老师。临别时，廖老师一再叮嘱我说：“你很聪明，也很正直，组织上是信任你的，今后你在社会上可能担任更重要的工作。你的主要问题是要力戒骄傲，任何时候都不能骄傲，切记！”另外，廖老师还特别关照说：“昆明是高原地区，你去后可能有高原反应，要注意保重身体，不要太劳累。”

当时正值盛夏，气温高达38°C，车厢内更是闷热难耐。为了让我感觉舒服一点，廖老师特地在车站为我买了一把大蒲扇。这令我十分感动。

在咸宁的日子是难忘的。难忘建新大队的乡亲们，难忘老庚一家人，难忘在这里经历的车轮战及没完没了的审查。

由于这半年孤独和郁闷的生活，我原本健康的身体却感染上了肺结

核和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在后来的几年中饱受病痛的折磨。

参加工作后，在和同学们谈起我在咸宁的境遇时，同学们都说我是幸运的，说工（军）宣队把我弄到温泉院学习班，实际上是保护了我，如果我当时留在系里，还不知道要受多大的罪呢。

原来院工（军）宣队在“一打三反”期间，完全采用了四清和文革初工作组的那一套。他们利用党、团组织，以“斗私批修”的名义，大搞“无情斗争”“人人过关”，以致不少无辜群众被迫选择了自杀。在那半年内，我院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远远超过文革武斗时期（1968年6、7月）死亡的人数。

其中五系（船舶工程系）和基础课部整得最凶。所谓的车轮战术就是五系的工（军）宣队发明的。文革期间与我关系最为密切的江重初和他们班的刘海宾（五系革委会成员，我也熟悉）就被整得死去活来。

我们二系（电机工程系）搞得还算平和的，但即使这样，还是有人被逼想自杀。其中就有我认识的一个同学，因文革前和文革初说了一些“怪话”，多次检查都过不了关。在一个深夜，他独自离开驻地，来到一片树林中自杀。要不是上吊的绳子两次都断了，他早就不在人世了。

“一打三反”是武汉文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从同学们对“一打三反”期间一些事例的讲述中，我确实认为我去了温泉院学习班还真是幸运的。

“一打三反”的原意是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而曾思玉们却移花接木，把“一打三反”变成整造反派的“两清一批”（清五一六、北决扬，批资产阶级派性），变成收拾新华工革命委员会、打击华工造反派的运动，真是可悲、可耻！

这场主要由湖北军人上层领导实施的“一打三反”，完全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他们和原体制内的走资派一起，在城市和农村掀起了又一场“镇反”运动，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在城市，首当其冲的是群众组织的头头，造反派的各级负责人几乎毫无例外地被审查、被批斗。

毛主席曾明确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我们这一代人从切身体验中都有这样的一种看法，即“上面的政策是好的，但到了下面就完全走样了”。为什么历次运动都会造成“扩大化”？

文革篇

重要原因之一应该就是作为执行者的干部队伍政治素质差。他们要么是不能正确理解中央的政策，要么就是为自己的私利（邀功、报复、泄私愤等）而胡作非为。这种情况越到下面越糟糕。文革中办学习班是常有的事，一般来说，中央办的学习班掌握政策比省级办的学习班要好，省级的又比地市级的好的，到了县处级及以下，很多政策就完全变样了。

“一打三反”与“清理阶级队伍”交叉进行。从网上看到的有关资料上说，文革中“清队”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远远超过了武斗时的伤亡人数，其负面影响是巨大的。

第二十三章 《寄影书》

我分配到昆明后，武汉的曾思玉们并没有放过我。就在我全身心投入工作并很快取得成绩的一年后，华工工宣队指挥部给云南省委组织部寄来了关于我文革问题的材料，我成了“云南省四个五一六分子之一”。

还好，当时的云南省委并没有把抓五一六分子作为运动来搞。我虽被列为“五一六分子”，单位也开了对我的批判大会，但就像一阵风一样很快就过去了，对我没有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对我造成致命伤害的是邓小平复出后有关造反派的政策。相关情况我将在下一篇《改开篇》中具体记述。

一、在汽车机械修理厂当工人

我于1970年9月29日到云南省铁路建设指挥部报到。当时的省铁路建设指挥部就在昆明东风西路小西门附近的省供销社大院内。

接待我的是组织部部长杜芳。杜芳，五十多岁，是个老革命，丈夫是老红军。她看了我的派遣令后很高兴，欢迎我的到来。她给我简要地介绍了云南省铁路建设指挥部的情况。她说：铁路建设指挥部是为适应云南边疆建设、发展地方铁路而组建的。指挥部的第一任指挥长是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军区司令员鲁瑞林，现任指挥长是省军区参谋长崔建功。指挥部下有两个工程处和一个汽车团。工程一处以桥隧工程为主，工程二处以土方工程为主，两个工程处的基地都在安宁白砂河。汽车团的主要任务是负责配合铁路建设的交通运输和后勤保障。汽车团下有三个汽车连和两个厂，即汽车机械修配厂和枕木防腐厂，基地在昆明西郊的长坡。铁路建设指挥部当时共有职工四千多人，是一个有两级党委的地师级单位。

杜芳告诉我说，分配到铁路建设指挥部的大学生总共有二十多人，其中有我们华中工学院两人，北京工业学院两人，北京中医学院两人，北京邮电学院两人，上海医学院两人，广州医学院五人，南京工学院一人，重庆建工学院五人。这二十多个大学生现都安排在汽车团，我也去汽车

团报到。她说我是最迟报到的，比先期报到的晚了三个月。

第二天，即1970年9月30日，指挥部派车将我送到了汽车团所在地长坡。下了车，在汽车团组织科报了到。组织科长王静（女）说分配到汽车团的二十几个大学生，除赵正洪、李素英两人安排在团机关外，其他全部分在汽车机械修理厂。随即她就把我带到了汽车机械修配厂厂长（连长）办公室。

因是上午刚上班的时间，两个厂领导都在。王静向厂领导简要介绍了我，随后厂领导也向我作了自我介绍，并表示欢迎我来修理厂工作。

当时修理厂的厂长（连长）是邓和生，云南昭通人，指导员是陶正光，云南祥云县人，他们都是复员转业军人，也都是在铁路建设指挥部组建时从昆明总站调过来的。说话间，陶正光突然说：辛开年不也是你们华中工学院来的吗？说着，就叫人去找辛开年来。

辛开年知道我也是华工来的，自然非常高兴。他把我领到他的宿舍，并要我就和他住在一起。我非常乐意。他说他6月底就来了，是三系（动力系）热工专业的，和我同一届。

在校时我并不认识辛开年。但三系的人我认识不少，特别是刘玉民、左玉明、赵嘉林、李纯植、王能秀等，文革中或文革前我们就有很多接触。我问他三系我最熟悉的几个人的情况，他都作了回答。

吃过中饭，辛开年领我在长坡山头转了一转，并逐一给我作了介绍，让我对环境有了初步的了解。

长坡，地处昆明西山区高峣公社排连大队境内，离昆明市区约十五公里左右。汽车团团部和我们修理厂都在长坡这个山头上。而三个车队（连）和枕木防腐厂都在碧鸡关坡脚下，离我们也就一公里左右。在长坡周围两公里范围内，西边有省结核病医院、市精神病医院、252油库和昆明化工厂等单位，北边有属昆明钢铁公司的桥钢厂（轧钢厂）。

当时长坡没有通公共汽车，但因滇缅公路、成昆铁路及通安宁、一平浪的米轨（窄轨）铁路都经过长坡，而且小火车在长坡还设有车站，因此出入交通还算方便。

云南铁路建设指挥部是国家为加快三线建设而组建的，实属会战性质的机构。工程一、二处是从铁道部几个工程局抽调队伍组成的，而我

们汽车团则是以昆明总站二、六车队为基础组建的。正由于是会战性质，当时我们汽车团是按部队要求进行编制的，三个汽车队和两个厂都称“连”。三个车队分别称为汽车一连、汽车二连、汽车三连，我们汽车机械修配厂称“修理连”，防腐厂叫枕木防腐连。厂长都称连长，支书称指导员。

正由于铁路建设指挥部是会战单位，在“先生产，后生活”的原则下，职工们的生活条件是很艰苦的。不说汽车团五六百多职工没有住房，就是团部和连部的办公室也没有一间正规的房子。团机关办公用的是一排五间“干打垒”平房（是原排连生产大队副业用房）。我们修理连稍好一些，有一个土基平房围起来的院子，另有两排土基平房。院子内有平房十四间，除连部办公用房外，医务室占了三间，材料室占了三间，单身老年职工占了三间。两排土基房一排用作职工食堂，一排为年纪大的双职工住房。

为了解决两百多职工的住房问题，团部买了五顶大帐篷，每个帐篷可住6—10个人，其他一百多人则是自己动手搭工棚。材料就是木料、油毛毡和草席。先用木料搭成屋架，在屋面上铺上一层草席，再铺上油毛毡，压上砖头以免被风刮跑。棚内用草席隔成若干间后，工棚就算搭建完了。

我和辛开年住的这排工棚就在食堂的对面。我们住在左起第二间。第一间住的是两个女生，一个是R，一个是F，都是返城知青。R的父亲是指挥部机关的会计，F的父亲是部队的一位首长。第三间住的是材料室的赵承斌师傅，他睡觉时的鼾声在长坡山头上可是数第一的。

除住房问题外，生产、生活用水也是个大问题。长坡山头上没有水源，更没有自来水。虽然团部每天都用油罐车到高峽拉水来维持基本需要，但要想洗个澡，就只能等星期天上昆明泡澡堂了。双职工的生活用水只能下到山脚去农村的水井挑。附近没有农贸市场，买米、买菜只能等到星期天集中乘生活车到高峽去买。

当时我的收入还不错，按国家标准，大学生分配后实习期间是每月46元，相当于工人四级工的工资，一年后转正，工资是54元，那就相当于五级技术工人的工资了。我每月除给父母寄20元的生活费外，剩余

的已够我花了。

我报到时铁路指挥部正在修建由广通至昆明海口中谊村的铁路支线。工程一处和二处的施工基地都搬到了罗茨。因当时建设材料和生活用品都主要靠公路运输，汽车团的工作十分繁忙，除来修配厂搞二级以上保养的车辆外，驻地基本上看不到车，全部都去了工地。

当时铁路建设指挥部有各种车辆两百多辆，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载重汽车。我们汽车团的一百多辆车都是解放牌和原苏联的“吉尔 151”四吨载重车。由于车辆多数都比较老旧，加上超负荷运行，损伤自然严重。根据指挥部的要求，凡指挥部所属车辆，三级保养以上都归我们修理厂负责，汽车团所属的车辆除例行保养和一级保养由车队自己负责外，二级以上保养都由我们修理厂负责。因此，我们汽车机械修理厂的工作也就显得非常紧张，各修理班组几乎都在加班加点地工作。

按说要完成指挥部下属两百多辆车的维修保养对于一个修理厂来说不是很困难，不应该加班加点。但当时的工作环境和生产条件实在是太差了。

首先说工作环境。当时根本没有厂房，生产车间都是用油毛毡搭成的。周围都是农民的旱地，而我们厂就建在长坡山头上，雨季是出门一脚泥，旱季（10月到第二年6月）出门一身灰。

再说工作条件，即生产设备和技术手段。当时基本上没有什么检测和修理设备，连拆装、检验用的防油槽都没有。保养和修理过程中的拆装、清洗、调试全部要靠体力和经验。

当时职工的生产热情都很高，靠体力的活是不成问题，但技术和经验却不是每个人都具备的。因此，修理过程中的返工是经常发生的。这就大大地延缓了修理的质量和效率。

尽管生活的环境很差，技术条件也相当落后，但当时职工们的生产热情还是很高的，大家都在为第一线的生产任务紧张地忙碌着。

分配到修理厂的大学生都安排到了生产班组。我和宋文忠（北京工业大学来的）被分配在牙箱班。牙箱班的职责范围包括前、后牙箱（变速器、差速器）、传动轴及翻斗车的液压系统。除我和宋文忠外，我们班还有班长郑达荣（砚山县人）、副班长张学怀（绿丰县人）、朱振忠、

王玉贵、曾守富 5 位师傅。

我对毛主席关于干部下基层参加劳动，首长下连队当兵和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主张是非常赞成的。我认为这是联系群众、防止官僚主义的重要措施。因此，我在思想和情感上对大学生当工人没有任何反感和不快。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我不但学到了一些汽车修理技术，而且和工人师傅交上了朋友。我觉得和工人们一起劳动和生活是一件很愉快的事。

现代汽车是现代科学技术的综合体。它不仅涵盖了物理学中的力学、动力学、运动学、电工学、电子学、热力学、理论力学和材料力学等学科的最新运用，而且随着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汽车制造技术还在不断地更新和发展。

当时工人们的技术主要是靠“师傅带徒弟”带出来的。一个工人的技术水平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他师傅的水平，师傅的水平高，他的水平也就相对高；师傅的水平低，他的技术水平一般也就会低一些。

而当时的师傅们的文化水平普遍都比较低（多数只读过小学），更没有经过专业技术学校的技能培训。因此，他们在汽车的技术理论方面基本都是空白。在工作中，他们主要是凭实践经验。

在学习和掌握汽车修理技术方面，我这个学工的人自然具有很大的优势。因为上述物理学中的各科基础理论在学校时我们都学过。为了尽快地掌握汽车的修理技能，我从省图书馆借来了大学汽车专业的教材，认真学习和钻研。不到一年，我就对汽车的结构、工作原理、修理和调试技术有了基本的掌握。

在学习汽车理论过程中，我认为学习引擎（发动机）及其配套装置的结构和工作原理固然是重要的，但底盘部分一些机构的工作原理解的学习也同样重要。因为几乎所有行车安全方面的知识都集中在底盘部分。对于非理工科专业的人来说，底盘部分的一些机构的工作原理解学习起来可能要比发动机更困难一些。

发动机的工作原理虽比较复杂，但其逻辑性强，且较直观，学习起来并不困难。而底盘部分中的一些机构，特别是差速器和前轮定位机构的工作原理解却看似简单，其实不然，学习起来也更困难。因为相关机构

的受力点分布在空间，较抽象，学习时需要结构力学和立体几何方面的基础知识，还需要有一定的空间想象力。

差速器在整个汽车构造中很不起眼，很多人只知道汽车有变速器而不知道有差速器。即使知道有差速器，也不知道它在哪里，更不知道它是怎样工作的。其实差速器是汽车结构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之一，因为没有差速器的正常工作，汽车后轮就不能适应前轮转向时的变化而实现内外车轮转速的变化（外侧轮转弯半径大于内侧轮），可以说，没有差速器也就没有现代意义的汽车了。

前轮定位包括转向节主销内倾、后倾和前轮前束。前轮定位的正确与否，不仅关系到汽车的操作灵活性、行驶的稳定性和安全性，而且还直接关系到汽车的运营成本（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多数小型车辆已通过其他技术措施取消了前束要求）。

由于我善于学习，又肯出力气，很快就在工作中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得到了领导和工人师傅们的肯定。

1971年底，云南省交通厅召开全省“汽车管理与保修工作技术交流大会”。汽车团领导指派我代表省铁路建设指挥部参加这个大会，并要我在大会上作交流发言。

大会在下关的苍山饭店召开，出席大会的除全省各交通汽车运输总站的相关负责人外，还有各大、中企业主管汽车运输的负责人。在这次会议上，云南省第一次明确了汽车管理、使用、保养、修理的关系，强调了管理的重要性。

会议结束后，我们游览了下关和大理古城，品尝了下关有名的砂锅豆腐和大理的弓鱼（这种鱼八十年代后几乎绝迹）。

这是我到云南后第一次参加省一级的会议。也是我到昆明一年多后第一次离开省城去少数民族集聚的地方，体验了白族的民俗和风情。

分配到汽车团的大学毕业生有二十几个，而我是最后一个报到的。领导选中我去出席这种全省性的大会，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肯定和鼓励。

二、《寄影书》

离开咸宁时廖老师对我说的话显然只能代表他本人而不能代表“组织”。因为“组织”并没有真正信任我，对我的审查其实并没有结束。

就在我参加下关会议回来后不久的一天，一个令我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华中工学院工宣队指挥部给云南省委组织部寄来了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相关材料。这个材料转到铁路建设指挥部后，汽车团领导随即在全团干部大会上宣布：“张建华是一个五一六分子”。并说：“阶级斗争是复杂的，不要以为我们汽车团现在风平浪静了。我们省有四个五一六分子，其中之一就在我们团里。”

“五一六”是什么？我怎么就成了“五一六分子”？对此我是一头雾水。因为此前我对所谓的“五一六”一无所知。

直到好些年后我才知道所谓“五一六兵团”、“五一六分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从我院贯彻5·27指示后，各级革委会实际上已名存实亡，院革委会原来的动态收集机构也随之撤消。且不说全国发生的情况和事件我们不知道，就是武汉市发生的重大事件我们也不一定知道。当时一些中央文件工宣队指挥部也不一定向革委会传达，中央关于清查五一六的决定我们就不知道。

1967年北京一些院校成立的五一六兵团在湖北、武汉并没有产生任何影响，连我们这些搞宣传的人也根本不知道五一六兵团是怎么回事。我们1969年在写《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斗争》一文时，曾对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决派”“省无联”“4·14”三股思潮进行了分析和批判，就没有写有关“五一六”思潮的内容，这足以说明北京的“五一六”在武汉根本就没有什么影响。事实上，我们去了咸宁后，在工（军）宣队领导的“整党”和“清队”中也从来没有人提起过什么“五一六”的问题。

和清队一样，全国清查五一六期间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搞得最凶的当属江苏和湖北。

据江苏官修《南京市志》记载：“清查‘五一六分子’在江苏是规模大、时间长、斗争残酷、危害极深的运动。从市革委会1970年4月发动至1974年5月市委正式宣布结束止，运动历时四年多。全市1083个

区属以上单位搞了‘深挖’，占单位总数的80%以上。大批干部群众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运动中被迫害致死的达250人。”

我不知道湖北、武汉的清查五一六运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后来我才知道，在湖北、武汉清查五一六运动中，造反派的各级负责人，不论是钢派还是新派，几乎全部被列入“五一六分子”受到审查和打击。

1979年3月13日，南京市委宣布：“南京没有一个‘五一六分子’，更不存在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原来对一些受审查同志所作的结论作废，予以销毁。”

我没有看到，也没有听说过湖北、武汉关于“清查五一六”运动的处理结论，但人们相信，和江苏、南京一样，湖北、武汉也没有一个所谓的五一六分子，同样不存在什么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当时强加给造反派头头的罪名全都是子虚乌有。

汽车团宣布我为五一六分子，这不仅给我的工作热情泼了一瓢冷水，而且在政治上也给了我致命的当头一棒。

就在宣布我为五一六分子的第二天，本来平静的长坡山头一时掀起了一阵波浪。“彻底批判五一六分子张建华”的大字报、大标语也贴了出来。人们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他们难以相信眼前这个纯朴、温和的年青人竟是“云南仅有的四个五一六分子之一”！朋友们多数也为我担心，为我捏了一把冷汗。

眼前的阵势我是经历过的，我的问题我心中有数。我到云南后再没有参与地方的任何文革方面的事，也从未和人谈及我在武汉的情况。再则，当时社会上和单位已没人关心什么文革了，即使人们偶尔提到云南的“炮派”、“八派”、“滇西纵队”的事，也往往是以开玩笑的形式出现，一笑了之。在云南我没有和任何人结怨，我相信眼前的事没有什么大不了。因此，我对五一六分子的事坦然面对，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慌乱和紧张。

当天晚上，团部机关和修理连召开批判我的群众大会。先要我作检查交待。

这时我正患重感冒，高烧39度，全身瘫软无力。我向会议主持人提出我正生病，无力站着讲话，要求坐着作检查。主持人同意了，搬来

了一把靠背椅让我坐下。接着我又提出我这个人在大会上一讲话就口渴，要求喝水，主持人叫人提来了热水壶。

我在咸宁时已检查交待了无数次，因此，我的检查交待无需作什么准备。我的检查交待完了，照例是批判发言。

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五一六”是怎么回事，被安排批判发言的人更是不知道怎么批判了。因此，他们的“批判”显然没有什么内容，只是做做样子罢了。

这次批判会后，汽车团曾派人到全国各地去搞外调，分配来修理连的大学生中就有几个参加了对我的外调。显然，这些外调人员并没有得到什么新的有“价值”的东西。

好多年过去后，一些人还记得这次批判会的情况。有人甚至和我开玩笑说：“你在批判你的大会上竟然要求坐着，还要叫人给你倒开水，就像是给大家作报告一样”。

就我所知，那次批判我的大会是汽车团甚至是整个铁路建设指挥部最后一次对个人的批判会。

令我难以理解的是，汽车团在传达中央关于林彪问题的文件时竟然不让我参加传达大会，而让我和五类分子一起读报纸。这件事使我感到十分憋屈和愤怒。不是说我攻击林彪吗？怎么林彪垮台了却不让我听传达？为什么竟把我划到五类分子一边去了？

1972年1月的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从中学时代起我就发愤图强，立志报国。我忠于党，忠于人民，我到底做了什么错事？为什么现实却如此让我难堪？越想越不能平静，于是下床写下了以下文字：

寄影书

孤雁落云岭，只身栖长坡。
 举目无亲友，四顾少知音。
 瑟瑟风作伴，淅淅雨有声。
 仰首望长空，浮想联翩翩：
 少年乘竹马，意气高山巅，

继而读功课，奋发泠江¹边。
求学到武汉，击浪扬子江。
歃血立重誓，定为国争光。
文化大革命，舍身狂浪间。
国难我心焦，挥笔斥贼奸。
冒险花明楼，徒步走三湘。
龟蛇²可作证，肝胆耀江天。
呜呼小丑俏，数载人妖颠。
咸宁景还在，长坡亦心酸。
忠良多厄运，古今所难免。
自问心无愧，宁折不弯。
笑对车轮战，松柏傲冰霜。
人生有何求？陨石一瞬间。
天地有正气，富贵如云烟。
悠悠我心悲，猛虎落平阳。
茫茫何所之？束手滇池畔。

从《寄影书》中可以看出，我当时的心情是很复杂的，既非常自负又非常茫然。一方面觉得自己拳拳报国之心苍天可鉴，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扪心无愧；另一方面又觉得“政治”这东西太玄奥，难以捉摸，觉得自己被一团巨大的阴影笼罩着，对前途、命运感到茫然。

所幸的是：在我被当成五一六分子审查时，虽然有个别胆小怕事的人有意无意地回避我，生怕因与我接触而带来麻烦。但多数人对我是友善和信任的。一些人甚至因此还对我表现得更为信任和亲近了。我有胃病，发作时食堂的师傅们会主动为我做“病号饭”并送到宿舍来。我要上昆明办点私事，厂里的师傅会以试车为名主动将我送到目的地。

四十几年过去了，当时给了我关心和帮助、于我有恩的人和事今天都记忆犹新。

在众多对我有恩的人中王骧腾当是第一个。

王骧腾，出生于山西农村，是北京中医学院的高材生。他身材高大，

1 泠江：湘江支流，流经宁远一中。

2 龟蛇：武汉的龟山和蛇山。

一米八以上，方脸，戴一副近视眼镜。他性格有些内向，平时说话不多，说起话来鼻音很重。也许正是由于他身材魁伟吧，他被安排在铁工班跟师傅们学打铁。

铁工班就在我们牙箱班斜对面，相距也就十来米远。平时休息时，我们常在一起聊天。我们之间似乎有一种天然的缘分，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说的挚友。

1970年分配到我们汽车团的9个医学院学生中，在我的印象里，不管是做人还是医术，王骧腾是最出色的一个。他对人热情诚恳，真正地把患者当亲人和朋友看待。他看病特别认真，望闻问切一丝不苟。每当开处方，他都要仔细推敲。更为难得的是，病人服用了他的药以后，他必定会登门造访，详细询问病人服药后的效果，并根据病人的反应回去认真研究，对用药作出适当的调整以达到最佳效果。

正由于他视病人如亲人，又勤于钻研，他的医术不仅在长坡汽车团小有名气，邻近厂矿和农村的病人也都来找他看病，一时名声远播。

他知道我患有胃溃疡，常发作。他除给我开治胃病的处方外，每天都来给我按摩、扎针。经过他近一个月的精心治疗，我的胃溃疡病很快有了好转。我的胃痛得到缓解后，他建议我去结核病医院检查一下肺部的情况。他说根据我的脉象和体征，肺上可能有问题。

我去结核病防治院检查后，果然发现了肺结核，而且正处在“浸润期”（传染期）。到上世纪七十年代，肺结核虽然已不是不治之症，已有了特效药异烟肼等新药，但尽管这样，患上肺结核这事本身还是给了我精神上一个不小的打击。

王骧腾知道我确实患有结核病后，当天晚上就到我的宿舍来安慰我。他说胃溃疡和结核病都与心情郁结有关，要治疗好胃溃疡和结核病，首先就要调整好心情。心情愉悦了，则全身经脉畅通，百病不生。为了照顾我并协助对我的治疗，他说要搬过来和我一起住，我不同意。但第二天他还是搬了家，和我做起了邻居。虽说是邻居，其实我们之间只隔了一道草席。

此后，王骧腾每天晚上睡前都和我聊天，和往常一样给我按摩、扎针。为了尽快治愈我的病，他除要我坚持服用治结核病的异烟肼外，还带我

上山挖白芨，配上其他中药材，要我坚持服用。

在王骧腾和结核病防治院何医生的精心治疗和照顾下，我的结核病很快就治愈了。第一个月复查结果是“浸润期”结束，第二个月复查时，除结核病留下的钙化点外，各项指标都是阴性。

1972年底到1973年初，分配到汽车团的二十几个大学生多数都因夫妻两地分居、学非所用等原由调离了。还留在汽车团的只有我、赵正洪夫妇、罗荣敬夫妇、李素英（她已和一个工人结了婚）和伍朝梅等七人。王骧腾是1973年初调去河南的。不久后他成了焦作市中医医院的一位名大夫。

王骧腾调回河南后，我们曾有过五年多的通讯来往。后来由于双方都实在太忙，我们间的通信往来逐渐少了，到八十年代中期，我再和他联系时已经联系不上了。

所幸2017年8月王骧腾的女儿玉蓉在网上看到我的文革回忆文章后告诉了他，我们又重新联系上了。玉蓉告诉我说她父亲是中国十大名中医之一，现在还在上班给人看病。我衷心祝愿老朋友健康长寿。

三、成家立业

1973年，我已年近三十了，还是单身。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中国人的传统，也是一个正常的人生不能绕过的过程。人们普遍认为，对于一个普通的人来说，婚姻、家庭、事业三者是相互关联的。一个人没有一个稳定的婚姻，也就不可能有一个和谐的家庭。而没有一个和谐的家庭的人是很难成就一番事业的。即使他事业小有成就，到头来也绝不可能感受到人生的乐趣和幸福。

快三十了还没有“对象”，确实是一个问题。为此，年迈的父母为我着急，同事们也为我着急。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我又何尝不着急呢？

一些好心人都积极为我介绍对象。这些人中有工人师傅，也有团机关和团属各连队的干部。有的要将他的同事介绍给我，有的要将他的朋友或老乡介绍给我，一车队指导员还要将他的小姨子介绍给我。

同事们对我的关心让我这个远离家乡的“孤雁”感到了温暖，让我重新找回了自信。也正是这些朋友的友情和信任，使我很快走出了阴影，

回归到了正常人的工作和生活中。

当时我们修理厂还是有几个女生对我心仪的，其中的两个就是和我只隔了一道草席的邻居 F 和 R。

F 和 R 属于两种完全不同性格的人。

F 是外向型性格。也许是因为她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又长期在农村长大的缘故吧，她为人正直，甚至有几分军人特有的豪爽和气质。她说起话来总是直来直去的，加之嗓门又大，说话就像放机关炮似的。她没有什么特长，厂里安排她在材料室工作。

R 的性格则是内向型的。她话不多，说起话来总是轻声细语的，给人的印象是温柔、善良和善解人意。她的父亲原是银行职员，现是铁路建设指挥部财务科的负责人。F 曾在曲靖当知青，调来修理厂后被安排在厂财务组当会计。

F 和 R 对我都有那种意思。她们对我的特别关心和照顾及她们看我时的那种眼神旁人也都看得出来。因此，同事们也常当着我和她们的面开玩笑。对此，F 总是毫不隐晦地承认。而 R 则含蓄一些，她没有当面承认，却也从未否认过。

中国人都相信婚姻是讲究缘分的。正所谓“千里姻缘一线牵”，“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

虽然 F 和 R 都对我表达了爱慕之情，但面对她们我却始终兴奋不起来。就拿 R 来说吧，我和她的床紧挨着，中间只隔了一道草席。我们常睡在床上聊天。夜深人静时，相互间都能感觉到对方的体温和心跳，但我就是不会“来电”，荷尔蒙似乎也没有什么变化。按说两个正值青春力盛的男女不应如此，但事实就是这样。

原来我不相信柳下惠能那样“坐怀不乱”，也不相信《西厢记》中的张生在遇到莺莺前能那样“洁身自好”。但这时我似乎相信了。

其中缘由我也说不清。就我的情况来说，之所以不“来电”，也许是命运注定我们是有缘无分，也许是由于我初恋的女友在我心中的印象实在太深，总觉得同事们给我介绍的女生和眼前的女生都不是我心目中的“另一半”，因而难有激情。

1973年12月底的一天，在团机关开班车的王浩亮师傅突然找到了我，

说是要将他爱人的一个同学叫杨元俭的介绍给我，并交给我两张杨的照片。当时我很诧异。因为我虽然坐过王师傅的车，知道他是1958年上海支边青年，但我和他从未交谈过，很不熟悉。出于礼貌，我答应见见面。

三天后是星期天，王师傅约我去见面，地点就在杨元俭家。

杨元俭家住崇仁街66号。这是一个典型的昆明式四合院，据说原是一个资本家的宅院。这个宅子的整个建筑属砖木结构。天井及其四周均为长条石砌成，地面多是三合土，靠天井南侧原是一个客厅，地面铺的是花瓷砖，可见这是民国时期的建筑。四合院里现住有八家人，都是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昆华医院）的职工。

王师傅的爱人曹妹林陪我来到杨元俭家时，杨元俭和她母亲正在等我们。曹妹林向双方作了简要的介绍。落座后，杨妈详细地询问了我的家庭及我的工作情况，我一一作了回答。

看得出来，杨妈对我的应答是满意的。说了一会其他话以后，杨妈对曹妹林说：“走，跟我去厨房，帮我弄饭去。”说着就拉着曹妹林去了厨房。

刚才只顾应答杨妈的提问，这时我才仔细端详起杨元俭来。今天虽是相亲，但她还是身着一身蓝色工装，没有刻意打扮。她神情淡雅，皮肤白皙细嫩，五官端正祥和，大眼睛，双眼皮，脸颊和嘴唇透着红润。看上去虽比照片上的样子老气一些，但却更显出一种成熟女性含蓄的美。

我的情况刚才当着她妈妈的面介绍过了，她向我介绍了她及她家的基本情况。

父亲杨式鹤是建筑工程师，云南富源人，毕业于云南道路工程学校。解放前就是建筑工程师，曾先后在昆明、重庆、上海从事建筑设计工作。

解放前夕，父亲就职公司的老板张昌华去了台湾，他不愿远离故土，于是带着母亲从上海回到了昆明。回昆后就职于云南省建筑工程总公司，曾在解放初的昆明南屏街改造工程、护国路原云南日报社工程及白鱼口的船型大厦工程中留下了他的作品。1958年他响应政府号召“支边”去了个旧，现是个旧第一建筑工程公司的主任工程师。

母亲张韵梅，江西九江人。毕业于安徽芜湖美国人办的教会护士学校。毕业后分配到贵阳图云关陆军医院当护士。在从安徽到贵阳就职途

中，母亲她们8个同学和负责护送她们的军人曾遭到日军的围追堵截，历经劫难。抗日战争胜利后，母亲随同事到了昆明，就职于昆明惠滇医院。和父亲结婚后不久，父亲受建筑商张昌华的邀请去了上海，母亲同行。在上海，父亲在张昌华的建筑营造所当工程师，而母亲则先后在上海中山医院和上海第五人民医院当护士，1947年生下了杨元俭。

1949年，母亲又随父亲从上海回到昆明，一直在昆华医院工作，直到退休。母亲50岁以前是东外科护士长。

杨元俭有两个弟弟，都出生于昆明，都当过知青，现都回城了。大弟弟杨洪通在云南纺织厂子弟学校当化学老师，小弟弟杨淮通在公共汽车公司大修厂当工人。她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姐姐杨元书，六十年代初报名支边，在景洪农场种橡胶。

杨元俭初中毕业后就读于昆明第一工业学校。毕业后分配到曲靖云机五厂（国防工办所属厂），现在厂技术科，主要分管铸造车间的技术工作。

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没有半点浪漫的成分，完全是在履行某种程序。但我们双方都是坦诚的，彼此间都留下了深刻的好印象。是缘分使然？还是一见钟情？我说不清楚，也许两者都有吧。

午饭后我辞别杨家，她送我回长坡，相互留下了通讯地址。

此后，我们又约会了几次。元旦过后，元俭回曲靖了，我们开始写“两地书”。

1974年春节前元俭回到了昆明。我给她详细地讲了我在文革中的情况，并给她看了我写的《寄影书》。她对我表示了充分的理解，我们的恋情迅速升温。

元俭父亲春节前也从个旧回到了昆明。他开始对我们的关系持保留态度，他担心我会因文革的“政治问题”给今后带来麻烦。

他的这个担心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在上海时虽参加过共产党外围组织的活动，做过一些有利于革命的事，但因他的老板张昌华去了台湾，每次运动他都会因此受到牵连，可以说“历史问题”让他受了不少窝囊罪。

我和他接触过几次后他终于改变了态度，并表示支持我和元俭发展关系。

1974年五一节元俭再次回到昆明，我们确定了恋爱关系，当年11月27日我们办理了结婚登记。

1975年1月10日，我们在长坡举行了俭朴而热闹的婚礼。

说它简朴，现在的年轻人也许很难想象。当时我们没有自己的房子，婚房是一车队临时借给我的一间单人宿舍。我们没有举办婚宴，只给来祝贺的朋友和同事们发了喜糖（喜糖也是凭结婚证买的）。我们的婚房内没有一样像样的家具和电器，只有凭结婚证供应的一张平背床（47元）、两把靠背椅（27元）、一张三屉桌（30元）和我自己动手做的一个床头柜。此外就什么也没有了。

说它热闹，一是汽车团的工会主席魏国权同志亲自为我们主持了婚礼，汽车团的主要领导罗祥等都出席了婚礼，这是汽车团成立以来没有过的；二是当晚修理厂文艺宣传队的队员们在我们的婚房里专门为我们表演了节目，气氛十分热烈而喜庆，这种庆祝形式在长坡也是从未有过的，后来也不曾有过。

这年五一节期间我和元俭作了一次国内旅行。先是回我家看望父母，年迈的父母看到如此漂亮的媳妇自是高兴得不得了。接着，遵照岳母的意思，我们去了岳母的出生地九江，看望九江的姨妈和她的子女。在九江，我们上了庐山。我写下了《登庐山》一诗：

登庐山

1975年5月于江西九江

人道登天难上难，而今举足上九天。

信步飞桥觅太祖，仙人洞内访群仙。

龙池水浅戏游鱼，五老峰高话沧桑。

寄语长江万里浪，白云深处可耕田？

注：飞桥、仙人洞、龙池、五老峰均为庐山有典故的风景点。庐山的5月是绝好的季节。雨后的庐山清新爽人，五老峰上杜鹃花怒放，置身其中，有如进入花的世界。含鄱口吞云纳海，云雾时涌时退，气势磅礴，变化万千，极为壮观。

离开九江后，我们乘船沿长江而上去了武汉。

回到母校，感慨万千，写下了《访母校》一诗：



1975年5月摄于九江周瑜点将台

访母校——华中工学院

1975年5月

人迁事过面目非，相见无言泪先垂。

峥嵘岁月成过去，是非功过诉与谁？

1976年9月，元俭调回昆明，安排在我们厂技术组管设备。

1972年后的五年中，我们厂有了很大发展，我在事业上也小有成就。

1972年底，新建修理厂厂房投入使用。新建厂房的规模和设备配置在昆明当时算是一流的。在机加工方面，我们有了机加工车间，配置了多台不同规格型号的车床、刨床、铣床、锻压机、发动机大修用金刚镗床和曲轴磨床。此前，我们厂发动机大修都要送到昆明总站镗缸磨曲轴，现在都能自己完成了，一些紧俏又常用的易损零配件几乎都能自己加工生产了。比起一年前的状况，真是“鸟枪换炮”了。

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修理厂于1972年底到1973年初分两批招收了一百多名小知青（1954年前后出生），全厂职工由原来的两百人增加到三百五十多人。

新厂房建好以后，三栋单身宿舍楼也相继落成。到1972年底，用油毛毡和草席搭建的工棚全部拆除了，职工的住房条件有了较大的改善。与此同时，汽车团从高峽到长坡铺设了自来水管，解决了生产、生活用水问题。

1973年我从牙箱班调到厂技术组当组长。在随后的几年中，针对我

厂生产实际，我对一些突出的技术问题进行了探讨。如发动机打气泵窜油问题当时在全国汽车修理行业是个普遍存在的突出问题，我经过反复试验和分析，在《汽车技术》杂志上发表了《汽车打气泵窜油原因及处理》一文，结束了就此问题全国长达多年的争论，并为我国今后汽车制造业打气泵的生产提供了理论依据。在这几年中，我先后设计了多项机工具，其中零配件清洗机辅助吊装机、转向节修复机等五项革新参加了“云南省首届技术革新展览”。

1976年11月，我们的宝贝女儿张巍出生。给她取名“巍”，是因为我老家有座九巍山，我希望她长大后像九巍山一样秀美、坚强。

在这一年中，唐山发生强地震，周总理、朱德委员长、毛主席先后辞世。真是巨星陨落，天崩地裂。它标志着一个革命时代的结束和邓小平时代的开始。

第二十四章 我说文革是与非

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过去近半个世纪了。

半个世纪来，有关文革的是与非的争论一直不绝于耳。“文革派”说文化大革命好得很，将光照史册。而“非毛派”则说文革糟得很，是一场浩劫。

毛主席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文革既然是一场革命，不同阶级、不同利益集团对同一事件因利益所系而作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实属正常，一点也没有什么奇怪的。

不管是“文革派”还是“非毛派”，有一点是一致的，即都认为文革是“史无前例”的，都认为文革对中国当代史产生了重大影响，应该予以认真地总结，以利于中华民族的振兴。

要总结文革并给予准确的评价似乎为时太早。一方面有关文革的历史档案现在还没有解密，当时高层的很多史料至今尚未公布，有的还是一个谜。另一方面，文革争斗的双方虽然一些人已经逝去，活着的大部分也已步入耄耋之年，但很多人还健在，他们的子女们正是当今社会的中坚。而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利益集团都会为着本身的利益或赞颂或贬损文革。因此，现在要做出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客观公正的评价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我是一个文革的积极参与者，曾为文革鼓与呼，也曾为文革蒙受了诸多委屈和磨难，以至断送了自己可能的美好前途。但作为一个文革的亲历者，我还是想就三十几年来围绕文革进行争论的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文革到底进行了几年

文革到底进行了几年？民间对文革的起始和结束的时间说法不一。有人说文革应从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算起，有人说应从中央五一六通知算起，有人说应从中央公布十六条算起，更有人说应从中央发表反修防修的中苏论战的“九评”算起。至于文革结束的

时间，有人说文革结束于九大闭幕的那一天，有人说应是毛主席去世的那一天，有人说应是华国锋抓捕四人帮的那一天，也有人说应是1981年6月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那一天。

由于对文革起始和结束时间的看法不同，得出文革到底进行了多少年的结论自然也就不同。有人说文革进行了十年，有人说是十二年，更有人说文革进行了十四年或更长。

官方最终的界定是文革进行了十年，即1966年—1976年。理由是毛主席一直坚持他的继续革命理论到他去世。这种界定现被普遍接受。我这本书中关于这十年的回忆，也都放在《文革篇》里。

文革到底进行了几年？我认为文革应从1966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算起，到1968年8月止，共两年。

作为亿万民众积极参与的文革，其实只进行了两年。而1968年8月至1969年4月（九大召开，新的中央委员会成立）的八个月应属文革收尾或善后期。我相信多数亲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人，特别是当年大学老五届和中学老三届的学生们都会同意我的这个看法。

我认为文革时间的界定，应以十六条规定的文革的目标及其形式来界定。

十六条规定的文革的目标是“斗、批、改”，向走资派夺权。

十六条规定文革的形式是“群众运动”，即自下而上地充分发动群众，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攻”。同时，支持群众成立自己的组织，认为“群众所创造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形式，就是一种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事物”。

我之所以认为文革只进行了两年，是因为文革从1966年8月全面发动起，到1968年8月止，全国各地都按十六条规定的目标和形式，完成或基本完成了文革的任务，达到了既定目标。

1. 到1968年8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已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除台湾外，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党的组织及国家机器都已恢复并正常运转。文革前的绝大多数领导干部都已“解放”并回到了领导岗位。此时，虽还有很多干部仍在五七干校中，但他们都

是在进行正常的学习和一般的体力劳动。这种学习和劳动是非常必要的，是接触群众、防止官僚主义的必然要求。在五七干校，他们虽不在原岗位上上班了，但他们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并没有受到影响。有人把五七干校说成“牛棚”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2. 到1968年8月，作为文革典型特征的群众组织都已解散，中央文革小组虽未正式撤消，但它已不再发号施令了。中央文革的主要成员王、关、戚已退出了历史舞台。

3. 到1968年8月，作为文革主力军的青年学生已开始退出文革。中学生11月开始下乡，大学生六六届1967年12月已经分配，六七、六八届1968年11月分配。尚未分配的六九、七〇届大学生虽还在学校，但此时已是工（军）宣队管理学校，进入院、系革委会的学生代表们也都回到了各自的教学班。作为文革的另一主力军的工人群众，此时也都回到了工厂，他们都在驻厂军代表的领导下正常上班。社会上基本看不到大字报、大串连、大辩论、大游行，更看不到武斗了，社会秩序已回归正常和稳定。

4. 到1968年8月，社会秩序和工农业生产已趋于正常。1968年7、8月间我们曾在湖南作社会考察，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我们去了长沙、湘潭、衡阳、株洲等四个城市和宁乡、湘乡、双峰三个县的农村，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形式的“动乱”，文革的余波虽还可见，但人们都在正常地生活和工作。作为见证，我们在乘车或徒步考察的两个月中，没有感觉到有任何安全问题。1970年我分配到云南后，也没有看到任何文革高潮时的景象。

这一切都说明有亿万民众参与的真正意义上的文革在1968年8月前后就结束了。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民主运动。其最显著、最本质也是标志性的特征：一是“大民主”，即大字报、大串联、大辩论；二是“群众运动”，即亿万普通民众自觉、主动参与；三是“群众组织”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力量。

只有1966年8月至1968年8月的运动具有上述特征。没有上述特征的运动我认为不能算真正的文化大革命的。

1968年8月以后又发生了多次政治运动，如“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现在很多人把这些都归于文化大革命，这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因为这些运动既不是十六条规定的文革任务，也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群众运动，它们和文革前传统的运动如“三反五反”“反右”“四清”等运动一脉相承，没有什么区别，与文革的“群众运动”，与文革的“大民主”毫不相干。

现在有人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5·7指示”“赤脚医生”等都划归为文革运动的负面现象加以鞭答，更是无稽和荒谬。

当然，从政治角度来说，文革也可以把1969年4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新的中央委员会成立作为文革的结束日。如这样计算，也可以说文革先后共进行了两年零八个月，这和毛主席文革初提出的文革预计搞三年基本吻合。

二、关于“走资派”

毛主席一生中做了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但他在总结自己的一生时却把它归结为两件事。他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几个海岛上去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是何等的重要。同时，我们也可以由此得出结论：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绝不是他一时心血来潮，更不是像一些人所说是为了“争权”“整人”。他冒着极大的风险发动文化大革命是经过长期思考和准备的，为的是给1949年“进京赶考”时关于“周期率”的“考卷”，交出一份“答卷”。

苏共二十大及此后苏共所发生的变化和1956年匈牙利共产党惨败的教训，使毛主席坚定地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仍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同时他认为：党政机关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日益严重的官僚主义将导致政权“异化”。因为“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搞社会主义革命，

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正是基于这种分析和判断，毛主席提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毅然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文革派”认为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理论和文化大革命是完全正确的。而“非毛派”则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¹

周总理是全国人民公认的伟人，即使是“非毛派”，有些人也极力推崇。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操盘手周总理是怎样诠释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的。

1967年12月22日，周总理在接见亚非作家协会的代表时曾就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性质、任务、目的进行了全面的阐述（见本章附件《周总理接见亚非作家协会外宾的讲话》）。

周总理说：“全国解放以后，在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上的矛盾会尖锐起来，成为主要矛盾。确实，我们进了北京城，从一九四九年到现在整整十八年，十八年的变化，就是不断地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一条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党内在社会上的斗争都在继续和发展。当然，这十八年中，指导的主要方面是毛主席为代表的一条红线。不然的话我们不可能在十八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这么重大的成就。这是主流。但是另一方面确实有一条黑线，即刘少奇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条黑线不仅刘少奇一个人，而是他那一帮。我们现在说的一帮，那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谈到毛主席为什么要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解决党内问题时，周总理说：“问题在于十八年的许多问题不只是刘少奇个人，而是一个思潮。党内有一些干部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他是有代表性的。因为中国社会上还存在着阶级斗争，这就不能不反映到党内来。……如果不是不断地揭
1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

发，不断地暴露，就不可能教育党员、干部和社会上的广大群众了。同时，我们又从苏联党的发展中得到了教训。斯大林在列宁死后，也曾经长期地同各种错误倾向作尖锐斗争。如反托洛茨基、布哈林、加米涅夫和季可夫等，但这一斗争只限于苏联党中央委员会内部，……没有在党员群众中，更不用说在广大的社会群众中引起广大争论和讨论了。斯大林一死，就出现了新的布哈林和托洛茨基，如赫鲁晓夫呀、米高扬呀，更不用说贝利亚了，公然搞修正主义，搞资本主义复辟。苏联党内，社会上，不是没有反对，也存在一些不满，但沉默得很，没有行动。所以，鉴于这个教训，毛主席认为，一定要把斗争诉之于群众，不仅党内的群众，而且诉之于社会上的群众，还要诉之于世界。”

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性质、目的时，周总理说：“文化大革命就名称、形式看是思想革命，从实际上不只是思想革命。从今年初起又进行了政治革命、经济革命。有了思想发动以后，就开始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权，这不是政治革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建立临时的权力机构，这不是政治革命吗？群众一觉悟起来，群众就用自己的力量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去掉了，代替他们的是革命的三结合的权力机构。革命的三结合在中国实行起来有两种，一种是革命的领导干部，当地驻军（或民兵）的代表和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另一种是革命的领导干部，中年的领导干部和年轻的群众组织的代表。革命的三结合把老年的、中年的革命干部选拔到新的领导机构中来，他们有经验，宝贵的革命经验，有错误在群众帮助下改正了。而新的领导机构中的年青的积极分子，他们来自群众，联系群众，保证了群众路线的贯彻。这样的三结合会保证我国永不变色，防止出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文革前，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意识中，“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根本不知道，也不可能相信，在中国还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更不知道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我们当时之所以起来造反，主要是出于响应毛主席“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同时也因为不满于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少数派”的压制甚至镇压。我们当时反对工作组，炮轰

省委，都是因为他们在文革初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当时是否存在毛主席和周总理所说的“走资派”？在中国是否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呢？三十多年来的事实已经明确无误地告诉了我们：毛主席当时的分析和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党内就是存在“走资派”，他们就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同时证实了周总理说的：“这条黑线不仅刘少奇一个人，而是他那一帮。”

现在人们争论的焦点也许不再是毛主席当年的论点是否正确的问题，而是中国到底是应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应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

记得大学一年级上政治经济学课时，我们曾讨论过人类社会制度的发展规律。按政治经济学的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最后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当时我们讨论的焦点是：我国是否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社会阶段，一步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跨入社会主义社会？一方认为完全可以，并以苏联从封建社会一步跨入社会主义和我国西藏从奴隶社会一步跨入社会主义的成功例子予以证明。而另一方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是客观的规律，跨越当然就是违背了客观规律，而且马克思说过：只有经历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财富充分发展和工人阶级队伍充分壮大，社会主义才能最终取得成功。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讨论的结果当然是另一方认输。

邓小平复出后，中国实行了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三十多年后，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在此期间，一小批人成了超级亿万富翁，一大批人进入了“中产阶级”。这些人理直气壮地认为搞资本主义好，认为中国本来就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作为普通的老百姓，他们中的大多数应该说在物质生活方面也有了很大提高，但由于改开后严重的分配不公导致了贫富差距无限扩大，官僚们严重贪腐，以及社会上“黄、赌、毒”泛滥，环境污染，食品不安全，人们理想、信仰缺失等，现仍然有很多人怀念毛主席，怀念毛泽东时代，他们认为还是社会主义好。

在中国，到底是应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应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也许还要争论三十年，即等到建国 100 周年后，人们通过比较、总结才会

得出明确的结论。

以毛主席为首的革命家们搞了三十年的社会主义，以邓小平为首的“改开派”搞了三十年的“特色主义”。现在习近平的时代开始了，人们满怀希望。习主席提出了“中国梦”，强调不能以“改开”三十年来否定前三十年，也不能以前三十年否定“改开”的三十年。强调要“依法治国”、“以法治党”。我认为以习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认真汲取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走中庸之道不仅符合中国的传统文化，也符合中国今天的实际。

三、关于红卫兵

三十几年来，由于当局对红卫兵的打压及主流媒体的错误引导，更由于不良文人昧着良心，通过小说、电影、电视等对红卫兵肆无忌惮地恶意歪曲和负面渲染，他们把文革中的红卫兵都描绘成粗俗无知、只会“打、砸、抢”的痞子无赖，以致在今天的一些年青人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文革时期的红卫兵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当年的红卫兵都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到五十年代初出生的一代人，是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共产党培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第一代知识青年。在共产主义、爱国主义、雷锋精神的教育和熏陶下，他们信仰毛泽东思想，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相信“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正确的党，光荣的党”。他们虽然在政治上很不成熟，甚至都还很幼稚，但无可否认，他们是最富于革命理想和革命激情的一代人。

红卫兵分为“老红卫兵”和“造反派红卫兵”。

老红卫兵始于1966年7月，终于当年10月，前后约4个月。

造反派红卫兵始于1966年9月，终于1968年8月，前后约两年。

北京的老红卫兵组织最早出现于1966年5月下旬。

1966年8月27日，北京各院校的老红卫兵联合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一司）。其骨干成员主要是高干子女。当时在校的高干子女在其父母和北京市委所派工作组的支持下，大多成为各大中学校文革运动的负责人、老红卫兵头头，如清华大学的刘少奇之女刘涛、贺龙之子贺鹏飞，北京航空学院的李井泉之子李明清等。其中，在全国

都具有一定影响的还有北京工业学院的谭立夫（最高检副检察长谭政文之子）和北师大女附中的宋彬彬（宋要武）。

谭立夫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他狂热地鼓吹血统论，在当时影响很大。

宋彬彬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她在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戴上“红卫兵”袖章，毛主席给她改名为宋要武。她在湖北出名，是因为她于1966年9月受王任重之托跑到武汉，公开支持以张体学为首的湖北省委，大骂“炮轰省委”的北京南下学生。

各省、市的老红卫兵组织成立于1966年8月下旬，都是由各省、市党委直接组建和领导的。就武汉来说，当时各大专院校都成立了“红卫兵师”，由省委统一领导，其主要负责人也都是由工作组和校党委指定的。我院红卫兵师头头基本上都是原院学生会和团委的负责人。

红卫兵师的成员大都是在校学生中的党员和团员中的骨干（当时入选红卫兵比入团还难，大多数团员都未被接纳）。不久后，各校红卫兵师联合组建了“武汉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即武汉地区红卫兵第一司令部），司令、政委由省委指定。

老红卫兵们有着天然的优越感。他们或因自己的父辈是打天下的功臣，或因自己是在党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党、团干部，自认为是“根正苗红”，是当然的革命接班人。

老红卫兵们在工作组的支持和默许下做了很多后来被人们诟病的事。如他们在反修防修的口号下大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黑帮”，迫害了很多当时的文化名人；在“破四旧”的口号下，毫无顾忌地破坏了大量文物古迹，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在抓“阶级斗争”的口号下在学校大抓“黑帮”“反动学术权威”“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大抓“反革命”，搞“红色风暴”。

在这场“红色风暴”中又以北京的“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最为突出，因而很快受到中央和中央文革的注意，江青首先发表讲话，称他们的行为是极其错误的。接着陈伯达就高干子女问题发表了专门讲话，指出了高干子女的弱点和存在的问题，要求他们向工农兵子女学习，要他们夹着尾巴做人。

随着工作组撤出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深入，到1966年10月，

北京一些老红卫兵因父母先后被审查而成为“保爹保妈派”，有的老红卫兵反戈一击，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因各地省、市委在文革初都执行了刘、邓路线而受到批判和冲击，各地的老红卫兵组织也就失去了依靠和根基，所以都在1966年11月前后解体，其成员大部分转而加入了本校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

说到“造反派红卫兵”，那就必须说到文革初期的两条路线斗争。因为造反派是在两条路线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没有当时两条路线的斗争也就没有文革中的造反派红卫兵。

当时两条路线的斗争主要体现在文化大革命的重点上，是矛头向上整党内走资派，还是矛头向下整基层干部甚至普通群众。

两条路线都有其代表人物，也都有各自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

文革初，刘、邓确定文革的重点是“整顿基层党组织和基层干部”。他们沿用“四清”和“反右”时的方式和策略，派驻工作组指导运动，“以保目标不致出现偏差”。

而毛主席文革的目标和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方式是放手发动群众，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提倡群众用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自下而上地揭露走资派。

文革期间的大字报、大辩论都是围绕着文革的两条路线而发生、发展的。当时全国所有大、中学生也都是在大字报、大辩论中自觉不自觉地卷入文化大革命的狂潮中去的。

如果没有关于文革两条路线的大字报、大辩论，文革中的亿万民众根本不可能那样迅速地发动起来。

如果当时没有亿万民众对资反路线的批判并最终取得胜利，刘、邓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必定是又一次“反右斗争”，其后果将比当年的“反右”严重千万倍。

在造反派红卫兵的影响下，社会各阶层也都纷纷加入造反的行列。到1967年1月，造反派已不仅仅是学生，它包括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工人、农民、医生、教师、机关干部甚至包括一部分军人（如军事院校学生），尤以工人人数最多，工人的造反派组织已成为造反派的主力军。

随着1968年各级革委会先后成立，群众组织撤销及中学生上山下乡、大学生毕业分配，在文革中曾风云一时的造反派红卫兵也就随之退出了历史舞台。

必须指出的是，作为文革主体之一的造反派红卫兵这时虽然退出了文化大革命，但各地造反派红卫兵的代表人物，即以群众组织代表身份进入省市革委会的头头们，如北京的五大学生领袖、武汉的钢新两派的主要学生头头，他们在当时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却发起了内战，就像我在十九章《“钢新之争”再起》所记述的那样。

随着文化大革命被否定，干部政策的落实，北京的老红卫兵们（高干子女）纷纷或参军或上大学或出国留学镀金。这些人现已成了我国党、政、军及各经济部门的掌控人。各地老红卫兵的骨干们也已陆续走上了党政各级部门的领导岗位。

造反派红卫兵的代表人物却没有老红卫兵们的幸运。

邓小平复出后，造反派头头们的厄运开始了。他们几乎全部被打成“三种人”入了另册。造反派红卫兵的一般负责人（进入院校革委会的）则无一例外地被戴上了“紧箍咒”（即所谓“记录在案”）。

凡进入省市革委会的群众组织代表几乎多数被定为“三种人”入了另册。他们的职务不但被撤销，而且其中一些人被关进了共产党的监狱。因公职被开除，出狱后他们只得自谋出路。

我们华中工学院被结合到湖北省、武汉市革委会的有三人，他们分别是张立国（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郭保安和聂年生（均为武汉市革委会常委）。张立国被判了十一年，出狱后一度成了长江大桥下摆摊的小贩。郭保安分配到安徽，在铜陵县一个农机厂当技术员。而聂年生的结局最惨，他出狱后到处找工作，但无人敢收留他，最后他只得靠列车上的一个朋友去长沙贩卖甲鱼。但他本不是做买卖的料，最后终因穷困潦倒，于1993年病故。

被结合到院校革委会的造反派红卫兵的日子也不好过。这些人虽大多没有被投入监狱，而是分配到基层工矿企业当了工人，或去部队农场当了兵。但他们却被戴上了“紧箍咒”（即所谓“记录在案”），他们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仅被横蛮地剥夺，而且成了此后本单位的“老运

动员”。

根据邓小平和陈云的讲话要求，凡结合到大专院校革委会的造反派红卫兵代表，不管他们的品德如何，能力如何，也不管其是否犯了错误，都不能出任县处及以上党、政领导职务，已在领导岗位上的也要一律撤下。从而制造了被人们忽视了的大“冤假错案”。之所以说是“大”，是因为该案牵涉的人何止上万！而说它被“忽视”，是因为建国以来的很多“冤假错案”都被平反了，被长期冤屈的造反派红卫兵头头们的“冤假错案”却无人过问，成了历史积案。有关情况我将在下一篇《改开篇》中还要说到。

我认为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文革时的造反派红卫兵是应有它一定的历史地位的。因为造反派红卫兵开创和践行了大民主。而大民主使得大小官僚们原形毕露，无处遁身。同时，红卫兵运动猛烈地冲击了存在了几千年的“唯上唯大”的封建意识，让人们第一次看到了“官怕民”而不是“民畏官”的景象，让人们品尝到了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快乐，同时为后来的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创造了条件。

四、关于“人整人”和“冤假错案”

经历过文革的人对文革中的“人整人”和“冤假错案”多有怨言。

网上有文章称：文革中三分之二的人都挨过整。此说虽未免太夸张，但文革中确实发生了严重的“人整人”的情况，也出现了不少冤假错案。

非毛派将文革中的“人整人”和“冤假错案”归罪于造反派，归罪于毛泽东。

我认为这不符合历史事实。事实上，制造了“人整人”（文革时称“群众斗群众”）和“冤假错案”的不是造反派，更不是毛泽东，而是刘、邓的反动路线，是旧的体制。造反派才是“人整人”和“冤假错案”的真正受害者。

为了让今天的年青人弄清事情的真相，我认为首先要明确什么叫“人整人”。

所谓“人整人”，就是一些人以“组织”的名义，通过跟踪盯梢、断章取义、捕风捉影、“想当然”等非正常的手段取得一个人的“材料”，

然后将其无限上纲，罗织罪状，给你扣上一顶帽子，定你一个什么“反革命”“右派”“×种人”，并将“材料”塞入你的档案，在“党领导一切”的政治环境下让你难以翻身。

“人整人”中有两个重要的概念或说是两个关键要素，即“组织”和“帽子”。这里的“组织”指的是“党组织”，“帽子”指的是所谓“反革命”“坏分子”之类的政治标签。在我国只有“党组织”才有权给一个人确定“标签”，也只有“党组织”才有可能将“材料”装入一个人的人事档案中。

根据上述“人整人”的两要素，我们可以看出，那些认为“人整人”和“冤假错案”是造反派所为的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因为任何群众组织都不是“党组织”，都无权也不可能给一个人定“标签（帽子）”，更不可能给人设立人事档案。

文革中“人整人”的情况发生在两个时间段，即文革初刘、邓推行“资反路线”时期和后来的军人掌权时期。

文革初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他们通过派工作组掌控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工作组用“枪打出头鸟”“引蛇出洞”“挑动群众斗群众”等策略，以“党组织”的名义收集、整理了大量敢于给党的领导干部提意见的人的“黑材料”，并给扣上“反党”“反革命”“野心家”等帽子，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今天人们经常谈论的文革期间的“抓黑帮”，“批斗学术权威”，“迫害文化名人”，“批剥削阶级孝子贤孙”，“学生批斗老师”，“扫四旧”，成千上万的群众被打成“反革命”“一小撮”“游鱼”等冤假错案，几乎都是在刘、邓主持文革工作期间（1966年6月—7月）发生的。

网上有文章统计了文革中自杀和冤死的文化名人有×万人，并笼统地将其归罪于文革。但我们只要看看文章中列出的这些人自杀或冤死的时间，就可以知道这些人都是冤死于刘、邓领导文革期间。凡忠实于历史的亲历者，我想都会承认这是历史事实。

有些人不顾历史事实，硬把“人整人”和“冤假错案”归罪于造反派和毛泽东。原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十年浩劫》一书的作者马文革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马文革在他的书中虽然也承认：文革前，他

被派去农村搞“四清”，按刘少奇的“桃园经验”在农村大抓“走资派”，一般生产大队干部都成了他们打击的对象。但他在极力控诉造反派红卫兵的同时，却只字不提他是在文革刚开始，刘、邓主持文革期间被四川省委抛出来并被打成“黑帮”的。他被刘、邓打成“黑帮”，却嫁祸于造反派红卫兵，我真不知道他居心何在？

刘邓的“资反路线”被批倒后，各省、市革委会相继成立，我国除北京、上海外，各地进入军人治理时期（各级革委会的第一、二把手都是军人），直到1974年。在此时期，那些大权在握而又对文革不理解甚至敌视的“诸侯”们，在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一打三反期间也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成千上万的人被整，以至冤死。其中又以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领导的江苏省和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领导的湖北省尤甚。

这一时期被整的都是普通群众、造反派的骨干及其领袖人物。

现在网上也可以看到有原造反派头头就文革中“人整人”问题发表文章，也把自己挨整归结于毛主席，我认为这是不恰当的。

首先，我们得承认，造反派的头头们确实有错，“挨整”事出有因。

1967年8月—1968年8月间，造反派头头们因受极左思潮影响，大搞派性并发展到武斗，这不仅严重地干扰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而且造成了无辜群众的重大伤亡，教训是十分惨痛的。这些错虽然与军队“支左”有关，但头头们的责任也是应该承担的。

我认为：毛主席和周总理对造反派头头们的严重错误，态度应该说是宽容的，并始终对造反派头头寄予希望。

毛主席认为造反派头头们的错误是“小将犯错误”，是可以通过整风和“斗私批修”（办学习班）的办法解决的。

对此，我们可以从周总理1967年10月10日对武汉造反派头头的讲话和1968年7月28日毛主席接见五大学生领袖时的讲话中得到印证。

武汉新派头头吴焱金在《我亲历的周恩来总理与武汉文革》（2011年9月发表于“六十年代”网站）一文中，在谈到1967年10月周总理陪同阿尔巴尼亚客人来武汉顺便解决武汉钢新两派的大联合问题时，有这样一段记述：“总理临行前给我们讲党的历史，讲了山头主义和派性的危害性，告诫青年人要正确对待自己，不要头脑发热，不要膨胀，要

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自己，不要脱离群众，要始终保持工人阶级本色，始终要做有利于大团结、大联合的工作等等。其间还点名问朱鸿霞：‘把湖北省交给你管行不行？’朱鸿霞连连摆手：‘不行不行’。总理说：‘好嘛，有自知之明，年轻人还要经受锻炼成长’。点名对我说：‘把武汉市交给你管行不行？’我也连忙说：‘不行不行！’总理说：‘现在不行，不等于将来不行。革命时期，很多同志很年轻就当了团长、师长，照样打胜仗，关键看你为谁打仗，执行什么路线’。”

1968年7月，清华大学两派武斗不断升级，蒯大富领导的一派打死打伤了毛主席派去制止武斗的工人。8月27日，毛主席、林彪、周总理、江青等接见了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在五个多小时的会见中，毛主席以长者慈爱的态度，以商量的口吻和他们交谈，引导他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

现在有人说毛主席、周总理在文革中、后期如何如何整治造反派头头，我认为用“整治”二字似有不当。

为了帮助造反派头头提高政治思想素质，毛主席、周总理采取的办法是搞整风，办学习班。结合到省市革委会的造反派头头不仅集中在北京办，也在所属的省市办。而结合到院校革委会的造反派头头则在本校办，而且是一个学习班接着一个学习班地办。

在学习班期间，主要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搞“斗私批修”。

现在一些人把办学习班也说成是“人整人”，我认为是不对的。我作为华工院革委会委员，也曾参加过几个学习班，如“学习贯彻5·27指示学习班”“学习贯彻9·27指示学习班”等。每次学习班都在一个月以上。我并不认为在学习班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挨整”。当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斗私批修对每一个人来说都不是轻松的，甚至是痛苦的，但我认为这是非常必要的。试想：如果没有当时一个接一个的学习班，造反派头头思想中的山头主义、无政府主义、极左思潮能轻易消除吗？如果这些错误不能及时消除，大联合能实现吗？各级革委会能顺利成立吗？

我认为毛主席、周总理决定办学习班绝没有要否定造反派头头的意思。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毛主席在世时，这些头头们的职务并没有被

撤销，是省市革委会副主任、常委的还是副主任、常委。当一些地方的军政府和重新上台的走资派借机对造反派头头进行无情打击时，毛主席还一再告诫这些人对小将们“要手下留情”，“要宽大为怀”，甚至还讲：“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

对造反派的致命打击实际上是发生在毛主席逝世后。这是毛主席和周总理当时没有想到的。

现在有人把办五七干校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说成是“整人”，那就更没有道理了。

五、关于文革时期的经济

历史学家经常用“发展生产力还是束缚生产力，经济是发展了还是倒退了”来评价一次更朝换代或革命，并以此来评价其领袖人物。认为凡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更朝换代或革命是正确的、进步的，反之则是倒退的、反动的。

文革结束后，我国社会包括思想理论界，流传着一个被许多人接受而且很少怀疑的说法，即：“文化大革命把我国经济搞到了崩溃的边缘”，而且大家都认为这是中央的结论。

实际上这是一个以讹传讹的说法，并不符合历史真实。

对文革期间的经济成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这样表述的：文革时期我国国民经济“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

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目前，全国工业企业达到 35 万个，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固定资产达到 3200 亿元，相当于旧中国近百年积累起来的工业固定资产的 25 倍。从我们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 1952 年算起，到 1978 年，我国工业发展尽管有过几次起落，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仍然达到 11.2%。”

上述《决议》和叶剑英讲话都是在否定文革、非毛化盛行的情况下作出的。因此，对文革在经济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显然是轻描淡写而已。

事实上，在文革期间我国经济不是“有所发展”，也不是“很大发展”，而是迅猛地发展。而且这些发展都是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绝没有现在所谓“虚拟经济”的成分。

我们先来看看文革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统计数字：文革时期（1967年至1976年）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为：工农业总产值为7.1%，社会总产值为6.8%，国民收入为4.9%。阶段发展指标：1976年与1966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9%，社会总产值增长77.4%，国民收入总额（按当年价格计算）增长53%。生产水平：1976年和1966年主要产品产量相比，钢铁增长33.5%，原煤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146%，农用氮、磷、钾化肥增长117.7%，塑料增长148.2%，棉布增长20.9%，粮食增长33.8%，油料增长61.6%。与建国初期相比较，以1952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为100%，可以看出，1976年的指数626.6%，比1952年的指数增长526.6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十年间增长了5倍还多。

如果我们不看这些数据，只看事实，那么我想凡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人，不管你当时是工人、农民、士兵、干部、青年学生、下乡知识青年，都见证了以下事实并为此兴奋过，激动过：

1. 文革中“两弹”爆炸，“一星”上天，导弹核潜艇下水，万吨水压机诞生……

正是由于有了这些“国之重器”，我们的国家才算真正站立起来了。它不但奠定了我国作为一个大国、强国的基础，而且向全世界昭示了伟大中华民族正在复兴。

邓小平也承认：“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江泽民也曾指出：“如果没有毛主席、周总理当年在非常困难条件下搞成的原子弹、氢弹，我们就没有今天这样的安全局面，恐怕早就挨打了。”

2. 文革中的“援越抗美”、“三个世界划分”、“乒乓外交”。

正是由于毛主席、周总理实行独立、正确、灵活的外交，才有了我国在联合国地位的恢复，才有了世界霸主美国的基辛格借道访华、尼克松与毛主席在书房握手，才有了一大批国家的元首、领导人纷纷来北京。从而解除了资本主义阵营对我国长达几十年的封锁，为打开国门、改革开放创造了条件。

3. 文革中的“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是我国亿万民众都参与了的，其声势之大，影响之深，是难以抹杀的。

正是文革期间开展了“工业学大庆”，在大庆油田后就又有了胜利油田、大港油田、任丘油田、辽河油田、中原南阳油田、江汉长庆油田、吉林扶余油田等。我国原油产量以每年平均递增 18.6% 的速度增长，到 1978 年年产量已突破了 1 亿吨，原油加工量比 1965 年增加 5 倍多。从而使我国从一个贫油大国变成了世界第七产油大国。

正是由于开展了“工业学大庆”，全国工业战线的广大干部群众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取得了三线建设的伟大成就。

三线建设不但初步改变了我国内地基础工业薄弱、交通落后、资源开发水平下的不合理工业布局状况，为我国后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三线建设还催生了一大批新兴工业城市，如攀枝花、六盘水、十堰、金昌等。

在交通运输方面，文革期间我国相继建成的川黔、贵昆、成昆、湘黔、襄渝、阳安、太焦、焦枝和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等 10 条干线，建成了包括滇藏公路、韶山至井冈山公路在内的许多贯穿各省城乡的公路干线。到 1979 年，全国铁路通车里程达五万多公里，有复线的八千多公里，并且开始了电气化铁路建设。内燃机车也投入了使用，铁路货运量达十亿万吨。全国公路通车里程达八十余万公里，全国两千多个县基本上每县都通了公路，大大地改变了西南地区交通闭塞的状况，不仅在当时适应了战备的需要，而且对以后内地的四个现代化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三线建设中，我国建成了一大批机械、能源、原材料工业重点企业和基地，机械企业有第二汽车制造厂、陕西汽车制造厂、四川汽车制造厂、东方电机厂、东方汽轮机厂、东方锅炉厂等；能源企业有贵州六

盘水地区和陕西渭北地区的煤炭基地，湖北的葛洲坝水电站，甘肃的刘家峡、八盘峡水电站，贵州的乌江渡水电站，四川石油天然气开发，陕西秦岭火电站等；原材料工业有四川的攀枝花钢铁基地、重庆钢铁公司、重庆特殊钢厂、长城钢铁厂、成都无缝钢管厂及成都钢铁基地等。这一时期共建成钢铁企业 984 个，工业总产值比 1964 年增长 4.5 倍；建成有色金属企业 945 个，占全国总数的 41%，10 种有色金属产量占全国的 50%。

文革中的“农业学大寨”更是影响深远。

全国农村广大干部群众治山造田、治河修渠，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

长江中下游水利建设取得重大成绩，兴建了荆江汉江分洪等工程，共建成五百多座大中型水库，灌溉面积达 1.55 亿亩；

全面治理黄河取得重要进展，扭转了黄河历史上“三年两决口”的险恶局面，灌溉面积达 800 万亩，1971 年黄河流域粮、棉产量比 1949 年分别增长 79% 和 137%；

治理淮河成绩显著，共开挖 11 条大河道，建成三十多座大水库、两千多座中小水库，灌溉面积相当于 1949 年的 5 倍以上；

根治海河取得巨大成就，治理了子牙河等 5 大河系，修堤 4300 公里，疏浚 270 条河道，建成 80 座大中型水库、1500 座小水库，万亩以上灌区 271 处，排洪能力比 1963 年提高 5 倍；

大规模治理辽河取得成效，建成水库 220 座，灌溉面积由 63 万亩增加到 1100 万亩。

此外，这一时期各地先后完成或初步完成的主要水利工程还有：豫、皖、苏三省开挖新汴河、治理沱河工程，河北黑龙港地区防洪排涝主要工程，京郊治涝工程三条主河道通水工程，宝鸡峡引渭灌溉骨干工程，汉江丹江口水利枢纽初期工程，江苏淮安水利枢纽工程，丹江渠道主体工程，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黑龙江北部引嫩工程，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等。在打井抗旱、兴建水电站方面，这一时期也取得了重要成就。据统计，1977 年我国农田灌溉面积达 7 亿亩，比 1965 年增长 41%，平均年增长 2.9%；1977 年我国机电排灌面积达 43167 万亩，各种水电站机电

总装机容量达 4289 千瓦，分别比 1965 年增长 355.58% 和 643%，平均每年增长 11.15% 和 16.8%。1975 年我国机井数达 181.75 万眼，比 1965 年增长 935.89%，平均每年增长 25%。

在水利建设中，到 1977 年全国各地共兴修了近百条人工河，建了七万多座大中型水库。例如，令世界震惊，被称为“人造天河”的林县红旗渠于 1969 年全部建成，总干渠长 104 里，灌溉面积可扩大 60 万亩；湖北省的汉北河也是一条人工河，1970 年竣工，全长一百一十多公里，建成后扩大灌溉面积一百多万亩。

诸如以上这样的艰巨豪迈的工程，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未实现的，而且都是在当时物质条件匮乏、施工机具落后的情况下完成的，它完全称得上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

文革中的农业发展与 1958 年大跃进时不同，它是建立在科技发展基础上的。从七十年代初开始，我国在改良品种、消除病虫害方面就取得了世界闻名的成绩。我国著名的水稻专家袁隆平研究杂交水稻从六十年代就开始了，1975 年 10 月 20 日正式通过了国家鉴定，其成果开始推广。新品种使水稻产量提高了 20%，亩产达千斤以上。另外，有关科研所培育的小麦新品种、水稻新品种以及杂交玉米、高粱等不断更新，给农业产量带来很大的变化。在防止病虫害方面，1968 年就解决了马铃薯退化的问题。到 1977 年我国连续十年没有发生蝗灾，这一危害中国数千年的“东亚飞蝗”之灾被消灭，也是农业科学史上的一个重大胜利。

总之，文革期间中国农业在基本建设和改变生产条件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生产力发展是具有历史决定性意义的。从此中国农业不仅告别了因发生自然灾害而使产量显著下降的历史，而且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其直接成果就是八十年代初期的农业大发展。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六、七十年代的成就，中国农业仍然停留在六十年代中期前的条件上，不管你实行什么样的管理体制和改革，是分田到户还是联产承包，农业产量要在短时间内有那么大的提高是不可能的。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到 1978 年，我国工业和农业总产值的比例构成，已经从 1952 年的 43.1：56.9，变为 75.2：24.8，从此可以看出我国已初步实现了国家工业化的目标。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文革中我国的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那些说文革使我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崩溃论”者不仅是对历史事实的公然诋毁，也是对曾经亲历了那段历史并为我国经济发展节衣缩食、艰苦奋斗、流血流汗，作出了巨大牺牲，立下了座座丰碑的亿万人民的蔑视和侮辱！

我毕业分配后参加了三线建设。我见证了修建云南中谊村铁路支线和田坝煤矿支线的全过程。见证了我们铁路指挥部三千多建设者住油毛毡、草席搭建的工棚，用较原始的工具（当时大型施工设备很少），凭着“建设四化”的热情和高度的责任感，仅用了5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云南两条铁路支线的修建工程。这两个工程如放到今天，会花多少钱不说，即使用现代的大型施工设备来修建同样长度的两条高等级公路，要在5年的时间内完成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那些相信“崩溃论”的年青人，你们可以回家问问你们的祖父母、父母，他们当时可能是石油战线或三线建设的一个普通工人或干部，也可能是一个企业的普通职工或曾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也可能是一个人民公社的社员，听听他们是怎么评论文革时期的经济建设的。他们很可能会告诉你他们当时吃了很多苦，流了很多汗，甚至受了很多委屈。但他们肯定会告诉你那是一个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努力奉献的年代；是一个物质相对匮乏，但生活必需品及住房、医疗、教育都有基本保障的年代；是一个贫富悬殊很小、社会稳定的年代；是一个没有贪污腐败、更没有“黄赌毒”、极少刑事犯罪的年代。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都认为“先苦后甜”、“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吃水不忘挖井人”、“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是正确的。人们也认可今天那些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特别是在创业初期的含辛茹苦、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是创业成功的必要条件；但今天一些人却对新中国在建国之初曾经经历的奋斗和苦痛不以为然，他们享受着前人奋斗的成果，不但不知道感恩，反而报怨前人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不能不说这是一种罪过，确实是太令人遗憾了。

附件 周总理接见亚非作家协会外宾的讲话（1967年12月22日）

陪同接见的有：郭沫若、许广平、郝德清

被接见的外宾有：森纳那亚克（锡兰）、白石丸、白土吾夫、西园寺公一、北泽阳子、北泽政雄（日本）、贾米鲁丁·阿里（巴基斯坦）、叶贡（缅甸）、威利·易卜拉欣·伊萨·阿费夫（印尼）等十几个国家的二十七名作家。

去年中国开始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是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近一年半的文化大革命发展的深度、广度和速度都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当然，方向是毛主席早就预见到的。诸位或许都读过我们党七届二中全会的文件，毛主席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进入城市，全国解放以后，在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上的矛盾会尖锐起来，成为主要矛盾。确实，我们进了北京城，从一九四九年到现在整整十八年，十八年的变化，就是不断地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一条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党内和社会上的斗争都在继续和发展。当然这十八年中，指导的主要方面是毛主席为代表的一条红线。不然的话我们不可能在十八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这么重大的成就。这是主流。但是另一方面确实有一条黑线，即刘少奇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经常的忽隐忽现地干扰无产阶级的红线。但这一条黑线有它的特点，即它使用两面派手法，通常好像与毛主席一致，善于表面上同意和悔改，毛主席说的，它一般也执行，不然它就没法隐藏在党内，骗得党和人民信任了。这条黑线不仅刘少奇一个人，而是他那一帮，我们现在说的一帮，那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到了关键的时候，他们就干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红线，反对这一红线，我想给你们举几个例子。

比如一九四九年，我们进入城市以后，我们面临着两个问题，一个是解放南中国（长江以南的部分），准备百万雄师过大江，这是主要方面。你们是作家，你们知道这首诗吧（指“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另一方面与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进行谈判。他现在住在北京。这是当时的主要任务，要么使国民党南京政府投降，改编它的军队，或者彻底消灭。但刘少奇却急急忙忙跑到天津与资本家会谈去了，不管这样的大事。当然我党是要与民族资产阶级有一段时间合作的，争取他们合作，使他们不破坏我们的生产。但是刘少奇与资本家做的超过了我党的改策。他要合作的包括买办资产阶

级，并主张保留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和影响，所以，毛主席知道了以后，就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对民族资产阶级提出了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刘少奇也表示接受了，好像一致似的。

我们解放后的另一件大事是在广大解放区（新）完成民主革命时期还没有完成的任务——土地改革。在老解放区，在全国占很大面积，早就进行土地改革了，仍需要继续前进。

关于土改问题，是法兰西民主大革命时的一个大问题。

但中国要引导农民走合作化，不可能停留在个体的小农经济上，否则小农经济就在每天每时产生资本主义，这时，在山西已经出现了互助组——最低的合作化形式。刘少奇发现了这个情况，他不向中央汇报和讨论，自己写了一封信，要停止发展合作社，而发展个体经济，这就证明他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

当时毛主席发现了，纠正了错误，他表面上同意，他又蒙混过去了。

第三件事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速度问题。一个新的国家刚刚从战争中恢复过来，计划不可能很准确的，而且一定是不完善的。因此就在计划中发现，有些该搞的没搞，有的不该搞的搞了，有的搞多了，有的搞少了，有不平衡。这种情况按毛泽东思想来说，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任何平衡都是暂时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这就是对立统一嘛！所以这样的问题，就是要调整。有了问题，然后调整，总之，是要前进的。但刘少奇就是大惊小怪，他给《人民日报》写文章，反对冒进，给人民的热情泼冷水。

特别是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问题上，他犯了更大的错误。在一九五六年我们党的“八大”时，我国工商业已经公私合营了，基本上已转为社会主义性质了。农业高级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这种情况下只是生产关系在所有制方面解决了，客观地讲，这是当时的事实。但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还没有解决，上层建筑也没有解决。

刘少奇在当时的报告里提出了另一个奇怪的反马列主义的理论，他说中国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问题都解决了。中国现在生产力落后了，生产力落后于生产关系，落后于社会制度，这个结论是什么呢？就是要发展生产力，技术决定一切。要发展生产工具，要人学技术，来掌握生产工具。不错，技术是要提高、要进步，人们是要创造和掌握生产工具的，但是，当时更

重要的情况是：生产关系在所有制方面解决了，在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在上层建筑方面还没有解决，还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不符合生产力的发展。只有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才能发展生产力，才能有新的发明、新的创造，这就是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方面的工作。这些问题直至这次文化大革命才解决。所以，当时刘少奇的思想是完全反动的，是反马列主义的。因为他说，生产力落后于生产关系，当时刘少奇这种反动理论，毛主席也不知道，后来毛主席知道以后，严厉地批评了他。这就是一九六二年以前的大事情。

更严重的是从一九六二年到去年，即从十中全会到十一中全会。这个问题是毛主席发表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里指出的。毛主席的大字报集中地概括地指出我党十中全会公报批评了右倾思想，当时刘少奇是代表。右倾思想的特点，第一是在国内，把国内困难看得很惶惶不可终日。农业有灾荒，他要分田到户，使农业变成小农个体经济，这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毛主席的看法与他相反，毛主席认为困难是可以克服，只要我们上面少瞎指挥，少向农民征购粮食，这些问题很快就会解决。事实果然如此。从六二年到六七年七个年头；不仅是粮食，而且在农业上其他方面都获得了丰收。根据今年不完全报告，今年粮食产量已达到××吨。实际上农民手里还有一部分。因为农民虽然已经集体化了，但他们毕竟是农民，不是工人。他们要保留一些可以备荒。中国有一句老话：“藏富于民”，按现在的话来解释就是藏粮食于实行集体经济的生产队。如果一旦有事，不但国家有粮食贮备，农民也有粮食贮备，到处都可以打仗。我说这番话也不是没有根据的，是有经验的，十八年前，也可以说二十年前，解放战争时期，我与毛主席在一起，后来我们撤出了延安，当时每家都有粮食：敌人每到一村，农民就把粮食藏起来，我们一去，就可以从农民那里用钱买到粮食。

第二件事：一九六二年在困难时，我们票子稍稍多发了些、财政上有些小小的赤字。刘少奇说，这是通货膨胀。要使货币贬值，把资产阶级那一套搬出来了，好像英国一样，我们坚决反对，因为这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财政上一时的不平衡是正常的，没有必要大惊小怪。只要发展生产，就可以克服。我们在六二年以后，六三、六四、六五年把欠

苏联的债还光了。把欠东欧的一些小数目也还光了。其中包括利息，按没有贬值以前的美金计算是×亿美元以上。

我们现在一身无债（森插话：中国欠苏联的债里一部分是用来买武器援助朝鲜战争的），我们援助朝鲜的军火用钱买的，苏联卖给我们的武器中有美国租借给苏联的武器，苏联用半价卖给我们。

我们不仅还了外债，而且我们的内债——建设公债在明年就还光了。从六二年开始，我们就不发公债了。六二年最困难时，我们也没发公债。这也是给刘少奇的一击。

美国无外债，但内债不是已达一千亿了吗？恐怕我记错了，可能是三千亿（美元），反正他没法还债，发了新的还有旧的。

第三件事，对外政策。他主张“三和一少”。这不是他想出来的，是邓小平想出来的，还有书记处的其他一部分人，但刘少奇没有反对。六二年的公报里反右倾，是指刘少奇。关于国际政策，我们兄弟党可以证明，在座的缅甸同志就晓得。

到了一九六三年，根据党内存在的右倾情况及在干部、群众中的影响，毛主席提出要搞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出了有名的一九六三年的社会主义教育十条，指出我们中国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修正主义，这时刘少奇他提出第二个十条，与毛主席唱反调。好像农村的干部都不能用，要搬石头。他不相信基本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是好的。当时毛主席就提出相反的意见，说这是形“左”实右。指出四清应打击党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主要在农村依靠贫农和下中农，在工厂依靠工人和积极分子。毛主席在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年批评了他（刘少奇），当时他承认了错误，但实际上没有改变，毛主席最后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以发表了北京大学的大字报，把它公布于全世界，后来又在党内十一中全会上发表了他自己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来清算刘少奇的罪行，关于文化大革命方面，我想在座的朋友们就清楚一些，我就不多说了。

朋友们会问：既然发现了这么多问题，为什么不早解决，所谓解决，彻底解决，这样也就写不出“黑修养”这本书来了。很遗憾，许多兄弟党、马列主义党、反修的党受了不良影响，问题在于十八年的许多问题不只是刘少奇个人，而是一个思潮。党内有一些干部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他是有

代表性的。因为中国社会上还存在着阶级斗争，这就不能不反映到党内来，如果不是不断地揭发，不断地暴露，就不可能教育党员、干部和社会上的广大群众了。

同时，我们又从苏联党的发展中得到了教训。斯大林在列宁死后，也曾经长期地同各种错误倾向作尖锐斗争。如反托洛茨基、布哈林、加米涅夫和季可夫等，但这一斗争只限于苏联党中央委员会内部，后来把决议向党员宣读，因此，没有在党员群众中，更不用说在广大的社会群众中引起广大争论和讨论了。斯大林一死，就出现了新的布哈林和托洛茨基，如赫鲁晓夫呀、米高扬呀，更不用说贝利亚了，公然搞修正主义，搞资本主义复辟。苏联党内，社会上，不是没有反对，也存在一些不满，但沉默得很，没有行动。

所以，鉴于这个教训，毛主席认为，一定要把斗争诉之于群众，不仅党内的群众，而且诉之于社会上的群众，还要诉之于世界。毛主席对许多兄弟党都说过这样的话，特别是日本的党，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说：“如果我们中国后代出现了修正主义的话，只要你们日本党还是坚持马列主义的，你们就可以发动中国的党员起来革命，帮助我们把这个修正主义推翻。”当然，这话是对日本共产党的真正左派说的，而不是对宫本修正主义者说的。因此，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有意识、有准备地进行的。

从一九六三年社会主义教育，四清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准备，就是它的准备阶段。毛主席做了充分的群众动员、准备，同时也做了思想舆论的准备，比如一九六三、一九六四年的戏剧改革就是一方面，你们诸位看了两个戏。我们把西方的芭蕾舞也灌了现代的革命内容。把芭蕾舞只能演古典的，甚至说只能演宫廷戏如“天鹅湖”呀，（森说：“睡美人”）最近我发现，在苏联教育中，都是大国沙文主义的，但苏联的芭蕾舞教育中全是法文教的，而不用俄文。他们有崇古崇洋的东西。比如请诸位听了交响乐。交响乐过去只能算第几乐章，第几乐章的，什么八乐章呀。现在我们改成了交响音乐，可以谱写革命戏剧，演革命的人民。（总理问外宾看的哪出交响乐，回答说是《沙家浜》）最近他们发展的有些不对头，他们有些喧宾夺主，他们把唱和表现为主而不是演奏为主。这不是江青同志最初的意思。我看了几次，提出了意见。交响乐总是要以音乐为主，伴唱为辅嘛！就像芭蕾舞应该以

舞蹈为主，伴唱为辅一样。这都是插话。

舆论准备早就开始了。一九六五年姚文元同志——他现在我们中央文革的成员之一，写了一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更早些时期×××揭发批判了领导太平天国一支起义军的李秀成叛变行为。太平天国起义军当时曾占领了半个中国，持续了十五、六年，有了这些准备，到去年六月一日毛主席把北京大学第一张大字报公开给全党和全国人民。这是在最高领导之下的从下而上的群众运动，这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还从来没有搞过这一运动，革命之势不可阻挡。因此文化大革命就名称、形式看是思想革命，从实际上不只是思想革命。从今年初起又进行了政治革命、经济革命。有了思想发动以后，就开始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权，这不是政治革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不是政治革命？进行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建立临时的权力机构，这不是政治革命？群众一觉悟起来，群众就用自己的力量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去掉了，代替他们的是革命的三结合的权力机构。革命的三结合在中国实行起来有两种，一种是革命的领导干部，当地驻军（或民兵）的代表和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另一种是革命的领导干部，中年的领导干部和年轻的群众组织的代表。革命的三结合把老年的、中年的革命干部选拔到新的领导机构中来，他们有经验，宝贵的革命经验，有错误在群众帮助下改正了。而新的领导机构中的年青的积极分子，他们来自群众，联系群众，保证了群众路线的贯彻。这样的三结合会保证我国永不变色，防止出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各位在座的来自民间，不是当权的，可能不能理解或不完全理解我们的作法。但你们的写作也必须联系群众。不与群众联系，不参加他们的实际斗争，写不出好的作品来，这是诸位都知道的。我国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领导层还是不容易接触群众，很难得到第一手生动材料。智慧是从群众中来的，创造性发明也来自群众。领导者的作用是加工这些材料，所以是加工作用。这个加工是重要的，不加工是粗糙的，不能成为成品。但是没有材料又加什么工？那样必然成为官僚主义，小的是官僚主义，大的就是修正主义，官僚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间是没有鸿沟的。列宁说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一种惩罚。在座的年青的中国同志，他们比较容易接近群众，容易得到群众的智慧。在座的翻译同志是外交部来的（对译员）你们都是五三派的？（一人答：她不是

五三派的，是东方红的）那里斗争很尖锐，他们参加了实际斗争，熟悉实际斗争生活，我们要向他们学习，不然，我就不能领导好外交部的工作。这也包括反面教训在内。如烧英国代办处，我们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都不同意，但劝也不行，他们就是烧。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和我四个人联名劝告他们都不听，这就教育了我，外事系统有一种极“左”的思潮起作用。当然在八月前这种思潮就有，但必然要发展到这个时期才能暴露。这时我们一讲话，外交部就起来斗争了。最近发现极“左”思潮后面有坏人，没有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不能发现的。这只是拿外交部作例子，全国都有这样的事情。诸位还知道，有的地方不只吵架，而且用了热武器，不只在家打，还到社会上打，为什么？有原因，或者走资派不甘心失败，背后操纵，或者外国派的特务，钻进我们党的间谍，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他们兴风作浪。这种人是极少数的一小撮，他们当了坏头头，或幕后操纵。一般说，还是群众中一种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思潮的反映，小资产阶级派性，无政府主义等等。这样打仗，甚至打武仗，就没有什么可怕。一句话，乱起来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教育了自己。一乱，敌人就钻出来，因为他们是要趁火打劫的，带头挑动，这样的乱，锻炼群众，教育自己，有什么不好？像毛主席所说的，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嘛。

第三，说说经济革命。这就是说，许多企业的许多制度要改革。工厂里一层一层的，层次太多了，这就使非生产人员的比重增大，工资等级太多，再加上奖励，工人的工资差别太大。另外劳保制度不合理，××多万工人和职员享受劳保待遇，临时工、合同工享受不到，市民和广大农民更享受不到，这就更容易滋长特权思想。分配制度有很多不合理，因此必须有一系列改革。斗批改，斗走资派，把他们撇开，群众一起来就可以解决了。批，批反动学术权威，社会科学方面的，自然科学方面的，这不那么容易，要下功夫，要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毛主席著作。改，改革制度就更复杂，因为许多单位是互相联系的。孤立的改一个单位是不可能的。这个工作在今后，明年要大作特作，但也不难，只要群众的注意力集中到这方面来，就会想办法。一个个机关，一个个单位来解决。

政治革命、思想革命、经济革命之后，还有一个组织革命。首先，党要整顿。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副产品就是群众学会了自己教育自己，而不

是让干部教育他们。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间，调查出我们的干部很多问题。我党在大革命失败以后，转入地下，搞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又与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国民党、开明士绅合作。国内战争时期，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斗争，还与民族资产阶级和民主人士进行合作，直到全国胜利。这样我党混入了一些资产阶级分子，甚至反动分子。解放后十年，党员由一百多万一下子发展到一千多万，问题很自然就复杂了，经过这次大揭发，发现干部中有一小撮是不好的分子，或是阶级异己分子，叛徒，或是敌人派遣的特务。经过群众揭发我们再加以审查，确定以后，党进行整顿或改组，我说就会更加纯洁。这为各国的革命斗争提供了经验。世界革命运动正在胜利发展，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反动派不甘心失败，包括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在内，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他们破坏革命运动、革命组织，包括革命的作家组织，派人进来，长期埋伏，到需要的时候再出来进行破坏活动。就亚洲说，日本党、印度党、印尼党都有这些经验。我看群众组织也不例外。我们除整党外，还要整团、整顿工人组织，甚至于新生事物的红卫兵，成为全国人民的注意中心以后，也会混入坏人。所以，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社会主义中国的一场大的阶级斗争，一场大试验。这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不敢作的。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防止出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革命的关键还是思想革命，因为只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群众所掌握，广泛的宣传，才能把精神变成物质力量，即使如此，毛主席还说，这样的革命不止一次，或十几次，这样才能保证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逐步向共产主义，推动世界革命，真正创造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的新世界，真正进入共产主义，一个国家不可能单独进入共产主义。关起门来建设社会主义，帝国主义要打仗，你就无法对付。一个国家可以建设社会主义，但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经过世界范围的阶级斗争考验。苏联不是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吗？如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起来，帝国主义还存在，大战是不可避免的，用什么形式进行是另外一回事，不能预想，这个问题还要看发展，如果世界革命来得快，形式会是另一样，但现在还不能说，世界范围内的阶级斗争较量是不可避免的。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必须防修反修，保证不出资本主义复辟。中心问题是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大众化，普遍化，然后

文革篇

化精神为物质力量，这是真正的备战，准备帝国主义挑起战争，加以消灭。这点连帝国主义也逐步认识了。

目前在文化大革命的这一紧张阶段，我们虽已取得决定性胜利，今年比去年好，明年比今年会更好，但我们的队伍——组织革命正在进行，至于思想革命，还是长期的，因此，作家的队伍也还没有整顿好，还没有很好地组织起来。……

我们共产党内也有左中右。不要以为这次把刘少奇清除了，我们党就完全一致了。可能我们党在九次代表大会会提出按毛泽东思想来建党，以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为指针，要党员入党宣誓词接受党章党纲。但以后还会出现右派。在人类中，一样还会有右派，但那时的右派与现在的右派的含义不同而已。……

[原载武汉新华工革委会材料组印《学习材料(第89期)》，1968年3月]

第二十五章 投身改革

一、文革被中央否定

1976年毛主席去世后不到一个月，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等人就对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采取了行动。对此，当时全国人民虽然感到震惊，但总的说来多数人还是拥护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华国锋是毛主席指定的接班人，而且有毛主席的遗言“你办事，我放心”作为他执政合法性的证据，人们因相信毛主席而拥护华国锋；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大多数人确实对长时期的政治运动已经感到厌倦，希望和平与安定了。

1977年8月，中共提前召开了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华国锋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在这次会议上，华国锋宣布“第一次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

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强调“抓纲治国”，这个纲是以揭批四人帮为纲。在经济建设方面仍贯彻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方针，并提出了“大干快上”和对外开放，强调要学习国外先进的企业管理和技术，并开始引进先进设备和管理经验。在昆明，当时就利用云南丰富的磷矿引进了德国的整套设备，建起了“五钠厂”。与此同时，广播、电视、报刊开始大力宣传企业改革（如建立企事业管理制度、成本核算制度，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等），一些介绍资本主义国家生活方式的纪录片和禁映多年的电影也开始在扩大的“内部”播放。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提出了改革开放、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方针。

在这次全会后，华国锋虽然名义上仍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但中国的实际掌舵人已变成了邓小平。1981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华国锋被迫辞去中共中央主席职务，由胡耀邦继任。

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胡耀邦任职期间开展“落实政策”、进行“真理标准”的讨论，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

二、上班、种菜、打麻将

对中央的方向变动及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当时多数老百姓似乎并没有什么反应。我这个原来很关心国家大事的人此时仍处在《寄影书》中所说的“茫茫何所之？束手滇池畔”的状态中。

当时我的生活很简单：上班、种菜、打麻将。

我上班是很认真的。不过，因为通过几年的不断学习和实践，我对汽车、施工机械修理中我负责的范围已是轻车熟路，应对自如了，所以上班对我来说也就显得很轻松，没有什么压力。下了班，我就去忙我的菜地，晚上和星期天则和工人们一起玩麻将或撮牌。

在我住所旁边有一块废弃的荒地，大概有五六分吧。我约了一车队的李冬海决定把这块地开垦出来，我俩各管一半。

把这块地弄出来确实花了我们不少功夫。这是一块生地，从来也没有人耕种过。原因主要是石头太多，土地太贫瘠，上面还堆了好多建筑垃圾。

我们花了近一个月的空闲时间才将这块地打整好。

种地一是水，二是肥。好在一车队和修理厂生活区的排水系统大部分都要经过我们的菜地，我们挖了个储水池，水的问题就解决了。肥的问题就更容易解决了，因为这块地的旁边就是生产队的养猪房，猪粪我们可以随意取用。水、肥问题解决了，我们这块地很快就成了上好的菜地。

我出生在农村，上大学前就一直没有离开农村、农业。因此，我对如何“盘地”虽不是很内行，但也一点不陌生。我根据节令适时播种、施肥、采摘。我的菜地虽然不大，但品种却较齐全，昆明地区农家种的菜几乎一样不少。

有了这块菜地后不但充实了我的业余生活，而且也解决了一家人的吃菜问题。当时我们种的菜吃不完，于是我又养了鸡、鸭、猫、狗。由于饲料充足，鸡肥鸭壮，天天都有鸡蛋、鸭蛋收获，我们的生活也因此改善了不少。至于我家养的“小花猫”和“小白狗”，还有那走路一摇一摆、绅士气十足的肥鸭都成了我女儿的“小宝贝”，她成天弄得脏兮兮的。

那时我们厂里还没有电视，更没有手机、互联网什么的。职工们的

业余文化生活很单调、枯燥。我们厂在长坡郊区，离城不近不远，家在城里的职工，特别是年轻人，一有机会就往城里跑，每天下午四点甚至三点以后，就有人下到公路边拦车回昆明了。

那时没有私家车，但人与人的关系好，多数人都乐于助人。因此，只要你在路边招手，不管认识不认识，驾驶员一般都会停下来让你搭上“顺风车”。

那些家不在城里的职工没地方去，也就只好将下棋、打麻将和玩撮牌当成主要的娱乐方式了。

那时一到晚上或星期天，厂里的职工文化活动室就热闹起来了，人们三五成群围在桌子旁，有的下象棋，有的玩麻将，那些“三差一”的就玩撮牌。

我也学会了打麻将和玩撮牌，经常是晚上玩。那时我们玩的麻将和今天人们玩的有些不同。首先，我们是只玩不赌。作为娱乐，对输者的处罚是木夹子“夹耳朵”。输一盘夹一个，连输连夹，一个接一个。手气背时，两只耳朵就会夹上很多木夹子，像在耳朵上梳了两条细辫子一样。当时的玩法和现在也不一样。现在多数都是玩“扳倒和”，我们那时是老玩法，即“数方”，规定“五方”以上才能和牌。“清一色一条龙”“小七对”“十三烂”都算“满贯”（十方），其他如“姊妹花”“全带么”“混一条龙”是“四方”，其他“门前清不求人”“老少配”“大龟将”“小龟将”“单调将”“二龙抱柱”等都只能算一“方”。因为规定要五方以上才能和牌，所以有时会出现全部牌都摸完了还没有人和牌的情况。

至于撮牌，听说是从四川传到云南来的，现在昆明很少有人玩了。

1976—1978年是我一生中生活最丰富、思想最单纯、精神最放松的一段时期，如按所谓“幸福指数”来衡量，这段时期也许是我一生中“幸福指数”最高的时候。

三、给公司党委写信

1978年，公司为我的“文革问题”平了反，推翻了1970年华工工宣队在“院学习班”期间给我做的“犯有政治错误”的结论。我当时写的检查、交待也都退还给我了。

到1979年上半年，全国的改革浪潮风起云涌，报纸、广播天天都在讨论改革的问题。

也许是我的个性使然，我报效国家的热情重新被点燃。

1979年9月20日，我给公司当时的党委书记黑晓林写了一封信，问了几个为什么。信中写道：

出于一片爱国心（我想，爱国是最高尚的，它比那些“政治家”口头上的共产主义强千百倍），我从参加工作以来总想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国家、民族多做点工作。但几年过去了却毫无成就。

在这里我不想自我反省。我只想向你提几个为什么，供你参考。

1. 中央已提出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策，提出要在本世纪末实现“四化”，同时明确指出“四化”的关键在科学技术现代化。公司党委对此有何打算？为什么公司正副书记、正副经理十几个，就是没有一个分管技术工作的？公司设有一二十个科室，为什么就是没有一个技术科？

2. 知识就是力量。科学是真正辩证唯物主义的结晶。为什么在我们公司科学技术得不到人们的尊重？公司成立以来，大小政工会议开了千百次，为什么技术工作会议却一次也没有开过？公司党委是不是要让我们的工人到本世纪末还凭十字镐和肩膀修桥铺路？

3. 知识分子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四化建设的骨干力量。据说公司范围内有一百多知识分子。他们现在的生活、工作怎么样？他们在哪一层？即使这些人都是大草包，总还认得几个字吧，总比目不识丁的人离科学技术近一点吧。为什么知识分子在生产、管理、技术上没有发言权？为什么他们只能在那些自命不凡的“大老粗”的指挥棒下生活和工作？

4. 中央一再强调要整顿党风。老百姓也强烈希望党的各级组织能在四化建设中起模范作用。但为什么在我们这里党风至今还是这样糟？党、官、权、利四者为什么如此紧密地结为一体？有人说：在我们这里是有才者无权，有权者无才，有权者自私，入了党草包变英雄。对此你们有何想法？建议你们翻翻组织科的各级干部名单，看看里面几个人是称职的。那些不可能入党的人又应怎样才能尽其才干四化？

在写这本回忆录时再看这封信，确实让我觉得当时的“造反精神”

还是很强的。

没想到这封信竟然起了作用。

一个月后，公司召开了第一次全公司的工程技术人员会议。黑书记在大会上还表扬了我，要求大家为公司献计献策，态度也还诚恳。

在这次会议上我又发了一通议论。

我的发言引起了黑书记的兴趣。他两次要当时三处的书记李春年带信给我，要我把自已有关公司改革的想法写成书面材料给他。我照办了。

1980年3月20日，我把《对铁路建设公司改革的几点建议》交给了黑书记。

《建议》全文如下：

对铁路建设公司改革的几点建议

目前的修配厂处于动荡中。干部作风不正，干群之间关系紧张，人心浮动，管理混乱，生产任务严重不足，工厂自己养活不了自己，大部分职工悲观失望。特别是年轻人，他们深感在修配厂前途暗淡，没有奔头。

修配厂向何处去？铁建司向何处去？这是广大职工非常关心并亟待回答的问题。

当前，修配厂以至全公司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出路在哪里？

我认为主要问题是人才和管理，而出路在于改革。

生存竞争是人类社会和大自然的一个普遍规律。作为一个企业，它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它必然服从生存竞争的原则和规律。

一个企业要生存，要发展，关键在于竞争能力。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提出竞争的口号并使广大干部群众树立竞争意识和勇气，积极地、大胆地培养自己的竞争意识和能力。

企业的竞争在于产品的竞争。而产品的竞争又是质量和成本的竞争。而决定质量和成本高低的关键又在于管理和技术。管理和技术是由人来决定的。因此，企业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人才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同样也决定一个企业的命运。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多数同志，特别是领导同志并没有足够的认识。他们不但不重视人才，反而经常有意无意地伤害和压制人才。

资本主义国家是非常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它视人才为无价宝。

为了人才，他们不惜重金收买，甚至用战争的方式去抢。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之所以在本世纪内有极大的发展，在经济上普遍比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得快，也许这就是关键所在。

为了发现人才，并使人才充分发挥作用，我认为有两个认识问题是必须弄清楚的，这就是什么是政治和外行能否领导内行的问题。

有些靠政治吃饭的人往往最不懂政治。在他们的心目中，阶级斗争就是政治，搞运动整人就是政治。在评定一个人的政治面貌时以是否是党员为标准，以出身成分为标准，以是不是“大老粗”为标准。凡是党员、出身贫寒又是“大老粗”的被认为政治条件好。而那些不是党员，出身非劳动人民家庭又有文化有知识的人则被认为政治条件不好，认为这些人是不可靠的，最多也只能作为团结对象而不能重用。

这些人的所谓政治已经给人民带来了严重后果。它埋没、压制、打击了大批有用的人才。

什么是政治？我认为，所谓政治，就是一群人、一个团体或一个政党，为着一个目标、某一信仰而进行的活动。就目前来说，搞“四化”建设就是最大的政治。凡是对“四化”建设作贡献的就是政治表现好，反之就是不好。

关于外行是否能领导内行的问题，三十年来一直在争论着。我认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以其昏昏是不可能让人昭昭的。毛主席曾经说过：“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要把我们国家搞上去，就必须使我们国家的各级党政领导成为治理国家和各行各业的行家里手。专家治国、专家治一切之时就是我们国家实现四化之日。当然，这里所说的专家是站在最广大人民利益一边的专家，而不是只为少数人利益服务的专家。

我认为，目前我厂以至全公司的管理水平与四化建设是很不适应的。不论是管理的指导思想还是方式方法，我们还处于“小生产”的水平上。

企业管理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系统工程。在这里我不想详细去讨论。

我认为目前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健全有关制度，如岗位责任制，经济责任制，质量、安全管理制等。

我们的各级领导必须明白：所谓管理，就是制定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并贯彻之。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相应的制度就无所谓管理。

我们不论干什么、说什么，都应该有一个标准，有个准绳。没有标准，也就没有是非，也就无所谓正确与错误。没有标准，那就只能是各行其是，一个人说了算。

实践证明，靠人管人是靠不住的。只能用具体的制度来约束人的行为并体现领导者的决心和意志。

人才问题、管理问题，只能通过改革才能得到解决。不改革目前的干部制度和管理制度，一切都是空话。

改革，应从调整领导班子开始。把那些通过实践证明既无才又少德的领导者撤下来，把那些只会搞政治运动，专事整人，不会管理，不懂业务技术的人坚决撤下来。把那些符合四化要求，有开拓精神的同志放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让他们在实践中去锻炼，并接受实践的考验。

要做到这一点，是需要勇气和魄力的。困难和阻力也是会很大的。但必须做到这一点，因为这是成败的关键。

有了好的领导班子以后，还应有强有力的工作班子。

现在各级虽有工作班子，但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一是有些用人不当，二是没有得力的组织领导，没有明确的分工，有职无责无权。

作为领导，应该明确领导班子和工作班子之间的关系。如果把领导班子比作一个人的大脑，那工作班子就是四肢五官。四肢五官靠大脑指挥，而大脑靠四肢五官获得信息，并靠四肢五官去执行大脑的指令。

现在有些领导是不务正业。该他做的他不去做，而不该他做的他却去包办代替，胡子眉毛一把抓。满足于“工人身上有多少油，他身上就有多少油”的赞誉。他们往往无视职能部门，采取所谓“一竿子插到底”的工作方法。其结果只能是什么事都办不好，更谈不上有什么效率了。

在干部选拔方面，一定要打破老框框、老标准。“德”、“才”应以新的尺度去衡量。我认为：在新时期，德的主要标志是看是否真心全心全意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谋利益，是否有改革、开拓的精神。对“老

黄牛精神”应重新认识。而“才”应视为胜任某一具体职务的能力。不能一说到才就是全才。“样样都行”的人是没有的。对于领导干部或分管某一方面的负责干部来说，除专业知识外，还应有与其职务相适应的组织指挥能力。而对于一般干部和职工则主要看其业务知识和能力。有的人，让他当工人，他是个人才，他可以当劳模；但如让他当干部，搞管理可能就不是人才了。

在选拔干部时，功过也是应该考核的。但对功、过应重新认识。人们应确立“无功即过”的观念。对于领导干部更应该这样来认识。

对于现有的各级领导干部，凡是他在现任岗位上两年内没有使所负责的单位或分管的部门的工作有什么发展，或变化很小，就应该把他从现有岗位上撤下来，改做其他工作。对这样的人降级使用也不合适。不能认为当不了处长可以当科长、队长。一般来说，当不好处长的人也当不好科长、队长，反之亦然。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认识是错误的。比如一个企业，它本来是一个经济单位，其职责是为国家创造财富、上交利税。如果做不到这点，甚至亏损，企业长期靠国家养活，那这个企业的负责人有什么功劳可言？他即使“辛苦得呕心沥血”也只能是有过。就像整日忙碌的猫，如果它不但不捉老鼠，反而偷吃了主人的食物，这样的猫难道不应该受到处罚吗？

在我们国家，奖罚往往不以事实为根据。一个小偷偷了几块钱他会受到舆论的谴责，甚至受到处罚，被人们认为品质不好。但一个玩忽职守的领导干部给国家造成上千万元的经济损失时，却往往没人谴责他，他照样活得很好，更不会受任何处罚。几元和几百、上千万元，谁大谁小？谁重谁轻？这本来是显而易见的，但其结果往往是相反的。

在选拔干部时应该从年青人中去考虑。年青人较少保守思想，敢作敢为，容易接受新事物、新思想，富于朝气。历来的社会变革都是由年青人发起，由年青人做先锋并以年青人为主力军的。今天搞四化也是这样。

我们的一些老同志，往往津津乐道自己年青时的所作所为。说自己二十来岁甚至十多岁时就当上了什么长，做了什么了不得的事了。但一

提到今天的年青人他就会连连摇头，大有今不如昔，一代不如一代之感。在他们眼里，二十几岁的人还是毛孩子，四十多岁的人还“不成熟”！

我认为，作为生产第一线的厂（队）负责人，年龄不要超过三十五岁，大部分应从二十五岁到三十岁的年青人中去挑选。处一级的年龄不能超过四十五岁，公司一级的不要超过五十岁。

在管理方面，应从改革管理体制方面开始。体制改革应从提高效率出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目的。

目前，我厂以至全公司的管理体制都是相当落后的。我厂不到三百人，实行厂、车间、班组三级管理。车间一级不但起不了好作用，反而经常出现“肠梗阻”。而公司实行的是公司、处、厂（队）三级管理。我认为处这一级也是多余的。

我认为：厂（队）一级应实行厂（队）、班组两级管理。而公司应实行公司、厂（队）两级管理。根据我公司“面广线长”的特点，也可实行总公司、分公司、厂（队）三级管理，但应作重新调整。

调整的原则应是有利于专业化。也就是说，调整以后，各分公司、各厂（队）都应有自己的专业特征，成为一支专业化的队伍。

根据目前的情况，总公司下可设三个分公司。即把全公司三个处的六个车队、一个修理厂、两个机械队合并成立一个机械化施工分公司，把现在分属三个处的桥梁、隧道技术力量和施工队伍合并起来成立桥隧公司，把路基和房建方面的技术力量和施工队伍合并成立房屋土建公司。

如果把现在各自配套、独立的三个处按上述要求成立三个专业化公司，我们公司的生产力和经济效益将会比现在成倍增长。

成立专业化公司有如下好处：

（一）把分散、闲置的人、财、物集中起来，能充分发挥其生产力和经济效益。

1. 人力集中

我公司现拥有机械、运输、土木工程等各方面的专业人才和施工队伍。但分散在三个相对独立的工程处，他们不可能充分发挥作用，形成不了强有力的生产力。

如一、二处均有桥梁、隧道修建方面的工程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

但各自的力量都不强，谁也不能承担大型桥梁和隧道的工程修建，即使有了大的工程任务也只能看着白瞪眼。如果把现两个处的相关力量集中起来，情况就不一样了，就完全可以接下大型工程的修建任务了。

又如施工机械，一、二处都有自己的机械队，各自拥有大型施工机械二十几台。在一般情况下，他们各自都可以完成施工的需要。但对那些时间要求紧、质量要求高的大工程，往往他们就谁也吃不消了。现由于两个处各自独立，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一个处的机械队白天黑夜连续作战，人和设备都拼得精疲力竭，而另一个处的机械队却无事可干，天天“向太阳”。

再如汽车、机械的维修力量，三个处都有，但三个处的技术力量都不强。如果把这三个处的修理力量合并在一起，那修理的各方面的力量都强了，起码承修本系统的汽车、机械的力量绰绰有余了。

这方面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它们说明一个问题：必须把分散的人力集中起来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2. 财力、物力集中

相对来说我公司的财力和物力是比较雄厚的。但同样由于没有集中起来而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就施工和运输设备来说，全公司拥有大型施工机械五十多台套、各种汽车两百多辆，还有各种配套设备几百台件，占用固定资金六百多万元、流动资金两百多万元，总共近九百万元。这显然是一个可观的数字。但现在却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造成了很大的浪费。就以汽车、施工机械修理配件所占用的流动资金为例，如果由修配厂集中统一使用，三十万元就足够了，而且可以随时供应配件。但现在流动资金却分散在三个处的六个汽车队、两个机械队、一个修配厂中使用，虽然流动资金有两百多万，却显得还是不够用，备件不能及时供应。

还有修理设备问题。三个处都搞汽车、机械修理，结果是修理用设备重复购置，造成很大的浪费。

财力、物力的集中使用势在必行。

（二）成立专业化公司有利于管理，有利于提高职工队伍的素质。

我们公司目前的管理还是比较落后的。这除了领导者的指导思想的

原因外，管理干部的素质差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而管理干部素质差又与非专业化管理体制有关。

一个管理干部的素质，主要体现在对某一专业的业务能力。离开了具体的专业，就不好评价一个人的业务能力。一般来讲，一个管理干部只有某一专业或某几个专业的业务能力。一个在政工方面业务能力强的在生产管理业务方面可能就是一个睁眼瞎。

我们目前的三个处都是小而全的施工队伍。就一、二处来说，每个处都既有机械专业又有土建施工专业，每个专业中又有几个不同的工种。土建施工中有桥梁、隧道，有路基、房屋、车站等。按一个称职的管理者来要求，每个处的处长、技术科长以及所有业务科长都应是本处各个专业的内行。而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现在公司所属三个处包括公司在内就没有一个这样的经理、处长、科长。不少人甚至在所负责的范围内没有一样是内行的。

如果我们把各方面的管理人才分类集中使用，那我们的管理水平就有可能得到大大的提高。不但精简了机构，而且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减少管理成本。

如机械方面的工程技术人员，全公司有六七人，熟悉这方面的管理人员也有七八人，总共十四、五人。现他们都分散在各处厂（队），谁也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如果将他们集中在机化公司，并以他们为技术和管理的骨干，他们的作用将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加。机化公司的领导们就可以把全部精力放在机械的管、用、养、修方面，用不着再操心与机械无关的事情上了。由于业务专一，他们的管理和业务能力将大幅度提高，这是毫无疑问的。

由于现在全公司的生产、施工、运输的机械分散在三个处的五队一厂，用于这方面的管理、后勤服务人员达三百多人。如果成立机化公司，一百五十人左右就够了。这样不但可以精简机构，加强生产第一线，而且可以大大节约生产管理成本。

（三）成立专业化公司有利于竞争

一个企业，应有自己的拳头产品。铁路建设公司的拳头是什么呢？回答是：现在还没有拳头。如果我们成立专业化公司，那我们起码会有

三个拳头，即桥梁、隧道和机械化土建施工。因为在这方面，我们有优于全省其他企业的有利的条件，在今后的竞争中我们将占据有利地位。

除了上面讲到的几个问题外，我认为有两个问题也应引起严重关注。这就是信息和信誉问题。

信息本身是一种财富。现代企业管理离不开信息。我建议公司成立专门的机构以收集和处理社会信息。首先要指定专人了解市场供需情况、发展趋势，了解国内外同行业的先进管理制度、先进技术和工艺。在此基础上尽快制定本企业的长远规划和确定主攻方向。如果不了解国内外的有关信息，我们的思路就打不开，思想也就解放不了，工作也必然带着主观盲动性。在其未来的竞争中必然不战自垮，没有了立足之地。

信誉对于一个企业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人在与人相处时要讲信誉，作为一个企业与社会打交道更要讲信誉。一个企业失去了信誉也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础。

在与外交往中，我们一定要以信誉为重。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为了信誉，即使赔本吃亏也应在所不惜。

以上是我对几个问题的粗浅看法，不一定对，仅供参考。

修配厂职工 张建华

一九八〇年三月二十日

四、投身改革

到1978年底，铁路公司所属三个工程处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经营性亏损。而属第三工程处（供应处）的我们厂的情况尤为严重，连续两年严重亏损，车辆返修率居高不下，车源逐年萎缩，职工人心涣散。

为了扭转我厂严重亏损的局面，公司和三处两级党委于1980年2月和7月，两次派出工作组到修配厂解决问题。第一次派出以处长宋加强为组长的工作组进厂指导厂领导工作。他们原想借那次调工资的东风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但无济于事。修理厂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亏损的趋势还在发展。7月底，三处（供应处）第二次派出以党委书记李春年为组长，李国文副处长为副组长，生产科副科长张廷玑、组织科长周子俊、施工科科长黄家庆为组员的强大工作组进驻修配厂。

然而，强大的第二个工作组也和第一个工作组一样，对修配厂的问题无能为力，一筹莫展。

经公司和三处两级党委研究，1980年8月26日，云铁司供应处（三处）党委工作组和云铁司修配厂党总支贴出了“招贤榜”，全文如下：

招贤榜

为了增产节约，开源节流，扬长避短，加强我厂的经营管理，搞好班组和车间的成本核算，把国家、企业和职工的三者利益紧密地结合起来，迅速把生产搞上去。为此，除了充分发动群众，同心同德，献计献策，“找米下锅”，广开门路，把经济搞活外，经处党委工作组和厂总支共同研究，决定采取招贤的办法，选拔建设四化人才，把我厂的生产进一步抓好，具体条件是：

一、从九月一日起到年底，共四个月，除保证每月一切开支外，净上缴国家利润五万元。

二、到一九八一年元月十五日结算，完成五万元者，奖励人民币五百元，完不成时，罚本人人民币壹百元。

三、应聘者见榜后在半个月内将自己的计划、方案和措施写成书面材料报厂总支审查后，张榜公布，听取职工的意见。

四、组织生产权限交由应招者，使之有职有权有责。本人对上级负责，对全厂职工负责，对经济负责。

五、工作组和总支及全厂职工都必须在生产方面给予大力协助，只准支持，不准刁难。

六、我厂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会会员和所有正式职工，凡愿意接受上述条件者，都可以毛遂自荐“应招”。

应招者可到工作组（原电话室）或总支办公室面谈有关具体事项。

云铁司供应处党委工作组

云铁司供应处修配厂党总支

一九八〇年八月二十六日

招贤榜贴出后，全厂反应激烈。而原厂级领导却因此愤愤不平。他们虽然同意发出“招贤榜”，但心里可能在这样想：你公司和处都说我们不行，你公司和处两级领导就行了？你们两次派工作组来厂为什么也

搞不上去？你们现要“招贤”，看谁敢来揭这个榜。

而厂内一些中、青年职工看了“招贤榜”后却跃跃欲试。

当天晚上，汽修车间主任梁华、生产调度孙武军、引擎班班长凹定忠、底盘班长张保华和我在梁华的宿舍开会，商量揭榜的问题。

会议开得很热烈。我们分析了厂里的形势、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一致认为我们的最大有利因素是人心思变、群众的情绪可用，其次是我们对全厂的生产管理、技术熟悉。最大的不利因素是原班子的人及其追随者将激烈地反对我们，给我们制造困难；其次是由于我厂的信誉这几年来已大量丧失，没人送车来修。没有生产任务，必须“找米下锅”。

27日，我们继续开会，主要讨论揭榜后的治厂方针、措施、方法，以及这几个人由谁来牵头的问题。会议决定揭榜。

28日上午，张保华向工作组递交了他写的方案。但很快就被退了回来。工作组的答复是：“这算什么方案啊”。

当晚，凹定忠突然宣布他不参加揭榜了。他没有说明原因，但我知道他想的是什么。他一是怕担风险，二是担心我们将为“谁做主”的问题闹分裂。

凹定忠的退出给大家一个小小的震动。但我们还是决定揭榜。有人提出让周国光来顶替凹定忠。张保华说他已找过了，周不同意。最后决定邀电工师傅周家炳参与我们揭榜。

关于由谁来牵头的问题，大家经过反复讨论后决定：如工作组同意我们揭榜，我们就成立厂务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因招贤榜规定的时间只有四个月，时间很短，由谁来牵头的问题是次要的问题。为了工作方便，一致认为张保华是最先提出揭榜的，就让他来当头。至于全厂的工作，将由厂务委员会办公室来统一协调、指挥。

8月29日，我起草了“应招书”。

“应招书”全文如下：

应招书

在修配厂连年亏损严重、职工思想不安定的严重情况下，供应处工作组和厂总支八月二十六日贴出了“招贤榜”。为了“四化”的宏伟大业，为了修配厂的生存和发展，我们经过认真地讨论，愿意舍弃个人得失，

应招出马。现将我们的方案简述如下，请工作组和厂总支审核决定。

一、组织指挥机构

1. 成立由张保华、梁华、孙武军、周家炳、张建华组成的厂务委员会，负责全厂除党、团工作以外的一切生产、行政工作。厂务委员会对全厂职工负责，对供应处党委负责。

厂务委员会的分工是：张保华负责全面工作，主管财务、理货（即经营）；梁华、周家炳负责生产、技术；孙武军负责行政后勤；张建华协助张保华工作并主管厂务委员会办公室及劳资、统计工作。

2. 厂务委员会下设一室四组。即厂务委员会办公室、生产组、行政组、财务组、理货组。

生产组是全厂工作的核心，分管全厂的生产、调度、材料、统计、技术；行政组负责全厂的行政、后勤、职工生活和娱乐活动；

财务组负责全厂收支、成本核算；

理货组负责“找米下锅”，调查了解社会需求，收集本厂所需的有关经济技术资料；

厂务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协调全厂工作，起草有关生产、行政文件，处理全厂日常事务。

3. 全厂生产工人分成六个班七个作业组及一个建筑队。

六个班：车工班、钳工班、漆工班、木工班、铁工班、附件班。

七个作业组是：凹定忠作业组、牛家云作业组、赵永刚作业组、谢永禄作业组、代树林作业组（机修）、郭复生作业组（小车）。

一个建筑队是现正在修建子弟学校的这个队伍。

另：凡技术差、体力弱，顶不了岗的人员组成一个勤杂班，负责厂区环境绿化及其他勤杂工作。

二、厂务委员会的工作方针、方法及措施

厂务委员会的工作方针是：坚决贯彻党在新时期的总路线，坚决贯彻社会主义时期的分配原则，充分发挥全厂每一个职工的聪明才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全厂职工，群策群力，一心一意，苦干、巧干，为修配厂在新时期的生存和发展，为在年内盈利五万元而奋斗。

我们的基本方法是：用经济规律管理经济。把我们的一切活动看成

改开篇

经济活动。把全厂上下左右各级各部门的关系看成是经济关系。我们的具体措施是：

1. 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开展立功受奖活动，使每一个职工明了我们的方针和目标，明了我们面临的困难及有利条件，从而树立信心，克服困难，为实现我们的近期和长远的目标奋斗。

2. 制定岗位责任制和奖惩制度并坚决执行。

3. 实行成本核算和小指标分解。把经济指标分配到班组和个人。使每个职工明了自己的任务及完成这一任务所需的努力。我们要求每一个生产工人在年内完成360元的利润，要求材料、后勤及所有服务性人员能自己养活自己，并略有节余。

4. 开源节流，扬长避短，大挖生产潜力，广开生产门路，坚决控制和压缩行政开支和其他非生产性开支。

5. 提倡“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凡有一技之长，能单独组织生产并盈利的，我们将大力支持，给人给设备。发动每一个职工积极“找米下锅”，提合理化建议。

6. 关心职工生活，抓好食堂和小卖部的工作，积极开展文化体育活动。

7. 厂务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厂务委员会的每个同志都必须廉洁奉公，坚持原则，苦干、巧干，力求在各方面成为群众的表率。

三、几项具体要求和条件

1. 厂党总支必须保证全力支持厂务委员会的工作。

2. 坚决实行党政分工，各负其责。在不违背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的前提下，厂务委员会有权对全厂的生产、财务、行政等做出决定并予贯彻执行。

3. 在厂务委员会工作期间，现行政、生产领导停止行政职权。有关人员必须服从厂务委员会的安排，并为厂务委员会当好参谋。

应招人：张保华 梁华 孙武军 张建华 周家炳

1980年8月29日

8月30日上午一上班，我们就将“应招书”递交给供应处（三处）工作组。三处工作组和厂总支立即对我们的“应招书”开会进行审核评估，当晚作出决定，同意我们“应招组阁”。

1980年8月31日上午，云南铁路建设公司第三工程处工作组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宣布了工作组和厂总支的决定。

张保华宣布“云铁司汽车机械修配厂厂务委员会”成立，并宣布了厂务委员会成员名单。我就“应招书”中关于厂务委员会的工作方针、方法、措施等做了具体说明，要求全厂职工积极支持厂务委员会的工作，投入到我厂的改革行列中来。全厂职工对厂务委员会的成立报以热烈的掌声。

9月1日，厂务委员会按照我们的既定方针正式开展工作。

厂务委员会办公室负责的厂内机构调整，各项规章制度起草、颁发；生产组负责的调度及安全、质量管理；理货组负责的市场拓展、“找米下锅”；行政组负责的后勤保障、职工食堂等，各方面的工作都紧张而有序地开展起来。

由于我们的改革得到全厂职工的普遍支持和拥护，加之我们都来自生产、技术的第一线，情况熟悉，应对有方，厂务委员会的工作很快取得成效。到年底，我们顺利地完成了“招贤榜”设定的扭转亏损局面并盈利五万元的目标。

在9—12月的四个月中，我们完成了28.9万元的产值，比1979年同期增长37.6%；实现利润5.6万元，比招贤榜提出的指标超额13%；四个月的全员月劳动生产率比1979年同期增长35%；生产工人平均每月增加收入30%，生产工人中，四个月所得奖金最多的相当于本人工资的72%；部分管理、后勤服务人员的收入也有所增加。

我们的改革使我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社会上也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云南日报记者韩曝光、新华社记者刘远达，还有春城晚报记者，都来我厂采访并发了报导或写了“内参”。省委工业部派人来我厂召开座谈会，对我厂的改革给予了充分肯定。当时的云南省委书记安平生还就我厂的改革作了专门批示。

1980年12月25日，我代表厂务委员会起草了厂务委员会工作总结——《从改革中求生存，在探索中前进》。

在这个总结中我着重阐述了以下观点：

1. 关于思想观念问题。

观念决定人的思想，而一个人的思想又往往决定了他的行动。因此，改变旧的观念，树立创新、改革的观念非常重要。我在总结中写道：

四个月来，我们的经济效果是好的，收获是大的。但最主要的收获是我们在思想观念上的改变。四个月来的改革实践，使我们更多的同志认识到：我们的企业要想在目前调整过程中求生存，在今后激烈的竞争中求得发展，就必须实行彻底的改革和大胆的探索，除此没有别的出路。这一观念的改变对我们厂的前途和命运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如果说我们的工作为“四化”做出了一点贡献，那这一观念上的改变及其付诸实践是最为重要的。因为仅仅几万元的利润对整个社会来说是微不足道的。我们应招“组阁”并大胆地实行改革和探索的本身将在社会上引起巨大的反响。我们的成功将鼓舞那些立志改革并跃跃欲试的人们迅速付诸行动，使那些在“四化”道路上徘徊犹豫的青年人迅速下定决心走改革的道路，勇敢地向旧观念冲击，为“四化”的宏伟目标作出自己的贡献。

同志们，我们大家都知道：由于封建主义、官僚主义的影响，我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还很不完善，在一些地方甚至仍然存在着腐朽没落的部分。它们极大地损害了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进步。对此，广大人民群众早就不满意了。要改革，要进步成了全党、全国人民的一致呼声和统一的意志。党的三中全会提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并号召全国人民立志改革，发愤图强，为在本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现代化的强国而奋斗。

厂务委员会响应党的号召，顺应历史潮流，代表全厂职工的利益和要求，为了修配厂的生存和发展，从一开始就下定决心，破旧习、冒风险，大胆地在长坡山头上实行改革。仅四个月的时间就扭转了亏损局面，人们的精神为之一振，在修配厂面前展现了一片光明的前景。

2. 关于管理体制和干部使用制度问题。

毛主席说：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我在总结中写道：

建国以来，我国的管理体制一直存在着严重的缺陷。由于政治运动

的需要，我国一直实行着党政一体，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所谓“领导一切”和“一元化”领导的方针，致使各级行政和经济管理部门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具体到一个企业，以党代政的结果使得本来应该以生产为中心的经济单位变成了一些人政治斗争的战场，或是政治学校。以党代政及“一元化”“领导一切”的另一严重后果是埋没了大量各方面的有用人才。因为在整个中国是“一元化”，那就必然出现非党（员）勿信，非党（员）勿用，非党（员）不提拔的现象。不是党员就不能做领导工作，即使是一个小小的部门或企业的领导工作。这似乎成了一条法律，为人们所承认和接受。

为了改变这一不正常的状况，厂务委员会一成立，我们就实行党政分工、各负其责的管理体制。厂务委员会在其工作期间行使除党团组织及工会以外的一切行政权力。凡属厂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工作，厂务委员会一经决定，就马上执行，不必请示批准后实施。我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厂的工作真正转向以生产为中心，也才有可能按经济规律办事。厂务委员会把自己的一切活动看成是经济活动，把全厂上下左右、各级各部门的关系都看成是经济关系。

在干部使用方面，三十多年来，我国仍保留了封建制度的一部分，存在着极大的弊病。再加上长期以来政治冲击一切的结果，使得我们现在的多数干部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只能适应政治运动，而不适应经济管理。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我们认为必须改变我厂的干部队伍，必须否认所谓“外行能领导内行”的神话，坚决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的铁饭碗。结合厂务委员会的特殊情况，我们决定让原厂不适应做领导工作的同志带职下放（即不改变其职位，不改变其工作性质甚至办公室，但停止行使行政职权），同时根据党在新时期选拔干部的标准及干部队伍逐步实现“三化”即年青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组成厂级生产行政领导班子，即厂务委员会。对于厂属管理部门，也根据同样的原则进行调整。

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厂务委员会的成立改变了原厂那种死水一潭、毫无生气的局面，为厂的转机及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管理体制及干部制度的改革方面，阻力是相当大的。传统的习惯势力及那些既得利益者将作顽强的抵抗。对此，我们从一开始就作好了

充分的准备，准备付出大的代价。我们相信：改革是不可避免的，历史是向前展现的，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这是历史的必然，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

我们这样做，有人会进行责难，说我们这样做是不要党的领导，不讲政治。而我们的回答是：恰好相反。我们这样做正是体现了党的领导，体现了无产阶级的政治。党在新时期领导人民干什么？干“四化”，搞改革。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去办，难道能说是否认了党的领导吗？

至于政治，长期以来，一些靠政治吃饭的人往往最不懂政治。这些人把党的领导，把政治只理解为一种吓人的口号，一种形式，甚至是一种虚无缥缈的抽象概念。在这些人的心目中，搞运动、整人、开大会作报告、背诵经典著作就是政治。甚至把一个人、一个职务、是否党员看成就是政治，就是党的领导的全部含义。

什么是政治？我们认为：所谓政治，就是一群人，一个集团或一个党，为着一个具体的目标或信仰而进行的活动。就今天而言，我们党的政治，就是团结教育并组织全国人民聚精会神干“四化”。这是当前最大的政治。党的领导就是围绕这一中心而开展、而进行的。如果有人说他这样做是否认党的领导，不要政治，那就恰好证明他是一个对政治一无所知的糊涂虫，或他是别有用心。

四个月来的工作实践使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到：思想工作是很重要的。只承认物质的力量而忽视精神的力量不是辩证唯物论。

物质的力量是很重要的。在通常情况下它起着支配的作用。但我们必须看到：在很多情况下，如果没有精神的力量，物质的力量也仍然会显得无能为力。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特别是要成就一项事业，要对社会实行改革，没有精神的力量推动是不可能的。

因此，要想把我厂的工作搞上去，把已经开始的改革推向前进，我们必须做好广泛深入的思想工作。要通过这一工作广泛宣传党在新时期的方针、政策、路线。要通过这一工作使全厂职工明了形势，认识到国家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大势所趋，从而解放思想，消除顾虑，立志改革。要通过这一工作使每一个职工明了改革与厂、与自己的利益的关系，

明确要办好厂是大家的事，大家的事就要靠大家来办，只靠几个人是不行的。

思想工作是一项重要的工作，但是谁来做这项工作呢？党团组织、工会和所有立志改革的人们都应该来做这项工作。当然，要做好这项工作并不容易。因为这项工作本身就是一门学问，一种艺术。我们认为：要做好这项工作，起码要有两个基本条件，这就是：第一，做这项工作的人本身是一个立志改革者；第二，他本身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实干家。

3. 关于分配制度问题，我在总结中写道：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多劳多得，按劳取酬。但建国三十年来，我国除农村现在正在实行以外，企事业单位则基本上没有执行这一原则，存在着极不合理的部分。如有些人不学无术，对社会毫无贡献，凭着政治上的投机和钻营，地位愈来愈高，待遇愈来愈优厚；一些人虽曾有过一功半绩，但后来却一无成就，凭着其过去就可享受一辈子，子孙也大沾其光。而那些工作勤奋且有技术、有专长，对社会有贡献，只因所谓政治上不积极，甚至有过错误，就劳而无功，不但地位日低，所得也甚微。

因此，在我国前些年普遍存在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有文化有技术和不学无术者一个样的情况。一些人，特别是一些年青人，不去努力钻研业务技术，胸无大志，随波逐流，给整个社会造成严重后果。我们认为，要改变这一状况，把经济搞上去，就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即按劳取酬。厂务委员会一成立，我们就及时制订和公布了生产工人的奖惩规定。该奖的一分钱不少，一个人一个月拿四五十元奖金我们也不犹豫。即使受到追究，我们也照样执行。奖金该拿的愈多愈好，愈多愈光荣。该罚的也按规定照罚，同样一分钱不少。我们这样做一些人不理解，甚至说我们除了会扣工资以外什么也不会。我们说：既然定了制度就必须执行。况且这是贯彻按劳分配的大事，决不能马虎了事。

由于我们比较认真地执行了按劳分配，职工开始真正关心厂的生产，关心本班组甚至关心个人的经济收支情况。这样就真正把国家、集体、个人的利益结合了起来。从而大大地提高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为厂的

扭亏增盈创造了条件。

我们在执行按劳分配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在当前的情况下，要真正做到按劳分配还有很多困难。一方面，现行的工资制度、劳保制度本身就极大地妨碍了按劳分配的执行。另一方面，我们在管理上，特别是在统计工作方面，还没有一套好的办法。我们虽然实行了班组、甚至个人的经济核算，但还很粗糙，还不够准确。我们虽然砸烂了大锅吃小灶，但在小灶内也存在不合理的部分。

4. 关于企业定位及发展问题。

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企业、一个人，正确定位自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只有把自己在这个社会上的位置定好了才有可能找到正确的发展方向，适应社会的需要，并为社会的发展作出贡献。在如何定位我们厂的问题上我在总结中是这样写的：

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经济本来应是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的。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没有能完全做到这一点。中央为了迅速发展国民经济，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同时提出扩大企业自主权、保护竞争，强调市场的调节作用。在调整和竞争的过程中，一些企业将被淘汰，而另一些企业将迅速发展起来。

面对这一现实，我们认为：尽快地定位我们厂并确定我厂的发展方向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生存竞争是人类社会和大自然的一个普遍规律，也是一条重要的经济规律。作为一个企业，它是社会的一部分，因此，它必然要服从生存竞争的原则和规律。在这严峻的现实面前，我们分析了我厂及全省的现实情况后认为：如果我们坚持以汽车修理过日子是行不通的，因为汽车运输行业目前供需已达到饱和状态。就汽车修理行业来说，据有关方面的统计，仅昆明地区就有两百多个修理网点，加上国民经济的进一步调整，基本建设的进一步缩减和能源的紧张，汽车运输行业将大幅度下降。因而，汽修行业的经营也就必然出现更为紧张的局面。我们厂是一个新的小厂，技术力量和设备都无法和昆明市的正牌修理厂竞争。从这一客观情况出发，我们必须迅速改变我厂只修汽车的方针，实行汽修、机修并重，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根据我省的情况，我们认为施工机械修理的前景是有希望的。从长远的观点考虑问题，随

着调整时期的过去，“四化”建设的发展，施工机械的数量和种类必将有一个很大的发展。而目前我省机修行业仍是一个薄弱环节，如果我们现在就有意识地做好充分的思想和物质准备，我们是有可能在今后与同行业的竞争中取胜的。四个月来的实践证明，我们的认识是正确的。我们厂有条件有能力承修施工机械，也必须把我们的工作重点逐步转到这方面来。

在厂务委员会工作的四个月中，正是因为我们对厂的定位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并采取了广开门路、多种经营的方针，我们今天才有可能扭转亏损的局面。从收入的情况看，四个月汽修的总收入只占四个月总产值的65%，而11、12月，汽修的总收入仅占11、12月总产值的37%。显然，如果我们在这四个月中仍坚持单一的汽车修理，我们是不可能扭转亏损的局面的。

在只工作了四个月的厂务委员会的工作总结中我为什么要写这些具有挑战性的政治观点呢？一是因为通过参加工作后几年来的实践和观察，我对这几个问题的感受实在太深了，认为要改革就必须首先解决这些问题；二是因为我们的厂务委员会之所以能在短短的四个月中取得成效，正是因为我们坚持并落实了这些观点的结果。

这个总结曾报公司和三处党委审核，公司杨正菊和三处李春年书记对我的一些提法有些不满意，甚至把一些我认为非说不可的内容整段给删除了。但我仍坚持我的意见，没有采纳他们的修改意见。

事实上我在送交审核时就知道他们会反对我的那些提法，而且作好了思想准备。在这个总结的最后部分我就写了这么一段话：

当然，改革的道路绝不会是平坦的。我们必须在探索中前进，我们一定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因为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不可能是开满鲜花，而有可能是荆棘丛生。我们前进的道路也不可能是平坦笔直，而有可能是布满陷阱。我们每一个立志改革的人都应该明白：探索是艰难而危险的。历史上多少探索改革者被虎狼所吞噬，多少探索改革者被陷阱所掩埋。但我们也要看到，探索者永远是值得骄傲的。人们永远称颂和尊敬他们。因为可以说，没有探索者的献身精神，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将是不可能的。

改开篇

一个在政治上曾受到严重打击，曾表示不再过问政事，安于“上班、种菜、打麻将”的人，一个明知前面有陷阱、有危险的人，在企业濒临破产、人心涣散的情况下能挺身而出“应招揭榜”，这是勇气、责任、担当，这是一个真正的男儿！

今天，近四十年的光阴过去了。每想起当年的那些事仍不免有些兴奋和激动，我为当时的自己感到骄傲和自豪。

第二十六章 再起再落

一、“找米下锅”

1981年1月15日，以李春年为首的三处党委报公司党委批准，正式任命我为铁路建设公司汽车机械修配厂厂长，梁华、孙武军、张保华、周国光为副厂长。

我正式出任修配厂厂长后，继续执行厂务委员会确定的方针，走改革之路。

当时摆在我面前的问题可以说是一大堆，但首要的问题是“找米下锅”的问题。

常言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个企业没有产品可生产或无对象可服务，那还谈什么改革？只能是空谈了。

国有企业实行的是计划经济。那几年国家没有在云南修建铁路的计划，因而专为修建铁路而组建的铁路建设公司没有了生产任务。当时公司领导虽然还是要求各工程处将车送我们厂来修，但工程处没有了施工任务，车子大都“趴窝”了，哪还有车送我们厂来修呢？

我们厂当时也承修社会车辆，但由于前几年服务态度不好，且返修率高，人家有意见，不送车来修了。加之各个单位都在讲效益，自然是哪家服务态度好，又便宜，就往哪家送。

我厂当时的生产能力（人员和技术设备）每月可完成20—30辆大修车，即平均每天大修一辆。但现在上面下达的生产计划每月只有五六辆，缺口达60%以上。

没有生产任务，但工资得照发呀。根据我厂的基本支出情况，我厂每月必须完成15辆以上的大修才能做到收支基本平衡。

生产任务缺口大，职工“窝工”多，思想情绪必然会低落，企业亏损也就在所难免了。

虽然当时允许企业有政策性亏损（即国家没有下达生产计划或因经济调整造成企业开工不足而导致的亏损），但要我当一个亏损工厂的厂长，即使亏损是“政策性”的，自尊心也会让我受不了。

为了解决“找米下锅”的问题，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质量是企业的根本。在我正式出任厂长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制定《关于质量管理的若干规定》，并在第二个月搞了一个“质量月”活动，不但在厂内大力宣传落实，而且邀请本公司各车队及社会上一些客户单位来厂参观我们修车的全过程，并参与在修车的“解剖检验”。希望以此加强职工的质量意识，同时挽回我厂在社会上的信誉。

为了解决生产任务严重不足的问题，我提出了“广开生产门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口号，发动全厂每个职工都去找任务，只要我们有能力做的，不管是汽车、施工机械还是其他什么工程，我们什么都做。另外我还提出：凡有一技之长，能单独组织生产并可能盈利者，厂部将大力支持，要人给人，要设备给设备。同时请职工们提合理化建议，只要能正常实施并取得成绩的都给予精神和物质奖励。

汽车团机关搬上昆明后把一些原为机关服务的工人甩给了修配厂。当我知道赵明江师傅是建筑施工的“把子”（技术权威）时，我就问他：“45米的烟囱能干下来吗？”他说：“没问题，我原来就砌过。”于是我们接下了海口公社和平大队砖厂三座45米的烟囱的砌筑工程。当听说省农资公司要盖钢结构活动仓库时，副厂长梁华主动承接下了这个建筑工程（那时还没有“施工资质”一说，只要你能干，就可以接工程）。

为了彻底解决“找米下锅”的问题，我着重抓了以下两项工作：

1. 在加强质量管理的同时组建营销队伍，改等客户上门为主动联系客户。凡有车的单位我们都去做宣传，发广告，并允诺以合同的方式明确我们的保修质量、工期和返修责任。

做广告、签合同在当时还是新鲜事。一些在企业干了一辈子的人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广告、合同之类的事。今天看看当年我拟定的合同样本，还真和今天普遍使用的供需格式合同很接近，上面有甲乙双方名称、工程（服务）事项、双方责任、付款要求等。只是当时还没有法律责任的内容，全凭信用。

2. 根据市场需要进行产品试制。当时我有一个强烈的意识，认为汽车修理行业是个“夕阳产业”，前景十分有限。要发展壮大我们的企业，就必须搞自己的产品开发和销售。基于这一认识，我决定以厂技术组为

核心组建了一个试制组。在市场调查的基础上（当时主要考虑日常生活用品和家具），试制铁质家具，诸如脸盆架、桌、椅、文件柜等，并购置了剪板机、折角机等相应设备。

由于我们采取了“广开生产门路”和“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方针，加上营销组为我们拉来了一些客户，试制组试制的铁质茶几、文件柜的试销情况又非常良好，这就大大地缓解了我厂生产任务严重不足的问题。

到1981年8月，我厂的铁质家具已批量生产，产值接近我厂总产值的三分之一。加上我们广开门路找到的生产项目，非汽车修理产值占到总产值的一半以上，大大地缓解了我厂靠“找米下锅”的被动局面。

常言道：“办法总比困难多”，事实上确实如此。只要真正去努力了，困难总是会克服的。

二、修配厂首届职工代表大会

1981年6月初，我们召开了修配厂首届职工代表大会。

当时我为什么会想到要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呢？主要是为了推进改革。而要推进改革就必须稳定职工队伍，调动职工的主人翁精神，群策群力，团结奋斗，克服改革中的各种阻力。

当时改革的阻力还是很大的。这种阻力首先表现在人们的观念及旧的传统和习惯。厂务委员会期间我们虽然在机构改革方面取得了进展，但要进一步实行改革却迈步艰难。

人为阻力是很大的。当时虽然从上到下都在说改革，但真要改革就必然会触及到一些既得利益者们的利益。一旦触及到具体的人，一些人就会条件反射似的跳将起来。

原厂级领导们的失意是可理解的。他们嘴上虽然不说，但内心却是很不情愿的，个别人还等着看我的笑话呢。依附原班子的个别管理人员和工人中的个别人也有不支持我们搞改革的。这些人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很深，习惯于走老路。一位车工“老把子”就曾让我头疼过。

有一次，一辆大修货车的后桥半轴孔需要镗孔镶套。这是一个两米多长的大家伙。当时我厂最大的C630车床滑轨长度不够，只能在床尾用支架托住机床尾座才能加工。往常，凡是难度较大的活只有他这个“老

把子”来亲自操作。可这一次也不知他哪股神经出了问题，当调度员安排下去时他就是死活不干。调度没有办法来找我，我找他谈了三次，好话说了一大堆，但他还是扭着不干。他说从来没有干过这种活，干不了。

怎么办？他是一个大家都尊重的老工人，车工的“老把子”。我当然不能把他怎么样。好在金加工的活我在学校实习时就干过，在修理厂这些年我也没少接触过车、钳、铣、刨、锻各种机床，也曾加工过连“老把子”也没有干过的活（如在万能铣床上加工齿轮），可以说金加工这类活还真难不住我。他实在要闹别扭，我就只得亲自上车床了。还好，经检测，我镗出来的后桥半轴套管承孔完全符合质量要求。

我是一个毛泽东思想的信奉者。毛主席说“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对此我坚信不疑。可以说，我这个人的群众观念是很强的。在我的一生中，特别是在文革期间和我毕业后的工作中，我都能和群众做朋友，并从群众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现在深化改革碰到了问题，我相信只有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激发群众的主人公精神才能解决。

要发动、组织群众首先你要有一定的人格魅力，让群众能相信你并跟你走。对此，我当时是充满信心的。其次就是要找到适当的办法，即让多数人感兴趣的办法。

“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是企业民主管理的根本制度，是职工参与企业管理，在企业中当家作主的具体体现。而工人参加管理，也是文革“斗、批、改”中“改”的最重要的目标之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央也大力宣传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但这一制度的落实却很缓慢。开职代会在我厂是首次，在全公司我们厂也是第一个召开职代会的基层单位。

要开职工代表大会的消息一经传出，全厂职工都十分兴奋，积极推选代表，提出自己的意见或建议。

在职工代表大会上我作了《当家作主，同心同德，为完成今年六十万产值而奋斗》的报告。

报告首先是向全厂职工“亮家底”，让大家对自己的厂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并从实际出发，群策群力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

在大会上我着重讲了我厂当时的人员构成及资产情况。

1. 人员构成情况：截至 1981 年 5 月底止，我厂职工总数为 266 人，其中女职工 123 人，占全厂总职工数的 46.2%；青年职工 146 人，占 55%；生产工人 160 人，占 60%；生产管理人员（包括正副厂长、调度、财务、劳资、统计、检验、技术等）26 人，占 9.8%，政工人员 6 人，占 2.3%；后勤服务人员 26 人，占 9.8%；生产辅助人员 11 人，占 4.1%；学校教师 14 人，占 5.2%；在读大、中专学生 4 人（带薪），占 1.5%；长期病号 9 人，劳教 1 人，共 10 人，占 4.9%。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我厂当时的人员构成是极不合理的。但要改变这种极不合理的人员结构问题，在当时可谓难之又难。特别是那些从部队转业的干部（他们转业前都是营级以上干部）和上级领导机关安排下来的人，你要调整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的工作岗位都是很难的。

2. 我厂资产情况：我厂当时拥有固定资金 120 万元（主要是厂房和设备），平均每人占用 0.45 万元；拥有流动资金 74 万元（其中的一大半又被仓库中积压的汽车零配件和通用材料占用了），平均每人占用 0.28 万元，两项合计，平均每人占用资产 0.7 万元。

流动资金只有 74 万元，而且大半又被积压的原材料所占用。厂长能支配的生产用流动资金往往捉襟见肘。每办一件事，有时即使是一件很小的事都颇费周折，更不要说办大事了。办企业，搞经营，厂长却没有多少资金可调用。显然资金问题也是我厂当时的突出问题。

接着，我讲到了上半年我们所做的工作及取得的成绩：

1. 为了加强企业管理，我们先后制定了以下制度：即《关于反对送礼、走后门及搞特殊化的不正之风的决定》《关于严格控制车旅费的通知》《关于质量管理的有关规定》《关于实行工分册的决定》《关于加工及修理费问题的几项规定》等。

2. 为了恢复和确立我厂在社会上的信誉，为我厂今后的生存及发展创造有利条件，3 月份我们开展了质量月活动，并在公司、供应处的组织下，在我厂进行了两次汽车解剖检验，在社会上起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3. 为了加强管理人员的责任心，不断提高业务能力，3 月底我们对

全厂管理人员进行了业务考核。

4. 为了逐步改变“找米下锅”的被动局面，我们对厂的经营业务进行了部分调整。我们正式成立了施工机械修理车间，并努力扶持和加强这个车间的力量；我们决定根据市场需要试制铁质家具，现试销情况良好。

5. 为了更好地组织生产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今年以来，我们先后两次进行了全面性的劳动组合和调整。

6. 今年来，我们先后几十人次找工人师傅谈心，交换思想，征求意见。使一些原来情绪不稳定、工作热情不高的同志有了大的转变，使一些原来对我们意见较大的同志对我们的工作表示理解。

7. 为了保护妇女权益，照顾女职工的特殊困难，我们对怀孕女职工给予了适当的工作照顾，大部分人的工作做了调整，一时不能调整的，也要求各作业班组给予适当的照顾。

8. 为了安置好待业青年，同时也为了解决部分职工的实际困难，我们根据生产情况，合理安排了厂职工的部分待业子弟。

我们的工作努力的，成效也是显而易见的。

报告在谈到今后的任务时，我着重谈了思想工作、遵守纪律和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问题。

关于政治思想工作，我在报告中讲了这么一段话：

要充分发挥思想工作的积极作用。人，是有思想、有感情的。人只有在一定的信仰和精神的激励下才能充分发挥其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迸发出战斗的激情。人们心情愉快，主动去工作和在思想上受到压抑，被迫地去工作，其工作效果是完全不同的。因此，我们必须十分重视思想工作，大家都来做思想工作，使全体职工都能在愉悦的状态下努力工作。

因为职工中产生的思想问题多与行政管理工作有直接的关系，因此，今后行政领导和行政各业务部门都要努力做好政治思想工作。

在谈到民主集中制时，我在报告中有这么一段话：

在目前情况下，强调遵守纪律和集中是非常必要的。要坚决反对各自为政、自行其是的现象。我们的每一个人，特别是领导干部都必须自

觉地约束自己，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每一个人都应该受到纪律和道德约束，不受任何约束的人是不存在的。我们应自觉地用党的政策和纪律约束自己，用道德约束自己。每一个同志都要十分注意和珍惜同志间的团结，坚决不做不利团结的事。同志相处要相互尊重，与人为善。

在职工代表大会上，群众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针对职工们提出的问题，我及时作出了回应。在大会上我明确表示：“对职工的具体生活困难问题，凡是厂里能办到又不违反国家现行政策的，我们将千方百计地予以解决。目前首先要解决的是待业青年的安置问题、女职工孕期及产假的照顾问题、职工住房问题、开回昆明班车问题等。”

在这次大会上我还明确表示：今后当职工个人利益和厂的利益发生矛盾时，我们将充分考虑个人利益的诉求。

首次职工代表大会取得了预期的效果，职工的积极性普遍有所提高。

三、长坡地区文化联络站

四十多年过去了，“长坡地区文化联络站”这个组织早已淡忘在人们的记忆中。但当时的长坡人，特别是当时修配厂的职工们却不会忘记1981年9月由长坡地区文化联络站组织的文体比赛和国庆大联欢。直到今天，同事们在聚会时，或是在微信“长坡同事群”中交流时，都会很自然地回忆起那段令人兴奋的美好时光，并相互晒出当时留下的照片。

为了改善职工的文化生活，首届职代会后的7月初，我带着厂工会主席张文昌跑遍了长坡地区所有的企事业单位，找这些单位的负责人，向他们谈了我们关于加强文化活动的一些想法。

当时长坡地区除我们汽车团（三处）所属四个车队和两个厂以外，还有桥钢厂、省结核病防治院、市精神病院、252油库等国有企事业单位。这些单位当时也面临着和我们同样的问题。当我们把成立长坡地区文化联络站的想法和这些单位的领导说了以后，得到了所有单位负责人的热烈支持和响应。

接着，我们连续三次召开了有这些单位工会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经反复研究，决定成立“长坡地区文化联络站”，发出了成立公告，并决定在当年国庆节期间举办长坡地区国有企事业单位首届运动会和大联

欢。

当时我们之所以要成立文化联络站，是因为我们都认为丰富职工积极向上的文化生活不仅可以提高企业的凝聚力，促进企事业的生产和工作，而且可以确保长坡地区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

当时我还有另一想法，就是想通过联络站的活动，促进各单位间的相互联系和交往，让文化联络站担负起婚介的职责以解决适龄未婚青年的婚恋问题。

当时我厂有 57 个未婚青年，无恋爱对象的 41 人。据我们了解，仅我们汽车团下属的六个单位 800 多职工中未婚青年就有二百多人，这显然是领导者，特别是工会应该管的事情之一。

1981 年 8 月初，联络站所属各单位的男女篮球队、乒乓球队、羽毛球队、拔河队、象棋队均已成立，总计有运动员 144 名，并开始训练。各单位的文艺演出队也全面开始排演。

各单位都有一些文体爱好者。但一般都没有进行过正规训练，也不熟悉比赛规则。针对这一情况，联络站首先组织裁判和各单项比赛项目队长学习比赛规则，并根据这些规则组织训练。

最先开展的是“交际舞”。五十年代后出生的人都还没有接触过交谊舞，因此，人们普遍都很好奇。当时桥钢厂有 8 个热心的姑娘每天晚上都来我们厂教交谊舞。她们的双人舞、四人舞，特别是八人舞跳得都很漂亮，吸引了很多年青人跟着跳，一些中年人也参加了进来。

8 月下旬，各项体育比赛正式开始。比赛安排在三个单位进行，一是我们厂，二是桥钢厂，三是市精神病院。在我厂进行的主要是篮球、乒乓球和中国象棋比赛。

9 月 24 日全部体育比赛结束，28 日举行了闭幕式。国庆文艺大联欢的彩排各单位都积极地进行着。

从长坡地区文化联络站成立到 1981 年国庆节的两个多月中，长坡地区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职工们都沉浸在欢乐的氛围中，一向寂静的长坡山头一时变得异常的热闹了起来。

这次运动会我厂的运动员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夺得了篮球、乒乓球、羽毛球、象棋四项冠军。



参加长坡地区企事业单位运动会的我厂运动员合影，前排左四为作者

通过运动会，人们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改变，企业的凝聚力明显得到提高。尤其令我感动的是，我们的厂篮球队竟然成了一个生产“突击队”，他们利用业余时间承担了三辆翻斗车货箱的大修任务（重做货箱），保证了当月生产任务的完成。

长坡地区文化联络站的成立及其活动不但活跃了我厂职工的文化生活，而且带动了整个长坡地区企事业单位的文化活动。

几十年过去了，但长坡地区文化联络站的成立及其活动至今还给人们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四、被免去厂长职务

9月23日下午快下班的时候，我突然接到铁路建设公司经理杨森的电话。这让我很吃惊。公司经理怎么会直接给我打电话呢？往常还从来没有这种事，公司一般有事都是通过三处转告我的。

杨经理在电话中说我召开运动会搞那么大的声势，影响了生产，一些人有意见，要我立即停止运动会的一切活动。

经理的话很严厉，是命令式的。

马上就要举行长坡地区企事业单位运动会闭幕式了，一切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如果只牵涉到我们厂我还可以考虑经理的意见，可这是牵涉

到长坡地区十几个单位的事啊，怎么能说停止就停止呢？我没有执行经理的命令，有关活动和闭幕式还是照原计划举行了。

闭幕式开后的第二天，三处党委派了3个人来厂调查。他们没有找我，也没有找运动会的直接组织者工会主席张文昌。调查人员走后我才知道这些人是来调查运动会的。

几天后，杨森经理在公司的一次大会上直接点了我的名。批评我不接受批评，态度不好。还说长坡地区文化联络站是非法的，说我这是出风头，说我无权召开这种运动会。

接着全公司各工程处都在传有关我们厂开运动会的事，说什么的都有，但多数对我持支持的态度。

1981年11月6日上午，三处党委书记李树本带着组织科长周子俊、宣传科长董某等人来我厂召开厂级党政领导集体的“交心会”，说是要来解决我厂领导班子的团结问题。

会上先是说运动会的事，接着就是批评我的“家长作风”问题。正当我就有关问题进行解释时，李树本书记突然拿出公司关于免去我厂长职务的文件宣读了起来。

对于公司免去我厂长职务的决定，多数职工感到突然和不可理解。

公司对我的免职文件没有说明任何原因。从“交心会”上李树本的发言看，他们免去我厂长职务的理由是以下三条：一是实行党政分工，不要党的领导；二是家长作风导致领导班子不团结；三是召开长坡地区企事业单位运动会，影响了生产。

这三条理由显然很牵强。

为了阐明自己对免职的态度，1981年11月9日，我给公司党委和三处党委递交了我的《几点申明》：

几点申明

省铁路建设公司党委：

省铁路建设公司三处党委：

一、我接受公司党委关于免去我的厂长职务，继续搞技术工作的决定。我将尽我最大的努力继续为我厂的建设作出贡献。

二、在我任职期间绝对没有出现经营性亏损。为正视听，我要求三

处成立专门查账小组进行公开查账。

三、三处党委以召开领导班子“交心会”为借口，对我突然袭击是不正当的。说我实行党政分工，搞家长作风导致了领导班子的不团结，说我召开长坡地区企事业单位运动会影响了生产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是站不住脚的。

四、我坚信我在年初厂务委员会的工作总结《从改革中求生存，在探索中前进》中所阐述的观点和原则是正确的。这些观点和原则在今年的贯彻执行中虽因受到现实的严重挑战遭受到了挫折，但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些观点和原则将重新被人们所接受，并重新回到我们的现实中来。改革是不可避免的，任何人也阻挡不了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

铁路建设公司三处汽车机械修配厂 张建华

1981年11月9日

对于当时的改革我是积极支持并全身心投入的。我坚定地认为企业的改革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需的，不改革企业就没有出路。

我并不想当官，只想能有一个自己的舞台能多做点事。一年多来，说我是全身心扑在工作上一点也不为过。

从揭榜应招成立厂务委员会到我正式任职的一年多时间内，我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且不说人们精神面貌的变化，就生产管理和经济效益来说也是非常显著的。1981年的产值比上年同期增长了43%，主要产品成本下降了18%。在成本和质量两个方面都进入了全国同行业的先进行列（当时全国交通系统有1000个左右汽车修配厂，其中八项经济指标完成较好的有32个。这32个企业中质量最好的返修率为1.2%，最差的为21.9%，我厂在10%左右。成本最低的为3092元/辆，最高的为6942元/辆，我厂为4358元/辆）。

免职对我来说虽然是一个大的挫折，但对我个人来说未必是件坏事。我深信改革是历史的潮流，也是历史的必然，是不可阻挡的。作为一个改革探索者，虽然会遇到重重阻力和打击，但我相信中国的改革者经过前赴后继的努力一定会取得胜利。

免职后的当月我曾就免职一事写了两首诗，一首为《免职》，一首为《免职随感》：

免职

丢去芝麻官，卸却千斤担。
移居白云间，我今得休养。
莫怨天和地，中华已在变。
待到霹雳时，笑看铺天浪。

免职随感

枯树绽新蕾，残雪锁旧枝。
花开映日月，严冰能几时？

从这两首诗可以看出我当时对改革还是很乐观很自信的。

免职后，我重新回到技术岗位，当我的“助理工程师”。

1981年底，在校友的帮助下我决定调昆明市电机电器工业公司，该公司的书记、经理都很欢迎我夫妇到他们公司工作。但由于三处党委个别领导人从中作梗，这次调动没有成功。

1982年初我被抽调到公司总工室负责的职工教育教材编写组工作，与我同时抽调上来的还有第一工程处原机械队队长何保清。

何保清是一处唯一的一个机械助理工程师，也是我的湖南老乡，和我很投缘。

半年后，我负责编写的《电工基础》《汽车修理》和《工程力学》三本工人适用教材陆续付印。

在公司机关编写职工教材的半年多时间里，我有机会接触到公司和三处各科室的干部职工，一些人成了我很好的朋友，其中与我特别贴心并给我很多帮助的有公司政治处主任席秀元、公司组织科干事孔令发、公司计划科的阳炳仁、公司工会副主席赵宜昌、三处生产科副科长张庭玑等。

职工教育教材编写完后我又回到了修配厂。

人们常说：一个人的发达必有贵人相助，而一个人如总是倒霉，则必然是有一个克星罩着他。

我一生中有两个克星。一个是我在二十一章《工(军)宣队进驻华工》中提到的工宣队副指挥长陶常仕，另一个就是我下面要提到的铁路建设公司三处代理党委书记李树本。

和我素昧平生的陶常仕副指挥长在负责华工院学习班时，毫无根据地一口咬定我是“决派”，后来又给我搞“记录在案”，给我带上了“金箍咒”，毁了我的前半生。而李树本则在我事业刚要起步的时候，硬说我是造反起家的“三种人”，从而毁了我的后半生。

说这两个人是我的克星，是因为我与他们前世无冤今世无仇，事前我们根本就不认识。但他们却莫名其妙地将我视为仇敌，并千方百计地要将我置于死地而后快。

关于陶常仕我在第二十一章中已经说过了，这里说说李树本。

李树本，军人出身，在部队曾任过团教导员，小学文化程度。文革中他曾在某地“支左”，1981年8月从昆明五华区武装部转业到铁路建设公司，被任命为我们三处（供应处）的代理党委书记。

从以下事例可以看出李树本这个人官瘾十足，心胸狭窄，且作风横蛮霸道，为人心狠手辣的人。

他到三处任职时正值我在主持长坡地区文化联络站运动会。当他得知公司经理杨森对我搞运动会不满，并扬言要免我的职时，他急于立功，立刻就以三处党委的名义起草了免去我厂长职务的报告，以迎合杨森。

该报告没有说明免去我厂长职务的原因。经公司批准的免职文件明确写了免去厂长职务后任厂助理工程师，继续从事技术工作。我被免职后，李树本却明确指示后任厂长周国光：“不能让张建华负责任何技术工作，安排他到作业班组去劳动，他如不去就按旷工处理”。当厂总支书记说把一个厂里唯一的工程师放到班组去劳动恐怕不合适时，李说：“有什么不合适的？几百个工人在下面劳动都合适，他为什么就不合适了？”就这样，不但我从事技术工作的权利被取消，连我爱人也不让继续从事技术工作了。

李树本不但支持周国光多次无理扣发我的工资（连我去公司编写职工教育教材期间他们也借口没有公司开具的考勤而扣发），而且纵容我厂曾经劳教过的一个流氓趁我出差时将我爱人给打了。

1983年7月2日，华中工学院派魏仁莲、殷像轩来云南向我作调查。介绍信上明明写着“到贵处通过张建华了解我院文化大革命的有关问题”（有关这次调查的情况我后面还要说到），而李树本却借此大做文章，

到处说我是什么“造反派头头”，是“三种人”。当我申请调昆明市电机电器工业公司时，对方经理已经答应并欢迎我们夫妇去该公司工作，市组织人事部门也都批了，但李树本却在给对方的书记介绍情况时说我是“记录在案”人员，说我“造反精神太强”，致使对方不敢接收，我的调动被弄砸了。

不久后，经同学蒙晓斌推荐，昆明电工厂领导决定调我们夫妇俩去电工厂工作。但就在调档案过程中，也因上面同样的原因，这次的调动又告吹了。

1983年7月10日，公司要召开第二届第二次职代会。我是本届公司职代会主席团成员，是大会执行主席之一。但李树本却到我们厂通知厂领导说：“张建华参加公司职代会对我们很不利，你们一定要阻止他去参加会议”。厂总支书记杨定武说：“你们如果决意不让他参加会议，我们不反对，但事情不会这么简单。你不让他参加会议总得找个理由吧，如果没有任何理由，到时有人问到我，我怎么回答？再说，公司工会委员会的通知中有他的名字，他本人能不知道？如果你们不让他参加，那你就写个纸条给我们，我们照纸条办就是了。”李树本拒绝写这样的纸条。于是，就在公司职代会召开的头天下午临下班的时候，杨定武才通知我去参加这次公司职代会（后面我还要谈到这次职代会的情况）。

第二十七章 初识建设厅长万跃林

一、铁路建设公司第二届第二次职工代表大会

1983年上半年刚过，铁路公司严重的混乱局面就达到了难以收拾的程度。继1981年亏损一百万后，1982年又亏损了九十多万。而1983年刚过去半年，从三个工程处都传来了亏损正在蔓延扩大的坏消息。

这些消息就像住在防震棚里惊魂未定的人们再次听到“地震了”的警报一样，使全公司五千多职工为之担惊受怕。因为铁路公司终究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地方。

根据国务院有关文件的规定：凡是连年亏损严重而又不能在短期内扭亏为盈的企业要实行“关、停、并、转”。同时，国务院文件还提出要打破“大锅饭”，职工收入要与经济效益挂钩。

如果公司垮了，老婆孩子吃什么？特别是那些年过五十的职工，他们曾转战东西南北，风里雨里几十年，不说孩子的入学、工作没有了着落，就是自己安身立命的窝还不知道在哪里。严重的现实使他们心急如焚。

这时那些经理们似乎也从梦中惊醒了。他们的担心绝不亚于普通职工。他们首先想到的当然是头上的乌纱帽。这些长期以来靠吃党饭、职务饭的人如果没有了官位是难以活下去的。一旦企业“关、停、并、转”，他们不但小汽车坐不成了，就是要混口饭吃也是困难的。

到了这个时候，经理们才突然想起早就弃之不用的“群众路线”来。7月初，公司党委决定召开第二届第二次职代会，希望能通过职代会找到走出困境的钥匙。

7月中旬，公司工会委员会召开全体委员会分析公司当前的形势。一致认为要扭转公司面临的严重局面，必须尽快实行改革。而改革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让经理杨森下台。

7月20日，公司工会通过了如何开好这次职代会的报告及要求罢免杨森的经理职务的动议。

7月21日，公司工会主席刘向群向公司党委汇报了工会委员会开会的情况及工会委员会所作出的决定。同时提到了工会副主席赵宜昌将代

表工会委员会在职代会发言一事。

公司的经理们听了刘向群的汇报后非常震怒。他们完全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他们原指望工会通过职代会来挽救当前的严重局面，帮他们渡过难关，而结果却是“烧香引出鬼”，搬起石头却砸了自己的脚。

工会的决定及赵宜昌将在大会上公布杨森丑闻的消息让公司的要员们如坐针毡。一天一夜的讨论后，决定第二天就派副书记找省建设厅厅长万跃林请求对策。

厅长终究是厅长。当他听了副书记的汇报后却不以为然，认为公司领导们是大惊小怪。他不但没有指示对策，反而批评说：这么一点小事就让你惊惶失措了？群众要发言是好事嘛。哪有共产党员怕群众的？既然是职代会，就应该让代表们充分发表意见。你们安排半天大会发言太少了，安排一天嘛，如一天不够还可以安排两天或更多一点嘛。公司副书记挨了一顿批，摸不着头脑。但心中却想：真是饱人不知饿人饥啊。

7月25日，星期一。万厅长亲自到公司找党委书记周书浮和赵宜昌谈话。听了赵的汇报后，万厅长代表厅党组公开表示支持赵宜昌发言。他说：老赵同志讲的这些事都是事实嘛，关于杨森的那些事我们厅里也是知道的。

万厅长支持赵宜昌的讲话使经理们大为失望。他们埋怨厅长“不了解事情的本质就随便表态”。有人甚至担心在这关键时刻厅长把自己给抛弃了。

经过公司党委研究，经理们决定再次到建设厅向万厅长汇报并陈述利害。他们相信，只要万厅长看到了事情的严重程度及其后果，厅长是会体谅他们并站到他们一边来的。在当前的情况下，只有万厅长能救他们，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当天晚上，公司的要员们集体找到了万厅长。为了引起厅长的重视，他们不得不把他们最担心的想法说了出来。他们说：问题不在于让不让赵宜昌发言，关键在于赵后面有人支持他，这些人将通过赵的发言把现在的经理们赶下去，从而取而代之。

这一下，轮到万厅长惊慌了。心想，这还了得？今天你把我手下的经理赶下去，明天不就要来赶我这个厅长下台吗？

于是，在对待赵宜昌发言的问题上万厅长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并决定亲自来指挥这场“反夺权斗争”。

公司经理们对厅长的决定感激涕零，欣喜若狂。尽管经理们回来时已是深夜了，但他们还是发挥了“连续作战的精神”，开会第二天的工作做了精心安排。

职代会前公司领导们的这些活动，都是我在公司机关的那些朋友告诉我的。

26日上午八点，代表们准时来到五楼大会议室。根据大会原来的议程是杨森经理作报告后厅领导与代表们见面并作指示。

八点半都过去了，但会议主持人还未露面。公司领导也一个都没有见到。

代表们正在纳闷。突然，当天大会执行主席来到会场宣布：“原定今天上午的议程向后推，请代表们回宿舍休息。各代表组中的常任主席团成员到三楼会议室开会。”

代表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但又无法打听，只好各自回到四楼公司招待所自己的房间。

当我来到三楼会议室时，里面已坐满了人。人们都相互用眼睛在询问：“开什么会？”是党委扩大会吗？不是。因为在座的好些都不是共产党员。是常任主席团会议吗？也不是。因为有些人连代表都不是。只见个个神情严肃，连万厅长及另外两个副厅长也都铁青着脸，一言不发。

待最后一个进来的人坐定后，一场预先安排好的闹剧开始了。

杨森经理第一个开了口。他气冲冲地说：“同志们，工会委员会已作了决定，他们要在这次大会上提出免去我经理职务的动议，还要让赵宜昌大会上发言，公开我的隐私。如果这样，我还有什么威信？我还有什么资格在大会上发言？今天正副厅长都在，只要万厅长说一声不要我了，我马上卷铺盖走人。”

说完后看了万厅长一眼就冲出了会议室，接着“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

几个人应声跟了出去。他们边跑边喊：“杨经理，杨经理，你不要走嘛。你走了经理报告谁做？职代会还开不开嘛？”

随着这一片喊声，整个公司大院出现了一阵骚动。人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纷纷从办公室、宿舍走了出来，互相询问，但谁也说不出来个究竟来。

过了好一会，追出去的人回来了。个个气喘吁吁，满脸涨得通红。但杨森却没有回来。

会场沉默了一阵后，万厅长神情十分严肃地开口了。他说：“同志们，刚才的情况大家都看到了。有些从下面来的同志可能还不知道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要告诉大家，公司最近发生了一系列非常严重的事。其中最主要的是有人要利用这次职代会把杨森赶下台，由他来当经理，由他们来组阁。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我想大家都是清楚的，用不着我说。因为大家都参加了文化大革命，知道夺权是怎么回事。这个要当经理的人是谁呢？就是公司计划科的阳炳仁。这个人多数人都不认识，甚至根本就不知道公司有这样一个人。三中全会后，他以为当官的机会来了。去年底，他多次找我，说他要当经理，还正式向建委递交了毛遂自荐的报告。他说如果让他当经理，保证第一年收支平衡，第二年盈利三十万。还说如果达不到这个目标他自动下台，并自动扣发一年的工资。我几次对他说，你这些说法没有根据。你还不具备当经理的条件。起码一点，你还不是共产党员吧。我已当着他的面把话说得这样清楚了，但他还是听不进去，他还是要当经理。我们不同意，他就向中央组织部毛遂自荐。中央组织部在他的报告上作了批示。当省委组织部和我们向他传达了中组部的批示后，他更要当经理了，他到处去宣扬中组部的批示，但我们还是不同意让他当经理。虽然中组部在给省委组织部的指示中说要重用他，但我们最了解他的情况。不要说让他当经理，就是当一个科长也不够格。有人说他是第二个张建华，我同意这种看法。张建华在当厂长期间，把厂党总支甩到一边，什么事都是他说了算。厂党总支就是体现党对修配厂的领导嘛，你把党总支甩在一边，这算什么？这样的人我们能用吗？改革还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嘛。阳炳仁也和张建华一样。他的有些事我很看不惯。举个例子说吧，有一次海口的一个工程给他送了一面大锦旗，旗上写着‘爆破之魁’四个大字。这面旗就是送给你的嘛，你收下不就完了？但他偏要人家把锦旗送到我这里来，说什么他到白塔

村进行高站台控制爆破是建设厅派他去的，所以要把锦旗送到建设厅来。你们想想，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无非是炫耀自己嘛！一面锦旗有什么了不起？这也值得说吗？为这点事就洋洋得意的人能当经理吗？”

会场上除了万厅长讲话的声音外没有人交头接耳讲小话。有人不断地点头，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更多的人是出于好奇，想见识见识那个毛遂自荐的阳炳仁到底长什么样。

万厅长见自己的一席话把与会者都镇住了，达到了预期目的，于是他改变了说话的语气，以一个长者对晚辈的温和、宽容的口吻接着说：

“当然，杨森同志也还是有优点的，几年来他做了不少工作，这点大家都是知道的。但他这个人不冷静，遇事急躁。刚才的情况大家看到了吧。作为一个领导，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沉得住气嘛。怎么能为一点小事就说不干了呢？这不好。厅里是支持你杨森的嘛，你还是经理嘛。只要你还是经理，我们就支持嘛。对他的缺点，大家可以提，可以批评。赵宜昌同志也可以在大会上发言。当然，发言的内容不要离开这次大会的主题，也就是公司党委提出的团结起来，争取今年收支平衡嘛。凡是和这个主题不相干的事就不要讲了，以后可以个别交换意见嘛。”

一位副厅长插话说：

“我们的职代会是在党的领导下的职代会。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当然也不是解放前的行会，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

万厅长接着说：

“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条是非常重要的。铁路建设公司党委就是体现党在公司的领导嘛。杨森同志是公司经理，也是公司党委副书记。今天下午的经理工作报告当然还是由他来做，他的工作我去做。”

这时，会场气氛开始活跃起来。刚才出去追经理的几个人兴奋异常。

“我完全同意万厅长的讲话。杨森是个好领导，我们公司全靠他。”

“阳炳仁做梦都想当官，这样的人就是不能用。他算老几？”

“阳炳仁的老婆在公司大院里说：‘如果我家老阳当了经理，现在这些人他一个也不用，要一个一个收拾他们’。他老婆都如此凶，阳炳仁如果真当了经理，那我们真死得成了。”

“不能让在赵宜昌在大会上发言，这个人的话很有煽动性。”

“赵宜昌背后有人支持，他的发言是有来头的，是个大阴谋。不能让他们得逞。”

“如果让赵宜昌发言，必须规定发言不能涉及杨经理的私生活。否则，不能让他在大会上发言。”

很清楚，刚才发言的人都是事先专门安排到会场上来发言的特殊人物，他们既不是大会常任主席团成员，也不是公司党委委员。

会场上出现了一边倒的情况。基层来的人摸不透底细不便发言。而那些了解内情的人看到反对阳炳仁、反对赵宜昌的发言人都是杨经理的红人，是惹不起的，于是也一言不发。

万厅长看看差不多了，于是站起来示意大家安静。接着，他笑容满面地说：“同志们，今天本来是想和全体代表同志见见面的。但现在来不及了。今天的这个会开得很好，大家统一了认识。你们下去后向全体代表传达一下。我相信，你们的这次职代会在公司党委的领导下一定能开好。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吧。”

下午两点半，杨森经理向大会作工作报告。听的人很少。一方面是因为报告已打印，人手一份；二是杨森自我表扬，老一套。更重要的是，代表们听了关于上午会议情况的传达后，都心情激动。一方面为公司的前途担心，认为公司的严重局面难以挽回；另一方面也对万厅长压制民主、无视代表们的权利而愤愤不平。他们纷纷要求大会主席团准许赵宜昌发言，认为赵的发言才是大家最为关心的。

杨森的报告念了一个半小时。四点，大会主席宣布分组讨论，主席团成员则留下来讨论赵宜昌的发言问题。

晚上，主席团成员继续讨论是否让赵宜昌发言的问题。最后决定要赵将他准备在大会上的发言预演一遍。

赵宜昌讲完后，会场上出现了一场真正的大辩论。经理的红人们认为绝不能让赵在大会上发言，并警告赵说：“你不要忘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而来自各个处的代表则一致主张让赵在大会上发言。

双方相持不下，会议一直开到深夜十二点。

27日上午，公司财务科长冯保行作1982年财务决算和1983年财务

预算的报告。下午各代表组讨论经理和财务科长的报告，主席团成员则继续讨论赵宜昌的发言问题。

由于赵宜昌在上午开会前曾公开呼吁代表们同意他在大会上发言，得到了绝大多数代表的热烈支持，主席团在下午会议结束前作出决定：允许赵宜昌在大会上发言，但声明赵的发言只代表他个人，不代表工会委员会。

28日上午，小组讨论，下午大会发言。

杨森等人为了尽量减少赵宜昌发言的影响，他们特地安排了五个人发言，将赵的发言安排在最后，而且将公司机关的发言代表换成了总工室的周焕昌工程师。

我们都知道周工这个人年纪大了，脑子不够用，一上台就天南海北，随意乱侃个没完，说话根本不着边际。

杨森等人之所以这样安排，目的就是让周工无休止的发言挤掉赵宜昌发言的时间。

轮到赵宜昌发言时已是下午五点过了。

当赵走向讲坛时，代表们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是几天来从未有过的)。

看得出来，赵非常激动。他两眼满含泪花，手在微微发抖。他说：

“代表同志们：我衷心感谢大家！因为是你门为我争得了这次发言的机会和权利。”“我今天的发言无疑要冒犯公司的领导。这对我来说可能惹下大祸。但我作为一个工会干部，一名职工代表，良心使我顾不了那许多。今天我是把自己这七十多公斤豁出去了。”

又是一片热烈的掌声后，赵宜昌开始正式他的发言。他说：

“我今天的发言分两部分：一、杨森经理道德败坏，违法乱纪，严重失职，给国家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二、关于公司领导利用职权大搞不正之风的情况。”

赵宜昌在发言中以大量的事实、确凿的证据说明杨森道德败坏，喜新厌旧，连自己的亲嫂也不放过，人伦丧失，是当代的陈世美。

赵宜昌在发言中，以近年来公司承建的昆明五钠厂铁路、公路建设工程、回洼电厂及秧田冲车站的扩建工程为例，说明杨森等人玩忽职守，管理混乱，以致造成严重的质量事故，导致直接经济损失超百万元。

赵宜昌还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杨森忽视安全生产。几年来一、二处工地工棚连年发生火灾，伤亡事故不断发生，二处一年内就有3人非正常死亡，直接经济损失巨大。

机关下班的铃声早就响过了，但代表们谁也没有注意到。

赵宜昌越说越激动，快结束讲话时嗓音已完全哑了。

代表们向他报以空前的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这掌声是无比真诚的。它代表了人们真切的心声。这掌声是人们献给赵宜昌的鲜花，表达了人们对他的支持和敬佩。这掌声在会场内外回响，它震撼着人们的心，也震撼着这钢筋水泥的五层办公大楼。

赵宜昌的发言有如一石激起千层浪。代表们的心久久不能平静。他们终于明白了铁路建设公司为什么会落到今天这份田地。他们在问：谁应对此承担责任？同时为自己置身于杨森这样的人手下感到可悲、可怕。

29日下午，大会进行最后一项议程：通过大会决议。

万厅长带着几个人按时来到大会主席台就座，一、二处的代表组却姗姗来迟。

三点，闭幕大会正式开始。当公司工程科科长邓文毅宣读完大会决议后，当天的执行主席陈忠站起来说：“如果大家对决议没有意见，就请大家鼓掌通过”。

除邓文毅几个人外无人响应。陈忠再次大声说：“如果大家没有意见，就请……”话音未完，一处处长郑德和、一处工会主席魏国权几乎同时站了起来，并举手要求发言。接着，二处代表组也有人站起来要求发言。

这突如其来的情况让大会主持人陈忠手足无措。他不知该怎么办，只是不断地挥舞着手上的“大会议程”，反复说着同样的一句话：“今天的议程中没有安排大会发言，如果大家对决议没有意见就请鼓掌通过。”

不断有人站起来离开了座位。这时有人提出：“鼓掌通过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我们要求用投票的方式通过。”

执行主席陈忠表示不同意搞投票。这时又有人提出：“如果投票不行，那就采取举手的方式通过。”陈忠还是不同意。

看到如此场面，我实在忍不住了。我站了起来并大声说：

“代表同志们，我认为刚才大会执行主席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为什么一定要大家鼓掌通过？如果大家赞成决议，自然会鼓掌，不鼓掌就说明大多数代表不同意刚才念的决议。这不是再明显不过的事实吗？”

“几天来的事实充分说明：公司领导根本就无视代表们的意愿和要求。这是对职代会的公然蔑视，是对民主的任意践踏！”

“会议期间，大会主席团几乎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放在是否让赵宜昌发言的辩论上了，这怎能把会开好？他们为什么如此害怕赵宜昌同志发言？为什么要强行鼓掌通过决议？事实不是很清楚了吗？经理报告通篇是给自己评功摆好，根本就不谈问题和教训。它既未回答铁路建设公司为什么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的（这显然是全公司五千多职工急切希望回答的），也没有告诉大家今后该怎么办，有哪些切实可行的措施。这样的报告有什么用？为什么非要大家通过？”

“我建议大会主席团重新开会，重新起草经理工作报告和大会决议；同时希望公司领导尊重代表们最起码的民主权利。再这样下去，铁路建设公司可真就没有救了。”

我刚说完，一些代表就高喊着支持我。由于激动，这时大部分的代表都已站了起来并离开了座位，纷纷要求发言。一处的几位代表已经冲到主席台上要抢话筒。

会场秩序此刻已完全乱了。

陈忠已经乱了方寸。他不断地看坐在主席台两边的公司领导，意思是问他们该怎么办。但没有一个领导抬起头来看他，有的甚至干脆扭过身望着窗外。

陈忠没有办法，只好走到万厅长面前问怎么办，回答是：“那就让他们说吧。”

于是，一处长郑德和和另外几个代表先后在主席台上发了言，一致表示同意我的意见，重新修改经理报告和大会决议。会场上的秩序也逐渐恢复了起来。

最后，大会执行主席请万厅长作指示。

万厅长走向话筒。第一句话就是：“刚才有同志提出这次大会不民主。这怎么能说不民主呢？职代会是在党委领导下的嘛！现大家统一了

认识，不是开得很好吗？”

接着，他作了以下“指示”：

“这次大会以前，公司党委给我们写了一个报告。对这个报告，我们是赞成的。在这次会议上，有人要求对公司进行整顿，我们认为目前时机还不成熟。主要是没有任务，而且今后一段时间内还是如此。没有任务就不好整顿嘛，谁来也不行。有人说如果让他来当经理，保证一年内就可做到收支平衡，第二年就要盈利，第三年要盈利多少多少。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没有任务，谁来也不行，叫我来也不行。

“这几年来，铁路公司党委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确实很辛苦，也取得了不少成绩。

“目前的问题是要抓好企业管理。首先要抓工程质量。要通过质量来提高社会信誉。现在省里还是有些工程的，但人家不给你。比如煤气公司，他们就有一个几百万元的土方工程。我跑了几次，想把这项任务揽给铁路建设公司。但人家就是不干。说他们信不过铁路建设公司，这让我也没有办法。

“铁路建设公司确实存在不少质量问题，到处都在告你们的状。有的告到建设厅，有的告到省里，也有的告到中央去了。搞得我们也头疼。我不是厅长了，倒成了你们的调解员了，到处为你们说好话。”

接着，万厅长列举了铁路建设公司近年来几起重大质量事故的情况。

最后，万厅长强调了技术培训的重要性。要求公司“要花大力气抓好这一工作”。

厅长“指示”后，大会主席宣布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圆满结束”。

这次职代会没有通过任何决议。公司工会原决定罢免杨森的动议也因万跃林厅长的干预而没有在职代会上提交。

在这次职代会上阳炳仁是一个焦点人物。为了让读者对这次职代会的背景有个大概的了解，现对他作简要介绍。

阳炳仁是一个有技术、有担当的热血男儿。

他五十年代毕业于南京工程兵学院，七十年代末由新疆调云南省铁路建设工程公司。他长期从事爆破技术的研究与应用，并取得显著的成就，被人称为“爆破大王”。

我们可以从下面两个例子看出他是一个有技术、有事业心、有担当、敢于挑战官僚主义的人。

例一：1983年6月初，阳炳仁接手小龙潭的一个爆破工程。根据他的设计，一次要放进炸药8.4吨。当时建设单位对他的设计有疑虑，不同意这样的爆破。反映到主管工业的副省长朱奎那里，朱奎同意了阳的设计。但要求签订一个协议：如造成经济损失，要由铁路建设公司和阳炳仁负法律责任。铁路公司的头头一个也不敢签字，但他却签了。结果爆破成功。一炮就为公司赚了四十多万元，对铁路建设公司当年调工资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炮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公司也不得不为这一炮发了一期简报。

阳炳仁的控制爆破技术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获得省科委“控制爆破推广三等奖”。中央及云南省报纸都介绍了他的爆破新技术，云南电视台还为他专门拍了一部纪录片。

例二：进入八十年代初，铁路建设公司的生存条件每况愈下。公司领导官僚主义严重，管理混乱，连年亏损，职工怨声载道。在这种情况下，阳炳仁舍弃个人得失，毅然于1982年10月7日向省建委、省委组织部毛遂自荐当经理，同时立下军令状：如让他当经理，保证上任一年内扭亏增盈。如若不然，甘愿扣发一年工资，自动下台让贤。在没有得到回应的情况下，他又直接向中央组织部写了“自荐信”。中央组织部即时批复，要求云南省委组织部予以落实。

正由于阳炳仁是一个有技术、有责任心、有担当且敢于挑战官僚主义的人，所以像万跃林厅长这样的官僚们都恨他，不看好他，千方百计地诋毁他、压制他。以致万厅长在职代会这样公开的场合还说他“要当经理不够格，连党员都不是”，说他是“第二个张建华”。

对这次职代会的结果，有人感到愤怒，有的人感到忧虑，更多的人在深思，在觉醒。

这次职代会拉开了铁路建设公司改革与守旧斗争的序幕。双方都亮出了自己的阵营。

8月1日，我以“本次职代会说明了什么”为题写了一篇日记。我写道：
准备了两个多月，开了整整四天的公司第二届第二次职代会就这样

结束了。会议没有通过一个决议。代表们不欢而散，忧虑和愤怒的情绪将很快蔓延到各处、厂、队。

代表们当着万厅长的面公开抵制大会决议的通过，并表示对公司现党委的不信任。这是公司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公司党委某些人这次是丢尽了脸，出尽了洋相。

这次职代会说明了什么？我认为通过这次职代会活生生的事实说明：改革的阻力是十分强大而顽强的。一个立志改革的人必须有大无畏的精神，要向赵宜昌同志那样，敢于“把我这七十多公斤豁出去”。

在这次职代会期间，赵宜昌的发言何以成为代表们的中心议题和矛盾的焦点呢？这是因为赵的发言内容是当前公司最为敏感的问题，即公司的体制改革及今后权力落于哪些人手中的问题。

在铁路建设公司，目前斗争的双方，一方是以经理杨森、杨正友（公司党委副书记、副经理）、邓文毅（工程科科长）为代表的“在朝派”，另一方是以阳炳仁和我为代表的“在野派”。从目前的形势看，前者占有明显的优势。这主要是他们得到了万跃林厅长的支持，而且他们本身现在也处于权力的中心，手中握有实权。他们属于守旧派或说是维持派，他们不可能会有什么作为。他们这次之所以极力反对赵宜昌的发言，是因为他们知道阳炳仁和我等一旦成功，他们要维持目前的地位和权利是不可能的。

以阳炳仁和我为代表的一派是目前的“在野派”。由于客观上的原因，我们相对于杨、邓一派来说现处于劣势。但我们属于革新改革派，我们既体现了时代的潮流，也反映了广大职工的利益和意志，具有潜在的力量。赵宜昌这次终于得到了在大会上发言的机会并得到多数代表的热烈支持就是证明。

我之所以这样详细记述这次职代会的过程，一是因为万跃林厅长在这次会议期间两次点了我的名，让我印象深刻。二是我想通过对这次职代会的介绍，让那些读到这本回忆录的人对上世纪八十年代国有企业的基本情况、对当时改革者们为什么要改革、对官僚主义是怎样把大批国企搞垮的，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二、与建设厅长万跃林的一场争论

万跃林，男，1925年生，中等身材，稍显肥胖。1977年以前在省建安公司任党委书记，1978年调省建安局任副局长。一年后任省建委主任。1983年4月任省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厅厅长。

对他的评价，人们说法不一，有人说他是全省各厅局中最有才干的厅长，而更多的人则认为他出任厅长是历史开的一个大玩笑，说他早就该下台了。

公司第二届第二次职代会结束一年以后，1984年7月5日，我和万厅长在他的办公室进行了一场争论。通过这次面对面的争论，我们相互之间的印象更深刻了。

这天上午九点，我来到建设厅党组办公室，厅长们正在开党组会。我向组织处处长段守成说明了来意，他进去在万厅长耳边说了几句什么后，万厅长就起身出来了。

相互客套了几句后，我就开门见山地说：“万厅长，最近我们公司连续发生了几件事，都是有关你和我的。我今天之所以特意来找你，是想听听你对这几件事的看法和态度。”

“什么事？你说吧。”万厅长很客气地说。

我说：我因改革而受到打击的情况我已向建设厅和省委有关部门多次反映过了。1983年以来，我的问题受到了省委有关负责同志和新闻界的广泛关注，省委负责同志李启明、高治国、林超等都过问了我的事，并有相应的批示。一些新闻单位也找过你们，他们要求在报纸发表有关我的报导文章。这些情况你都是知道的。今年第一次整党开始以后，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云南组在云南找的第一个人就是我。他们认为我的问题既关系到改革的问题，也关系到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问题，情况很典型。他们通过调查落实以后，于今年4月责成省指委（云南省委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尽快落实处理。5月初，省指委开始了对我的问题的调查。这些情况我想你也是知道的，因为在省里的几次会议上，有关负责同志已找你谈过了。

对中指组、省指委的调查，铁路公司的负责人采取了顽固的对抗态度。他们提供伪证，公开威胁被调查人。有关情况我也已向厅里汇报过了。

6月份以来，铁路公司到处都在传什么“万厅长说了，张建华是知识分子的败类，张建华要当公司经理除非我万跃林死了”。前几天，公司纪委、组织科和三处有关人员两次到我厂调查所谓政治谣言，矛头直接冲着我来。他们强令副厂长孙武军同志写交待材料，要他承认“万厅长要下台了的政治谣言”是从我这里传出去的。当孙武军同志拒绝他们的要求时，他们公开威胁说：“你还当不当共产党员了？我们是以组织名义找你的。”公司组织科长王凤华在公司机关公然说：“孙武军公开讲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把张建华比作青山。他这哪还像共产党员？他这样是要吃亏的。”

上面说到的这些事都直接牵涉到你万厅长，请你直接表一个态。

听了我提出的要求，厅长感到很难堪。他迟疑了一阵后说：

你的情况我知道一些。你刚才提出的几个问题要我表一个态，我认为这不好办嘛。一方面我没有调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嘛。再说建设厅所辖范围有上千知识分子，如果都来找我，我还怎么工作？今天你既然来了，我们可以谈几句。因我正在开会，时间不能太长。

我看他在打官腔，不想回答我的问题。于是我说：

我提的这几个问题不但对我关系很大，对你也是有不良影响的。如果你对这几个问题不直接表态，人家会说你厅长水平太低了，这会影响你的威信的。再说，我只要求你表一个态，证实一下你与这些问题的关系，有还是没有，这也不需作什么调查。

万厅长觉得无法回避了，于是他说：

关于你们公司最近追查谣言的事我知道，是我要他们查的。我刚从北京回来，×副厅长就对我说铁路建设公司最近在传什么我要下台了的。消息。他说应该查一下，当时我就同意了。怎么能随便议论领导同志呢？这不好嘛。我还是厅长嘛！说我下台了，这不是谣言吗？

说到这里，厅长显得非常气愤，脖子都红了，两只手紧紧地抓住沙发扶手。接着，他说：

你们铁路建设公司近几年来小道消息特别多。今天说这样，明天说那样，把一个铁路公司搅得乌烟瘴气，再不追查一下不行了嘛。造谣造到我的头上来了，追查一下起码可以使那些制造谣言的人受点教育嘛。

他说到这里，我插话说：

关于你要离休了的事我也听说过了，但我没有传。公司为什么说就是我传播的谣言呢？杨森最近在三处党委会上就指名道姓说是我传的，这是什么意思？

万厅长说：前天，杨森同志到我这里来了，他说了三处开会的情况。他没有点你的名。和他一起参加三处会议的席秀元，他一下说谣言是从公司传出来的，一会又说是从三处党委传出来的。叫他点出名来，他又点不出名来。

我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与你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这根本就算不了什么政治谣言，更没有必要兴师动众去追查。目前是机构调整时期，领导班子随时都在调整。干部上或下的事经常发生，这是正常的事。你今年已满六十岁了吧，听说你也写了离休报告了。人们很自然地就会想到你离休的事，对此议论几句一点也不奇怪。议论领导也不都是坏事，这也是群众对领导的一种监督嘛。你不也经常讲要接受群众的监督吗？如果对这种议论也要追查，那就太过分了。

万厅长无以言对。过了一会他才说：当然，议论一下不是不可以。但这对领导的威信总是有伤害的吧。特别是在你们铁路公司，这样的议论性质就不同了。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说：你认为下面对你的议论有损你的尊严或说威信，你们把自己的尊严看得过重了。千百年来，统治者、领导者总觉得自己比臣民，比被领导者高贵得多，优越得多，而且认为这种尊严、高贵是不可改变的。谁要对此怀疑，甚至挑战就被看成是犯上、造反，就不能容忍。这种社会心理恰恰是官僚政治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认为要改革，要搞“四个现代化”，就必须推行民主政治，推行法制，就必须推翻官贵民贱的社会意识。如果民众议论一下都不行，那还谈什么民主？

你说我们公司被小道消息、政治谣言搞得乌烟瘴气的说法是不对的。我们公司之所以弄成今天的这个样子，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我们公司的领导太不尊重广大职工的民主权利了。他们不承认职工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不承认劳动的价值，去年职代会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我说那次职

代会不民主，你不承认，还当众批评我。这说明你也只不过是口头上讲讲民主罢了。

在铁路建设公司，你只相信像杨森这样的对你忠诚的下级。不管他们是怎样的平庸，怎样的不得人心。正由于这样，你已把自己置于广大群众的对立面上了，人们从不信任杨森发展到不相信你了。上次职代会上的情况就说明了这一点，相信你也感觉到了。

可以说，铁路建设公司之所以落到这步田地，关键的原因就是领导完全失去了群众，群众再也不相信你们了。

我这样说也许你又要给扣上“不要党的领导”这顶大帽子了。在你们看来，党就是你们，你们就是党。不相信你们就是不相信党，不跟你们跑就是不要党的领导。你们的这种认识是相当愚蠢可笑的。因为你们离群众已经很远了，离党的方针、政策、路线也已经很远了，你们根本就代表不了党。正因为这样，当你在职代会上说要取代杨森就是向党夺权，说我实行党政分工就是把党甩到一边时，人们并不以为然，甚至对你嗤之以鼻。

我的这番言论，万厅长显然是第一次听到。一个小百姓当着他的面数落、顶撞他这个堂堂的大厅长，也许他是第一次碰到。我看到他气得发抖，但他又无法反驳我。

正在这个时候，有人从会议室出来叫他，要他回去作会议总结。当他站起来正要走时，我说：万厅长，我好不容易上来一趟，我提出的问题你还只回答了一个呢，是不是我们明天继续谈？

他没有直接回答我。在他走向里间时，气冲冲地说了一句：“人家说你造反精神太强，我看一点没错。”

这次谈话不欢而散。

我原以为说我“造反精神太强”的人只是李树本，没想到万厅长也这样说。

后来我和万厅长还有过多次接触和争论。

云南省建设厅厅长，在一般老百姓眼里算是“大官”了。而且一般人也都会认为既然当到了厅长，政治思想水平一定会是很高的。但从我和万跃林厅长的几次接触看，万厅长的水平并不怎么样。如果说万厅

长是一个典型的官僚，那倒是名副其实的。

官僚们的典型特征是：远离群众，以权谋私，固步自封，自以为是；任人唯亲，嫉贤妒能，家长作风，搞一言堂，一手遮天；上抗下压，唯我独尊。

看看万厅长在铁路公司职代会上干的那些事吧：他明知杨森经理品德败坏，却以“不干涉个人私生活”为名，千方百计地掩盖杨森的无德；他明知因杨森的平庸无能，导致铁路公司连年严重亏损，却以“没有生产任务，谁来也不行”为由，掩盖杨森的无才；他明知阳炳仁在工程爆破方面卓有成就且有改革创新精神，中央组织部、省委组织部都有明文批示要重用阳炳仁，他却说阳“是第二个张建华”“连党员都不是”“当个科长都不够格”，硬是顶着不执行中央和省组织部门的批示……

为什么我们修配厂、我们铁路建设公司在八十年代的短短几年内就垮掉了？这不能不说应该归功于万跃林厅长！而全国成千上万的国企在几年内就纷纷破产倒闭，这难道不更是官僚集团的光辉政绩吗？

第二十八章 直面官僚

我从小立志报效祖国。早在上初中一年级时我就写下了“不求富贵不图侯，不想红颜太风流。只要为国争口气，平生志愿第一筹”的自勉诗。在以后的求学和工作中，我一直以“为民族争气，为国争光”来激励自己。

然而，经过十几年的实践，特别是经历八十年代初几年的拼搏和抗争后，严峻的现实使我深深地认识到要报效国家并不容易。

1984年5月我写了一篇《报国难》的文章，是有感而发。

这篇文章较长。它记述了我从小学、中学、大学、文革，直到参加工作、投入企业改革的经历及所思所想。

当时我曾将此文分送给云南《支部生活》主编刘全健、云南知名作家吕克昌、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云南组组长杨桂荣。由于此后多次搬家，底稿已给弄丢了。

毛主席之所以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是缘于他看到了由他自己创建的体制，其内的官员正在发生严重的蜕变。那些建国时的功臣们因官当大了，忘了初心，日益脱离群众，严重的官僚主义正在迅速发展、蔓延、聚结。如果不予解决，资本主义就要复辟，人民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我们当年参加文化大革命时，对体制内的官僚主义的严重性其实并不了解，更没有切身感受。之所以不顾一切地投身进去，完全是出于对党、对毛主席的无限信任和忠诚。

几十年过去了，严酷的现实让我们这一代人真正理解了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反官僚主义，批走资派的真正历史意义。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企业改革，在很多地方其实是文化大革命的继续，是批判官僚主义的继续，是广大群众与走资派斗争的继续。

一、《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否定文革，走资派成英雄

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否定了文革。文革中被批判的对象“走资派”统统被列入“冤、假、错案”而得到平反。

一时间，走资派们成了正确路线的维护者，成了英雄。他们在文革

中的检查、交待、忏悔，甚至像“永不翻案”之类的保证都统统不算数了，都名正言顺地官复原职。文革中被冲垮的官僚集团重新集结、恢复、强化，并很快掌握了国家的党政大权。

走资派们官复原职后自然要进行报复。他们最痛恨的是造反派。因此，文革中各群众组织的领袖人物和曾同情或支持过造反派的领导干部，都相继被判刑或被免职，即使那些在文革中并没有犯什么错的造反派骨干们也统统被“记录在案”或被“挂”了起来。

他们否定文革，说文革中的“两派都错了”。但实际上他们只否定造反派，而对保守派却情有独钟，被大量提拔重用。

在我被免职前，我们铁路建设公司文革中造反派的代表人物均被免了职。如公司常务副经理陈舟、我们三处（当时还叫汽车团）处长罗祥都被免了职。公司机关和第一、二工程处的情况也一样。

与此同时，那些文革中参与支左的部队干部，转业后大量地被安排到地方各级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岗位上。这些人多数来自农村，虽当过兵，但都没有打过仗，虽在部队接受过教育，但普遍文化水平低（多数小学文化），农民意识重，缺乏现代素养。他们与新中国自己培养起来的经过文革洗礼的青年知识分子在思想方法、能力等很多方面格格不入。他们中很多人与官僚集团有着天然的联系，并成为官僚集团最强有力的社会基础。

以我们铁路建设公司为例，当时从公司到各工程处再到各基层厂、队（车队、施工队），一、二把手几乎清一色是部队转业干部。这些人多数毫无企业管理方面的经验，但在整人和运用“关系学”方面却称得上是行家里手。

二、告状

正如我在前面说的那样，我无端被免职后，我要工作不让我正常工作，我要调走又制造障碍不让我调走，杨森、李树本时时处处与我为难，以致我的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证。他们已把我逼到退无可退、让无可让的地步了。

人们常说，兔子急了也会咬人。我从小就养成了不畏强权、敢于碰

硬的性格。我怎能长久地忍气吞声而不予反击呢？

我主张抗争。我认为抗争是人的一种本能。抗争对一个人来说是绝对需要的。一个人如果在受到不公平待遇甚至欺凌时放弃抗争，那他实际上也就放弃了作为一个人应有的尊严，丧失了起码的人身自由。

我清楚地认识到我面前的对手是十分强大的。李树本只不过是一个无赖，一个打手。在他的背后是公司经理杨森，而在杨森的背后是建设厅厅长万跃林。显然，在万跃林的后面也还会有省里更大的人物。他们各自手中不仅有权，而且在他们的前后都有一个强有力的利益关系网。

如何进行抗争？我当时能做的首先是“告状”，利用合法并为当局认可的方法去进行抗争。

我给媒体写信反映我受打击迫害的情况，争取社会的同情和理解。我先后给春城晚报、云南日报、工人日报、人民日报写信。因为这些媒体在1981年初就曾派记者来我厂采访过，并写了有关我厂改革并取得成效的报导。在多次接受采访中我还和几个记者成了朋友，如云南日报的韩曙光、春城晚报的阿永昶、人民日报的刘远达及后来认识的云南《支部生活》杂志主编刘全健。这些人对我们厂的情况都有所了解，对我的改革举措都持热烈的支持态度。

我给母校华中工学院官复原职的党委书记朱九思写信，向他诉说了我的拳拳报国之心及因改革而遭受到无情打击的情况，希望学校能澄清我文革中的问题，给我解除“紧箍咒”。

解放朱九思的学习班是我主持办的，我相信他对我有一定的了解，也相信他会出手援助我。

信中在谈到学校给我搞“记录在案”时，我把它比作是一把魔教杀人无痕的“华工剑”。我写到：“没有人告诉我这个记录在案的内容及其结论，但我知道它对我的事业、前途危害极大，因为它在短短的两年内就三次给我造成了难以愈合的伤害。”

在这封信中我不无抱怨地说：

每当想到妨碍我报效祖国的枷锁，想到这个枷锁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的母校给我戴上的，怨愤之情就难以自制。谁见过母亲给自己的孩子带上枷锁？又有谁听说过哪位师长给自己无辜的学生套上紧箍咒？作为母

亲，谁不望子成龙？作为师长，又有谁不希望自己的弟子为国争光，名扬四海？为什么华工要对自己的学生如此冷酷，如此少情寡义？

我也给中共中央组织部乔石写信，就中央搞“记录在案”问题和“应如何看待当年造反派红卫兵”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这封信中，我以自己亲身的经历为例说明中央对文革中的造反派红卫兵骨干搞“记录在案”是错误的。我写道：

文革十年，我们只有最初的一年多不到两年处于主动造反的地位，其后八年均是处于被动挨整的状态。就我来说，我没有整过任何人，而自己却被整得遍体鳞伤。

华中工学院给像我这样的造反派红卫兵搞“记录在案”，给我们戴上“紧箍咒”是错误的，还因为：

1. 既然文革是错误的，文革中的两派就都应否定。而华中工学院却只否定造反派红卫兵，并死揪住不放，而对文革中、后期掌权的保守派红卫兵却予以重用，似乎他们是完全正确的。

就造反派红卫兵来说，从1968年8月工宣队进院以后，华工的文革就结束了。事实上，文革的严重后果正是1968年8月后发生的。因此，中央对造反派红卫兵搞“记录在案”，并死揪不放是不公正的。

2. 对造反派红卫兵应作历史分析。当时，绝大多数红卫兵是因为对党、对毛主席的绝对忠诚卷入文革的，当时我们只不过是十几岁或二十刚出头的年青人，文革即使错了，要十几、二十来岁的年青人来承担历史的责任，这实在是太不公道了。

3. 当年的造反派红卫兵在四化建设中有着特殊的历史地位。因为他们有着以下明显的特征：

抗日战争后期或解放初期出生，是真正的在共产主义、爱国主义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他们的思想基础好。

他们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因此他们对中国历史、中国现时国情比较熟悉，政治上比较成熟，正反两方面的教训使他们有较强的是非辨别能力和判断能力。

这一代人思想比较开阔，对新思想、新事物特别敏感，较少保守思想。大量的事实证明，他们在业务上，特别是在创造性工作方面有着不可取

代的作用。

这一代人现正值年富力强(40岁左右),他们不但有较强的组织能力,而且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已成为四化建设中各行各业的骨干力量,四化建设的成败与他们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历史将证明:如果否认他们,那将在历史的进程中留下一片空白,如果压制、排斥他们,那将犯下历史性的错误。目前,在选拔干部时存在一种错误的趋向。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人都认为凡是当年的造反派红卫兵,特别是他们中的骨干分子都是不可靠的,甚至是危险的。决定凡造反派的骨干均不能进入领导岗位,已经进入的也要撤换下来。他们对参加过保守派的人却情有独钟,认为这些人是最可靠的。他们宁可用文革中“一派也没有参加”的逍遥派也绝不用造反派。

我认为这种认识是非常错误的。文革是一场席卷全国的运动,它波及每一个角落,与每一个人都发生了关系。对在当时的形势下无动于衷的人,是很难想像他是一个政治上坚定、敏感的人。我想,即使三国时期的诸葛孔明,在那种‘天下大乱’的情况下也不能安居隆中,不出来表示自己的观点,“一派也不参加”。

当年的造反派红卫兵中,特别是其骨干分子中,有大量人才。这些人的才华,特别是组织、号召能力方面的才华在十几、二十岁时就已经显露出来了。有些人认为这正是危险所在。这是没有根据的。应该看到,他们首先是受害者。当然,在他们中也存在危险分子,但这是极少数,而且要识别他们并不难。

在任何由人组成的群体中都可能存在坏人,就是在共产党内也不例外。我们决不能根据某一群体中有少数坏人的情况制定对该群体一刀切的政策、方针,这是不言而喻的。

在这封信的最后我写道:

我之所以要写这封长信,是因为像我这种情况的人在全国有成千上万。他们都希望在四化建设中作出贡献。这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恳请中组部予以重视。

当时中共中央成立了一个“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简称“中指委”),我也向中指委写信反映了我因改革而受到打击的情况。

我的这些“告状”信除给华中工学院的信没有反应外，其他均有明确的回应。

当时全国的媒体都在争先宣传报导改革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情况。因此，我给媒体（报社）的信反应也最快、最激烈。他们很快就派出记者对我因改革而受到打击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及时地写了报导或评论文章。尽管这些文章都因潜规则（媒体发表有关报导和评论文章，需和有关单位领导及其上级部门领导见面并征得同意才能公开见报）而没有公开发表，但记者们对我们修配厂、铁路建设公司、建设厅的公开调查本身，特别是这些文章的报纸清样和人民日报“内参”中的三篇文章，也给了李树本、杨森、万跃林等官僚们不小的压力，给同情和支持我的公司内广大干部、群众以很大的鼓舞，当然也给了我坚持抗争的信心。

当时的媒体中确实有一些编辑、记者敢冒风险，仗义执言。其中给了我很多帮助，也最让我感动的，是云南《支部生活》杂志主编刘全健。

刘全健是中指组（中指委云南组）的李群介绍我们认识的。

1984年12月22日，阳炳仁告诉我说云南《支部生活》记者刘全健要见我，并把联系电话给了我。随即我就给刘打了电话，约定26日下午见面。

26日下午两点半，我来到省委宣传部《支部生活》编辑部。刘全健正在等我。见面以后，他领我到二楼接待室。

他很热情，对我的事很关心，我们谈了三个小时。

他说：

中指组的李群向我介绍了有关你的情况。李群认为你的问题很典型，并要我写一篇文章。听了有关你的情况介绍，我也很感兴趣。我想以《失败的改革者》为题写一篇长篇报导，下个月8号就可以动笔了。当然，写好以后还不一定很快就可以发表。因为现在你的问题中指组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他们写了一个调查报告，我看了一下，不太满意。他们已决定再次组织一个调查组对你的问题进一步调查落实。他们有一个结论，哪怕是一个初步结论都好办。因为上面那些人只相信这些机构的意见。对记者的调查他们不太相信。如果省指委有一个初步结论，我们写的文章就好在新闻检查中通过了，否则还是不好办。

这种事我们碰到的多了。比如刘忠笃的问题，我们认为是打击迫害，但市里有关领导却认为不是这样。因此，那篇稿子送了八个新闻单位都发不出来

关于你的问题，我想肯定会解决的。因为中指组和省指委都下了决心。你这两年的日子虽然不好过，但文章一旦发表，你的问题将得到解决，这将对你以后的工作产生重大影响，这对你是很有好处的。

在这次谈话中，刘全健自我介绍说他是山东青岛人，和我是同一届大学毕业的。毕业时有几个新闻单位都争着要他，他选择了光明日报社。但因为他和另一位姓王的记者说了真话而得罪了报社的一位领导，结果被赶了出来。谈到他在光明日报社的这件往事时，不无感慨地说：中国人整人是普遍的，即使像光明日报这个知识分子的报纸也不例外。中国的事实在太复杂了。

后来他到了昆明，在云南省委宣传部机关刊物《支部生活》当主编，现在情况还好，宣传部的领导对他很信任。

刘全健还谈到了他对现在官僚机构的看法。他说在党政机关中，很多人都是混饭吃的，包括一些处一级的干部。他认为这些人什么事也干不成。

从谈话中可以看出，刘全健对我们公司和三处的情况进行过认真的调查，对公司经理杨森、三处党委书记李树本都有自己明确、清晰的想法。

通过这次谈话，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认为他这个人性情爽直，敢于仗义执言，可信，可交。

此后，我们来往很频繁，成了知心朋友。他帮了我很多忙，也为我担了一些风险。在由省科干局出面为我安排工作都出现阻碍时，他还主动提出要我到主持复刊并任总编的《昆明日报》去工作。后来因为同样的原因没有调成，但这已足够说明他对我的信任和友谊，相关情况我后面还要谈到。

我给中指组的信也得到了回应。

1984年3月15日，中指组电话约我去圆通饭店八号楼见面。

3月16日我应约于上午八点半来到了他们的办公地。杨贵荣组长和吴致辉同志很热情地接待了我。

一进接待室，他们就问我最近情况有什么变化，问我是否还在修配厂工作。杨桂荣说，他们到云南后收到不少群众来信，但我是他们开展工作以来接待的第一个人。他说：你信上写的我们都知道了，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请随便谈谈。于是，我就说了我在我厂搞改革的情况及后来的遭遇。

听了我的陈述后，杨桂荣说：“你的问题很典型，不仅关系到当前的改革，而且也关系到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问题，我们一定尽快组织调查核实，给你一个满意的结果”。

根据近两年来我几次抗争的过程及结局，我认为要解决我的问题，关键在公司，而根子在建设厅。因此我建议中指组最好先解决公司阳炳仁的问题，因为只有解决了公司的问题，我的问题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

接着，我向他们详细介绍了阳炳仁的情况，并向他们推荐了几个调查对象。

这天的谈话气氛很好。他们很理解我的心情和处境，对我谈的很多观点表示赞同。

谈话一直持续到十一点四十五分。我临出门时杨桂荣要我提供一些原始材料，特别强调要我的那份厂务委员会的工作总结——《从改革中求生存，在探索中前进》，说可以直接送来，也可以邮寄。他们两人一直送我到饭店大门外，临分手时，杨桂荣说随时欢迎我来他们这里反映情况。

这次见面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首先是中指组组长杨贵荣及他的那些同事们（十来个人）。他们的年龄与我差不多，四十出头，思想开放敏锐，神态随和，没有架子。后来我又和他们接触了几次，总的印象不错，觉得这些人都是有见识、能干事、可信任的人。

中指组采纳了我的建议。第二天，即1984年3月17日，他们就打电话约见了阳炳仁。在接下来的一周内，他们又分别约见了公司政治部主任席秀元、组织科干事孔令发等人，并于月底在公司机关召开了两次关于阳炳仁和我的座谈会，听取公司干部、职工的意见。

中指组经过调查后认为铁路公司的问题很突出，决定将铁路公司作为他们进驻云南后的第一个县团级单位的典型来抓。组长杨桂荣在和席

秀元的谈话中曾明确表示：“我们将责成省委解决铁路公司的问题，如果省委拖着不办，我们将直接处理。”

5月中旬，云南省指委驻铁路建设公司工作组成立。挂帅的是省指委副主任周副部长。省纪委的李同志任组长，组员有省委组织部的一人，省指委的两人（杨文洲、杨秉成），建设厅的徐然，共六人。

工作组成立后立即展开了调查。在公司的调查主要围绕阳炳仁受压制的问题进行，包括阳“毛遂自荐”当经理问题，公司人大代表选举问题，科技成果申报被阻问题。在三处的调查则是围绕我被免职的原因及免职后受到打击的问题进行。

在对三处党委调查我被免职的原因时，前后两任书记有不同的说法。代理党委书记李树本说了四条，一、任职期间实行党政分工，把厂党总支撇在一边，而且不听招呼，直接顶撞杨森经理；二、家长作风，一个人说了算；三、擅自成立“长坡地区文化联络站”，召开运动会；四、随意开支“小金库”，运动会期间为运动员买服装及收录机。而原党委书记李春年和副处长李国文的说法则完全不同，他们说免张建华与他们无关，完全是公司经理杨森一手搞的，至于三处党委的免职报告是杨森逼着写的。党委委员、副处长白天牛和其他几个副处长也持同样的意见。

随即，工作组到我们修配厂调查。他们找了厂领导班子的全体成员和二十几个职工，分别核实李树本说的“四条”。

当时的代厂长周国光肯定了李树本所说的“四条”。为了证实他的说法，他还拿出当时宣布免除我厂长职务的那个厂领导班子“交心会”的记录作证。

而其他则人则认为以上“四条”作为免职原因不能成立。

作为当事人的当时的厂总支书记施金亮否定了第一条，即“把厂党总支撇到一边”的问题。认为当时厂里的所有重大问题都是党政商量决定的，不存在“把厂党总支撇到一边”的问题。至于自己外出没有请假被扣了工资只能怪自己，因为厂里的制度管着（李树本用施曾因私事外出没有请假被扣了工资来证明我“无视党的领导”）。

施金亮这个人还是有良知和正义感的。当时他是书记，我是厂长，他和我在一些问题上虽然也有矛盾，但在我被免职后厂子变得愈来愈糟

的事实却让他相信我是正确的，并把我当成了朋友，厂里的事、家里的事都愿意和我讲。就在工作组向他核实情况的当天晚上，他就来我家告诉我有关情况了。

关于“家长作风”问题，被调查的四个副厂长中，除张保华认可外，其他三人都认为不是事实。他们都说我这个人有能力，但为人随和，是个好商量的人。

关于“长坡地区文化联络站”及开运动会的问题，当时联络站和开运动会的具体操作人工工会主席张文昌及三个副厂长也给否定了，他们一致认为成立联络站和开运动会没有错，并以具体事例证明联络站和运动会对工厂的发展有积极意义。

第四条，关于用“小金库”资金买运动员服装问题。被调查的运动员们一致证实：每个男运动员只买了两件背心、两条短裤，而女运动员的服装则全部是用原汽车团留下来的旧服装，并没有买新的。至于买了一台收录机用于活跃职工的文化生活也没有错。

调查组通过调查，也落实了所谓“小金库”其实是当时厂里为了安排待业人员开设的一个小卖部，赚的钱有限，谈不上什么“小金库”。

省指委驻公司工作组对我的免职调查一个星期就结束了，结论是显而易见的。

三、“影子内阁”

针对当时严重的官僚主义，我认为要实现“四化”，体制改革和经济改革都是必需的。我强烈地认为要取得改革的成功，一是要求改革者以实现四化为目标，以为最广大的人民谋福利为宗旨；二是要求一切立志改革者团结起来，组成统一战线与官僚主义者斗。

1983年6月初，我开始走出修配厂。

首先，我和公司机关的阳炳仁工程师取得了联系。因我们意气相投，都立志改革。我们很快就成了朋友，而且大有患难之交相识恨晚之感。我们联合了起来。

公司第二次职代会后，特别是中指组接待了我们，省指委派工作组进驻公司后，以我和阳炳仁、公司政治部主任席秀元、组织科主任科员

孔令发为核心的队伍迅速扩大。公司二十几个科室中，几乎每一个科室都有人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其中有公司工会副主席赵宜昌、前工会主席于进禧等。公司下属三个工程处，几乎每周都有人来和我们联系，或表示支持，或表示要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来，如第一工程处的党委书记、处长郑德和，工会主席魏国权，机械队队长何保清；第二工程处党委委员林绵标；第三工程处的党委委员、副处长徐子明，生产科副科长张廷玑等。

至于我们修配厂，那就更热闹了。我任厂长时的三个副厂长及生产、管理骨干几乎无一例外地站到了我这一边。我们三处所属厂、队、子弟学校的三十几个知青，几乎一边倒，都支持我的行动。特别是枕木防腐厂的王继光、李长虓，子弟学校的胡昆言、张兆云几个人更是三天两头往我家跑，给我出主意，出方案，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参谋和写作班子”。

公司内干部、群众很快就发动起来了。原来是我们受压，难受，这一下轮到公司那些官僚们难受了。这时，以杨森为首的铁路建设公司党政领导班子感觉到了“压力山大”，个个成了热锅上的蚂蚁。

整个公司从下到上要求改革，要求杨森等现有班子下台的呼声空前高涨。当时有人戏称铁路建设公司有一个“影子内阁”。事实上这个“影子内阁”确实是存在的。在中指组指挥下的省指组和省委组织部当时也确实打算以这个“影子内阁”为基础，调整铁路建设公司的领导班子。

中指组在云南当时是中央派驻的“钦差大臣”。他们要解决我和阳炳仁的问题，要解决铁路建设公司的问题，按理来说应是轻而易举的事。中指组当时也确实很有信心很快解决我们的问题。但事实上却不然。他们低估了以万跃林厅长为首的官僚们的力量。

在中指组已经介入，省指委已经派工作组进驻铁路公司的情况下，铁路公司的官僚们在万厅长的指挥下开始是抵制，不予配合，后来干脆就是要无赖，对中指组和省指委的决定硬是拖着不办。

在阳炳仁的问题上，万跃林面对中指组和省指委的调查，坚称他没有压制阳炳仁，说对阳炳仁始终是支持的。但在省科委决定授予阳科技推广三等奖、省电视台决定播放阳的爆破技术的纪录片时，万跃林厅长却指使、纵容铁路建设公司搞了一个“九人异议书”及八人联名告省科

委的检举信，把阳炳仁从 1956 年来各个时期的档案材料都翻了出来，全面否定阳的技术和省科委的决定。

在我的问题上，他们开始说免去我的厂长职务是因为前面说到的那“四条”原因。但在省指委通过调查证实那“四条”不成立时，他们又说免去我的厂长职务是因为在我任职期间修配厂发生了严重亏损。在省指委决定查账以证实我任职期间是否发生了亏损时，他们却拖着不查。当省指组多次直接给万厅长打电话要求查账后，他们才不得不组成以公司党委副书记宋学义为首，有会计师王万云、组织科孔令发、三处生产科副科长张廷玑等四人参加的查账组。

查账的结果是：在我任职期间不但没有亏损，而且盈利 11.3 万元，是我厂建厂以来最好的时期，在我们三处乃至全公司也是经营效果最好的，是 1981 年唯一没有亏损的厂（队）。

其实，说我任职期间发生了亏损而免我的职，这个理由连他们自己也知道不能成立。因为 1981 年三处共亏 73 万，除我厂外的其他五个厂（队）都是亏的。如果亏了的厂（队）长要免职，为什么那五个厂（队）的厂（队）长亏了不免职，却偏偏是免了盈利的厂长呢？

说他们耍无赖一点也不过分。是他们指定的人查的账，他们却干脆来个“不承认”，说查账组的结论“不可能”！省指委多次要公司报查账报告，他们就是拖着不报。记者们多次来采访查账情况，也统统都被拒之门外。

中指组约我去圆通饭店，答应尽快解决我的问题之后，很快就过去一年多了。但我和铁路建设公司的问题却迟迟得不到解决，大家心里都很着急。

我也很着急。在 1984 年 8 月 23 日的日记中，我是这样分析其中原因的：

我和阳炳仁及公司的问题之所以在中指组介入后一年多还得不到解决，主要原因是我们的问题与整个云南的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反映的问题带有全局性。我们目前进行的这场斗争，绝不是我们和二李、二杨的斗争，也不是我们几个人和另外几个人的斗争，而是社会两股政治势力斗争在我们公司的缩影。

这两股政治势力，一股是改革派，他们代表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和广大人民的诉求；而另一股则是保守派，他们代表的是官僚们和既得利益者们的诉求。

正由于这是社会两股政治势力的斗争，因此，这场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就目前来说，改革者虽聚集了很大的能量，但他们还处于无权的地位，而且力量分散，缺乏有效的组织。而保守势力则相反，他们手中有权，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组织对改革者的进攻。

我国这次改革要想获得成功，需要有成千上万的改革勇士团结战斗。旧势力是强大的。没有一股强大力量的冲击，旧势力不但不会垮台，还有可能在某一天早上对改革者进行反扑，把这场改革扼杀在摇篮中。

8月6日，云南日报转载了人民日报文章《云南省委认真对照检查提出整改措施》，集中反映了云南省委存在的主要问题。这篇文章是中指组主持写的，它体现了中央对云南省委的看法。该文对一个省委持基本否定的态度，这在全国还是第一次。从这篇文章看，云南省委在年内也许会有较大的人事变动。在省里的问题解决之前，我们的问题是很难从根本上解决的。

为了印证自己的看法，11月10日我去拜访了老朋友刘远达，他是新华社云南分社的记者，知道的事情多，我希望能从他那里找到答案。下面是我当天的日记。

11月10日（星期六）

上午九点半，我来到新华社云南分社。

大楼内十分安静，刘远达正在办公室等我。

我把近一年来的情况告诉了他，还把我写的一份材料给他看了。因为我们彼此都很熟悉，谈话很随便。

他听了我讲的情况及看了我写的材料后说：

现在要解决你们公司和你的问题还不是时候，你最少还要再等一段时间再说。现在，中指组在省里是最具权威的。他们既然答应要解决你的问题，那一定会解决的。

他们（指中指组）开始对云南的情况估计不足，过于乐观。通过十来个月的工作，他们现在明确地认识到不解决省级班子的问题，那就什

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因此，他们现在是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解决省级班子上，其他问题统统都放下了。年内省级班子可望得到解决，明年春节后就会着手解决厅局一级的班子了，到那时，你们公司和你的问题才有可能得到解决。

省里的问题不解决，你们的问题根本不可能得到解决。就我所知，比你们的问题严重得多的还很多。比如省外贸厅的问题，我去调查过，他们那里的问题非常严重。胡耀邦、邓小平、万里都批示要严肃处理。但现在一年多过去了，就是处理不下来。他们那里设有厅长、副厅长四个，当中央批示下来时，一个副厅长公开说：“不管他来头多大，我们不理他。”还把这话写进了《简报》。他们在《简报》中说我们的调查报告“基本不符合事实”！

后来中纪委又派人来调查，结果和我们的调查结果一样。中纪委明确指示要严肃处理，但还是处理不下来。

赵××副省长的老婆就在这个厅里上班，她每次来我这里都是哭啼啼的。她确实被整得太惨了。她两口子原来在中南局，曾和胡耀邦共过事，相互都很熟悉，但问题就是解决不了。她曾去找过中指组的李德军，李对她说：我们目前还腾不出手来解决你的问题，省外贸厅的问题确实很严重，但现在我们还只能暂时放下。

在说到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时，刘远达说：现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还只是在宣传上，要真正落实还需要很长的时间。长期形成的偏见，要一下子改变过来肯定是很困难的。有人公开说：“你们知识分子现在也还不是老大嘛！”意思是知识分子现在还是“老九”。说这话的人还不是一般的人。

落实老干部政策这几年并没有宣传，但人家落实起来多快，多好！知识分子政策天天在宣传，但就是落实不下去。从这件事你也可以看出一些问题。说明了，就是因为人家官僚们有权嘛。全国各省市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四川目前是最好的，但问题照样存在。从全国总的形势来看是好的，但具体的问题也还很多，有些事我也想不通。

关于你提出来的问题，我们当然可以捅上去。但现在捅上去估计也

没有用。捅上去后，要么转到中指组，中指组是中央的办事机构，但转到中指组意义也不大。因为他们已了解了，而且已答应解决。要么就会转到省纪委，如果转到省纪委那事情就麻烦了。

我和省纪委打过不少交道，这些人我了解。我现在还在和他们打官司。这些人一下去就是找你所在单位的书记调查情况。问题本来就是书记弄的，你去找他本人，那有什么用？即使他们亲自去调查，他们得出的结论肯定和中指组、省指委去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两回事，对你肯定不利。

因此，最好的办法你就是等。两年多都等过来了，再等两个月你就等不了？

省外贸厅的事，一年多过去了。这一年多来我都没有去他们那里。当然，他们那里的情况我都了解。他们每发一个文件我都知道。我要看他们到底要怎么样。

外贸厅下属有八个公司。近两年来都是提拔有问题的人。最近还在提。这些年来分配到他们那里的有42个外贸学院毕业的，没有一个被提上来。难道这四十几个人中就没有一个好的？他们现在提的都是初中生，甚至是文盲。根本谈不上什么知识化、专业化。他们要这样做你有什么办法？省里的问题不解决，这些问题是根本解决不了的。

刘远达说的我认为都是实情，他对我是很诚恳的。他今天的谈话比去年初的那次谈话显得有信心。那次他是很灰心的。他当时极力劝我调走，还说他也要走。但他今天却显得有了一些信心。

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中有这样一段话：“人类所有的力量，只是耐心加上时间的混合。所谓强者，是既有意志，又能等待时机。”

从今天刘远达谈话的情况看，我前面的看法得到了印证，我们现在确实只有耐心地等了。

几天后，我就“等”的问题在日记中写下了如下文字：

我们必须冷静地考虑和处理面临的问题。要充分认识到现实社会的复杂性和矛盾斗争的尖锐性。不能用自己个人的好恶和感情作为处理问题的根据，现实社会中确实存在大量令人憎恶的腐朽没落的东西。至于不合理、不近情理、违背逻辑的东西更是比比皆是。我们既要明确这些

东西迟早总有一天会被历史清除掉，但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这些东西不可能在短期内被清除，更不是凭几个人的努力就可以办得到的。有一个哲学家说过，“凡是存在的东西都是合理的”。也就是说，任何存在的东西都有其历史和社会的根源和基础。

我们做任何事情一方面要考虑自己的能力。另一方面要考虑其可能性。对反动的，腐朽的东西我们只能一步一步逐个地在自己和社会的能力范围内加以解决。有些明明知道办不到的事就不要勉强去做。在自己的力量还不够，或时机尚未成熟时，我们不妨“忍辱负重”。

时机，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的成功在一定的程度上取决于他对时机的掌控和在时机没有到来前是否能耐心地等待。

等待，长期的等待，是一种煎熬。而且经过煎熬的人多数并没有好的结果。

在煎熬中，人们开始纷纷调离铁路建设公司。说是调离，其实不如说是逃离。

我坚持着，斗争着。一直坚持到1985年7月底。这时铁路建设公司新的领导班子已组建。阳炳仁在省科委的支持下成立了自己的爆破公司。席秀元、孔令发被调离了原岗位，至此，“影子内阁”终结，它终究只是“影子”，没有成为现实。

在此期间发生了很多事。

国内，对越战争还在持续。全国的改革进入低潮，一些知名的改革者处境艰难以至纷纷落马。

云南，中央派驻云南的中指组被撤消。省委、省政府、建设厅、铁路建设公司的领导班子均作了调整，但只换了汤，没有换药。

为什么要对越发动战争？现有人说是邓小平为了讨好美国，在国内树威立万。我认为有一定的根据，但不敢妄评。

为什么要撤消云南中指组？因为以杨桂荣为组长的云南中指组是改革派。他们认为我们铁路建设公司问题的根子在云南省委。他们下决心要改组云南省委，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云南日报转载的人民日报文章《云南省委认真对照检查提出整改措施》，是中指组直接参与写的，该文章对云南省委持基本否定的态度，因而遭到以安平生为首的云南省委

的强烈抵制。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亲自到云南安抚，他在肯定云南省委工作的同时，决定撤消中指组。云南的改革势力受到严重挫折。原来配合中指组的省指委重新回到省委的原有轨道上了。

我们与官僚们的斗争仍在继续，《支部生活》杂志主编刘全健成了我们中的主要斗士。他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法制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一个“毛遂”的遭遇》《赎不完的自荐罪》《文革中为非作歹的李树本、李国文担任铁路公司三处主要领导后继续为非作歹》《有功为何遭诋毁》等文章，矛头直指打击、压制改革者的官僚们。云南日报、上海法制报对刘全健的行动给予了积极的响应和配合，因而引起了建设厅和铁路建设公司的强烈反弹。在铁路建设公司，改革者遭到围攻。

建设厅新任厅长李光润继承了万跃林的衣钵，继续打击、压制铁路建设公司的改革者。新上任的公司经理米兰楨虽决意改革，但手脚被束缚，处境艰难。

到1986年上半年，铁路建设公司的改革者近三年的抗争失败了。他们无奈地、眼睁睁地看着铁路建设公司在官僚们的糟蹋下走向没落、破产。

当然，在这三年中，官僚们也没有胜利可言。由于我们坚持不懈的斗争，凡与我们直接相关的官僚们，从三处的党委书记李树本，到公司经理杨森，再到建设厅厅长万跃林，在这三年中都被赶下台了。

第二十九章 新任公司经理米楠桢

1985年8月2日，建设厅新任厅长李光润在铁路建设公司正式宣布了公司新的党政领导班子的任命。米楠桢任经理，高翔云任副经理，王凤华任党委副书记（书记暂缺）。

据省委组织部的一位部长说，省委组织部根据原中指组的意见，原本是任命米楠桢为铁路建设公司党委书记，张建华为经理。已宣布的任命是建设厅采取“先斩后奏”的办法搞的。

当省委组织部问建设厅为什么取消对张建华的任命时，建设厅的回答是：“张建华在文革中有严重问题。”再问有什么严重问题时，回答是：“等解决张建华的问题时一起说。”

对任命米楠桢出任公司经理，我们是赞成的。但对王凤华的任命我们则持坚决反对的态度。这不仅是因为他是杨森旧班子的“铁杆”，还因为此人品德恶劣。他为报私怨，曾利用组织科长的职权，在别人的档案中私塞黑材料，他还曾因打人致伤被法院判罚过。

米楠桢出生于军人家庭，毕业于西安公路工程学院，是工农兵大学生，第二工程处党委委员，施工一队队长。

此前，我和米楠桢并不认识。但我们相互间都有一定的了解。“影子内阁”曾讨论过他的任用问题。我们知道他和我们一样是改革派。如果我们成功，他将是我们公司党委的副书记。

10月6日，我去公司找孔令发了解公司最近的情况。孔说，米楠桢正要找我，要我去经理办公室。

11点我来到米楠桢的办公室。他正在等我。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米楠桢，我们谈了一个小时。

我问他如何开创新局面。他说了三点，即：

1. 公司是一个重病人，医治用药不能太猛；
2. 要以新时期的用人观念用人；
3. 工作方针是：务实、效率、速度。

他谈完后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我对你的指导思想及在一些主要方

面的想法还不清楚，因此谈不上有什么意见。于是，他谈了一些有关公司体制及机构设置的想法。他要我和他一起干。我问他要我干什么，他说暂时到经理办公室来当主任，工作只对他负责。

最后他说：你的问题（指学校搞的“记录在案”材料）就由我来负责。我既然要你和我一起干，你的问题当然要由我来解决。你现在有时间，你就考虑一下公司的体制和机构设置问题，拿出一个可行性的方案来。我答应了。第二天上午，我就托人给他带去了我草拟的下列方案：

如何开创铁路公司新局面

一、认识方面

1. 只有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铁路建设公司才有出路。

改革就是革命。这场革命的特点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的。它以发展经济、实现“四个现代化”为目标，但又不是简单的经济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思想、观念、意识的革命。

2. 要打开铁路建设公司的局面，要做一个企业家，必须在政治上站住脚，必须有政治家的谋略、手段。也就是说要学会政治斗争的技术、技能，治乱应该有一个“操刀”的。

3. 要打开新局面，必须实现以下转变，即：

在指导思想上，要坚持改革，坚持群众路线。努力实现指导思想、经营方式、管理方式、生产手段等四个方面的转变。

要从片面追求产值转变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上来；在经营方式上，要从单纯的生产型转变到生产经营型上来；在管理方式上，要从传统的经验管理方式上转变到现代化的科学管理方式上来；在生产手段上，要从落后的工艺技术上转变到新的、先进的工艺技术上来，要充分发挥现代施工机械的作用。

4. 团结是手段，不是目的。“一碗水端平”的方法从宣传的角度来说也许有一定的好处，但在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在政治上，一碗水是永远端不平的。因为斗争是绝对的，过程是运动的。

5. 打开新局面的首要条件是选配好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和工作班子。在用人方面，应以是否有强烈的事业心和开拓精神为基本条件。那些受到旧班子重用而又多年干不成一点成绩来的人，要坚决地从领导岗

位上撤下来，不管他是班长、队长、厂长，还是处长。

6. 开创新局面要坚决地始终依靠广大职工。国以民为本，企业也是这样。只靠几个人是不行的。

7. 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不能只靠奖金，而要靠群众的主人翁精神。

二、方法步骤

第一步：调查研究，弄清公司现状及公司家底。

第二步：体制改革。铁路公司实行生产区域制（直线和职能管理综合制）。

公司机关设一室四部，即经理办公室、工程部、经营部、开发部、服务部。

调整公司工作班子时，必须选好各部部长，特别是要配好经理办公室主任。因为经理办公室是经理的参谋部。

公司下设三个工程处，即工程一处（桥隧专业）、工程二处（土建专业）、机械化施工处。

第三步：以“专业化”为原则调整三个处的工人队伍。

第四步：配备好处级领导班子和工作班子。

第五步：通过这次整党充分揭露旧班子给公司造成的巨大危害，总结经验教训，造就一个生气勃勃、有开拓创新精神的职工队伍。

三、广开生产门路，稳定职工队伍，特别是技术骨干队伍。

四、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尽力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人员。

具体操作可参考八〇年我给黑晓林书记的《对铁路建设公司改革的几点建议》

张建华

1985.10.7

11月2日，李长虢特地从昆明来找我。他说他昨晚去了米楠桢家。米楠桢对他说：“我昨天舌战群儒。我要启用张建华当处长。我认为三处只有张建华有资格当处长。杨森他们不同意，坚决反对。我是把宝全部押在张建华身上了。只要我当经理，我就要张建华当三处处长。如果他们反对到底，那我就要行使经理职权，直接任命。如果他们还要反对，那我就要他们解释一下什么叫经理负责制。总不能还是有权者不负责，

负责者没有权吧。看来我是要和老班子彻底决裂了。”

李长虬说：“我认为米楠桢这个人很不错。他只要看准了就会下决心干。你当处长的可能性我看已有百分之八十了，你就干吧。”

李长虬临走时一再强调说：“米楠桢要找你进一步深谈，时间定在明天，地点就在我家。”

11月3日晚，我应米楠桢之约，在李长虬家进行了第二次深谈。在当天的日记中，我记录了当天和孔令发、米楠桢谈话的情况：

11月3日（星期日）

今天上午10点，孔令发给我讲了公司最近的有关情况：

一、二处调整班子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处级主要负责人选基本已确定。老班子除在个别问题、个别人上有点意见外，没有大的分歧。现在就是三处班子不好办了。前天，公司新、老班子在一起进行了讨论。在讨论到三处的班子调整时，第一个就谈到了你。杨森他们那一伙跳起来反对。事先我们三个人（米楠桢、王凤华、孔令发）对三处的人选进行了分析讨论，基本统一了意见。这次我们几个人对三处的八十几个人征求了意见，提名的候选人有李国文、周治俊、周国光、陈忠和你。

我们一个一个进行了分析讨论，最后，前面的几个人都否定了。米楠桢说三处只有你合适当处长。

王凤华可能事先把我们研究的情况通知了杨森等人。这次（星期五、星期六）要杨森、杨增友他们参加会议也是王凤华提出来的。

他们对我们搞突然袭击。星期五下午，郑子云突然拿出83年6月的中央文件来念，说你文革中有严重错误，根据中央文件不能进领导班子。这个文件的大致精神是：凡构不成“三种人”，但属下列情况的文化大革命时毕业的大学生一律搞“记录在案”，一是大派的主要头头；二是大派的核心人物；三犯有严重错误的人。对于“记录在案”的人，不能进领导班子，已经在领导班子的要拿下来。对这些人的晋级、提薪、技术职称评定与其他人一视同仁。

杨森他们就是拿这个文件来说你是“记录在案”的人，不能进领导班子。他们拿中央文件来压米楠桢。

米楠桢前几天看了你的档案，他认为从你给院党委书记的信看，你

一点问题也没有。在前天的会议上，米楠桢还说：如果张建华不能用，那李树本当党委书记又怎么说？

他们抬出“中央文件”来，事情确实变得很麻烦。星期五下午，一说到你时，杨森就端着茶杯退席了。星期六早上一上班，杨森就和米楠桢吵了起来，杨森说：“你们几个人这个月只调查了几十个人，我们在这里工作了十几年，难道情况不比你们更了解？你们事先为什么不找我们征求意见？”完全是太上皇的架势。

我昨天也看了中央文件。你们学校的那个材料，主要是你和江重初写的那篇文章。具体内容我没有看到。米楠桢看了，你今晚可以问他一下，他会告诉你的。

为你这个问题，我曾经找省委组织部问过。他们说你不属于“三种人”，也不属“犯有严重错误的人”。我把这些情况都和米楠桢说过了。

看来你的问题一下子还定不下来，其他人看来争议不大，已有了一个趋向性意见。昨天会议结束后，米楠桢他们三个人（米、王、高）又开了半个小时的会，不知结果怎样。

在昨天的会议上，王凤华、高祥云对你的问题都表了态。王凤华的意见是：既然有中央文件，那张建华就不能当处长。高祥云的意见是：既然你们说张建华是个人才，那就还是先让他当一两年厂长，如果实践证明他确实行，到时再提上来也不迟。

在会上，米楠桢曾提出：“对于华中工学院的材料，张建华本人有意见。”但王凤华说：“83年他们学校来了两个人，就是找他核实材料的。正由于这样，他才给他们学校党委书记写信。”你说那次根本不是找你当面核实材料，你今晚一定要把这个情况告诉米楠桢。

我在孔令发家吃了午饭。正准备走时，孔说他要给米楠桢写个纸条，要我今晚带给他。

孔的纸条的大致内容是要米楠桢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要理睬杨森他们的反对。同时提出，如果我的问题一下解决有困难，可先放一下，将处长的位置留着。其他人可以先写报告报建设厅。

他把字条给我看了后装了信封，封好后交给我。

从孔令发家出来，碰到阳炳仁。他告诉了我他们公司最近的情况，

并特别强调说刘全健要见我，要我去一趟。

晚七点半，我来到李长斌家。米楠楨接着也到了。但他还没有吃晚饭。趁李长斌出去为他买饭的机会，米楠楨和我谈了这几天围绕我的任用问题展开斗争的情况。

米楠楨说：你的档案我已经看了。学校“记录在案”的材料主要问题是你们写的《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斗争》这篇文章。

我说：他们说我（这篇文章）有什么问题？

米说：材料中说你在这篇文章中提出要重新划分阶级，而且提出今后主要依靠地、富、反、坏、右。

我说：这绝对是无耻的诬陷！接着，我说了这篇文章的有关情况。我说：

《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斗争》这篇文章是69年6月写的。先是用大字报的形式于7月1日党的生日这天公布，在广泛征求全院师生的意见后于8月初定稿并打印成册的。

当时这篇文章在华中工学院是很受欢迎的，包括工（军）宣队指挥长及原院党委的一些老同志都争着要这篇文章。我们曾给“两报一刊”邮寄了这篇文章，一致评价都很高。

我之所以说他们搞的“记录在案”材料是诬陷，是因为我们不可能有那样的思想基础，不可能说那样的话。如果在那篇文章中真的提出了要重新划分阶级，今后要依靠地、富、反、坏、右，那我们当时就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了，文章还有可能公开发表吗？这是一般人都可以想象得到的常识。

再说，这篇文章是我们新华工文化大革命的总结，是经过院革委会反复讨论后通过的。说我在文章中说了“要重新划分阶级”，“要依靠地、富、反、坏、右”，这可能吗？我们新华工是湖北的一大派之首，是全国知名的造反派组织，有可能出现这种错误吗？

当米问到83年7月学校派人来调查一事时，我说：83年7月2日，当我来到周治俊的办公室时看到里面坐着两个我不认识的人。我问他们是什么人，哪里来的，找我有何事，他们拿出介绍信给我看了后，我才知道他们是华中工学院党委（临时）派来的魏仁蓬和殷像轩。当他们说

了来意后，我才知道他们是来调查我的文革有关情况的。他们向我提出了很多问题，多数问题我不知道，他们也没有详问。他们最关心的问题是《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斗争》这篇文章的问题及有关《新华工》报的问题。我如实地回答了他们。最后，他们要我给他们写份文字材料。

对这两个人的到来和提出的问题我感到十分突然和气愤。我向他们当面表示：如果你们想通过我来达到整人的目的，我将坚决地予以抵制。

当晚，我给华工党委书记朱九思写了一封信。大致内容是：1. 表明对学校派人来调查的反感态度；2. 回顾我在文革中的一些主要情况；3. 汇报我十几年来工作情况。这封信前几天我已给你看了。

过了一天，即83年7月4日上午十点，我在周治俊办公室向魏、殷解释了我为什么不给他们写书面材料的原因。同时向他们提出了以下几个问题：

1. 华工为什么现在还是“临时党委”？谁是党委书记？
2. 这次你们来调查是学校的决定还是根据湖北省或中央的指示？
3. 学校动不动就发“外调函”或直接派人“外调”，这不但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会给被调查的人很大的精神压力，难道这是华工党委希望的吗？

对前面两个问题，魏作了如下回答：

1. 武汉现还有三所重点大学的党委是临时的，其中有华中工学院和武汉大学。华中工学院临时党委基本上是老班子的那些人。

2. 学校不可能作出这样的决定，我们是根据中央有关文件要求才来调查的。

最后我说：前晚我已给朱九思书记写了一封信。当他的回信证实了你们这次的调查的合法性及意图后，我将给学校写书面材料。魏、殷二人均表示理解。

米楠桢认真地听我讲，并不时用笔记录。当我说完学校来人调查的情况后，他说：“原来如此！王凤华这些人真不是人。”

我们正说着，胡昆言来了。我们终止了上面的话题。

过了一会，李长琥买来了面包和饼干。米边吃边说。我们三人不时提出一些问题。

我们的谈话很随便，无拘无束，就像老朋友在一起谈论问题一样。

米楠楨一直很激动。讲话时一直站着，并不时挥着手以强化语气。

在说到他对前途的看法时，他说：“我无非是两种前途，一是糊里糊涂地下台，一是头破血流地下台。我宁愿头破血流地下台。因为这样我起码可以得到经验教训，知道今后要怎么干。如果糊里糊涂下台，连个下台的一、二、三也说不出来，那才是冤枉呢！既然要我干，我就要搏一下。”

在说到党政配合问题时，他说：“我同意你（指我）的观点。作为党委书记，要么是精明强干的，要么是不管你怎么干他都点头的，不争权。怕就怕那种事情干不了，又成天捣乱的党委书记。”

当我问他今后具体怎么干时，他说：“我基本同意你的方案，现在仍保留三个处，其中三处改为机化处。把现三处的建筑队和二处的部分房建力量抽出来成立一个独立的建筑队，直属公司领导。先搞一段时间，摸索出一套实行两级管理的办法来，要求他们能自己养活自己就行。建筑这一行不能放弃，这一行是有前途的。待时机成熟后，成立建筑分公司。现三处的防腐厂划到一处去。”

在谈到用人问题时他说：“当然，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用人。用人要用人家的长处。比如你们三处的童彦文，三处现用的就恰恰是他的短处。童彦文这个人画个图、提个方案是能干的。他在二处出的图纸基本上不用改就能用，大家都放心。要他搞管理，就是用他的短处。”

在谈到改革进度时，他说：“现第一步很重要。第一步宁可慢一点，绝不能乱。”

他说他现在和三处的现班子已经闹翻了，和公司老班子也进行了几个回合。

谈话一直持续到晚十一点。因他爱人正住院，李长斌不断催他尽快回去，我们的谈话才结束。

临分手时，米楠楨对我说：“你要耐心等待，要沉住气。”

过了十来天，米楠楨再次找我谈出任三处处长的的问题。关于这次谈话，我当天的日记是这样记述的：

1985年11月15日（星期五）

上午八点半，孔令发给我打电话，说米楠桢要单独和我谈，要我十点前赶到昆明。

当我来到公司时，孔令发打开了组织科对面的一间房间。我和米楠桢进行了一个小时的谈话。他说了以下情况：

米说：你要作好出任三处处长的思想准备。虽然还有些麻烦，但我已经决定了。我现在尽量争取通过正常的组织程序，即大家都通过，或基本通过的办法。如果不行，那我就只有行使经理职权了。我已把开拓公司新局面的宝全部押在你身上了。只要我当经理，我就要用你。公司的改革就从你这里开始。如果你这个问题我都处理不了，我还谈什么改革？我还当什么经理？

他说：我在建设厅已经说了，经理负责制不能说就是负责亏损的责任嘛。事实上我已和建设厅摊牌了。我上来后还没有具体处理什么事，他们就在说我独断专行了。我不理他们。我说过，我的前途无非是稀里糊涂地下台，或头破血流下台。我是宁愿头破血流下台的。我这个经理，他们聘用的时间是四年，也许半年就会下台。我不怕。不过，只要我在职一天，我就要干，不叫我干就算了。

现在，一、二处的处级班子的调整基本搞完了，正在填表准备上报。三处的调整只好拖一下了。这几天我准备和公司、建设厅的有关同志一起去省委组织部，把你的问题原原本本地抬出来，征求组织部的意见。如组织部这一关通过了，那就一通百通，问题就解决了。你的问题，主要是那篇《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斗争》文章。我认为这算不了什么。我们要看时代背景。在那个时候，出现一些问题是可以想象的，也是可以原谅的。我在文革初，也是学校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只是因为我父亲是部队里的，文革开始后不久，父亲就把我接到部队去了。否则，我也可能出事。

你的问题既不是“三种人”，也不算犯有严重错误，更不是处分。我在向建设厅汇报时，谈了我的看法。我认为，从你文革及前几年的历史情况看，你这个人敢想、敢说、敢为，思想活跃。你的本质是好的，事业心又强。你有两点我很赞赏：一是你当厂长时不以权谋私。一个人

的廉洁是很重要的，特别是作为领导更重要。二是你下台以后不搅窝子。这一点也非常重要，一般人也很难做到。

最近几天，我准备把建筑队合并的问题处理一下。你现在有时间，可以正式考虑一下三处的班子问题。我们将采取组阁的方式，由处长提名副处长，包括党委书记的提名。一、二处我们就是用这个方式，由处长组阁。

你上来后要注意团结工作。这是一个大问题。因为稍不注意，那些人将联合起来和你作对。不但消耗你的精力，而且可能把事情弄得更麻烦。能统一的，尽量统一。你上来以后，自己的问题（即他们这几年对你的打击）可以暂时放一下，先要把脚跟站稳。

通过这几次和米楠桢的谈话，我们之间更增加了相互了解。我认为米楠桢这个人有开拓进取精神，为人率真，可交，可共事。我认为他的思想和我很一致。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我更激进。如果在他的身边有几个好的参谋，我相信他是可以干出一番事业来的，我应该全力支持他。

据我了解，当时米楠桢的处境非常困难，说是处境险恶也不过分。

顶头上司建设厅的万跃林厅长虽然下台了，但接任的还是万跃林的官僚班底，他们随时都可能将米楠桢废了。而在铁路建设公司，杨森经理虽然下了台，但他核心班底中的杨增友、王凤华还在班子中。新来的党委书记邹学诗肯定是建设厅安插来的。可以说米楠桢在公司党政领导班子中还没有一个跟自己贴心的人，是典型的“孤家寡人”。在这种情况下，可想而知，他要想打开铁路建设公司的局面那真是难上加难。

有两件事足以说明建设厅对米楠桢的打压和公司王凤华等人对他的掣肘。

第一件事：建设厅在任命米楠桢为铁路建设公司经理时曾明文规定：在铁路建设公司实行经理负责制，由经理“组阁”。除公司下属各处的处长和书记需报建设厅备案外，其他副处长及以下均由经理直接任命。但当米坚持要我出任第三工程处处长后，建设厅就立即取消了他的“组阁”权。在建设厅召开的一次处以上干部会上，厅领导明确说：“实行经理负责制并不等于经理个人说了算。处级领导干部还必须由建设厅任命。铁路公司个别领导同志独断专行，不听其他领导人的意见是绝对不

允许的。”矛头直指米楠桢。

第二件事：公司新班子花了两个多月的调研考察，确定了一、二处的党政领导班子。但报告报到建设厅后，建设厅就是迟迟不批。最后批下来了，但批下来的名单竟然和报上去的名单大不一样。更为严重的是，一处众人皆知的×××和×××一直不和，建设厅却将这两人分别任命为党、政第一把手，犯下用人之大忌。

为解米楠桢的困境，我曾去《支部生活》找刘全健征求意见。他听了我谈的公司近期情况后说：

米楠桢在目前情况下首先是要保住自己。他要和建设厅硬顶是不行的，因为建设厅完全可以随时把他撤掉。撤了你，你也没有办法。省里不可能为了你去解决厅里的问题。现很多厅都存在问题，省里一个也没有管。

当谈到组织部门的问题时，刘说：“凡是搞组织的都是心毒手黑的。他们为了自己，为了讨好上司，常常不惜采用最卑鄙的手段整人。这种事我见得多了。”

当天晚上，我去了米楠桢家，就公司目前的现状交换意见。下面是我当天日记记录的这次谈话情况：

1986年1月10日（星期五）

晚七点半，我按约定时间去米楠桢家。在明通路口，我见到了孔令发（他是来通知米第二天去开会）。我们在路边谈了几分钟。他说公司的工作班子基本定了，马上就会宣布。他要我今晚和米谈话时问问米为什么要把他赶出组织部门。

分手后，他在路口等米楠桢，我去了米家。

米楠桢直到八点半才回到家（他在路口和孔谈话耽误了时间）。在这次谈话中，我首先提出了以下问题：

1. 你如何看公司这次公司工作班子的调整？
2. 你如何估判目前自己的处境？
3. 邹学诗这个人怎么样？建设厅对你的态度如何？
4. 孔令发不能留在组织科的原因是什么？
5. 今后有何打算？

米楠楦就以上问题一一作了回答。

他说：这次公司调整工作班子，应该说是我们的工作前进了一大步，起码可以说取得了百分之六十的胜利。因为这次调整机构总的说来是按照你上次提的方案进行的。精简了机构，减少了横向联系。由原来的二十几个科室精简为十个科室，即行政方面的经营开发办公室、生产技术办公室、劳动人事科、行政办公室（与党委办公室合并在一起）、经理办公室；政工方面的组织科、宣教科、工会、纪委。再加上公司的劳动服务公司。

在这次调整科室时，我们把50岁以上的那些人都请下来了。他们不再担任职务，该退的退了。我们召开了两次座谈会，把那些老同志找到一起作动员。会后多数人都填了表，积极地自动提出让位。有几个没有填表，我们又第二次找他们座谈，进一步动员，结果基本上都达到了我们的要求。

这一批（50岁以上的）是公司的一大惰性势力。不把这些请下来，我们的工作就不可能有生气，这是改革的一件大事。

我们这次把庙拆了，重建新庙，请新神。以后的事就好办一些了。我们以后要依靠少壮派。

我之所以说是百分之六十的胜利，就是说这次工作班子的人还是不很令人满意的。目前的阻力还很大，我们只能作让步，硬碰硬要吃亏。退是为了进。必要时迂回前进，要刚柔并举。

我插话说：在当前的情况下，作一定的让步是对的。我同意你的想法。策略是很重要的。改革者应该是政治家，要学会谋略。不过，你难道不认为把组织科和人事科交给你并不信任的人，这个步是不是让得太大了？

米接着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不过，组织科的正职位置我还是空着的嘛。经理办公室主任的位置也是空着的嘛。再说，我们这次决定的人选有半年的试用期。如合格，我们就聘两年。有半年时间，我们就好办了。权力在我们手中，到时可以随时任免。

我要你帮我做一件事，就是起草岗位责任制，从责、权、利相结合来写。

我说：如果要我来写，除责、权、利外，我还要加一条，那就是强

调任任职资格。也就是说，你要担任这个职务，必须具备哪些条件。这个条件就是衡量你是否称职的尺度。我认为，对工作班子和所有管理人员来说，目前最重要的是要让他们知道在现在的岗位上应该干什么和怎么干。如果连自己该干什么都不知道，那还谈什么称职不称职？比如有的财务负责人干了一辈子，却只知道根据出纳收到的钱计收入，以出纳支付的钱计成本，连什么是应收款，什么是应付款，什么是投资，什么是投入产出都弄不清，那还谈什么“成本分析”“财务分析”？又比如搞经营的，如果你不了解市场信息，不了解本行业国内外同行业的先进技术、先进工艺，你搞什么经营？即使你一时搞上去了，也只能是暂时的，不可能持久。

接着，我给他讲了我在当厂长时对管理人员进行摸底考核的情况及取得的成效。

米连声说：对、对。有了这把尺子，到时就可以拿这把尺子去量，你不合格，就请你下来。

起草这个东西，只有你能干。这对你也是一个考验。我已把你上次写的那个方案给老邹看了。我要他看看那个东西的分量，也为你上来创造条件。三处班子的调整我们现先放下，等你的“记录在案”的事了以后再说。你先到经理办公室来，过渡一下。只要你在经理办公室，我和老邹不在时，整个公司的工作就还能照样运转。像你说的，以后我们要用制度来管理，要有各方面的条文，按条文办事。

我目前的处境确实很困难。但我并没有被架空。老班子的人指挥不了我，我也不会听他们的指挥。老班子的势力当然还是大的，特别是杨增友这个人。前几天，他抓住我的一句话大做文章。其实，我当时讲这话并不是针对他讲的。我说：“对有些人来说，让位就是作贡献。”对此，他大为不满。我也曾说过：“听话的马是瞎子，活蹦乱跳的马才是真正的好马。”对此，他也很不满意。

对新来的书记邹学诗，米楠桢也谈了他的看法。

他说：老邹这个人是个好同志。他对我是理解的，是支持的。他曾对我说过：“你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你的阻力就是我的阻力。”可以说，这次调整工作班子，还真得他的支持。

关于孔令发没有留在组织科的问题，米楠桢说：

对孔令发我和老邹都尽力了。我们在找他谈话时，老邹曾说：“就像入党一样，人家不举手，你就入不了。”现在安排他当宣传部副部长，形式上是提了他，但我们也知道，这是用了他的短处，没有用他的长处。我们希望过渡一下，以后再说。

当我说到应重视宣传舆论工作时，米说：

过一段时间，当各方面的工作相对稳定以后，我要像你上次说的，到各处去演讲，宣传我们的主张，宣传改革。这一点我是要做的。我们还将对公司这几年来的一些重大问题作一个结论。就像中央六中全会那样。阳炳仁的问题，你的问题，都是典型的原则问题，到时都要有个结论。

从今天米楠桢的谈话看，他并没有对我们所担心并提醒了他的那些问题给予必要的重视。特别是对来自建设厅的阻力他严重估计不足。他好像还很乐观。这更让我担心。

我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此后不到一个月，米就完全被架空了。他不但失去了“组阁”权，连下级班子的任命权也没有了。他虽然希望按我为他拟定的方案全力推进改革，但在失去了用人权后，他的改革愿望和决心最后都化成了泡影。

他没能坚持到四年的任期结束就“头破血流”地下台了。

又一个锐意改革的战士落马了，人们只能扼腕叹息。

第三十章 魔咒“记录在案”

在1983年前我相信自己的档案是清白的。1970年咸宁院学习班结束时虽有一个“文革中犯有政治错误”的结论，但1978年铁路建设公司经过复审后已经推翻了学校的结论，认为学校原结论依据的事实不能成立，“纯属不实之辞，应予推倒”。原建设厅组织处的阎九锡说他看过我的档案，也说我的档案没有问题，还说“原学校的结论已用纸条封掉并加盖了公章”。

什么是“记录在案”？中国绝大多数人也许都不知道。学校给我搞了“记录在案”的事我是1983年因工作调动受阻时才知道这回事，更深的背景当时就不知道了。

1983年我要调昆明市电机电器公司，当时市人事局都批了。但当对方知道我被“记录在案”时，调动就告吹了。

后来我要调昆明电工厂，对方党委书记和厂长都同意了，但他们调看档案时发现我被“记录在案”，电工厂也婉言谢绝了。

1985年，省委组织部把我作为“有特殊贡献的青年知识分子”，责成省科干局重新安排我的工作。科干局把我推荐给了省科委。省科委当时正急需管理干部，于是提供了两个岗位让我选，一个是去安全烟厂当厂长，一个是在省科委由我组建一个“科学学研究所”。当时我决定去安全烟厂。但当科委组织处负责人来铁路建设公司调查得知我被“记录在案”时，省科委为难了。最后他们还是婉言谢绝了省科干局的推荐。后来科干局又把我推荐给了省乡镇企业局。乡镇企业局开始对我很满意，但还是因为我的“记录在案”问题，调乡镇企业局也没有调成。

在铁路建设公司领导班子调整时，省委组织部的意见是让我出任公司经理。但被建设厅给否定了，理由是我是有“记录在案”问题。

铁路公司调整处级班子时，米楠楨经理决意要我出任三处处长，王凤华抬出“记录在案”来否定对我的任命。

对我个人来说，不当领导本来也没有什么。当然，我因此而失去了在铁路建设公司推行改革的舞台是有些失望，但也只是有些遗憾而已。

我没有想到的是：为什么我的工作调动有省委组织部的明确指示和省科干局的全力推荐竟然也落实不了？

我被“记录在案”，档案里到底有些什么样的东西？其威力何以如此可怕呢？

给我搞“记录在案”本来是应该让我知道的。但我对此一无所知，没有任何人跟我说过。

云南《支部生活》杂志主编刘全健通过省委组织部的关系看到了我的“记录在案”材料（他当时准备把我推荐给昆明市委或调到他任职的昆明日报工作），据他说我的材料足有一尺多厚！但真正有份量的一份也没有。我估计，学校是把文革时新华工所有的材料都给我“记录在案”了。

米楠桢也看过我的“记录在案”材料（因为他要我出任三处处长）。他说里面没有什么，唯有一篇文章（即《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斗争》）与我相关，但他认为这篇文章也根本算不了什么问题。

铁路建设公司政治部主任席秀元是负责核查“三种人”的。当时全公司被列入审查对象的有37人，我不在其中。席秀元对我是很信任的，他也看过我的档案，也说我的档案中没有什么问题。

既然看过我的档案的人都认为我没有问题，那为什么我的“记录在案”不仅影响了我的升迁，还会影响我的工作调动呢？

为了弄清我的“记录在案”到底是怎么回事，从1983年开始我就不断地跑公司，跑建设厅，跑省委组织部，跑省“核查办”，要求落实我的“记录在案”问题。但三年过去了却没有结果。

直到1986年3月底我的“记录在案”问题才有了结果。三处党委经过审核，给我作了“文革中犯有一般错误，免于处分”的结论。但当处理报告报到公司时，公司却迟迟不批，更不将审查结果报省委核查办。我多次去找公司核查办的负责人刘成福，他总是以“公司党委还没有讨论”来搪塞我。在我的一再追问下，他才于1986年4月3日说出了有关情况。

他说：“对于你的‘记录在案’，三处是有了一个处理报告，听说你已原则上同意了。不过，对三处的意见你还是要有的思想准备。因为公

司对三处的意见不一定能通得过。你的问题华中工学院看得是很重的。不严重也不会给你搞‘记录在案’，由中央转到我们这里来。”

我问他我的“记录在案”中到底有些什么问题，他说：

“‘记录在案’的内容主要是那篇总结文章（《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斗争》），而要害又是你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要以‘革’‘保’来划分阶级。材料中说华中工学院在文革中是一大派之首，宣传舆论对湖北、武汉的影响很大，你又是革委会常委，宣传部副部长，又管《新华工》报，错误是严重的。材料还说你与‘新华工广播电台’有关，说你还积极参与了‘反复旧运动’。”

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真正知道我的“记录在案”的大致内容。

显然，“记录在案”所记录的“材料”大多数是造谣、诬蔑不实之辞。其中说我是院革委会常委，是负责《新华工》报的，还与“新华工广播电台”有关，更是无中生有。

有关《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斗争》一文的情况我在前文几个地方都说到了，这里不再赘述。

至于说我要“以‘革’‘保’划分阶级”也完全是无中生有，荒唐可笑的。因为“以‘革’‘保’划分阶级”的观点正是我们在《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斗争》一文中所批判的内容之一，把它作为我的错误，那不是颠倒黑白吗？

在讨论《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斗争》一文时，我确实在讨论会上提出过“再过几十年后如何认识和划分阶级”的问题。根据马、列、毛的思想，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都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再过几十年后，解放初期划的成分，如地主、资本家、贫农、工人都作古了，他们的后代的成分显然都变了。地主、资本家的后代和工人、贫农的后代一样都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了，如果再以解放初期的成分来分析、划分阶级阵线就毫无意义了。到那时既然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就必然存在如何认识阶级和阶级划分的问题。

当时我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阶级斗争主要体现在党内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上。作为劳动阶级，他们的斗争对象应该始终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基于这种认识，我认为几十年后阶级阵线的划分应该以路线斗争中站在哪一边为依据，而不能以解放初期划分的阶级成分为依据。

我的这个观点当时是在讨论会上提出来供大家分析、思考、讨论的。因觉得考虑不成熟，并没有把它写入《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斗争》一文中。“记录在案”材料中把它说成是该文的重要内容之一，并将其确定为我最主要的错误完全是没有根据的。

我当时提出这个观点是有前提的，即“再过几十年后”，而不是指当时。因而也就不可能存在我提出以当时的“革与保”划分阶级的问题。从观点的提出到现在五十年过去了，事实证明这个观点是对的。

现在虽然还是共产党领导，但现在的共产党搞的是“特色社会主义”“私有制”，阶级斗争不提了（“阶级斗争熄灭”了），毛主席继续革命的理论被否定了，共产党不再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了（工人阶级被边缘化了），新、老走资派们冠冕堂皇地走资本主义道路了。

今天，私有制基本上取代了公有制。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还是说明社会主义道路本身就是曲折发展的？人们只能拭目以待了。

言归“记录在案”问题。

前面说了我们三处党委已就我的“记录在案”问题作出了结论，并报到了公司，但公司党委并没有批，他们还要继续以“记录在案”做文章。他们采取拖的办法，其目的很清楚，就是要在公司两级领导班子调整结束前一直要用“记录在案”来压制米楠桢经理，同时整治我。

为什么建设厅和铁路建设公司能用一纸“记录在案”就可以压制米楠桢经理并同时整治我呢？原来他们有中央文件作依据。

我没有看到过有关“记录在案”的中央文件，也没有人向我这个当事人宣读过。

几十年后我才通过网络知道，1983年4月23日中央发出一个文件，叫做《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学生造反组织重要头头记录在案工作的意见》。文件说，“对‘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学生中造反组织的重要头头和严重问题的人，应由原所在院校认真负责地将经过调查核实材料，通知这些人现在所在单位的党组织和有关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门，记录在案。”“今后，凡从‘文化大革命’期间



的在校学生中选拔领导干部和选派出国人员，用人单位都必须主动与这些同志原所在院校联系，取得他们在校期间的表现材料。高等院校党组织应积极协助。”

我当时因“记录在案”带来的种种遭遇，其原由这时才算彻底弄明白。

不过，当时也听说有这么一个中央文件。

刘全健因我的问题专门去省委组织部

查过。他告诉我说中央文件有明文规定：凡文革中进入高等院校革委会的学生一律不能进入县（处）或以上领导班子，已经在领导岗位上的要坚决撤下来。

1986年6月30日，新上任不久的铁路建设公司党委书记邹学诗好像是要对我表示友好，又好像是要向我解释什么似的对我说：“中央最近有文件，凡是‘记录在案’的人和‘三种人’一样，一律不能进领导班子。”当他看到我将信将疑时，很肯定地说：“这是真的。”

邹学诗是看过我的“记录在案”材料的。他其实很清楚在我的“记录在案”材料中并没有能证明我文革中有什么错误的事实。就在前几天，他还要和我签协议呢。我那天的日记是这样记录的：

1986年5月26日（星期一） 天气：雨

党委书记要和我签协议

今天上午，我先去省科干局告诉老李我去省科委的情况。接着我去

了省检查组，谈了有关“记录在案”的问题（老何等三人在场）。

下午三点，我到了公司，找到了公司党委书记邹学诗。

邹学诗说：“你的胃口很大，节奏也很快。我愈来愈感觉到你这个人铁路公司的分量了。要解决你的‘记录在案’问题，我们得先达成一个协议。也就是说，我们对你的问题粗一点，你也要对我们粗一点。如果我们对你粗一点，解决以后你又提出你在修配厂的问题，我们就不好办了。因为这就要牵涉到一大批人。如果你一点错误也没有，我得罪这些人还值得，但你总不会一点错误也没有吧？如果我们给你粗一点，解决问题后，你尽快调走，不再扯过去的事，我就尽快把你的‘记录在案’问题给解决了。”

邹学诗还算是一个直率的人，他说了真话。他说今天上午得知我要找他时，他就一直在考虑如何给我答复。也就是说，他要与我签协议是经过一番认真考虑的，不是随便说出来的。在和我的谈话中他反复说他对我是非常慎重的。

一个堂堂的党委书记提出要和我签协议，这真是前所未闻的事。这说明了什么？这种事在政治交易中是常有的，只是不直接说出来，更不会张扬罢了。

我答应了邹学诗书记的要求，即如果“记录在案”的问题能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我将不再找邹学诗的麻烦。

临了，邹学诗要我去找一下三处，要他们尽快把审查结论报上来。我找到了杨增友，杨说有一个外调材料还没有来，来了后就讨论。

我知道，他们是不会轻易放弃“记录在案”这个对付我的王牌的。等着瞧吧。

谁最恨文化大革命？D。当然，C也是最典型的一个。他们重新上台后，开始是在“落实老干部政策”的名义下把老走资派们一个个请了出来。为清除他们的隐患，接着就以“清查三种人”为借口，把造反派的主要负责人全部送进了监狱。他们似乎还不解恨。为了斩草除根，他们就搞出了一个“记录在案”，把大专院校文革中凡当选了校一级革委会委员的造反派代表，哪怕是像我一样并没有什么大的过错的学生们一网打尽！

那些反毛的推墙派们攻击毛主席的重要话题是说毛整人太多，太狠。其实，作为领袖人物的毛主席对人是最宽容的，哪怕是对他的政敌。

真正整人最多、最狠毒的是D。反右的扩大化是谁搞的？是D。因为他当时是总书记，是反右的具体负责人和操作者。文革初，在五十天的时间里就有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和教师被打成反革命，是谁搞的？是刘少奇和D。因为他们当时是文革的具体领导者，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和操作者。如果推墙派们硬要说那时毛主席是最高领袖，硬要把责任推给毛主席，那就看看1989年的那场风波吧：在那场风波后有多少无辜群众被整？整得有多狠？特别是对参加了那场风波的青年学生，坦克都出动了，死了多少人？这不叫狠吗？这时毛主席已经过世，D是“核心”了，推墙派们难道还可以把责任推给毛主席吗？

D为了自己政治上的需要，是什么人都要整的。就连和他搭档多年，战功赫赫，被称为“战神”的刘伯承元帅不也被他整了吗？在所有老干部都平反了的情况下，他就是不给刘伯承元帅平反，足见他为政之道。

“记录在案”是D掌控的一道魔咒，它剥夺了成千上万像我一样立志报国的青年人报效祖国的权利。

到写这个回忆录为止，我还不知道我的“记录在案”到底是个什么样子，里面到底还有什么内容，更不知道当局最后是怎么处理和什么时候处理这些“记录在案”材料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改变了我人生轨迹的“档案”，2004年厂劳动人事部门在为我办理退休手续时却找不到了，我竟然成了一个曾被当局重点关注而没有档案的人！劳动人事部门在没有办法办理我的退休手续的情况下，只好到我的调出单位铁路建设公司复制了我的工资档案后，才办理了 my 退休手续。痛乎！惜乎！悲哉！

第三十一章 改革走入歧途

从1983年到1986年整整三年的时间，我一直在和官僚们缠斗。老的一批官僚下去了，但他们的继任者还是继承着前任的衣钵。我一直处于下风，没能摆脱被动的处境，因为他们有权啊。

三年并不漫长。但在这三年中，国内的政治、经济环境却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一、“集体接班”和腐败爆发

政治环境方面，当局在清理了“三种人”，把文革中的造反派骨干分子通过“记录在案”禁锢起来的同时，为文革中劣迹斑斑的“老红卫兵”（首先是北京的以高干子女为主体的“联动”）翻了案，明确了这些人的本质是好的，是可依赖的。随后，当局把接班人的问题提了出来。

在由谁来接班的问题上，传说C提出了由他们的子女“集体接班”，“每家出一个”的方案。理由是只有由他们的子女来接班才最可靠，“起码这些人不会挖自己的祖坟”。邓小平同意并支持了C的方案。传说我无法证实，但“我们的子女”迅速在国家党、政、军、经各方面接了班，却是事实。

到1986年底，原国家党、政、军高干子女基本上都已调回了北京。这些人中的一部分被安排到了党、政、军及经济领域的各级领导岗位上。他们很快就掌握了北京从市到各区以至居委会的党、政和经济大权，另一部分人则被安排去了美国留学深造，为全面接共产党政权的班做准备。

网上有文章说，美国会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专门拨款为中国培养了三千多高级干部，这些人基本上都是“红二代”。

这些人今天都已回到了国内，并进入了党、政、军、经各顶层领导机构。如众所周知的被称为多产将军作家LY，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被称为最高智囊的LH等就是这些人的典型代表。

我有一个朋友，四川人，她和丈夫原都是昆明的普通工人，但她的婆婆却是文革前国家某部的一位副部长。C、D的“集体接班”实施后，

她和丈夫都因此调到了北京（婆婆因年事已高，喜欢昆明的气候而未回北京）。到北京后，丈夫被安排到最高法院当了法官，而她则进了国家级的某研究所。

各省、市的主要领导人也参照高层关于接班人的做法办理。这些人的父母或自己很多没有参加过打江山，这些人及其子女不属于“红二代”，“每家出一个”轮不到他们。于是，他们或亲自操控或让自己的子女出面办公司，或找代理人办公司敛财。

以云南为例，就我所知，当时昆明的一些重大建设工程项目，如昆明市五成路的拆迁改造工程、高海高速公路的建设工程等都是由省市主要领导人的子女伙同开发商完成的。一个不争的事实：今天昆明几家著名的房地产开发商背后都有这些纨绔子弟们的身影。

上行下效。省、市以下党政领导及企、事业单位的当权者也纷纷仿效上级的做法，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成了人所共知的“明”规则。

“集体接班”实施的直接结果，一是一些家族财团迅速形成并壮大了起来，如众所周知的D氏财团、Y氏财团和J氏财团等；二是导致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僚的集体腐败，社会主义国家的航船开始转向。

我的一个朋友、同事ZZY，在铁路建设公司新领导班子宣布后去了某建工学院当老师，在北京进修了半年。回来后他曾和我讲了一些他在北京半年的感受，我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述了这次谈话的情况：

1986年8月3日（星期一）

ZZY从北京进修回来了。他今天和我讲了他在北京半年的所见所闻及对北京的印象。

他说：现在的北京人对改革已失去了信心。一般人不再关心改革的事。一些有志者感到报国无门。人们对高干们的肆意享乐及他们的子女的胡作妄为非常反感和厌恶。

在北京，高干子女日常乘坐的不再是摩托车而是豪华轿车。

他还具体说到了几个原国家领导人的子女利用职权办公司、经商的情况。说这些人往往自己不直接出面，国家拿他们也没有办法。

他说北京人对现领导无好感。他具体说了不久前最高人民法院对一起重大案件的判决经过：

在外贸部门工作的叶××将国家绝密的经济情报出卖给了港商，港商将其倒卖给了国外一家企业，致使国家遭到重大经济损失。

案发后，北京高院经审理，一审对叶××判处了死刑，另两人一个判了死缓，一个判了无期。

高院判决后，叶母即去找包括乙林在内的一些“老大姐”们求援。很快，最高法院将北京高院的判决批回重审。北京高院重审后仍坚持原判。最高法院再次批回重审，北京高院还是坚持原判。

在这种情况下，最高法院只好将全部案卷调来直接审理。

因此案十分明显，其中奥妙人人皆知。一些有正义感的法官无不愤愤然。最高法院找了两个审判长，两个都拒绝就任。最后只好由最高法院院长亲自出任审判长。

最高法院判决的结果是：主犯叶某由死刑改判为无期，而从犯××则由死缓改为死刑。

对此，北京人哗然。为掩人耳目，北京日报用了大量版面为之“解释”，但北京人对此嗤之以鼻。

ZZY今天还谈到了去年大学生“闹事”的情况。

他说：中央对这次“闹事者”的处理十分高明。说明共产党对学生是很有办法的。这次对“闹事者”的处理一反常态：凡为首“闹事”的都受到优待，毕业分配时由自己选择分配地点，想去哪就去哪。而且从处理之日起，每人发给30元补助费，直到分配后报了到为止。对参与了这次“闹事”的人一律不记档案。为了让这些人放心，还把档案一页一页拿出来给本人看。

ZZY对此无不感慨地说：对政治上的反对派，最有效的办法是安抚。安抚往往能使多数最激烈的反对派失去斗志，放下武器。历代统治者对人民的反抗往往采取强权压制、打击的办法，结果总是事与愿违，愈是镇压，反抗愈是剧烈。

看来，今天的当权者只对造反派红卫兵继续采取压制的政策。他们视造反派红卫兵如洪水猛兽，是最危险的政治隐患。历史将证明：这是当今领导人犯的最大错误之一，这是历史性的错误。

政治环境的急骤恶化也使一些原本还算正直的党内干部随之私欲膨

胀，干起了令人不耻的勾当。原华中工学院党委书记朱九思就是其中一个。我在一篇日记中曾记录了华中工学院党委集体腐败的有关情况。

1986年11月19日（星期三） 天气：晴

今天上午，我把前几天写的《如何调整家用电炉的功率》《落实政策应有法治观念》《蜘蛛织网与柏鲁思王的胜利》三篇短文交给刘全健。他随便翻了一下后指着第一篇说：“这样的文章可以发”。他的意思显然是第二篇、第三篇要发表就不行了，因为话题太敏感了。

我问他今后有什么打算，想把报纸办成一个什么样？

他说：“什么样？党报呗，只能是这样。前几期，我们登了些文艺作品，销售量大幅度增加。但市委领导已批评了，说这是党报，不是文艺报！谁还敢不听领导的话？你还想搞改革？太天真了。”

昔日那个为改革者摇旗呐喊的刘全健不存在了。曾经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掀起巨浪的一大批弄潮儿统统销声匿迹了。曾几何时，改革者就被淹没了，这就是中国改革的宿命吗？

从昆明日报社出来，我去找同学MXB，他在家。

好长时间没有见面了，有说不完的话。他给我讲了他所知道的有关社会信息，并谈了一些感受。

他今天说到了华中工学院一大批干部被端掉一事。“老家伙”们基本上都受到了处分。院党委书记朱九思受到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院党委副书记王树仁被开除党籍，两个处长被处以劳动教养两年。

事情的大概情况是这样的：

几年前（82年？），华工机一系制图教研室韩承松老师的儿子韩浩考研究生时，模仿当时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李锐的声音和朱九思通电话，说×××是陈丕显的孙子，要求华工给以重点培养。

李锐是朱九思的入党介绍人，自然遵命。立即组织力量对韩浩给予特别的关照，除把考题预先给了他外，评分时也给了特别的照顾。考后填报专业时也随他自选。

韩浩在上研究生的几年中，华中工学院一些处以上的干部处处对他百般逢迎，尽量投其所好，他成了华工园内的一位王子。

这位“王子”不知是利欲熏心还是有意戏弄共产党，在临分配时，

他又以陈丕显的名义给湖北省委组织部打电话，说他是国家重点培养对象，要求将他分配到某地某机关。湖北省委当然也就照办了。

也许是活该那些利欲熏心的蠹虫们倒霉，就在这个时候，作为中纪委负责人的陈丕显到湖北检查工作来了。当湖北省委组织部向他汇报时说到“你的孙子我们已按你的要求给予了照顾”时，陈丕显顿时大发雷霆，立即指示对此事严肃查处（也有说是钱运录让公安机关监听后发现的）。

湖北日报、光明日报连续发表文章揭露这一重大骗局。因为华工领导巴结中央领导的目的在于取代湖北省委，因此，湖北省委也就毫不留情地收拾了华中工学院党委的一班人。骗子韩浩被判坐了八年牢，另一同伙也被判入狱。

堂堂高等学府竟演出如此卑劣的闹剧，这说明了什么？这种闹剧只发生在华中工学院吗？

党政官僚们的腐败一经爆发就难以收拾和遏制。权力成了可交易的商品后，社会风气迅速恶化。受罪的当然是老百姓了。

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那时感受最深的莫过于办事要请客送礼、走后门、拉关系了。你办什么事都要请客送礼、走后门。孩子上学要送礼走后门，孩子参军也要送礼走后门，更不要说工作调动、职务升迁这类大事了。像我等不齿于送礼走后门的人，你是什么事情也办不了的。

这种社会风气使有权的官僚们迅速致富。我的一个朋友，1985年调离我们修配厂去了某厅，他的工作是专给厅领导当驾驶员。正因为是给领导开小车，很知道一些送礼的内幕。据他说，厅级领导每年光收礼的钱就不下一百万。过年过节有人送礼，下面来办事，特别是来要求上项目的更是要送礼，一个红包最少也要十万、八万的。

他还举了这样一个例子，说一个浙江包工头想来承揽云南几个糖厂的改、扩建工程，从老家一次性带四十万现金来疏通关节，结果三天四十万就送完了，可承揽工程的事还没有一点眉目。他急了，只好叫家里继续打钱来。这个浙江老板后来终于接下了这些工程，但他总共花了一百万元的疏通关节费。

一百万元在今天也许算不了什么，可在八十年代，对一个普通老百姓来说，无异是个天文数字了。

当然了，老板是不会做亏本的生意的。他付出的一百万，官僚们至少会从工程预算中加倍甚至加十倍地偿还他，最后吃亏的当然是国家了。

二、经济改革已走入歧途

当局这时仍在继续推进改革。但这时的改革已完全不是我们此前理解和极力推行的改革了。我们当时理解的改革是毛主席文革时提出的“斗、批、改”中的“改”，即“反对官僚主义”“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参加企业管理”“干部参加劳动”等。而这时的“改革”已完全不是毛主席所说的“改”了。从这时起，改革已步入歧途。

这三年在经济领域的“改革”也确实让我感到忧虑。

在“猫论”“摸论”“胆大论”“不争论论”的引导下，首先是经商潮汹涌澎湃。当时真可谓是“全民经商”。

一方面是“红二代”们利用当时实行的“双轨制”搞皮包公司，通过“批条子”倒卖紧俏物质，快速敛财。党、政、军、高校等事业单位也一窝蜂地办公司，搞创收；另一方面是社会上的乡镇企业、私有企业遍地开花。乡有乡的企业，镇有镇的企业，一个村也办起了企业，皮包公司开始大行其道。

昆明当时分四个区（五华、盘龙、西山、官渡），每个区甚至每个街道都纷纷办起了自己的集体企业。个人办企业的也不少，那些没有工作的，在单位谁也瞧不起的人也不甘示弱，也自己办厂或在街边摆起了地摊。我们修配厂就有一个谁也不待见的职工，她以有病为由在单位长期请病假搞印刷，开始是小作坊，后来干脆办起了印刷厂，没有几年工夫就发了，现移居去了加拿大。

当时在昆明最有影响的可能算在青年路摆地摊的了。这些人从广州进货（主要是时装、双卡收录机、电子表等），沿街叫卖，很多人很快就发财了。在南屏街东口、护国路一带，换房、倒卖二手房的摊点生意火红，也是当时昆明街头一景。

在金钱的诱惑下，传统意识很快被冲垮，人们都在做着发财梦。当时昆明有一个老太太靠做豆腐成了万元户，还有一个靠收破烂成了万元户的。一个被人称为“豆腐大王”，一个被称为“破烂大王”，经报纸

和广播一宣传，确实让人羡慕死了。

今天的人会说一万元算什么？可那时的一万元可是不得了了。因为当时的一万元可在昆明市中心买下一套不错的四合院。

面对当时的“全民经商”大潮，我在日记中曾表示了忧虑。

1985年5月13日（星期一）

应该引起注意的趋向

自从中央提出搞活经济以来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弄得不好，让其发展下去可能断送改革。因此，凡真正希望改革的人们应引起高度的关注。

这些问题包括：

1. 在搞活经济的口号下，出现了党、政、军、学都来办企业做生意赚钱。关于党政干部办企业做生意虽已引起了中央的重视，文件也发了，报纸也作了报导。但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党政干部办企业、做生意的危害性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这些人有权，掌握着生产资料和相关信息。他们做生意可以无本万利。不要很长时间，他们就可以成为没有资本的资本家。国家的、人民的财富就会大量地、不断地进入这些人的腰包。这不但在政治上会引起严重后果，在经济上也将造成严重后果。

现在部队也在做生意，办企业。听说海军做生意特别严重，海关根本管不了他们。

高等学校原来只有工科院校才有实习工厂，主要用于学生实习和搞科研。其他院校是没有工厂的。但近几年来却不一样了，高等院校不但办起了工厂，而且成立了各种各样的公司。上次我们学校派来参加云南校友会的院党委委员就在会上大谈了一通生意经，说华工在广州、深圳、珠海都有专业公司。我想，学校如此发展下去是有大问题的。学校是工程师的摇篮，怎么能和商人一样做生意，只想赚钱呢？

报社也在做生意，办企业。光明日报在昆明就办了一个营利性的企业，听说还是经中央批准过的。

2. 工厂发红包，亲疏界限分明。

3. 酒席宴上签合同，个人得利，国家、企业受损失。

4. 各行各业都在搞“回扣”，厂长、经理、采购员等均有机会把大把大把的钞票装进自己的口袋里。

5. 一些中小企事业，特别是一些个体企业只顾赚钱，不考虑他人利益，甚至不顾社会风尚和道德的要求。

……

这些做法既不是资本主义的，更不是社会主义的东西。它是一个怪胎产下的怪物。如果当局任其发展，那就等于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将有害无穷。

在经商大潮和自由经济的冲击下，国有企业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报刊和广播中，当时一些经济学“专家”开始鼓噪国有企业、城市集体企业向农村的土地承包制“改革”看齐，要求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和企业职工劳动合同制。对此我也曾表示过质疑，并写下了这样一篇日记：

1986年8月25日（星期一）

企业职工合同制应当缓行

最近一段时期，广播、报刊都在鼓吹企业职工“合同制”的优越性。国务院有关负责人也说在年内要办这件事。有些单位已正式传达了有关文件。看来实行企业职工合同制是肯定的了。

实行企业职工合同制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也许有很多优越性。但在我国，目前还不宜实行这一制度。因为实行这一制度的前提条件还没有解决。如强行实施，必将带来严重后果。

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劳动合同制，是因为他们的生产资料是私人所有，签订合同的双方，是资本和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即资本家与不掌握生产资料的以自己的劳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换取生活资料的劳动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和人的关系非常明确，即资本为主，人为仆，人必须服从资本。这种关系在资本主义国家不但合理，而且也合法。资本家正是通过合同制强调和固化了这种资本和人的关系以赚取更大的利润。

在社会主义国家，生产资料是全民所有，人为主，资本为仆。职工是企业的主人，企业的负责人只是作为国家的代表管理企业。现在的问题是：企业的负责人是否有代表国家、代表职工的资格和能力。也就是

说，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家是靠自己的资本才有权管理企业的，才是合法的。而在我们国家，目前管理企业的厂长、经理都是没有“资本”（资金、资产）的，他们管理企业的权利不是他们对企业投入的资产、资金、学识、经验和能力，而仅仅是凭一张上级的任命书。

上级任命的企业负责人很多是不学无术的。这些人无任何做企业管理着的资本，但他们却拥有远超过资本家的权利，被人们戏称为“无资本的资本家”。这些人的目的不是要搞好企业，企业的兴衰似乎也与他们不相干，更无需负什么责任。他们既不能代表国家，更不能代表企业职工的利益和意志。

推行劳动合同制的前提，我认为应该是：企业的负责人，也即合同的甲方必须是能真正代表国家、代表企业大多数职工利益和意志的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真正实行法制与民主。而民主政治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是不可能的。

在人民的民主权利还得不到保障，人民的利益和意志还得不到尊重的情况下强行实施合同制，势必强化人治，强化那些“红色资本家”及特权阶级的地位和优越感，他们将更肆无忌惮地欺压劳动者，普通老百姓的生存条件将更加得不到保障。“红色资本家”们将利用合同制随心所欲地解雇工人，并以此打击异己，网络亲信，巩固和强化自己的权利、地位。其结果只能是造成贫富差距的加大和社会的动乱。

在我国，目前最重要的是要铲除封建官僚政治，实行民主政治，实行法制。无视这一客观事实，什么也不可能做好。这些年来实行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就是有力的证明。

铁路建设公司这三年来都在官僚们的指挥下进行“改革”，但结果是人心涣散，愈改愈糟，每况愈下。

据我所知，我们三处下属各厂（队）长都纷纷写了请调报告。我们修配厂的两个副厂长都走了，张保华“跳槽”去了五华区工业总公司下属的供销公司任经理，梁华去了一个服务公司。而代厂长周国光也不干了，到三处机关当了个经营科科长。我任职时，我们厂有 286 名职工，到 1986 年底只剩下 182 人，走了 104 人。走的都是厂里的骨干。当时每天坐班车上、下班的几乎是清一色的女职工。

我们厂的原书记施金亮也要走。一天，他兴致勃勃地来找我，说他已经想好了，决定和长坡大队有关人员成立一个叫“四海联营”的公司，现正在筹集资金。

老施是从农村到部队，又从部队转业到修配厂的。他没有技术，也没有什么企业管理方面的经验。他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能说什么？他能否成功我不知道，但我祝愿他能成功。

曾经对我满怀期望的防腐厂知青王继光、李长虓也要走了。他们来家告诉我要走的那天，我在当天的日记中是这样记述的：

1985年元月14日（星期一）

今天上午，李长虓、王继光来家看我，告诉我他们就要走了。我和他们讲了最近我了解的有关情况，并对他们说：根据我掌握的情况，3月份前我们公司的问题没有解决希望。如果你们实在等不得了，要走你们自己决定。至于我自己，在省里没有解决问题前是不会走的。我一定要见了分晓后再说。到时如果公司的问题解决得彻底，需要我们来收拾这个烂摊子，我们义不容辞。如果公司问题不能得到彻底的解决，是否走到时再确定。我现在的打算是让我爱人先走，我一个人在这里顶着。

他们听了我的话后非常伤感。王继光说：“我们本来是想和你一起大干一场的，不忍心离开你。但现事情既然已是这样了，我们留下来也帮不了你什么忙。李长虓他是再也等不得了，对方单位催得很急，他拖了一个月又一个月，实在无法敷衍别人了。我的情况也差不多，运输机械厂的党总支书记一年前就要我去了，我一直只是答应着，一直拖着。现在我们只好先走。到时候如果公司的问题解决了，需要我们回来，我们回来就是了。”

最近两个月来，我身边一些十分积极、坚定的同志均因无法继续忍受下去而先后离我而去了，自谋生路去了。每当听到他们向我诉说离去的苦衷时，我都会非常难过。因为这意味着我今后的工作会更加困难。

但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我难道能要求他们不要走，和我一起坚持熬下去吗？我能不顾别人的前程强留他们吗？不能。因为我们面临的斗争十分复杂，甚至有些残酷。对于胜利，我并没有十分的把握。公司的问题能否解决？什么时候解决？我能左右这个企业吗？这些我都不能作出

肯定的答复。既然不能作出肯定的答复，我能要求他们为我去牺牲吗？如果这样，那是不公平的。

总之，这时的铁路建设公司已处在风雨飘摇中。整个公司已人心涣散，技术、管理骨干到 1986 年底时已基本走光了，有门路的调离了，没有门路但有一技之长的干脆就下海自谋生路了。我被免职后的头一年，修配厂凭借我开发的铁质家具生产还勉强维持了一年，但后来也不行了。虽然从 1983 年到 1986 年的四年中换了三个厂长，但这时的修配厂已是病入膏肓，元气大伤，谁来当厂长也不行了。

由邓小平总设计的“改革”到今天已推行四十年了。精英们今天还在继续鼓吹邓小平的改革。人们不禁要问：到底还要怎么改啊？是不是要把现仅存的一点国有企业也要改成私有？如果再这样改下去，是不是要修改党章了？

第三十二章 调离铁路建设公司

人们常说“树挪死，人挪活”，还说“人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我决定离开修配厂，离开铁路建设公司。

“记录在案”问题三处党委虽然半年前就有了结论，但公司党委却一直拖着不批，更没有向省核查办报审查报告的意思。

“记录在案”问题不解决，它的魔咒效力就会一直有效。实践已经证明，在其魔咒效力还没有解除以前，即使省委组织部、省科干局出面也解决不了我的工作调动问题。

三年来的事实告诉我：期望依靠共产党的官僚组织解决问题就像要依靠泡沫浮出水面一样不可靠。要开始新生活还必须得靠自己。

当权者搞“记录在案”不就是为了不让我们这些人进领导班子么？我现在已不屑进你们的领导班子了，请我也不干了，你还能怎么着？铁路公司拖着不批审查报告，就让他们拖吧，我不在乎了。

要离开铁路建设公司，第一步我得让爱人杨元俭先离开。

正巧，杨元俭的弟弟这时已大学毕业，并分配到了市政府秘书处工作。他通过上大学前当知青时在一个知青点、参加工作后当工人又在一个车间、现任市公共汽车公司修理二厂副厂长的张达明，很快就办理了杨元俭的调动手续。1986年11月3日，杨元俭在弟弟杨准通的陪同下去昆明市公共汽车公司第二修理厂报了到，我轻松了不少。

公共汽车公司经理当时要我也一起调入，但我考虑到夫妻俩调同一个单位不好（主要担心我的问题会影响她）而没有答应。

就在杨元俭去公共汽车公司上班后的第二天，我找到了我们厂的厂长曹尚昆（曹是我被免职后的第三任厂长），提出给我两个月时间自谋出路。如果在两个月内我仍不能正常调离，则按自动离职处理，决不找厂里的麻烦。但在我找接收单位的这两个月中必须仍按出勤处理，工资照发。曹同意了，并和我签了协议。

当时我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主要是要彻底放弃通过组织解决调动问题的想法，不给自己留后路。当然，更重要的是：我相信凭自己

的人格和能力，到哪里也能养活自己。

我有两个月时间不用上班，专门去找工作了，我相信一定能找到一个不在意“记录在案”而愿意接收我的单位。

我把我的决定告诉了已经是昆明日报总编的刘全健。他觉得我还去工厂很可惜，希望我再耐心地等几个月，等他把各方面的工作理清以后，调到昆明日报来。我说我的前半辈子大部分时间都处在政治的风口浪尖上，我已经身心疲惫了。昆明日报也是个是非之地，我不想再卷入政治的漩涡中去了。

我打电话给省科干局，要他们不要再为我的调动工作一事操心了，我要自己去找工作单位。

我每天骑着自行车去找接收单位。但找了十几家单位我都不大满意。要么离城区远，交通不方便；要么单位太小，难以发挥。

我也去参加过一次招聘会，想试试运气，但结果让我失望。在当天的日记中我记录了去招聘会的情况：

如此招聘

昆明市旅游局筹备处在晚报上刊登了招聘业务人员的广告。为看个新鲜，我今天来到了市政府三号楼筹备处办公室。

报考的人还真不少。应聘者把一大条走道都挤得满满的。

三位年青的考官正在对应聘者进行面试。我在一旁看。

当第一个应聘者坐上应聘席时，考官问：

“你应聘什么？”考官问。

“我报财会。”应聘者答。

“你现在干什么工作？有何能力证明？”

“我在单位做会计。没有什么能力证明。”

“我们要的财务人员是要有头脑、善于经济管理的人才，你只会会计业务不符合我们的要求。”

第一个应聘者起身下去了。

又一位女同志坐上了刚才那位应聘者的位置。

“你多大年纪了？”考官问。

“39岁。”应聘者答。

“根据我们的规定，女同志报考不得超过35岁。”考官说。

“你们的广告中不是说有专长的人可以不受年龄限制吗？”

“这里说的专长，是指对旅游业有专门研究并取得成就的人。也就是说要对旅游业的历史、现状、经营方式方法、规律特点等有专门研究，正式发表过全面、系统的学术报告及文章，同时还对中国的历史、地理、社会有全面了解的人。”

听了考官的问答，我在一旁想：如果真有个对旅游业的历史、现状、经营方式、规律特点均有研究并发表过学术文章的人，他会来你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单位应聘吗？

这个39岁的女应聘者茫然离去。

又上来一个。是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

“你应聘什么专业？有何能力证明？”考官问。

“我应聘宣传。没有什么能力证明。”

“你现从事什么工作？”

“我在单位搞宣传工作。我有一定的文字写作和美工能力。”

“在报刊上发表过作品吗？”

“没有。”

“我们招聘的宣传业务人员，要同时具备文字写作、摄影、美工的技能。你只有文字写作和美工方面的技能而没有摄影方面的专长，不符合我们的要求。更何况在文字写作和美工方面你又没有作品发表过。”

又一个应聘者悻然离去。

接连看了三个应聘者的遭遇，我本不想一言不发就离去，但一种好奇心促使我坐上了应聘者的座位上。

“有能力证明吗？”考官问。

“有。”我把大学本科的毕业证书递了过去。

“你应聘什么专业？”

“经营管理或宣传两个专业都可以。”我答。

“说说你在宣传业务方面的情况。”

“我在大学时曾当过广播台的文艺编辑、学校宣传部副部长。我对摄影也有兴趣，并有一定的技能。”

“在报刊上发表过文章吗？”

“发表过多篇。”

“发表的文章带来了吗？”

“没有。你们并没有说要带来呀。不过，最近我就在昆明日报上发表过两篇文章，你们可以去看看。”

“美工方面怎样？”教官问。

“我在美工方面是外行。”我答。

“我们招聘的宣传业务人员必须同时具备文字写作、摄影和美工三方面的才能。你说说在经营方面的经历吧。”

“我在工厂干了十几年。当过工人、技术员、助理工程师、厂长。我曾在短时间内救活了一个厂。在经营管理方面我自信有一定的能力。特别是在汽车的管、用、养、修方面。你们搞旅游，汽车运输是少不了的，我相信我能发挥作用。”我说。

“那你填张表吧。”说着，他递过来一张招聘表。

我填好后交给另一位考官。他看了以后说：“怎么没有贴照片？”

“我不知道要贴照片，因此没有带来。”我说。

“你交钱了吗？”

“没有。”

“没有交钱你怎么就填表了？”考官大为不满。

“是他要我填的。”我指指刚才考我的考官。

“那你就现在交报名费吧。”

“今天我是来看看的，并不想报名。刚才我已领教了。”

说完我就离开了。我很看不惯他们那种盛气凌人的做派。

考官们继续面试源源不断涌来的应聘者。

这种招聘完全是骗人的把戏。他们在人事安排上其实早就内定了，登报招聘只是为了掩人耳目。如果真要招聘人才，那他们这种招聘办法是根本不行的。从他们的提问看，即使有博士学位的人也不够格。因为他们要的是全才，而全才是不存在的。话说回来，真有一个全才，他会来光顾你这个八字还没有一撇的“筹备处”吗？

当时也有人建议我出来办个汽车修理厂。我觉得也是呀，我在汽车

修理行业干了十六年，对汽车、机械的修理业务，包括管理、技术我都是熟悉的，为什么不出来自己办个修理厂呢？

要办厂首先就得找厂址。于是我又每天骑着自行车在市内到处转，试图找个可作为办汽车修理厂的地点。

确定厂址和开铺子做生意一样要看“堂口”好不好。人们常说“酒好不怕巷子深”，其实，这是对那些名声早就在外的名酒而言的，对于还不为人知的新酒是绝对行不通的。

要办厂还得有一笔启动资金。我哪来资金呢？又有人建议说：为了解决启动资金的问题，最好找一家活不下去了的厂搞联营。对方出厂房、资金，我们出管理和技术。

可哪里去找这样的厂呢？我们掌握的信息实在是太有限了。找了一个星期还是没有着落。时间一天天过去了，眼看约定的两个月就要过去一个月了。

就在我有些着急的时候，好消息来了。张达民打电话告诉我说，他已和他的同学、现任云南毛巾床单厂厂长的杨正义取得了联系，并说了我要调工作的事。他要我第二天上昆明，他带我去找杨正义。

11月27日，我们按约定时间见到了杨正义和总工赵洪延。我向他们作了简单的自我介绍并递上了一份简历。他和赵洪延也简要地介绍了云南毛巾床单厂的情况。两人都说见到我很高兴，希望我能到毛巾厂和他们一起工作。

当他问我有什么要求时，我说：我对政治，甚至管理都没有兴趣，唯一的要求是来毛巾厂只搞具体的技术工作，不搞行政管理，更不要担任什么行政职务。当然，希望能帮我解决住房问题，哪怕是只有几个平方，能铺一张床就行。

杨厂长是一个很爽快的人。我们关于调动的谈话进行得很顺利。

调云南毛巾床单厂的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杨厂长要我12月1日就去毛巾床单厂设备动力科上班，在调动手续办完以前就按“试用”给我待遇。至于住房问题，他答应尽快为我解决，说今后厂里只要有一套住房就优先分给我。

我申请了三年的工作调动问题竟在两个小时内就搞定了。这还真让

我感到意外。

我之所以决定去毛巾厂，最主要的原因是毛巾厂离我岳母家近。

当时岳父、岳母住崇仁街 55 号省第一人民医院宿舍。而云南毛巾床单厂在市区中心的复兴村，与第一人民医院（昆华医院）仅隔着一条玉带河，从毛巾厂到岳母家走路也就几分钟的事。岳父母年纪都大了，需要有人照顾。而且当时我女儿张巍在上十六幼儿园，晚上也住在岳母家。我如在毛巾厂上班，老人和孩子都可以照顾了。

另一方面，云南毛巾床单厂是一个有三千多职工的中型国有企业，管理也还算正常，我相信去这样的厂搞技术工作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1986 年 12 月 1 日，我正式在云南毛巾床单厂上班了。

这时我的心绪是复杂的。一方面是情势迫使我不得不离开铁路建设公司；另一方面，我毕竟为铁路建设公司奋斗了十六年，这十六年中虽有伤、有痛、有遗憾，但也有欢有乐，有成功后的满足，怎么能没有感情呢！

在这十六年中，我做的两件事是值得回味的。一是在修配厂成立厂务委员会搞企业改革；二是直面现实，反官僚。

厂务委员会是我在企业改革中的一个创新，也是企业管理的一种大胆尝试。关于厂务委员会的情况，我已在前面的章节中较详细地记述过了，这里就不再赘述。这里我要说的是：改革不管采用什么形式，关键还是领导者要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即改革的目的和宗旨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还是只为自己、只为少数人谋利益的问题；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让群众参加管理，把工人当主人，还是脱离群众甚至无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的问题。

我之所以能让一个人心涣散、每况愈下的修配厂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内就变成一个人心凝聚、生气勃勃的企业，正是我们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走群众路线，坚持了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结果。我可以无愧地说：在我任职期间，我没有为自己谋一点私利，在全厂多数职工都有奖金而收入有所提高的情况下，我还是拿原有的固定工资，一分钱的奖金收入也没有。

铁路建设公司当时在建设厅厅长万跃林的主持下也在搞改革，但他

们搞的改革是愈改愈糟。修配厂在我被免职后的三年内就基本被搞垮了，具有两级党委的铁路建设公司也在几年内改没了，“改制”成私人企业了，五千多工人都下岗了。为什么有这样的结局呢？就是因为以万跃林为首的官僚们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丢掉了群众路线和为最广大的群众谋利益的宗旨。当时如果按我和米楠楨的思路对铁路建设公司进行改革，我想结局是会完全不一样的。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关于面对现实反官僚的问题，我在前一章中也说得比较多了。我想应该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官僚主要是指体制内那些已经放弃了共产党的宗旨，有权不为民众办事，专为自己或只为少数人服务，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官员，用毛主席的话来说就是党内走资派。

当然，体制内当官的不都是官僚，好的领导干部还是多的。有的干部犯有官僚主义的错误，是认识问题，不是立场问题。

对我任厂长期间的改革，厂总支书记施金亮是反对的。但两年后他却把我当成了他的知心朋友，什么话都愿意对我说，有事总要我出主意。因为他通过这两年的亲身体验认识到我主张的改革是对的，因而改变了对我的态度，由反对我到支持我对官僚们抗争。

杨森经理也是对我打击、压制最厉害的人。免我的职是他干的，反对我出任公司经理他也最积极。但几年后的一天，他在昆明金马坊广场碰到我时却表现异常（此时他已调某建工学院当了副院长，我已在毛巾厂上班）：他双手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好长时间就是不放，把我的手都握疼了。当时他虽然没有当面向我承认自己错了，但他略带哽咽的话语以及对我的祝福却已表达了他的真诚及对我的愧疚，这让我很是感动。

施金亮、杨森这样的人当然不能算是“官僚”。他们只能说是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有更多的人像他们一样对D的“改革”有新的认识。现有人说D的私有化“改革”已是不可逆转了，会“一百年不变”了，我看未必。

不过，反官僚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为可以说“改开派”现已基本上全面掌握了国家的权力。

近年来习主席全力推动反腐败，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但我认为，反腐败必须从反官僚开始，只反腐败而不反官僚，特别是不依靠广大人

民群众来反官僚，腐败是永远反不完的。

回到原来的话题。

对铁路建设公司，我是问心无愧的。

此时的我，唯一感到愧疚的是觉得对不起那些在我困难的时候曾经全力支持过我的朋友。我不但没能报答他们对我的支持和友谊，而且还让他们受到我的牵连，使他们的前程受到了负面影响。

其中我最对不起的应是公司组织科主任科员孔令发和新上任的公司经理米楠楨。

孔令发，云南巧家人，转业军人，年龄和我相近。1983年前我们之间并没有交集，相互也不认识。但在我与官僚们三年的抗争中，他始终站在我这一边给我支持和鼓励。他为我提供信息，为我跑中指组、跑建设厅、跑省委组织部、跑省核查办，向这些部门反映我受压的情况。他对我确实是满腔热情，尽心尽力了。他是铁路建设公司公认称职的组织科主任科员、先进工作者。但就是因为他对我的事尽心尽力而遭到了官僚们的忌恨。在公司工作班子调整时，他被调离组织科，成为王凤华等人打击、排斥的对象。就在我写这一章时，一个偶然的的机会碰见了铁路公司的一个同事，当我问到孔令发的近况时，却得知他五年前就因肝硬化去世了。这个消息让我非常震惊，以致埋怨起老天的不公。肝硬化是长期情绪郁结所致。可以想象，在我离开铁路建设公司以后，他受了多少打击和委屈。想到此，一种负疚感在我心头油然而生。

第二个我对不起的是新任公司经理米楠楨。米楠楨的情况我前面已经说了很多了，这里就不赘述了。我之所以说也对不起他，是因为如果他不是为了我而与建设厅摊牌，是完全可以保全自己的，起码不至于一个任期都没有干完就下台了。按他的条件：出身军干家庭，共产党员，有大专文凭，有基层工作经验，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三化都占全了。在铁路建设公司有几个人同时具备他的条件呢？建设厅又有什么理由把他拿下来呢？

我已经在毛巾厂上班了。从此我将再不过问铁路建设公司的事。我将开始我一生中连续多年不问政治，不与社会抗争，专心从事业务技术学习和探讨的平静生活。

第三十三章 在毛巾厂七年的那些事

一、在锅炉房上班

到毛巾厂报到后，我被安排在设备动力科分管技术改造和节能，并兼锅炉工段工段长。

当时设备动力科下设一个办公室，一个维修车间，一个锅炉工段，一个电工班，总共近六十人。

办公室有正副科长两人，支部书记兼工会主席一人，工程师两人，设备检验员两人，统计员一人，总共 8 人。

维修车间主要是为全厂设备维修和技术改造服务，人数不多，不到二十人。但车、钳、铣、刨、焊，冷、热加工各工种设备和人员都配置齐全。

锅炉工段包括锅炉三个班和管道一个班，总共 32 人。锅炉班为漂印车间提供蒸汽，管道班负责管道维修。当时锅炉班有三台 4 吨、一台 8 吨工业燃煤蒸汽锅炉。锅炉工实行“三班倒”，保证 24 小时供蒸汽。

电工班负责全厂生产、生活用电。

调毛巾厂时我曾声明不再搞任何行政管理工作。但架不住总工一再“做工作”，觉得不能一来就驳他的面子，我只好答应先干一年，把现任锅炉工段长带出来后就下来。

总工赵洪延当时安排我负责全厂的技术改造和节能，但其实这是虚的。因为他没有给我提出任何具体的技改项目和节能目标，而要我去锅炉工段当工段长才是实实在在的。

那时人们都觉得锅炉工的活又脏又累，而且技术含量低。因此，一般年青人都有点瞧不起锅炉工。毛巾厂虽然女职工占百分之七八十，但锅炉工要在厂里找一个对象却十分困难。

在我来毛巾厂以前，锅炉工段管理混乱，事故不断。往往车间正忙着要蒸汽的时候没有汽，而在车间闲下来不要汽时蒸汽却到处乱冒。车间三天两头向厂长、总工告状。厂长、总工们对锅炉工段也感到头疼，但却没有好的办法去解决。

我到锅炉工段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厂长写报告，要求增加锅炉工的

福利待遇，改善锅炉工的工作环境，以此来提高他们在厂内的地位，改变锅炉工的形象。厂长很快就批下了我的报告，为锅炉工每人增加了相当于一级工资的岗位津贴，并重新装修了锅炉房。

锅炉工段的工作条件和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锅炉工们的积极性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当年就被评为全厂唯一的先进工段。

二、每年出一项科技成果

我虽然在锅炉房上班，但我没有忘记我来毛巾厂的初衷，也没有忘记厂长要我负责全厂技改和节能的任务。我每天上班除处理好日常事务外，还根据毛巾厂生产的实际抓紧学习。一是熟悉毛巾、床单的生产工艺、流程，二是学习节能、节水方面的知识。当时锅炉能耗占到全厂能耗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因此，我把锅炉节能作为主攻方向开展学习和研究。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我几乎就把省图书馆内有关的书籍和期刊翻了一个遍。

厂里没有给我技改的项目和科研课题，我就根据厂里的生产实际自己找项目，找课题。在此后的六年里我几乎每年都有一项科技成果或论文面世。简述如下：

（一）“自动卸料垂直提升机”的设计与制造

1. 课题背景：长期以来，毛巾厂的锅炉炉渣都是就地堆放，严重影响厂内环境卫生和交通。特别是到了旱季，炉灰飞扬，严重影响漂印车间产品质量。

2. 功能、设计特点：自动卸料垂直提升机是一种集垂直提升、自动装卸和存储于一体的多功能专用装置，广泛适用于冶金、矿山、仓储等行业散料的中转装卸，特别适用于与燃煤工业锅炉配套，解决炉渣的堆放与装卸问题。该装置与传统的类似功能的装置（如刮板式输送式、皮带输送式、乌龟车输送式）比较，具有结构简单紧凑、操作安全可靠、维修方便、投资省（仅为传统类似功能装置的20%），占地少（因其下部可停放汽车，可认为不占地，缓解了厂区场地拥挤问题）。

3. 实施效益：该设计1987年12月完成，报厂长批准制造，1988年5月竣工并投入使用。该装置运行后，很好地解决了炉渣就地堆放所造

成的所有问题，大大地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和工作环境，每年还可以节约一大笔装卸费用。

（二）蒸汽供给系统的设计与改造

1. 课题背景：长期以来，毛巾厂漂印车间蒸汽浪费严重。一楼漂洗间经常是蒸汽弥漫，职工浴室水池常年开水翻腾。而车间二楼则经常莫名其妙地遭水淹，给产品质量造成严重威胁。

2. 改造特点：拆除原有的所有手控装置，实现冷凝水的自动排放；根据不同设备的耗热情况（蒸汽压力、热交换面积和效率），通过严密计算确定蒸汽疏水阀的规格型号；加设冷凝水止回装置；投资少，改造施工简单、方便，可在生产间隙中进行，不影响正常生产。

3. 实施效益：改造施工于1988年5月完成并投入运行，效益显著。热效率得到大大的提高，原煤单耗从1987年的4.29T/吨纱下降为3.32T/吨纱，下降了22.6%，以1988、1989年毛巾厂的年产量计，每年可节约原煤1000吨以上。漂印车间一楼长期大量蒸汽弥漫和二楼经常被水淹的问题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我根据我厂蒸汽管网改造工程的实践撰写的《蒸汽疏水阀在纺织企业中的运用》一文在《中国棉纺织技术》上发表以后，引起国内纺织行业的普遍重视，纺织行业多家报刊作了介绍。文章中的有关计算方法和公式被有关设计人员所引用。

之后，我又撰写了《蒸汽输送管网负压的产生及危害》一文，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阐述了蒸汽输送管网内负压产生的原因和危害，并从实际出发，提出了避免其危害的方法和措施，为设计人员在蒸汽管网设计时提供了关于负压问题的理论数据和实践依据。

（三）工业锅炉给水工艺存在的问题与改进

1. 课题背景：采用钠离子交换水处理工艺的工业锅炉给水，较好地解决了锅炉结垢的问题。但也存在采用此工艺导致炉水碱度增加快，而且水处理效果愈好，炉内碱度增加愈快（PH值升高），不仅增加了排污频率和排污量，造成能源浪费，而且随着碱度的升高，加大了炉体的腐蚀，降低了锅炉的使用寿命。

2. 改进方案特点：在经过大量调查和实验的基础上，大胆地突破传

统的给水观念。根据碳酸氢钠在炉内达到一定浓度后其本身所具备的“水处理能力”，提出了新的锅炉给水工艺，即“软、硬结合的给水方法”以降低炉水碱度，达到减少排污量、节约能源的目的。采用此方法，理论上可节约能源 5% ~ 15%。

3. 实施效益：未进行工业实施（厂领导没有同意在我厂具体实施）。我根据大量的实验数据撰写的论文《软硬结合，节能节水——锅炉钠离子交换水处理工艺探讨》一文发表后受到省市有关专家的肯定和好评。

（四）锅炉给水设施对水质的影响及改进措施

1. 课题背景：我在对我厂西坝锅炉给水水质进行检测时（此前只要求检测离子交换塔的出水，而不要求检测软水储水池内的水），偶然发现软水储水池中的水比离子交换塔的出水硬度高 2 ~ 5 倍。跟踪化验半个月，结果相同。这说明锅炉的实际给水指标已远远超过了国家标准，锅炉面临威胁。

2. 研究结论：为了查明原因，我采用了理论和实验相结合的办法，进行了反复化学实验，取得了近千个实验数据。在实验和分析的基础上，我终于找到了问题出在软水池池体的混凝土结构。

我们知道，混凝土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钙和碳酸镁。这两种物质中的钙和镁元素正是我们要用钠离子交换工艺去除的。当从离子交换器出来的“软水”进入到软水池后，池体（混凝土）将释放出大量的钙、镁离子，使水中钙、镁的碳酸氢盐浓度达到新的平衡，削弱甚至抵消钠离子交换塔处理的结果，使“软水”重新变成原来的“硬水”。当炉内的钙、镁碳酸氢盐达到一定的浓度时就形成了我们平时所说的“水垢”。

解决的办法是：软水池采用金属结构，或在混凝土结构的软水池内壁上用高分子聚合物将混凝土和水隔离。

3. 实施效果：厂领导同意我的结论和处理办法。实施后，排除了投资近百万元的锅炉的重大隐患，其综合经济效益是显著的。

这从我厂食堂锅炉报废的情况得到印证。

毛巾厂食堂锅炉给水和生产用锅炉的给水工艺是一样的，唯一不一样的是，食堂锅炉给水池的混凝土结构没有改造。结果一台新锅炉运行不到两年就因结垢和严重腐蚀而报废了。

我根据我厂对软水池实施改造的情况，撰写了《锅炉给水设施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文。文章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回答了“为什么经钠离子交换处理后的‘软水’在进入储水池后很快变成‘硬水’”的问题，并给出了解决的方法。文章在《能源》杂志上发表以后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也为以后的锅炉房设计人员和锅炉使用单位提供了相关部分的科学依据。

（五）供热系统负荷率与能耗的关系

1. 课题背景：从1989年起，毛巾厂实行限产压库。到1991年，年产量仅为1988年的63%。产量的大幅下降，导致单位能耗回升。

2. 研究成果：我在大量统计数据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画出了供热系统负荷率与能耗的关系曲线，从而找到了产量与能耗关系的规律，进而提出了“合理调度，改烧三台锅炉为两台”的建议。

3. 实施效果：1991年8月，厂领导和漂印车间采纳了我的建议，节能效果明显。在1991年产量比上年下降11%的情况下，原煤单耗不但未上升，而且下降了6.3%。1992年在市轻纺行业能耗普遍上升8%~11%的情况下，毛巾厂1992比1991年又下降了8%。此成果的经济效益是显而易见的。

在毛巾厂的七年中，我几乎年年都有科技成果。而且每项成果都给毛巾厂带来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1992年我被昆明市轻纺局评为节能先进工作者。我的“自动卸料垂直提升机”设计1989年获国家专利，1992年参加了云南省第五届发明展，在1994年沈阳举办的中国首届发明展上获金奖，香港回归前夕获香港专利局紫荆花金奖。该设计还被选入《中国专利集萃》一书。由于这几年我取得的科技成果，我被收录入《中国当代科学家与发明家大辞典》第一卷中。

这些荣誉对我的生活虽没有产生什么实际意义，但它却让我对自己在科技方面的研发能力有了信心，心里自然也就感到高兴，甚至对自己有了一些自豪感。

三、纯洁的同事间友情

我之所以在这七年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与厂领导的支持和车间



和毛巾厂同事在郊野公园（后排右一为作者）

的密切配合有关，更与工人师傅们的积极支持和我们之间的友谊分不开。

总工要我兼任锅炉工段长没几天，我就将办公桌从设备科办公室搬到了锅炉房，并和工人们打成了一片。我和锅炉工们上班在一起，玩在一起，喝酒在一起。我和工人们的关系就像兄弟一样。

我和工人们的情谊是真诚的，平等的，也是无私的。

我到毛巾厂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锅炉工们争取到了应得的福利，使他们在毛巾厂的地位有所提高，工作环境有所改善。我进行的第一项设计，首先就是为了改善他们的劳动条件，减轻他们的劳动强度。

而锅炉工们也给了我相应的回报。

让我至今难忘的是在我生病住院期间锅炉工们对我的关怀和照顾。

1988年后的三年中我因胃球部溃疡发作年年住院治疗。开始是保守治疗，什么药都吃过了，各种偏方也试过了，但就是没有控制住病情的发展。到1991年1月，发展到幽门水肿以至不能正常进食，医生不得不给我做胃大部切除的手术。

在这三年多次住院治疗过程中，锅炉房的弟兄们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每次住院，特别是做手术的那次住院，他们都是利用休息时间轮流来陪护我。在我手术治疗期间，吴宏斌师傅几乎是每天24小时

都陪护在我的病床前。

因不能正常进食，当时我瘦得真是“皮包骨”，体重由 60 多公斤下降到不足 50 公斤。如果没有锅炉工们的悉心照料，我真不知道后果会怎么样。

在写到 1989 年至 1991 年这三年我多次住院治疗的情况时，我真庆幸当时我国还没有搞“医改”。

当时国家企事业单位职工是享受免费医疗的（包括退休后）。只要是在正规的医院看病，大病小病的医疗费都可以全部报销。住院治疗时，自己要办的唯一手续就是去单位医务室开一份“三联单”交给医院，其他任何事都不用自己管了，更不要自己掏一分钱。

如果那三年我多次住院的事发生在今天，我真不敢想象后果会怎么样。

我退休后现每月国家给的医疗费（打到自己医保卡上的）为每月不足一百元。而现在去医院看病，即使是看一次普通的感冒，少则也要四五百，多则要上千元。也就是说国家每年给的医疗费只够看一次感冒！如果生了大病要住院，虽然可以凭医保卡报销一些，但自费部分也是难以负担的。

“医改”后仍然享受免费医疗的只有官僚集团和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事实上，这些人的医疗待遇还远远超过了“医改”前的免费医疗，因为现在国家给他们的医保费远大于他们的实际需要，而且是打入他们的个人账户，一个人的医保费可供全家人享用。

这是题外话，言归正传。

在毛巾厂工作的这七年中，给了我帮助的人很多，其中在科研方面给了我很大支持和帮助的应算是 QH。

QH 四川人，1955 年出生，是个小知青。我们之所以相识、相知，一是我们有工作上的联系。她在环保科上班，负责污水处理的检测和化验，我们的锅炉给水处理用的检测器具和化学试剂都是由她负责提供和配制的，我们的锅炉水处理工也是她代培的。二是她们环保科和我们设备动力科离得很近，她们的科头和我们科的谭国君工程师又是“闺蜜”，没事就常往我们设备科跑。而她是她们科头的得意弟子，因而也就常和

科头一起来我们科聊天。这样，我和QH也就从认识到熟悉了。

QH长得很漂亮，身材适中。她既有四川姑娘的热烈、爽朗，又有江南姑娘的含蓄与温柔。

她与我很是投缘。她常跟她们的科头来我们科聊天。有时也自己一个人来找我。她似乎对我有说不完的话，每次说完了还总是意犹未尽似的。

凡我要做的和想做的她都积极支持和协助。她的动手能力很强，而且做起事来总是干净利落。我写的《工业锅炉给水工艺存在的问题与改进》和《锅炉给水设施对水质的影响及改进措施》两篇文章，其中引用的实验和数据都是她帮我完成的。这两篇文章送发表时我也同时署上了她的名字。

一个星期天，她们的科头约了谭国君、QH和我去昆明金殿公园玩，她一直和我走在一起，有时还挽着我的胳膊，甚是亲密。她们科头和谭工拿她开玩笑，说她和我是天生的一对，让我很狼狈，但她一点也不在乎。

当时我住公共汽车公司分的南通街的一间房子，只有16平方。QH来过我们家，和我爱人也很说得来。

有人说：“男女之间没有真正的友谊，哪里有友谊，哪里就有爱情。”对此，我不敢苟同。男女之间是有真正的友情的。真正的友情与性无关。

我曾给QH写过一首诗《小桥和白云》：

小桥和白云

1992年7月于昆明

小桥伴流水，白云恋青山。

相依坦荡荡，自然即是缘。

现二十几年过去了，毛巾厂的好多人和事都已经淡忘了，但只有锅炉房的这帮兄弟们和QH我还没有忘记，我和他们至今还有往来。

四、终究没能逃离政治

我调毛巾厂的目的本来是要远离政治，避开人与人之间的争斗，专心从事自己力所能及的技术工作，以求得心灵的平静和生活的安宁。但政治有如空气无处不在，而且随时影响着甚至决定着人们的命运。只是有些人在意，有些人不在意，有些人是故意不承认罢了。

我在毛巾厂工作期间，江泽民、朱镕基按邓小平总设计师的设计正加快“改革”的进程，中国的政治环境完全变了。

毛巾厂从1991年开始搞“限产压库”，到1993年初，全厂已基本处于半停产状态了。就在这时，厂里开始实行“职工劳动合同制”、“企业职工全部员工制”（即全厂不分干部、工人，统称员工）、“职务聘用制”的“改革”。

在这些改革过程中，有的人调换了工作岗位，有的人办理了“留职停薪”去自谋出路，有的人则下了海，做生意去了。更多的人（一半以上），特别是四十岁以上的老工人们则下了岗。他们面对来势汹汹的“改革”无依无助，只能望着这个曾经是昆明市“税利大户”的毛巾厂暗自伤心流泪。

1993年7月，我这个毕业于名牌大学，被收录入《中国当代科学家与发明家大辞典》，连年来都有技术成果的工程师竟然也落聘了。

我这个曾经的改革者此时也无能为力。当时女儿正在上医学院，上学要花钱呀。为了女儿，从1993年8月起，我开始了我最无奈的“打工生涯”。

第三十四章 打工生涯

一、汇入打工仔行列

我从 1993 年 8 月起就汇入到了亿万打工仔的行列，一直到 2014 年春节后，这时我已 70 岁了。

我打工的第一份活是给昆明水处理设备厂当总工。该厂就在现明波立交桥附近，离家不算远。当时老板给的工资是 800 元 / 月，这比我在毛巾厂上班的一百多元的工资是高多了。

这个厂的两个老板原来是轻机厂的技术人员，他俩合伙开了这个厂，主要生产纯净水设备。工人不多，只有二十几个人，工长是来自贵州的一个复转军人。

在水处理设备厂待的时间不长，半年左右吧。主要是两个老板在利润分配上发生了矛盾，闹得不可开交。后来分了家，一个去了安宁办新厂，另一个在原地继续维持，我也就辞去了工作。

第二份工作是经朋友介绍去了一个机械设计工作室搞设计。这个机械设计工作室是从省设计院下海的一个技术人员办的，就在人民西路梁家河附近。给的月工资也是 800 元。

我对机械设计并不陌生，在铁路建设公司修配厂和毛巾厂我都做过多项设计。

到了设计工作室后，老板要求用 CAD 制图。这给我出了一个难题。因为那时我还没有摸过电脑，更不知道什么是 CAD。因此，我必须现学现用。好在八十年代初我跟着电大班在电视上学过一些电脑基础知识，学起电脑操作来还不那么费劲。至于 CAD 软件的运用，那就更不是问题了，不到一个月，我就能在电脑上绘图了。

在机械设计室我也没有呆几个月。为什么要离开这个工作室？今天看来也确实是自己太任性了。

当时工作室老板接到一单生意，是一军工厂要一台能绕 8 字形的绕线机（用于雷管引线绕制）。几个人搞了几个月，样机搞出来后不能用。我看了他们的设计后，就对老板说，让我试试吧。老板同意了。花了几天时间，我就有了明确的思路并画出了初稿。于是就对老板说，我已有

了初步方案。如果让我来设计，我不要工资，但专利权归我，你可以有优先使用权。老板不同意，为此发生争执。我就说不干了。就这样，我离开了这个设计工作室。

就在我离开机械设计工作室不几天（1995年1月），老伴在春城晚报上看到一则招聘广告，说西山旅游度假区管委会投资开发总公司要建一个汽车安全技术检测站，要招聘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问我想不想去看看。

我去了。负责招聘的人向我介绍了汽车安全技术检测站的基本情况：

汽车安全技术检测站（下称安检站）是西山投资公司和昆明TD工贸公司、昆明DD实业公司三家投资组建的（当时每家投资120万元）。而西山投资公司的上级是西山旅游度假区管委会（下称管委会）所属投资开发总公司。因安检站项目是度假区投资开发总公司通过昆明交警支队的关系设立的，该公司又是国有企业（其他两家均为民营企业），所以安检站由西山投资开发公司出任董事长并具体进行经营。

当负责招聘的人问我来应聘什么职位时，我回答是来应聘检测车间主任或技术科科长职务。

面试后的第三天，电话来了，说车间主任的人选已经有了，问我愿意不愿意去当技术科长，如同意，第二天就可以来上班，月薪是800元。我同意了。

第二天我去报了到。比我先报到的还有刘惠。他原是昆明冶金机械局汽车修配厂驾驶员培训部的负责人。此时安检站其他管理人员和检测、调修的工人都还没有落实。

我们报到时检测车间的房顶还没有盖好，检测设备已到了一些，全都摆在旁边的临时房子内。根据站长刘东的安排，刘惠负责配合施工单位完成车间未完工程的修建，我负责检测设备的验收、安装前的准备及安检站正式开检后管理制度的起草工作。

说我和刘惠是安检站的“元老”一点也不过分。因为一是我们俩去得最早，我们参与了厂房的修建和设备的安装、调试；二是整个安检站的规章制度，包括安全操作规程，都是出于我的一支笔。

1995年4月1日，安检站正式开业检车。

汽车安全技术检测是在一条由微机控制的全自动检测线上完成的。全线共分七个工位（每个工位由一台单板机控制），即 1. 基本资料输入（人工），2. 外检（人工），3. 大灯，4. 前轮前束，5. 前后轮制动力，6. 尾气（人、机），7. 检测结果打印、出单。

我虽然在汽车修理行业呆了十几年，但由微机控制的汽车检测线对我来说却是一个新行当，我必须再学习。

要弄通汽车检测的基本原理不难。但对我来说，当时要熟练掌握单板机的联机运行却不那么容易。

我们的检测设备是深圳一家汽车检测设备厂商提供的。在开业后的半年内，系统运行极不稳定，故障不断。我像救火员一样，经常忙得焦头烂额。

电子设备维修与机械设备维修有很多不同。机械维修的对象看得见，摸得着，很直观。只要对工作原理了解透了，一般问题很快就可以解决。而电子设备维修就完全不一样了，既看不见，也摸不着。对有经验的人来说，他可以通过故障现象初步判断出故障的部位，但要迅速判断出到底是哪一个器件出了问题还需费些周折。以制动台单板机为例，主板上除有大量的电阻、电容外，还有一排十几个小集成块。要判断出到底是哪个器件、哪只“脚”出了问题，不费些周折是不可能的。

当时最令我头疼的问题是系统接地和鼠患问题。

每一个工位的单板机本身就是一个子系统，七个工位就是七个子系统。每个子系统都有自己的接地装置。要使检测线平稳运行，就必须使七个子系统的接地电位完全一致，否则，就会出现检测数据不准，甚至出现运行故障。为了保证全系统接地的统一和安全可靠，我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安检站当时还地处郊区，老鼠特别多。在设备安装时我们虽然采取了一系列防鼠措施，如强、弱电电缆全部走地沟，而地沟是用水泥砌筑的，还加了铁盖板。尽管防范这样严密了，但还是防不住老鼠将线缆咬断的事，真是防不胜防。头天下午检测线还是好好的，第二天刚上班就发现系统不能正常启动了。要查找咬断点，就要打开所有电缆沟盖板，逐段仔细查找，有时一找就是两个小时。没有办法，最后我们只能将所有电

缆的进出口用水泥封死。

我的责任主要是让检测线每天都能正常运行。加夜班是常有的事，因为为了不影响全站的检车，对于那些不影响整条检测线运行的故障只能留到下班后来处理。

半年后，机械设备的磨合期结束，电子设备该出的问题（包括软件）也都出了。通过对故障的处理，加深了对设备的了解，处理起来自然也就快捷多了。

此时，西山投资公司已收购了昆明 TD 工贸公司和 DD 实业公司在安检站的全部股权。

两年后，安检站成立“调修部”。负责对检测不合格汽车的调整和修理工作，我由技术部经理调任调修部经理，原检测车间副主任宋滇接任我技术部经理的职务。

我在安检站干了九年，直到 2003 年春节后离开。

我为安检站的建设和发展确实付出了很多，对安检站自然是有感情的。但为什么最后还是离开了呢？主要是因为从 1998 年开始安检站闹着要“改制”了。围绕着我们亲手创造的国有资产，我再次卷入到了一场风波，而且又失败了。

二、安检站的“改制”风波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国有、集体企业的私有化浪潮已成汹涌之势。一大批国有、集体企业通过“改制”变成了私有企业，几千万国有、集体企业的职工成了下岗工人。与此同时，一大批企业的党政领导干部一夜之间成了企业主、资本家。

安检站的“改制”是 1998 年年初开始的。作为第一步，站领导决定将西山旅游度假区投资公司和安检站合并，更名为“昆明聚龙有限责任公司”。对外还是称安检站，在西山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内则称聚龙公司。

3 月 17 日，安检站向度假区投资开发总公司递交了《关于安检站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造的报告》。3 月 18 日，度假区投资开发总公司以管开总司（98）028 号文件作了批复。同意安检站的改制方案。

4 月，安检站出台了《安检站改制为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实施方案》

（下称“方案”）。

根据该方案，“股权设置为：开发总公司（国家股）占35%；安检站（集体）40%；投资各方内部职工（个人）25%。”“实行投资各方内部职工全员持股，维护职工主人翁地位，实行资本合作与劳动合作相结合。”

该方案第七条“公司的法人治理机构”中还明确规定了在董事会下“设监事一人，监事对董事会、董事长和总经理等人员行使监督职能”。

大会上宣布了实施方案后，全站55名职工（包括两名“内退”职工）全部都同意投资成为股东。书记麻争投了3.1万，财务部长杨斯欣投了5.3万，一般职工有投3万的，有投2万或1万的。管委会投资开发总公司的董事长杨斗和王希翎也分别投了2万和3万。我当时投了3.3万。

当时人们认为董事长、总经理肯定是会由管委会指定，因此也就没有在意由谁来当了。但由谁来出任监事大家就有想法了。因为方案中明确规定监事是要通过股东民主选举的。通过几年来的观察，大家普遍对麻争为首的经营班子有看法，认为必须选一个能真正代表大家利益的人出来担任监事一职。

可是在选举监事时，站领导却在选举前只指定了一个候选人，即技术部经理宋滇。

安检站立即炸开了锅。因为大家都知道宋是个“老好人”，对领导除了顺从外还是顺从，根本不适合当监事。如果让他当监事，那设监事一职就毫无意义了。

选举监事的大会在调修车间楼上的大会议室召开了。绝大多数人对指定候选人表示了不满，要求实行真正的民主选举。当时主持会议的是工会主席李英，面对职工们的强烈不满，她在强调了支部只提一个候选人的同时，表示大家可以自行选自己信任的人。结果，大多数职工的选票投给了我。

李英是麻争的心腹。她并没有宣布选举的最终结果。当大家要求公布监事当选人时，她以需请示领导为由宣布散会。对此职工们再次表示强烈不满。

李英立即向麻争作了汇报。

麻争听了李英的汇报后立即召开了党支部、团支部和工会委员会的

联席会议，宣布下午的监事选举没有按党支部的要求进行，选举结果无效，应重新进行选举；要求大家“和支部保持一致”，只能选宋滇任监事。

两天后再次召开监事的选举大会。选举结果：宋滇比我多一票当选公司董事会监事。

为什么不正常的第二次监事选举能正常进行呢？这是因为：

职工们对重新选举也抱有必胜的信心，至于为什么要不正常地搞第二次选举，觉得没有必要追究。再者，当时安检站的绝大多数职工都是来自不同单位的下岗职工，各有各的想法。当然首先还是一个“怕”字，怕再次丢了工作。因此，一些人就只好服从。

宋多出的这一票就是 Y 投的，Y 本来是积极追随我的。但他在最后一刻害怕了，按麻争的要求投了宋滇的票。

两次监事选举给安检站的全体工人上了深刻的一课。他们的民主意识、维权意识以及对领导的监督意识开始觉醒。

在接下来的两年中，麻争的面目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因此，一场捍卫民主、捍卫自身权利的斗争在安检站成为不可避免。而我这个曾决意退出政治斗争舞台的人也由于生来的个性，很自然地也就卷入了其中，并充当起了组织者的角色。

麻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政治思想品质很不好，权力欲、私欲极强，而在企业管理方面又极端无能、弱智的人。

麻出生于山东一个比较贫穷落后的农村。小时没有读几天书，但在部队却当过宣传干事。

说他政治思想品质很不好，权力欲又极强，一点也不冤枉他。读者看了以下事实就可略知其人了。

1.1990年前后，他转业到昆明，到处找接收单位而没有着落时，是他在西山投资公司当老总的一个战友 × × × 收留了他。但一年多后，他就把提携他的这个战友给踢翻并取而代之，成了该公司的老总。

2.前面说到安检站最初是由度假区投资公司、昆明TD公司和DD工贸公司三家合资组建的。安检站开业后不到半年，他为了稳住自己董事长的宝座，不惜血本，借高利贷买下了另两家的股份，搞独资经营，致使安检站长期在高负债情况下经营，职工利益严重受损。

3. 度假区投资公司下有两家企业，一个是安检站，一个是工贸公司。按当时的分工，作为投资公司书记的他分管注册为“集体”的工贸公司并兼任老总、法人代表，而作为投资公司经理的刘东则分管国有的安检站并兼任站长、法人代表。

为什么作为国有企业一把手的他要去负责工贸公司这个集体企业呢？因为这个“集体”其实就是他自己一个人的啊，赚了钱直接归自己，而亏了呢，则由国企抬着，自己一点也不会吃亏。

但事不如人愿，到1996年8月，麻争负责的工贸公司已负债累累，亏得一塌糊涂，连十来个职工的工资都发不下去了。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来到安检站。安检站是投资公司的下属企业，作为一把手他要来也没有什么。问题是他一来就要把站长刘东挤走，要鸠占鹊巢，要由他来当安检站的站长和法人代表。

刘东从安检站建站起就一直担任站长兼法人代表，对安检站应该说是有功的。况且他出生于军干家庭，也是有背景的（没有背景也不可能从专县调上昆明，且由一个普通工人当上了投资公司的经理）。那么他怎么就会那么轻易地被赶下台呢？这除了他的盲目自负和轻信外，主要还是因为麻争的权谋和手腕远胜于他。

刘东被赶走的经过大概是这样的：

一天下班前，麻争请刘惠（检测车间主任兼总检验员）、陈兴（检测车间副主任）和我（调修部经理）三人去官房大酒店吃饭。饭桌上，他对我们三人大大地吹捧了一番，什么“安检站就靠你们三个人了”“我一定忘不了你们”等等。他还特别强调说：今后有什么事你们三人研究定了就完了，不要再向刘东请示汇报。

在这次酒席上，麻还说了一大堆刘东的不是。如说刘东不懂管理，私心太重。还举例说：刘东将临街服务楼承包给自己的女儿经营。承包期满后，安检站不但没有收到一分钱承包费，反而倒贴了水电费。临走时，刘东还要安检站给她女儿8万元现金。

这次酒席上，麻争当着我们三人的面说：只要刘东离开安检站，他愿一次性付给他30万元作为补偿（九十年代初这可是一笔天大的数字）。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麻争又专门来我家“拜访”，继续做我的“工

作”，好话说了一大箩。

我们三人当时都是五十多岁的人，当然知道他的目的和用意。

我们都不愿意卷入麻、刘之争。在工作中，我们还是像原来一样该请示刘东的还是照样请示。

麻争见我们不买他的账，于是就反过来说我们的坏话，离间我们和刘东的关系。那时他们正为谁当安检站站长和法人代表的事闹得不可开交，甚至闹到管委会去了。麻争这时却突然“关心”起刘东来，他对刘东说我们三人在官房大酒店请他喝酒，在酒席上我们三个人都向他写了“效忠信”，要刘小心一点。

对于如此荒诞的谎言，刘东如果是一个有头脑的正常人，自然不会相信。但奇怪的是他竟然相信了。不但信了，而且为此恼羞成怒，立即免去了我们三个人的职务，让我们“待岗”。

没有了我们三人的安检站自然也就问题不断。麻争不失时机地向度假区管委会写报告，要求把刘冬调走。管委会主任方利益同意了麻争的要求，把刘东调到度假区汽车服务公司去了。从此，麻争真正成了安检站的站长兼法人代表。

在短短的几年中，麻争赶走了投资公司的老总×××，赶走了TD、DD两个合伙人，赶走了自己的搭档刘东，足以说明麻争这个人的政治思想品质不好，权力欲极强。

说麻争的政治思想品质很不好，还因为他争权不是为大家，而是只为自己。他当上安检站的站长、法人代表后私欲恶性膨胀，把安检站变成了“麻家店”。从以下几件事可窥一斑：

在安检站严重负债经营的情况下，麻争在三年内除了为自己在百合花园买了大房子以外，还在三年内换了三辆轿车：从桑塔纳到奥迪到三星太空。

按国家有关规定，麻争每四年可有一次探亲假。而他却每年总要回家几次，每次来回都是乘坐飞机，且每次飞到青岛后就租一辆轿车自己开回家以显摆他的身份。每回家一次，车旅费要报销一万左右。不仅如此，他山东老家的三亲四戚来昆都是安检站的小车接送，开宾馆住也都是在安检站报销，几年来少说也是几万。

麻争不仅公款玩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而且玩遍了世界各大洲。国家当时三令五申不许公款旅游，而麻争却在2002年初玩澳洲，年末玩日本，花的车旅费就在15万元以上。

麻争好色，长期包二奶。安检站众所周知的就有三个。第一个是某洗脚城的迎宾小姐何某，第二个是宣威来昆的宋某，第三个是住金星小区163栋的×某。

为了赢得二奶的欢心，麻争挥金如土。以二奶何某为例，为讨好何某，麻以安检站投资为名，为她成立了一个工贸公司（注册为集体），开始是与福建的一个老板合资建竹地板厂，后来又做皮鞋生意，安检站为此共支出45万元（办竹地板厂20万，做皮鞋生意25万）。再后来又为其开汽车配件经营部，安检站又支付了十几万元。1998年我站成立驾培部，麻将其安排在驾培部管收费。后来麻看上了宋某，何某愤然带了驾培部公款6万元走了。当时财务发现后要报警，麻争公开阻止说：“谁要报警，谁明天就不要来上班了。”

宋某的丈夫在宣威犯杀人罪在监，来昆后麻看上了她，就让她承包了我站的一个对外饭店，并予以扶持。

麻争包二奶在我站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一些人对玩女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公开宣称：“能玩女人是本事。”

麻争的小金库比财务部还大。1999年以前，检车收入外的收入均属于麻争的小金库。众所周知，安检站的“调修”收入仅次于检车收入。如2002年，上报的财务报告中，营业收入为266.5万，这只是检车的收入。而这年调修收入的104万和驾培部收入的66万共计170万都进了他的小金库。他为了掩盖罪行，曾对原站长刘东说：“小金库的账我们必须每隔一段时间销毁一次，免得找麻烦。”小金库到底有多少钱？这些钱去哪了？恐怕无人说得清楚。

说麻争在企业管理方面是一个无能、弱智的人一点也不夸张。因为他来安检站后的经营决策几乎没有一项是正确的。如他不顾安检站的实际需要，花二十万从深圳买来的一套烤漆设备几乎从来没用过；他花二十几万元为驾培部买的一套倒桩仪，因场地等原因，一直闲置，两年后成了一堆废铁；又如他花二十八万元装修安检站的舞厅，因他吃回扣，

导致音响等设备根本不能用，两年多无人问津；再如他花十几万元买来桑塔纳发动机防护板，更是无人过问，变成了一堆垃圾。

麻争最擅长的是拉关系。他曾多次在中层干部会上宣扬他的“关系就是生产力”的理论。他利用拉关系不但摆平了顶头上司、车管所所长李熹和西山旅游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方利益，而且还摆平了市纪委、市检察院、市法院。

“拉关系”，说白了就是行贿。为了拉关系，他安排唯一的一个副站长专职负责“攻关”，根据攻关对象的特点和需要，送钱、送物，陪吃、陪喝、陪玩、陪睹。

为了摆平西山旅游开发区管委会，麻争可以说不惜血本。在安检站第一次买商品房时，就给管委会分管安检站的某副主任送了一大套住房（安检站第一次买房时在百合花园共买了三套，一套是麻自己的，一套是刘东的，第三套就是某副主任的）。

麻争给管委会主任方利益送了些什么我们不清楚。但有传言说：方利益的女儿去澳大利亚留学并在澳国注册了一家相当规模的公司，麻出力不小。我想这绝不是空穴来风。否则就难以解释后来方利益为了麻争不惜冒与市纪委直接对抗的风险了。

为了摆平车管所，麻争不仅将车管所所长在农村的一个侄女招来安检站，而且在大多数骨干职工都分不到房子的情况下，专门买了一套房子“分”给了这个“农民工”。

全国两亿多农民工，谁听说有哪一个国有企业为农民工分过房子？

正由于麻争连车管所长的农民侄女都照顾得如此周到，所以麻争为提高被检车辆的不合格率擅自修改检测技术参数、酒后开车肇事等恶行都不会受到追究。

2002年下半年，西山度假区管委会贯彻D“南巡讲话”，要求国有企业的“改革”“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的指示，决定将安检站作为国企完全退出的试点，并公开向社会招标出售安检站。

麻争作好了充分的购买准备。他通过做假账（如加快固定资产折旧、截留营业收入、虚增营业和管理成本等）减少企业净资产，以便自己购买时少出钱。同时给人造成安检站不盈利、是亏损企业的印象（2002年

财务报表上亏损 90 万)，以减少购买时的竞争对手。

安检站是一个有双重领导的企业。行政上属西山旅游度假区管委会，而业务上则归昆明市车管所管。即安检站既是一般企业，又是代表车管所执法的单位。一般人都知道安检站很赚钱，是块肥肉。因此，2003 年春节后管委会要出售安检站的消息刚一透露，就有多家企业申购安检站。其中昆明市金马东方汽车贸易公司首先于 2003 年 3 月 5 日与开发区达成了购买意向性协议。

麻争原来的计划落了空，急了。他跑到管委会找到方，说他要买安检站。方答应了，并通知国资公司立即中止了与金马东方汽车贸易公司的交易。

度假区管委会要将安检站卖给麻争的消息一经传开，安检站立即又炸开了锅，真可谓群情激愤。职工们为了安检站，也为了自己的权益，纷纷向管委会纪委、市纪委、市检察院举报麻争的种种腐败劣迹。

2003 年 9 月 5 日，一份《致西山旅游度假区管委会的一封公开信》放到了方利益主任的办公桌上。

这是由安检站 27 名股东（占全体股东的 70%）签名并按了红手印的公开信。

公开信中说：

就我公司的实际状况来说，我们广大职工坚决不同意现有的经营班子购买国有股，因为我们不信任现在的经营班子及财务班子！现经营班子不能代表广大职工的利益，他们以职工名义提交的购买国有股的申请是无效的。其理由如下：

（一）我公司自 1995 年开业至今营业收入将近 4000 万元（公司前身为安检站）。但是，他们从未真正做到站务公开，一切事情都是暗箱操作，由几个人把持说了算，财务缺乏应有的透明度，职工缺乏基本的知情权。

（二）我公司的主营业务是车辆检测，企业的收入是相对稳定的。从 1995 年 4 月开业到 2002 年的 7 年中，营业收入将近 4000 万元。我们成立了聚龙有限责任公司以后，1999 年至 2001 年每年的税后利润均在 100 万以上。我们认为公司去年出现亏损是假亏，是麻争想利用此次改

制掩盖财务上的问题，骗取政策上的优惠，以达到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的勾当。如果是真亏，为什么他们那么热衷于此次购买，今后又怎样确保广大股东的利益？这岂不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吗？对此，我们广大职工坚决不答应！

（三）公司成立至今基本实行一言堂的制度，在研究决定职工工资、福利、安全生产以及劳动保护、劳动保险等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问题和研究决定生产经营重大问题、制定重要的规章制度时，从未听取公司职工的意见和建议，广大股东也从未接到过任何财务会计报告。这些做法都直接违反了《公司法》之五十五条、五十六条、一百七十六条等的规定。我们的工会、持股会、股东大会基本形同虚设。

（四）2000年至2002年三年公司上报给管委会的职工收入及各种保险与实际严重不符，存在做假账的可能。另外，我公司2000年及2001年营业费用及管理费用两项合计达240万之多。我公司的生产经营项目为车辆检测，既不需要购买原材料，也不存在销售费用，管理人员最高时也不过十来人，为什么经营和管理费用每年平均竟达百万之巨，这些钱到何处去了？2002年我公司被税局查实偷逃个人所得税28万元，对比职工的实际收入，不难看出其中的奥妙所在。

（五）此次改制在进行资产评估报告的评审时，住房公积金补偿表中所列各人1998—2002年的工资收入与事实严重不符。在广大职工切身利益的面前，他们都胆敢这样欺上瞒下，要是这个企业被他们买下，我们广大职工的基本权利能够得到保障吗？我们还有活路吗？况且，这还是冰山一角，更大的黑幕还有待于进一步揭开。

（六）公司经营的这几年，管理者不但在财务上进行暗箱操作，更是在用工制度上及人事上采用了高压政策，任人唯亲，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采取打击报复，从而造成人人自危，唯我独尊。在这样的企业工作根本没有一点安全感及安定感。这种情形下，企业能够得到发展吗？

（七）地税三分局今年3月查实，2002年安检站偷逃个人所得税达28万元。以此推算，安检站职工的平均月收入应在3500—4000元左右，而我们实际的月平均工资不足700元。多数人不具备上个人所得税的资

格。如果这28万元的个人所得税应由麻争等人来上，那他们的收入是个多大的数字呢？

（八）麻争挥霍无度，国有私营麻家店。

麻争是一个典型的“无资本的资本家”。他来安检站时，是一个“连一件好衬衫都没有”的普通人。几年后却成了挥金如土的大老板，国有企业安检站成了他的“麻家店”。七年来，他大肆占用和挥霍安检站全体职工用血汗换来的财富。1996年10月，他要职工集资，1997年1月他就用大家的钱为自己买了一套一百多平方米的住房。接着就是为自己换车、换通信设备。1997—1999年他三年换了三次车，坐骑由桑塔纳变奥迪再变成三星太空。1998年改制评估时，除去职工的投资，安检站的净资产不足50万，而他个人所占用的资产，如房子、车子、通讯设备等就超过60万！

我们是聚龙公司的职工，也是聚龙公司的股东，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亲自参与并目睹了公司的每一步成长历程，企业的发展凝聚着我们的心血与汗水，我们对这个企业有很深的感情，我们在企业中入的股都是我们大家的血汗钱，我们希望企业有美好的明天，家庭有美好的生活。因此，我们不愿看到国有资产白白地流失，也不愿看到自身的权益被侵犯，我们不信任现在的经营班子及财务班子，我们也更不会同意他们来购买聚龙公司。我们广大职工有权选择今后聚龙公司的经营者。在此，我们恳请管委会的有关领导能够尽快下来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听取职工的呼声，以理智的情感、负责的态度慎重选择聚龙公司的未来之路。天道昭彰，真理永恒，我们广大职工拭目以待！

2003年9月3日

职工（股东）签名：

王武 杨朴 刘正 李玉 杨修昆 王琦 李民 王文 张学强 金亚锦
布廷昆 王珊 杨波 周浩 王亚庆 张小勇 王硕 李德刚 李萌
杨林生 段永华 吴然 范君怡 徐正东 窦智 毛长云 刘惠

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这27人中怎么没有我张建华的名字？是的。签名中是没有我的名字。因为这时我已被麻争给“开牌”了。

麻争意识到我是他最强有力的对手。因此，在2003年春节过后，

他借我和安检站的劳动合同到期，不再和我续签劳动合同了。

这时我虽然还是安检站的股东，但我已不是安检站的职工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安检站的多数职工都信任我，我虽不是安检站的职工了，但我仍然是安检站反对他的组织者。

面对激愤的维权职工，麻争于9月8日上午召开了安检站中层以上干部会议。在会上，他将写公开信定性为“闹事”“诬告领导”，并当场宣布免去王文检测车间主任兼主任检验员的职务，要窦智、张学强两人停职检查。理由是他们带头“闹事”。

职工们的强烈反应也许是方利益主任没有想到的。在收到公开信的第二天，他把“闹事者”们召集到管委会进行安抚，答应尽快组织工作组到安检站对公开信中提到的问题进行调查核实，并当众批评麻争免去王文等人职务的做法是错误的。

第三天管委会派出了工作组，在安检站召开了座谈会，听取职工的意见。由管委会国资公司工作人员组成的三人查账小组也来到了安检站“查账”。

几天后，工作组和查账组向方利益主任作了汇报。方利益定的调子是：职工们提出的问题都属于麻争的工作方法问题。当查账组汇报说职工要求查账组应有具有会计师资格的人参加时，遭到方利益主任的拒绝。他说：“查账只能在麻争的问题属于工作方法问题的前提下进行，不能扩大化”。

对安检站职工的公开信，方利益主任的处理意见是：

1. 麻争在大会上对职工们提出的问题公开予以说明；
2. 安检站的国有股实行内部职工竞购。

对方利益给麻争的“定调”，安检站的职工极为不满。但对“实行内部职工竞购”的意见表示支持，因为我们完全有信心击败麻争的经营班子而成为安检站的主人。

经充分讨论，我们决定由王文、窦智牵头组成“骨干职工竞购小组”参加竞购。

9月17日晚上，窦智、王文和我在一起吃饭，我们就目前形势和应对方法进行了讨论。我在当天的日记中记录了我在这次碰头时发表的意

见：

要确定下一步怎么走，我们应该怎么做，关键决定于我们对目前形势的判断，而正确的判断又来自于我们对掌握的情况的正确分析。如果把我們目前进行的斗争比作解放战争，我们现在已在“西北坡”，我们取得完全胜利已成为不争之事实。从现在开始，对手将节节败退，而我们将步步走向胜利。

以上判断基于以下分析：

作为我们的对手麻争，经过我们一年来的不断打击，已经是元气大伤，名声扫地了。一年来我们向纪委、检察院不断地送揭发材料，使管委会和站上职工都知道了他是一个有严重问题的人；职工们的签名信又给了他致命的一击。麻争之所以能猖狂一时，是因为他在管委会买通了一帮实权人物，这些人吃了他的钱，形成了利益集团，这些人自然要千方百计保护他，为他效力。而麻争也必然对这些人以此相要挟。正由于这样，我们一年来虽然不断给予打击，他仍能安然无恙。

职工联名信的送出给了这个利益集团有力的一击，以方利益为首的利益集团面对上（市纪委、市检察院）、下（职工）的夹击要么丢卒保车，要么全军覆没。对他们来说丢卒保车自然是上策，也就是说让麻争放弃买站，给予安抚，实现整体安全着陆。

应该充分认识到我们一年来与麻争进行斗争的重要意义及成绩。可以说，没有我们坚持一年的斗争，就没有职工的联名公开信（因为没有公开信中的素材和炮弹），即使有人写了同样的公开信也不会有丝毫作用（因为没有舆论准备，管委会很容易就可应付过去）。一年来的斗争与联名信的关系，就像二战时中国人民的八年抗战与美国人在广岛丢了两颗原子弹的关系一样。没有中国人民的八年抗战，美国人不会丢原子弹，即使丢了，日本人也不会因此而投降。原子弹的作用只是加速了日本的投降而已。

我们将取得最后的胜利，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这并不等于我们可以高枕无忧了，什么问题也没有了。我们还必须提高警惕，作好打下一个战役的准备。因为麻争是否能使他们的利益集团如愿，是否心甘情愿放弃这块肥肉，是否愿意牺牲自己来保护这个利益集团还不一定。因为这

对麻争来说这个牺牲确实太大了。他失去的不仅是安检站，而是他的下半生，失去他现在拥有的奢侈生活和为所欲为的权力；同时还要失去他儿子及其亲属包括兄弟、家族的利益。根据麻争的性格，他完全有可能拒绝这种牺牲。他将采取各种手段进行反抗，包括要挟这个利益集团与自己同归于尽。

一旦这种可能成为事实，以方利益为首的利益集团将全部垮台。因此，他们绝不会让麻争走到这一步。他们将不顾一切地保麻争过关，并对我们进行全面打击。

因此，我们必须作好思想准备，准备打下一个战役。下一个战役将更激烈、更残酷。因为我们的对手将不再是麻争一个人，而是一级政府，是一个以老奸巨猾著称的方利益为首的利益集团。他们不仅有权对职工进行无情的打击、镇压，而且作为一级政府，他可以以各种理由对抗上级党、政官员的干预。而且如果他们不是做得太鲁莽，太过分，上级党、政官员是绝不会对他们怎么样的。

我们必须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王文有可能再次被免职；除窦智、张学强再次被停职检查外，其他骨干也可能被停职检查；在公开的高压下，一些签过字的职工将退缩、反戈；甚至出现我们的某个人被暗算、伤害。那些我们在电视里看到的可怕镜头可能就会真的出现在我们身上或身边。总之我们宁可想得复杂一些、更困难一些。因为在事关生死存亡的斗争中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绝不能掉以轻心。

在与利益集团的斗争中，我们必须充分依靠群众，充分用好职工这张王牌。同时保护好每一个签过字的职工，不能让职工受到可以避免的任何伤害。这不仅是斗争的需要，也是我们的职责。对那些胆小的、可能动摇的要安慰、鼓励，使他们进一步了解这场斗争与自己切身利益的关系；对个别有可能“反戈”的要警惕，要向他们说明我们必胜的原因和反戈的后果。

在这场与“利益集团”的斗争中，我们必须借助上级党、政机关领导和媒体，这是我们最后取得胜利的关键。如果说第一战役的斗争对象是麻争，裁判者是管委会，而第二战役的斗争对象就是管委会，裁判者就是市级领导了。在第一战役中，我们也曾求助于市级领导，但根据我

国的国情，上级政府一般不直接干预下级政府的职权范围。因此，在第一战役中，上级政府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而第二战役则不同，因为这时管委会成了第一被告。

事情的发展正如我所预料的。

2003年10月10日下午两点半，管委会主任方利益率领西山旅游度假区纪委主任、各局局长、总公司经理等十一人来安检站召开“安检站改制动员大会”。如此大的阵势以前是从未有过的。

大会由度假区投资开发总公司（国资公司）总经理孙继东主持。他首先介绍了到会的管委会领导。接着他宣布了大会议程：1. 国资公司董事长、本次调查组负责人杨光宣布调查结论；2. 管委会主任方利益讲话，聚龙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麻争讲话。

杨光在讲话中完全否定了职工在公开信里和座谈会上提出的26个有关麻争贪污、挪用公款、无视党纪国法及无视职工权益的问题。最后结论是：麻争的这些问题都属于“工作失误问题”。

方利益主任在讲话中对职工们的公开信表示强烈不满和严厉批评，而对麻争却给了高度评价。他说：“麻总在聚龙公司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你们提出的那些问题只是他的一些工作失误，主要是由于他没有很好地和大家沟通。”“现在好多单位工资都发不下去了，麻总不但给你们发了工资，而且还发了奖金，你们还要起什么哄？”他警告说：“公开信的事就到这里为止。这是西山旅游度假区管委会作为一级政府做出的最后决定。大家不要在这件事情上再纠缠。因为这关系到改制的进程，事关整个管委会的脸面！”

方利益接着说：“大家要把改制的积极性化为对以麻总为首的经营班子的信任、支持。”他在讲话中明确无误地告诉大家，管委会是麻争的“大后方”，管委会将全力支持麻争购买聚龙公司。他还说：“麻总买下聚龙公司以后，聚龙公司将由国有变成共有，变成大家共同拥有。”

方利益在讲话中只字不提骨干职工代表窦智已递交了购买申请一事，却煞有介事地说：“大家不要受外人的诱导参与购买聚龙公司。”他威胁说：“若内部关系摆不平，相持不下，我们只好拿到社会上售卖，最后受损失的还是你们。”

麻争最后发言。他对方利益千恩万谢后，许诺他买下聚龙公司后，现有职工全部留用，对参与这次写公开信的人决不搞打击报复。

大会没有安排职工发言。

方利益代表一级政府决意要将安检站卖给麻争的目的昭然若揭。

会后，人们纷纷表示了强烈不满。有人深有感触地说：“方利益这些人真是太黑了！”

10月21日，管委会在安检站贴出了《关于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内部公开出售聚龙安检实业有限公司国有资产公告》。

11月3日，以麻争为首的“经营班子”和以王文、窦智为代表的“骨干群体”报名竞购，而刘惠、李波也以个人名义递交了竞购报告。

方利益亲自主持了竞购者会议，他重申了管委会公告中载明的竞购评分标准：

1. 职工支持率(选票)占30分；
2. 出价高并资金到位占30分；
3. 竞购者的经营方案占40分(由市改办专家组评判)。

总共100分，谁得分最高谁中标。

根据公告给出的评分标准，我们信心满满。我们认为在职工支持率方面，我们肯定取胜，仅在公开信上签名、按手印的人数就占到职工总数的60%以上；在资金方面，我们得到了昆明市金马东方汽车贸易公司的有力支持，我们出具了银行450万的资金证明，而麻争的经营班子的银行资金证明只有100万元；至于经营方案，我们的方案肯定是最好的，因为凭着我们对麻争们的了解，他们不可能拿出什么好的方案来。

然而，在11月20日的“选举经营者职工大会”上，麻争却以45票对23票的优势胜出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在选举前，麻争在安检站召开了党支部会、团支部会、工会委员会，要求党、团、工会成员都必须投现经营班子的票，否则就是不和党支部保持一致。同时，他对在公开信上签名的职工进行威胁（说凡不投麻争票的将不续签劳动合同）或许愿（说只要投了麻的票就可加工资、报医药费等），使5名曾在公开信上签了字的人改投了麻争。

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在选举那天，麻争将聚龙公司修理厂和驾培部的全体人员都拉来参加投票，并规定他们只准投麻争的票（修理厂和驾培部早已承包给了私人老板。这些人既不属安检站的职工，更不是安检站的股东），使得有投票资格的人（股东）由45人变成了70人。

本来票数的多少也还不能完全决定竞购的胜负。因为根据管委会公告的规定，还要看资金到位和经营方案的评分情况。可方利益却在投票结果出来后立即宣布麻争“获胜”，资金到位和经营方案的专家评审连过场都没有走。

麻争和他的经营班子欣喜若狂。

王文、窦智为首的骨干职工竞购小组则义愤填膺，表示要集体去管委会要说法。冷静下来后决定向市纪委举报，并将矛头指向了管委会主任方利益，认为这一切都是方利益造成的。

《我们不承认暗箱操作产生的选举结果》《暗箱操作能合法吗？》《聚龙公司财务收支十八问》《麻争自卖自买国企严重违法》《方利益保麻争是为了保自己》等一封封举报信交到了昆明市纪委和昆明市检察院反贪局。

市纪委非常重视安检站职工的举报，特派出以纪委副书记郭某为首的调查组来度假区管委会和安检站进行调查核实。

2004年3月1日，昆明市纪委发出昆纪字（2004）×号文件，明确提出了废止麻争竞购小组中标资格的处理意见（下引文件原文对有关单位名和人名作了处理）：

鉴于西山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和麻争及其经营班子存在以上问题，经初核小组和分管领导集体讨论，作出以下处理意见：

1. 针对西山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在聚龙安检公司改制过程中，核销无形资产缺乏政策依据问题，应严格按昆办通（2002）4号文件执行，将无形资产纳入资产评估范围，重新界定纳入产权制度改革的国有净资产。

2. 针对西山旅游度假区深化企业产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在改制过程中对竞购者资金证明未作严格审核，对麻争竞购小组资金运作中存在严重违规等问题，应废止麻争竞购小组此次中标资格……。

3. 针对麻争在购买国有资产中存在以公司名义借款和挪用公司资金



问题，必须纠正。

昆纪字(2004)×号文件在“关于西山旅游开发区管委会在改制中存在的问题”一节中明确指出：

1. 管委会将2002年12月31日经审计认定的750万元无形资产核销没有政策依据；

2. 管委会对麻争认购的资金未作严格审核。以致麻争竞购小组的银行资金证明中掺有聚龙安检公司资金62万元和以公司名义借款的92万元。

文件在“麻争认购国有资产中存在的问题”一

节中指出：

麻争竞购小组出具的银行资金证明中没有麻争个人的资金证明，麻争挪用公司资金38.22万元资金购买国有资产，以聚龙公司名义借款20万元作为个人出资侵占了公司利益。

市纪委的文件管委会虽然没有公开传达，但职工们都知道了麻争的中标被取消了（我们去市纪委复印了这个文件）。与此同时，市检察院反贪局也对麻争的贪腐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

为此，职工们欢欣鼓舞。

人们开心之日自然是方利益、麻争们难过之时。

麻争几年没有回自己的家了。一天，老婆突然哭哭啼啼地跑到站里来，麻没好气地说：“我都急得要跳楼了，你还好意思来闹。”

过了几天，麻争放下一句话“我着急，方主任会比我更着急”，带着二奶去四川旅游去了。

方这时确实是很着急。他很清楚，麻争是一个无赖，一旦他出了事，也就意味着自己也完了。

方的小跟帮们也跟着着急。有人公开说：“市纪委这样搞，我们还搞什么改革？”“市纪委的文件算不了数，还有省纪委嘛。”

方利益来度假区管委会任主任前是昆明市政府的副秘书长，人脉关系自然可以通天。他清楚，要推翻市纪委的文件，只有找省级领导。

一天，方利益陪着原省委副书记、副省长赵光来安检站“视察”。一个堂堂的副省长竟然来一个只有五十来号人的小小安检站视察，人们自然明白这是为了什么。

老省长在安检站神情自若地转了一圈走了。

几天后，西山旅游度假区管委会重新启动了安检站国资退出程序，麻争旅游也回来了。

昆明市纪委的×号文件成了一纸空文。市检察院反贪局对麻争贪腐案的调查也打住了。

这一切都是方利益们打着“改革”的旗号进行的。根据D南巡讲话中“谁不改革谁下台”的指示，谁还敢阻止他们的“改革”？

麻争本人一分钱没花就买下了经昆明鸿润会计事务所审计为总资产1427.2万元的安检站。

安检站建站时的第一批职工和主要骨干大多数离开了安检站。此时的安检站成为真正的“麻家店”。

安检站由国企改制为私企只是全国私有化进程中的一个缩影。事实上，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到本世纪初，也即是我在安检站打工的1995年—2004年的十年中，我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抓大放小”方针的指导下，除了国有垄断企业如电力、烟草、铁路、民航、金融、电信等以外，几乎所有工商企业都进行了“改制”。在这一过程中，一大批工商企业被逼破产了，另一大批则“改制”成了私有企业。连鼎鼎大名的昆明电工厂，正值兴旺发达、年创外汇过亿美元之时，也以两千万人民币的价格卖给了私人老板（该厂当时的资产近两亿人民币）。就昆明来说，到本世纪初，国有工业企业仅存昆钢集团、云烟集团、云南电力集团等少数几家了，其他机械制造、电子、建筑、轻工、纺织、

食品等行业的几乎所有国有企业都已荡然无存。

三、当建筑监理工程师

2004年春节后，经朋友推荐，我进入到建筑监理行业，做起了监理工作。这一做就又做了十年，直到我年满七十，执业证到期。

我从水电专业监理工程师做起，一直做到总监代表、总监。

监理工程师是一个“自由职业”。只要有注册的执业证，就可以在不同的监理公司承接工程监理工作。

我的监理工程师执业证是在云南监协监理公司注册的。在这十年中，我曾先后在云南建设监理公司、云南监协监理公司、云南水电安装建设监理公司、云南城市建设监理公司、河北远大工程咨询公司云南分公司等几家监理公司承接过工程监理工作。

在这十年中，我监理的工程有：云南烟草进出口公司圆通街综合楼改造工程（主要是楼宇智能安防系统）、菠萝村连排别墅工程、中烟云南烟草公司综合楼智能建筑工程、昆明商贸学校教学楼工程、昆明铁路局临江里高层商住楼工程、普洱市第一污水处理厂二期及管网建设工程、昆明三德木业昆明海口生产基地厂房建设工程等 10 个工程。

在很多人眼中，监理是一个受人尊重、吃香喝辣的职业。其实干过这一行的人都知道，干监理这个行当并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那样轻松，而是很辛苦的。

作为监理工程师，特别是总监，不仅需要熟悉整个工程的图纸、施工工艺、各种验收技术规范，而且要随时掌握施工进度，提前做好质量安全事故防范预案。对于质量、安全的关键节点，你还必须亲自看着工人人们的每一步操作。碰到浇灌混凝土，特别是在大体量的浇灌时，工人干二十四小时，你也必须守二十四小时，工人连续干四十八小时，你也得坚持四十八小时。

监理的责任重大。从 2004 年开始，国家实行监理工程终身负责制。一旦出现重大安全质量事故，施工方的领导要坐牢，总监也是要坐牢的。因此，作为一个真正负责的监理人员，他在监理过程中神经总是绷得紧紧的，不敢有丝毫懈怠。

那些年，监理往往还是一个两头受气、两边不讨好的职业。建设方总觉得你做得不够好，觉得他出了钱请监理，监理就应该听他的。建设方派出的甲方代表往往不懂行，瞎指挥。而施工方又总觉得你要求太高，是故意找茬，去甲方告你的状。他们往往采取给甲方代表一些“好处”的办法，绕过监理，由甲方代表直接处理一些安全、质量及工艺方面的问题。

在我做监理的十年中，总的情况是好的，和同事，和建设方及施工方也处得不错。没有出现过任何质量、安全事故，受到人们的好评。

但思茅污水处理厂二期及管网工程的监理工作我却并没有做完。我辞了职，中途退出了。我炒了老板的“鱿鱼”。

昆明铁路局临江里高层商住楼建设工程结束后，经人介绍，我接手了云南建安监理公司（下称建安监理公司）承接的思茅污水处理厂二期及管网工程的监理项目。

建安监理公司是一家父子经营的私人企业。老总姓任。其父是省人事厅的一个退休处长。平时是父主内，子主外，配合相当默契。

在我和建安监理公司签订的协议中，明确了我出任思茅污水处理厂二期及管网工程项目总监，月薪 3500 元。公司答应给我配 6 个专业监理工程师（建安监理公司在和建设方签订的监理合同规定配 11 个专业监理工程师）。

2010 年 12 月 9 日，公司的小邢开车送我去思茅。同行的还有李小丽。她和小邢都是公司监理部与建设方进行商务谈判的代表。

下午四点半，我们到达目的地——思茅自来水总厂，并被安排住宿在总厂的双赢酒店。

第二天上午十点，在施工现场举行了“思茅区污水处理厂二期及配套管网工程开工典礼”。参加典礼的有思茅区自来水总厂的主要负责人和总厂的上级有关领导。我和建安监理公司的总工丘丽（丘是当天赶来的）、办公室负责人李小丽代表监理公司出席了典礼。

开工典礼很简单，大家站在一起摆好姿势让普洱市电视台摄了像，放了鞭炮，典礼就算完了，历时不到半个小时。

典礼结束后，一台挖机和四台自卸汽车就开始挖填土方。

思茅区污水处理厂二期及配套管网工程，分为污水处理厂（新厂）工程和从原第一污水处理厂（老厂，一期）到新厂（二期）的管道铺设工程两部分。老厂位于思茅区北平坝与山区的交界处，而新厂则在弯掌山（也有人称“万掌山”）的腹地，两厂相距约5公里。

新、老厂之间有公路相通。公路沿纳子河而建。但因长期受重型车碾压，加之管理不善，路面损坏严重。

该工程的管网基本沿纳子河岸铺设。建成后，思茅区的城市污水将在老厂通过大型水泵加压提升后经管网输送到新厂，在新厂处理后再排入到纳子河汇入澜沧江。

开工典礼虽然举行了，但工程施工并未真正展开。因为应该由建设方提供的基本施工条件——“三通一平”（水、电、路通，场地平整）还不具备。

新厂将建在还是一个小山包的位置上，整个山包需要推平。当时建在山上的配电站、坟墓需要搬迁，农民的菜地、果园也需通过协商进行补偿。

“三通一平”的问题解决前，施工方和监理除积极配合建设方外，只能耐心等待。

在等待的日子里，既让我有充分时间熟悉施工图纸和修订各项监理实施细则，同时也让我有机会对普洱市的人文、地理及历史进行进一步的了解。

普洱市位于云南省西南部。下辖1个区（思茅区）、9个自治县。

普洱是“七彩云南”丰富性和多样性的缩影，是全国唯一的国家绿色经济试验示范区。普洱市历史悠久，著名的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源于普洱。普洱生态优越，森林覆盖率达68.8%，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高于世界卫生组织“清新空气”标准12倍多。水能、矿产、森林等资源丰富，有高等植物5600种、动物1496种，有“云南动植物王国的王宫”之称。普洱具有“一市连三国、一江通五邻”的独特区位，有2个国家一类口岸、1个国家二类口岸、17条通道，是云南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前沿。普洱文化底蕴深厚，有普洱茶文化、茶马古道文化、民族文化、生态文化和边地文化，享有“天赐普洱，世界茶源”“中国

咖啡之都”等美誉。

我之所以在 66 岁高龄之际还去接下污水处理厂工程的总监工作，主要就是奔着普洱优美的自然环境及人文历史来的。我到云南虽然三十年了，但此前我还没有来过这里。

在思茅待了一段时间后，我就喜欢上这座小城了。除这里优美的环境、清新的空气、整洁恬静的街道外，主要还因为普洱人的纯朴、热情和友善。

我在双赢酒店住了一个星期后，建设方安排我搬进了自来水总厂的一栋单身宿舍。

这是一栋八十年代修建的两层砖混结构建筑。因地处洗马河以西最高的一座山头上，凭窗西望，整个思茅城区尽收眼底。宿舍东面约 500 米就是美丽妖娆的洗马河水库及洗马河水库公园，这是思茅人最钟爱的休闲、娱乐的好地方。宿舍楼前空地上种有五棵菠萝蜜树（云南人也称其为“牛肚子果树”）。菠萝蜜很有些神奇，一是花开在树干上而不是开在树枝上，长成的果实胖嘟嘟的，就像一群大猴子在争先恐后爬树玩一样。更令人不解的是，每年都要在树干上用大砍刀砍出一些伤痕来，



据说只有这样菠萝蜜树才会多挂果。

空地上还栽有几棵木瓜树。木瓜树也有些神奇。人们看不到它开花，但它却会像椰子树一样每年都会挂出一大串形似面包的木瓜。木瓜富含淀粉，

甜中略带酸味，可食。难怪人们又把它叫面包树。

在我住进来以前，整栋楼只住着一个人。他就是我的邻居，也是我在思茅结交的第一个朋友——龚成。

龚成 29 岁，身高 1 米 7 左右，景谷县人。2004 年毕业于哈尔滨工

程学院。毕业后曾去广东闯荡了一年，后回到家乡。现为普洱市自来水总厂的一名助理工程师。

通过一段时间的交往，他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思想正统，作风朴实，为人热情，乐于助人。我搬进单身宿舍后，他主动提出将我的电脑用双绞线联结到他的路由器上，因而为我上网与监理公司及家人联系创造了条件。

我们很快就成了忘年交。他无话不和我谈。谈他的家庭，他的学生生活，谈他交过的女朋友。在我看来，他是我认识的年轻人中的佼佼者，我很看好他的发展。

能上网了，我就注册了一个QQ账号。很快就有几个思茅本地人加我为朋友，其中三个后来成为我现实生活中真正的朋友。

三个朋友中，第一个是我的湖南老乡王和平。他原是湖南衡山县的一个农民，五十来岁。几年前，他一家三口来到思茅。在思茅市区中心最热闹的地方开了一家科技公司，经营电脑及办公用品，也搞批发，生意很不错。后来未过门的儿媳也来到了思茅，一起打理店铺。

在思茅，我们都是来这里谋生的“外地人”。他的一口湖南乡音使我一见面就倍感亲切。他态度热情和蔼，乐于助人。经过几次交往后，我们就成了很要好的朋友了。我每次去他店里，他都要叫老伴多弄几个菜，要和我“多喝几盅”。

第二个朋友叫小敏，五十来岁，是普洱市一所学校的英语老师。丈夫是江西人，是普洱市的一个局长，写得一手好字。

小敏长相一般。但很时尚、性感，爱开玩笑。她似乎和我很有缘。在网上聊过几次后，第一次见面就有说不完的话。在我住在自来水总厂单身宿舍的那段时间，她经常晚饭后来和我聊天。

她有一辆很漂亮的小车。每到星期六或星期天，她就拉我出去兜风，或去她的同事家吃饭，或去公园聊天。有一次，她还拉着我去参加了她们学校老师在郊外一“农家乐”的小聚会。饭后她们要打麻将，她就叫我坐在她旁边“当参谋”。

她在向同事们介绍我时，谎称我是她上中学时的老师。

后来我的工作逐渐忙起来了，压力也很大。但只要她一来，就会让

我感到轻松和愉快。

第三个朋友叫亚玲。四十多岁，是市物资公司的一名职工，一年前她办理了“内退”，这时休闲在家。

亚玲身材娇小，生性活泼，长得也漂亮。她喜好文艺，是普洱市业余文艺演出团的积极分子和台柱。

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相互都觉得似曾相识。对于我来说，这也许是因为文革时我负责过文艺宣传队，脑海中留存着宣传队员的影子。而她为什么对我会一见如故，我还真弄不明白。

她对我就像对她的亲哥一样。她给我讲她的童年、讲她的工作、讲她的婚姻、讲她的儿子、讲她的朋友和同事。总之，她什么都愿意和我讲，毫无顾忌。

一次她开着她那宝贝摩托车来我的宿舍，非要我陪她去金凤大酒店参加一个婚礼，说让我去见见她的那帮演出团的朋友。开始我有些犹豫，觉得和一些不曾认识的人在一起吃饭会尴尬。但她非要我陪她去。

她骑着摩托车带着我在思茅大街上转了一大圈。当来到婚礼现场时，她的那些朋友一见到她就围了过来，并高兴地大叫着：“小咪喳来了，小咪喳来了”。她也很兴奋，在向朋友们介绍了我以后，竟手舞足蹈起来。这时的她完全不像是一个年近五十岁快做奶奶的人，倒像个孩子。

亚玲的家庭生活并不好。离异多年，和儿子一起过。儿子虽已二十多岁了，但还没有找到稳定的工作。她靠自己一个人的内退工资养活一



在思茅污水处理厂工地（2010年4月18日）

家人，生活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但她是一个乐天派，成天乐呵呵的，在她的脸上根本看不出有任何为难的事。

一天，我们在洗马河公园散步时我问她：“你为什

么总能一天到晚都乐呵呵的呀？”她说：“我从不想知道昨天的事，也不想明天的事，我只想今天怎么过得愉快。愁是一天，乐也是一天，何必去为那些令你不开心的事发愁呢？”她说得真好。

有了朋友们的陪伴，日子过得很快也很愉悦。当时我写了两首诗，记录了我在思茅那段日子的生活。

诗两首

致 QQ 好友

相约阳光下，放飞梦风筝。

许愿有灵犀，知己值万金。

逍遥游

我梦上蓝天，逍遥白云间。

了却凡尘事，佳人伴神仙。

转眼 2011 年的春节到了。自来水总厂的干部、群众都开始杀猪宰羊，施工队的农民工也陆续回了家。

2 月 5 日下午四点，我搭乘八公司思茅项目部尚国柱经理的车离开思茅回昆明，同行的还有项目部的三个管理人员。

晚七点，我们到达墨江县城，并下榻在墨江哈尼宾馆。

墨江是全国唯一的一个哈尼族自治县。因北回归线穿城而过，加之这个地方双胞胎很多，且有三江奔流奇观而闻名中外。

我是第一次来墨江。出于好奇，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就约了同来的四人上了街，以一睹墨江县城的风采。

这是一个非常新鲜幽丽的早晨。薄雾笼罩下的墨江县城让人感到格外的恬静和舒畅。

此时街上行人还很少，多数店铺都还没有开门。我们沿北回归大道由西向东漫步。当我们近距离地看到北回归线标志塔时，我对同伴们说：这就是每年太阳照射地球由南向北、再由北向南转身的地方。如果它不转身，我们地球上就没有春夏秋冬了。

天大亮后，街上的行人多了起来。我们折头返回哈尼宾馆。路过农贸市场，各人买了些当地的土特产作年货。

上午十点，我们离开墨江县城，下午四点回到昆明。

回到昆明的第二天，我去建安监理公司汇报了思茅工地的情况和我的工作，同时要求给我增派专业监理工程师。老任开始对我在思茅的工作表示满意，但一提到要人时却一口回绝，说现公司无人可派，各项目部都缺人，要我再坚持一段时间。经我好说歹说，要求春节后至少把胡志飞派给我。最后，老任同意春节后先把胡志飞派给我，其他专业监理工程师也将在两个月内陆续为我配齐。

胡志飞，年近五十，原是昆明手扶拖拉机厂职工。他文化水平不高（初中毕业），但肯学习。他为人诚实忠厚，待人热情谦逊，工作认真负责，对工程监理的业务也比较熟悉。在监理昆明铁路局临江里高层商住楼工程时，我们曾共事过近一年，对他印象不错。

2月24日，我和胡志飞搭乘八公司思茅项目部的车从昆明返回思茅。

元宵节过后，污水处理厂二期及管网工程各施工队的员工陆续返回。新厂长100米、宽40米、深5米的大型污水处理池主体工程，跃渊公司的土方开挖（小山推平）及回填工程，厂区道路及围墙工程，污水输送管网勘测铺设工程都相继铺开施工，建设工地挖掘机、推土机、压路机、运土汽车，来往穿梭，一片繁忙的景象。

有了胡志飞的帮衬，我们的监理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当时我们监理的主要工作，一是帮助各项目部完善“施工组织设计”，落实施工安全措施、安全预案；二是现场巡视，重点是隐蔽工程，签认施工方报来的工程量（主要是土方量）及进场材料；三是协调各施工队的进度，处理各种因施工引发的矛盾。

为了及时处理工地上发生的状况，我们住进了施工方搭盖的活动板房，只有星期天我们才回到思茅城休息。

老伴元俭总是担心我一个人在思茅的生活。虽然我们还只分开一个多月，而且每天在QQ聊天中我也总是告诉她我一切都好，但她还是不放心。4月9日，她还是以她从未去过西双版纳、从未看过傣族泼水节为由，独自坐上由昆明开往思茅的班车，于下午六点到达思茅。

对元俭的做法我是能理解的。因为结婚25年来，我们还从未分开一个星期以上的的时间。其实，我也很想她，我也希望她能来思茅。虽然我经常埋怨她唠叨，但长时间都听不到她的唠叨反而习惯了。

4月13日，我和元俭、胡志飞坐周良的车去景洪过泼水节。

周良是昆明嵩明县的一个农民，五十来岁。改革开放后他跟着别人承包土方施工赚了钱。他当时有大小四台挖掘机，是承包思茅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管网施工的老板。

周良在老家有妻室，儿子都二十几岁了。前几年他来思茅发展，认识了思茅的姑娘小翠，并在思茅买了房子，两人一直同居。现小翠已经怀上了他们的孩子。我见过小翠，人长得确实很漂亮。

像周良这样家有妻室又在外边另寻新欢的人在我做监理的这几年中见过很多。多数都是在外边赚了钱的包工头。当然也有不是包工头的。在工地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成双成对的“夫妻”在一起工作和生活，但其中很多其实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夫妻，而是临时拼凑的“夫妻”。这也许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一道新风景吧。

去西双版纳的途中，我们路过野象谷，并有幸近距离地和一群野象不期而遇。

说“有幸”并不夸张。因为好多人去了多次野象谷也没有见过野象的真容。据一位导游说：去野象谷看到野象就像买彩票中大奖一样，几率很小。因为大象是移动的动物，西双版纳那么大，而且森林茂盛，即使大象离你只有几十米，如果没有人提醒你也是看不到的。

我们先去了野象谷公园停车场，看到门票要五十元，加之我们今天的日程安排得很紧，只在公园入口处转了一圈就走了。

离开野象谷去景洪时因不熟悉路，本应出园后右转的，而我们却左转打算从来路上高速公路。不到5分钟，突然听到有人大叫：“看，野象、野象！”我们下了车，果然看到有五六头野象在离公路三十几米远的树林中觅食，我们激动不已，忙着跑过去和大象合影。

二十分钟后，大象离开了我们的视线。当我们准备上高速公路时被告知走错了，只好返回。当我们再次路过刚才看到野象的地方时再也没了野象的影子。那些花了五十元门票兴致勃勃去野象谷看野象的人，却没有一个人有幸看到野象。

离开野象谷，我们直奔景洪。在景洪城转了一圈，游览了中科院热带花卉园，吃了经典的傣族餐后，我们就急着赶往橄榄坝。

橄榄坝是我早已向往的地方。据说那百听不厌的《有一个美丽的地方》这支歌，就是描绘橄榄坝的。

到了橄榄坝，却不免感得有些失望。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很普通的傣族寨子，街道、民房建筑都很一般，而且显得有些陈旧，街上行人不多。当我们来到“傣族园”时，看到门票要五十元一张，而入口处却冷冷清清，因此我们也就没有进去了。

这年因干旱，当地政府决定泼水节在不同的地方轮流进行。我们从橄榄坝重新返回景洪时，听说在漫听公园正在进行万人“赶摆”，我们就去了漫听公园。因天气太热（摄氏34度以上），公园内又人山人海，我们转了一圈就出来了。

当天我们还有一个行程安排，这就是去中科院植物园。当我们赶到地处漫仑的植物园时已是下午四点了。

中科院植物园位于一个叫葫芦岛的地方，占地一万多亩，园内有世界上热带地区几乎所有的植物。据开电瓶车的司机说，他叫得出名字的植物就有近万种。

因时间紧迫，我们只能走马观花地在园内转了一圈，离开时已是六点半了。

往回赶路时车子却出了毛病，刹车突然没有了。经停车检查，是驱动发电机、冷却风扇和刹车油泵的皮带掉了。皮带掉了，发电机、机油泵等都不工作了，自然就没了刹车，发动机水温也就迅速上升。车是不能继续走了，我们只好停下来修车。

皮带掉下来了，本来是个小问题，重新装上也就好了。可这辆皮卡车有点特殊：一根皮带带动五个皮带轮，还有两个“过轮”。我们试装了好长时间就是装不对。要么皮带长了剩下一大节，要么短了，怎么使力也装不上。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了，我们毫无办法。

我们只好上车走，边走边找修理店。因没了刹车，司机只能用一档慢慢地走。

约走了两公里，看见了灯光，发现路边有一个修理店。我们真像见到了救星，心想终于不至露宿在大山上了。

修理店里有灯有工具，比我们刚才在山上赤手空拳摸黑修车好多了。

但修理店的师傅也没有修过这种车，弄了好一阵，皮带还是没有装上。于是我们就“群策群力”一起干了起来。修理工和司机周良配合，反复试装皮带，而我和胡志飞则在地上“纸上谈兵”：将五个皮带轮和两个过轮画在地上，尝试皮带的各种走向、各种装法，就像搞数学中的“排列组合”一样。

一个小时后，皮带终于装上了。付了修理费，我们重新上路。回到思茅已是晚上十二点多了。

5月13日，胡志飞陪同元俭回昆明。

元俭4月9日来思茅，在思茅共住了一个月零四天。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过得很愉快，她很满意。

随着时间的过去和工程的进展，我们和建设方派出的甲方代表的矛盾越来越大，以致胡志飞再也不能忍受，提出辞职，不干了。

思茅自来水总厂派出的甲方代表是黄绍成、黄启明、李梅三人。

黄绍成毕业于云南建工学院，学的是城市规划，现是自来水总厂的党支部书记。李梅，中专毕业，是总公司组织科长。黄启明毕业于昆明工校（中专），学的是土木建筑，退休前是思茅水务局的高级工程师，和黄绍成是父子关系，现被自来水总厂聘为此工程的甲方代表。

黄启明工程师虽然年近七十，但身体健硕，是个实干家。也许因为长期在水利建筑工地劳作的原因吧，他衣着朴实，手里常拿着一把大砍刀，脚上穿一双解放鞋，在工地上到处转悠，像个农民老头。他每天都在工地，事无巨细，都亲历亲为，大家都很尊重他，尊称他“黄老”。

黄绍成和李梅则很少来工地，一个月也就是来两三次吧，因此，工地上认识他们的人很少。

作为监理，大家都知道要搞好工作必须尊重甲方代表，协调好和甲方的关系。我当然也不例外，尤其是对像黄工这种经验丰富、工作认真负责的人更应该尊重。

固执（甚至偏执）、经验主义、难以接受新鲜事物也许是很多老年人的通病。我和黄老之间的矛盾首先就是因他在技术和管理方式上的固执和经验主义导致的。

先举几个技术方面的例子：

1. 标高之争。当过建筑施工人员的人都知道“标准桩”对施工非常重要。因此，在施工队进场前，施工员最关心的就是建设方（甲方）指定的“标准桩”在什么地方。只有弄清了“标准桩”的坐标及海拔高度，才能确定待建建筑物的方位及 ± 0 （建筑物高度的测量基点）的位置。没有标准桩，连施工的第一步“放线”都无法进行，更谈不上后面的建筑施工了。

云建八公司的测量人员经过反复测量（从老厂到新厂），发现设计给出的“标准桩”的标高与实际测量的结果相差 1.83 米。

为了解决两者高差的问题，设计人员和监理的意见是：用简单的方法将两个测量系统折算成一个系统，施工中确保工艺相对标高。而建设方老黄却坚持：“工艺上按设计标高，其他保留实际标高”。

两种意见虽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但按老黄的意见就造成了整个工程没有了一个统一的标高基点，各单位工程和构筑物施工放线时，基础标高（ ± 0 ）只能由黄老临时指定，这给施工带来了很大麻烦。

2. 土方计算方式之争。开工后第一项大的施工项目是把一座小山推平。在如何计算土方量的问题上我们间又出现了矛盾。他坚持用他五十年代的测量和计算方法（这种方法他和我说过，但现在忘了），并要我们监理派专人实地跟随测量。我认为他的方法过于陈旧，费工费时，而且我们也无人可派。我坚持根据设计人员的按“等高线”加坐标加网格法，进行土方的核查和计算。我认为设计人员的方法快捷科学，而他则认为他的方法可靠实用。

在两种意见统一不了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各干各的，他继续每天去实地测量，而我则每月按设计提供的图纸核查施工方报来的土方量。他确实很辛苦，但结果证明他是白辛苦，在最终核准土方量时他不得不采用我的数据。

3. 输送管道安装之争。口径 DN1000 的大型水泥预制管拉到工地时，我要求卸车时承插口朝来水方向顺序摆放，而他则要求承插口顺着水流方向，正好和我的要求相反。不管我怎么用力学原理解释安装时承插口应该朝来水方向，但他就是听不进去，坚持承插口朝水流方向，说他们从来都是这样安装的。

水泥预制管是沿公路和河岸铺设的。因地形复杂，加之预制管体量

大，每节重一吨以上，安装搬运都必须依靠吊车。因此，安装成本很高。一旦返工，将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

我说服不了老黄。没有办法，我只能求助于预制管生产厂家，要求他们派工程师来现场指导。

厂家的人来了，说承插口必须朝来水方向。这时老黄才无话可说。

在施工管理方面，我们和黄老也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

在施工管理上，我的指导思想是：建设、施工、监理三方是合作关系，相互间是平等的，只有三方共同协作好，工程才能顺利进行。因此，我到思茅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起草了一个“建设、监理、施工三方共同章程”。这个章程规定了三方各自的权利、责任、义务及协调机制。根据建筑行业的实际情况及我个人做监理工作以来的经验，我认为落实这样的一个章程对顺利完成本工程是很重要的。但这个章程交给甲方后却如石沉大海，没有了踪影。建设方根本没有把它当回事。

建设方认为施工过程的一切都应是建设方说了算。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设计、施工、监理都是我们花钱请的，因此都必须听我们的。”

虽然建设方和监理方、施工方都签有合同，合同中建设、监理、施工三方是平等的，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完全不是这样。

如果他们说的都对那也就罢了。但他们却经常不按建设规程、规范及相关程序办事。

如开工以来，建设方提出的设计变更有几十个。大到建筑物方位变更、污水输送管口径变更（由 DN800 改为 DN1000）及管网铺设走向、围墙走向（地界）变更，小到对回填土的要求变更等。

按相关规范要求，凡设计变更都必须经监理审核并经设计方同意，签发“变更通知单”后才能生效。但建设方根本不理这一套，他们说了要变更就马上要求施工方去落实。对此，监理多次提出这不符合建设规范及相关法规要求，但毫无结果。

我们和老黄在施工管理方面的意见冲突还表现在施工进度和施工安全的关系上。老黄最关心的是进度，而我则更强调的是安全。

我曾对多个工程（包括本工程）的招、投标书进行过分析统计，发现安全施工措施费在投标报价中占有相当比例（30% ~ 60%，这都是相

关规范允许的)。但施工单位在实际操作中往往不按投标预算中的项目去落实。比如高空作业的防护架、防护网、安全通道，深坑（井）作业的防护支撑、挡墙、排水等，这些费用在预算中都有，但实际上这些安全措施都大大地打了折扣，有的甚至根本就没有投入。这也正是建筑承包商之所以大赚其钱、建筑行业事故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5月下旬的一天，我在巡视污水处理池工地时，发现我在工地例会上曾反复强调并下了整改通知的施工安全通道和池壁防护栏问题还没有落实，工人们还是踩着两根光滑的钢管上下五米深的污水处理池作业。于是我签发了“停工令”。但当“停工令”报到老黄那里时他却坚决反对，他同意要施工方整改，但不同意停工整改。为此事，我们再次发生了争执。

他是甲方代表，在当时的情况下，我还只能听从他的意见，“停工令”最终没有发出。

在施工过程中，我和老黄确实经常发生争执，有时还会弄得面红耳赤。但争执归争执，它并没有因此伤了我们之间的个人感情。通过几个月的接触，我对他的印象很不错，“很有些对脾气”。对他的那股“犟劲”甚至还有几分欣赏，几分赞许。

老黄对我也不错。他常转悠到监理办公室来，除谈工作上的事外，也谈些思茅人的闲情趣事，还经常从家里带些我没有吃过的，他老伴亲自做的思茅特有的咸菜来给我们解馋。

老黄和我老伴还是校友。他是六二届的，老伴是六八届的。他们虽从未谋面，但同是一个学校毕业的，自然也就有了几分亲切感。

就在老伴要离开思茅的头天晚上，他专门在酒店设宴为元俭饯行，还说要给我们一个惊喜。

当我们步入酒店包厢时，一个我不认识的满头白发、身材瘦削的老人起身朝我们迎了过来。听了老黄的介绍，我们才知道老人叫刁进德，傣族，云南临沧人，是元俭工校时的同班同学。

元俭和刁进德见面后都非常兴奋。元俭根本没有想到在思茅会见到近三十年没有见过的老同学。

在工校时，刁进德是铸四班的团支部书记，元俭是支部委员。毕业后他们又和另外3个工校同学一起分到曲靖云机五厂，现突然见面自然

有说不完的话。

临别时，我们都非常感谢老黄的安排和盛情。

话扯远了，言归正传。

上面说到我和老黄虽然为工作上的事经常发生争执，但我们之间的友谊却不但没有受到影响，反而逐渐加深了。

但与此同时，我和老黄的儿子黄绍成的矛盾却在不断增大。

我很看不惯黄绍成的一些做派。

首先，作为思茅自来水总厂的党支部书记、甲方首席代表的黄绍成，很少来工地现场。

他每次来都要带上对建筑施工一窍不通的李梅和一台时髦的笔记本电脑，在工地转一圈后就召集施工方的项目经理和监理开会。会上他很少听施工负责人和监理的汇报，有事也不与大家商量解决。他似乎对谁都不满意，总是一脸严肃。一开会就是对别人一通训斥，一副大老板的做派。

我曾和老黄谈起过对黄绍成的看法，希望他能劝劝他儿子，改改这些脱离群众的毛病。但老黄每次都是无可奈何地摇头说：“现在的一些年轻人都这样，完全不像我们这一代人了。他现四十老几了，十年前离了婚，虽经常和一些大姑娘小媳妇混在一起，但就是不结婚，到现在还是单身。”从老黄的谈话中可以看出，老黄对自己的儿子也很不满意。

6月1日上午十一点半黄绍成和李梅又来到工地。

这天，本来是要开监理工地例会的。但他来后说监理例会不开了，他要和监理、施工单位分别开会。

在和监理开的会上他提出：今后所有隐蔽工程检查验收都必须由监理通知甲方代表和市质检站的人员参加，否则验收无效。理由是该工程的质量最终认定权属于质检站。

对此，我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如果每一项隐蔽作业都要甲方代表和市质检站的人员参与验收，不但不现实，完全不可能做到，而且也没有必要。从我在昆明参与监理的所有工程看，市质检站几乎只是一个名义，它的存在并没有实际意义。除开工典礼和竣工验收派人参加外，其他时间根本见不着他们的人，你请他们来，他们也会用各种理由来推辞。

他们除按工程造价的一定比例收取费用外什么事也不会干。隐蔽作业是每天都会发生的，而且是大量的。如果每一项都要请市质检站的人来参与验收，不但不可能，而且这样还会严重影响施工进度。事实上，开工以来，我们曾多次电话请市质检站派人来验收，但他们一次也没有来。我的意见是：我们可以定期向市质检站通报工程进度，并希望他们随时来检查。至于他们是否来由他们决定。一般隐蔽工程的验收有甲方代表参与就行了。

参加会议的胡志飞表示完全赞同我的发言并和黄绍成发生了争执。

黄绍成完全不理睬我们的意见。最后他气呼呼地说：“如果你们做不到，那我们就只好换人了”。

胡志飞完全不能接受黄绍成无理和横蛮的态度。中饭后我正在睡午觉，突然感觉胡在做什么，睁眼看见他在收拾行李，要走。我立即起来劝慰，但他决意要走。我看劝不动他，就去甲方办公室，希望甲方出面劝劝。当我找到黄绍成和他说了胡志飞要走的情况后，他没好气地说：“他要走，这是你们的事情，我不管。”

胡志飞是我在这个工地上的唯一助手，他一走我又成光杆司令了，我还怎么工作？于是，我也就决定走。

自来水总厂法人代表王斌得知我们要走的消息后接连几次打电话给我，要我去他办公室谈谈情况。下午四点半，我到了他的办公室，说了事情的原委。我说了两点：一、我们难以适应甲方的管理；二、没有一个和谐的工作氛围，难以继续工作。王斌表示理解，但希望我们能留下来。晚上，王斌再次来到我们的住所，表达了同样的意愿，但我去意已定。

6月2日上午九点，朋友王和平送我们到思茅汽车站，我们乘十点的班车于下午四点回到昆明。

其实，我早在4月2日就向监理公司递交了辞职报告。之所以还没有走人，一是因为我负责的这个工程是普洱市的民心工程，我一走了之似乎于心不忍。二是思茅那帮朋友的热心挽留。他们一听说我要走都感到意外，并劝我不要走，留下来。再说，监理公司一直拖着不批准我的辞职报告，也许还会有转机。

之所以要辞职，主要原因不是因为和黄绍成的矛盾，而是因为对监

理公司任老板父子的严重不满，甚至愤怒。至于与黄绍成的矛盾只不过是到最后决定离开的诱因而已。

当时我的工作非常繁忙。胡志飞我安排他负责管网工程。他每天跟着施工人员在长达五公里的施工工地上奔波，早出晚归，日晒雨淋，已经非常辛苦。而新厂区这边的工程完全是我一个人负责。我既是总监，又是各项目的专业监理，还是安全员、资料员，每周要报周报，月底还要编制监理月报。每天都要审查各项目部报来的大量的各种资料、签认隐蔽工程、计算各项已完工程的工程量……

特别让我操心的是施工安全问题。施工方在安全上不愿意多投入，而工人们又基本上来自农村，缺乏安全教育，自身安全意识薄弱，甚至不知道什么叫危险。我总是生怕出事。当时真有点“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之感。

然而，监理公司老板却只顾收钱进账，对我们的工作不闻不问，更谈不上有什么关心了。我到思茅半年多了，公司从未派人来工地看望过。听说在此期间任老板曾两次来过思茅，但他却一次也没有来看一下为他挣了大钱的思茅工程监理部。

让我感到愤怒的是：监理公司投标时白纸黑字写着将派 11 位监理工程师到该工程，在和我签订监理协议时，也许诺最少要派 6 位专业监理工程师给我。然而，如果不是我在春节期间硬要来了一个胡志飞，我将一直都是单打独斗的光杆司令。

3 月上旬，我曾向公司递交了紧急报告，要求在 4 月 1 日前必须至少要再给我 3 个人，但报告递上去后如石沉大海，老板一直置之不理。

公司成立不到 6 年，老板赚了上千万，买了豪宅，高档汽车五六部。但对为他赚了钱的员工却是铁公鸡，几乎是一毛不拔。

思茅污水处理厂二期及管网工程国家投资五千多万，监理费少说也有两百万。但我们作为这一工程的项目监理部，公司除为我们配备了电脑和打印机外，竟不给一分钱的办公费。经多次申请，后来才勉强给了我们每月一百元，超过的要自掏腰包。

早在上学的时候，从书本和课堂上我们就知道了“资本”这东西是残酷的，特别是在“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对此，现在我们是真真切切

切地体验到了。

面对这种既贪婪又吝啬的老板，像我这种性格，且信奉毛泽东思想的人，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所能做的就是辞职，不给他干了。

回到昆明的第二天，我写了述职报告。

在述职报告中，我简述了我在思茅半年多来的工作情况、坚决辞职的原因及对继任者的希望。

6月3日上午，我将述职报告和思茅工程项目监理部的公章一并交给了老板任永春。

在我们离开思茅的当天，建设方的电话就已打到了监理公司。当我走进公司时，各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正在议论我离职的事。看到我进来，他们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有的表示惊奇，有的表示赞许，也有人表示疑虑。

我与监理部总工丘丽聊了一会后走进里间任总的办公室。任总正在看文件，我将述职报告放在他的桌上。他示意我坐下。

他还是像我前几次见到他时的那种模样：一脸严肃。据常在公司上班的人说，他对公司所有他的下属都是这样。

我给自己泡了一杯茶，坐在沙发上慢慢地品着，静等他的反应。

他看完了我的述职报告后站起来走到我的对面坐了下来。

他说：你的辞职在公司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看到你是一个老同志的分上，我也不说别的了。如果换成一个年青人，情况就不一样了。你在述职报告中提出的问题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没有什么，也可以说很正常。我们监理公司是服务机构，本来就应该是听人家建设单位的。我们监理只管质量和安全，其他诸如投资、进度等都不要管。对于甲方的错误更不要去管。人家出了钱请你，你只要为他搞好服务就行了，拿人钱财为人消灾嘛。

接着他说：不是不给你人，是无人可给你。公司现监理着十几个工程，每个监理部都缺人，都在向我要人，像你这样一个人负责一个工程的就有五六处。

我原想他一定会对我大发雷霆的，我也想好了应对的办法，准备和他硬碰硬地干一场。没想到他今天说话竟软了下来。

但他说到胡志飞时却原形毕露了。他说胡志飞是大街上的流氓，像下贱的妓女。什么难听的话都骂出来了。他认定我这次辞职就是胡志飞挑拨的。他发誓说要让胡志飞三年内在昆明找不到一个工作，说他有办法让全昆明所有的监理公司都不要胡志飞。

对此我感到气愤，我为胡志飞辩护。我说胡志飞是个老实勤恳的好人。没想到他竟没有和我争论。

他要我下午两点后来公司监理部开个会，商量我辞职后的善后问题。我同意了。因为不管怎样，任永春是任永春，思茅工程是思茅工程，两者不是一回事。我不能因为对任永春或黄绍成有意见而影响了思茅人民的“民心工程”的正常进行。

下午两点，我按时到了建安监理公司。总工丘丽和公司监理部的有关人员正等着我。我们一起讨论有关思茅工程监理的交接问题。丘丽说任总已决定由邱平来接替我的工作。

两点半邱平来了。他说昆明商学院金桥工程的工作还没有最后完（他在那里任总监），甲方只同意他一个星期的假。经过丘丽的协调，最后决定我在思茅再坚持一个月，等邱平这边的事了结了，我就将总监的工作移交给他。在此期间，公司保证一个星期内再派两个人去思茅协助我工作。

6月8日，我和邱平乘夜班车到达思茅。

9日，我带邱平分别见了自来水总厂的法人代表王斌、书记黄绍成，通知他们邱将接替我总监的工作。

10、11日两天，我带邱平查看建筑工地并介绍相关情况，并把他介绍给了参与施工的各项目部负责人。

12日，邱平返回昆明。我一个人继续履行总监的工作。

28日，公司派来了专业监理工程师兰飞，但邱平并没有来。29日，我电话通知丘丽我将按约定坚持到月底，如到月底新的总监还没有来，我将自行回昆。

7月3日邱平来到了思茅。

4日，我和邱平办理了移交，双方在移交书上签了名。

7月5日上午，我乘思茅至昆明的班车回到昆明。

我人虽回到了昆明，但我对思茅工程总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担忧。因为通过和兰飞、邱平短暂的接触，我对这两个人实在很不放心。在7月8日的日记中我写下了如下文字：

7月8日（星期三） 天气：多云 26°C

邱、兰能行吗？

水电建安监理公司新派去思茅项目部的两个人，一个是兰飞，一个是邱平。兰飞6月28日到思茅，邱平7月3日到思茅。对这两个人我一点也不放心。

兰飞：37岁，出生在昆明。父亲是湖南长沙人，军人，解放前夕到昆明。兰飞也当过兵（对越南反击战时在贵州遵义，空军地勤）。

他复员时分配在昆明塑料二厂工作。但没有干几天，他就下了海，这些年来，他一直在打“浪战”。凭关系，他先在市节水办待过一段时间。后来自己买了一辆车，开起了出租车。但还不到一年就因不赚钱而将车卖了。卖车后他干起了为汽车销售商卸车的营生（将汽车从火车上开下来再送走），也干不长，赚钱来得太慢。于是就和一帮人开起了“场子”（赌场）。

我和兰飞相处了不到一个月。每当他说到“开场子”的事都会非常兴奋。据他说，在昆明开赌场的人他都认识。昆明附近他都去开过场子，小河、普吉是他常去的地方。开赌场他赚了不少钱，买了房子、车子（两辆高档车），但也“乱糟”（乱花）了不少。

据他说：开场子必须和当地派出所取得联系，出钱（每天500—1000）买保护，他和城郊的派出所都熟，有一次被警察抓了，一个电话打到公安局，局长秘书就把他给领出来了。

兰的大哥原在市政府保卫处车队当队长，后来当了市长秘书。1983年后开始买车搞运输，赚了不少钱。大嫂在玉溪卷烟厂工作，大嫂家和玉溪卷烟厂的一个副厂长关系密切（此人现是玉溪鼎鼎大名的一个公司的董事长）。

兰的妻子现在昆明市社保局工作，他这次来监理公司就是通过监理公司办社保的杨艳的关系进来的。兰并没有正式搞过监理工作。

在和兰的接触中，他谈得最多的是开场子的事，他对做监理不在行，

也毫无兴趣。他最大的兴趣还是开场子。

他说：“走正道赚钱不行，赚钱一定要走歪门邪道才行。”

邱平也是一个开过场子的人。他对赌场的那一套轻车熟路。只是据他说他早已“改邪归正”了。

邱是昆明宜良人，45岁，华南工学院毕业，学的是建筑。毕业后分在省建六公司，干了两年后就回家不干了。后来在昆明水电勘察设计院干了几年，在此期间他去西康干了三年监理，回来后去了俊发房地产，并在这里结识了云南的“太子党”。据他说普朝柱、尹俊、李嘉廷这些省市主要领导儿子们平时都在一起，并以大哥、二哥、三哥排序相称。俊发地产后来因李嘉廷事发受到牵连，但并没有垮，而且现在越做越大了。邱是李嘉廷事发后离开俊发地产的。

邱这次连续做监理有三年多了，前年3月他来到这个建安监理公司。

对兰、邱这两个人我真不放心。因为他们不可能尽职尽责地工作。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你越是担心的事越是容易发生。就在我离开思茅后的第十天，噩耗传来了：在拆除一钢屋架时，屋架突然倒塌，造成杨柏兄弟俩一死一重伤的严重事故。

我认识杨柏兄弟俩。云南大理人，焊工。他们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工。他们常把电焊机、气焊设施放在我们监理厨房外的场地上，用以加工一些混凝土预埋件。兄弟俩都很腼腆，每当我们邀请他们和我们一起吃饭时，我们明知道他们还没有吃，但他们总是说已经吃过了。

哥哥杨柏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他才三十出头。弟弟也将永远失去劳动能力和做人应有的尊严。对此，我感到非常难过和惋惜。

当我听到这兄弟俩的消息时我曾自责过。认为如果我再忍耐一下，坚持留下来不离开工地，这种事也许是不会发生的。因为只要我在监理的岗位上，根据监理规范的要求，我就一定会在钢屋架拆除前要求施工方制定切实可行的安全方案。因为钢屋架拆除是典型的“危险源”。拆除时我也一定会在现场监督落实。

这是一起典型的严重安全责任事故。但最后的处理结果却让人感到心寒：施工方给了死者杨柏家属30万死亡赔偿金，给弟弟报销医药费了事。作为事故责任方之一的监理公司，既没有按规定上报主管部门（按

规定是要报的），也没有对相关责任人作任何处理，更没有对死者家属表示过任何安慰，没有给一分钱的抚恤金，声称此事故完全与监理无关。

我在为死者感到悲哀的同时也对老板们的无情、冷血感到愤慨，更加觉得我的辞职是对的。老板们既然是这样的冷酷无情，我们为什么还要为他卖力不造反呢？

令人遗憾的是，在现实中还有很多人在明知老板冷血、贪婪、吝啬的情况下，为了吃一口饭、分一勺羹还要拼命为老板们服务，为老板们残酷剥削自己和同事辩护，完全不顾及自己的人格和尊严。

丘丽就是我身边这种人的一个典型。

我和丘丽的认识纯属偶然。云南中烟综合楼工程竣工验收后的一天，我去云南监协监理公司，准备把一直存放在该公司的监理工程师执业证拿回来。当我来到老总办公室时，工作人员说老总在总工室。于是我就去了总工室。一位女同志接待了我。她很热情，倒水泡茶后，她自我介绍说她叫丘丽，是公司的总工，问我找老总有什么事。我说了来意后，她说老总刚出去办事去了，要我下午再来看看。

我刚要起身离开，丘丽把我留住了。她问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退休前在什么单位工作，我简要地作了回答。

当她听说我曾在铁路建设公司工作过后，问我是否认识一个叫杨富满的人。当我说不但认识而且很熟时，她显得有些兴奋，话匣子也就一下子打开了。

她告诉我她毕业于重庆建工学院，是六五级的。杨富满和她丈夫是一个班的同学。一起毕业分配到昆明后，她和丈夫分到了昆明铁路局，而杨富满则分配到了铁路建设公司。两家的关系一直很好，常来往。说着就给杨富满挂了电话，告诉杨我现就在她的办公室。

接通电话后我和杨富满自然都很兴奋。三十年没有见面了，真有很多要说的话。

杨富满是1970年和我一起分来铁路建设公司汽车机械修配厂的。当时他被安排在底盘班，我在牙箱班。两个班离得很近，又因都是学校分来的，有同样的经历，我们自然也就有共同的语言，个人关系也就很好。两年后，公司重新分配1970年来的这批大学生，他被分配到工程二处去

了。不过，他还是经常来修配厂找我聊天。

我和杨富满通完电话后，丘丽问我是否愿意和她一起合作接下昆明铁路局的一个高层商住楼工程，说如果我愿意，她就把这个工程的监理工作承包下来，她去兼总监，我去任总监代表。

她说这个工程的监理合同是她通过她在铁路局的关系签下来的，原计划让李天亮去任总监，李也答应了。但后来李被另一个公司给“挖”走了，这个工程的总监现还没有着落，公司老总正为此着急。

云南中烟综合楼工程验收后我正闲着。于是，我就答应了与她合作接下这个工程的监理任务。

昆明铁路局临江里高层商住楼工程于2008年9月30日开工，2009年10月竣工验收。我们顺利地完成了该项工程的监理工作。

通过和丘丽一年的合作，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觉得她这个人的活动能力不错，但虚荣心太强，不宜合作共事。

她对领导总是唯唯诺诺，毕恭毕敬。而与同事相处，特别是对下属，她却架子十足，显得太强势，施工方对她总是敬而远之，背地里叫她“马列主义老太太”。

说她虚荣心强绝不是冤枉她。比如她对电脑可以说是一窍不通，连最基本的打字都不会。但当人们说到电脑时，她总要说她是昆明市第一批学习电脑的，电脑还是“286”的时候她就开始学了。

又如她经常在办公室吹她在铁路局房管处当处长时搞了些什么设计，当着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侃微积分、力学。但当我问到一些具体的问题时，她往往又答不上来。我曾经在“工大”教过工程力学，也曾编过职工业余教育用的《工程实用力学》教材。我提出的问题她答不上来，本也没有什么，也可以说很正常。但她在我面前总要摆出一副“知识渊博”的样子，心里总觉得她太爱虚荣了。

我认为不宜与她这样的人合作共事。因此，在临江里工程结束以后，我没有和她打个招呼就去了建安水电工程建设监理公司。

谁知当我和水电建设监理公司签订监理合同时，却发现她已是该公司监理部的总工程师了。这让我感到很吃惊，觉得昆明实在是太小了，竟然一转身又和她见面了。好在她在昆明公司机关上班，我在思茅工地，

相离四百多公里，可以做到井水不犯河水。

她对我离职回昆一事很不高兴。因为她曾在老总面前多次夸过我，说我是个人才，工作能力强，又有实干精神。现在我竟然辞职了，炒了老板的鱿鱼，认为我这是让她难堪，打了她的脸。

7月下旬，丘丽以公司监理部总工的名义去思茅处理工地严重安全事故问题。她回昆后，监理公司立即就有了一些有关我的负面传闻。说我在思茅期间甲方对我的工作意见很大，说我离职时删除了电脑中的监理资料给继任者造成困难，说我随意签认施工方的土方量，给甲方造成了经济损失等等。

为了澄清这些传言，8月12日我再次到了思茅。第二天，我当着他们两人的面打开电脑，事实证明他们所说的所谓被删除的资料全部都在电脑里，一个也不少。

令我不解的是：邱平是九十年代毕业的大学生，毕业后他又返回学校学了一年的电脑，应该说他对电脑应该是很熟悉的，没想到他对电脑、对CAD制图软件竟然如此无知。

下午，在我的要求下，老黄召开了一个会，会上老黄也当着邱平的面给我澄清了公司传言中的相关问题。

8月27日，我去公司领工资。任总要我第二天下午去财务结账，并说工资、保证金、车旅费等一起结清。

但当我第二天如约去领工资并结账时却遭拒绝。理由是：老总说我和邱平的移交不算数，要等思茅问题完全解决后才能补发我的工资和报销车旅费。

8月31日，我去找任总，他不在。于是，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并用电子邮件发给了监理部。信是这样写的：

任总：

我们曾因工作有过两次谈话。但两次谈话都使我不愉快。因当时你是老板，我是小工。你让我不愉快在你看来也许是正常的。现在我已辞职，虽不是公司员工了，但我还是担心你仍以老板和员工的谈话方式来和我谈话，再弄个不愉快。因此，我现在只好用电子邮件的方式和你就公司最近的传闻谈谈我的看法和要求了。

一、对思茅工程监理的自我评价：在我任职的七个月中，工地没有出现大的质量和安全事故；和甲方、施工方的关系基本可以，总的情况应该说是好的、正常的。

二、关于几个问题的说明

1. 关于删除电脑中的资料问题

这个问题本不用说了。但此事现在在公司闹得沸沸扬扬，所以我还是想说明一下。7月13日，我当着邱平、兰飞的面打开电脑时，电脑中该有的一切资料都在，没有任何文档被删除。至于CAD和Photoshop等工程制图及图像处理软件之所以被卸载，是因为兰飞说他们不会用，为了不影响电脑速度，是我当着兰的面给卸载的。这里要说明的是：这两个软件并没有从电脑中删除，它存放在D盘中，会电脑的人只要点一下“安装”就可以了。因此，不会用电脑的丘丽说我删除了电脑中资料的问题是根本不存在的。

2. 关于说甲方对我意见很大的问题

我想“意见大”是不至于的。因为作为甲方法人代表的王斌是我的朋友。你和他是生意关系，而我和他是布衣之交。他是我思茅朋友的邻居、学生和朋友。通过几个月来和王的交往，我和王斌也成了朋友。他的家庭、社会关系及他的性格、为人等我自然比你了解得多。因此要说王斌对我有意见并转告给了你们是不可想象的。当然，本工程的甲方代表中个人也可能对我有意见，但不会是什么大的意见，因为我并没有做错什么。

3. 关于我擅自辞职回昆的问题

说我“擅自辞职”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因为我早在4月7日就给你写了辞职报告，是有言在先的。根据我和公司签订的协议，我提前了近两个月就通知了公司，我是履行了协议的。要说有错也是公司的错。

当公司要求我再坚持一个月的时候，我从大局出发又回到了思茅。当我和邱平办了交接手续后，公司再次要求我去处理7月1号前的一些问题，尽管我当时不情愿，但我还是去了，这应该说我是一个负责任的人，是一个顾全大局的人了吧。

4. 关于核签的资料问题

丘丽反复强调的所谓平地土方量和“进水头部”土方量的问题，事

实上这并非我的问题。因为这两项我早就签发并报给了甲方，只是甲方迟迟没有返还给我们，这一点邱平应该是清楚的。至于说我签认的量远大于甲方认可的量更是没有根据。因为平地土方量我是根据三方在会议上确认的量签的，不存在我签的量大于甲方认可的量。至于“进水头部”的土方量，我签的比甲方代表签认的少900多方，怎么能说我签的比甲方的多很多呢？

5. 关于我7月份算不算上班的问题

首先，我7月份是受公司的派遣去思茅的（有《纪要》为证），我去了，而且完成了公司指定的任务。

丘丽说我7月份不能算是上班，我想这未免太过分了。

8月27日，你曾当面要我第二天下午去财务结账，并说工资、保证金、车旅费等一起结清。但当我第二天如约去领工资并结账时却遭拒绝。直到今天，公司在无任何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仍拖欠我的工资和保证金等。

作为曾经的公司一员，尽管我对公司的某些做法不满意，甚至愤怒，但我至今仍从大局出发，尽量维护公司的利益和信誉。我一直尽力克制自己，尽量争取协商解决和公司业已存在的矛盾，我深知和为贵的重要。何况昆明是如此之小，不知什么时候我们又会见面，何必不做朋友要做仇人呢？

我认为就思茅工程来说，公司目前最重要的是处理好我移交工作后不到一个月所发生的重大安全事故，而不是去想如何继续拖欠我的工资。公司个别人说在这一重大事故中监理没有任何责任，且不检查，不报告，并支持施工方“用钱来摆平”，这是非常错误的。纸能包住火？更何况国家有明确的法律法规放在那里！

对杨柏兄弟俩一死一重伤的重大安全事故，监理部果真没有任何责任吗？明知钢屋架的拆除是重大的危险源，监理部做了什么？

每当我看到杨柏兄弟和钢屋架倒塌的现场照片，除对杨家兄弟感到惋惜外，更感到监理工作的责任重大。同时觉得自己曾如履薄冰、提心吊胆地为确保施工安全的付出是非常值得的。

我认为公司起码应通过这一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总结教训，提高监理人员的安全意识。这对公司、对所有监理人员都是非常重要的。

这也许扯远了，但这确实是我的心里话。

我要求公司在9月10日前支付拖欠我的工资、退还我的保证金、报销车旅费等。和为贵，我十分愿意协商解决问题。如果不能如愿，为了自己的尊严和权益，我也只好面对现实，积极应对。

请回复。

张建华

2010.8.31

也许是因为我的信是用电子邮件发给监理部一个网名为“大力水手”的人请他转的，在公司监理部造成了很大影响，也许此前我和昆明都市时报的记者有过联系，记者登门造访过老板，这个经常对下属吆五喝六、不可一世的老板，终于在三天后老老实实地如数补发了拖欠的工资，退还了我的保证金，还报销了我辞职后多次往返思茅、昆明的全部车旅费。

看来，老板对报纸、网络舆论还是很在乎的。

邱平、兰飞如我所料，在我辞职后还不到三个月也就先后辞职了。他们既担不起这副担子，也吃不了那个苦。

丘丽则在三个月后被老板炒了鱿鱼。她虽然对老板“尽职尽责”，但她终究因为长期待在机关，干不了实事而被老板辞退了。老板是不会要干不了实事、光会玩嘴皮的人的。

本来2011年初就应该竣工验收的思茅污水处理厂二期及管网工程拖到2013年初才竣工验收。拖了两年，任老板的收入自然也就大打了折扣。

我辞了思茅的总监工作后不想再打工了，准备写回忆录。

2011年3月3日，也不知道甘红是怎么通过张开发师傅知道我赋闲在家的（张师傅是我在监理昆铁临江里工程时的同事），她约我见面，说她已承包了河北远大咨询监理公司中标的“昆明三德实木门窗厂海口生产基地工程”，要我去当“总监代表”，时间是四个月（3~7月）。我当时很犹豫，没有马上答应，只是说先让我考虑考虑再答复。

当时之所以犹豫，是因为觉得自己已是“奔7”的人，剩下的日子不会太多了，应该在自己还耳聪目明的时候集中精力写回忆录，给后人留下点什么才是正事。但另一方面，经济问题却很现实地存在。当时我的退休工资只有580元，老伴的退休工资比我多一点，但两人的加起来，

也只剩一千二百多元。虽说吃饭的钱是没有问题的，但物价飞涨，老伴又患有心血管病和静脉曲张的毛病，近一年来曾多次住院，这点退休工资就不够用了。再说谁能保证我就不生病呢？一旦我也生病了怎么办？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总得有一点存款吧。

生存问题永远是头等大事。考虑再三，我答应了甘红的邀请。

第二天上午，我在甘红的陪同下去见了三德公司的金希龙副总经理。下午，金副总开车送我去海口看了工地。

三德实木公司是家私有企业。老板赚了钱后已移居美国。公司现由他聘请的经理王志军和他在昆明的一个姐姐打理。

三德公司的生产基地建在海口工业园区，占地 30 亩，包括一栋三层办公楼、一栋五层单身职工宿舍、两栋钢混结构的综合生产车间及附属建筑，总建筑面积两万多平方米。

昆明海口工业园区离海口镇 12 公里。从昆明到海口镇有远郊公交班车，但由海口镇到工业园区就没有公共汽车了，出入只能乘坐当地的“土的”。

3 月 5 日上午，我和甘红两人一起去穿金路口刻了一枚“河北远大工程咨询监理公司三德实木门窗公司海口基地监理部”的公章。下午，我们就监理部的相关事宜进行了协调，甘红代表河北远大咨询监理公司云南分公司和我签订了监理合同。

根据合同，我将出任三德实木门窗公司海口生产基地工程总监代表，月薪 4000 元。因咨询监理公司和建设方签订的合同为服务四个月（2011 年 3 月～7 月），因此，我和甘红的合同时间也定为四个月。当时约定，如四个月工程仍未完工，则由我和建设方另行约定，到时工资由甲方支付。

3 月 10 日，甘红开车将我的行李搬去了海口工业园三德公司生产基地。此后，我就住在由施工方提供的住所，每周乘昆明远郊班车回昆明一次。

因昆明海口工业园是政府仓促搞起来的，我们进驻工地时，施工最基本的条件——水、电、路“三通”都不能满足要求。施工用水只能靠消防车去海口镇拉，勉强可以应付。用电的问题我们去找工业园管委会，

管委会答应由他们去协调解决。最后，邻近的一个单位同意我们从他们的配电房拉一股临时线到工地，条件是：“负荷不能超过 100 A，而且只能是晚上用电”。

水、电问题严重地影响了施工进度。

6 月底，河北远大咨询公司与三德公司的监理合同到期。甘红希望我去接手昆阳的另一工程，我没有同意，因为这一工程还没有完工。我想还是应该有始有终，把一个未完的工程交给别人不合适。

三德公司和我达成协议：三德公司在和远大工程咨询监理公司合同 6 月底到期后，三德公司继续聘请我担任总监代表，“聘用期从 2011 年 7 月 1 日起到本工程竣工资料通过验收止”。工资由原来的 4000 元降为 3000 元，由甲方直接支付。

协议明确我的职责“主要是监督施工单位按规范要求做好竣工资料的编制”。

我之所以同意签订这一协议，一是因为主体工程已完工，二是协议明确我不必每天到工地上班，施工资料可在家里编制。这就为我准备写回忆录创造了条件。

三德海口生产基地工程于 2012 年春节前完成终验交付使用。之后，考虑到自己已年近七十，不宜再到处奔波，昆明市区以外的工程监理我就不再接了。

2014 年 1 月 2 日，我已年满 70，我的打工生涯就此结束，我的回忆录《风雨七十年》的写作也就随之正式开始。

从 1993 年开始到 2013 年，我打了整整二十年的工。

在这二十年中，因工作性质的原因，我有机会接触了不少政府官员、国企老总、大小私企老板，也参与过打官司，接触过法官和律师。当然，接触得最多的是农民工。

在这二十年中，我在看到一大批私有企业在政府的扶持下“突飞猛进”的同时，也看到了大批国有企业在国家金融政策的制约下迅速衰败的过程。在看到一批批“权贵”、“土豪”一夜暴富的同时，也看到了以千万计的国企下岗职工及农民工的艰辛和无助。

在这二十年中，我在看到人们为中国 GDP 成为全球第二而欢欣鼓

改开篇

舞的同时，也看到了人们在失去信仰、丢掉情操后，“世人熙熙皆为名来，世人攘攘皆为利往”的现实。

所幸已有更多的人通过前后两个 30 年正反两方面的比较和思考，已经重新找回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正在回归中华大地。

我对中华民族的复兴充满信心。

拾 贝 集

自 序

写回忆录少不了要查看自己的日记。我在写作《风雨七十年》的过程中发现我的日记里留下了不少自己写的诗。

看到这些自己几十年来有感而发写成的东西甚为高兴。因为它比较准确地记录了我不同时期的思想和情感。它不仅记录了我一生的追求、奋斗和伤痛，同时也记录了我晚年的恬淡生活和对世事的感悟。可以说，它就是浓缩了的自传。

综观我几十年来写的诗，其中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诗大多贯穿着四个字：“拼搏”“抗争”。为理想而拼搏，为国家民族的复兴而拼搏，为正义而抗争，为不平而抗争，为命运而抗争。我的拼搏和抗争虽无大的建树，但我无怨无悔，并以此为荣，为此自豪。

而九十年代后写的诗则多为人生感悟和享受人生。这一时期我虽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但我无欲无嗔，过得也还算逍遥。

《风雨七十年》完稿后我总觉得还差点什么。一天，突然想到：何不将自己散落在日记中的诗整理一下也留给社会呢？

但问题是：我写的这些形式上是旧体诗的东西能算是“诗”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从书架上找到了一本席金友先生编著的《诗词基本知识》。看过以后才知道，我以前写的这些“诗”，多数其实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近体诗！说它是古体诗可能还勉强可以。

读了《诗词基本知识》后，对诗的押韵、平仄、对仗等有了一定的了解。但细看之下总觉得作近体诗的框框太多，要求也太复杂，令人真不好学。律诗对形式的要求苛刻，简直就是杀威棒，使人不敢轻举妄动地写什么诗了。

诗是作者内心情感的倾泄，意志的表达（即所谓“诗言志”也）。我认为：如果过分拘泥律诗的条条框框，必然限制作者情感的自由发挥和意志的表达。

其实，中国古体诗并没有那么多限制，既没有平仄的要求，更没有

律诗的对仗、粘对等等要求。近代一些影响较大的近体诗也没有严格遵循格律的要求和限制。

时代发展了，如果非要拿这些写律诗的条条框框来要求、评价旧体诗的写作及其质量，无异于宣布在中国文化中占有极为重要地位的诗歌的死刑，就像八股文因完全脱离现实需要而死亡一样。另一方面，由于时代的发展，人们更崇尚自由、简单、明了，不会花过多时间去理解、体会。如果旧体诗没有人写了，没有人读了，那不就是传统诗歌的死亡吗？

当然，适当的条条框框是必要的。否则，那也就无所谓中国的诗了。我以为：诗要押韵，文字要精炼、通俗，容易上口，内容要有格调、有意境。只要做到了这几点，就应该算是一首好诗了。

我认为我写的这些东西可以认为是诗。我将整理出来的这些诗集中起来并命名为《拾贝集》，这是因为在我看来，它就像我漫漫人生中大海边、在荒漠里捡到的粒粒贝壳，它们虽很粗糙，也很平凡，但它却闪现着岁月的痕迹，值得我细细地玩味。

今天的人们，特别是年青人都在追求自己的价值。但什么是人生的真正价值呢？人的生命有长有短，但就历史长河来说，它们都是短暂的。一个人所能积累的财富不管有多大，但它和整个人类财富比起来却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我以为，衡量人生的价值不能以其寿命的长短来计，也不能以其所聚集的财富来计，而应该以其一生中是否有闪光点及闪光的强弱、长短来衡量。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那怕一生中只有一次短暂的闪光，也是有价值的。正如我在《寄影书》一诗中所说：“人生有何求？陨石一瞬间。”在我看来，人生只要有像陨石那样一闪而过的光辉就足可告慰平生了。我几十年来的拼搏和抗争，为的其实就是有那么一瞬。

2017年12月于昆明

目 录

- 自 勉（1961年8月）
望笔架山（1961年10月）
致友人（1963年3月）
读《粉妆楼》有感（1963年10月）
诗两首（1966年11月）
情趣（1967年4月）
三湘行（1968年8月）
随感（1968年8月）
红旗怨（1968年8月）
访友（1969年2月）
松梅本色（1970年8月）
寄影书（1971年10月）
登庐山（1975年6月）
访母校——华中工学院（1975年6月）
杂感（1980年10月）
免职（1981年11月）
自勉（1981年12月）
潮流（1982年11月）
迎春（1983年12月）
小桥和白云（1992年7月）
咏莲（2011年8月）
逍遥游（2011年11月）
致网友（2012年1月）
乡音不改（2012年5月）
同学聚会（2012年5月）
题御笔峰（2012年5月）

自勉

1961年8月

不求富贵不图侯，不想红颜太风流。
只要为国争口气，平生自愿第一筹。

题笔架山

1961年10月

窗外一岭生三峰，昂然若剑插云中。
想他胸怀不凡志，敢将锋芒示天公。

注：笔架山位于湖南宁远县城郊，离原宁远三中约一公里。笔架山又名猪头山，因采石多年，现已面目全非，令人叹惜。

致友人

1963年3月

爱情岂寻常，要经风和霜。
轻言爱情者，月下看《西厢》。

读《粉妆楼》有感

1963年10月于宁远

读书有几篓，最好《粉妆楼》。
君昏就该反，粪土万户侯。

诗两首

——有感于《湖北日报》被封

1966年11月

(一)

滔滔扬子江，巍巍红旗楼。
英雄驱虎豹，为民争自由。

(二)

昔闻江汉报社楼，只见铁窗只见儒。
今日工农登大雅，红旗漫卷楚天舒。

情趣

1967年4月

大江留不住，滚滚向东去。
回首浪滔天，天高何所惧。
热血奔腾急，飞马不停蹄。
此行欲何往？险峰白云处。

三湘行

1968年8月于湖南宁乡

我乘天马游三湘，稻浪千重万里香。
四水相迎挥玉带，群山竞起舞翩跹。
扮谷声声村家乐，牧笛阵阵伴夕烟。
催马扬鞭月宫去，携手嫦娥回人间。

注：天马山位于湖南宁乡境内。1968年8月，我们在湖南调查时曾在天马山下的油草铺村停留了四天。

随感

1968年8月于湖南双峰

山外青山峰外峰，农家点点垂半空。
千古英雄今何在？原来尽在稻浪中。

注：湘西多山，农舍多建于山腰或山顶。入夜，山峦模糊，灯光点点与群星相连，天地难分。

红旗怨

1968年8月于长沙

四水映红旗，波涛行更急。
洞庭同庆贺，余波亦未息。

注：从武汉到达湖南时，正值湖南各派大联合，形势相对稳定，但各政治派别之间的明争暗斗仍在激烈地进行着。

访友

1969年2月于武汉华中工学院

朔风催门紧，万里飞雪急。
束衣访故友，惊醒窗前梅。

松梅本色

1970年8月于湖北咸宁马桥

雷劈青松松更翠，雪压冬梅梅更红。
松梅本色皆如此，堪笑檐下可怜虫。

注：1970年8月，同学们均离开了咸宁走上了工作岗位。而我仍在湖北咸宁马桥的“院学习班”接受“审查”。夜深了，“你不签字就别想离开马桥”的呵斥声仍不绝于耳。几个月来的车轮战使我身心倍受煎熬，故作此句以自勉。

寄影书

1971年10月于昆明长坡

孤雁落云岭，只身栖长坡^①。
举目无亲友，四顾少知音。
瑟瑟风作伴，淅淅雨有声。
仰首望长空，浮想联翩翩：
少年乘竹马，意气高山巅。
继而读功课，奋发泠江^②边。
求学到武汉，击浪扬子江。
歃血立重誓，定为国争光。

文化大革命，舍身狂浪间。
国难我心焦，挥笔斥贼奸。
冒险花明楼，徒步走三湘。
龟蛇^③可作证，肝胆洒江天。
呜呼小丑俏，数载人妖颠。
咸宁^④景还在，长坡亦心酸。
忠良多厄运，古今所难免。
自问心无愧，宁折决不弯。
笑对车轮战，松柏傲冰霜。
人生有何求？陨石一瞬间。
天地有正气，富贵如云烟。
悠悠我心悲，猛虎落平阳。
茫茫何所之？束手滇池畔。

注：①长坡：地名，位于昆明西郊。

②泠江：河名，在湖南宁远县境内，湘江支流。

③龟蛇：武汉市龟山和蛇山。

④咸宁：即湖北省咸宁县。

登庐山

1975年6月于江西九江

人道登天难上难，而今举足上九天。
信步飞桥觅太祖，仙人洞内访群仙。
龙池水浅戏游鱼，五老峰高话沧桑。
寄语长江万里浪，白云深处可耕田？

注：飞桥、仙人洞、龙池、五老峰均为庐山有典故的风景点。庐山的5月是绝好的季节。雨后的庐山清新爽人，五老峰上杜鹃花怒放，置身其中，有如进入花的世界。含鄱口吞云纳海，云雾时涌时退，气势磅礴，变化万千，极为壮观。

访母校——华中工学院

1975年6月于武汉华中工学院

人迁事过面目非，相见无言泪先垂。
峥嵘岁月成过去，是非功过诉与谁？

杂感

1980年10月于昆明长坡

风雨三十秋，沉渣浊江流。
我君一场梦，天翻地倾覆。
民意不可欺，人心岂能侮？
山洪到来时，枯朽自飘浮。

免职

1981年11月于昆明长坡

丢去芝麻官，卸却千斤担。
移居白云间，我今得休养。
莫怨天和地，中华已在变。
待到霹雳时，笑看铺天浪。

自勉

1981年12月于昆明长坡

中华振兴多坎坷，男儿有志贵在搏。
扪心无愧对天地，是非功过任评说。

潮流

1982年11月于昆明长坡

佼佼者被栓，
奄奄者举鞭，
弥留者发出无声的命令。
空气早已凝结，

大地死一般沉寂。
太阳升起来，又落下了，
山河如故：月圆月缺。
啊，别忘了：
历史车轮谁能阻挡？
蓄之愈久，
爆发愈烈！

迎 春

1983年12月于昆明长坡
枯树绽新蕾，残雪锁旧枝。
花开映日月，严冰能几时？

小桥和白云

1992年7月于昆明
小桥伴流水，白云恋青山。
相依坦荡荡，自然即是缘。

咏 莲

2011年8月于昆明
芙蓉如约至，凌波入梦来。
守得来时身，平步上瑶台。

逍遥游

2011年11月于昆明
我梦上蓝天，游戏白云间。
了却凡尘事，佳人伴神仙。

致网友

2012年1月于昆明

相约阳光下，放飞梦风筝。
许愿有灵犀，知己值万金。

乡音不改

2012年5月于湖南宁远

走过千里路，看遍万里云。
乡音总不改，月是故乡明。

同学聚会

2012年5月于武汉

相逢是首歌，歌手是你我。
谈笑人生路，功过任评说。

题御笔峰

2012年5月于湖南张家界

壮哉张家界，天工巧安排。
孰能挥御笔？澄清万里埃！

跋

早在十年前我就想写回忆录了。但由于总是为了生计忙于打工而未能如愿。2014年春节后，我结束了打工生涯，这时我才真正静下心来开始写作。

开始的写作还顺利。到2015年8月，我已写完了1—25章，也就是说写完了从我出生到文革结束的这段经历。

2015年9月19日，江重初夫妇来昆旅游，我们就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他回到贵阳后又通过微信就写文革这段历史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并对我的写作给予了很大的鼓励。

这年年底，陈定方到贵阳见到江重初。江把我写回忆录的情况告诉了陈定方，陈定方立即和我取得了联系。两个月后，刘玉民组建了微信“思想者”群，这样我就和原华工革委会及《新华工》报的一些同学通过微信建立了联系，这对我的写作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写文章当然希望有人看。去年是毛主席发动文革五十周年，刘玉民建议我先在左派网站上发表几章看看反应。于是，我就将第三篇《文革篇》中的18~25章先后发到了网上，结果反应还可以，短短的两个半月内就有近万人次点击阅读和点评。

在写作第四篇《改开篇》的最后两章时发生了一些周折。很长一段时间甚至都停下来了。原因一是话题过于敏感，很难把握；二是觉得写作的才思已经枯竭，每次一打开在写文稿头就发晕，就会情不自禁地打开游戏软件玩起游戏来。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17年9月我参加宜昌—襄阳华工同学聚会结束为止。

宜—襄聚会后我去看望武汉的同学和朋友。在杜先荣的安排下，我见到了几个曾在网上看过我的文章的朋友。他们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并表示愿意资助我出书，让我十分感动，也给了我力量。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我终于写完了《风雨七十年》这本书的最后两章。

作为社会最底层的一个老百姓，我原想是不可能出书的。即使

有出版商愿意出我的书，我也没有钱自费出书。今天这本书竟然出来了，我非常感谢武汉的这些朋友。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华工同学刘玉民、江重初、陈定方、谈志殿等给了我很多帮助和鼓励，在此一并致谢。

但愿这本书给社会的是正能量。

张建华

2017年10月24日于昆明

